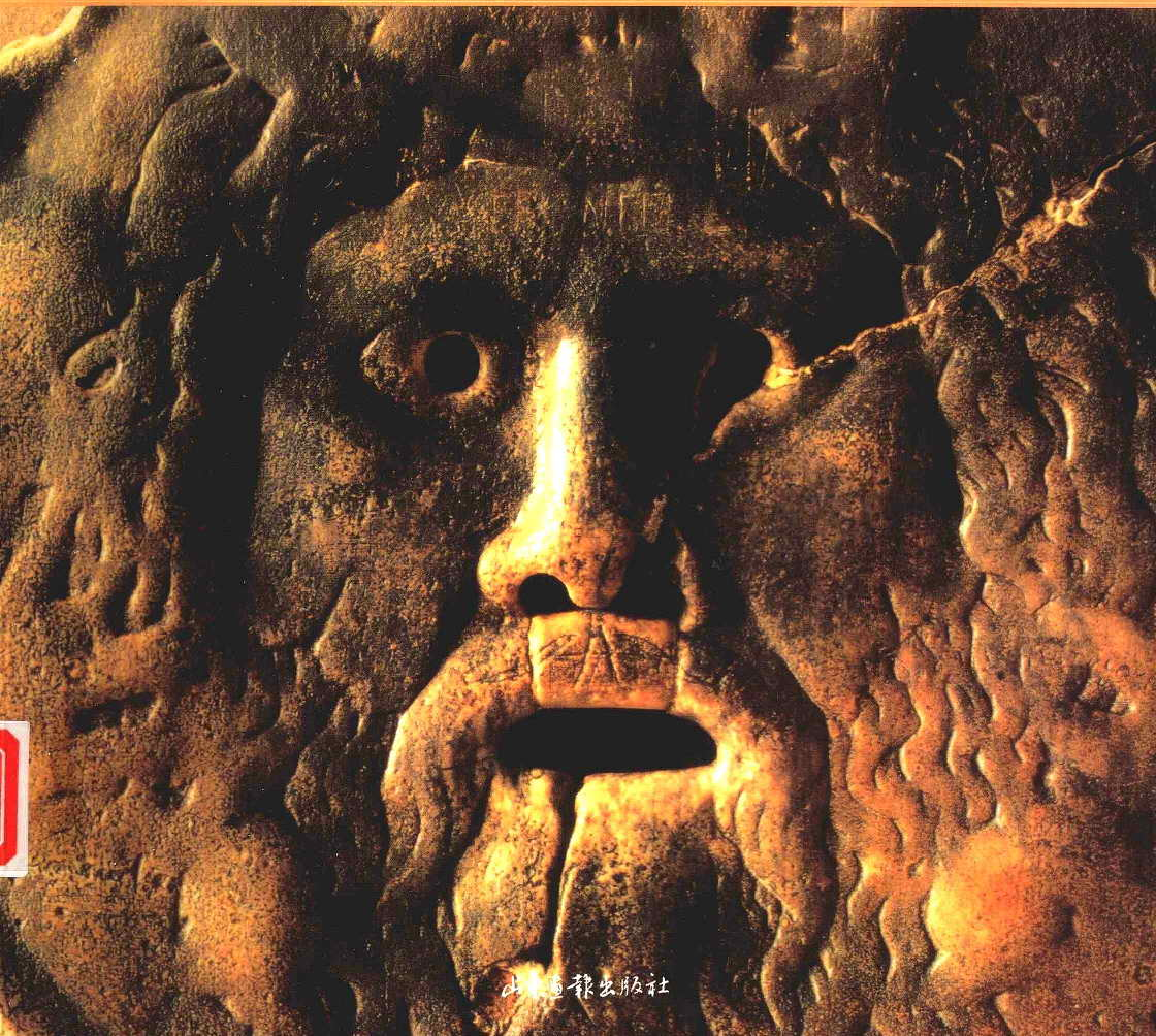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ROMAN WORLD

剑桥插图罗马史

[英] 格雷格·沃尔夫（Greg Woolf）主编　郭小凌　晏绍祥　崔丽娜　张　俊　王秀芹　周洪祥 译　郭小凌 审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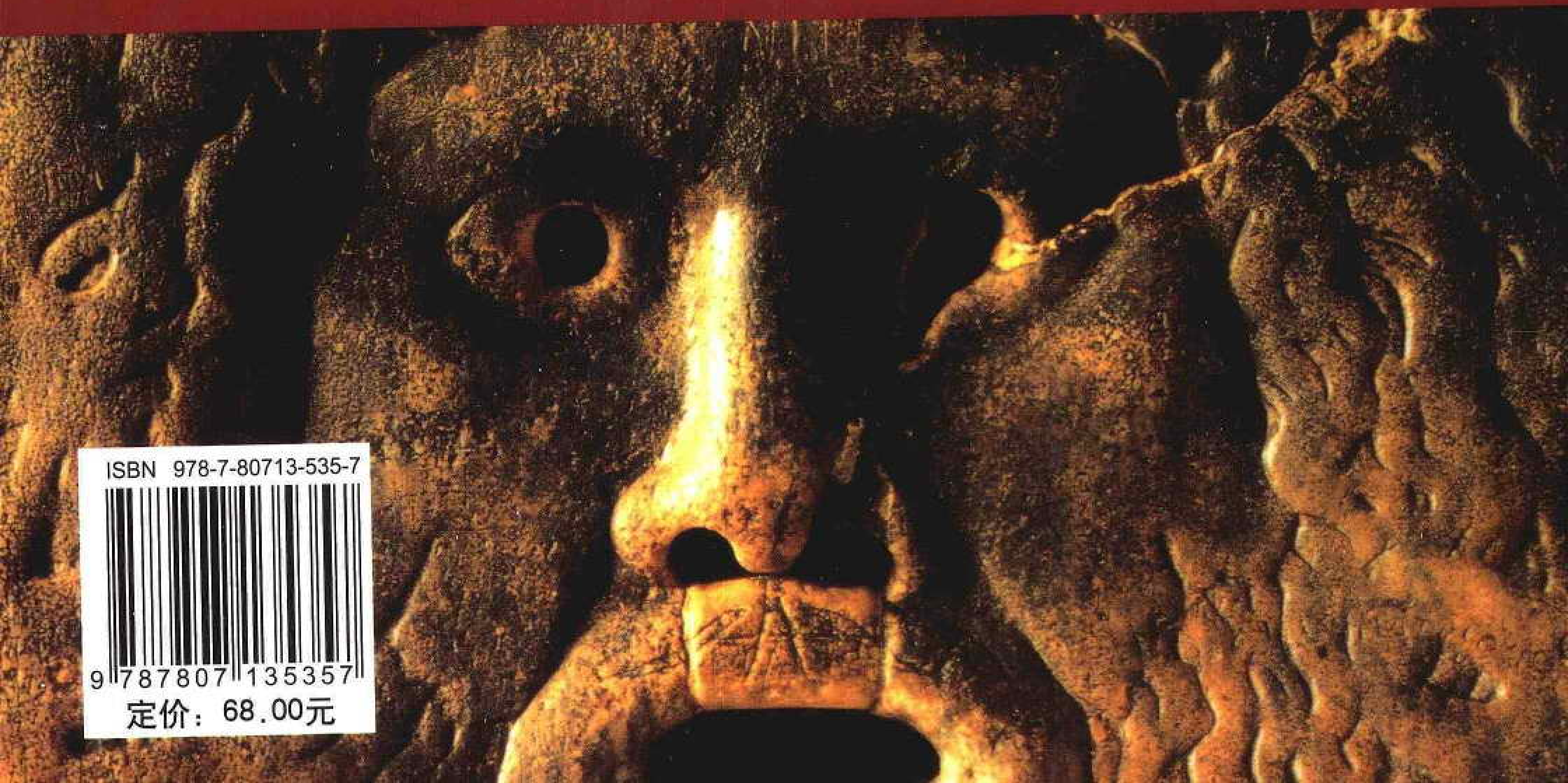
山东画报出版社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ROMAN WORLD

责任编辑＼于建成　装帧设计＼李海峰

古罗马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在其顶峰时期，罗马帝国的版图从北方的不列颠延伸到阿拉伯半岛的沙漠。这本新编的史书由国际知名的专家队伍写就，在最新研究和发现的基础上，展现出这个文明的一番景象。书内各章配以丰富多彩的插图，提供了有关罗马历史与文学的迷人描述，涉猎的主题从宗教到医学，从贸易到战争。这一切构建起了一种极富魅力的文明画面，其中浸润着皇权的作用、巨大的价值以及帝国获得的财富。

- 对世界最著名的帝国所做的一种不可或缺的介绍
- 由各国专家共同写就
- 令人愉悦，浅显易懂，适于学生、教师和一般读者



ISBN 978-7-80713-535-7
9 787807 135357
定价：68.00元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ROMAN WORLD

剑桥插图罗马史



〔英〕格雷格·沃尔夫(Greg Woolf) 主编
郭小凌 晏绍祥 崔丽娜 张 俊 王秀芹 周洪祥 译
郭小凌 审校

山东画报出版社

山东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5－2003－114号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剑桥插图罗马史/（英）沃尔夫主编；郭小凌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5
ISBN 978-7-80713-535-7

Ⅰ.剑… Ⅱ.①沃…②郭… Ⅲ.古罗马－历史 Ⅳ.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4965号



书　名　剑桥插图罗马史
主　编　［英］格雷格·沃尔夫
译　者　郭小凌　晏绍祥　崔丽娜　张俊　王秀芹　周洪祥
审　校　郭小凌
责任编辑　于建成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浙江港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201×250毫米
19印张　200幅图　360千字
印　数　1－7000
定　价　68.00元



目录









第一部

罗马人与他们的历史





第一章

发现古代罗马

格雷格·沃尔夫

发现古代罗马

我们是如何知晓1500年前便已消失的罗马世界的呢？答案是罗马从来就不曾完全消失过，它的法律、它后期的宗教以及某些文学作品幸存了下来，成为我们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它的某些人工遗迹也保存了下来。罗马的建筑或者被派上了新用场，或者摇摇欲坠变成废墟，时常出现在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并且成为文艺复兴及其以后的建筑师们的灵感来源。19世纪以来，罗马的铭文得到了研究；自19世纪后期起，更具世俗味的物质遗存——从陶片到人骨——已经向我们提供了有关罗马世界的生活经历。

可是，我们关于罗马世界的知识的基础，乃是罗马人自己创造的历史意识。罗马人对其文化的起源感到好奇，他们担心的是：关于罗马远古的过去已经失去了多少？如何填补其历史上出现的这些空白？像我们一样，他们以努力研究来寻找答案。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①是在410年罗马被阿拉里克(Alaric)②的西哥特人攻陷后不久开始其写作的，他写道：所有罗马学者中的最博学者，是生活于公元前116年到前27年的马尔库斯·泰伦提乌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③：

> 有谁曾比马尔库斯·泰伦提乌斯·瓦罗更加细致地考察过那些事情（罗马的起源与早期历史）？谁以更有学问的方式发现了它们？谁曾更专注地思考过它们？谁曾更精确地区分过它们？谁曾更加勤勉、更加充分地写出了关于它们的著作？尽管就雄辩方面而论，他的风格不是那么让人愉悦，但又是谁如此富有教益和智慧，以至我们称为世俗的所有学问中，他教给学生们的知识，就像西塞罗（Cicero）④的演说带给学生的快乐一样多？



在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的各个领域，瓦罗写过总数超过六百种的著作。保存到今天的，是他关于农业的手册以及许多其他作品的残篇，其中包括一部名为《罗马古事记》（*Roman Antiquites*）的著作，该书被分成人事和神事两部分。关于这部作品，我们所了解的绝大多数内容保存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因为他把《罗马古事记》变成了其攻击异教文化的靶子。奥古斯丁暗示，如果连瓦罗都不能把传统宗教变成一个让人信服的宗教，那么罗马宗教本身必然就是虚假的，不能像这个古老宗教的最后一批追随者所做

庞贝（Pompeii）的一幅罗马壁画（现存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博物馆），表现一个正处在写作中的年轻妇女。她把尖笔抵在嘴巴上凝神思考。在罗马肖像画中反复出现的这个象征性的、但非常熟悉的动作，表明这显然是常见行为。

① 圣奥古斯丁（354~430年），影响巨大的早期教父作家之一，曾任希波主教，著有《忏悔录》、《上帝之城》等重要著作。——译注

② 阿拉里克（约370~410年），西哥特人首领，曾率领西哥特人扫荡巴尔干和意大利，410年攻陷罗马，随后率军北上，病死于军中。这是自公元前4世纪初高卢人攻陷罗马后，罗马第一次被外族敌人攻陷（内战中罗马数次被罗马自己的军队攻占，并遭到可怕的抢劫），因此引起巨大震动。社会舆论因此谴责基督教，认为此乃罗马人背弃传统神灵、改信基督教所遭的报应。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在很大程度上为反驳此种看法而作。——译注

③ 瓦罗（公元前116~前27年），罗马最伟大的作家和讽刺作家，著有《美尼普斯式讽刺诗》、《论拉丁语》、《论农业》等，但仅有《论农业》完整传世。——译注

④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罗马政治家、作家和演说家，曾担任罗马执政官，镇压喀提林暴动，后支持庞培，反对安东尼，因参加反对“后三头同盟”的政治活动被杀。西塞罗写有大量作品，包括《论演说家》、《论共和国》、《论法律》等以及大量书信，是拉丁语文学的代表人物。——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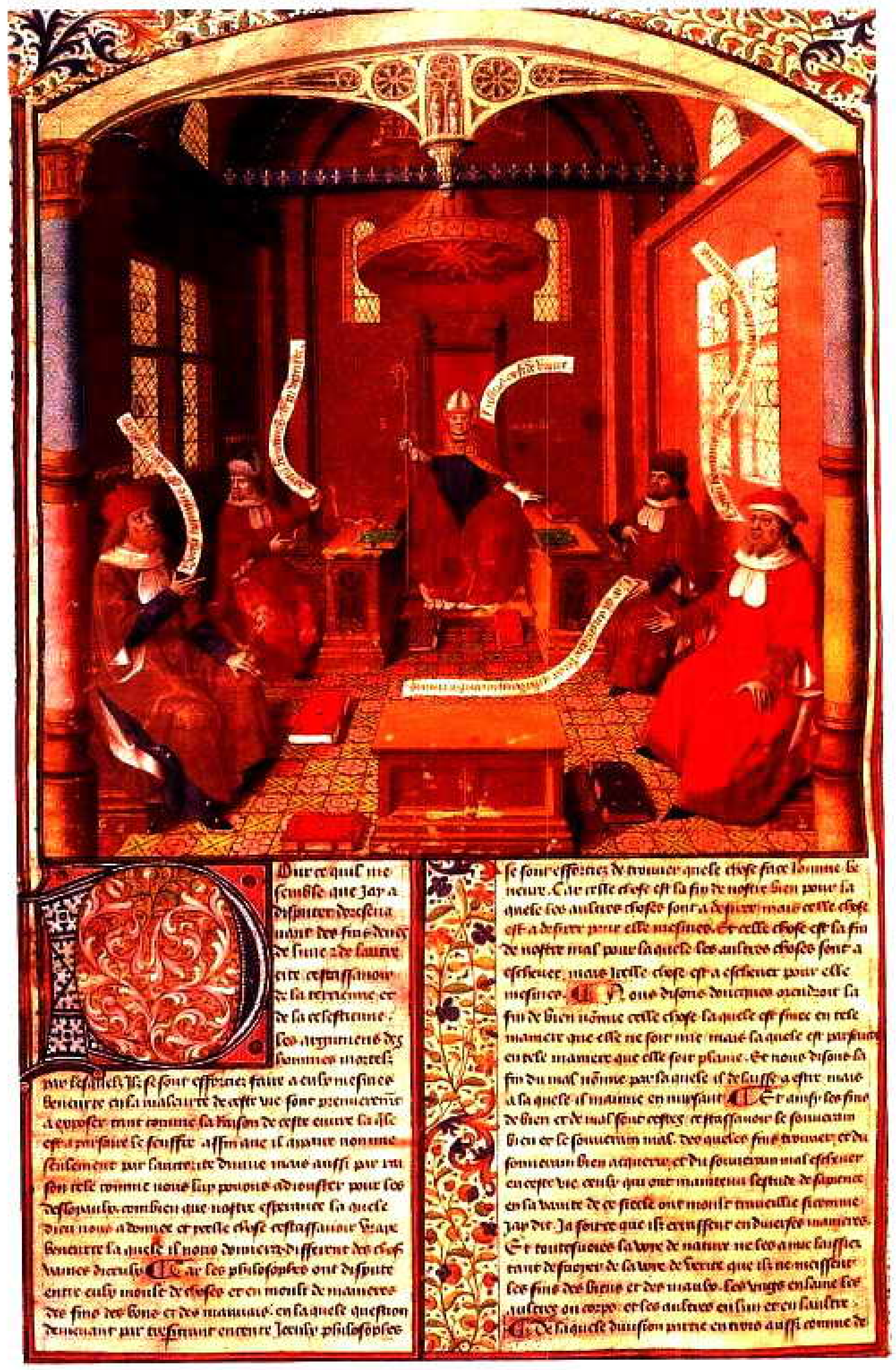
盖乌斯·斯塔提乌斯·塞尔修斯（Gaius Statius Celsus）的墓志铭与浮雕的局部。此人是一个罗马官员，在其墓志铭中被称为“最博学的”（doctissimo）。浮雕表现的是塞尔修斯及其妻子和儿子。

的那样，把罗马的浩劫归罪于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前辈们。

可怜的瓦罗，其作品竟然仅仅以其论敌的解说和引证的形式保存了下来，但这正是绝大多数我们知道名称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文献的共同命运。中世纪欧洲修道士的文化价值观与古代的作家们不同，仅仅抄写那些在观点上能够同中世纪基督教调和的作品。古代的作品是人们用手工抄在纸草卷上的，材料和抄写都很贵。纸草仅在尼罗河三角洲出产，所以需要从埃及进口，而抄写员绝大多数是奴隶，在奴隶市场上是价格最高的，因此，绝大多数作品只有很少的抄本。为了查阅一本书，学者们要走成百上千公里，直到那些领兵征服东部地中海区的将军们将希腊国王们的藏书作为掠夺物带回罗马时，罗马才有了它自己的图书馆，其中的一个将军，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Marcus Licinius Lucullus）[①]在其罗马城外豪华的别墅中建造了一座图书馆。这个地方正是瓦罗和西塞罗为查阅希腊文献著作时要来的地方（在他们那个时候，可供阅读的拉丁文献还很少）。

拉丁文献的保存

由于演说家们需要在没有笔记的情况下发表长篇演说，所以罗马的教育非常强调记忆，但集体记忆是弱不禁风的。上一代记住的事情，只有经历很



希波的奥古斯丁（354～430年）拥有巨大影响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一书的中世纪版本。他是古典古代晚期最伟大的基督教作家。插图上出现了奥古斯丁、伊壁鸠鲁（Epicurus）、芝诺（Zeno）、安提奥库斯（Antiochus）、瓦罗。中世纪的抄写员们甚至保存了一些非基督教古典作家作品的某些部分。

① 卢库鲁斯（约公元前117～前58或56年），罗马将军，曾先后出任罗马多种高级官职，在小亚细亚指挥罗马军队进攻亚美尼亚，后因部下哗变而收兵。——译注

叙马库斯（Symmachus）的建议

您要我给您提供关于高卢人的记载，那就先看看那位帕多瓦作家的最后几卷，其中有关于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活动的叙述；如果您觉得李维（Livy）提供的资料还不充分，那就利用我送给您研读的、我图书馆里恺撒作品中的简洁叙述。这些作品将告诉您高卢人的起源、地理和战争，并且提供关于他们的风俗和法律的资料。如果上天能让您如愿，我还会为您找到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日耳曼战争》（German Wars）。这些该让您满足了。

4世纪的贵族叙马库斯给一个希望成为研究古代高卢的历史学家的人提供的书目

大的困难才可能传给下一代。到奥古斯丁时代，许多较早的拉丁文献已经失传了，4世纪至5世纪后期帝国时代文人之间的通信表明，尽管已经有了五百多年的文化产品生产，但可供利用的书非常少，而且很难得到。

从罗马陷落到发明印刷出版的许多个世纪里，古代文献仍然很容易失传，纸草保存的时间不如羊皮纸那么长。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古代书籍才会有几页幸存到今天，其中大多数是在中东，尤其是在埃及的沙漠中发现的，它们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因为那里的干燥环境。有几个纸草卷以碳化的形式保存在因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而遭到烧弃的房子中，目前人们正利用光谱摄影技术将文字从碳化的纸上区分开来，以努力破解这些文献。其中一座如今被称为纸草别墅的房子设有私人哲学文献图书馆，其中包括菲洛德穆（Philodemus）[1]的作品。在这次发现之前，人们对这些作品几乎一无所知。对现存古典文献的系统研究是由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学者们开始的，近现代罗马史学家们视为当然的许多文献——塔西陀（Tacitus）[2]的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之间的1000年里，仅仅有10余部手稿保存。人文主义者们汇集、抄录和传播了古典拉丁语文献，将它们安全保存下来，直到印刷技术使这些作品可以得到广泛利用，但是大量作品此前已经散佚。

因为最初的纸草卷几乎都已毁失，所以古代的文献只有在经过中世纪多次的抄录和再抄录之后才得以保存下来。既然学习总是和中世纪的教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这项工作绝大多数时候由修道士们进行。许多希腊语文献保存在拜占庭帝国的图书馆中，它们或者是在第四次十字军期间，因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占领后被带到西方，或者是在15世纪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带到西方的，因为他们占领了东南欧。几部希腊人的科学作品，包括医学作品，以阿拉伯语译文的形式保存下来，它们是由一个在许多方面高于中古西欧的思想传统保存下来的。罗马的三个继承者——西方的基督教、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世界——只是在13世纪才开始分享他们保存的作品。在中世纪只有西方才有许多幸存的拉丁语文献。

那些作为古典拉丁语文献监护人的修道院抄写人对古代罗马了解很少，更重要的是，他们和罗马人的价值观仅有少许共同之处，因此他们让那些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自生自灭。他们对拉丁语修辞保持着持久的兴趣，瓦罗的绝大多数作品随之失传，但他的当代人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的作品在中世纪作为修辞风格的典范得到赏识，被一再抄录，因此有很多保存到今天。

西塞罗得到赏识的原因之一，是在他于公元前43年死后一代人的时间里，其作品已经变成了经典。西塞罗的作品与其他十余个作家——其中之一是剧作家普布里乌斯·泰伦提乌斯·阿菲尔（泰伦斯）（Publius Terentius Afer）[3]，另一个是史诗诗人普布里乌斯·维吉里乌斯·马罗（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4]——的作品一道，成为学校的教材，因此几乎比任何其他作家被传抄的次数都多。在帝国时代的文化中，这位失败的事业的捍卫者——他终生在为保存罗马国家，防止其受到伟大的将军们的统治——竟然成为这么关键的一个人物，似乎让人奇怪。简短的解释是：罗马的文化成果从来没有被完全置于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

① 菲洛德穆（约公元前110～约前35年），希腊诗人和伊壁鸠鲁派哲学家，曾将伊壁鸠鲁主义传播到罗马，其诗歌对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诗人维吉尔等产生过一定影响。——译注

② 塔西陀（约56～约120年），罗马帝国时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所著《历史》和《编年史》构成了对1世纪罗马帝国历史的完整叙述，可惜均未完整保存下来。——译注

③ 即泰伦斯（约公元前195～前159年），又译为泰伦提乌斯。罗马伟大的剧作家，写有六部剧本，对罗马教育和后世欧洲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语言成为纯正拉丁语的典范。——译注

④ 即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年），罗马最伟大的诗人，著有史诗《埃涅阿斯》，另有田园诗、牧歌等多种作品。他的作品被视为拉丁语文学的典范，而且对近代西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译注



一部15世纪的手稿插图，表现的是学者之间的一场辩论。该插图是西塞罗《论老年》（*De Senectute*）中世纪版本的一部分，两个老年学者和其年轻的同事形成对比。西塞罗的声望，使他的许多作品在中世纪通过抄录保存下来。

大人物常常不得不迁就古代的典籍。自公元前3世纪文学兴起以来，它在罗马所享有的声望，确保那些有权势的人努力保护他们那个时代的伟大诗人。

文学与权力

文学与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最好例子，是中世纪传统中的另一部伟大的经典——维吉尔的作品。维吉尔比西塞罗年轻，内战刚结束，他就开始了写作生涯。这场内战在罗马建立了常被称为元首制的君主制度(有时被简单地称作帝国，而这个名称也许让人迷惑，因为罗马共和国已经是一个帝国了)。如今维吉尔作品中最知名的是他的史诗《埃涅阿斯》，诗中叙述一个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Aeneas）如何逃过希腊人对特洛伊的攻占、到达意大利并建立罗马民族的传说。关于这个神话还有其他版本，它们与将罗马追溯到罗慕路斯



让·约瑟夫·塔拉逊（Jean-Joseph Taillasson）1787年的一幅绘画，画上是维吉尔正向奥古斯都和他的姐姐屋大维娅（Octavia）朗读《埃涅阿斯》的情景。该画重现了一个著名的情节：诗人额外提到了屋大维娅刚去世的儿子马尔凯路斯（Marcellus）作为年轻人具有的美德，使她晕了过去。罗马人将文学和保护结合起来的典型做法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Romulus）和勒摩斯（Remus）①的传统不太协调，但维吉尔选择埃涅阿斯为其文化英雄，把奥古斯都（Augustus）②变成埃涅阿斯的一个后裔，用“闪进”方式把史诗和维吉尔自己的时代捆绑在了一起。于是维吉尔让埃涅阿斯访问阴间，以接受有关未来的详尽预言。维吉尔给了埃涅阿斯一个盾牌，上面刻有最后结束内战的阿克兴战役（the Battle of Actium）的情景，他还让埃涅阿斯在罗马未来的城址上流浪。正是在这些地方，在维吉尔在世时，奥古斯都忙着修建各种纪念建筑。

弥漫于《埃涅阿斯》的对奥古斯都胜利的预言，让近代的一代代的学者们感到困惑。有些人觉得，伟大的艺术应当高于当时的政治；其他人则觉得，这部伟大的诗歌因为与暴政过于密切的关系而遭到了削弱。许多近代批评家试图在他的作品中搜寻反奥古斯都潜流来挽救维吉尔；其他人则想象他内心的雄心大志和意识之间的紧张状态：一方面他希望成为罗马人的荷马（Homer）③，希望超过共和国时代的前辈，如诗人哲学家提图斯·卢克莱提乌斯·卡路斯（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④，或者史诗诗人克文图斯·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⑤。另一方面，他意识到只剩下了一个保护人，即皇帝，而他会烧掉他不喜欢的书。但是，这些担心都是近代人的，要求在艺术和政治之间划一道鸿沟，是晚近和浪漫的观念。在任何一个艺术由权贵保护的时代，艺术家们都会拥有自己的权力和声望。

元首制时代西塞罗持久的成功，恰恰仰赖于他的演说所获得的声望。尽管如此，有些罗马人还是意识到了其中存在的讽刺：一代又一代的罗马贵族和官员阅读那些谴责独裁统治的文献，被教育出来为皇帝服务。恺撒死后，西塞罗发表的演说——谴责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⑥，并试图将元老院重新聚合在恺撒继承人屋大维（当时的奥古斯都）周围——如此重要，以至当安东尼和屋大维合兵一处时，安东尼要求将西塞罗加到被判处死刑的反对派名单中。这位老人于是被杀害，头和手被砍下，放在演讲台（rostra）——那是广场上演说家们的讲坛——上展览，作为反对者将被处死的警告。

这些事件过去一百多年后，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奎努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⑦写了一部奥古斯都的传记，其中讲了一个故事，说高龄的皇帝发现他的一个孙子正读着纸草卷，纸草卷上抄录的

① 在荷马史诗中，埃涅阿斯是特洛伊方面对抗希腊人的领袖之一。城市被攻陷后，他率追随者逃出，辗转到达意大利并定居在那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即以埃涅阿斯的流浪和定居意大利为主题。罗慕路斯和勒摩斯是埃涅阿斯的后代，传说两人是一对孪生兄弟，为母狼养大，后成为罗马城的建立者，罗慕路斯还是罗马的第一个国王，但现代学者多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历史上实无此二人。接着提到的奥古斯都则是历史人物，他在共和国末年的内战中先后击败竞争对手，成为罗马帝国惟一的统治者，奠定了罗马元首制的基础。——译注

②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年），罗马将军和政治家，元首制的创立者。曾为恺撒继子，后与安东尼、雷必达结成三头同盟，击败共和派，接着剥夺了雷必达的军权、打败安东尼，成为罗马的惟一统治者。统治期间对罗马内外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改革罗马制度，其统治标志着罗马共和国的终结和帝国的开始。——译注

③ 传说为早期希腊的盲诗人，是著名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译注

④ 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和伊壁鸠鲁派哲学家，《物性论》为其主要作品。——译注

⑤ 恩尼乌斯（公元前239—前169年），罗马叙事诗人、戏剧作家和讽刺诗人，罗马文学之父，著有史诗《年代记》，戏剧《萨宾人妇女》、《西庇阿》等。——译注

⑥ 安东尼（约公元前82或81—前30年），罗马将军和政客，原为恺撒部将，后与屋大维、雷必达结成后三头。公元前31年被屋大维击败，逃往埃及后自杀。——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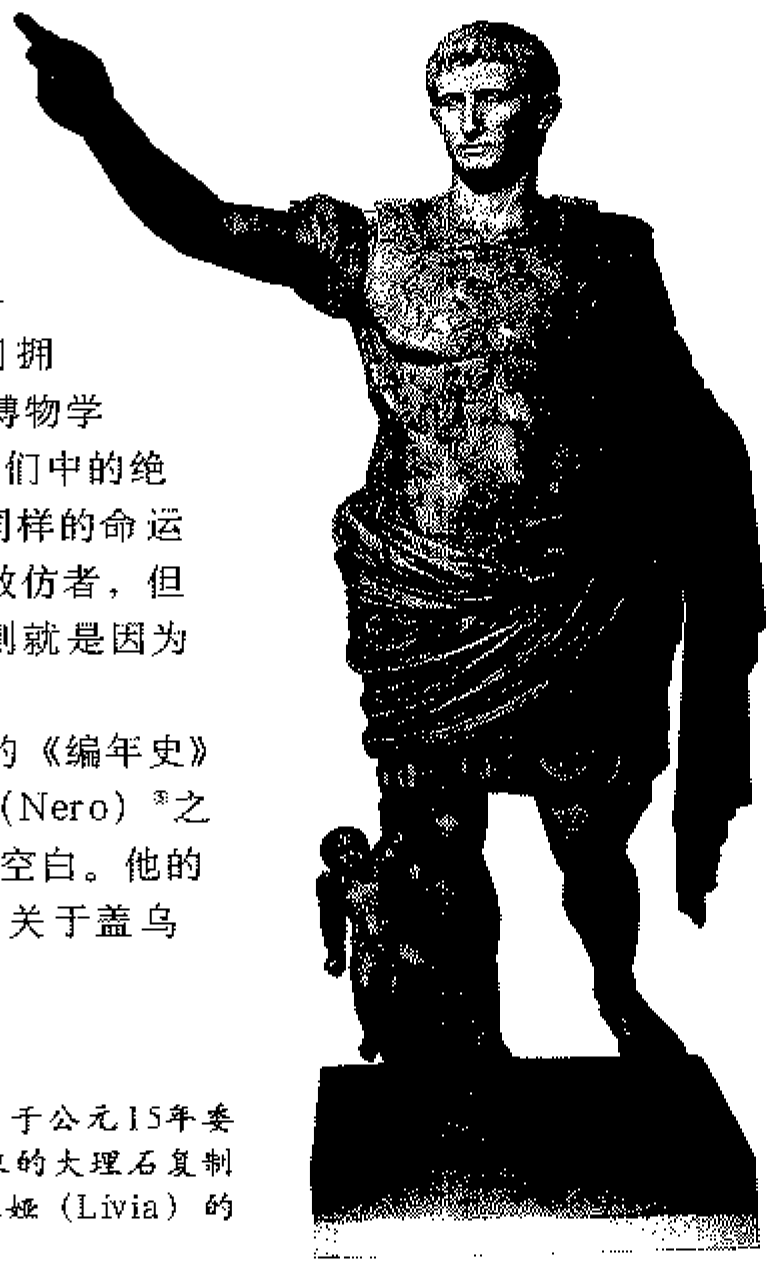
⑦ 苏维托尼乌斯（约69—约122年以后），罗马作家，写有《十二恺撒传》，记录了自奥古斯都以来到1世纪末罗马12个皇帝的事迹。——译注

是西塞罗的一篇演说。孩子徒劳地想把纸草卷藏起来，但皇帝看过演说后，把它递了回去，称赞西塞罗是一个热爱祖国的好人。这是一个优美的故事，暴君成熟了，演说家重新获得了地位，王子和他的祖父实现了隔代的和解。到苏维托尼乌斯时代，西塞罗已经变成了古代历史，一部无害的经典。2世纪的罗马人带着感伤的怀旧情绪谈论起被称为共和国的时代，但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现在中。可是，有关西塞罗的真相是不同的。奥古斯都能够烧掉他的批评者所写的历史，因为人们只有那么少的抄本，但西塞罗的作品流传如此广泛，以致他们无法进行检查。

文学的典范

因此，我们拥有的拉丁语文献，很大程度上是大约公元1世纪初创作的古典文献的范本。罗马的学校以及那些从这些基本相同的文献中学到拉丁语的中世纪的教会人员，都保存了这种典范的规则，同时还有许多更随意地保存下来的或早或晚的作品。当然，有些经典属于西塞罗之前，马尔库斯·波西乌斯·加图（老加图，Cato the Elder，又称Marcus Porcius Cato）①是第一个将自己的演说精炼后让其流传的演说家。维吉尔之前，恩尼乌斯已经写过一部关于原始罗马的史诗；盖乌斯·卢基里乌斯（Gaius Lucilius）②是第一个讽刺作家。但是，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Horace）③以及其他作家成功地把他们的前辈变成了粗鲁的原型，并且让他们自己变成了拉丁语风格的里程碑，因为罗马世界各地学的都是这种风格。许多更早的作品保存到公元2世纪，我们拥有一些那个时期有关这些作品的几条引文。它们常常出现在罗马博物学家以及那些对拉丁语的古朴形式感兴趣的语法学家的作品中，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熬过被选择以及为我们保存了典范作品的抄录过程。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许多1世纪后期及其以后的作品上。维吉尔的史诗有许多效仿者，但仅有几部保存下来。我们所拥有的后期拉丁语作品大多残缺，否则就是因为在偏远的修道院图书馆中有一到两部抄本幸存下来。

结果，我们拥有盖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塔西陀于2世纪写作的《编年史》的几个部分，但没有他关于卡里古拉（Caligula）④统治或者尼禄（Nero）⑤之死的叙述，关于提比略和克劳狄（Claudius）⑥的统治，叙述存在空白。他的《历史》描述的是较晚的时期，在犹太战争开始处突然中断了。关于盖乌



普里马－波塔的奥古斯都像，奥古斯都的继承者提比略（Tiberius）于公元15年委托制造的纪念像，可能是一件对定年为公元前20年的、已经失传的青铜像的大理石复制品。它发现于离罗马约14公里的普里马－波塔一座属于奥古斯都妻子李维娅（Livia）的别墅中。

① 即老加图（公元前234～前149年），罗马演说家、政治家和作家，迦太基坚决的反对者，以维护罗马传统、反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希腊文化影响著称。著有《论农业》、《自建城以来》等重要著作，但仅有《论农业》完整流传下来。——译注
② 卢基里乌斯（约公元前180～约前103或102年），又译卢齐利乌斯，罗马讽刺诗首创者，其作品死后汇集出版，现存约一千三百行。——译注
③ 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年），又译为贺拉西，罗马共和国末年和帝国初年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著有《讽刺诗集》、《长短句集》、《书简》、《诗艺》等。——译注
④ 卡里古拉（12～41年），罗马皇帝，本名盖乌斯·恺撒，卡利古拉乃其绰号，意思是小靴子。他的统治极为残暴，自比为罗马主神朱庇特，后被近卫军杀死。——译注
⑤ 尼禄（37～68年），罗马皇帝，世界史上的著名暴君。54年继位，前期受塞涅卡和近卫军长官布鲁斯指导，尚能顺利进行统治。后期统治残暴，甚至为逃脱罪名而用火刑处死基督教徒。其统治被罗马贵族政变推翻。——译注
⑥ 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年），罗马皇帝，在位期间励精图治，稳定了由奥古斯都开创的元首制。克劳狄（公元前10～公元54年），罗马皇帝，在位期间加强皇权，尤其在发展罗马官僚制度方面建树较多。但他受其妻子和解放奴隶影响甚大，后据传被其妻子毒死。——译注



约斯特·阿蒙（Jost Ammon）为李维《历史》早期印刷本所作木刻，1568年出版于法兰克福。画面描绘的是希腊数学家和发明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在罗马人公元前212年攻陷叙拉古时被杀的情形。李维描述道：发明家如此专注于自己的计算，以至当罗马士兵进入他的研究场所时，他甚至都没有抬头看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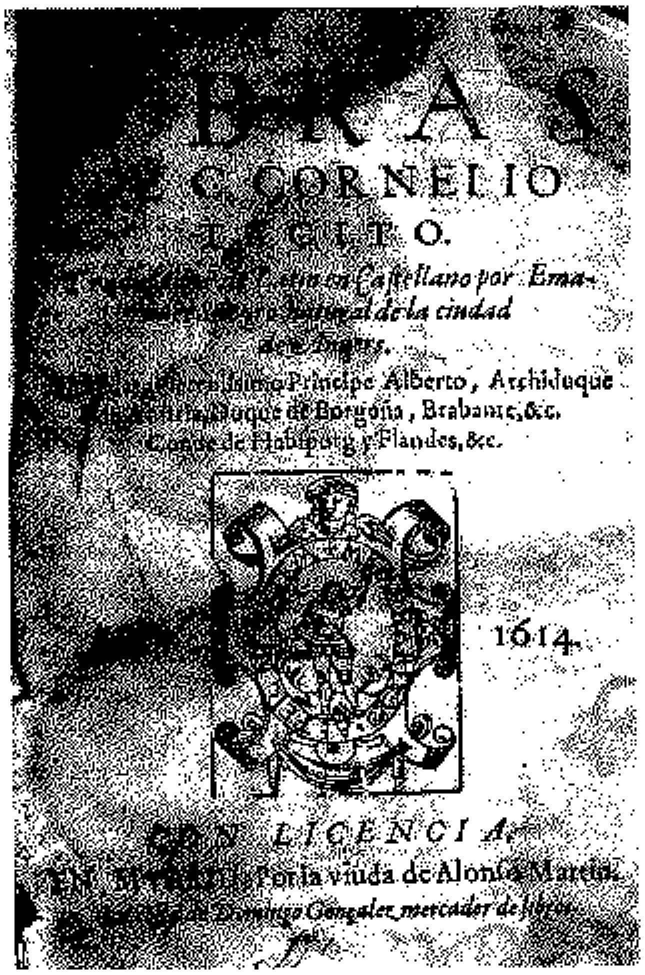
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撒路斯特）（Gaius Sallustius Crispus）[①]——正好在恺撒死后开始写作——的作品，我们拥有两部小的著作，一部是关于反对朱古达（Jugurtha）[②]的战争的，另一部是关于西塞罗公元前63年担任执政官时与喀提林（Catiline）[③]的冲突。但是，撒路斯特的《历史》——那部叙述共和国崩溃的历史，我们仅拥有几条摘要，而且是一个对修辞学而非历史更感兴趣的读者做的摘要。提图斯·李维乌斯（李维）（Titus Livius）[④]的作品也只是部分保存下来。就他的作品而言，我们还有一部摘要——每卷一段的摘要，使我们对那部《自建城以来》到李维本人时代罗马历史的巨著最初的轮廓有所了解。他本人的时代是奥古斯都时代，"当时我们既不能忍受病痛，也不能接受治疗。"在到4世纪止重要的拉丁历史学家中，我们拥有相当大部分作品的，仅有他们三位：撒路斯特、李维和塔西陀。除他们之外，我们再添上一些次要作家以及一些后期希腊作家的作品，拼凑起罗马共和国和早期帝国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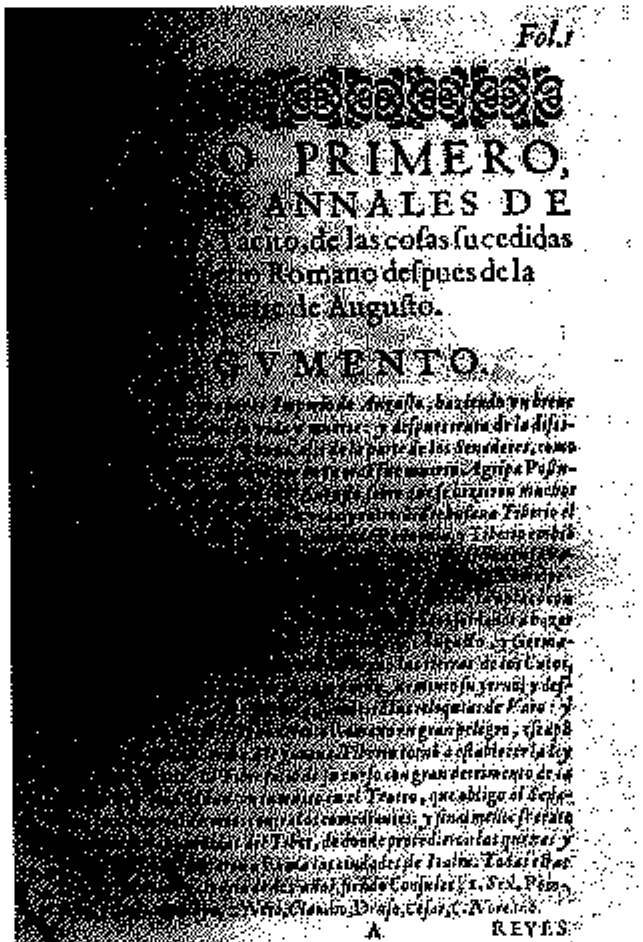
我们所以对西塞罗时代了解得比罗马史上任何其他时代都多，原因是他那么多的演说以及对这些演说的某些注疏被保存了下来。他的许多书信——它们是写给当时的许多大人物的——因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Petrarch）[⑤]而重见天日。同一时期恺撒关于他在高卢的战争以及随后他与庞培（Pompey）[⑥]及其支持者的战争的自我陈述也保存下来了。这一时期在古典古代后来所获得的经典地位，也吸引了其他作家，其中之一是希腊哲学家卢基乌斯·马斯特里乌斯·普卢塔库斯（Lucius Maestrius Plutarchus，普卢塔克〔Plutarch〕）[⑦]。他的《平行列传》（*Parallel Lives*）本来是要创建一种超越希腊与罗马文化规范的道德观点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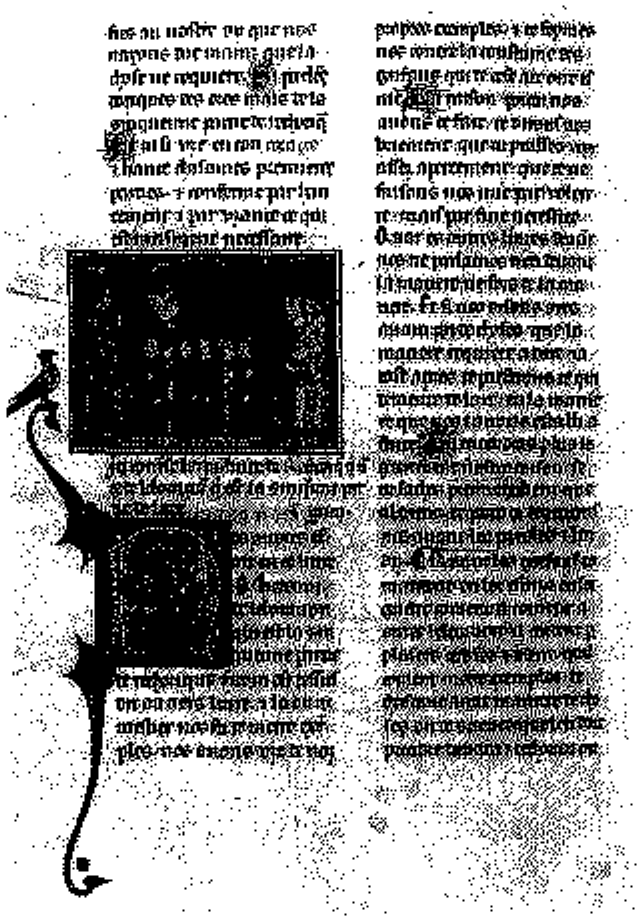
李维《历史》一书约1450年版本的一个绘图首字母。中世纪的艺术家们提供了关于该书（李维著作的第XXI–XXX卷）主要情节的一个非常简明的摘要，这些卷叙述的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插图表现了汉尼拔（Hannibal）在调动军队及战象时的技巧，左上方一幅表现的是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情景。

① 即撒路斯特（约公元前86~前35年），罗马军人和历史学家，著有《朱古达战争》、《喀提林阴谋》等。——译注
② 朱古达（约公元前160–前104年），北非努米底亚国王，于公元前112年对罗马发动战争，后被马略击败，被罗马人处死。——译注
③ 喀提林（约108~前62年），罗马政客，两度参与执政官竞选失败后，纠集支持者准备武装推翻罗马共和国，被西塞罗挫败，本人也战败身亡。——译注
④ 即李维（公元前64或公元前59~公元17年），罗马历史学家，其名作《自建城以来》为罗马共和国的通史，始于传说中的罗马建城，止于公元前9年。现存1至10和21至45卷，其他各卷仅有摘要和残篇。——译注
⑤ 彼特拉克（1304~1374年），意大利学者、诗人和人文主义者，第一个提出要来一个古典文化的全面复兴，搜罗和发现了大量古典著作，作品有《阿非利加》等。——译注
⑥ 庞培（公元前106~前48年），罗马军人。原为苏拉部将，曾指挥罗马在东方的战争，吞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完成清剿海盗的任务。后与恺撒、克拉苏结成同盟，史称前三头。再后因克拉苏战死，与恺撒的矛盾激化，乃倒向元老院。公元前48年在与恺撒的决战中失败，逃往埃及后被杀。——译注
⑦ 普卢塔克（约46~119年以后），罗马时代希腊的哲学家、作家，著有《平行列传》（已出中译本译为《希腊罗马名人传》不确，因传中包括非希腊罗马人）、《道德论集》等著作，为研究希腊、罗马史的重要史料。——译注





左图和中图：塔西佗作品印刷版的书名页和正文页。该书是1614年在西班牙翻译和出版的。



右图：西塞罗《论演说家》(*Rhetorica*)13世纪法文抄本的一个插图页。这位中世纪的艺术家在其中插入了一幅名为《一个（演说家）大师向六个学生和两个成人发表演说》的微型画。虽然拉丁语仍是中世纪国家官员们的正式语言，但西塞罗是该语言公认的大师，他的作品因而成为贵族的基本读物。

评价人类的行为，但其中包括卢库鲁斯、庞培、克拉苏（Crassus）[1]、西塞罗、恺撒和安东尼的传记。所以，对于公元前1世纪60年代和50年代，我们事实上可以逐月追溯政治同盟的转换，我们还能够看到人们如何变得富有，观察到他们对财产和家庭的管理，看见祭司和法官在处理公务，发现人们读什么样的书，欣赏他们的爱恨情仇等等。

关于公元前70年代以前的时期，我们所知少得可怜。2世纪的希腊作家阿庇安（Appian）写过一部伟大的罗马史，其中描述格拉古兄弟（the Gracchi）[2]以来罗马内战的各卷完整保存了下来。阿庇安可能使用了早期拥有良好资料的历史学家的作品，但他把许多关键问题弄混了。例如，只是从回顾的角度看，罗马和它的意大利同盟者在公元前91年至前89年进行的同盟战争就可以被作为内战来处理；关于马略（Marius）[3]和苏拉(Sulla)[4]的许多叙述，大概依据的是苏拉公开发表的《回忆录》，但该书如今仅存残篇；像关于公元前2世纪后期的记载一样，李维关于这一关键的几十年的记载完全失传。关于该世纪的前半期，我们拥有波利比乌斯

① 克拉苏（约公元前115－前53年），罗马大奴隶主、军人。曾镇压斯巴达克起义，后与恺撒、庞培结成前三头同盟。公元前53年入侵帕提亚失败，被俘后被处死。——译注

② 即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约公元前169到前164－前133年）和盖乌斯·格拉古（约生于公元前160年至前153年之间，卒于前121年），罗马政治家和改革家。两人先后当选保民官后，鉴于罗马小农经济崩溃、兵源短缺而战线拉长的形势，乃提出一系列改革法案，企图恢复罗马的小农经济和传统的公民兵制。但因遭到贵族的猛烈反对，更兼形势复杂，改革先后失败，两人也分别在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暴力冲突中丧生。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标志着自共和国建立以来以和解与妥协为特征的内斗方式的终结、罗马内战及共和国到帝国过渡的开始。有关内容见本书第二章《政治暴力的兴起》部分。——译注

③ 马略（约公元前157－前86年），罗马政治家和军人，自公元前107年起多次出任执政官，进行以募兵制为中心的军事改革，利用新组建的军队胜利结束了朱古达战争，击败入侵意大利的日耳曼部落。后与苏拉争权失败。公元前86年病死。——译注

④ 苏拉（公元前138－前78年），罗马军人和政客。原为马略部将，在对朱古达的战争中俘虏了朱古达，在同盟者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为与马略争夺对米特拉达弟战争指挥权，而煽动军队进攻罗马，夺取政权后进行恢复传统贵族共和国的改革。在打败米特拉达弟后回师意大利，与马略派展开厮杀，重掌政权，成为终身独裁官。公元前78年病死。——译注



李维《罗马史》法文抄本起首篇的插图，大约制作于1370年，表现的是一个修道士正在抄写手稿的情景。

(Polybius)[①]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该书是一部富有思想性的作品，叙述罗马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后是如何逐步统治地中海世界的。但波利比乌斯《通史》的绝大部分仅存残篇，而且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希腊人，他更感兴趣的是罗马帝国主义和地中海历史的统一，而非罗马的政治生活或者文化。

在叙述公元前2世纪早期罗马对希腊化诸王国的战争时，李维使用过波利比乌斯的部分记载，他关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汉尼拔入侵的叙述也相当充分（尽管我们所依赖的这位历史学家，是在他所叙述的事件过去200年后才写作的）。但是，尽管罗马从一开始——传统归于公元前8世纪——就与希腊世界保持着接触，但在罗马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之前，希腊作家对它并不感兴趣。最早的罗马历史学家要到公元前3世纪才产生，他是费边·皮克托（Fabius Pictor），[②]一个用希腊语写作的作家。在那之前的罗马历史，至今迷失在黑暗之中。

像我们一样，罗马作家希望更多地了解他们的早期历史。就像在他之前的和他之后的许多其他人做的一样，维吉尔发明了罗马起源的历史，因为他无可选择。在李维的《前言》中，他对维吉尔认为这种发明有理的说法提出了怀疑：

城市建立（也就是说，由罗慕路斯建立）以前所发生事件的传统，或者说城市正在建立时所发生事件的传统，更适合装饰诗人的创作，而不是历史学家的真实记载，我无意确认它们到底是真是假。传统允许古人某种程度的任意性，让人类和神灵的行为可以混合，以使得国家的起源显得更加具有尊严。如果有哪个国家能够宣称其起源神圣而且追溯到某个神灵祖先，那个国家就是罗马式的。她在战争上取得的声望如此之高，以至当她选择宣称马尔斯（Mars）是她的和她的建立者的父亲时，世界各民族都像他们接受罗马的统治那样，同样平静地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是，对于基于此类传统或者其他类似传统形成的意见和评论，我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

尽管如此，李维还是不可避免地简短叙说了特洛伊流亡者的故事，并且简短叙述了罗马的各个国王，然后才继续谈共和国的建立。

与希腊人的联系

我们知道，对维吉尔和其他罗马作家而言，埃涅阿斯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创建者，因为他给罗马人提供了与英雄时代希腊神话以及最早的希腊文学作品荷马史诗的合法联系。因为同样的原因，罗马人需要一部比布匿战争更早的历史。关于高卢人攻陷罗马、与中部意大利各个邻国的战争以及驱逐国王和建立共和国的传统说法，显然保存到了共和国后期。有一些记载涉及贵族和平民以及其他人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贵族宣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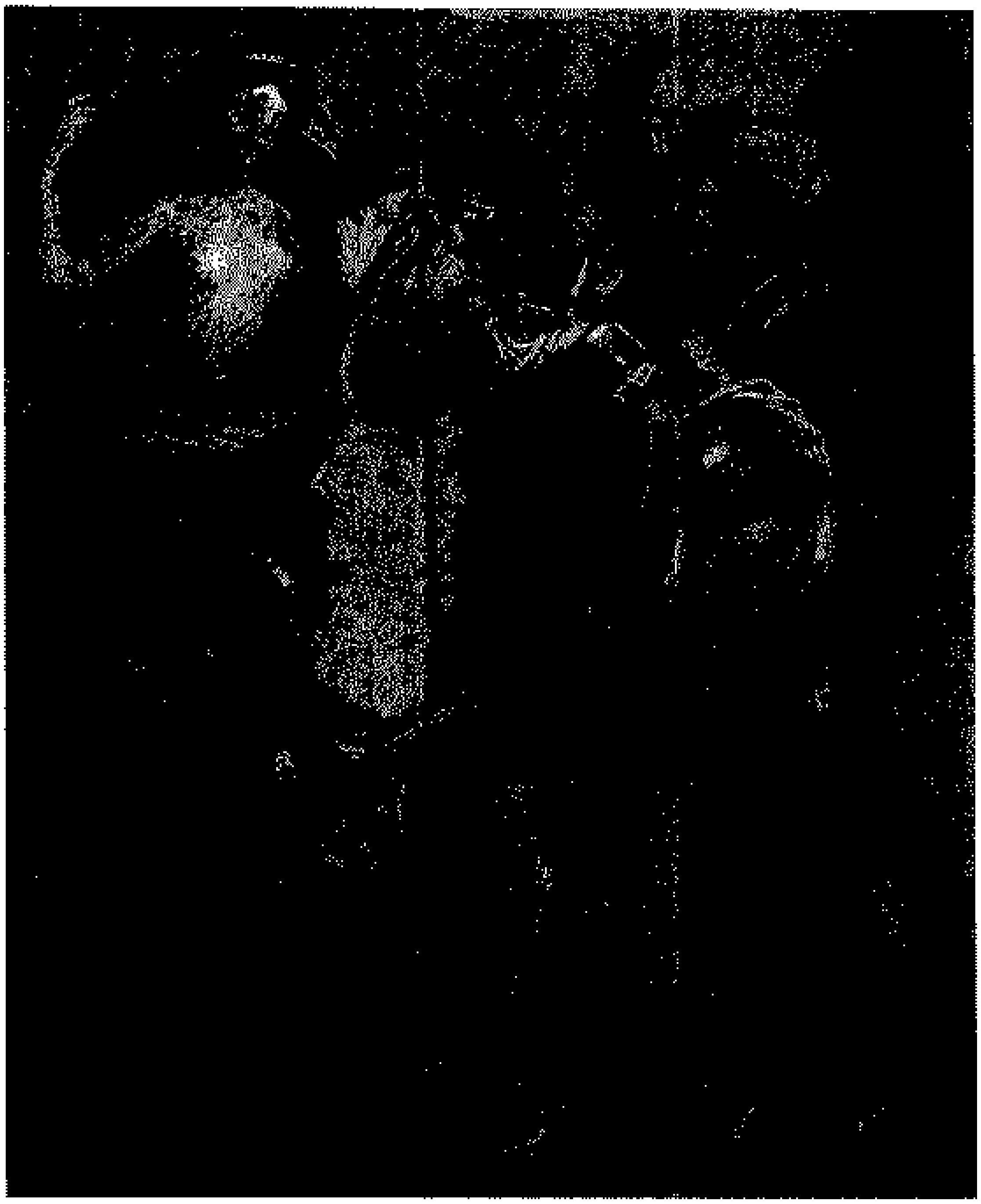
① 波利比乌斯（约公元前200～约前118年），又译为波利比阿和比吕比奥斯，希腊历史学家，其名著《通史》系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主要叙述布匿战争以来罗马扩张和征服地中海世界的过程，其中仅1至5卷完整地保存至今，其余仅存残篇或者摘要。——译注

② 费边，公元前3世纪末和前2世纪初罗马军事家和作家，曾在汉尼拔战争中采取消极避战的策略，人称费边策略，并用希腊语写有罗马的历史，已失传。——译注

他们是王政时代的贵族后裔（基于此，他们希望独占政治官职和祭司职位）。在某个时候，据说平民放弃了罗慕路斯的城市以及（传统称）由塞尔维乌斯（Servius）①国王设防的地区，威胁要在阿芬丁山建立自己的共同体。

这些传统说法是如何传递的？是通过浓缩在戏剧或者仪式化的重述传下来的“家庭的记忆”，还是通过平民和贵族相互竞争的口传历史？近现代的学者们对此争论激烈，我们也会就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信进行论证。尽管个别国王的具体名字与性格可能是后来伪造的，但君主制度是真实的存在吗？或者说最后的几个国王是真实的，但前面的三个国王分别是被发明出来的罗马政治、宗教和军事制度的创立者呢？根据我们了解更清楚的、人们讲述的关于希腊僭主的类似资料来看，关于诸王的许多故事令人生疑。

可是，如果把我们首次在公元前3世纪才看清楚的罗马复杂的、精细的政治和文化社会当作是一蹴而就的事物，那也让人不可思议。从一般的发展来说，公元前5世纪的罗马肯定像那些我们在成文历史中了解如此之少的希腊城市。可是，虽然阿哥斯、科林斯、底比斯以及其他城邦在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主角的历史中也能扮演某些次要角色，但古风和古典时代的罗马没有什么近邻，让我们可以从它们那里得到潜在的、重要的历史资料。相反，罗马城是作为一个动态的希腊化共和国，在其盛期拥有大约两倍于雅典的人口而在历史上清晰起来的。达到那一步用了多长时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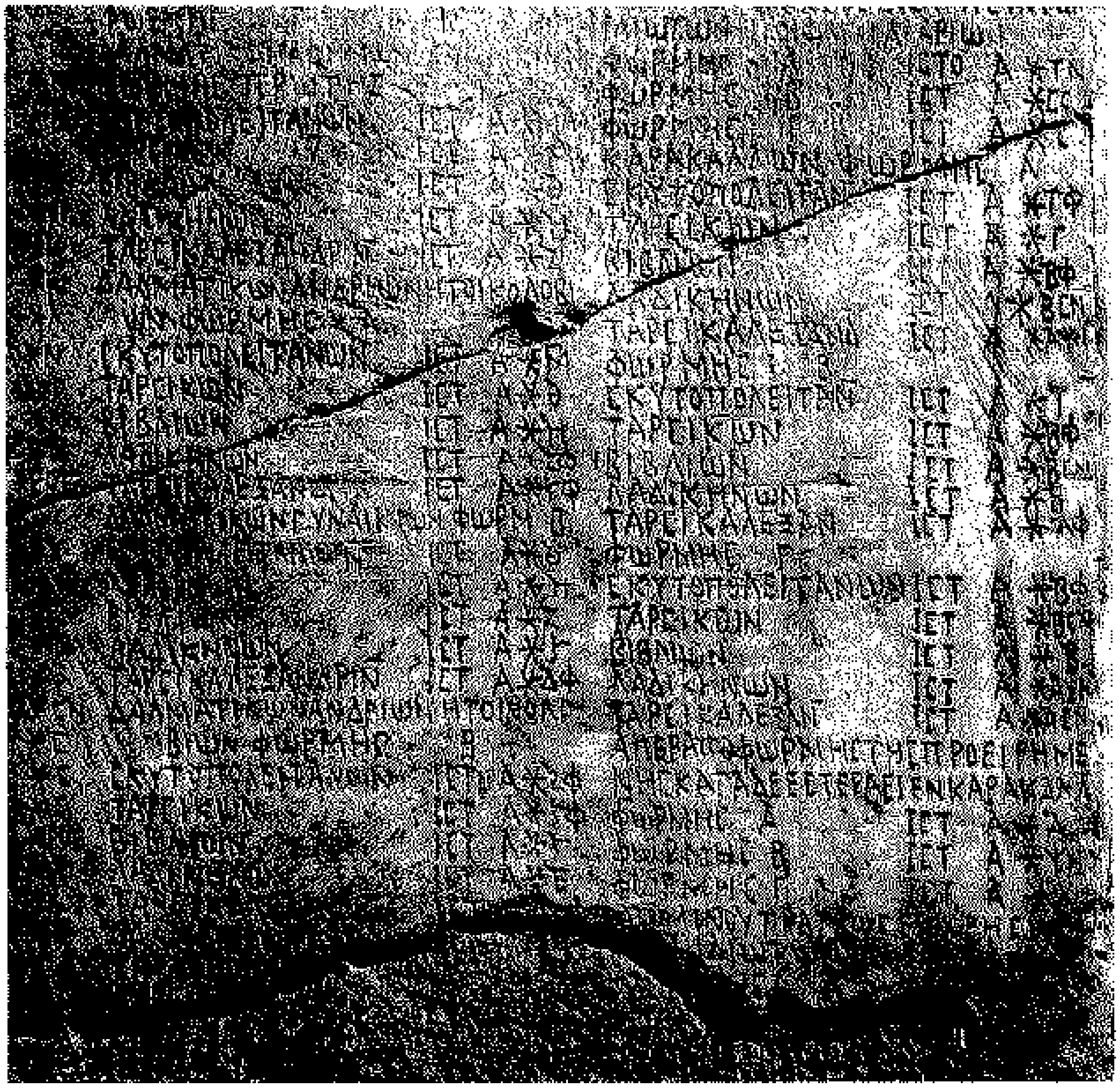
现存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庞贝壁画，画面上描绘的是埃涅阿斯在即将逃离特洛伊之前，让人从他腿上取出箭头的情景。画面左上角的人物是女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在罗马神话中，她是埃涅阿斯的母亲。

绝对年代序列

后期罗马共和国末代的文化人也忙于进行着这类辩论。在《论共和国》（*Republic*）中，西塞罗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罗慕路斯是否统治过蛮族。在其他一些篇章中，他急于强调城市中心圣地，例如卢普卡尼亚崇拜的古老。瓦罗好奇的是当公元前4世纪高卢人攻陷罗马时，那些已经失传的早期记载是否真的存在过。早期罗马的历史所以有可能建立，是因为瓦罗和他的当代人已经创造了一个年代学，其中根据希腊历史文献中关键的、有确定年代的事件的关系，确定了罗马传统的某些关键因素。西塞罗在赞扬瓦罗时说道：

当我们像个陌生人似的在我们自己的城市中游荡时，如过去发生的那样，你们的书被带到了国内，因此我们最终逐渐知道了我们是谁，住在什么地方。你们向我们揭开了这个国家的分期、季节的分配、圣事和祭

① 相传为罗马七个国王中的第六位。在位期间进行改革，创建森都利亚大会，设立地区部落，改革军事组织。——译注



现存戴克里先（Diocletian）《物价敕令》铭文的一部分，发现于罗马帝国说希腊语的东部的一个城市。这份301年向全帝国发布的《物价敕令》，是皇帝控制3世纪末剧烈通货膨胀的措施之一。此类铭文在帝国时代变得常见，并成为历史学家有价值的资料。

司的规则；你们为我们展示了私人和公共的纪律；你们向我们指出了举行宗教仪式合适的地点，并告诉我们有关圣地的资料。你们告诉了我们所有关于神圣和人类事物的名称、类型、官职和原因。

传统上，罗马人是根据该年执政官的名字来描述时间的，但要使用这些时间，我们需要得到完整的所有执政官的记录，但在奥古斯都公布执政官和举行凯旋式将军的官方年表“法斯提”之前，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瓦罗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者。在与他相同的一代人里，西塞罗的朋友阿提古斯（Atticus）编写了《年代记》（*Liber Annalis*），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①]编写了《年代学》（*Chronica*）。所有这些（仅是可能，因为它们中没有任何一种保存下来）都是创造罗马史绝对年代学的努力，我们关于早期罗马直到公元前3世纪（包括公元前3世纪早期）的标准年代，来自他们的研究，因此其基础是脆弱的猜想，问题仍然存在。从公元前753年到前509年有七个国王，他们必定非常长寿；平均每个国王34年的统治好像也有点像一代人的观念。罗马末代国王的被逐，很像雅典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id）[②]家族僭主政治的终结，看起来让人生疑。罗马的学者既系统，也细心，但他们的说服性论证的观念，并不总是和现代的观念吻合。

李维非常清楚地表明，奥古斯都巧妙地利用了早期的罗马历史以便找到借口拒绝给予他的一个将军以展示战利品（spolia opima）的荣誉。他没有和奥古斯都的这一主张唱反调，但有关记载清楚地表明，他服从了皇帝，但不是皇帝的观点。

新型史料

乍一看，写帝国时代的罗马史好像容易得多，年代学不存在重大问题，资料的数量也大得多。2世纪中期到4世纪中期的少量拉丁语文献已经保存下来了，同时这还是我们拥有大量希腊语作品的时期，罗马人、犹太人，还有希腊人，都在进行写作。许多演说保存了下来。在一个演说成为教育基础的社会里，这样的事情不会让人惊奇。现存的还有大量医学文献以及传记、哲学作品、虚构性作品以及从占星学、解梦书到农学、地

① 奈波斯（约公元前100～约前25年），罗马历史学家，写有《外族名将传》、《年代学》、《轶事集》等。——译注
② 庇西特拉图（公元前6世纪初～前527年），雅典僭主。曾先后三次入主雅典，最后一次为公元前546年，成功确立起对雅典的统治。在位期间维护梭伦改制、大力发展经济，增强国家权威，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后代继续在雅典执政。公元前510年被推翻。——译注

理学和水道管理等各门科学的指南。

此外，还存在多种新型的史料。1世纪后期到3世纪早期，石质和青铜铭文制品非常繁荣。将法律和宗教资料刻在永久性材料上根本没什么新奇，罗马将军们书信的大理石复制品此前已经在希腊城市中树立起来，共和国时代意大利的一小部分青铜铭文记录了元老院的敕令和法律，此外还有几件早期的墓志铭和献纳铭文。但从新千纪初开始，数量开始有了重要的增加。大多数铭文失传了：青铜被熔化，石头被打碎，以便对它们进行再利用，或者用来烧石灰。保存下来的也许只有5%。

献给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

这是菲凯拉伊公民献给鲁基乌斯(Lucilius)的儿子盖乌斯·普林尼乌斯·卡基里乌斯·塞肯都斯(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的铭文。他属乌芬丁部落，乃执政官，台伯河河谷、河岸以及罗马下水道的占卜官，农神财库长官，军队财库长官，帝国财务官，罗马骑士的"sevir"，高卢第三军团军事保民官，十人委员会成员，神圣的皇帝提图斯(Titus)的祭司（Flamen）。

每年都有新铭文被发现。学者们搜集它们的时间，几乎像他们搜集拉丁语手稿的时间一样长。但对它们的科学研究，即碑铭学，是在19世纪后期开始的。它与对主要拉丁语文献以及法律的第一批批判性版本一道，创造了古代历史的近代规则。与数学、物理学或者医学比较，古代史是一个年青学科，与其最接近的当代学科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今天，协调研究古代罗马的各种机构、有自己的刊物和会议的学术协会以及外国设在西班牙、希腊、意大利和中东的学院——许多考古活动由它们组织——仅有一百年左右。他们的工作一方面建立在人文主义者和启蒙学者工作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建立在大游览时代的收藏上。自18世纪以来，他们的收藏品扩充了博物馆的收藏，但对碑铭学、纸草学和考古学的科学研究，打开了通向罗马世界的新道路。

绝大多数铭文是墓志铭或者献给神的捐献记，两者都常包含着建立碑铭者的生平细节。当一个士兵在帝国境内调动时，它们使我们能够重建他的生平；或者使我们看到一个高官怎样从较低的职位以及祭司上升到高位的，并使我们能就罗马政府及其制度做出一般性的结论。少数长篇铭文为我们提供了重大公共决策的简要情况。城市在青铜或者大理石上宣示它们的法律；现存西班牙的某些宪法，表明罗马共同体的组织犹如罗马本身宪法的缩微；希腊城市常在大理石上刻上它们接到的皇帝的书信文本，这些书信给予或者肯定了城市的特权。有些公共铭文透露了其文化神话的信息，许多铭文记载了大人物的慷慨，他们给城市提供了宏伟的浴室和健身房以及输水管道和储水池；修缮道路和神庙；资助谷物基金以缓解食物危机，或者大肆宴请，以使其生日永久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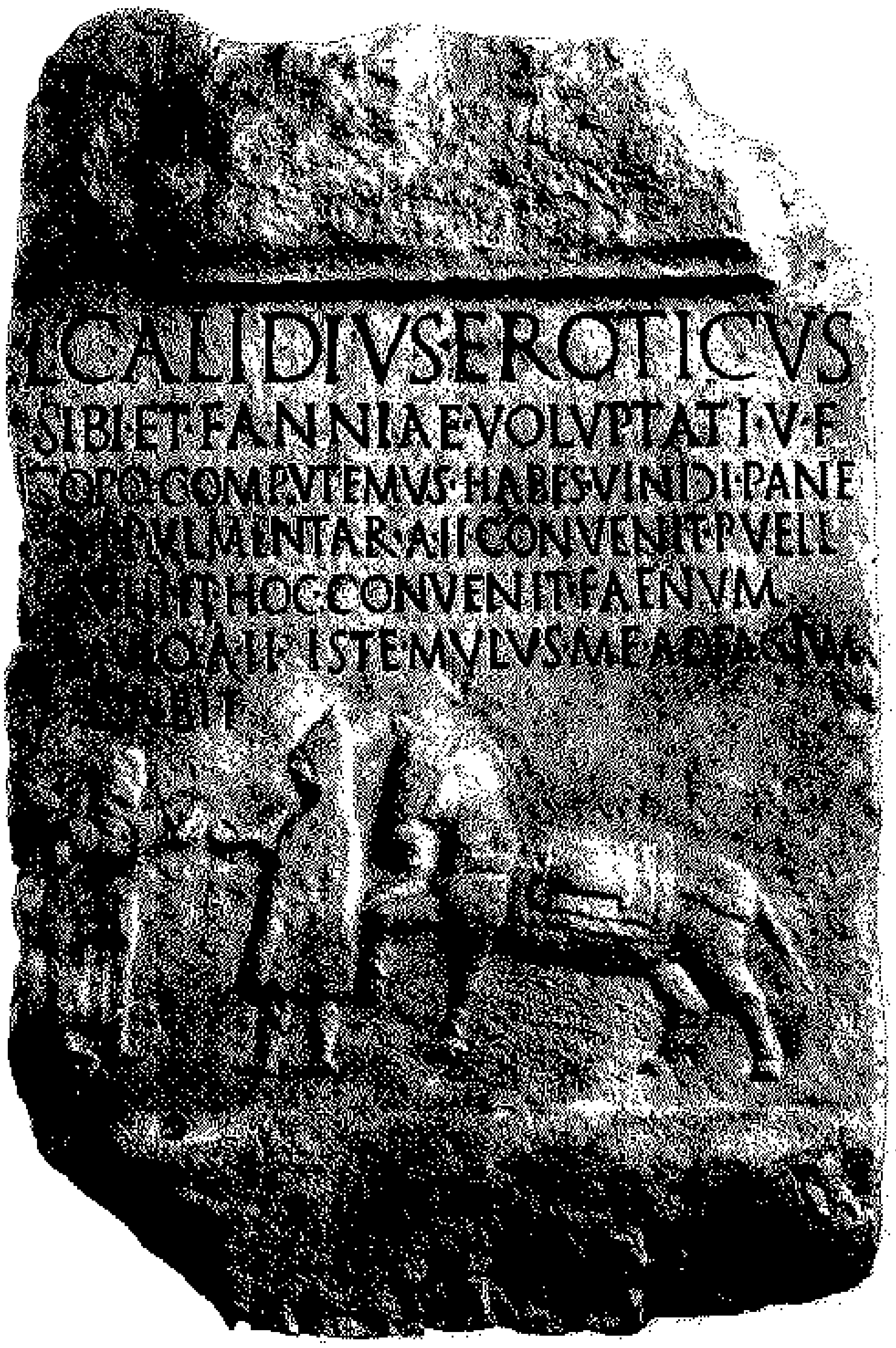
一种不同类型的历史

史料上的这些差别，使得帝国的历史类型不同于共和国时代，它并不是单纯的史料数量更大的问题，甚至也不是这些资料比共和国时代的文献覆盖的地区更广大的问题。共和国时代的各种历史著作、西塞罗生动的演说和书信记录了变化和危机，罗马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崩溃相互影响。可是，帝国时代历史的叙事性作品要少得多，部分原因在于资料容易给人下述印象：奥古斯都以后，罗马进入了好坏皇帝交错出现的某种平衡时期，但政治的基本性质没有任何改变。一些近代史学家认为，在奥古斯都和戴克里先之间，几乎看不出任何重要变化。在君主制、言论自由的终结、修辞学的衰退和罗马扩张的终止之间，塔西陀隐约指出其中存在深刻联系。这些结论过于简单化了，但罗马文化的许多方面，包括1世纪的文学规则，确实好像仍是几百年来的样子。

我叙述的是和早期罗马史相当不同的一种历史。那些作品的主题是伟大的战争、城市的被荡平、国王被击败和俘虏。如果他们说的是国内的事情，那就是执政官和保民官之间的不和，土地法、谷物法，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冲突等。但是我所写的事情都是狭窄范围之内不光彩的事情；因为当前是一个长期和平的时代，有些骚动也都不大；罗马的气氛凄凄惨惨，皇帝也无心扩大自己帝国的领土。

塔西陀《编年史》第4卷第32节就帝国时代写作历史条件的变化所发的感叹

其他资料也助长了历史停止前进的观念。墓志铭暗示着，它们对将来阅读它们的后代抱有信心；神庙中的还愿铭文宣称，罗马的



发现于意大利莫利塞城伊塞尼亚附近的一个罗马人的墓志铭。这是一个旅馆守门人的墓碑，上面的浮雕表现的是守门人正在欢迎一个牵着马、披着斗篷的客人的情景。

神灵确实对向它们祈祷的人显了灵；官方的命令被刻写下来，以保持其永恒性，将那些永远不会枯竭的善意昭示于众；铸币资料“声明”说，皇帝富有美德，城市忠实于皇帝以及它们自己的传统。

对早期帝国文化这个方面的观察——犹如共和国的文化是动态的一样，帝国的历史是静态的——是一个更广大现象的一部分，它创造了那个神奇的、游客们至今仍在参观的巨大的文明中心。当考古学家们主要根据古代作家提供的叙述解释其发现时，这些庞大的遗迹似乎证实了和平和繁荣的景象，而无所不在的皇帝的肖像，反映了臣民对他们的忠诚。如今考古学家更倾向于独立进行解释，充斥于公共空间和私人住所的皇帝肖像、遍布帝国各地的神庙和浴室，如今被视为图像建筑的传递者，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它们明显的家族相似性，如今也被视为一种夸张的努力，以宣布在罗马的统治者之间，存在着比实际存在的更加紧密的亲缘关系和一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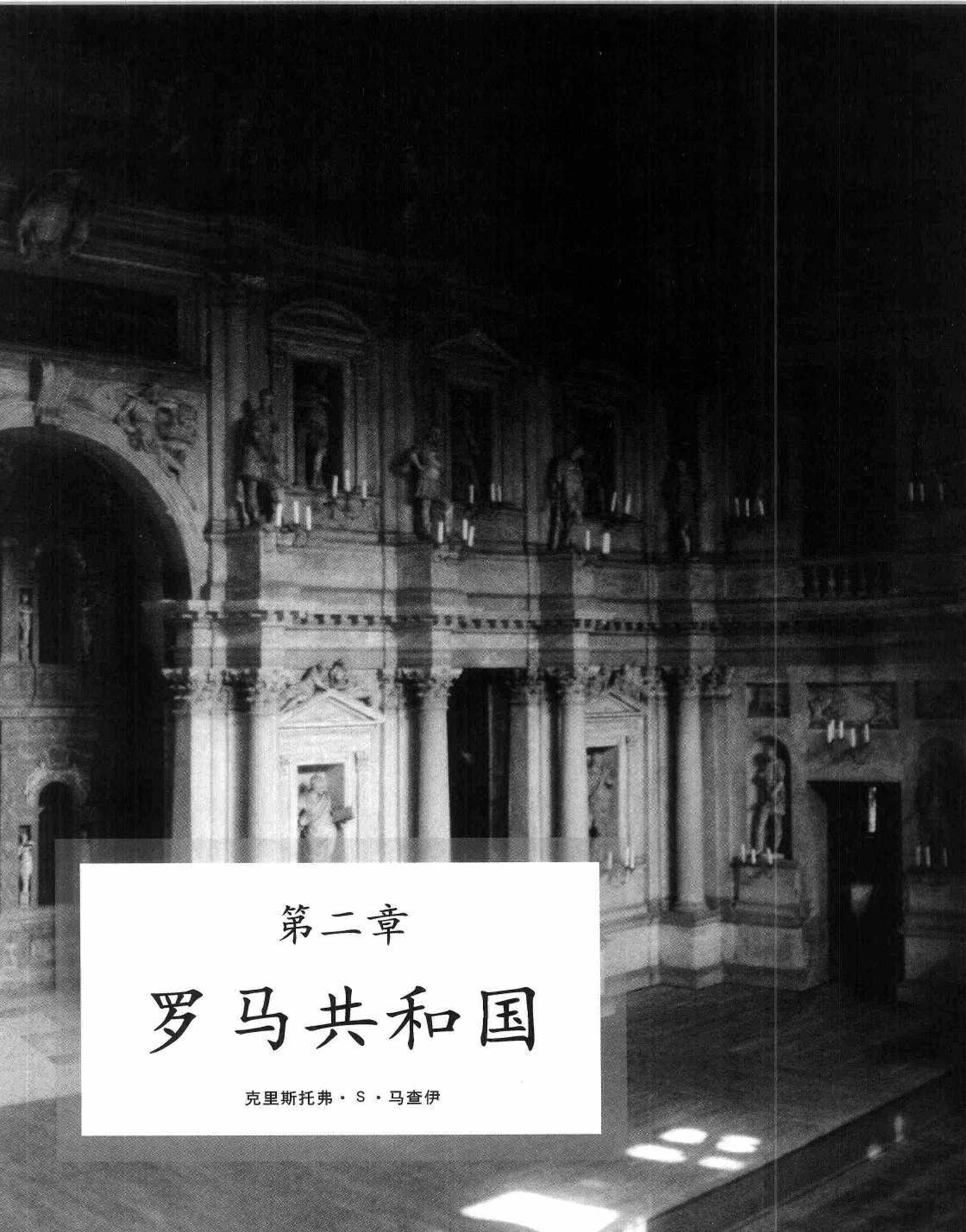
最近的考古学表明，早期帝国的大城市是由空旷的乡村包围的。在那里，农民和奴隶被迫比以前更加辛勤地工作。产品增加了，但它是以更加辛勤的劳动为代价的。剩余产品被一小撮特权分子消耗了。对家庭房屋的发掘，让我们对罗马世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了新的认识，骨骼资料开始表明，传染病和营养不良严重得可怕，许多穷人过的就是这种日子。罗马的疟疾、埃及的麻风病都很严重，整个帝国的平均寿命不高。对希腊城市的考古调查表明：财富从乡村流向城市；虽然在罗马统治下最大的城市在发展，但较小的城市在萎缩；罗马社会似乎比文献暗示的更加等级化、更加层级化了；财富的分布更加不均衡；公民民主被扼杀，奴隶大量增加；少数人享受着罗马喜剧和讽刺诗所描述的、由家仆侍候的舒适生活。

考古学还显示，罗马时代的意大利和行省普通人民的生活经历了更加缓慢、更长周期的转变——古代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仅仅偶然就这些变化发表评论。例如，1世纪到2世纪，城市在以前从来不曾存在过的地区发展起来，从不列颠和西班牙内地，到安纳托利亚和上埃及，都是如此。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如饮酒、洗浴、富丽的房屋、家中的奴仆，随着当地统治阶级转向罗马文化变得广泛起来。与此同时，铸币的使用流行开来，至少在某些地区，对税收和法律的要求越来越多地把大多数是文盲的人口拖入到依赖成文记录的控制体系之中。从哈德良（Hadrian）①长城到突尼斯和幼发拉底河驻扎的罗马军队，像商人们一样也创造了大量的文书。在罗马和平中，数量更大的商人们旅行到更遥远的地区。更多的人比过去更经常地旅行，而且旅程更长，因

① 哈德良（76～138年），罗马帝国盛期的皇帝，117年继图拉真为帝。在位期间四处巡视，强化皇权，鼓励希腊文化，修建著名的罗马万神殿，完成雅典的宙斯大庙。——译注

此，各种类型的交流，如陶器风格、新的崇拜、建筑技术和疾病等，也就不让人惊奇了。无论罗马最高层的稳定程度如何，它都依赖于转换中的基础。随着公民数量的增加，随着拉丁文字的传播，随着越来越多的行省富人找到进入罗马上层的途径，罗马社会的性质本身也变化了。研究罗马的家庭和宗教，在公元前300年是一回事，因为那时绝大多数罗马人居住在城内或者其附近，但在公元300年却意味着另一回事，因为那时几千万人居住在帝国各地。罗马帝国停滞的观点其实是一个虚构。

对罗马过去的研究，今天的进步比该学科过去一百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快。如今不仅有多得多的专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参与其中，而且新的工作在各条战线同时展开。在学术杂志上，对共和国时代精神生活进行考察的文章和那些关于大理石贸易的文章以及公布的新文献并驾齐驱；从对瘟疫进行的新研究、对饮食配料的探索，到对文化水平和帝国时代肖像的研究并列。我们工作赖以进行的一切，从田野考古调查搜集的陶片到苏拉《回忆录》的残篇，都是因为偶然原因保存下来的。那些研究罗马世界的人，始终需要意识到这些保存发生的过程以及那些系统遗失或者被删除的内容。我们关于罗马世界的图景是从碎片中拼凑起来的，但可以说关于恐龙或者暗物质的研究也是如此。瓦罗不曾被他的任务规模以及已经失传的资料的数量所吓倒，我们也不应当被吓倒。



第二章

罗马共和国

克里斯托弗·S·马查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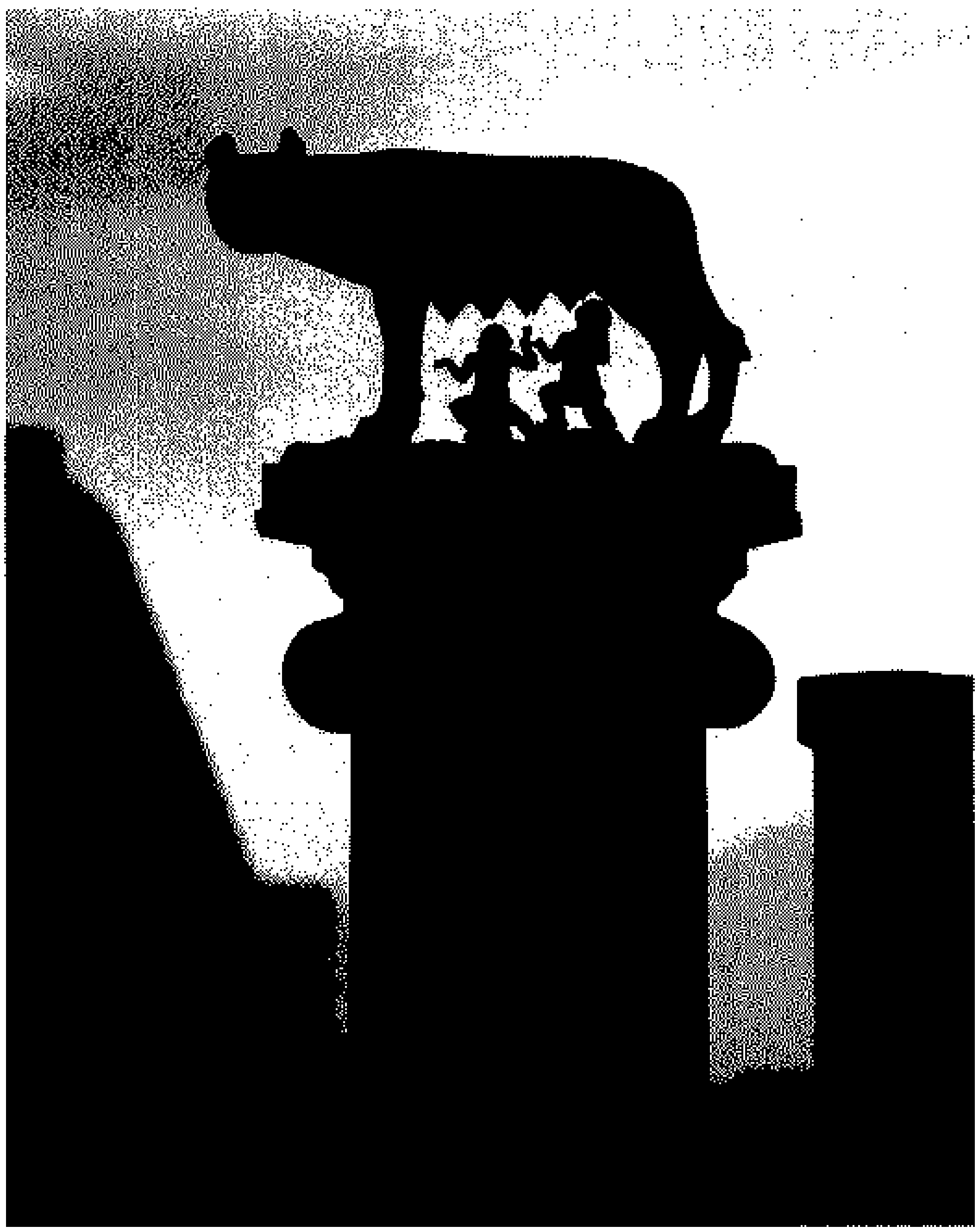


共和国

罗马共和国的史料分布很不平衡。罗马的历史写作开始于公元前3世纪，但现存作品并不是均衡地覆盖各个时期的，而且主要是和高层的政治有关。关于罗马社会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的信息少得多。对于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时期，文字史料保存了某些信息，但时代越古老，它们的可靠性就越低。关于最早的时期，考古学提供了某些信息，但对这类资料的解释存在困难，而且难以与文字记载相一致。因此，虽然我们对文字史料的理解一直在进步，新的考古和铭文资料也不断地面世，但我们对于罗马共和国的描绘仍有许多不确定之处。

共和国的兴起

考古资料显示，像意大利其他地区一样，铁器时代之初，即约公元前900年，罗马这个地区由单个的家族团体稀疏地占据着。在随后的几百年里，社会和经济生活日渐复杂，到公元前7世纪后期，大型私人房屋和公共建筑开始出现。罗马的文献传统宣称：该城由罗慕路斯于公元前753年前后建立，并且成为其第一个国王。帝国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陀注意到，“罗马城从一开始就是由国王统治的。”根据传统，罗慕路斯和他的6个继承者统治该城245年。有关这个王国的情况，有不少细节保存下来。不幸的是，这些细节中仅有极少部分可以被作为历史资料。罗慕路斯本人显然是一个伪造出来的人物，因为该城从来不曾正式“建立”，他的名字是以城市名为基础的。其余6个国王的名字明显不是伪造的，传统也确实把他们的名字准确保留下来了，但关于其王国的起源，我们没有可靠的资料可资利用。可是，传统暗示的可能是正确的：到王政时期末，罗马处在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①]影响之下。埃特鲁里亚人是居住在该城北方一个更加先进的民族，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



传说中罗马建立者罗慕路斯和勒摩斯铸像的黑白图。还是婴儿时，他们就被叔父抛弃，由一只母狼喂养。他们的名字明显是后来从城市本身派生出来的，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真正在历史上存在过。但是，在罗马历史过程中，这个传说保持着它的力量。

公元前6世纪最后的10年（传统年代不是公元前509年，就是公元前507年），末代国王被逐，共和制政府得以建立。对现代读者而言，“共和国”这个术语属于误导，它派生自拉丁语的“res publica”，意思是“共同体”或者“国家”，

① 又译为伊达拉里亚人。——译注

但从现代意义上说，其制度并不民主，最多能把罗马共和国形容成一个选举型寡头政体。在由共同体比较富有的成员支配的各种公民大会上，最富有家族的成员被选举为一年一任的官员。当时不存在可以被称为政府的抽象制度，相反，权力是由各个官员行使的，如果没有了官员，也就没有了“政府”。

官 制

罗马共和国中，官职受两个基本原则控制：年任制和集体制。官员只能任该职务一年，而且组成平等者的委员会（colleges）。正常情况下，官员每年选举，直接重新当选一个新的官职是被禁止的。在每个官员委员会中，一个同僚的行动也可能因为另一同僚的反对被禁止。两种规定都是为防止过多权力落入某一个人手中而设置的。

罗马国家的两个主要官员是执政官，他们拥有被称为治权（imperium）的权力，据认为该权原由国王掌管。这一权力让他们拥有处死或者鞭打人的权力，但他们对罗马公民行使这些惩罚的权力日益受到限制。治权还授权其拥有者征调公民参军，并且在战斗中指挥军队，但附有下述限制：军事指挥权仅存在于罗马城以外的地区。罗马人没有其他独立的职业将军，因此所有军队都由拥有治权的官员统帅。

最初，执政官是惟一的官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需要创建另外的职位。公元前367年，设立了裁判官。裁判官也有治权，虽然在地位上，人们认为它低于执政官。起初，裁判官是在执政官缺席在外指挥作战时管理罗马事务，但最终他在罗马公民法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约公元前244年，设立了第二个裁判官，这个官员最终负责处理所有涉及公民和外国人法律事务的案件。

当罗马获得海外行省时，设立了新的裁判官职位，到共和国末期，裁判官总数达到八人。罗马人总是不愿意增加该官员的数量，也许是因为每个裁判官都是执政官潜在的候选人，而执政官的数量总是固定为两个。治权延续制——一种缓解拥有治权的官员短缺的方法——首次于公元前327年被创建。由于在战役中中断一个成功官员的军事指挥权会造成不便，因而治权延续制使他得以保留治权，直到他返回罗马为止。通过这种方式，治权获得延续的官员被称为代执政官或者代裁判官。

前官员进入元老院，所以元老院是由担任过官职的人组成的一个集体机构。严格地说，它没有法律的授权，所通过的政令仅仅是建议性的。可是，在某些领域的管理问题上，如国家财政总额的分配、决定哪些总督将被取代等，元老院逐渐取得了真正的控制权。虽然任何官员都勿需注意元老院的建议，但它代表了具有压倒性声

罗马科伦纳宫中表现罗马官员（中坐者）宣读遗嘱的浮雕。该官员使用的所谓“象牙座”（sella curulis）表明他是寻常官员（ordinarii）的一员，也就是说，他是正常当选的官员，通常一年一任。象牙座是官员地位的正式标记。



波利比乌斯论罗马史研究

世界上有谁会漫不经心、懒惰成性，以至不愿去了解在不到53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有人居住的世界是怎样、又是在什么样的政体下被罗马征服并臣服于罗马统治的呢？

波利比乌斯：《通史》，第1卷第1章第5节

望的统治阶级的集体声音和大多数官员被其元老院同僚接纳的要求，确保了元老院的政令极少被忽视。到公元前3世纪，元老院已经取得了授权延长官员治权、控制国家财政的权利。

"罗马人民"（意思是达到服役年龄的成年男性）理论上拥有对国家的控制权。在不同的公民大会上，罗马人民通过所有的法律选举官员，对严重案件进行审理。事实上，投票的安排有利于比较富有的人。选举所有拥有治权官员的森都里亚大会（Centuriate Assembly）最初是以军队的百人队为单位的。因为士兵们需要自己提供武器装备，所以服兵役只限于那些家境相对好一些的人。每隔五年，罗马会进行一次名为普查的公民财产登记，以便确定他们的军事义务。在普查中，那些拥有足够资源提供自己装备的公民被分配到五个等级的一个当中，但其财产的最低资格逐年上涨。最后，军事组织开始发生变革，但森都里亚大会的章程仍然是固定的。每个等级被分配给一定数量的森都里亚，那些符合该等级要求的公民被分配到这些森都里亚中。由于最高等级控制了森都里亚的半数以上，所以他们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选举的结果（他们的份额后来被削减到稍少于半数）。那些没有达到服兵役最低标准的公民可以在这个公民大会上投票，但在193个森都里亚中，他们只占一个。事实上，公元前2世纪后期征调士兵的方法发生变革以前，一直是那些在军队中战斗的、比较富有的公民选举最富有的人为官员担任指挥官。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罗马对地中海的征服，最终导致了这套制度的崩溃。

贵族与平民

根据传统，共和国早期的政治史被名为等级冲突的贵族和平民的争吵所支配。贵族指那些进入元老院的家族，所有其他人都被称为平民（他们集体被称为"plebs"）。传统宣称，贵族对权力的垄断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而确立，但对官员名单列表的考察表明，他们的垄断直到公元前450年才变得绝对起来。斗争期间，平民自己组织了起来，选举他们的代表保民官为领袖。最后，每年要选举10名保民官，在城市之内，他们亲自干预官员活动的权利得到了承认。平民的目标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一旦贵族对官职的垄断确立起来，富有的平民就支持比较贫穷的平民的经济要求，以便推进允许他们竞选官职的事业。约公元前367年前的若干年里，这场冲突达到了顶峰。那一年，政治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裁判官的设立也在同一年）。平民被允许竞选执政官，最富有的平民家族开始进入元老院。新加入者和旧贵族融合，形成了名为"显贵"（nobilitas）的新统治阶级。虽然该制度对于有能力的圈外人有限度地开放了，但显贵利用他们的财富和联系，占据了多数执政官席位，保持着对国家的控制。这班显贵将领导罗马征服意大利和地中海。

在这些改革后的年代里，平民单独的机构被整合到了作为整体的罗马人民的共同机构之中，而且成为中期和后期共和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特点。平民在一个特殊的公民大会中集会，它以名为部落的地理投票区为基础，每个部落一票，决定由那个选区的选民做出。罗马城拥有的部落从来没有超过4个，但随着罗马领土的扩张，新的乡村部落被创建起来，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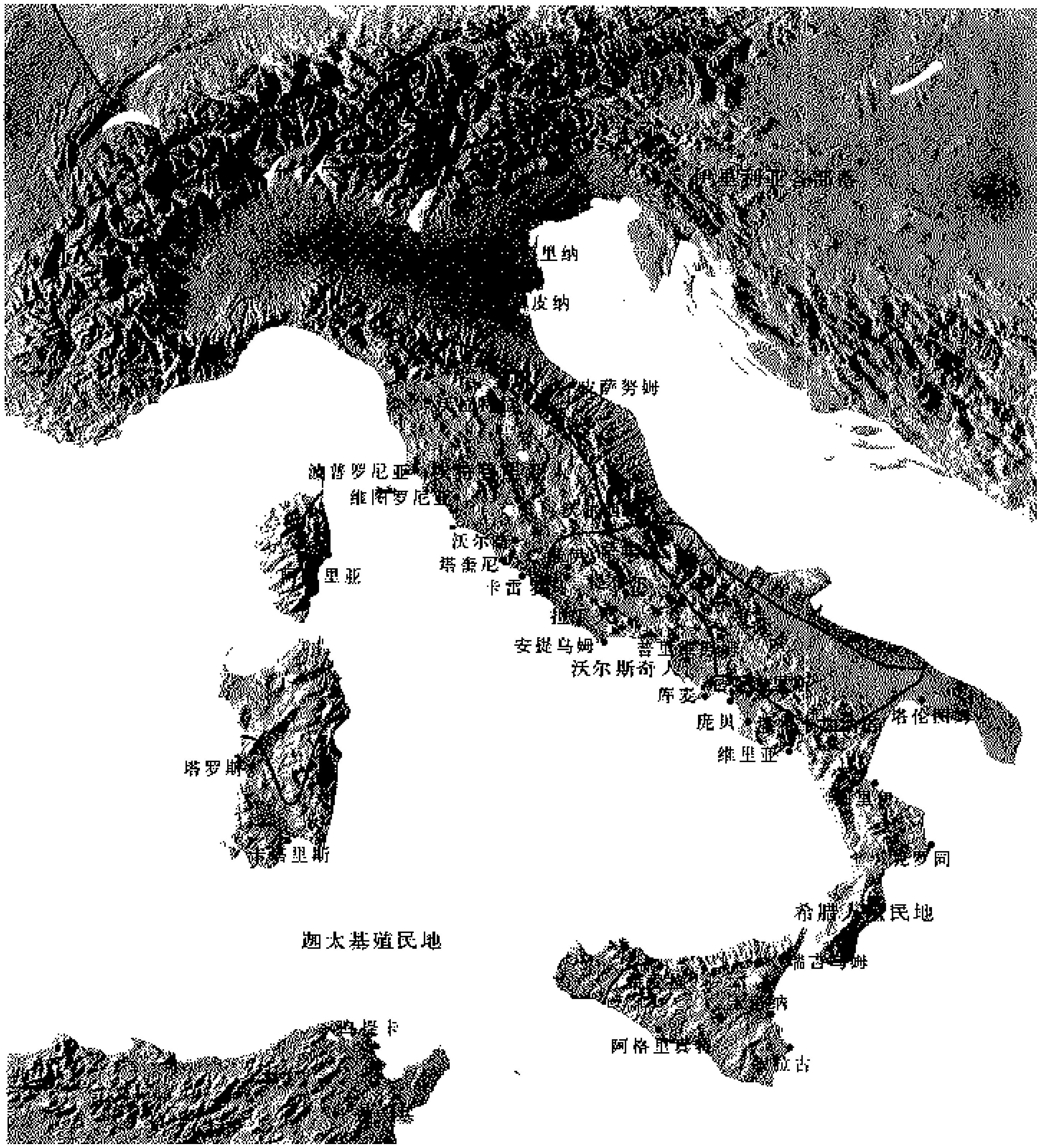
奥斯提亚（Ostia）棺雕残片上的罗马元老，现存罗马国立博物馆。该棺的年代约为270年，饰以深浮雕。

和国初期存在的20个乡村部落，到公元前241年总数达到了31个。这就意味着城市不断增长的人口严重缺少代表权（下述事实可以让我们得到公元前1世纪城市某种程度的相对规模：公元前70年的普查中，意大利共有91万人登记；公元前1世纪40年代中期，仅在罗马城就有32万人得到国家的谷物配给。尽管两个总数都可能是指成年男性公民，但这些数字的准确意义仍不清晰。它们表明，罗马城的人口约占意大利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平民公民大会不仅选举保民官，而且通过决议，其决议最初仅对平民有效，但到约公元前287年，它们被承认具有法律效力。由于它比较简洁的程序，平民公民大会成为通过法律的标准场所。公元前367年以后，10个保民官也成为元老院政府的一部分。显贵中的年轻平民会担任此职，代表元老院通过法律。只是到公元前2世纪后期，某些保民官才利用平民大会的权力，采取反对元老院的行动。

征服意大利

罗马人重视军事成就，从共和国初期起，他们就卷入了一系列战争。这些战争先是征服了拉丁姆(Latium)，然后是全部意大利。意大利的征服提供了让他们消灭地中海军事强国的人力资源。关于这些事件的总体进程，文献传统可能是准确的，但许多细节是后世的伪造。

拉丁姆（现代的拉齐奥）是意大利西海岸一片宽广的平原，由名为拉丁人的民族占据。他们大约被划分为30个共同体，其中最北的是罗马。从共和国初期起，罗马人就把自己和其他拉丁人区别开来，后者组成了一个名为拉丁同盟的松散的军事合作组织。罗马人企图控制这个同盟，但在拉丁姆遭到东部亚平宁山地部落团体的袭击时，他们只好把自己的计划放在一边。公元前5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都被消耗在阻击这些入侵者上了。到该世纪末，虽然新来者占据了拉丁姆南部的土地，但入侵已经被制止了。



公元前4世纪的意大利居住着各种各样的人。在半岛的北部和东北部，埃特鲁里亚人已经被来自阿尔卑斯山北部的高卢人取代。埃特鲁里亚人的一些领土已经失陷于罗马，而那时罗马人的主要方向是对付中部地区的其他部落。非意大利人的土著（如阿普里人）和希腊人、迦太基殖民者尚未遭遇罗马的强大力量。

公元前5世纪末，罗马开始和维伊（Veii）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维伊是一座埃特鲁里亚人的城市，紧靠罗马之北。约公元前396年，维伊最终被攻克，城市被毁灭，领土被吞并。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罗马将直接吞并中部意大利的大片领土。约公元前386年，罗马被来自北部意大利的凯尔特人（高卢人）攻占，打断了这一进程。但是，尽管这场大败给罗马人留下深刻印象，可是在罗马领土扩张过程中，最终证明它不过是一次暂时的挫折。

公元前341年，拉丁人为抵抗罗马的统治而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但罗马人很快征服了反叛的城市。公元前338年，他们取消了拉丁同盟。离罗马最近的拉丁共同体被直接合并到了罗马国家之中，那些遥远的拉丁城镇则被允许内部自治，但在外交和军事上没有独立的权力。那些位于罗马南方、与罗马关系不是那么密切的共同体，也被合并进来，拥有某种类型的二等公民权，其居民承担罗马公民所有的军事义务，但没有政治权利。拉丁人放弃了他们当地的方言，改说罗马方言，它后来就成为拉丁语言的惟一形式。新合并城镇富有的公民开始在罗马担任官职，成为罗马显贵的一部分，而拉丁人也成为罗马最坚定的同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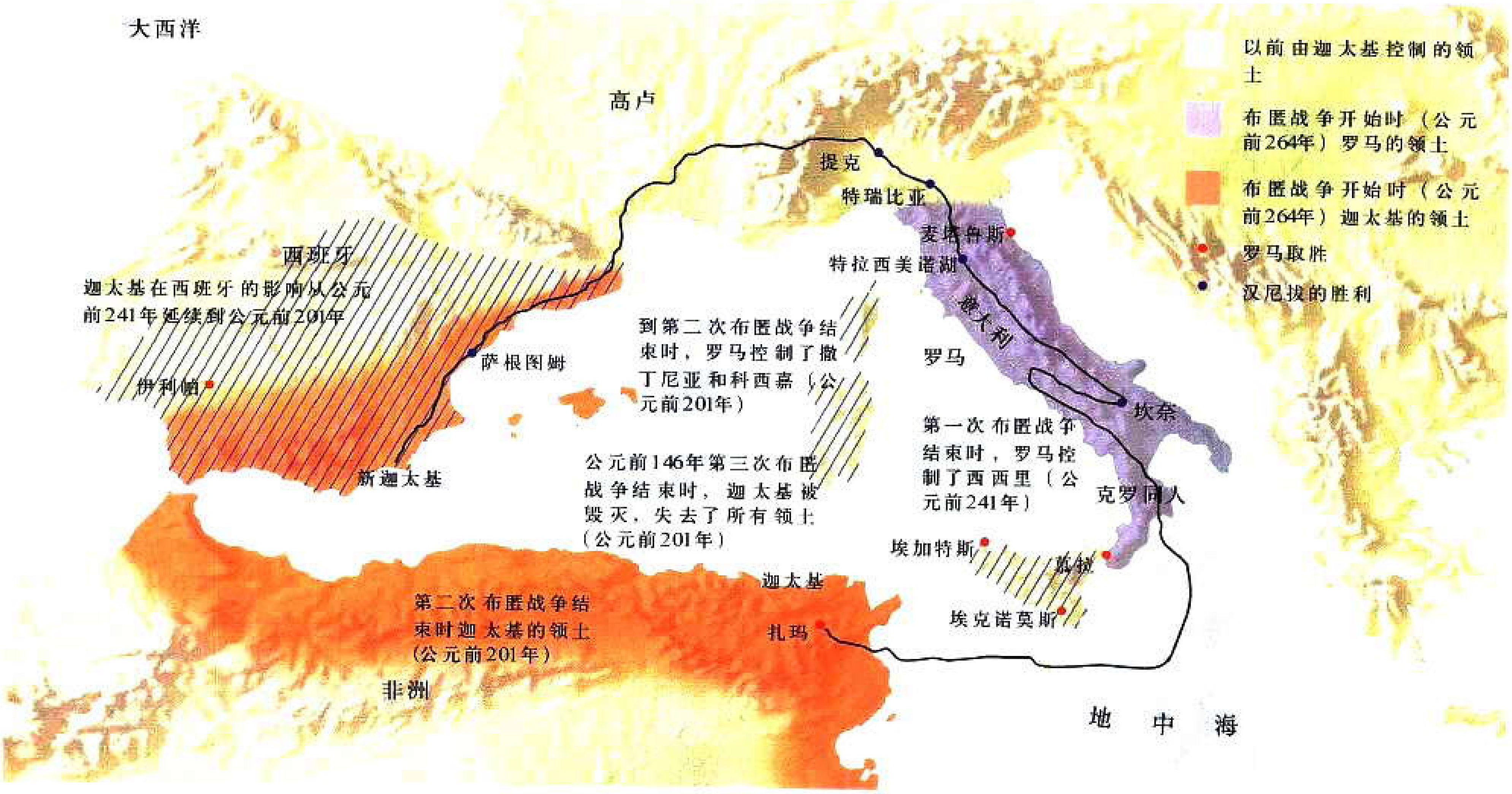
凭借对拉丁姆的牢固控制，罗马人进行了一系列战争，最终将意大利全部置于统治之下。他们的主要对手是东南部的萨莫奈人（Samniters），直到公元前3世纪90年代，他们才被击败。而巩固统治，甚至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在中部意大利，罗马人吞并了一些土地，但那些遥远的共同体，绝大多数被用“不平等条约”和罗马捆在了一起。这些条约让它们保持着内部自治，实际上又让它们屈从于罗马。虽然这种地位和拉丁人类似，但罗马人对拉丁人要尊敬得多。对意大利的控制，使罗马有资源踏上征服地中海的道路。

罗马人建立殖民地的做法，既有利于向意大利遥远地区的扩张，也推动了整个半岛的罗马化。从起源上看，“殖民地”（colonia）一词表示农业定居点，这些共同体最初的意图，是要作为外国领土上独立的城镇。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罗马殖民地，建立在罗马人公元前5世纪从奥斯坎（Oscan）人入侵者那里重新夺回的拉丁姆部分地区，定居者既来自罗马，也来自拉丁姆的城市。他们放弃了原来的公民权，以取得殖民地的公民权，而这些殖民地变成了拉丁同盟的成员（当时也有居民全部是罗马公民的殖民地，但它们数量很少，在这个时期不够重要）。建立拉丁殖民地的意图，是为了控制那些远离罗马，而且战略上重要的地区。殖民地既可以监视潜在的敌人，而且可以坚守，直到罗马的援兵到达。虽然拉丁殖民地直到公元前2世纪80年代还在建立，但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起，它们已经稀少。在这些殖民地失去其军事功能很久之后，它们仍继续推动着罗马语言和文化在整个意大利的传播。

布匿战争和马其顿战争

罗马征服地中海的快捷，成为一个古代的奇迹，而快捷的原因，至今仍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罗马人自己相信，他们所有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也就是说，罗马人是受到了敌人的挑衅，他们是为同盟者而战）。由于共和国中期对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征服提供了几个罗马不愿吞并但最后被迫实行直接统治的地区的例证，这个观点长期以来是为历史学家们接受的。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的动机与罗马的帝国主义不同，因为那种帝国主义是欧洲诸国因为经济扩张或者威望的原因积极努力吞并非欧洲人的领土。尽管如此，进行征服的首要动机，是任何特定时期的官员们都希望通过军事胜利赢得声望。执政官对政治过程的控制如此彻底，以至当他们决心进行战争时，元老院和人民的反对很少能成功。同样清楚的是，对外国城市的攻占以及对其人口的奴役，无论是对提供官员的富有公民，还是对罗马的普通士兵而言，都让战争变成了非常有利可图的活动。征服战争也许可以被视为为抢劫而进行的战斗，在此过程中，罗马国家被迫承担起统治外国领土的任务，而对此它本来是不适应的。此外，这些战争使构成罗马军队中坚的小所有者破产，维持军队以保卫帝国的需要最终导致共和国政府被军事独裁体制所取代。

在更广大的地中海区，罗马的第一个主要对手是迦太基人。迦太基位于今天的突尼斯，因其首都而得名。作为一个商业民族，从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迦太基人在地中海西海岸定居下来。为控制西西里，他们卷入了和该岛希腊殖民地的长期斗争。公元前265年，罗马人和一个西西里的城市结盟，引起了罗马和迦太基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第一次布匿（迦太基）战争。罗马人采取战略攻势，取得了几次战役的胜利。



这幅地图标出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的进军路线以及比较重要的战役、第一次和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失去的和罗马获得的领土。

但他们海战经验的缺乏，造成了几次惨重的失败，损失了成千上万的人员。尽管有这些灾难，意大利并没有发生起义。每次失败后，罗马人都能征集一支新军。公元前242年，当他们重新发动战争时，精疲力竭的迦太基人投降了，他们支付赔款，放弃了西西里。接着，当迦太基人的非洲雇佣兵暴动并且对迦太基本身形成有效围困时，罗马人利用这个机会，夺取了撒丁尼亚（Sardinia）和科西嘉。

罗马人现在有了海外领土。他们没有像在意大利做的那样，把这些新的领土变成从属的同盟者，而是遵循当地的习惯，强迫它们交纳贡金，但不经常性地利用它们的军事力量。这也许暗示，罗马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和其他意大利人有某种亲缘关系，而对撒丁尼亚人和科西嘉人，则没有这种关系。无论如何，事实很快证明，为保证当地人履行义务，必须在新的行省中永久性派驻罗马官员。公元前227年，设立了两个新的裁判官职位，为西西里和撒丁尼亚提供总督。

为加强人力储备，迦太基人将他们的领土扩张到西班牙内地，到公元前3世纪20年代后期，他们在那里的力量处在古代最伟大的将军之一汉尼拔的统帅之下。公元前218年，他挑起了一场对罗马的新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而且快速穿过法国南部到达意大利，期望在那里打败罗马，诱使同盟者起义。公元前218年和公元前217年，他连续击败了罗马人，但没能挑起意大利人的起义。公元前216年，他在坎奈（Cannae）歼灭了一支由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和盖乌斯·泰伦提乌斯·瓦罗（Gaius Terentius Varro）[1]统帅的罗马军队。虽然意大利南部的某些城市和西西里的叙拉古确实发生了暴动，但拉丁人和中部意大利人仍忠诚于罗马。最终，意大利的人力资源让罗马人制服了暴动者，遏制住了汉尼拔的军队，同时征服了西班牙。公元前204年，罗马人发动了对非洲的入侵，汉尼拔被从意大利召回。公元前202年，他在迦太基附近的扎玛被普布里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2]统

① 两人是当年罗马的执政官。罗马人所以决战，部分原因是因为汉尼拔在意大利的行动对罗马的经济，尤其是意大利的农业造成了严重破坏。——译注

② 西庇阿（公元前236~前184或前183年），罗马将领，反对汉尼拔战争的英雄。他率领罗马军队进军西班牙，占领其绝大部分地区，切断了汉尼拔的后方基地。接着入侵迦太基本土，并在公元前202年的扎玛会战中击败汉尼拔，迫使迦太基求和。罗马因此赢得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译注



17世纪法国艺术家克劳德·奥兰（Claude Audran）的画，画面表现的是罗马殖民者正出发前往罗马非洲行省的迦太基。在盖乌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在那里建立殖民地的努力失败后，尤里乌斯·恺撒于被毁的迦太基旧址建立了一个公民殖民地。

帅的罗马军队击败。迦太基人被迫放弃了他们的殖民地，而且支付给罗马人一笔巨额的罚金。

元老寡头中个别成员影响事件进程的能力，在老加图身上得到了表现。尽管他是该家族进入元老院的第一人，但他的演说才能与人格力量使他赢得了公元前195年执政官的选举。他的声望与好斗的性格，意味着在此后很长时期里会发挥重要作用。公元前2世纪50年代后期，他不断要求对迦太基进行最后的战争（著名的事情是：每次在向元老院提出意见后，他总是以下述的话结尾："除此之外，我的看法是迦太基必须毁灭。"）。在扎玛达成的50年和约到期后，罗马人在公元前149年再度对迦太基发动了进攻，3年后最终毁灭了这座城市。

罗马人维持着他们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公元前197年，为管理该地区，设立了两个新的裁判官。事实证明，伊比利亚成为中期共和国不断的麻烦。那个地区划分成许多不同种族和语言的集团，他们根本不愿接受罗马的统治，在整个公元前2世纪，那里不断发生战争。征集军队在东方和对非洲进行战争比较容易，因为那些战争具有获得战利品的前景，而在西班牙服兵役日益不受欢迎，伊比利亚人是强大而顽强的敌人，即使取得对其战争的胜利，也没有多少油水。公元前2世纪50年代和40年代，战争规模尤其广大，但随着公元前134年纽曼提亚(the Numantina)的被攻陷，土著抵抗力量的后方终于被冲破，尽管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还有一些小的起义零星发生。

第二次布匿战争刚结束，元老寡头们立刻在希腊的东方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公元前322年，随着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1]的死亡，他的帝国也被其将军们瓜分，三个重要的王朝兴起：马其顿的安提柯王朝（它还控制着希腊本土的城邦）、小亚细亚和近东的塞琉古王朝以及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罗马人首先采取行动对付马其顿的腓力五世（Philip V of Macedon）[2]。公元前197年的库诺塞法拉之战，腓力的马其顿军队，在提图斯·昆提乌斯·弗拉米尼乌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us）[3]拥有先进战术的罗马军队面前，遭遇了决定性的失败。罗马人没有占领马其顿的领土，而是宣布了"希腊的自由"，希腊城市则误将这一口号理解成它们获得独立的机会。随后，罗马卷入了与塞琉古国王安提奥库斯三世（Antiochus III）[4]的战争，因

① 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马其顿国王，继位后大举扩张，先是征服了希腊，接着征服了波斯和印度河流域，后因士兵哗变而退兵，但已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公元前323年病逝于巴比伦。——译注
② 腓力五世（公元前238～前179年），马其顿国王，在位期间企图大举扩张，征服希腊。但遭到罗马强有力的打击，晚年集中精力于内政，巩固在马其顿的统治。——译注
③ 弗拉米尼乌斯（约公元前227～前174年），罗马将军与政治家，曾率军侵入巴尔干、击败马其顿后宣布希腊人的自由，利用希腊人牵制马其顿。——译注
④ 安提奥库斯三世（公元前242～前187年），塞琉古王国国王，曾大力扩张塞琉古领土，率军远征波斯河印度河流域，与托勒密埃及进行战争，后与罗马冲突，但叠遭失败，致使塞琉古失去包括小亚细亚在内的大片领土，疆域日益局限于叙利亚地区。——译注

为后者试图重新控制小亚细亚。公元前190年，在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Lucius Cornelius Scipio）[1]指挥下，罗马军队在马格涅西亚（在今天的土耳其）让拥有数量优势的塞琉古军队遭受决定性的失败，安提奥库斯被从小亚细亚逐出。这一次，罗马人又拒绝吞并敌人的领土。

公元前172年罗马人再度发动对马其顿的战争，表明如今他们决心对对手国家采取敌视政策。公元前168年，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LuciusAemilius Paullus）[2]在皮德纳消灭了腓力的儿子柏尔修斯(Perseus)[3]的军队，马其顿王国被废，罗马人将马其顿划分为四个共和国，希望利用它们阻击巴尔干内地的部落。公元前149年，马其顿爆发起义，而且波及希腊，因为在那里存在着对罗马干涉的深刻仇恨。到公元前146年，罗马已经镇压了起义，将科林斯夷为平地，以警告希腊人。

行政管理的复杂化

公元前146年，罗马人设立了两个新的行省：马其顿和非洲（迦太基周围的领土）。这一次，他们没有设立新的裁判官。从此时开始，行省的设立就伴随着罗马对地中海的征服，但裁判官的数量并无相应增加。公元前133年，设立亚细亚行省（小亚细亚西部）；公元前2世纪20年代后期设立南高卢行省（现代法国）；公元前2世纪末设立西里西亚行省（小亚细亚东南部）。由此造成的裁判官的短缺，由于罗马一系列新法庭的建立而变得更加严重。传统上，审判在人民的集会上进行，但在处理大量案件和事关杰出人物的案件时，事实证明这套制度无力应付。第一个永久性法庭建立于公元前149年，由元老充任陪审员，负责审判行省腐败案件，目的是遏制罗马总督日益增长的对权力的滥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处理各种严重案件的法庭建立起来，主持其中的一个法庭，对一个裁判官来说，就是一份全职工作，可他们的人数一直不足。罗马国家及其帝国的管理开始超出元老院管理它的能力。

导致公元前2世纪政治稳定崩溃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征兵制度的失败。军役需求的增长和来自富人奴隶劳动农场的竞争，共同削弱了小所有者的竞争力，导致作为罗马军队核心的小所有者阶级崩溃。第二个问题是意大利同盟者要求得到罗马公民权。这些同盟者构成了罗马军队的半数，但同样的服务，所得到的却是劣等的酬劳。他们的领袖既不能参与罗马的投票，也不能在那里担任官职。此外，所有同盟者都要服从罗马官员的惩处，而公元前2世纪通过的法律保护罗马公民免受惩罚。然而，罗马的显贵们没有理由通过扩展公民权来危及他们自己的政治控制。他们数次破坏了授予同盟者公民权的努力，最后的结果是内战。



鲁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公元前1世纪的雕像，现存巴黎卢浮宫。无情的苏拉上升到罗马独裁官的高位，建立了为实现国内政治目的使用军事力量的先例，给年轻的尤里乌斯·恺撒以巨大影响。

[1] 西庇阿（公元前3世纪末－前2世纪初），大西庇阿之子。关于他的事迹，古代的记载存在混乱。——译注

[2] 保卢斯（约公元前229－前160年），与前文的保卢斯并非一人。此人为公元前182年罗马执政官，率军入侵巴尔干，公元前168年在皮德纳战役中击败马其顿，但十分欣赏希腊文化。——译注

[3] 柏尔修斯（约公元前212－前16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之子。曾试图扩大马其顿势力，控制希腊，坚决反击罗马侵略，皮德纳战役中被击败，后幽死。——译注



大庞培（Pompey the Great）雕像，吉利奥·马佐尼（Giulio Mazzoni）1540年雕于罗马。在使用军队威胁元老院以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方面，庞培追随的是他以前的保护人苏拉。通过确保授予他连续的、虚假的军事指挥权，他为自己控制权力维持着一副合法的外表。

政治暴力的兴起

共和国的灭亡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前133年暴力被引入国内政治到公元前1世纪80年代的内战，从此时起士兵们便被用来促进其指挥官的利益。在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他属于一个显赫的贵族家族——于公元前133年任保民官期间，他引入了以创造新的士兵储备为目标的立法，方法是没收已经被私人占据的公共土地，将其划分成小块分配给公民，因此使他们有资格服兵役。这个建议遭到了来自富有的占地者的激烈抵抗。为支持其计划，提比利乌斯诉之于看来会威胁到元老院的措施。当他试图重新当选为保民官时，他与他的一批支持者受到元老暴徒们的攻击并被杀死。虽然这些对暴力的使用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可以被辩护为保卫宪法，但元老院很快就发现，这样的暴力也能被用来对付他们自己。

公元前123年至前122年，提比利乌斯的弟弟盖乌斯成为保民官，通过了一系列旨在防止元老院滥用权力的法案。盖乌斯没费多大劲就获得了第二个任期，但这个任期却成了灾难。为了消除意大利同盟者对土地分配的反对，他建议授予同盟者以公民权，可是他的敌人们利用了现有公民的恐惧。在他第三次当选的努力失败后，在一次将取消他的一道法令的人民大会上爆发了冲突。为保护自身，盖乌斯和支持者们占据了罗马城内的一座小山。作为反应，执政官卢基乌斯·奥皮米乌斯（Lucius Opimius）[①]促使元老院通过了一道法令，要求他来保卫国家。依靠这种授权，奥皮米乌斯使用军队攻克了被占据的山丘，杀死大量公民（盖乌斯自杀）。此时，在国内政治中使用武力因官方法令而被合法化了（见98～99页）。

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十年，由于一系列军事上的失败，寡头对国家的控制遭到了一次重大打击。对努米底亚（在北非）国王朱古达的战争进行得没有效率，对元老贵族明显的无能和贪污腐败，人们极为愤怒。最后，一个能干的官员承担了征服努米底亚的任务，但他用的时间太长，无法满足不耐烦的选民。公元前107年，他们选举了一个新人（也就是说，一个 novus homo，某个祖上不曾充任元老的人）盖乌斯·马略来完成这个任务。事实证明结束战争是容易的，但在征集援兵时，马略把无土地者吸收进军队。在共和国的毁灭中，这次改革将发挥主要作用。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样的军队最终只是忠诚于他们的指挥官，因为他能够关照他们在退役时得到分配的土地，这样，他们就可以被用来反对罗马元老院的统治。

正当努米底亚战争即将结束时，另一场重大的军事威胁以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形式出现。他们是已经移居高卢的日耳曼人部落。公元前105年，在阿劳西奥（现代的奥兰治）附近，他们让罗马的军队吃了一次惨重的败仗。对寡头统治的敌视在罗马达到了白热化程度，马略被不合法地选举为公元前104年的执政官，而且直到公元前100年，他每年都担任该职。他消灭了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但在公元前100年，由于他允许从前曾是他盟友的一个保民官被杀，而使自己的政治生涯进入暂时的低潮。

① 奥皮米乌斯，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政客，先后出任执政官等重要官职。担任执政官期间，他利用其同僚不在罗马的机会，独揽大权，在元老院支持下镇压格拉古改革，并在几乎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处死了3000名公民，被控告后竟被无罪开释。其行为使元老院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法合法化，但在处理努米底亚问题上再度被控告且被流放，不知所终。——译注

公元前91年，保民官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Marcus Livius Drusus）[①]也被刺杀，他建议的改革措施之一，是授予意大利同盟者以公民权，现在，他们对通过合法手段取得公民权绝望了。许多同盟者发动了公开起义，在随后的同盟战争（来自socius一词，拉丁语的意思是同盟）中，罗马遭遇了几次重大失败。到公元前89年，罗马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镇压了起义，但他们被迫给予波河以南的所有意大利人公民权。

有关同盟者应当怎样被登记为公民的争论，导致了一场罗马的内战。保民官普布里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卢弗斯（Publius Sulpicius Rufus）希望将新公民平均分配到各投票部落中，并寻求马略的帮助，马略则希望获得在东方已经爆发的一场战争的指挥权。在那里，小亚细亚东部本都王国的国王米特拉达弟（Mithridates）[②]由于与罗马人的边界纠纷挑起了战争，而且占领了军力薄弱的罗马领土。这场战争的指挥权被授予了执政官鲁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在努米底亚时，苏拉曾为马略服务，但已经与他的前指挥官闹翻。当卢弗斯通过一道法令，将指挥权转给马略时，苏拉采取了一个毁灭共和国的措施，他使用军队夺取了罗马，杀死了保民官，驱逐了马略。在满意地解决了罗马的事务后，苏拉在公元前87年初前往希腊。就在此时，马略与他的追随者重新夺取了罗马城。到公元前86年，苏拉已经打败米特拉达弟的军队，有意与罗马据统治地位的政治家、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秦纳（Cornelius Cinna）[③]谈判（马略于公元前86年去世）。同时，通过允许军队从亚洲那些不忠诚的城市勒索钱财，苏拉确保了军队对他的忠诚。公元前84年秦纳的死亡，导致了苏拉次年的入侵意大利。在经过多次血腥的战斗后，苏拉于公元前81年末取得了对意大利的控制权，而且使自己当选为独裁官（专门在军事危机时设立的传统官职）。苏拉以反对马略派的贵族保卫者面貌出现，对他的敌人进行了严厉的清洗，但他树立的利用军队获得政治统治的先例却无法废止。苏拉死于公元前78年。

元老政体的恢复

共和国灭亡的第二阶段，始于苏拉公元前78年对元老政体的恢复，止于公元前49年新内战的再度爆发。在这个时期，对帝国的军事威胁，使得授予某些将军史无前例的权力成为必须，因为将军们利用财富和军队干预罗马的政治。第一个大军阀是格涅乌斯·庞培乌斯（Gnaeus Pompeius，庞培）。还是一个年轻人时，他就为苏拉征集了一支军队。在公元前78年至前77年镇压了意大利因对苏拉的解决方案不满发生的起义后，庞培利用军队从元老院掠取了在西班牙反对马略余党战争的指挥权。同时，公元前74年在意大利爆发了一次奴隶起义。[④]在斯巴达克领导下，在坎佩尼亚（Campania）受训做角斗士的俘虏们冲破了营地，解放了意大利南部的农业奴隶。最后，成千上万的奴隶拿起了武器，数次打败了罗马匆忙征集的缺乏经验的军队。公元前72年，前裁判官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接受了与奴隶作战的指挥权，打败了起义者的主力。作为回报，庞培和克拉苏一起取得了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职位。虽然克拉苏担任该职合法，但庞培不仅尚在该最高官职所规定的最低年龄之下，而且此前不曾担任过任何应当担任的较低级官职。他很快就找到了巩固其地位的方法。公元前2世纪，罗马已经消灭了曾经保持地中海秩序的海上势力，海盗猖獗起来。罗马分割的行省制度无法应对这一威胁，公元前67年，庞培经投票被授予指挥权，其权力范围囊括整个地中海，而且赋予他巨大的资源来对付海盗。40天之内，他的军队横扫了地中海各地。次年，庞培经投票被授予东方的指挥权，因为公元前73年，与米特拉达弟的战争重新爆发。庞培的前任鲁基乌斯·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已经将战争扩展到亚美尼亚王国，但他无力结束战争。在公元前67年遭受一次挫折后，他的军

① 德鲁苏斯，公元前1世纪初罗马政治家，公元前91年保民官。在任期间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有些措施直接继承了盖乌斯的观点，如提高骑士地位、改革罗马司法、授予意大利人以公民权等，但遭到元老贵族反对，决议被废止，本人被暗杀。意大利人因此发动了反对罗马的起义，同盟者战争随即爆发。——译注

② 米特拉达弟（？～公元前63年），即米特拉达弟六世，本都国王。公元前120年继位，初由母后摄政，亲政后一面扩大本都领土，一面与罗马对抗，数次与罗马发生正面冲突，最后被罗马击败，失去自己的国家。准备东山再起时，军队哗变。他服毒未成，被一个高卢雇佣兵杀死。——译注

③ 秦纳，公元前1世纪罗马军人和政治家，马略的同盟者，曾在苏拉离开罗马后执掌政权，反对马略屠杀政敌的政策，而且着手恢复共和国的秩序，并与苏拉谈判，后被叛军所杀。——译注

④ 即斯巴达克起义。——译注

西塞罗对恺撒的评价

你看，这里就有一个人，他渴望作罗马人民的国王和所有民族的主人，并且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有人认为这样的欲望是高尚的，那他必定失去了理智，因为他竟然称赞法律和自由的死亡，认为可恶而卑鄙地压制法律和自由是光荣的行为。

西塞罗：《论义务》，第3卷第83节（中译文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该书中文版）

队拒绝继续战斗。庞培不仅结束了战争，而且通过解决小亚细亚的事务，吞并了叙利亚的塞琉古王国，确立了罗马的东方边界。公元前62年末，庞培回到了罗马，他已是一个极富有的人。

此时罗马的政治一团混乱。演说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已于公元前63年担任过执政官，镇压了一次推翻罗马国家的阴谋（西塞罗的许多作品保存了下来，罗马共和国最后20年因此成为希腊－罗马历史上文献记录最好的时期。另见第134～135页）。人们普遍担心庞培企图模仿苏拉夺取权力，但他解散了军队。尽管如此，他仍树敌众多，元老院拒绝批准他在东方所做的安排，拒绝给他的老兵土地。同时，元老院也挫败了克拉苏重组亚细亚税收的努力。克拉苏同意与庞培合作，让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当选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作为回报，恺撒许诺推翻元老院阻击他的两名支持者野心的措施。恺撒当选了，而且利用威胁强制通过了必要的立法。三人组成了一个不协调的同盟，历史上称为“前三头”。

任执政官期间，恺撒被公民大会授予在高卢的五年指挥权（后来又延长了五年）。他证明自己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将军，在公元前58年到前52年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中，他将罗马的统治扩张到遥远的北方，将莱茵河以西的所有地区都收入罗马境内（除今天法国的中部和北部外，还包括低地国家）。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一支忠诚的、会追随他到任何地方的、有经验的军队。

与此同时，罗马的选举制度也在暴力和贿赂中垮台。庞培和克拉苏是公元前55年的执政官，将西班牙和叙利亚五年的指挥权分别据为已有，而且延长了恺撒在高卢的指挥权。庞培留在罗马，但克拉苏为寻求与其盟友相匹敌的军事声望，越过叙利亚边界侵入帕提亚（Parthian）王国。公元前53年，他在卡雷（在今土耳其境内）一次灾难性的失败中被杀。罗马的政治权力再度分别归于恺撒和庞培。

公元前1世纪50年代末，恺撒在高卢的指挥权即将到期，他需要再度当选为执政官，以避免因其公元前59年的不当行为受到控告。但是，到公元前50年，庞培已经被恺撒在元老院中的敌人接受为自己的领袖，而且他已准备暴力对抗自己过去的盟友。由于在元老院中被挫败，恺撒将他的军队开入意大利，引起了内战。多数元老站在了庞培一边，但恺撒证明，他是迄今为止最能干的将军。战争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5年，恺撒在一系列战斗中打败了敌人。他有意放弃了苏拉的血腥先例，原谅了他的敌人，因此许多曾经为共和国而战的人都投到了他的一边，而反对派的领袖（包括庞培）都死于战争。他的新老支持者们期待胜利的恺撒恢复共和国，但他明显无此意图。他提前几年举行选举来补充那些传统官职，采用了国王的装饰，接受本来是希腊的东方国王们才有的荣誉，并且在公元前44年初使自己被指定为终身独裁官。同年3月15日，元老们将主动权抓在了自己手中，他们中的60人合谋刺杀了恺撒。

罗马共和国的末日

恺撒死后的时期是共和国走向灭亡的最后阶段，那时罗马的选举过程已经毫无意义，所有权力都掌握在军阀们手中。刺杀者们期待着共和国因暴君的死亡而恢复，但是他们错了。幸存的执政官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Marcus Antonius，即马克·安东尼）试图把恺撒的支持者重新组织在自己的麾下，同时留下和刺杀者和解的空间，但他忽视了恺撒继承人的影响。由于没有子女幸存，这位独裁者已经过继其姐姐19岁的孙子为继承人，此人通常以屋大维而知名。虽然恺撒没能把一个人的军事统治与元老派的传统价值观调和起来，但他无情的继承人在经过15年的内战后，作为胜利者建立了帝制政体，但表面上却打着恢复了共和制的招牌。

独裁者死后的年代是一个同盟者不断变换的时代。屋大维最初打算利用他对恺撒老兵的影响夺取权力。这个计划失败后，他和元老院结盟反对安东尼。公元前44年末，安东尼企图夺取意大利北部，屋大维对他发

动战争，迫使他退入高卢。然后屋大维改变立场，与安东尼以及恺撒的另一个将军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①]结成同盟。他们联合占领了罗马，使他们自己被任命为三头。对他们的敌人的清洗导致了西塞罗的死亡，因为他曾不断发表反对安东尼的演说。



19世纪的法国画家让·勒昂·吉罗美（Jean-Léon Gérôme）描绘的尤里乌斯·恺撒遇刺的情景。布鲁图和喀西乌斯领导的元老们采取重大步骤，将恺撒刺死在库里亚大厅——元老院辩论厅——的地板上。

同时，盖乌斯·喀西乌斯·隆吉努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和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Marcus Junius Brutus)[②]——刺杀者中的两个领袖，夺取了东方行省，因为他们意识到，对他们来说，与他们的牺牲者的继承人合作是不可能的。公元前42年，安东尼和屋大维在希腊的腓力比打败了布鲁图等，现在，罗马世界实际上是他们的了。雷必达退缩到了非洲，而安东尼将罗马的东方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屋大维则得到了意大利。屋大维很快迫使雷必达不光彩地退了休，安东尼则击退了帕提亚对东方行省的入侵，但其反攻却遭受失败。

虽然安东尼与屋大维的妹妹结了婚，但他又与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统治者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③]混在了一起，而且把罗马的领土送给她和她的孩子们。屋大维的回应是要求在他控制下的城市向他个人进行忠诚宣誓，而且准备战争。公元前32年，他的军队在希腊西部与安东尼的军队遭遇。安东尼在战术上被挫败，试图从海上逃往埃及。公元前31年，他的舰队在阿克兴被歼灭。屋大维如今成为罗马世界无争议的领袖。

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使罗马公民广泛散布到意大利和地中海各地。盖乌斯·格拉古恢复了重建殖民地的做法，但其基础和早期的拉丁殖民地颇为不同。新殖民地的目的是向无地的罗马公民提供土地。虽然盖乌斯的绝大多数定居地在意大利，但他也开始在其他地区安置殖民者（例如在迦太基旧址）。一般来说，这个政策和那些反对元老寡头的政客们联系在一起，而元老们将拒绝在外国建立殖民地（和分配土地）视为当然。从马略时代起，殖民的主要意图是给那些取得战争胜利的老兵提供土地，所以他既在意大利，也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苏拉在意大利建立了殖民地，其土地是他从那些在内战中反对他的城市那里没收来的。在公元前1世纪40年代初期的胜利后，恺撒既在意大利，也在海外为他的老兵建立殖民地，屋大维在腓力比和阿克兴之战以后也是如此。所有这些殖民地都大大推进了西欧、北非和巴尔干地区的罗马化。

共和国是因为三个原因垮台的。第一，它没有提供有效监督行省总督的手段，使得那些总督中的无原则之辈剥削行省，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滥用他们指挥的军队。虽然共和国在最后一个世纪企图通过立法监督总督，但缺乏此类行政结构来协调这些规定，确保总督的服从。第二，帝国的战略要求使得建立一支庞大而永久性军队成为必须，从而导致了无土地者被征入军队，而这些人对罗马旧的选举制度缺乏忠诚。最后，当人民大会被暴力左右时，政治制度失去了它的合法性。罗马小型的公民大会已经不再能代表作为整体的罗马人民，因为同盟者战争以后，公民是由意大利全体人民组成的。屋大维的天才在于，他提供了一个控制军队所需要的专制制度框架，同时通过表面上恢复共和国，给元老们的感情留下了空间。

① 雷必达（? ～公元前13或前12年），罗马军人，原为恺撒的部将。恺撒死后，他与安东尼、屋大维结成三头同盟，打败共和派，后与屋大维合作击败小庞培，但他取得西西里的企图失败，部下哗变投奔屋大维，遂失去权力，以祭司长终老。——译注
② 刺杀恺撒的两个领袖人物。刺杀后不久就逃往希腊，在那里聚集军队，与屋大维等对抗，公元前42年在腓力比战役中被击败后先后自杀。——译注
③ 克利奥帕特拉（公元前69～前30年），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以美貌著称。她先后与恺撒和安东尼结盟，企图扩大和维持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但终因缺乏实力，与安东尼一起被屋大维击败后自杀，托勒密王朝遂亡。——译注





第三章

皇帝们

大卫·波特

皇帝们

公元14年9月，提比略，我们现在知道是皇帝的那个人，在元老院嘲弄了自己。他的继父的尸体——我们知道那是皇帝奥古斯都——在一次特殊的公共葬礼的高潮时刚刚被火化，执政官——当时罗马国家的主要官员——已经准备了一个法律文本，将把曾由奥古斯都掌握的各种权力授予提比略。

皇帝统治的发展

提比略已经掌握了奥古斯都所有权力中最重要的两项：较高治权（imperium maius）和保民官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①。前者被界定为一种“比那个统治他应当进入的任何行省的人的权力要大的权力”，后者使他可以把决议直接提交给人民表决，停止公共事务，保护一个罗马人免受一个官员处置。但提比略好像暗示，他宁愿不拥有那些额外的权力。这些权力可能包括管理罗马城的某种权威、主持元老院会议的权力、宣战或者媾和的权力，而且很有可能包括这样一条规定，即使提比略免受法律限制的规定。与提比略已经掌握的那些权力一道，这些权力将构成被称为“paterna statio”，即祖先地位的权力。在奥古斯都死前，他曾经在国家中具有这种地位。好像并没有人使用元首（princeps）这个词，它只是逐渐变成共同使用的称呼，而且将变成对我们如今称为皇帝的那个人的惯用罗马术语。事实上，只是在公民大会根据执政官提出的动议进行表决，且在提比略不再含糊其辞，该决议由元老院批准后，才会存在一个罗马皇帝意味着什么的定义。奥古斯都曾经占据的地位，是在马克·安东尼于公元前30年在亚历山大里亚自杀后，逐步积累到他那里的诸权力的特殊集合。在后来的44年中，他通过安排让他的各个亲属行使其中的某些权力，但直到公元14年，没有人曾将它们全部控制。



埃及奥克苏亨楚斯纸草残篇上献给皇帝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285～305年在位）巨大的公共献词的一部分。献词是由第五（马其顿）军团的一个支队提供的。这篇纸草也许是石匠刻写铭文的草稿，但也许它本身就是那份通告。

不幸的是，我们并不知道罗马人民投票赞成执政官建议的具体日期，虽然很可能是直到一个月之后，他们才集会做这件事情，因为传统要求，在一个法律被作为建议提出到它实际被表决之间，应当有三个“集市”（“nundinae”）

① 两种权力都产生于共和国时代，前者指较高层次的治权，例如，独裁官的治权相对于执政官的治权是较高的治权，执政官的治权相对于裁判官的治权也是较高的治权。这里显然是说皇帝的治权高于任何其他官员。保民官的权力本是指平民保民官的权力，目的是保护平民免受贵族侵害，否决元老院和高级官员决议的权力。后因平民大会成为立法机构，保民官取得了立法权力。奥古斯都将这些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罗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在后来的历史中，恺撒与奥古斯都成为皇帝的代名词或头衔。——译注

的周期过去，而罗马每九天有一个集市。可是，正是在这一点上，由于这部《关于治权的法律》（*lex de imperio*）的通过，元首在国家中的角色有了合乎逻辑的界定。规定这个程序的传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前一个世纪中，它已经被用来创造各种特殊的职位。让有关提比略的法律与以前的法律如此不同的是，虽然它们本来是与某些特定的危机相联系的，但人们所以需要它，是因为当时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感：国家所需要的是一个君主。在奥古斯都生前，这种情绪已经成长起来。他曾经喋喋不休地宣称：当他拥有他的地位时，他要恢复罗马、意大利和行省的和平与秩序。

在皇权统治的发展过程中，提比略即位之初通过的界定元首权力的法律是开始，而非结束。如果我们向未来移动大约三百年，来到现代土耳其城市伊兹米特，古代的尼科米底亚郊外的平原上，我们也许会看到皇帝权力得以界定的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305年5月1日，皇帝戴克里先召集军团的代表们来见证一场在舞台上举行的仪式。在那里，21年前，他登上了奥古斯都的位置——第一个皇帝的名字早已成为一个称号，而且当着集合起来的军队的面，杀掉了那个希望被宣布扮演他的角色的人。那天没有元老院会议，在那些挑选戴克里先为领袖的统帅们中间，只有少数几个是元老院的成员。这一次也将不会有元老院的会议，而且在米兰的元老院也没有开会。在那里，戴克里先长期的副手，小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Maximian）也将举行同样的仪式。在这一天，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将会退位，他们是仅有的自愿这样做的皇帝。这边在尼科米底亚，戴克里先将脱下作为官职象征的紫袍，把它裹在马克西米努斯·戴亚（Maximinus Daia）的肩上，把他提升到副皇帝，即恺撒（Caesar）的位置上。马克西米努斯正在代替戴克里先的女婿马克西米亚努斯·加列里乌斯（Maximianus Galerius），因为他现在变成了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会和他的女婿，另一个恺撒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和一个名为塞维鲁（Severus）的人，进行同样的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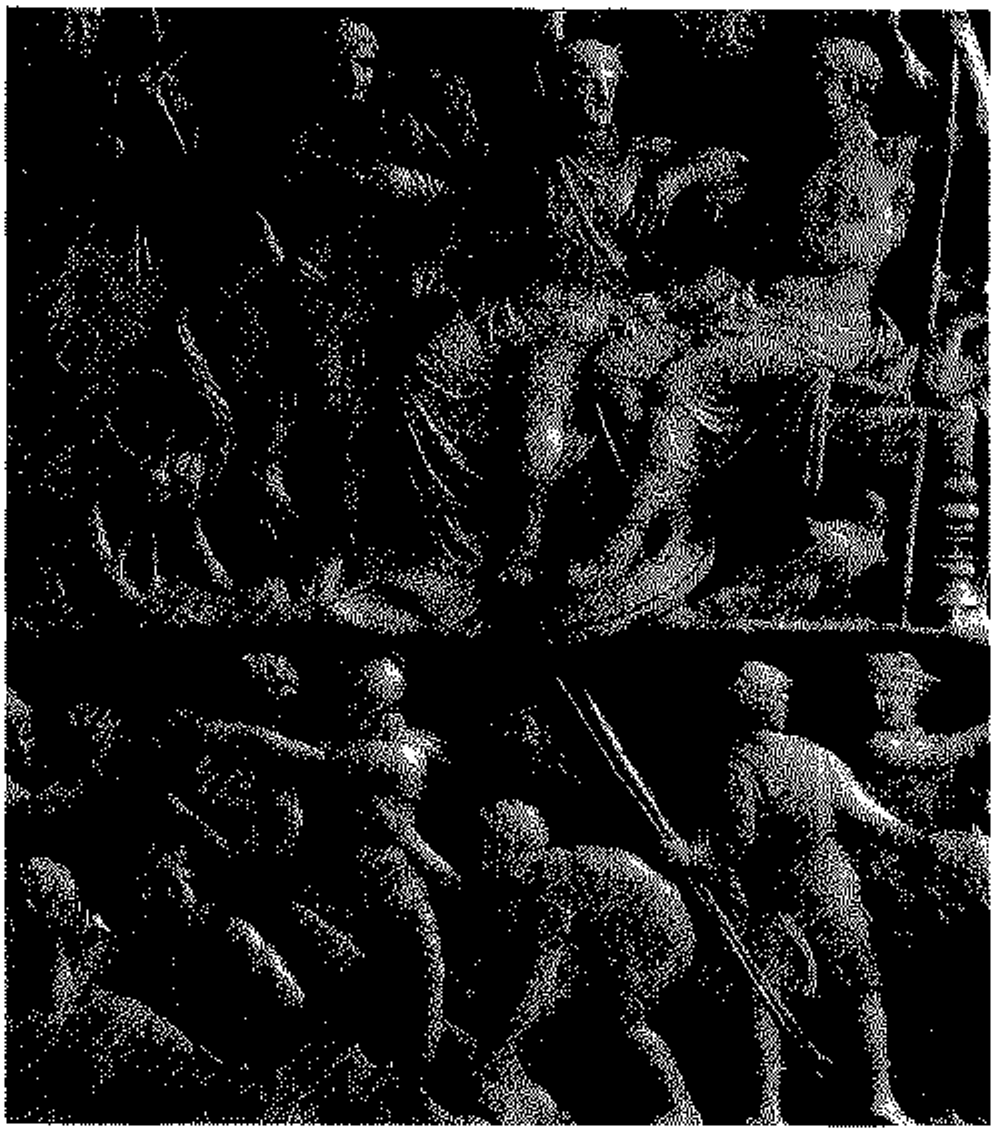
自293年以来，这四位皇帝作为一个集体，宣称他们从混乱中恢复了罗马帝国，拯救了它病恹恹的经济，恢复了正义，纯洁了罗马国家。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表决通过的法律，而是他们的士兵的欢呼以及神灵的恩宠。

皇帝的财产

我们如何从提比略过渡到戴克里先呢？大概最好的方式是从提比略在元老院发表其不得体的演说之前所做的事情开始。在此之前，作为奥古斯都权位的第一继承人，他接受了自己的份额，也就是说他必须交纳奥古斯都写入遗嘱的财产，取得地中海世界最大的一份不动产——他的遗产（patrimonium）。

在确立其地位方面，皇帝的私人财富像任何法律规定一样重要，甚至在奥古斯都生前，皇帝的领地就需要一批管理人员，其规模也许已经超过了代表罗马国家（公认比较薄弱的）管理行省与税收的官僚。奥古斯都在行省的管理人员大多由奴隶或者被释奴隶组成，他们管理着他的地产，在行省一级，向被称为代理人的官员（他们绝大多数也是被释奴隶）提交报告。他个人的随员由“朋友”组成，他们是那些具有重要职能、帮助他的同僚贵族。他还有一帮秘书，都由奴隶或者被释奴充任，可以接受命令。另外有阅读官，他们的任务从娱乐到让他了解他收到的信中的内容。即使如此，奥古斯都也不大可能听到写给他的所有信件，他的个人随员会对邮件进行分类，甚至以他的名义回信。这支新兴的秘书和财务官僚队伍，得到骑士官员的补充，他们监督元老院指令他处理的重要事务的管理，例如埃及行省的管理以及罗马城的谷物供应等。元老院决定他应当拥有一支卫队，由两个具有骑士资格的官员统帅，那些指挥着这支据说由1万人组成的军队的军官就向他们负责。

在后来的罗马行政管理史上，关键的问题是确定皇帝作为财产所有者和官员的角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管理他的财产的人比绝大多数元老能更方便地接近皇帝。结果在1世纪，贵族们开始取代以前控制着皇帝财产许多事务的被释奴隶。2世纪，那些通过管理皇帝财产升迁的人和那些通过出任传统官职的贵族实现了基本平衡；3世纪，由于各种原因——从某些人的难以相处到似乎非常缺乏想像力的统治阶级应对挑战的无能，权力的平衡偏向了将军和廷臣。到3世纪末，皇帝已经是作为军队以及管理皇帝财产人员的主人进行统治了。



这是约公元10年的一件被称为“奥古斯都宝石”(Gemma Augustea)的玛瑙雕刻。其(上部)表现的是提比略、奥古斯都与人格化的罗马女神在一起的情景，以及(下部)佩带着胜利象征(包括一个有胡须的俘虏)的提比略的士兵。

公元68年是财产管理上的关键时刻。当时皇帝尼禄已经被废黜，而且自杀。既然尼禄不曾立下遗嘱，财产就没有了合法所有人。我们不知道，尼禄死去数月之后，当人民投票将构成皇帝职位的法律权力授予加尔巴（Galba）[①]时，通过何种技术手段，尼禄的财产变成了加尔巴的财产。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加尔巴搬入了一座宫殿，全面控制了管理财产的官员队伍。可能的情况是：他将皇帝的财产作为无人继承的财产（bona vacantia），即缺乏合法继承人的财产接管了过来，根据法律，它们就变成了皇帝的财产。我们知道的还有，至公元3世纪，皇帝处理其财产的权力尚不够绝对，3世纪的法学家阿尔丕安（Ulpian）[②]注意到，对财产中的有些部分，皇帝之不能处理它们，犹如罗马国家不能放弃罗马广场一样。193年，当佩提那克斯（Pertinax）在康茂德（Commodus，180～192年在位），[③]被谋杀后登上王位时，他提出了康茂德挥霍财产的方式问题，就好像它是一个公共问题一般。隐藏在这些声明之后的，是对附属于皇帝位置的人和财产进行区分的意识。这同说皇帝有两副躯体相当不同。中世纪欧洲人谈到国王时就是如此，也就是说，一方面是作为国王的个人，另一方面是定义国家的王权。皇帝从来没有与帝国同一过，在共和国（res publica，即罗马国家）中，他拥有最高权力，但这与说他的权力就是国家非常不同。

皇帝和他的官员们

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科尔涅利乌斯·塔西陀在2世纪写道：皇帝的历史学家关注的是一些小事，他们常以不可预见的方式，控制着大事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④]是在塔西陀之后一个世纪写作的，而且本人也不是一个劣等的历史学家。他注意到，人们常常很难了解皇帝的圈子中发生的事情，因为皇帝控制着接触信息的渠道。尽管有这些局限，两人都以特殊的能力，描述了皇帝行使权力的情况，而且他们的透视，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是在宫廷与传统贵族平衡的时代之初写作的，另一个则是在那个时代末进行写作的。在许多方面，2世纪都是一个本性不稳定的政治制度保持稳定的时期。

奥古斯都认为，他本人属于前一代传统中据支配地位的政治领袖，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描绘，不仅在铭文中——该铭文被铸在青铜板上，立于其陵墓之前，而且在维列乌斯·帕特克罗斯（Velleius Paterculus）[⑤]的作品中——他在公元30年写了一部简明罗马史，都是如此。提比略取得权力时的古怪仪式，也是其反映，证

① 加尔巴（公元前3－公元69年），罗马皇帝。68年举兵反对尼禄，并在尼禄死后被元老院承认为皇帝，但因为处置失当，于69年被近卫军杀死。——译注
② 阿尔丕安（？～228年），罗马帝国时代的法学家和帝国官员，其著作占了查士丁尼《法学汇纂》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译注
③ 康茂德（161～192年），罗马皇帝，统治残暴，在位期间曾处死大批元老，而且自命为赫尔枯列斯转世到角斗场参加角斗。后被谋杀。他死后罗马爆发内战。——译注
④ 狄奥（约150～235年），罗马官员和历史学家，写有《罗马史》80卷。——译注
⑤ 维列乌斯·帕特克罗斯（约公元前19－公元30年后），罗马军人和作家，其《罗马史》始于建城，止于公元前30年，实为一部作品汇编，虽然作为史学家，他的热情大于史识和史才，但他保存了不少关于罗马殖民以及早期拉丁语文学发展的资料，具有一定价值。——译注

明帕特克罗斯的看法有道理。对恺撒、庞培，或者苏拉来说，政治权力来自军事上的成功。奥古斯都也是如此，他的一生是以比罗马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广泛的征服为标志的。尽管他本人是一个相当蹩脚的将军，在内战期间某些决定性战役前多次生病，但他设计出了一种制度，使他能够把他人的成功据为己有，而且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军事天才。通过在公元前28年取得较高治权——最初是有期限的，后来变成了终身制，他能够宣布，他的将军们是在他的护佑下战斗的。他的意思是说，他与神灵的关系保证了将军们的成功。既然奥古斯都能够指定人员来指挥行省中的军团，而这些行省是公元前28年元老院授予他的巨大行省，从而将几乎所有有军队驻扎的行省包括在内，所以能确保将军们对他个人的忠诚。

奥古斯都能够宣布的胜利并非无足轻重。在20年代，他将西班牙那些尚未处在罗马控制下的地区整合进行省体系中。在那个十年之末和下一个十年之初，他以对罗马有利的条件获得了与波斯的和平。此后，他的军队征服了巴尔干和远达易北河的日耳曼。虽然日耳曼行省在公元9年后失去了，但他去世时留下的帝国，北方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为界，中东地区以幼发拉底河划线。此后几乎二百年时间里，帝国保持着大体相同的规模。后来的皇帝中，只有两个进行了大规模的领土兼并。一个是克劳狄，将不列颠以及北非原来某些依附国的领土添到了罗马领土上，从而完成了罗马对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控制。另一个是图拉真，

奥古斯都对其解决方案的叙述

根据人民的同意，在扑灭内战和掌握权力后，在我的第六和第七个执政官任上，我把共和国从我的控制下转给了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因为这个缘故，我被元老院的指定命名为"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的《业绩自传》，第34章第1节（大卫·波特英译）

图拉真记功柱螺旋型浮雕石膏复制品的一个细节。该柱建于113年，以纪念101年至102年、105年至106年对达西亚人(Dacians)的战役。这里表现的是：皇帝本人在士兵们建立的位于图尔努－塞维林的多瑙河大桥边举行献祭仪式。



罗马的税收

罗马国家的收入来自各种税收。它们分成三个基本部分：土地税、人头税和对各种经济活动征收的直接税。土地税和人头税的义务通过人口普查确立。普查根据各省确定的周期，在各个行省按周期进行。人头税的义务也由同一个普查确定。

确定税收的责任属于地方政府。其他现金税，比如进出口税，是承包给由收税人（publicani）组成的收税公司的。在各个普查周期，收税公司竞价取得征收某些税收的权力。公司利用自己的资源将税收支付给国家，希望以后通过收税来补充这些资源。如果公司收取的比他的竞价多，那么多余的部分就归公司；如果征收的税低于竞价，那就自己承担损失，除非它通过谈判为自己从国家那里获得减免。收税人还倾向于征收被称为“portoria”的交通税，税额根据跨省运送的货物量决定。除了这些绝大多数落在非罗马人和居住在行省的罗马人头上的税收外，还有由罗马公民承担的财政税（它按五年的期限也承包出去）。它们中主要有5%的继承税，原由奥古斯都确定，以充实专门支付退役士兵退役金的财库；5%的奴隶解放税，1%的商品拍卖税。4%的奴隶买卖税是由尼禄设立的，虽然有关证据相当模糊，但他死后可能也保留下来了。

实行土地税和人头税背后的原则，是国家应当事先知道在每年它可以期待得到多少收入。考虑到土地税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周期后才重新估价，税收承包人的合同期是五年，这套制度非常缺乏弹性。如果遇到突发性危机，获得新收入的空间很小。看起来情况是：皇帝们回应地方金钱请求的方法，就是豁免地方的某些税收，除非发生粮食危机，作为土地税征收的一部分，粮食会被划拨到粮食短缺的地方。

早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税收体系的不完备已经被发现，为此奥古斯都将自己的大笔金钱支付给了国库。皇帝的巨额财产为其提供了应付异常开支所需要的机动收入，而且在有需要时，还有一些对国家不开放，但对皇帝开放的渠道使他的收入最大化。这些渠道中的一个是继承无继承人财产的权利和占有无主土地的权利，另一个是夺取那些犯有严







重刑事罪行的人的财产——在贵族社会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皇帝们常向元老院宣誓他们不会处死元老，与此意思相同的另一个说法是：皇帝不会认为元老的财产是皇帝收入的一个潜在来源。但即使那些已经宣过誓的皇帝们，也不是必须遵守这一点，因为没收作为取得现金的一种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用4世纪历史学家阿米安努斯·马尔克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①的话说，一个有需要的皇帝，会“像洪流一样扑到富人身上”。

上图：属于罗马国库官员（viator ad aerarium）的一袋钱的浮雕。

左图：出自特里尔（Trier）的（？）墓碑浮雕的一个细节，属于2至3世纪。即使是在帝国的边缘地区，在许多金融交易中也使用罗马的铸币。

① 阿米安努斯·马尔克林努斯（约330—395年），罗马历史学家，其《罗马史》共31卷，始自涅尔瓦继位，止于瓦伦斯之死。该书现存后18卷，记述353年至378年间的史事，文风和史实均有塔西陀遗风。——译注

他征服了达西亚——多瑙河以北，构成现代罗马尼亚大部分的地区。两人取得权力的背景都有些可疑：克劳狄（Claudius）是在他的侄子卡里古拉被谋杀之后即位，图拉真（Trajan）当政是涅尔瓦（Nerva）①在97年过继的结果，过继之后伴随着近卫军的一场骚动。就他们两人而论，征服都伴随着罗马大规模的建筑活动，目的是获得人民的支持。图拉真在晚年还设想将帕提亚王国所属的今伊拉克的部分并入罗马版图，但就在他去世前夕，他意识到罗马缺乏保有它的力量，于是决定采取相反的、满足于表面的“制度变革”政策。

帝国边界的这种相对稳定，好像既适合于皇帝，也适合于贵族成员的需要。那些上升到高级指挥官地位，渴望军事荣誉的人，满足于保卫罗马领土的工作，在不引起皇帝妒忌的前提下，他们为自己积聚了信誉。许多皇帝很少有自己亲历沙场的愿望。当克劳狄登基时，年龄已经比较大了，而且健康不佳，很不适合军事统帅的严酷生活；而他的继承者尼禄，则缺乏任何类型的军事历练。韦伯芗（Vespasian）②是一个颇有能力的军人，最终继承了尼禄的地位，他成为皇帝时年龄也比较大了，仅相信拥有广泛指挥权的图拉真的父亲。他的儿子图密善（Domitian）希望获得军事上的荣誉，但他人格上的缺点表明，他的战争是防御性的。继承图拉真的哈德良回避征服战争；他本人的继承者安东尼努斯·庇乌斯（Antoninus Pius），是另一个对战争没有兴趣的老人。只是在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Marcus Aurelius）统治时期（161～180年）③，皇帝才被迫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走上战场，而他的战争是一系列的防御性战争，先是对付波斯人，后来是对付多瑙河以北的部落。

防御性战略

在罗马帝国历史上，提比略在许多方面都是关键人物。他放弃了后期罗马共和国的、同时也是奥古斯都时代特征的侵略政策，采取了随后两个世纪典型的防御战略。但是，这不是提比略某种特殊本能产生的结果，而是他性格的独特性决定的。当提比略继位时，奥古斯都的侵略精神仍然活跃和兴盛，其代表是提比略的继子，在莱茵河地区指挥着一支大军的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奥古斯都指定他去指挥，是为了就公元9年普布里乌斯·昆提里乌斯·瓦鲁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的灾难复仇。瓦鲁斯指挥下的三个军团在日耳曼条托堡森林（Teutoberger Forest）被消灭，结束了罗马不可战胜的形象，而这个形象乃是罗马能依靠相对较少的军队控制住边界形势的原因。两年后，由于东方出现了麻烦，提比略将日耳曼尼库斯召回罗马，派往叙利亚。在安排了与波斯的和约后，他于公元19年在那里去世。提比略的亲儿子德鲁苏（Drusus），在其父亲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在巴尔干的军营里度过的，后被他的妻子谋杀。只是八年之后，提比略才了解到谋杀的情况。在此期间，他受到近卫军长官埃利乌斯·谢雅努斯（Aelius Sejanus）的巨大影响。当提比略于27年退隐到卡普里岛时——他再未从那里返回过罗马，谢雅努斯接管了日常事务的管理，利用他的权力迫害那些非他本人支持者圈子内的已经取得杰出地位的人，但他对军事冒险没有任何兴趣。当提比略发现谢雅努斯计划利用其地位取代提比略为帝时，他派人谋杀了谢雅努斯，处死了他的大批支持者，其中许多人是元老院的元老。

资深贵族被处决——罗马皇权表现为近卫军对奥古斯都家族的忠诚——让许多人对出人头地取谨慎态度。皇帝与元老院的关系需要调整的重要问题出现了。在卡里古拉的统治后，这实际上变成了某种必须的事情，因为卡里古拉明显是个精神错乱之辈。在克劳狄和尼禄统治下，国家的日常管理落入皇帝宠幸的另外一帮人——在克劳狄时代是被释奴隶，在尼禄时代是骑士阶层——手中。通过把统治的条件以及人们对升迁的期待正式化，他们与元老院达成了暂时的妥协。作为对赢得财富与荣誉机会被削减后的补偿，元老院成员获得了

① 涅尔瓦（约30～98年），罗马元老和皇帝，图密善被杀后被元老院选举为帝，实行较图密善宽容的政策，把军事将领图拉真（53～117年）过继为儿子，稳定了局势。图拉真，罗马皇帝，继位后采取扩张政策，先后夺取幼发拉底河流域、征服达西亚，并从事大规模的建筑活动。——译注

② 韦伯芗（9～79年），罗马皇帝，弗拉维王朝的开创者。尼禄死时，他正在巴勒斯坦指挥镇压犹太人起义的军事行动，69年7月被军队宣布为皇帝。主政期间大力加强皇权，提高税收，军事上则无太大作为。图密善（51～96年）为韦伯芗之子，81年继其兄提图斯为帝。他好大喜功，四面出击，导致财政困难，加上统治残暴，于96年8月被谋杀。——译注

③ 安东尼乌斯（86～161年），罗马皇帝，在位期间平定帝国内部的动乱，巩固边防，创造出一片升平气象，整个王朝也因此被称为安东尼王朝。据认为中国史书中所说之大秦王安敦即此人。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120～180年），罗马皇帝，在位期间罗马边境局势已经相当不稳定，其大量时间用于抵御外来入侵。但他影响最大的是其撰写的具有浓厚斯多葛思想的《沉思录》一书，并因此被学术界称为哲学家皇帝。——译注

更大的安全感。如果皇帝打破了这种隐晦的约定，那他本人就会陷入危险。68年导致尼禄被赶下台的广泛阴谋，源自宫廷中领导权的变化以及贵族中利用接近皇帝来攻击对手的做法。96年造成图密善被谋杀的阴谋发生在宫廷中，这次也源自同样的原因，即人们感到图密善难以预料，由此导致了一系列阴谋，最终得以成功。除了卡里古拉被杀后元老院在短时间内发出过某种抱怨外，任何时候都不曾提出过下述建议：罗马不应当要皇帝。作为安全的保障，这个官职是重要的，而且不仅仅是对元老院如此，那些通过为皇帝提供个人服务谋取仕途的人，在确保相安无事方面，与元老们有着同样的兴趣。在克劳狄——他对被释奴隶的依赖深遭痛恨——的统治后，为皇帝服务的主要官员倾向于从骑士阶层中选拔。骑士也是贵族，在他们和元老之间，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利益区别。

好皇帝是这样一个人，即他可以平衡他周围的不同利益集团并构建共识。元老院的能力是在皇帝死后就他的所作所为进行表决，提醒皇帝应扮演的角色，提醒新皇帝应当怎样做。一个成功地保持秩序的皇帝被神化；一个被谋杀的皇帝则被作为灾难以警示未来：他是一个没有扮演好自己角色的人，未来的皇帝们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下场。



阿格里披娜（Agrippina）携日耳曼尼库斯的骨灰在布隆底西登陆。本杰明·威斯特爵士（Sir Benjamin West）1768年画。日耳曼尼库斯是罗马最伟大的军人之一，被他的叔父提比略过继为子。他死于叙利亚，可能是根据提比略的命令被毒死的，因为他的权力威胁到皇帝的地位。他与阿格里披娜所生的孩子中包括卡里古拉。

变动中的贵族

也许是帝国时代元老院最有趣的现象就是它和共和国时代的元老院——它一代复一代地由相对较少的几个家族支配，且都以意大利中部为基地——不同，它的成员不断在变动。虽然朱利亚－克劳狄家族本身深深地卷人到共和国后期的王朝政治中，将一个小的贵族家族——朱利亚家族和最伟大的家族之一克劳狄家族联合在一起，但他们掌权的年代却对那些古老的家族进行了扫荡。加尔巴是那些家庭曾经在共和国时代占据显赫地位，后代当上皇帝的家族中的最后一个成员。来自意大利自治市，有着悠久的意大利定居者历史的行省，最明显的是西班牙的家族，现在开始走上前台。他们和那些来自东方希腊最富有的家族联合起来。到2世纪中叶，元老院成员中大约仅有一半来自意大利，尽管从法律上说，来自行省的元老需要在意大利拥有地产。

我们虽然无法像追溯元老院的变化那样来追溯骑士阶层的变化，但它的成员显然越来越快地具有了世界色彩。被授予公民权的杰出行省人士家庭，根据界定，几乎就属于骑士等级。甚至土耳其东南部一个叫欧诺安达的小城镇也能在2世纪早期因有一个骑士家庭而自夸。由于骑士阶层官僚的增长，帝国政府很快就体现出整个帝国的人口状况了。有些重要地区，例如叙利亚，产生的元老很少，但好像产生过大量骑士，原因也许是因为公民权在这些地方扩展的时间晚些，当时元老阶层较骑士的优势已不那么明显了。

帝国贵族向圈外人的开放，把罗马帝国与其他帝国区别开来。通过维护帝国的秩序，行省中的重要家族获得了重大利益，一个行省人甚至可能变成皇帝。例如，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①]乃北非布匿人的后代，说着一口带布匿味的拉丁语。他与叙利亚城市埃麦沙的一个妇女结婚，他建立的王朝的每个成员都是与帝国闪米特部分缔结婚姻的成果。从268年克劳狄二世（Claudius II）[②]登基到提奥多西乌斯一世（Theodosius I）[③]379年登基——后者来自西班牙，几乎每个皇帝的祖籍都在巴尔干而不是意大利。这种开放性所造成的结果之一，是少有反对罗马统治的“民族”起义。2世纪时仅有两次，两次都与中东地区的犹太人有关。因为经济和文化的原因，犹太人不愿被吸收到希腊－罗马文化范式中。3世纪，因为军事上的失败，帝国政府威信受到严重挑战，出现了更多的起义。但与其说它们是“民族”起义，不如说是对帝国政府无能的抗议。乍一看，有两次起义好像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一次是叙利亚沙漠中伟大的贸易城市帕尔米拉于3世纪70年代发动的起义，一次是3世纪80年代阿曼都斯（Amandus）[④]在高卢的起义，但更细致的考察表明，它们与帝国官僚内部关于地位的争吵有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皇帝权威的内部威胁来自帝国体系本身。

不稳定的根源

1世纪出现的皇帝和贵族间的平衡，在3世纪初崩溃了。要理解崩溃发生的原因，重要的是理解占统治地位的贵族要对与皇帝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负责。只要皇帝扮演好他的角色，贵族们愿意为了良好的制度而放弃自己的野心。当皇帝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时，贵族集团的另一些成员就会通过自己做皇帝，来让这个体制运作。

公元68年，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所以成为皇帝，与其说是因为他是那场把尼禄赶下台的阴谋的领袖，不如说是因为上日耳曼行省的总督鲁基乌斯·维吉尼乌斯·卢弗斯（Lucius Verginius Rufus）掌控着一支大得多的军队，他正想获得进军罗马的通行证。我们并不清楚卢弗斯这样做的原因，但很可能同

① 塞维鲁（146－211年），罗马皇帝，塞维鲁王朝的开创者。他利用康茂德被杀后出现的混乱形势，在军队支持下于193年取得帝位。登基后采取依靠军队进行统治的政策，据说“让士兵发财，其他人可以不管”的“名言”就出自他之口，因此他的统治被视为罗马从元首制转向公开的军事独裁君主制的标志。——译注

② 克劳狄二世（214－270年），罗马皇帝，因曾打败哥特人而被称为哥特库斯。268年因军队拥戴登上帝位，先将阿勒曼尼人赶出意大利，旋打败哥特人，在出征汪达尔人时染病身亡。——译注

③ 提奥多西乌斯一世（347－395年），又称狄奥多西一世，罗马皇帝。先为东罗马皇帝，392年后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期间压制基督教异端派别，将尼西亚会议信条定为正统，而且将基督教确定为罗马国教。他死后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译注

④ 事迹不详。——译注

这样的事实有关：加尔巴年事已高，没有子女，因此对他来说，卢弗斯与他建立联盟更加容易。他的期望是加尔巴会过继贵族中的某一个其他成员为继承人，来建立这个联盟。加尔巴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个原因：他没有给支持者认为应当得到的奖励，从而得罪了在罗马的支持者；他还得罪了近卫军，因为他没有支付给近卫军认为他们已经挣来的大笔礼物，而正是他们的背叛，把尼禄赶下了皇位；他也没有奖赏莱茵军团的那些士兵。由于没有履行忠诚于尼禄的誓言，他们认为自己也应得到特殊的待遇。近卫军支持马尔库斯·萨尔维乌斯·奥托（Marcus Salvius Otho）在69年1月谋杀了加尔巴。此人的名气，系因他是尼禄第二任妻子的奸夫，同时还教会了尼禄如何在脚上撒香水找乐。表面看来，奥托的记录也许不够杰出，但他了解包括近卫军在内的宫廷政治的内幕。即使近卫军没有杀加尔巴，他的统治也不大可能延续得更长久，因为下日耳曼的总督奥卢斯·维特里乌斯（Aulus Vitellius）已经起义反抗。

塔西陀论政治权力的秘密

尼禄的死亡，在最初的高兴之后，不仅在城内的元老院成员、全体人民和近卫军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而且在军团和将军们中也有不同反应。帝国隐藏的秘密已经大白：一个皇帝可能在罗马之外的某个地方产生。

塔西陀：《历史》，第1卷第4章（大卫·波特英译）

维特里乌斯所以能于69年4月在意大利北部的克雷莫那打败奥托，是因为他拥有一支更好的军队。但这样一来，他得罪了巴尔干的军团，后者已经和他的竞争者站到一起了。他没有时间来修补这种关系，因为提图斯·弗拉维乌斯·韦斯帕西阿努斯（韦伯芗）希望获得皇位，而且已经于7月使自己在恺撒里亚被宣布为皇帝了。他指挥着一支负责镇压犹太起义者的军队，而这场起义，在尼禄统治下已经爆发。巴尔干军团支持了韦伯芗的事业。10月，维特里乌斯被击败，这一次又是在克雷莫那。韦伯芗的巴尔干同盟者于12月占领了罗马，韦伯芗本人于70年初到达罗马城。

历史学家塔西陀注意到，韦伯芗的成功泄露了这样一个秘密：如果拥有必要的军事支持，皇帝可以在罗马以外产生。当他写下这句话时，他心里所想的，可能是更接近他本人时代的事件，而非韦伯芗的暴动，因为他也许知道，图拉真所以在97年被涅尔瓦过继为子，恰恰是因为他是一个成功的军人，因为他当时正指挥着一支大军。很明显涅尔瓦认为（而且他是正确的），如果近卫军遇到一支强大的行省军队的威胁，其干预继承的可能性要小些。

皇帝和军队

69年和97年的事件表明，将罗马军队视为单一的统一军队是错误的。事实上，1至2世纪，罗马军队正逐渐变成各种地方力量的集合。虽然军官们快速地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但士兵在很长时间里仍然和他们最初入伍的军队在一起。他们的服役周期被确定为16年。如果他们能活到服役期满，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他们就可能被征召到军队中。退役后留在他们曾经服役的地方是相当经常的事情。这些士兵并不总是与他们的军官有共同的利益，而与他们所驻扎的地区的人民，几乎从来没有共同利益。每个单位都有他们自己的传统。此外，到2世纪末，军团的基本战略在300年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表明军队已经不再是帝国扩张的工具，毋宁说它是对内镇压的工具。

有迹象表明，到2世纪末，军队正逐渐失去它控制边界的能力。为恢复多瑙河边界的秩序，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花了十年时间，到他死时，该任务尚未完成。长期的战争，开始让统治阶级感受到压力，因为其中的某些人，常常是那些上层贵族圈子外，但已经上升到显赫地位的人，在很长时间里担任大规模军队的指挥官。一个近卫军长官威胁要杀死一个老资格的元老，后者因为某个法律上的问题来找马尔库斯；马尔库斯本人不得不亲自干预，以保护他最优秀的一个将军，一个被释奴隶的儿子，使其免遭其他将军们的阴谋伤害。这种形势明显要求他动用所有政治技巧将各种不同派别笼络到一起。他死后，政府就陷入了混乱。当马尔库斯死时，他的儿子康茂德还很年轻，他把日常管理交给自己的一帮宠臣，其中没有一个人来自传统的统治阶级。当康茂德的行为变得如此古怪，以至其宫廷感到无法再容忍时，他就被刺杀了。

康茂德被谋杀后，出现了混乱，帝国体系内不同的集团都努力为自己争夺权力。近卫军谋杀了康茂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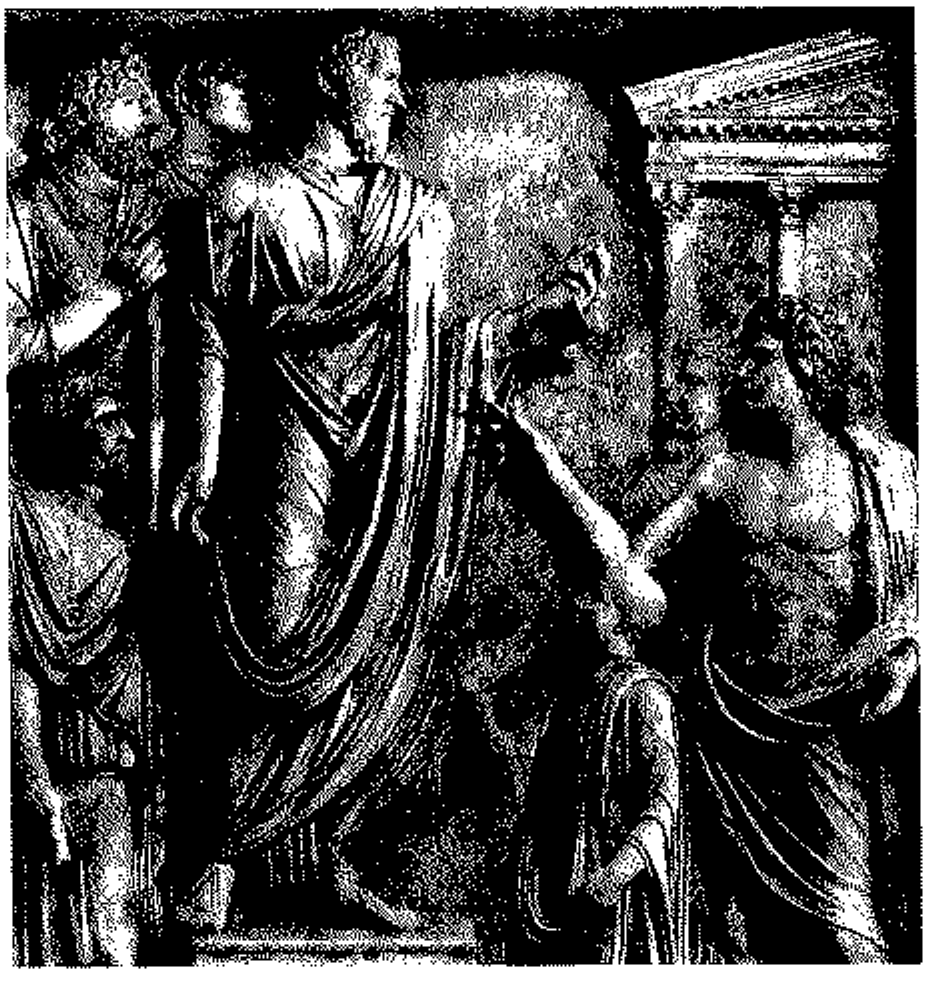
不幸的瓦列里安（Valerian）的儿子，皇帝加里埃努斯（253～268年在位）的半身像。像绝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3世纪的“军人皇帝”一样，对于亲率军队上阵，他并不畏缩。当军团决定谁将取得皇帝的位置时——2世纪90年代，塞维鲁已经确立了这一趋势，一个皇帝是不可能离他的士兵太远的。

继承者赫尔维乌斯·佩提那克斯，原因是他好像对他们的利益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怀。当近卫军宣布狄狄乌斯·朱利安努斯（Didius Julianus）——一个在公开拍卖中许诺给予近卫军最高数额金钱的元老——为皇帝时，行省的军队就支持他们自己的将军为皇帝，以取代朱利安努斯。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还能把巴尔干的军团联合在他的领导之下，所以能够利用他所处的帝国中心的地位，在193年至197年的一系列内战中为自己夺取了权力。在他的儿子卡拉卡拉（Caracalla）于217年被谋杀后，另一场内战爆发了，宫廷中不同派别相互争斗。争斗很快以支持塞维鲁远亲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安托尼努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一派得以解决，他们反对支持马尔库斯·奥佩利乌斯·马克瑞努斯（Marcus Opellius Macrinus）的一派。在卡拉卡拉被刺杀后，马克瑞努斯已经被军队宣布为皇帝。

战场上的皇帝

在这些年里，军队作为一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现在舞台上，因此要求皇帝对统治方式进行重要的变革。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公元初的两个世纪里很少有皇帝亲临战场，但在3世纪，对一个皇帝来说，在重要的远征中亲自指挥军队变成绝对必须的事情。人们发现，皇帝现在在战斗中积极地发挥着作用，类似德基乌斯（Decius）在战场上阵亡、加里埃努斯（Gallienus）[①]受伤的记载，表明他们对军事行动的参与不仅是要树立形象。元老地位不再是做皇帝的必要条件，元老们也很少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了。

这一发展强化了宫廷官僚以及军队的权力，导致我们在305年5月1日看到的情况的出现。与该发展相适应，罗马本身也不再是政府的中心。虽然旧都城总是保持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和象征意义，但政府现在是在皇帝们确定为自己基地的地方有效地运转着。新帝国的首都建立在更接近边界的各个城市中，建立在诸如特里尔、米兰、



2世纪的一块石浮雕，表现皇帝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中央站立者）接受罗马人民崇拜的情景。图中的人民是由一个剃光头的孩子、一位老人以及站在他们中间的一个半裸的人物——一个人格化的“天才”、一种民族化的确定象征——来代表的。

① 德基乌斯，249年至251年的罗马皇帝，出生于潘诺尼亚行省，被军队拥立为皇帝，在阻击日耳曼部落的入侵中战死。加里埃努斯，253年至268年为罗马皇帝，曾亲自率领军队阻击日耳曼部落和镇压反叛者，后被其军官谋杀。——译注

尼科米底亚等地，最后，是在君士坦丁堡。

皇帝与帝国

当法利赛派的成员想让犹太人的宗教先知拿撒勒的耶稣（Jesus of Nazareth）难堪时，他们要求他宣布他们是否应当支付罗马的税收（在1世纪的加利利，这是件不受欢迎的事情）。他以向他们提出下述问题来回答：他们每天使用的钱币上，铸的是谁的头像。当他们答称，那是恺撒的头像时，他告诉他们，他们应当让恺撒的归于恺撒。虽然他的教会将改变古代世界的思想结构，耶稣本人却从来没有见过皇帝，而且在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前，他好像除了帝国政府加于他的赋税外，和它几乎没有任何瓜葛。对绝大多数臣民而言，皇帝离他们的距离，就像皇帝离耶稣一样远。可是，对于皇帝是什么样子，他们还是有某些概念，因为他的头像被铸在他们使用的铸币上。当他们走上由罗马士兵修建的道路时，他们会每隔一英里看到一个里程碑，碑上会告诉他们与道路起点的距离，而皇帝对修建道路负责。通过这些细小但重要的方式，皇帝出现在各个地区。

> **卡西乌斯·狄奥论义务**
>
> 他（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非常勤勉，努力履行与其职务有关的各种义务。他从来不说、不写，或者做任何看来仅具次等重要性的事情，但有时他会把一整天放在小问题上，考虑对一个皇帝来说，在匆忙中做任何事情是否正当的问题。
>
>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71章第6节（大卫·波特英译）

当他们看着皇帝时，人民看到的，经常是一个高度风格化的图景。很可能的是，铸币上的形象，与皇帝本人并不太像。在铸币上，奥古斯都从来没有老过；提比略本来秃顶，铸币上的他却有茂密的头发；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和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非常相像（他将自己过继给了该家族）。皇帝们的头衔反映的是他们宣称取得的对外敌的胜利，直到3世纪，那些胜利都是由他们的将军取得的，而且常是防御战而并非进攻取得胜利的结果。可是，皇帝又不仅仅是铸币上的一张脸，或者是一连串的称号，他还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从理论上说，是保护人民免遭官员压迫的根源；他还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存环境。皇帝在其臣民生活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许多方面是根据那些臣民的愿望确定的。

关于帝国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神话，就是谁都可以接近皇帝。有一个故事说，当哈德良进城时，一个妇女走上前去向他提出请求，他告诉她走开，她则在他后面喊道，"那就不要当国王。"他停了下来，允许她把想说的话说完。虽然严格地说，这个故事未必真实，因为在整个古典时代，关于其他统治者也有类似的故事，但它仍集中地体现了统治者作为保护者的重要性。皇帝确实要收到来自各色人等的大量请求，人们期待他能听取这些请求。即使大量请求是由秘书们处理的，他本人可能从来没有读到过，但那些来自宫廷的反应，都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帮助那些受到压迫的人。有些来自乡村地区的请求在铭文上保存下来，说的是受到皇帝官员们暴虐行为侵犯的村民得以伸冤。这些请求是如此雷同，以至看起来像是人民可以接触到文件，从而为他们提供了请求应取样式的样板。

从个人扩大到共同体，请求及其做出反应的制度创造了一个尺度。基于这个尺度，城市可以与其邻居相互竞争，而且给皇帝提供了影响其臣民生活的一种途径。城市会给皇帝写信，在重要的纪念日里向他表示祝贺；每年都有城市的使者被派到罗马，在那里他们会看到围绕着世界之主的所有排场。他们会看到他操办的竞技会，会见到他在圆形竞技场或者斗兽场中倾听集会的人民的声音——在那些地方，如一位皇帝顾问所说，是暴民在统治。他们会看到在其他地方难以想象的表演，并期望在家乡用自己的方式模仿。皇帝对某些娱乐形式的兴趣会引起其他地方同样的兴趣，被称为"pantomime"——一种根据神话，由一个演员在众多歌唱演员和音响伴奏下表演的舞蹈，最初也许起源于东方的希腊，但因为罗马皇帝的热爱而获得了突出地位。角斗在帝国范围内传播开来。它是一种庆祝帝国得以伟大的诸种美德的活动，行省中一年一度的庆祝皇帝的活动——所谓的皇帝崇拜活动——与角斗的联系，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皇帝崇拜

“皇帝崇拜”是一个近代术语，用来描述无数地方的节庆，它们早些时候以赞颂希腊化君主们的活动为样板，后来是以罗马官员赞颂奥古斯都的活动为样板。奥古斯都时代，这些地方性节庆被改造成双重的表达体系。每个行省都会有一次集会，会在一次年度节日中赞美皇帝，同时单个的城市会与之竞争，以使他们自己的节日得到皇帝的承认，而显示它们的重要性，因为皇帝可能通过允许他们以特殊方式赞颂皇帝来奖赏城市或者个人。在这些庆祝活动上，人民会听到赞颂皇帝的演说，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他是谁、正在做什么事情。这些庆祝活动是受到严密控制的宣传活动，但它们对于将皇帝塑造成一个善良统治者的形象会有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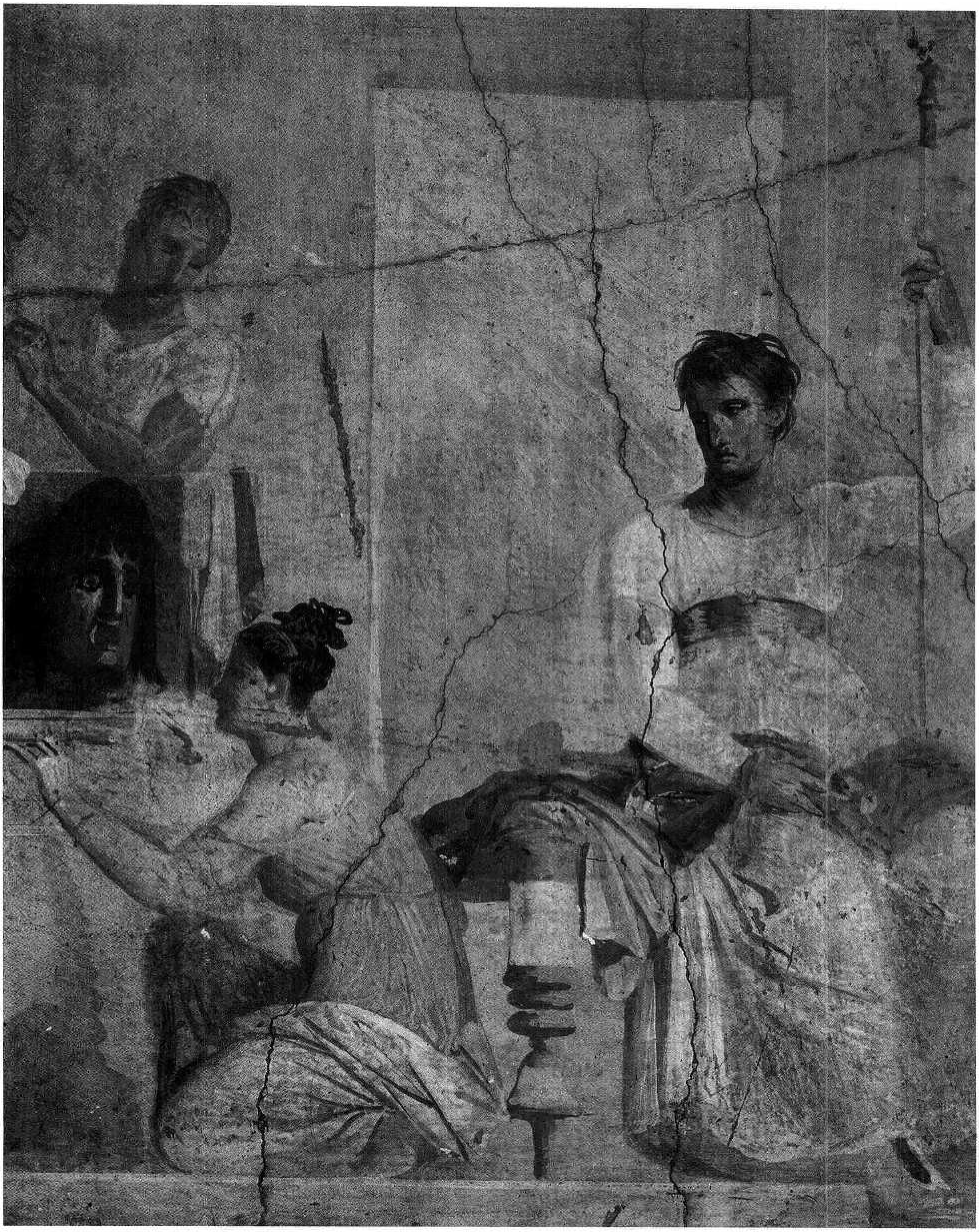
在决定谁应当赞美他和怎样赞美他时，皇帝能够把自己的趣味强加于人。例如，我们知道，哈德良青睐那种带希腊文化色彩的赞美活动，因此一个来自欧诺安达，名叫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的人，通过请求哈德良允许他在此类节庆上这样做，创建了一个崇敬他的节日。当哈德良完成了奥林匹亚的宙斯（Zeus）[①]大庙的工程时——该工程数百年前已由僭主庇西特拉图开始——他允许希腊人创建一个“希腊人的联盟”的节日，每年集会，庆祝对宙斯的崇拜，而加入同盟的资格取决于一个城市能否为自己创建一个适当的希腊谱系。借助于这样做，哈德良不仅使他本人的价值观得到推广，而且还促进了那些希望其遗产得到承认的小亚细亚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当他的宠臣安提诺斯（Antinous）死于埃及时，那些城市竞相纪念这个男童，以表明他们对这个制度的忠诚得到了承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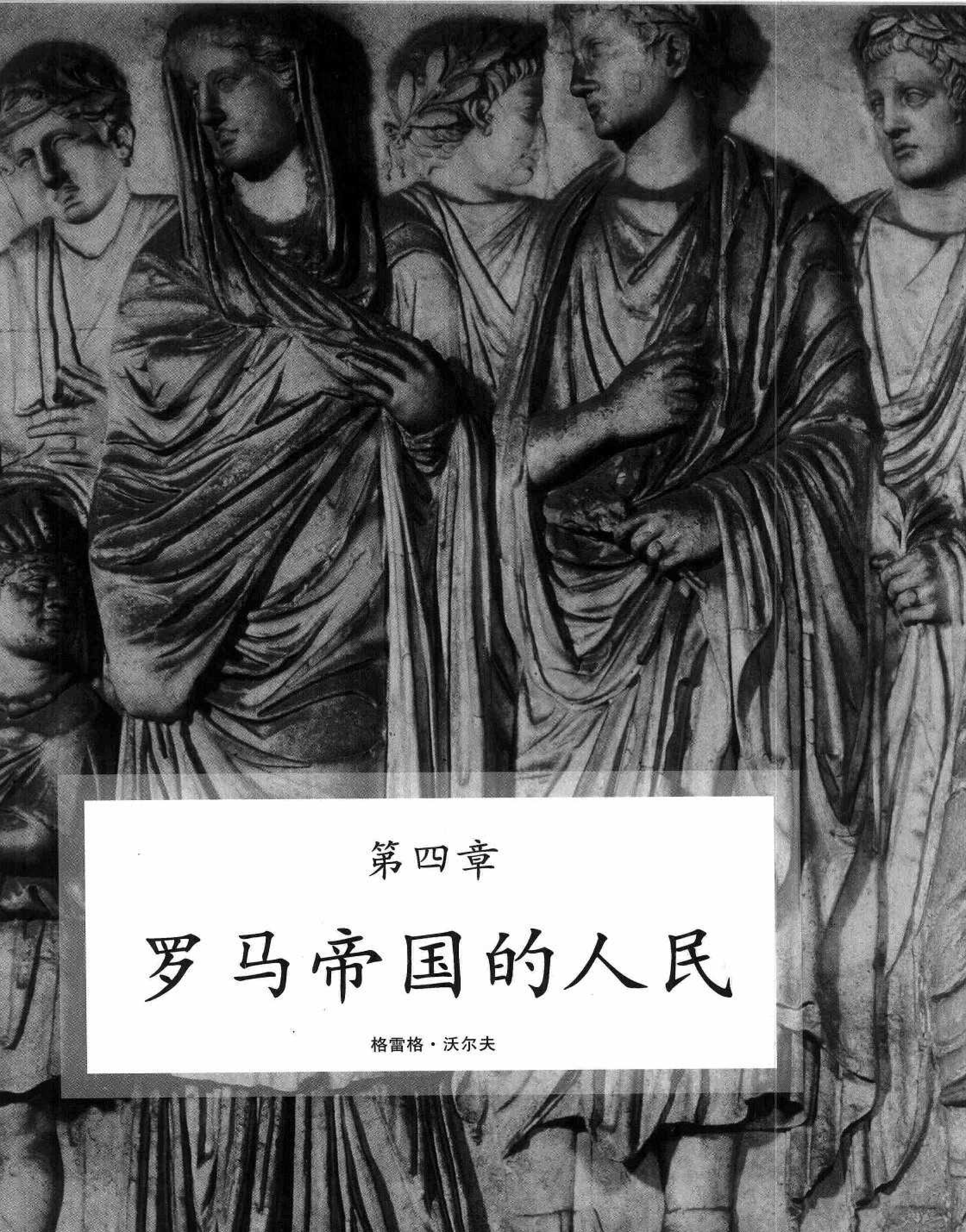
在一个文化生活由城市支配的世界中，皇帝通过赐予那些从村庄发展起来的城市以公民地位来塑造城市的景观。通过给予新的特权，他把城市提升到更高的地位，或者利用同样的方式，降低那些惹他不高兴的地方的地位。随着时间的不同，这些赐予也不同，因为旧形式已经失去其意义，或者说获得了新的意义，但请求和做出反应的过程还是那一套。皇帝们常常意识到，通过中央的命令，他们能够做成的事情很少，如果他们要进行有效的统治，就需要他们的臣民投身于该制度中。总的来说，他们的臣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被给予了决定参与的方式，被允许把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政府的愿望一致起来。

只要中央政府能保持和平和安全，帝国的体系就能发挥作用。不同的意见总是存在的，不满的原因难以穷尽，中心的不稳定可能导致边疆的危机，从内在的逻辑来说，这种管理体系是保守的。这就是说，在最初4个世纪中，通过对请求做出反应，皇帝们会确保最重要的思想转型的实现。这个皇帝就是君士坦丁（Constantine）[②]，正是因为他的缘故，基督教从罗马社会的边缘走向了核心。它在边缘得以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提出了不同于古典城市的价值体系，成为了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宗教，而且具有悖论色彩的是，成了一种将保存古典时代遗产的制度。

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罗马壁画残片，属公元1世纪。该场景刻画的是希腊戏剧表演中的演员，而且人们相信它是对公元前4世纪希腊原作的模仿。戏剧以及用戏剧场景装饰房屋的做法，是联系希腊与罗马的文化，使其没有中断的众多潮流之一。

① 希腊主神，天父，掌管霹电。——译注
② 君士坦丁（约280～337年），即君士坦丁一世，又称君士坦丁大帝，罗马皇帝。继戴克里先之后，他再度把罗马帝国置于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他发布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乃罗马帝国从古典转向基督教文化的重要人物。





第四章

罗马帝国的人民

格雷格·沃尔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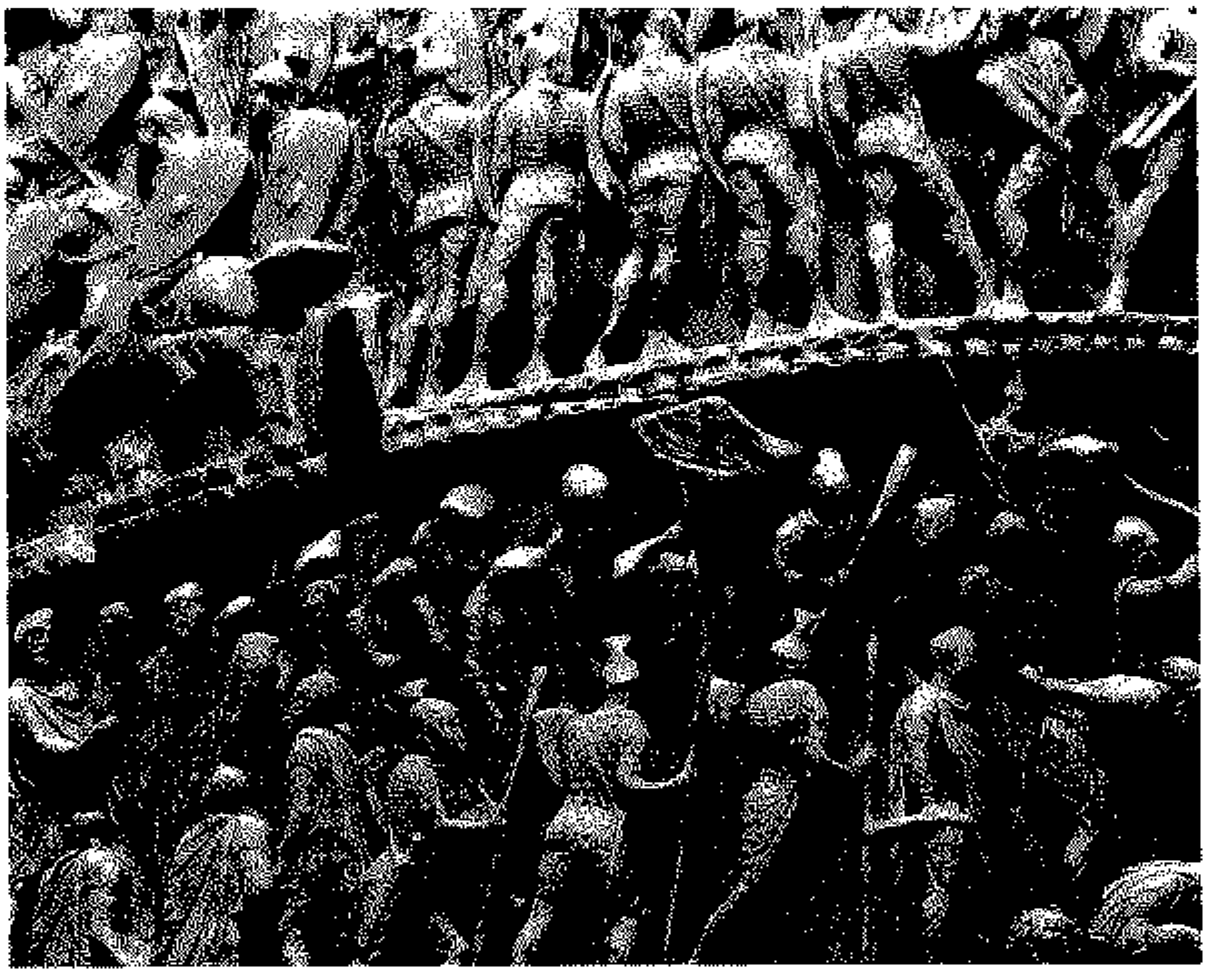
罗马帝国的人民

自古典时代以来，史学家们一直奇怪，到底是什么把一个城市国家罗马提升到地中海世界几百个国家之上，成为一个帝制大国。维吉尔和老普林尼①认为，罗马人享有天定命运。有些罗马人认为，他们自己是特选民族。李维和恺撒将胜利归于个别罗马人的美德，就好像撒路斯特和奥古斯都将恶行的传播作为灾难的根源一样。波利比乌斯论证说，罗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它们所鼓励的观念和行为，为罗马相对于希腊化诸帝国的优势提供了最好的解释。对许多现代史学家来说，这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说明。

罗马制度的重要性

现代作者有时求助于意大利在地中海世界的地理中心论，有时宣称罗马人对战争具有罕见的狂热。但罗马并不是位据地中海中部的惟一力量，迦太基和马其顿，更不用说意大利半岛上的其他城市国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都符合这个条件。同样，许多，也许是绝大多数城邦国家，同样使用民兵，而且用仪式装饰战争，期待它们的政治领袖也是优秀的将军，因此也都是军国主义的。当罗马共和国于公元前3世纪出现在历史中，表现出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时，几乎没有什么让人惊奇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如果它不是军国主义的，倒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在人们提出的各种解释中，那些眼光盯住罗马制度的似乎看起来最有道理。是什么给罗马社会提供了把军事胜利转变成永久性的统治，并且在享受和利用扩张带来的好处的同时，把其中的某些部分再度转变成持续的扩张和稳定的状态呢？某些近代的类比也许会对此提供帮助。英国的帝国主义所以变成可能并得到强化，就是因为在国内发展起来的制度被用于相当不同的目的。东印度公司之类的商业活动是根据现存法律和金融手段创造出来的，却成了英国统治得以在印度建立的原因。同样，英国社会以阶级为基础的特性，为通过加强土著的地位等级和尊严的差别来控制其他社会提供了基础。制度还有助于解释帝国存在的弱点。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最终削弱了欧洲人的帝国，因为它给臣服的民族提供了自治和自决的样板。同样，希腊化诸帝国对希腊人特征的强调，限制了非希腊人臣民充分融入希腊人的可能。甚至在古代罗马，有一个作家就在比较了雅典和罗马的帝国主义后论证说，罗马在公民权问题上的慷慨，可以和雅典在这个问题上的独占相媲美，它解释了罗马帝国超凡的力量、规模和持久性。



罗马图拉真记功柱的一个局部。这个特殊部分刻画的是罗马军队看守着新抓获的俘虏的情形。作为奴隶，俘虏成为一种珍贵的财富。

① 普林尼（23－79年），罗马作家和学者，其主要著作《自然史》汇集了大量有关古代科学的资料。——译注

到波狄卡（Boudicca）公元61年发动起义时，不列颠南部已经被划分成九个政区，每个政区都由一个地区性的“首府”城市管辖。这些罗马政区根据部落划分的性质得到了绝大多数城市完整名称的证明。例如，里塞斯特是拉塔·科里塔努茹姆（科里塔尼人的拉塔），科伦塞斯特是科瑞尼乌姆·道本诺努姆（道本尼人的科瑞尼乌姆），温切斯特是文塔·贝耳加努姆（贝耳加人的文塔）。



自古典时代以来，历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性。波利比乌斯当时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有关罗马在意大利成功扩张的另一个解释，是强调罗马控制其同盟者的制度化方式。被打败的敌人一般被迫和罗马订立不平等的盟约，这是一种不强加贡金，但需要他们出军队帮助罗马打仗的盟约。因此，战争成为罗马继续享受以前的胜利果实的主要方式。过去的胜利成为未来征服的动力，诸如此类。

本章无意用这些话语对罗马的成功提供综合性的解释，因为那样做，需要涉及政治制度、军事组织、罗马法、奴隶制以及许多其他的内容。相反，本章的焦点是一系列在罗马帝国中发挥新作用的国内制度方面。军事制度将在第十三章中讨论，第六章的许多内容也与这一讨论有关。本章的设计需要和上述两章合并阅读。

微观罗马

让我们从大约二十年前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一座小山边开始。当时，金属探测爱好者发现了一批不平常的青铜文书。在其中的六块铜板上，刻写着以前不为人所知的罗马城市弗拉维伊尼塔努姆自治市（为简便记忆，下称伊尼）一半以上的宪法条文。文书的定年正好是1世纪末，因为其中包括一封图密善的信，它附在原来的宪法之后。此类铭文的残片在西班牙其他地区也有发现，每个铭文所提到的城市都不同，但到目前为止，这份抄件是最完整的。如果我们把“Lex Irnitana”（伊尼的法律）与某些其他残片结合起来，就可能重建大约三分之二的共同的宪法条文，而所有法律都是以这些条文为基础的。不同抄本只是在细节上有出入，例如城市的名称、担任官职所需要的准确费用或者元老院（the curia）中市政元老（decuriones）的数量、法律规定在一年一度的节日中所崇拜的主要神灵的名字等。所有这些法律的来源，似乎都是老普林尼谈到的韦伯芗对西班牙共同体的赐予，该赐予允许它们作为拉丁自治市建立起来。无论何种原因，伊尼人为得到自己的抄本还费了一些时间，但他们显然为得到它而满意。青铜文书的尺寸暗示，它们是放在某些公共建筑，可能是神庙上展出的，任何游客或者公民都不会怀疑，他们已经到了伊尼。

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在提比略时代写下的话：

阿劳布鲁吉人过去依靠他们众多的人口经常发动战争，可现在他们耕种着阿尔卑斯山的平原和山谷，有些人生活在村庄里，但最重要的人物住在维也纳。尽管它过去是一个村庄，但他们已经把它变成了其人民的都城。

这是斯特拉波对一个高卢部落（在今萨伏依地区）转变成城市国家的描述。

皇帝的罗马通过城市国家网络统治着罗马以及意大利。每个行省都被划分成领土单位，每个单位都有一个单一的城市中心。以此为起点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许多为罗马共和国控制的地区，例如西西里、希腊和布匿人的非洲，事实上已经由分散的城市国家占据了。其他地区则由国王控制，有些国王被正式承认为“罗马人民的朋友与同盟者”。这些依附性质的国王，在某些地区一直残存到1世纪中期，罗马从未放弃通过支持他们的候选人和控制人质来影响邻国政府的做法，但这些王国从内在逻辑上说是不稳定的。偶尔会有罗马人的朋友变成敌人的情况，如共和国后期反对努米底亚的朱古达和本都的米特拉达弟的战争。

打败米特拉达弟之后，庞培肢解了本都王国，代之以根据现存定居点为基础的城市国家。作为独裁官，恺撒决定让小亚细亚的城市征收自己的税收则另有意图。罗马曾通过发展与实施公共建设工程同样的制度为军队提供给养，从总体上减轻了国家的这个行政负担，这就是共和制罗马把税收交由承包人征收，这些人必须是富人，是罗马公民，但不是元老。波利比乌斯已经谈到罗马有许多人——他的意思是富人——卷入了公共承包活动，但这套在重新铺设阿庇亚大道中发挥过作用的制度，当应用于收税时，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签约人腐败，寻求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的持续发展，引起了一系列毁灭性的起义。恺撒允许城市征收它们自己欠税的解决方案，成为奥古斯都组织西部和北部行省的样板。部落被作为国家对待，并被赋予像东部城市那样广泛的职责。很快，在每个部落的领土上，兴起了小型罗马风格的城市。

向公民模式的转化采取了不同的途径。在本都，根据城市划分领土，但是在高卢，则是根据领土划分城市。同时，被称为诺姆的埃及古老的行政管理区划、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神庙城市也被改造成城市国家。无论采取哪种途径，这种城市加土地、由许多小单位组成的结构，在帝国各地被复制。对于帝国的结构来说，它比行省更加重要。

无论它们的传统与起源如何，那些城市国家都由从土地所有者阶层中选举产生的议事会进行统治。民主政治和头人统治一样逐渐消失。即使到奥古斯都时代，还不曾有计划，也很少有行政或者财政上的协同，但是很快，罗马帝国政府就像是一个有产阶层精英公民的联盟了。地方精英中最富有的公民很快开始在其他城市获得土地，把他们的女儿嫁给邻城最富有的成员，先是追求罗马公民权，然后是骑士身份，在某些情况下，上升到元老地位。一个帝国贵族集团开始兴起。它以行省精英为基础，来自每个城市最富有的家庭。对于许多人来说，社会流动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但它却是那种把帝国联合在一起的粘合剂的一部分。只有在最蛮荒的地区才进行直接的军事统治，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都是临时的。分队中的森都里亚成了部落大会降生的“助产士”；在不列颠和莱茵地区，要塞最终都被城镇所取代。西部各种各样的共同体——有些古老而且已经城市化，多数则没有——都被改造成了伊尼那样的自治市。由富人统治的城市仿效罗马，而城市却在行省中。

根据财富划分等级的社会

罗马人利用他们熟悉的制度来巩固他们的权力，也许并不让人惊奇，因为绝大多数帝国都如此。后期共和国时代的罗马是根据明确的分层原则组织的。每隔五年，罗马会选举两名监察官（censors），他们的工作包括将国家合同出售给那些有足够能力履行合同的、非元老阶层的富人，而且对全体公民进行评议。你拥有的财产就决定了你在其中战斗和投票的森都里亚，其方式的复杂，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叙述过了。地位最高的是“equites”（常被蹩脚地译成骑士）。那些能够进入元老院的官职仅仅对“equites”开放，失去财产，就像道德上有污点一样，乃是被逐出元老院的可靠方法之一。西塞罗曾经用“boni”这个词来表示那些道德高尚而且拥有财产的人。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在他的哲学作品中，特别是《论义务》和《论法律》中，



和平祭坛（Ara Pacis）浮雕带的一个细节。祭坛建于马尔斯广场，以纪念奥古斯都在高卢和西班牙的胜利。该祭坛三面的浮雕表现的是皇帝和他的家庭正和官员、随从、祭司带着用于牺牲的俘虏一起游行献祭的情景。该画面将皇帝的家庭置于罗马宗教中心的地位，为奥古斯都取得了传统崇拜的权力和声望。

西塞罗为此提供了理性的论证：只有富人能够抗拒贿赂，或者具有使得他们成为可靠的、能干领袖的道德与教养，尽管这种说法在我们看来既古怪，又不让人愉快。

由于同样的原因，共和国时代罗马重要的祭司职位由元老独占。像官职一样，祭司绝大多数也按照团体来组织，有大祭司、占卜官、十人委员会以及诸如此类的团体。也许它的目的之一是要防止个人滥用权力。罗马宪法法律的许多基本理由，好像是要限制贵族家庭之间的争斗，同时还要确保贵族对相对贫穷的罗马人的集体优势。但这些祭司绝大多数是终身职，这些团体本身也要和那些取代已去世者的新成员合作。犹如祭司从中产生的元老院一样，年龄、经验和利益支配着祭司阶层。贵族仍然有权担任其中的几个祭司职位，但

只有很少的人属于贵族家庭。到公元前2世纪（即使不是更早的话），绝大多数罗马贵族都认为财富比门第重要。等级冲突的遗产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富豪政治。

宪法自然是斗争的核心。公元前2世纪末，那些提高保民官权力，而且试图利用人民大会和骑士来对抗元老院及其官员的同样一批政治家们，试图引入祭司的选举机制。公元前63年，恺撒通过堂皇的贿赂成为了大祭司长。但所有这些变化——那些试图在富人赢得政治锦标的竞赛中，让人民有更多发言权，而不是更多地向人民开放比赛的做法——无一存在到共和国以后。奥古斯都提高了元老院的尊严，将元老阶层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有特殊的服装，在剧院中有特殊的座位——分离出来，同时对元老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财产标准，所以，让财富与地位的差别更加显著。元老们不再受由骑士组成的法庭审判。当罗马贵族被作为总督、军团和舰队指挥官、税收和皇帝财产监管人被派往行省时，元老们得到最有声望的职位，骑士得到的则是二等的行省和职责。像监察官过去对全体公民所做的一样，奥古斯都对上层阶级做过同样的评议。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分配了绝大多数官职和祭司职位。提比略时代，选举转移到了元老院。元首制时代，罗马的财富分层深深扎下了根，最后骑士充任的官员也出现了等级，他们的称号按照薪金水平确定。那种半心半意地使这些等级变成世袭的企图很快陷入失败，因为皇帝意识到，他们将被迫资助那些未来的贫穷元老。无论如何，更重要的事情，是给意大利和行省那些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提供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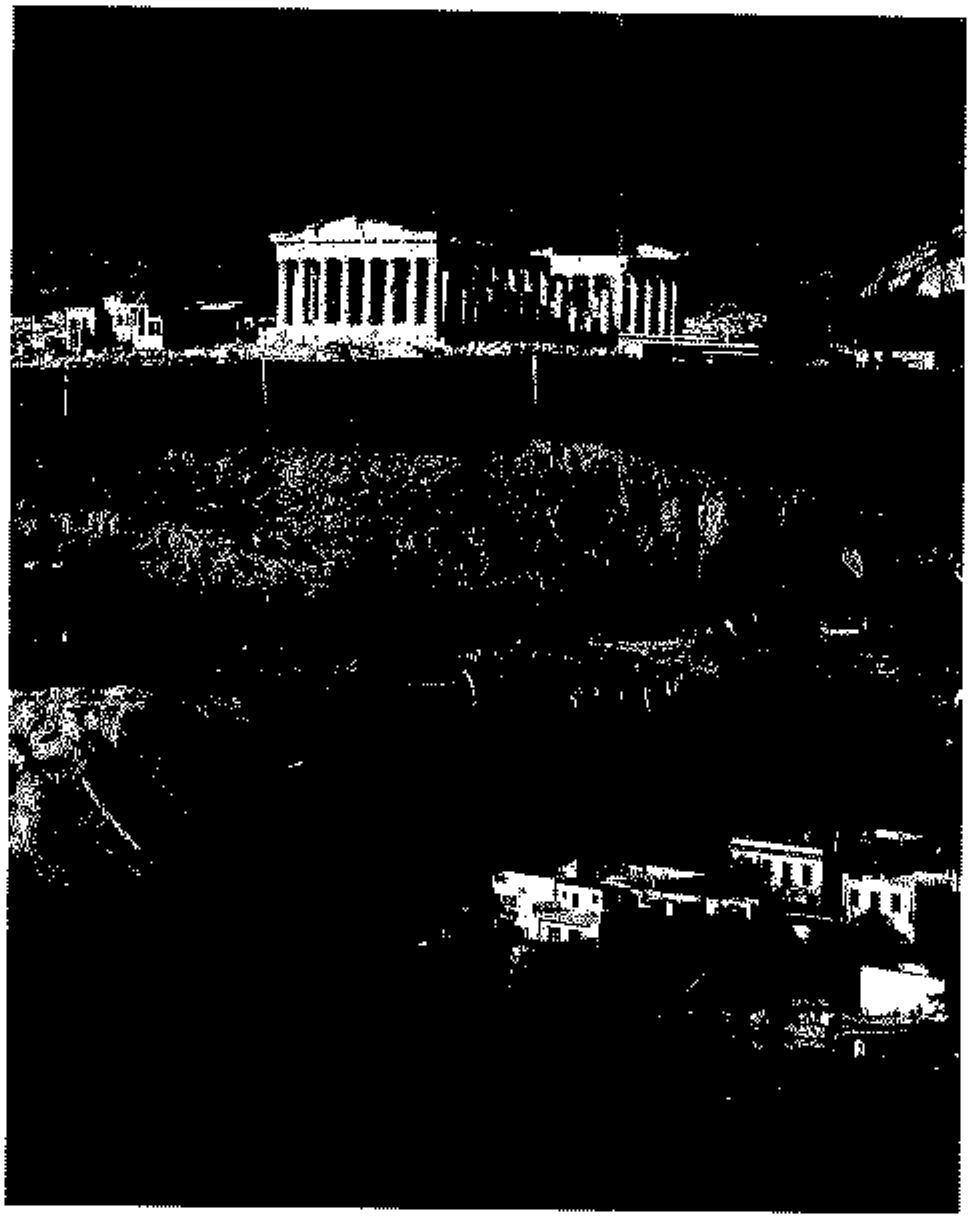
城市的社会分层

伊尼几乎不能被称为富豪政治。它的领土也许仅有几百平方公里，但它的基本宪法被设计得可以应用到各种规模的城市。它也许是从奥古斯都时代起草的样板中发展起来的，而它们本身又来自可以追溯到共和国中期的传统。结果是，伊尼的法律描述的城市是罗马的缩影。官员们一年一任，而且是集体职务，但两个行政官（duoviri）和两名市政官（aediles）就足够了。每五年会有特殊的官员进行一次普查登记。卸任官员组成的议事会被称为库里亚（curia）而不是元老院，拥有广泛的权力。那里有财产资格的限制，有罗马风格的陪审团规则，有对共同体借贷规模的限制。那里有一年一度的赛会（ludi，基于罗马传统模式的运动会，由官员们主持）。运动会上，皇帝和作为集体的家神（Penates）占有显赫地位。关于祭司的规定失传，但两名行政官的职能中，包括对公民宗教的监督。它提供了选举规则，关于建筑、反对粮食投机等的规定。也有公民法的基本条文，但前言告诉公民们，在缺少公民法规定的地方，就应当根据罗马公民法来决定，那就是说，伊尼人好像真正的罗马公民一般。

关于普通伊尼人政治地位的详细情况，历史学家们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一个核心问题是清楚的：担任官职会使一个伊尼人获得公民权，而这种地位可以和直系亲属分享。那么，像伊尼一样的拉丁共同体，就是一部在西部行省的有产阶级中撒播罗马公民权的机器。在卡拉卡拉于212年发布所谓的安东尼敕令，将某种程度上已经贬值的罗马公民权授予几乎是帝国的全体自由民之前，除在军队的辅助军分队中服役和某些形式的奴隶解放外，多数人很可能是通过政治服务被授予公民权的。在这种条件下，拉丁权变成了一个新的用法，用以描述一个家族介于罗马公民和外国人——“外人”——之间的状态。

这类或者那类的拉丁共同体在罗马西部行省中广为流行。帝国内也存在其他类型的城市，外国的城市同样有收税、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义务，但它们的精英分子却无同样的奖赏。有几个城市如雅典等，享有某些特权，在法律上享有某些自治权。殖民地数量要少些，而且完全由罗马公民组成，要服从罗马法的管辖。在同盟战争后开始到恺撒完成的、被大规模集体授予公民权的意大利共同体也是如此。

这些共同体事实上到底有多少不同，我们的许多资料来自有关奖赏的记载。许多外人城市希望成为拉丁自治市，或者变成自由城市（civitates liberae），同时许多拉丁城市却寻求得到殖民地地位。在我们拥有的关于单个共同体改变地位的资料中，政治忠诚常常是被推荐的条件之一，但这些地区现在享有文明的生活方式的感觉（就是说从罗马人的标准判断），也占重要地位。犹如对个人一样，公民地位的提升在诱导忠诚时十分有力；犹如处理个人问题，皇帝严密地控制着城市共同体地位的提升。



雅典卫城。该卫城建于公元前5世纪，2世纪的雅典富翁赫罗德斯（Herodes）为纪念其罗马妻子瑞吉拉（Regilla）而修建的音乐厅在画面前方。在罗马帝国内，雅典是一个“自由城市”，意思是它享有自己的宪法，在许多领域中享有观念上的自治。但历代皇帝，尤其是哈德良，都干预过它的内部政治，并因承认它作为希腊文化中心的地位，赐予该城多项特权和建筑。

城市化的进程

各个社会共同体遵从罗马规则的过程，从考古学上也可以追溯到痕迹。罗马的城市化问题将在第九章中讨论，但这里需要指出某些关键的特征。第一，根据罗马的形式兴建新的城市，在公元前1世纪40年代之前几乎尚未开始，在绝大多数地区，它是奥古斯都时代的现象。第二，各个地区建城的程序大体相同。公共建筑是第一批需要建设的工程，甚至街道的棋盘式规划也是后来才有，这让一些神庙和广场（fora）在城市中的位置显得有点怪异。城市人口从一开始就在扩张，但绝大多数早期罗马城市最初都是围绕着新式神庙建设的一串传统房屋。罗马风格的房屋只是在后来才出现的。第三，城市建设过程要花几代人的时间，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早期的广场建筑群和神庙一般是在2世纪被更大规模的建筑所取代。第四，城市化过程的代价难以置信地高昂，涉及从外地引进建筑师、手艺人，在许多地区还有原材料等问题。从建筑风格上使我们可以描绘出意大利建筑师在元首制初期移居邻近行省而设计出第一代罗马城市的路线。新石矿的开采，瓦窑的兴建，砖、混凝土、拱顶和地下取暖系统新技术的采用，也让我们可以追溯这一过程。建筑的繁荣，肯定让某些人成了富翁。

即使在西方，人们也不总是遵守“典型”的程序。有几个城市是失败的显著例证，一串公共建筑被无数公顷的空旷地包围着。另外一些则相当让人意外地得到了发展，因为它们在交通线上的位置，使它们富有起来，伦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埃及诺姆的都城逐渐建立起古典风格的神庙，按照罗马人的做法规划城市也慢慢开始了。最古老的希腊城市，例如雅典和以弗所，已经拥有了它们伟大的建筑中心，但随着比过去更大规模的建筑活动的开展，新区发展起来。有些古代城市按照罗马风格进行了重建。在公元前146年同期被摧毁的科林斯和迦太基，在公元前1世纪后期都变成了辉煌的新殖民地，但也保存了某些毁灭前的组织结构的遗迹。

城市不是建筑活动发生的惟一地方。所有罗马城市都有公共崇拜，它们常常在城市边缘或者远离城市的圣地中举行。厄琉西斯是阿提卡一个地方性的圣地，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圣地。卑微点的是许多不列颠和高卢的圣地，它们位于远离新的行政中心的古代崇拜地。在所有这些中心，我们常常也能观察到同样的建筑活动。无论是考古年代学，还是每个共同体宪法发展的年代，我们通常都了解得不充分，不足以揭示是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后伴随着建筑活动，还是某些共同体把自己建设成那个样子，从而得到皇帝提升的。但希腊和罗马的作家把公共建筑和成熟的政治文化联系起来，而且将城市建筑看做它们的建设者文明本质的某种证据。在古典文化中，这些联系是古老的，在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塔西陀的《阿格利可拉传》（*Agricola*）中，它们都有表现。

创造了巨大建筑遗迹的伟大建筑工程——我们常通过它们来想象罗马世界，是富豪政治的另一个反映。由于富人越来越富有，他们就利用慈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忠诚，宣传他们对罗马价值观的遵从，炫耀他

> 我的主啊，普鲁沙人拥有一个公共浴室。它又旧又破。他们渴望予以重建，在我看来，您也有理由同意他们的请求。资金是现成的，部分来自我已经开始从那些欠该城债务的人那里收回的借款，部分来自公民们通常免费享用的橄榄油，如今为了该工程，他们自愿付钱。最重要的是，该工程将装饰该城，为您的统治增光添彩。
>
> 一个行省总督转达的比提尼亚一个城市从事新的公共建筑工程的请求

们比其同僚们（decuriones）更加富裕的程度。那些资助此类建筑工程的西部贵族们，正在表现他们在接受罗马教育时学得多么优秀，又是多么好地遵循了阿格利可拉那样的总督所提供的暗示。东部的贵族们纯粹就是炫耀财富。技术的进步，部分解释了罗马－希腊城市比其先驱者更加辉煌的原因，间距被拉大了，更好的石料得到了利用，但关键的因素是财富集中在人口中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古典时代的雅典也许有600家富有得足以承担诸如资助一个歌队或者一条战舰的费用，到哈德良时代，雅典百万富翁赫罗德斯有能力建造半打大型建筑，其规模让帕特农神庙变成了小不点。而帕特农神庙是由整个雅典帝国的资源支持的。在东方所有大城市中，故事都一样。大城市在增长，小城市在萎缩，超级富豪们则赢得了皇帝的友谊。

出于各种不同动机——有些是实用的，有些则是感情上的，皇帝鼓励城市国家及其都城的城市化。罗马在行省的复制，是一种保证。当新的精英像罗马共和国时代的贵族们一样行事时，皇帝就容易相信他们对帝国的忠诚。城市还提供了统治帝国，或者毋宁说是不进行统治所需要的基本组织结构。伊尼法律所揭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几乎完全没有提到罗马的官员——总督、代理人、财务官、司法官员以及在行省中代表罗马皇帝的被释奴隶和使者。伊尼的设计明显是尽可能自给自足。对于这样的共同体，总督行使的是不干涉型监督。

通过几百名由贵族出任的业余官员，管辖着几千名帝国的奴隶与被释奴隶以及绝大多数驻扎在边境地区的大约25万士兵，皇帝统治着5000万到1亿人口。城市所以是基础，是因为它们的土地贵族承担了保卫行省和平、上缴税收等绝大部分义务。作为回报，罗马很少插手城市国家的内部事务。这些地方精英中许多人财富的不断增长，强烈地暗示妥协的达成是以牺牲帝国内自由、半自由、依附人口的利益为代价的，而且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有时还非常之高。全面的贫困化、广泛的营养不良（如新的研究所揭示的），好像相当常见。古典时代晚期流传下来的土地登记册清楚地表明，财富的不平等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在4世纪埃及的赫尔摩波里斯，8个最富有的地主拥有超过全城三分之一的土地，另外的三分之一由其余的38个人瓜分。换句话说，在罗马统治下，甚至在元老阶层内部，巨大的财富差异都在增加。

罗马人的家庭

伊尼法律表明，它对新宪法不要干预伊尼人现有权利表现出特殊的关注。这些权利包括父亲对子女的权利，保护人对依附者的权利，主人对奴隶的权利等。被选举为行政官意味着为你赢得公民权，但那并不降低父亲对你的权威，这并不令人惊奇。西塞罗认为，对一个文明社会来说，财产权是基本的，家族首脑的权利，即父亲家长（paterfamilias）的权利，很大程度上属于财产权。持此种看法的，他并非惟一。在罗马公民中，家庭是其关注的核心，而伊尼的法律就是以罗马公民法为基础的。在学校的教本中，它也占据突出地位，而西部贵族们学习的拉丁语，或者作为年轻人学习修辞学所做的大量练习，正是这些东西。大部分关于早期罗马的传统，是由关于家庭的神话构成的。半传说性质的公元前5世纪的女英雄维吉尼亚（Verginia）被她的父亲杀死，以保全她的清白；同样著名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军事统帅曼里乌斯·托奎图斯（Manlius Torquatus）①，他因儿子违背命令进行决斗而处死了他。在关于罗马传说的创建者罗慕路斯的故事中，也有杀害兄弟的传说。

罗马思想中家庭核心地位的另一个表现，是表达家庭关系的术语被广泛用来表述其他关系。新老神灵被

① 据说维吉尼亚是一个贵族的女儿，被当时统治罗马的十人团（公元前451年建立，制定罗马的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即由该团制定）首领人物阿庇乌斯·克劳狄看上。为防止女儿的清白遭到玷污，其父预先杀死了她。她的死直接导致了十人团的垮台。托奎图斯传说是公元前4世纪罗马的英雄人物，曾在决斗中杀死凯尔特人。公元前340年，当他出任执政官时，曾经保护自己的父亲免遭不名誉的诉讼，却处死了不服从他命令的儿子。他后来成为罗马传统美德的代表人物。——译注

作为父亲或者母亲神来崇拜，从海外引进的西贝尔（Cybele）变成了“众神之伟大的母亲”。更古老的崇拜中，有玛特·马图塔（Mater Matuta）[①]和利伯·帕特（Liber Pater）[②]，朱庇特被称为“天父朱庇特”。在世俗领域，元老在正式场合被称为“patres conscripti”——特选的父亲，好像国家乃家长们的联合组织。给予人的最大的荣誉之一，是被欢呼为“pater patriae”——“国父”。西塞罗和恺撒都赢得过这一荣誉，皇帝则把它加到自己的称号上，皇后阿格里披娜的正式称号是“mater castrorum”——军营之母。3世纪给神灵的献词通常这样开头：“献给神圣的家庭，”意思是皇帝的家庭。

法律规定着家庭，但家庭是因为共同的利益与共同的崇拜被结合到一起的。贵族家庭提供了政治派别的基础，富有家庭之间的联系也许既具有政治意义，也还有财政上的后果。最著名的例子，是恺撒与庞培、屋大维与安东尼之间的婚姻同盟，它们分别标志着前三头和后三头的正式成立。当然，家庭也常在政治上陷入分裂，格拉古兄弟的近亲中，所包括的敌人和支持者一样多。像现在一样，家庭也会因竞争陷入分裂。在我们了解最清楚的家庭处于压力下的时期，透过西塞罗的法庭演说，我们发现围绕继承问题存在着同样的斗争，在不同婚姻——此乃所有贵族社会的特征——所生的孩子之间，存在着竞争。有时我们也能看到强烈的情感联系，尤其是在父母和孩子之间，但有时也存在于配偶之间，或者以前的奴隶和过去的主人之间。西塞罗的书信为我们提供了一扇透视罗马家庭情感力量难得的窗口。他们常常与我们的家庭很相似，在确定所有的家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似以及任何特定时代、特定地区和文化的家庭有多大程度的特殊性方面，罗马家庭史经常像是给我们提供的练习。

让我们从独特性开始。罗马用来称呼家庭的术语是“familia”，在其最正式的意义上，它表示在法律和社会意义上，一群成年人和孩子都服从一个人，即家长的权威。这个人一般没有活着的父亲或者祖父，其绝大多数，或者说所有的后代都处在他的家长权（potestas）之下，那是他的法定权力或者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古风时代罗马的法律处理的是家长之间的关系，而将他们的家庭成员的控制权留给了家长。所以，家庭中所有的奴隶以及几乎所有过去曾经是这个家庭的奴隶但现在已经自由的人，也是家庭的一部分，它的后果之一是，到帝国时代早期，某些家庭包括几百人，“familia Caesaris”，即皇帝的家庭，成员有数千之众。从形式上说，家长拥有家庭中所有的财产，而且他对其成员的权利扩张到法律审判上，甚至在早期帝国时，一个父亲还可能组成家庭法庭审判一个孩子。

当时仅有几种方式可以脱离家长的家长权，它们全部需要家长的同意。某些形式的婚姻会将妇女转移到丈夫的家庭，但自共和国末期以来日益普遍的婚姻形式不是这一种。父亲也许会同意把他的儿子过继到另一个家庭，通常是在成年时，为过继者提供子嗣，或者建立政治联系。西庇阿·埃米里亚努斯（Scipio Aemilianus）就是这样一个工具，通过他，两个伟大的军人王朝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和埃米利乌斯·保



一块红条纹玛瑙浮雕上所显现的奥古斯都与他的妻子李维娅，制作时间约在公元40年。皇帝夫妇被其家族成员以及被罗马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征服的各国代表（正下方）所环绕。皇室家族与罗马国家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是罗马艺术的一个流行主题。

① 成长女神，也发展成为分娩女神，亦可能是一位黎明女神，后来她与希腊女神伊诺（Ino）相对应。——译注
② 生产神，酒神，与希腊神祇狄俄尼索斯相对应。——译注

罗马法



法律也许是罗马最重要的遗产。对中世纪的精神文化来说，罗马法是根本。在文艺复兴时代，它发挥着关键作用，今天，它仍然是世界各地法律体系的基础。中世纪的学者们是通过6世纪拜占庭的伟大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的汇编了解它的。他的《法学汇纂》是我们了解罗马法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对于罗马人关于家庭、公民权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其他问题的观念来说，也是如此。此外还有一系列的文献，例如那不勒斯海湾普特奥利（Puteoli）港口一个被释奴隶家庭卷入贸易的记载等，表明法律在精英阶层以下的人中也得到了应用。

罗马法学的典型时代从共和国后期一直延伸到公元3世纪早期。公元前2世纪，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法律专家（法学家），法律本身开始作为一个独特的学科出现。其他古代社会也有法律，事实上罗马帝国时代有许多法律体系保存下来，而且由那些非罗马公民的人使用，但法学作为一个潜在的、具有自己内在逻辑的知识体系的观念却是新事物。法律由人民大会、官员的命令以及皇帝的敕令缔造。《法学汇纂》的很大部分是关于疑难案件，其中绝大多数是假设性质的学术意见的摘要。大约五分之二来自多米提乌斯·阿尔丕安的作品，他是一个大区长官，写有几百卷很大程度上是向帝国新公民解释罗马法的著作，绝大多数又写于212年卡拉卡拉发布安东尼敕令后的五年中，因为该敕令将普遍的公民权授予了帝国境内所有自由民。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法律，大部分是关于财产的，因此很大部分是涉及奴隶制的。贸易、继承、婚姻、委托、出售和出租在其中也占突出地位。关于各类官员的职责——其中许多人本身通过程式诉讼参与对法律的制定——的同样多。在此过程中，一个官员通过发布一项声明（一项定式），确定争议之事物，并为之指定仲裁人，来创造法律。法学家们发展出一系列灵活的程序和工具，例如标准出售和出租合同。类似“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的观念、法人具有它们自己的合法存在的理念，都起源于罗马法。塞维鲁时代最伟大的法学家阿尔丕安、帕皮尼安（Papinian）和保罗（Paulus）[①]企图在大量的法典、敕令和早期作品中建立秩序。他们利用了某些希腊哲学，主要是斯多葛派的观念，他们的作品受到当时修辞

① 帕皮尼安（140～212年），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3世纪罗马最伟大的法学家，最重要的著作是《问题集》和《解答集》，曾任大区长官，后被卡拉卡拉处死。保罗（盛期为公元210年）是3世纪罗马伟大的法学家之一，帕皮尼安的顾问，著有《论告示》、《问题集》、《解答集》、《法学阶梯》等，其著作在查士丁尼的《法学汇纂》中被广泛引用。——译注



学教育的影响。虽然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实用问题，但他们发展出一套诸如公平、效用和自然法等一般原则。

法学是帝国时代罗马知识分子青睐的伟大学科之一，即使在法学家被置于皇帝控制之下后，法学教育以及法学研究和职业在整个古典时代晚期仍然活跃。

拉温纳城圣维塔利教堂6世纪的马赛克画，表现的是被神化的查士丁尼和他的法庭的12个成员（因此强化了君权神授的观念）。530年，查士丁尼建立了一个由16名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来编辑那些活跃于2世纪至3世纪的法学专家们（iurisconsulti）的作品以及编纂法典，结果就产生了《法学汇纂》。该书连同一部法学教科书《法学总论》一道，构成了罗马法统一体系的基础，并给世界各地的法律制度以重大影响。



庞贝的一幅壁画，表现广场上的商人。罗马缺少与现代公司相匹配的法律制度，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贸易、工业和农业企业都由家庭管理，家庭中可能包括大量值得信赖的、具有特殊商业和管理技术的奴隶。

卢斯家族（Aemilii Paulli）结成了同盟。维斯塔贞女被转移到了祭司长的家长权之下。被剥夺继承权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很少发生。罗马法庭有一种强烈的、支持合法亲生子的倾向。只有家长的死会改变一切。每个孩子，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得到大体相同的一份财产，而且每个儿子自己就成了家长。女儿和寡妇享有某些财政上的独立性。奥古斯都以后，那些生育了足够多孩子的妇女，事实上可以成为她们自己家庭的家长。

关于理论，毋宁说是关于神话，就谈这么多。围绕着一个严厉的、占支配地位的家长运行的大家族，是父权社会强有力的形象，但在历史上它是不可行的。让我们从下述一点开始：让一个已经成人的孩子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家长不切实际。罗马法承认一种特许析产（peculium，彼库里）观念，彼库里是指一个家庭成员（包括奴隶在内）似乎可以像处理自己的财产一样处理的一份财产。[①]墓志铭、房屋建筑以及各种轶事都明显地暗示，绝大多数罗马人是生活在核心家庭中的，即使他们属于不同的家庭，他们和自己的子女以及配偶也相当亲近。那些讲述古板父亲严厉故事，或者是描述一个当代的父亲如何召集家庭法庭作为对某些恶行的反应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此类行为在他们自己那个时代相当罕见。最后，古典时代每个人的寿命都很短，也让我们确信，很少有人能活得如此长寿，以致长时间地折磨他们已经成年的孩子们。

尽管如此，罗马的家庭制度还是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后果，这里可以举那些婚后仍留在父亲家的妇女为例。她们每个人都会随身带走其继承的部分（作为嫁妆），但她的丈夫无权处置它。如果夫妻两人离婚，她会把她的财产带回去，依靠它生活，或者作为再婚时的嫁妆。如果她去世，这种嫁妆会被归还给娘家。只有她有了孩子，这份财产才会离开她自己的家族而进入丈夫的家族。很明显再婚非常普遍，至少在现存资料允许我们观察的社会的那些层次是如此。贵族妇女通常是初潮后不久就结婚，男人则一般要到25岁左右。高死亡率使得夫妇双方都活到高龄不太可能。此外，离婚手续简便，而且不会成为污点。看到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有过两到三次婚姻并非不正常。以此为背景，夫妇双方与自己的娘家保持连续的、强有力的联系，在感情上和经济上都是可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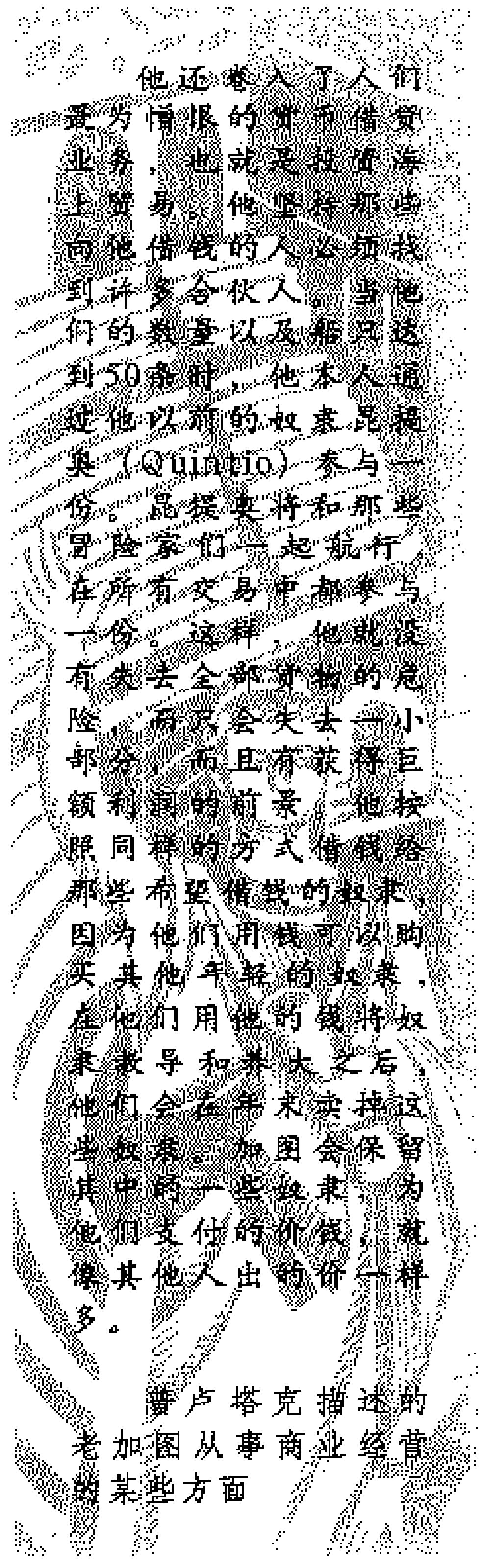
① 罗马存在授产奴隶，他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彼库里"。罗马家庭的其他成员当然也有这种权利。——译注

作为管理单位的家庭

也许更重要的是奴隶属于家庭这个事实。像在许多社会中一样，购买奴隶是改变家庭构成的一个途径。家庭殷实的农民能够使用奴隶来增加家庭农场或者其他企业可以利用的劳动力。老加图是一个公元前2世纪前期的作家，描述过比较富裕的农民如何利用二十多个奴隶来耕作一个中等规模农场的情况。考古调查也发现，在公元前1世纪，这种以农庄为基础的农业在意大利是如何扩张的。有几个农庄，例如托斯坎纳的塞特芬尼斯特雷，还得到了发掘。

到早期帝国时代，骑士和元老精英一般拥有散布在意大利的多处产业，有时在行省也有财产。这些农庄不仅生产大量、多样的农产品供出售，而且开发林地、洼地和湖泊。沿海的农庄也许会开办鱼类加工场，可以放养大群可以取得羊毛绵羊或者类似动物。城市的财产也出现了集中，多层住宅楼（insulae）用于出租，还有零售商店、食物外卖店（tabernae）以及加工成衣的企业（fullonicae）等。一个富有贵族的经济事务可能是非常复杂的。

正在这些奴隶的家庭中富人建立了管理这些不同利益的方法。它也许开始于农业中，在农业中，一个受到信赖的前奴隶也许会被指定为管家管理地主不在的农场。加图详细描述过管家的职责：监督劳动者，确保每件工作都会在适当的时候完成，照顾农场的设备和设施。农场管理人可能需要识字和会计算。他还需要具有有限的经济权力，特别是因为这些农场所依靠的农具需要从市场上购买；在诸如葡萄的收获季节，当奴隶人手不足时，就雇用临时劳动力。受过训练的、值得信任的城市奴隶的存在，为地主们提供了理想的管理阶层。奴隶和前奴隶还充任出租房屋的日常管理员，收取租金，确保房屋处于良好状态。其他人则根据安排经营商店，这种安排使得主人和奴隶或者前奴隶可以分享利润。维苏威山下城市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考古表明，隐藏在街前门面之后的，是城市富人的高宅大屋，前面则是一排零售商店与食品店。以前的奴隶甚至可以在一定距离内建立自己的小生意。以萨摩斯陶或（印纹陶，terra sigillata）闻名的红面陶，绝大多数都是分散在小规模的作坊里生产的，这些作坊共用陶窑，也许还有共同的销售渠道。在这种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奴隶劳动似乎特别重要。



他还卷入了人们最为憎恨的货币借贷业务，也就是投资海上贸易。他坚持那些向他借钱的人必须找到许多合伙人。当他们的数量以及船只达到50条时，他本人通过他以前的奴隶昆提奥（Quintio）参与一份。昆提奥将和那些冒险家们一起航行，在所有交易中都参与一份。这样，他就没有失去全部货物的危险，而只会失去一小部分，而且有获得巨额利润的前景。他按照同样的方式借钱给那些希望借钱的奴隶，因为他们用钱可以购买其他年轻的奴隶，在他们用他的钱将奴隶教导和养大之后，他们会在年末卖掉这些奴隶。加图会保留其中的一些奴隶，为他们支付的价钱，就像其他人出的价一样多。

普卢塔克描述的老加图从事商业经营的某些方面

罗马法被有产阶级用来进一步扩展家庭作为管理机构的功能。从公元前2世纪中期起，地主们可能就指定代理人代表他们签订合同，它反映的既是实用的、也是道德的需要。复杂的运作，例如葡萄酒的酿造，或者托斯坎纳地产上的泥制容器，以及沿海路的南运，然后再经海上运往法国南部、销往内陆等工作，甚至不需要元老等级的所有者离开他们在帕拉丁山的别墅，就能够完成。同样，某些经济活动，例如零售贸易，或者管理妓院与皮革场，都不是罗马的那些绅士们希望别人看到他们参与的行业，但以前的奴隶可以代表前主人，使用后者的资金，甚至也许是财产，来从事这些活动。

罗马家庭的灵活性，意味着即使是在最大的企业里，也不需要现代意义的公司方式，而能得到有效的管理。古典时代存在的银行和公司，规模从来没有超出家庭企业的界限，也不曾出现一个挣薪水的职员或者秘书阶层来协助富人管理他们的事务。当然，这不意味着作为一个奴隶是一种特权或者处在舒适的地位。

统治阶级的家庭

当一个贵族外出管理行省时，除了家庭的近亲，也许还有朋友的儿子外，

他常常会带着值得信赖的被释奴隶和奴隶一起上任，因为这些人会成为他的职员。对一个奴隶来说，成为一个强有力主人值得信赖的助手，可能会得到罗马世界最好的升迁机会，但罗马人之利用奴隶，恰恰是因为他们可以对奴隶进行严格的控制。奴隶可以被殴打或者折磨，对他们的主人来说，他们总是可以被性侵犯的对象，而且对于他们自己的家庭，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加图公开主张许可男性奴隶因为性的原因接近女奴隶，以诱使他做出良好表现。奴隶确实会有孩子，但是抚养他们还是抛弃他们由主人决定。奴隶的结合可以因为出卖被拆散，或者简单地在财产间进行转移。主人对奴隶可以做的绝大多数事情，对以前的奴隶同样可以做。我们看到的那些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和奴隶、过上了相对舒适生活的被释奴管理人，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非自由人的顶部，而处于底部的非自由人的地位则比他们低得多（关于奴隶制的进一步讨论，见第六章第101～105页）。

家庭是罗马社会的基本管理单位，因此，看到它在管理罗马帝国中发挥的作用，并不让人惊奇。现在我们应当能看清楚，罗马国家是有意利用各种机制，防止出现类似于官僚或者某种行政服务的机构。即使在他们不再征收土地税以后，公共承包人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同盟者和臣服者共同体中的土地所有者阶级被赋予了重要职责。监督所有上述事务，是各个职位上任期短暂的贵族总督、代理人、前行政官员以及皇帝任命的官员的职责。他们所具备的，是他们在服兵役期间担任下级军官、管理他们自己复杂事务时获得的技术。不奇怪的是，他们还带上了他们家庭的一部分成员。前奴隶和奴隶们陪伴着共和国时期的总督，并不仅仅是作为随从，还作为助手和秘书。庞培的被释奴被那些由他代表庞培巡视的希腊城市授予特殊的荣誉。如果一个总督有成年的孩子，他们也许也会陪伴他。一个将军常常会带着朋友或者政治盟友的子女。恺撒在高卢的战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例证。参与的机会就是成为富翁的机会，克拉苏的儿子和西塞罗的弟弟都从中受益。更具争议的是总督的妻子在行省中的活动，她们形成自己较小的朋友圈子，发展起她们自己的影响网络。但是，行省总督们的基本原则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而非公共的利益行事，他们的奴隶与助手的地位是不容挑战的。

这一过程的自然顶点，是奥古斯都自己的家庭在管理帝国中所发挥的作用。犹如他的继子指挥着军队一样，在他统治初期，人们发现他的前奴隶



土耳其以弗所的罗马大理石装饰薄板，表现安东尼努斯·庇乌斯（居中者）过继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居左者）和鲁基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居右者）的情景。过继一个远亲或者无血缘关系的成人为继承人的做法，在罗马统治者中并不是罕见的现象。它强调了罗马社会中家庭联系的重要性，也表明帝位继承中的不稳定性。

代理人在征税，担任秘书。苏维托尼乌斯在记载奥古斯都遗嘱时，提到遗嘱中简要叙述了整个帝国的情况，包括军事力量和军队调动、帝国贮备的规模以及所欠的税收。皇帝还补充了那些奴隶与前奴隶的名字，称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恺撒的家族中包括大量由奴隶和前奴隶出任的官僚。对于皇帝的被释奴所获得的巨大权力——这些权力来自他们被赐予的财富以及他们对皇帝的影响，贵族作家们极为憎恨。克劳狄是由军队立为皇帝的，而且违背了元老院的意志。他让元老院授予被释奴帕拉斯（Pallas）[①]以特殊荣誉，从而非常清晰地把贵族的无权地位揭示出来。普林尼和塔西陀那样的贵族作家（数十年后）进行了报复，他们挖苦帕拉斯的记忆力，宣称克劳狄受他的奴隶统治，甚至在让其处死前任后，为其挑选了第三任妻子。但对皇帝来说，就像对共和国时代的官员一样，奴隶是他们完美的助手。他们中的许多人受过良好教育，有计算能力，既是有经验的管理者又可以信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权力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因此其忠诚是有保证的。

帝国时代的罗马社会

写于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已经讨论过希腊社会的政治构成问题，他从对家庭的分析开始，接着是公民权和奴隶制，最后到对关键制度的讨论，这些制度使得政体成为民主制、寡头制或者僭主制。这些分类，如波利比乌斯所承认的，在观察罗马社会时依然有效，只是要注意到某些关键的差异。罗马家庭按照一种独特的方式构成，以部分是神话、部分是真实的家长为中心，利用他与亲属、朋友、奴隶和前奴隶的关系构成罗马社会的一个基本构件。虽然罗马法继续在发展，直到3世纪早期古典法学家时期达到顶峰，但这些基本的习惯和原则是早就规定下来的。在帝国时代的条件下——我们惟一可以清晰观察罗马情况的时期，贵族家庭尤其开始发挥新的作用。说它成为协调大规模经济活动的主要方法一点也不夸张。

在帝国的城市中，富有的家庭为职位进行竞争。从形式上看，只有罗马公民才能有罗马式家庭，因此卡拉卡拉敕令之前，帝国的绝大多数家庭并不是罗马式的。但拉丁共同体和许多外国人的共同体似乎已经拥有罗马式家庭制度，大流散中的犹太人共同体也是如此，希腊人的家庭常常像罗马家庭那样行事。例如，在东方和在西方，妇女所以作为女祭司和施舍人，并似乎常常成为注目的中心，部分是因为在家庭中缺乏适龄男性时由她



一对罗马人夫妇举行葬礼的浮雕，发现于法拉利古代城市（现代的西维塔·卡斯特拉那，位于拉齐奥）斯卡撒托的阿波罗神庙附近。如本图所示，对绝大多数罗马人来说，核心家庭的团结实际上也许比扩大型家庭更加重要，在理论和法律理想中，扩大型家庭拥有一个专制的家长。

① 皇帝克劳狄的财务总管，据说极为富有，而且对克劳狄具有重大影响。尼禄继位后，他因为自己的富有被处死。——译注



庞贝的一幅壁画，表现一群休闲的罗马上层妇女。庞贝那样的坎佩尼亚城市的统治阶级来自奥斯坎土地所有者与罗马殖民者的混合，他们的官方文件是拉丁语的，但他们的房子、服装、崇拜和娱乐包括源自埃及、希腊以及小亚细亚的因素。坎佩尼亚社会是独特的，但我们在其中仍可看到典型的罗马制度，包括家庭、奴隶制和皇帝崇拜。

们来代表家庭。希腊贵族与罗马贵族通婚，希腊的大亨如赫罗德斯雇佣被释奴为代理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从2世纪起，越来越多的希腊贵族宣扬他们的罗马公民权，有几个成了元老甚至总督。奴隶制仍无所不在，罗马人释放奴隶的习惯到处流行。在占有土地的公民精英中，家庭与城市走到了一起，但有些时候会有冲突，因为家庭会把他们从几个城市中积累起来的钱财，花在一个城市中，或者因为注意力转向了权力中枢，而试图摆脱他们所负的公民义务。皇帝反对这样的做法，但并不完全有效。

在帝国土地所有者阶层，这种广泛的社会一致性与文化上顽固的差异性形成了对照。最明显的是在当时的许多希腊人中，存在着他们的希腊遗产在某种程度上比现行的政治忠诚更加重要的强烈感情。到2世纪，在用拉丁语写作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中，它也产生了反响。可是，我们很难找到任何例证，证明这种明显的文化

或者民族差异超越了阶级上的同情。换句话说，富有的希腊人的行为，好像与富有的西方人而不是比较贫穷的希腊人，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因为那个共同体部分依赖于地中海世界范围内的制度上的广泛一致。希腊人与罗马人关于城市、家庭和崇拜的观念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它们也是够接近的。这些基本观念上的罗马版本的巧妙传播，有助于上层社会一致性的启动，与此相对照，各种不同的地方性习惯和社会下层的观念就没有了流行的机会。



第五章

罗马与希腊

格雷格·沃尔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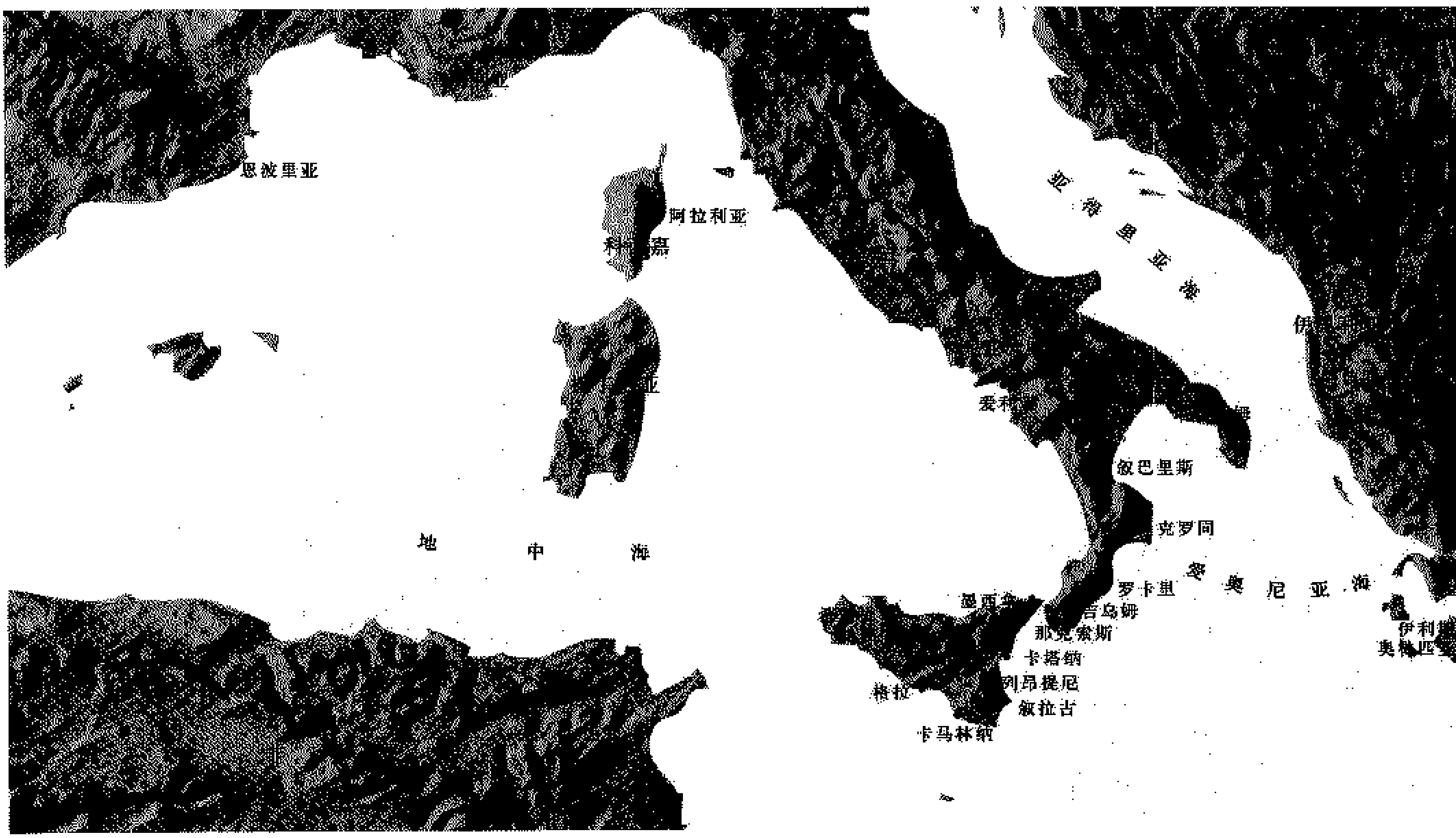


罗马与希腊

希腊之前没有罗马。从考古学上看，在罗马城最早的地层中，已经发现了希腊人生产的物品，所以罗马人恐怕不可能和希腊人突然遭遇。平心而论，罗马人首次出现的那个世界，始终是希腊人的世界，通过那个世界，他们扩散开来，并且最终取得了对它的支配地位。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关系确实有变化，直到各自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与对方的关系而得到了重塑为止。

希腊人的同一性本身并非一成不变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变化。瓦罗以后的罗马人相信，罗慕路斯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此时的希腊人已经探索过地中海的绝大部分地区，而且开始在从法国南部到黑海的地区定居。爱琴海的每一处海岸和岛屿，拥有说希腊语的人口的时间要比罗马人长得多。亚述的君主们所知道的希腊人，是劫掠者和雇佣兵，其他人则把他们作为商人加以欢迎。约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开始生活在城市中，这些城市有些拥有法典和宪法。罗马北方的邻居埃特鲁里亚人在寻找铁和用于交换的陶器时，已经遇到过希腊人，虽然希腊人事实上从来没有在托斯坎纳定居过。看来一般的情况是：希腊人的定居点避免出现在或者说是被排除在那些国家已经建立的地区，其中包括现在被统称为腓尼基人已经定居的地区。从腓尼基人那里，希腊人已经学到了字母文字，也许还有航海技术。但就在罗马南边的那不勒斯湾，便有希腊人的城市，希腊商人简直无所不在。希腊离罗马从来就没有远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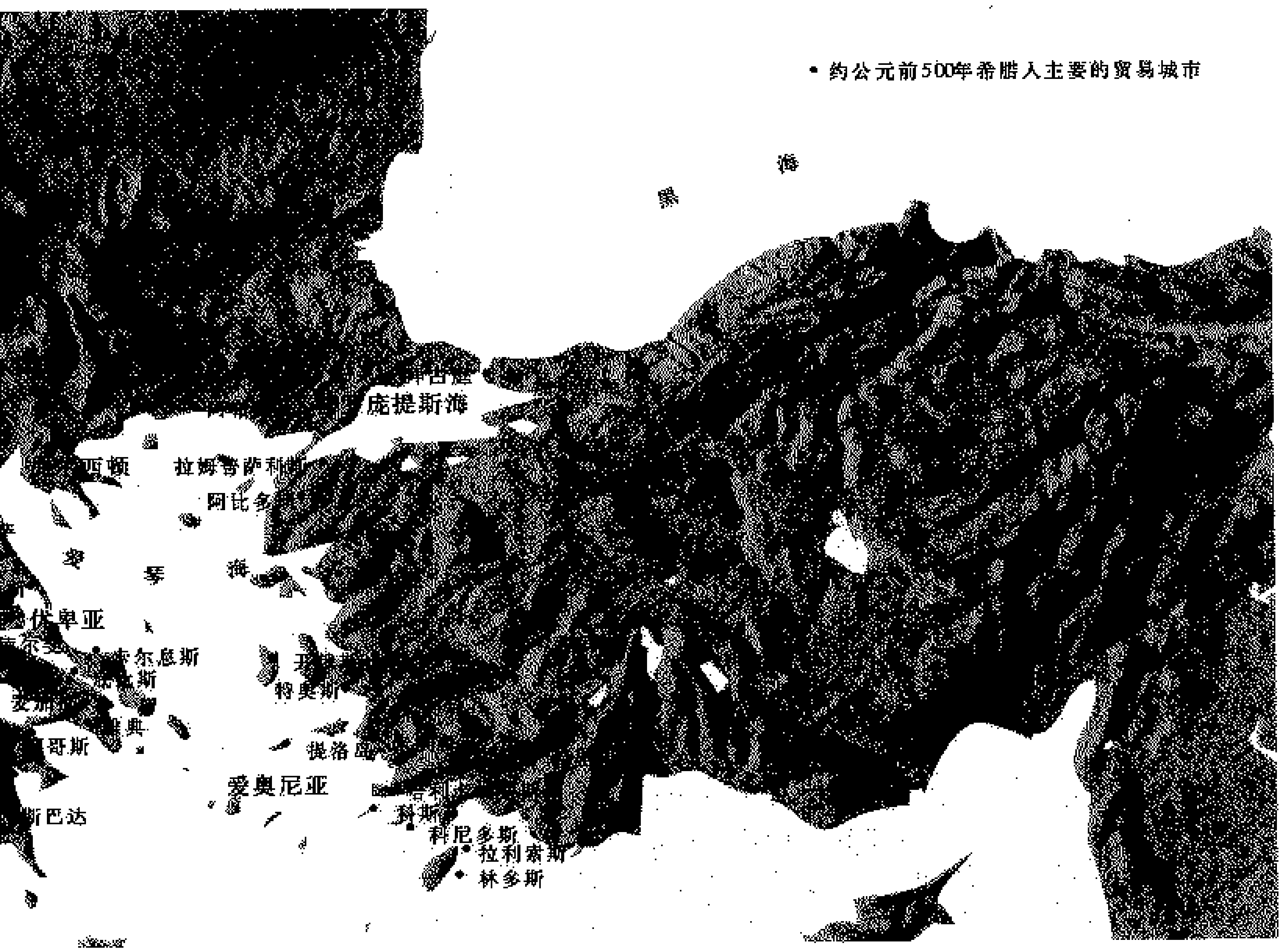
到公元前5世纪，即共和国早期，某些希腊国家已经成为地区性强国。到该世纪末，对西西里霸权的争夺已经把一些希腊国家拖入了长期的冲突，即伯罗奔尼撒战争之中。这场战争波及的范围远抵波斯帝国，其核



心是雅典和斯巴达争夺爱琴海控制权的竞争。这个“古典的”希腊世界是围绕着城邦组织起来的，从观念上说，所有城邦在其领土内都是自治的和拥有主权的，犹如今天的民族国家一般。雅典和斯巴达、列昂提尼和以弗所以及其他地区的公民，对自己的城邦都具有狂热的忠诚感。这些城邦的自由成年男性们在一起战斗，享有共同的法律，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政治生活，共同庆祝基于神话和崇拜、传统的地理和共同的历史的地方性节日。在一个城邦的领土范围内，通常仅允许公民拥有土地和担任官职，绝大多数希腊人和本共同体内的妇女结婚。

上述归纳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应用于罗马人，可能还能应用到许多其他城市化的地中海民族身上。有关他们的记载绝大多数已经失传，或者是因为他们的记录很少，或者是因为他们最后的征服者罗马人，不像罗马人对待希腊人那样，重视他们的传统，并将其保存下来。可是，将雅典、斯巴达和其他城邦公民区别开来的一件事情，是除地方性忠诚外，他们还共同具有强烈的希腊人意识。像他们的地方政治认同一样，这种认同建立在一种共同的神话—历史传统以及对共同祖先的信仰上。共同使用的语言对部分人，共同的崇拜对许多人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些标准中哪些是最重要的，并无完全一致的意见。公元前5世纪创作的大量诗歌和散文都关注的是下述问题：“作为一个希腊人意味着什么？”

希腊特性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地方有共同的、“泛希腊的”圣地，有些是像多多纳那样的发布神谕的地方，其他的是像奥林匹亚那样举行盛大运动会的地方。对许多希腊人来说，德尔斐乃世界的中心，既发布神谕，也举行运动会。希腊作家都尊敬荷马和赫西奥德（Hesiod）（即使表现为对他们的批评）。希腊人相互之间的共同性，似乎比他们与那些他们眼中的非希腊人，亦即蛮族，要更多些。地中海是一个交流频繁而深入的世界，但在希腊人之间，这种交流具有某种不同的价值。他们常从相邻的城邦借鉴制度和节日，相互之间有时存在不公开的竞争，例如在公元前6世纪建造神庙的活动中。当波斯远征军试图征服我们称为大陆希腊的地区遭到失败时，希腊世界最终找到了他们的民族性认同，尽管当时有许多希腊人参与波斯一边战



在罗马建城的传统年代之前，地中海是被贸易、旅行和殖民联结在一起的。自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参与了这些活动，从法国到叙利亚以及地中海所有岛屿上，希腊人的城市都有共同的特征。凡是有城市文明的地方，如腓尼基人的、埃特鲁里亚人的或者埃及人的城市，都不排斥它们。

斗，而且在战后很长时间里仍然处于波斯统治之下。



亚历山大大帝胸像，现存罗马卡匹托林博物馆。他的年轻且肌肉丰满的面部，头稍左偏，狮子毛似的头发和上翻的眼睛，都是亚历山大肖像的标准特征。亚历山大让罗马的将军们着迷，庞培、恺撒和奥古斯都曾用不同的方式试图与他一较高低，而那些在罗马统治时代的希腊作家们，可能将他称为“我们的皇帝”。

希腊性的局限

希腊性的局限，犹如任何种族认同中存在的局限一样，是一个仍有争议的问题。有些希腊作家认为，罗马人本身就是希腊人。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语言学上的相似——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相似来自它们作为印欧语系后代的共同特征——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某些支持，因为当时存在着具有不同语汇与方言的几个希腊语集团，说拉丁语的也许纯粹就是另一个这样的集团。但持这种看法的是少数人，在希腊人的思想中，它的兴起，仅仅是对罗马征服希腊进行的某种形式的理性化解释。

更具有争议的是下述问题：北部和西部希腊的居民是不是真正的希腊人。他们所说的语言与希腊语有关系，但只有极少数人居住在公认的城邦中，或者举行诸如特斯莫菲里亚节（献给德墨忒耳〔Demeter〕和波色芬尼〔Persephone〕的古老节日，在整个古典希腊世界，只有这个节日妇女可以参加并登台表演），或者按照正确的方式奉献牺牲。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流传着诸如“半希腊人”、退化的希腊人或者由希腊君主统治的蛮族之类的观念。由于巴尔干北部最强大的马其顿王国的兴起，此类问题的重要性地位上升了。

公元前4世纪末，正是马其顿的一个国王亚历山大大王（亦译为亚历山大大帝）毁灭了这个希腊世界。这位伟大征服者的第一批牺牲品就是巴尔干南部的希腊人城邦。在征调希腊军队补充了他的军队后，他把波斯作为他的下一个目标。在由亚历山大所进行的每一次重大战役中，希腊人都是两边参战，但他的胜利却被描述成希腊文化的胜利。在希腊世界的边缘地区，包括意大利南部（有时被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的边境地区，城邦政治仍然存在，但对绝大多数希腊人来说，在古典时代剩余的时期里，都将接受国王的统治。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的将军们瓜分了他的帝国，他们的继承者所建立的国家，仍是当时的超级大国，希腊世界这时扩张到了从兴都库什山到比利牛斯山地区。

从亚历山大之死到罗马征服东方的时期如今以希腊化时代知名。在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和现代的阿富汗地区，诸王国建立起来。马其顿本身仍是一个大国，一些相邻的民族，如西部的伊庇鲁斯人和伊里利亚人、黑海周边的亚美尼亚人和其他民族，依据很大程度上相同的模式创建了自己的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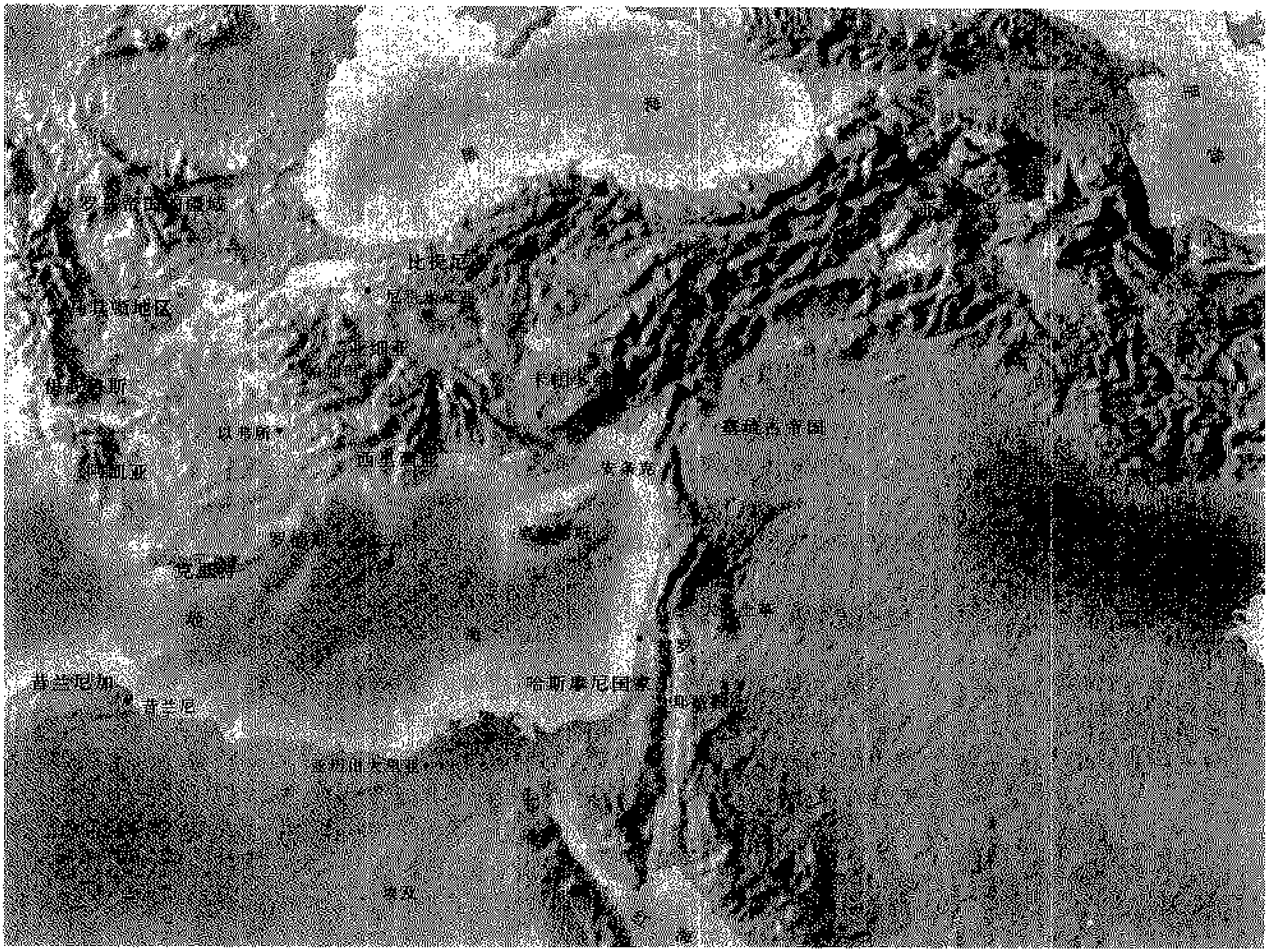
这些王国中的大多数把马其顿的王权特征与波斯的制度结合了起来，其中的最强大者依靠世袭的马其顿军队，许多国家还大量利用希腊殖民者和雇佣兵。各王国的核心是国王本人，按照亚历山大的传统，他总是一个伟大的将军，受到其军队爱戴，得到臣民崇拜，而且为相互敌对的亲属和廷臣所围绕着。国王中最强大者，建立起豪华的首都与首府城市，庇护希腊学者、诗人、雕刻家和建筑师。在解释罗马元首制的产生时，一种观点认为，罗马人最终屈从于希腊化王权的诱惑。希腊城市确实把罗马皇帝称为巴赛列斯（basileus，希腊语中的国王一词），而且把他们的名字和马其顿的君主、共和国的将军以及波斯的一个国王（一个个案）刻在一起，对他们进行同样的崇拜。

在亚历山大的部将托勒密创建的埃及王国，希腊人逐渐构成了一个近似世袭地位的集团，通过税收上的特权和独占政府职位与埃及人区别开来。当奥古斯都在克利奥帕特拉死时把托勒密埃及变成行省时，他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许多政府部门，但说希腊语的人继续支配着行政管理和城市。在罗马东方各行省中，同样的现象在以不同的方式发生着。事实上，罗马是通过希腊城市，准确地说是通过城市的有产阶级，统治着东方。

意大利斯帕达宫的亚历山大壁画肖像，画于17世纪。在罗马帝国灭亡很长时间后，亚历山大作为一个伟大国王的偶像仍是强有力的。



到公元前1世纪初，罗马帝国已经深深地入侵到亚历山大大帝所遗留的诸王国中，马其顿于公元前148年被征服，两年后希腊其他地区被征服。公元前133年至前103年，罗马获得了小亚细亚西部的主要地区，随后于公元前102年确立了对西里西亚“海盗海岸”名义上的控制权。



在没有希腊城市国家可资利用的地区，罗马人就创建它们。庞培肢解本都王国、奥古斯都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所做的，就是如此。在亚德里亚海以东，罗马的军队和少数殖民者说拉丁语和用拉丁语写作。但是，无数的铭文证明，希腊语实际上是官方语言（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糟糕的希腊语）。

罗马东部的希腊文化

罗马东部的文化生活完全围绕着希腊制度运转。尽管这些制度扎根于古典希腊的文化，但他们并不仅仅是对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复制。例如，民主政治消失了，邦际之间的战争也如此，而一种标准化的、很大程度上以古典雅典文化为基础的上层文化，取代了许多具有地方性差异的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包括由旅行的智者进行演说表演、教育和训练富有年轻人的体育馆以及宴会——一种或多或少涉及严肃文学与哲学论辩的贵族酒会——组成。自西塞罗时代起，罗马的年轻贵族会在希腊的主要城市之一度过一年左右的学习时间，参与并熟悉这种文化，而他们偏爱的地方是雅典。

在所有这些希腊人的具体事物中，最辉煌、最具社会包容性的是伟大的政治节日。所有希腊城市都有年度性节日，但综合性运动会（penteric games）的数量日益增加。这种运动会四年一次，它把崇拜和仪式、免税集市和竞技、音乐、诗歌以及许多其他项目的比赛糅合在一起。节日通常由富有的，似乎已经控制了许多城市政治生活的捐资人资助。城市相互派出使节参加节日，此外这些节日还吸引了职业运动员、商人以及乡村居民进入城市。到公元1世纪末，包括迦太基和罗马本身在内的几个西部城市，开始举办此类运动会。

老普林尼报道的加图对希腊人的看法

关于那些希腊人，吾儿马尔库斯，我会在适当的地方告诉你我从自己在雅典的经历中了解到的情况。浏览一下他们的文学作品是一个好主意，但不要全身心地投入。我会向你证明，他们是最为邪恶和桀骜不驯的民族。而且你可以把我的话作为预言家的预言：只要那个民族把文学作品传给我们，它就将败坏所有的东西；如果他们把医生派来，腐败会更快。他们曾经密谋用药杀死所有外国人。他们之从事这种勾当，是为了谋取钱财，以便他们可以取得我们的信任，更容易地杀死我们。

加图关于希腊的观点，按照老普林尼的报导。

罗马统治下希腊文化取得较高地位的后果之一，是许多罗马东部的臣民发现了，或者说是创造了希腊人祖先。还在希腊化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某些历史学家称为"文化上的希腊人"的某些迹象，它的意思是：那些宣称自己属于希腊人后代的人，根据不够说服人，但他们的行为和希腊人一模一样（这并不是说行为而非血缘成为希腊性的规定特征，古代希腊人拥有一种足以与现代种族主义者匹敌的民族认同观念。它的意思毋宁是：某些东部行省居民坚持认为，来自希腊人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乃是他们已经将希腊人价值观内化为行为最明显的标志之一）。从所有罗马时代小亚细亚的建筑铭文看，当地的铸币和节日所强调的仍是传统信仰，即路过此地的希腊英雄（在东部是柏尔修斯或者阿尔哥号的英雄们，在西部是赫拉克列斯和奥德修斯），在当地的仙女或者被救的公主的帮助下，建立了他们的城市。当具有无可争议的希腊性城市如阿哥斯和斯巴达被说服出具证明时，它们的支持会得到突出宣传。服从希腊文化规则（以及财富）肯定会支持此类要求，但某些城市显然是泛希腊联盟（panhellenion）裁定的，这是一种由皇帝哈德良创立、设于雅典的宗教崇拜组织。

与希腊人一起成长

共和国时代的罗马也许会对下述事实感到惊奇：有朝一日，罗马帝国会把希腊人的文化和对希腊文化的认同传播到历史上最广大的地区。难道罗马人不曾张狂地表示他们并非希腊人吗？在维吉尔高扬反希腊的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的史诗故事中，罗马人难道不曾宣扬过他们的城市的起源吗？

可是，即使是维吉尔，也无法完全掩饰希腊对其罗马起源解释的影响。《埃涅阿斯》的许多内容讲述了埃涅阿斯的流浪故事，其所经历的地区和希腊人奥德修斯一样，不过不是寻求回归，而是一个新家，他的眼光坚定地注视着未来。在到达台伯河边那个其后代终将建立罗马的地方时，他发现来自南希腊的一小

队阿卡狄亚人居住在那里，由他们的国王厄凡德尔（Evander）领导。他们并不是第一批希腊人，因为厄凡德尔将赫拉克列斯（赫丘利）打败和杀死当地怪物卡库斯（Cacus）的地方指给埃涅阿斯看了。这些神话被包括到《埃涅阿斯》之中的理由之一，是他们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已经广为人知，而且就像许多有关起源的神话同罗马最古老的崇拜联系在一起一样，在大祭坛（the Ara Maxima）对赫尔库列斯的崇拜就是这样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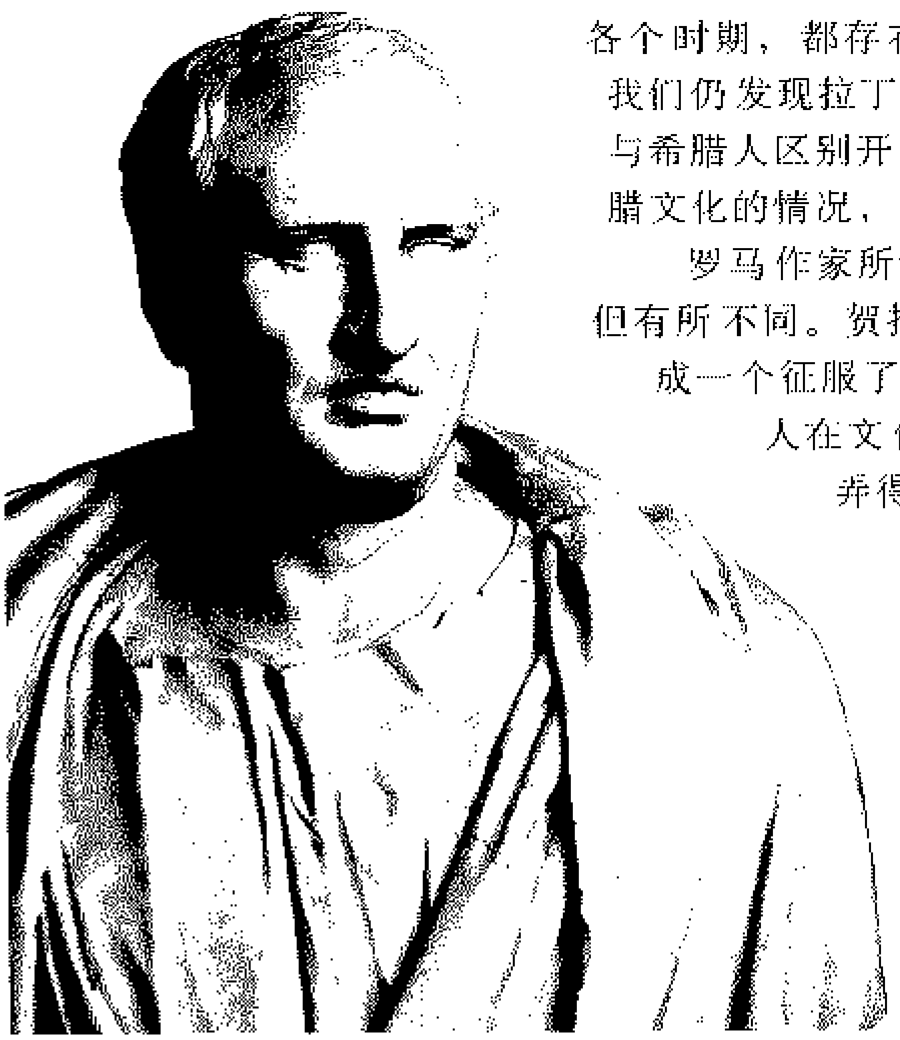
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创作《埃涅阿斯》。罗马人认为，这是关于他们城邦建城的确定性叙述。诗人的灵感来自（希腊的）主管历史的缪斯克丽奥（Clio）（左立者）和主管悲剧的缪斯麦尔波麦涅（Melpomene）（右立者）。该马赛克画定年为3世纪早期，现存突尼斯巴尔多博物馆。

希腊人以前一直在那里。共和国晚期的学者们对希腊作家的依赖已经在第一章中得到讨论。同样的说法也可以应用到共和国中期的先驱者们。拉丁文学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末，这是在第一批拉丁语宗教铭文显示罗马人首次采用希腊语书写拉丁语的几百年之后，由于希腊人的缘故，公元前6世纪文字已经广布地中海区，而希腊字母——它本身是以近东字母为基础的——被用来书写凯尔特语、西班牙语以及埃特鲁里亚语、奥斯坎语和其他意大利语言。但即使在希腊世界中，文学作品还是要少得多，看起来情况很可能是：罗马城的一代贵族领袖们几乎是突发奇想地创造了拉丁文学。要做到这一点，他们输入和庇护来自意大利各地的作家，先是忙于撰写第一批近似希腊史诗和喜剧译文的作品，然后是在这些和其他领域中创作原创性作品。

文艺作品的威望是巨大的，我们很快就发现，罗马重要的贵族们自己创作作品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老加图。这是一个颇为传奇的人物，而且他给自己涂上的传奇色彩并不算少。在公元前2世纪前期的政治中，他一直非常活跃。利用自己缺少贵族祖先的条件，他把自己打扮成古老的、非贵族的罗马文化与道德的卫道士。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的事实，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的形象，其大量作品所表现的对希腊模式明显的依赖，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其中之一是《建城记》（*the Origins*）。该书搜罗了一些意大利民族有关建城的传闻，并将它们整合到不曾提到任何个人的历史叙述中。这是该书与费边·皮克托的历史作品的一个重大差别。此人写作的时代早于加图一代人，其中提到一系列让人生疑的罗马英雄中包括费边家族成员的数量。皮克托用希腊语写作，但当时希腊语是地中海世界惟一的文学写作语言。加图用拉丁语写作的决定，意义堪与中世纪欧洲俗语文学的精心创作相比。尽管如此，为研究《建城记》，加图肯定搜罗了大量希腊语的传记、人种志和地方史著作。

这一文化过程被称为“借鉴”。罗马人之劫掠希腊文化，不是要复制或者模仿它，而是要把它派新的用场，为他们自己取得其所代表的文化资本。加图大声嚷嚷着批评希腊人，宣称所有希腊医生都是下毒者。在强调罗马“mores”（传统或者道德）为区别使用希腊文化提供基础方面，加图提出的观点在几百年后的罗马作家那里得到了回应：希腊文化确有值得罗马汲取的东西，但作为一个罗马人，远比作为希腊人更为可取。西塞罗在创造希腊哲学的罗马版本时，玩过同样的把戏，所有宣称是罗马人的荷马、特奥克里图斯（Theocritus）、阿尔凯欧斯（Alcaeus），或者随便哪一位希腊诗人的罗马诗人，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借鉴的成分越多，声明希腊人的成就已经被超越，所进行的选择是对原作所做的精心改造，也就显得越重要。

许多历史学家曾被吸引用现代爱情故事的话语来形容罗马人和希腊人的经历。双方的初次相遇得到了一个初步印象，但随后是悲喜剧式的误解以及冷漠的表情，导致日益增长的吸引力被越来越明显地掩盖。但和解终于来临（罗马文学的奥古斯都时代），虽然仍然出现了一点小麻烦（尼禄），但最终的结局乃有情人终成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胸像，雕刻于公元前1世纪，现存罗马卡皮托林博物馆。西塞罗是一系列下述罗马人之一：他们各自宣称自己乃希腊文学转换成拉丁语文学的第一批可靠译者。

眷属（哈德良）。现实情况要更为复杂，在从古风罗马到公元5世纪双边关系的各个时期，都存在着拒绝、模仿、借鉴和调和的情况，即使在哈德良时代，我们仍发现拉丁语作家将他们的前驱者称为“我们的”（nostri），以把他们与希腊人区别开来。此外，历史上从来没有所有罗马人都一个模子地看待希腊文化的情况，同样，所有希腊人也并不是一个模子地对待罗马人。

罗马作家所说的关于希腊罗马文化的故事，虽然同样有过于简单之嫌，但有所不同。贺拉斯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其一系列诗歌中，他把罗马描绘成一个征服了希腊人的野蛮战士民族，但随后被希腊人所征服，因为希腊人在文化上更先进。他暗示，第一批模仿希腊文学的罗马人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只有他及其当代人才成功地创造了拉丁语文学，使其足以与希腊的同行匹敌。最近的研究表明，贺拉斯、维吉尔，甚至西塞罗，所以都或明或暗地宣称，他们是第一批把希腊文化转换成拉丁文化的可靠译者，部分原因是为向他们先驱者的权威地位挑战。毕竟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恩尼乌斯已经写过一部伟大的爱国史诗，他用的是希腊语的六音步韵律，而不是意大利人拉丁语的古调，而且献给了希腊的缪斯，而不是献给意大利的卡麦纳（Camenae）。恩尼乌斯也有先驱者，其中之一曾写过一部拉丁语的《奥德赛》。换句话说，声明自己的灵感来自希腊人，在拉丁语文学中是确立其声望的一种方法。同样的论点，可能也适用于贺拉斯取代卢基里乌斯为经典讽刺诗人，取代其先驱者为抒情诗人的企图。有趣的是，此前一代人中的某些诗人曾称自己为“neoterikoi”，这是个希腊语词汇，意思是“新人”。

所以，历史上并无一个惟一的转折点，此前罗马是罗马人的，此后它变成了半希腊的（或者如某些现代学者所言，是“希腊化”的）。有关突然接触的解释也许很对某些古代作家的胃口，有些人假设，随着公元前211年西西里最伟大的希腊城市叙拉古的陷落，罗马突然暴露在希腊文化面前，因为该城的罗马征服者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尔凯路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将成百上千的希腊雕像带回了罗马（尽管这肯定会引起争议，因为当几年后塔伦图姆陷落时，负责指挥的罗马将军拒绝这样做）。另一些人觉得，希腊的影响可以被追溯到罗马在反对马其顿和叙利亚的战争中运回的大量战利品。而这些战争是在加图生前进行的。所有这些都是某种程度的转折点，但事实上，希腊与罗马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由一系列转折点组成的。罗马人经常发现他们自己“突然变成希腊式的”，因为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希腊文化的它者性质感到震惊，他们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他们仍然是罗马人。

包容希腊人

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兴趣并不局限在文学方面，至少从公元前3世纪起（可能还要早得多），希腊雕像就作为战利品到达了罗马。麦特路斯·马其顿尼库斯（Metellus Macedonicus）于公元前131年在罗马建造了一座把第一批大理石神庙包括在内的柱廊；庞培的剧场建筑群是公元前55年捐献的，据称是以希腊城市米利都的建筑为模型的，其中包括一座方亭，那里展览了大量富有异国情调的希腊雕像。在东方的希腊，大理石是公共建筑的首选材料，因为那里大理石的供应相对充足。奥古斯都自夸（不那么准确）：他见到的是泥砖的罗马，留下的是大理石的罗马。确实，在他统治时期，他以亚历山大里亚和帕加玛那样的希腊都城为榜样，对罗马城的许多部分进行了重建。

这些是公共建筑。在整个公元前1世纪，罗马贵族私下里一直在为他们的别墅搜集和委托制作希腊雕像（西塞罗的书信提供了有关证据）。这股潮流延续到帝国时代。我们有关希腊化和古典希腊艺术的知识，绝大多数来自罗马人的仿制品。偶尔，例如在意大利海岸斯佩隆加的山洞里，在法国南部的奇拉干庄园（villa），或者在位于提沃利（Tivoli）的哈德良宫殿，还有可能看到伟大的罗马贵族和皇帝们大规模的专题性收藏品。通过将这些雕像从其原初的希腊圣地和公共空间的背景中搬走，罗马人事实上发明了"美术品"的概念。

罗马人的性生活也受到了希腊观念的影响。性行为是那些道德出格可能影响公众声望与公职生涯的私生活领域之一。婚姻上的一夫一妻制是理想，在早期罗马的许多神话中，女性的"美德"（也就是贞洁）尤其著名。到共和国中期，某些罗马人已经变得更加大胆了，至少在罗马以外如此。共和国的许多将军不仅有希腊人小妾，而且有年轻的男性性伴侣。到共和国后期和奥古斯都时代，在有教养的精英阶层中，男性同性恋可能普及了。从加图路斯（Catullus）的挖苦和讽刺诗人的作品看，此时被视为耻辱的是轻率，以及一些具体的做法，如口交中主动的一方，或者肛交中被动的一方。这些态度都是典型希腊式的。到2世纪早期，规则又有所变化：苏维托尼乌斯赞扬了提图斯，因为在提图斯登基为皇帝后，他放弃了自己的娈童情人，但图拉真出征之时，带着自己的娈童，而哈德良的男性情人是最有名的。他名叫安提诺斯，为纪念他，哈德良封其为神，并建立了一座城市。各个时期的道德论争，都围绕着对具体环境中恰当行为的规定进行。苏维托尼乌斯笔下的坏皇帝在性生活方面不加节制，和男性情人结婚，允许他们自己受性侵犯。好皇帝很可能也有情人，但尊重自己的地位，而且将非婚姻的性行为限制在私人领域中。

罗马宗教史也可以根据同样的线索来写。在古风时代的罗马，赫丘利并不是惟一受到崇拜的希腊神灵，阿芬丁山的狄安娜（Diana）神庙据信通过马赛的崇拜和以弗所的阿尔特米斯（Artemis）联系起来。将希腊神灵更明确地引入到罗马公共宗教中，始于公元前3世纪阿斯克列庇奥斯（Asclepius）和帕拉丁山上大母神的崇拜，前者于公元前291年建坛于台伯河中的小岛上，后者是公元前204年建立的。对大母神的公共崇拜伴随着私人崇拜，其中有些明显是非罗马式的。可是，并不是所有希腊人的崇拜都被迎入公共崇拜，甚至私下崇拜也不能得到宽容。李维和元老院政令的铭刻版本都记录了在意大利控制巴库斯（Bacchus）崇拜的努力。当希腊的崇拜被引入公共崇拜时，通常被赋予罗马化的形态。帕拉丁山上的大母神神庙有一副意大利的外表，而且是在罗马传统的赛会上得到庆祝的（大母神节 Ludi Megalenses）。女神并不期待她的信徒像她的安纳托

西贝尔崇拜被引入罗马。安德列亚·曼特纳（Andrea Mantegna）约于1504年至1505年创作的一幅底图画。西贝尔乃安纳托利亚的母亲神，为引入罗马的众多外来崇拜之一。西贝尔崇拜论，约为公元前205年至前204年引入。该崇拜在帝国各城市，尤其是高卢和非洲的城市中被广泛接受。



利亚信徒一样，在一种癫狂的状态下把自己阉割。可是，外来的和希腊的因素得到精心保留，大母神奇特的服装、阉人祭司的乐器，可以与根据“希腊仪式”所表演的阿斯克列庇奥斯的献祭仪式相提并论（事实上它是罗马的发明而不是对希腊宗教的忠实模仿）。通过把后来所有的外来神灵都包容进来——它一直延续到君士坦丁将公共崇拜转向基督崇拜，它们外族起源的因素得以保存，即使规定它的许多制度都是罗马人的。

希腊和罗马因素融合成为一种混合文化，在这些交流中是常见现象。可是在混合文化中，罗马人从来不会忽视那些希腊成分。一个典型的做法是，在某种危机或者征兆使得元老院请示《西卜林书》（*the Sibylline books*）后，新神会被引入到罗马共和国的宗教中。这些神谕据说可以追溯到王政时代的罗马，它们本身是用希腊语书写的，但要由罗马元老祭司团解释。同样，希腊艺术被置于罗马城内和别墅中有限的地域，麦特路斯的柱廊和庞培的剧场都恰好修建在该城神圣的边界之外；希腊艺术品的展览场所，常常是在别墅封闭的花园中，其中不少明显是由受希腊人启发修建的列柱围着的。在进行议事和崇拜活动的主厅和中庭中，除家神、家庭守护神（lares）、国家神以及可能放置的祖先的胸像外，没有其他雕像。这种对希腊文化的“缠绕”一直持续到奥古斯都时代，那时皇帝和贵族们倾向于在城市中扮演他们的传统角色，但在那不勒斯湾则穿着希腊服装放松，享受希腊人的运动会和娱乐。

帝国时代罗马人所享受的文化生活，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其中的某些部分完全是希腊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对其加以区别。在处理与性有关的主题时，希腊风格的诗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特许权。那些担心自己在罗马的地位的皇帝们可以扮演传统派的角色，如奥古斯都和韦伯芗那样。其他人则可以通过创造性地利用希腊文化，试图为自己确立世界性的声誉（图密善、尼禄，还有奥古斯都）。从西塞罗到普林尼，援引希腊作品是一种普通策略，不过常是为了嘲笑。与此相对照，在希腊或者土耳其的罗马殖民地所出现的拉丁语铭文暗示，铭文的竖立者，还有铭文的读者，在该城拥有相对于邻居更高的政治地位，即使这些邻居无人能够阅读这份铭文。

人们期待有教养的罗马人对“两种语言”都能熟练运用，对罗马人来说，两种语言是指希腊语和拉丁语，但他们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两种语言的“古典”形式——西塞罗的拉丁语和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1]的希腊语，所谓熟练，包括对每种语言古典时期权威文艺作品的了解。即使在早期帝国时代，也许鲜有罗马贵族达到这个标准，但这是罗马人称之为“人文”（humanitas，意思是“文明”而非“人道”）一词成熟的价值观和道德判断复合体思想的组成部分。犹如这些价值观超越了希腊高级文化一样，它们也超越了当地的罗马传统。蛮族、半开化的行省居民和大众当然是被排除在外的。当帝国的贵族越来越倾向于根据共同的美学和道德素质，而不是高贵的出身或者政治上的显赫来定义自身时，它就成为该观点的一个组成部分。

希腊主义的魅力

可是，对于罗马人对希腊人事物的着迷，我们得更充分地理解吗？

记住下面一点也许是有用的：在他们那个时代的世界上，罗马人并不特殊。在整个希腊世界，我们发现有些民族好像对希腊文化的某些方面深深入迷，但他们决心不成为希腊人，其政治背景也并不总是希腊人或者罗马人掌握政治霸权。自公元前7世纪起，埃特鲁里亚人开始进口希腊陶器，对希腊神话的兴趣好像也发展起来。像绝大多数希腊人的银器出土于“蛮族”地区一样，今日博物馆中保存的大量雅典彩陶来自意大利的墓地。公元前5世纪，小亚细亚南部的吕凯亚人已经根据他们与荷马史诗的关系重新想象他们自己。下一个世纪，一些波斯王子和国王显然对希腊文化有兴趣，他们的继承者帕提亚人在公元前1世纪也是如此。人们为帕提亚皇帝表演希腊戏剧，奥斯坎人和意大利南部其他民族也模仿这些戏剧。希腊字母在西方广为传播，最初常出现在以希腊殖民地和马其顿国王铸币为模板的铸币上。汉尼拔时代的迦太基好像拥有很大程度上是希腊式的政治制度。在希腊化诸王国中，交流的范围甚至更广泛。希伯来人的《圣经》被译成希腊语，开创了重要的希腊语犹太文学流派；腓尼基城市根据希腊人的思路重新发明了它们的传统，在希腊哲学和阿富汗的佛

[1] 公元前4世纪雅典伟大的演说家和政治家，其演说辞有许多存留于世。——译注

教之间甚至也存在交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除非把这种更广大范围内的现象纳入考虑之中，否则我们对罗马与希腊文化结合的任何分析，可能都无法让人信服。当我们发现，在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和前1世纪，希腊建筑和表现艺术也受到中部意大利一系列民族模仿时，再理解它们对罗马的影响，肯定会容易些。我们可以把费边·皮克托的（希腊语的）罗马史和稍早时的由祭司马涅托（Manetho）所写的希腊语的埃及史进行有效的比较，约瑟弗斯（Josephus）的《犹太古事记》对圣经《摩西五经》的改写要晚得多，他从希罗多德（Herodotus）那里借鉴良多。所有这些对希腊灵感的借鉴都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文化中心，发生在大体相同的背景中。



《圣地风景》，约63年至79年的庞贝绘画，描绘了一幅想象中的情景，反映了罗马对希腊理想的尊敬以及罗马文化对希腊神话的吸收。该画现存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博物馆。

任何对这种更广泛现象的解释，也许都会从下述问题开始：为什么希腊文化对这么多的民族如此具有价值？部分原因在于希腊人自身就是一个其他民族发明的通道。书写、冶金、重装武器、巨型雕像，甚至也许还有铸币，都起源于其他地区，但它们最终都是以希腊形式得以普遍化的。希腊人联通了地中海的许多国家和内地地区。在他们的后期，希腊化的帝国，其中包括由罗马创造的帝国，给“到希腊去”增添了政治动机。也许希腊文化还是以那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从而使得它容易被吸收进多种它最初无意影响的文化之中。希腊神话既导向崇拜，也导向艺术；宴会把酒与文学联系了起来；诸如此类。也许当人们一旦开始采纳希腊文化，要停下来就困难了。

希腊文化相互联系的最明显方法之一，是通过希腊人的认同。这种联系，在希腊世界赖以组成的成百上千的城市之间，即使远隔千山万水，前后相距数百年，也继续存在。罗马的统治改变了，但肯定没有侵蚀希腊人的认同。罗马人通过泛希腊宗教联盟这样的机构，或者通过赞助文学、希腊化的艺术和节日，在决定何种希腊主义形式得到推动上发挥着作用。在废止他们所不赞同的制度方面，罗马人从来不用担心，在1世纪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注意到的、因罗马统治而遭到破坏的制度中，有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和克里特的法律，还有雅典的民主政治。

可是，在与罗马人进行文化交流时，希腊人仍是纯洁主义者。在说希腊语的东方，罗马神灵鲜有受到崇拜者；拉丁语文学作品从来不曾得到引用；从罗马人那里借用的语汇，虽然在日常口语中经常出现，在罗马帝国的管理中也是必须的，但绝对被排除在希腊语的书面语言之外。希腊人的作品常利用这样的希腊作为背景：那时罗马人似乎尚未出现。所有这些都是文化抵抗的形式吗？包括2世纪早期的阿里安（Arrian，他把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人色诺芬〔Xenophon〕奉为偶像，写有一部引人入胜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和出生于155年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在内的许多希腊作家，都是罗马的元老。近代对希腊与罗马文化明确而确定的区分所进行的搜寻，最终像为文化变迁搜寻单一的解释一样无用。这是一场希腊人和罗马人各自为了自己的意图已经玩过的游戏，而且在整个古典时代，他们似乎从未厌烦过。我们没有必要再追寻他们的足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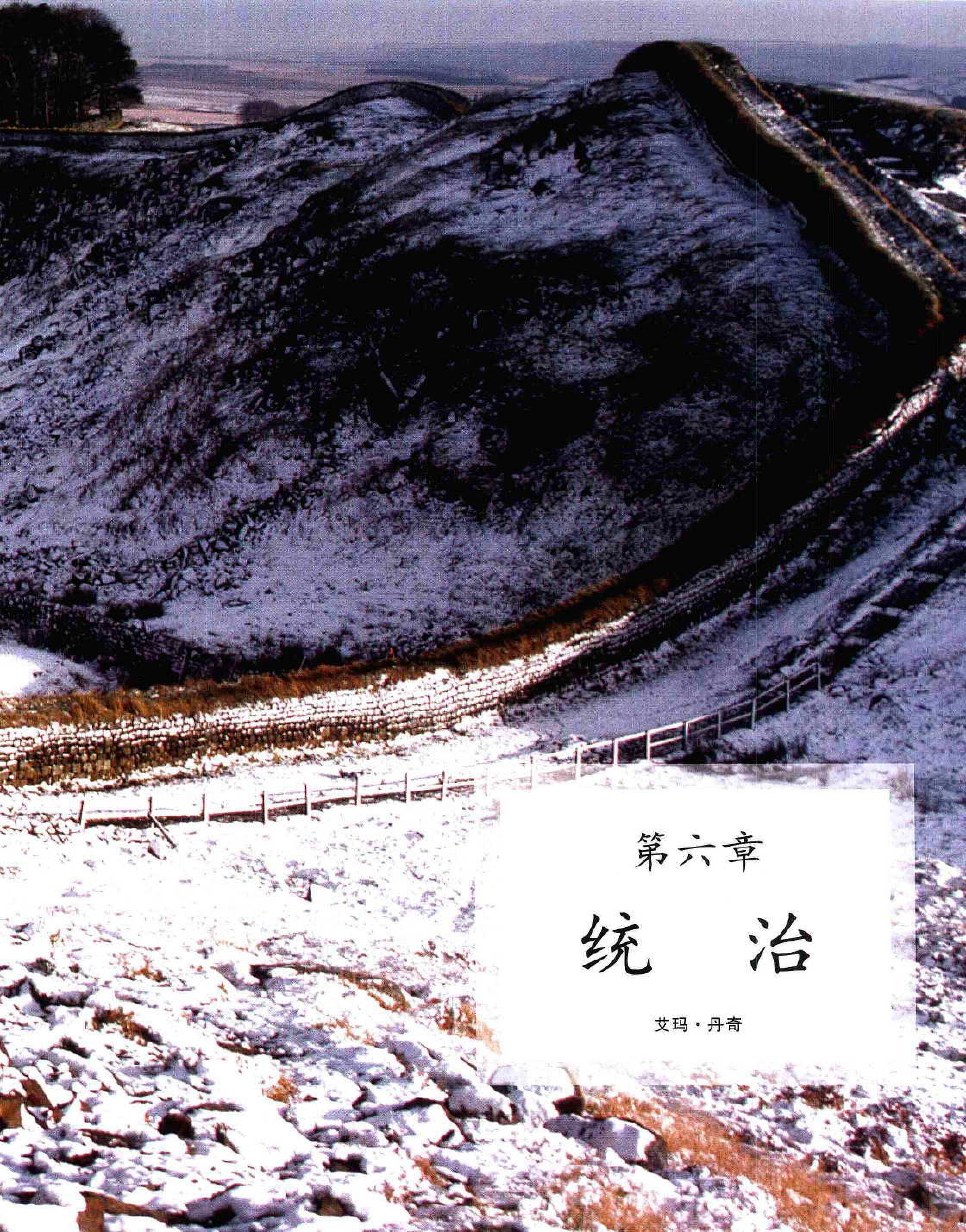




第二部

帝国的文化





第六章

统　治

艾玛·丹奇

统 治

当我们试图想象罗马世界，我们中大部分人会把好莱坞电影、画册残篇以及博物馆收藏的精美艺术品、雕像、珠宝和玻璃制品拼凑在一起。我们最可能获得的形象大概是一个文化上同源、讲究礼仪、有着光辉遗迹的社会，那里生活着身穿紫色条纹长袍、统治着帝国的富有男人和梳着漂亮发式、充满愚蠢想法和激情的妇女。好莱坞电影喜欢以受迫害的基督徒以及高贵的角斗士对既定统治的挑战为题材，这意味着我们也更可能构想出截然不同的画面——那些由于地位的低下而掩饰了美德、愉悦和正直的人们，在竞技场、矿坑或残忍的主人的怪念头下经历的折磨、羞辱和艰苦的劳作。

这种形象主要建立在几个世纪以来对现代西方人幻想的拼接以及对罗马社会政治、宗教方方面面的认同



这幅出自庞贝的壁画（这幅画通常被解释为描绘了一个奴隶理发师服侍两名妇女和一位年轻女性亲戚的情景）促使我们形成了一种有关罗马人的陈旧观念——有闲的、追求时尚的贵族，过着放纵的奢侈生活，由于大量家内奴隶的存在，免除了对世俗的、家务事的管理。

与抵制这样一种奇特的组合基础之上。但是，它们确实反映了富有的罗马人以及他们在帝国各地的同胞们的文化和追求的一些真实侧面。在共和末期，人民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存在获得承认，而在帝国时期又被看成是暴力和混乱的根源，成为恐惧的对象。罗马的政治理想建立在财产和地位的等级基础之上，不同阶层的人，有着清晰的社会、政治、法律和道德区分。帝国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并非总是严密控制的实体。为了发挥作用，帝国较少依赖罗马官员的直接统治，而较多依靠忠实的地方精英的出现，罗马积极地培植、加强了他们的势力。史料倾向于多方阐述这些较为富有、享有更多特权的地方精英的抱负和他们都市化、开放的文化：在帝国各地，我们发现了用拉丁文或希腊文为死者书写的墓碑，浴场、剧场和圆形斗兽场以及由大力提倡的捐献装饰起来的城市。



公元1世纪罗马公民泰伦斯·尼禄及其妻子的肖像壁画，发现于那不勒斯附近。这幅画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更真实的普通罗马人的形象——一对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年轻夫妇，迷惘地看着那个时代。他们手中的纸卷和尖笔表明他们有文化，受过教育，但这幅肖像画是否表明了某种文学上的协作或仅仅打算一起写传记尚不清楚。

一般说来，罗马帝国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倾向于夸大以财富为基础的差别，扩大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罗马人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通常将承认社会差别和支持精英事业看做好皇帝和忠实的罗马总督的特征。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发现帝国时期罗马法的形式化，对于犯罪惩罚的尺度以特权模糊的财产、地位和道德为基础，这在希腊罗马社会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humiliores”——地位较为低下、贫穷的人——比“honestiores”——地位较高、较为富有的人受到更严酷的惩罚。在政治层面，同一时期我们也能看出重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罗马与更普遍的地方村社公民大会作用的降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民主政治的观念在东地中海的希腊城市只是有名无实的力量。但事实上，承担昂贵的公共服务或实际交纳会费的要求已经使财富和议会资格之间的联系日益公开。

这一章集中讲述这个等级鲜明、富于进取的社会鲜为人知的某些方面。罗马人希望得到帝国属民的服从，易于设想或想象对自己和朋友的威胁，并采取激进的手段对抗这些威胁。妇女和奴隶自然被排除于政治生活各项制度之外，不论在地方或在罗马都不许参加公民大会的投票或担任政治官职。在罗马私法中，同被释奴一样，妇女和奴隶本身也是合法的阶层，被释奴虽然不能担任地方和罗马的政治官职，但法律规定他们继续对其先前的主人负有义务。仅在农神节（Saturnalia）狂欢的气氛中——这时人们会怂恿主人和奴隶互换几天角色——人们可能感到生活有所不同（这个节日对受女人、被释奴和家内奴隶控制的“恶”皇帝的统治提供了一种比喻的说法），但是正常生活秩序仅通过创作以中止他们的统治为题材的歌舞加以强调。

除了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十二铜表法（the Twelve Tables）证实的传统合法阶层，史料一般揭示了精英对“人民”特别是城市人民的出现及活动的不满（或实际上是察觉到的懒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常与被称之为“plebs”（平民）的人是一个无差别的群体，但有时以形容词加以限定更多揭示了罗马作家的精英偏见（例如“肮脏的”或“龌龊的”平民），或以描述或制度加以区分（“有价值的”或“诚实的”平民，或运气好、有资格得到谷物施舍的平民）。类似这样的区分使得罗马帝国庇护的专断本质以及取消这种庇护对穷人的灾难性影响显露无遗。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材料对家内奴隶或城市平民表现出了比普通的乡下人更大的兴趣。不过，在罗马的意大利，特别是在广大帝国的某些地区，例如北非或埃及，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获得对乡下人有价值的看法，他们不是奴隶，但他们靠对富人脆弱的依附关系生活。

社会流动性

虽然强调等级和进取精神是罗马帝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如果把罗马的阶级结构想象为静态的则是错误的。社会流动性——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的流动——是一个经常论及的帝国生活的特点。早在公元前3世纪晚期，罗马人就因为释放奴隶并将他们合并到公民团体中的做法而蜚声希腊世界。歌颂摆脱奴役、获得自由的被释男奴和女奴的进取精神的做法在整个罗马世界随处可见。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谓的“面包师的坟墓”，这是对去世的被释奴幼里萨斯的职业的光荣纪念。这座坟墓建于共和制的最后几年，位于罗马的马吉奥门，至今在这里仍可以见到。关于社会流动的普遍愿望表现在各种证据当中，反映了人们对突如其来的命运变化的广泛文化兴趣。这包括一种用于流行的赌运游戏的赌博板，有些类似于“蛇与梯子”；也有从富人沦落为穷人然后又致富的传奇故事，这在帝国讲希腊语的地区特别受欢迎。罗马文学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势利眼，与此相关的是对出身、口音、举止具有浓厚兴趣，这也是制定或陈述是否属于上层社会的规则的一种尝试，但它也是社会及地域流动性的象征。一种独特的、与势利眼反其道而行之的罗马人的观点有时也宣扬非贵族出身在道德、社会甚至政治方面的优越性。这种态度允许罗马精英队伍不断更新并且反映了这种更新的事实。

很难过多强调罗马社会等级之间纵向联系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将其中的一些联系定义为“保护”。这是一种互惠却又非平等的关系范畴，可以通过父亲和儿子的比喻或利用更形象的术语“保护人和被保护人”或“地主和佃农”等委婉、友好的语言表达出来。特别是帝国时期，保护网络首先允许各种特权（从高官到公民权，从低级助手到高级军事职位，直到进入有资格获得谷物救济或其他慈善计划和个人施舍的人员的名单和在农场得到一份临时工）超越直接的家庭或地位群体，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越了地域。

历史学家倾向于把罗马世界的社会流动性看做是一个积极因素，但在这个问题上有理由谨慎。在这个社会里，机会的均等连哲学家都没有梦想过；对奴隶制的关心更多地集中在主人的道德健全和经济利益上，而非奴隶的幸福；对广大奴隶来说，获得释放虽然算不得难以企及的向望，但好处的施予并无固定章法，选择慈善和福利事业的受益人以是否值得而非需求为基础。



一幅公元1世纪罗马镶嵌画的细部，出自罗马附近的圣托塞勒。这幅画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一个相当俗艳的性生活场面，但这可能是仅能用粗线条勾勒的镶嵌技术所造成的错觉。比如，艺术家的本意可能是刻画一位正在教育仆人的贵妇。

对罗马社会的研究

我们在本章开头想象出来的有关罗马世界的形象是对罗马的曲解，其部分原因在于幸存下来的证据类别的局限；部分原因在于很长时间以来，现代西方社会对罗马过去诸方面所进行的选择、利用和解释的过程。

一般情况下，罗马文学和罗马帝国的古典艺术非常严格地按照时间、文化和美学进行界定，它们是欧洲特权阶层以及英语世界中学和大学古典教育的传统基础。罗马文学主要由富人和有闲的文化人写就，主要也是为这些人享用，他们不论出身如何，都是那些最可能享受到等级鲜明的帝国社会利益的人群。我们的古典艺术概念，除了某些明显的例外（例如埃及纸草和在赫库兰尼姆及庞贝保留下来的全部生

活片段)，部分取决于自然幸存物。这些物品通常包括很多石头、陶器、金属和玻璃制品，但很少有木制品或纸张。由于早期考古学家的审美偏见，我们对罗马的曲解又大大复杂化了。他们对古典艺术和雄伟的纪念物情有独钟，忽略甚至主动抛弃了其他材料。

至20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和英语世界的中学和大学里，罗马文学主要用于为伟人、伟大的作品以及帝国崛起和衰落的历史提供一种社会政治框架，而对艺术和建筑的研究或作为这种历史的见证或单纯从审美的角度考虑，又往往将其置于社会和政治的真空中。

但是，较为晚近的历史学家对罗马世界表现出了更广泛的兴趣。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常生活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自20世纪60年代，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在内的理论方法都帮助揭示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罗马历史。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某些情况下首次揭示了——不同的证据，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例如，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考古学界对农业移民产生了浓厚兴趣，新的探测技术的发展鼓励人们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而不仅仅局限于个别发掘点。最近几十年，房屋的发掘也使人们可能像关注壁画和艺术品那样关注家内工具的发现和空间利用（以及由谁利用）的问题。

维吉尔对帝国目的的陈述

有的将铸造出充满生机的铜像，造得比我们高明；有的将用大理石雕出宛若真人的雕像；有的在法庭上将比我们更加雄辩；有的擅长用尖笔绘制天体运行图，并预言星宿的升降。但是罗马人，你记住，你应当用权威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你应当保持世界的持久和平，对臣服的敌人要宽大，对傲慢的人要通过战争征服他们。

维吉尔：《埃涅阿斯》第6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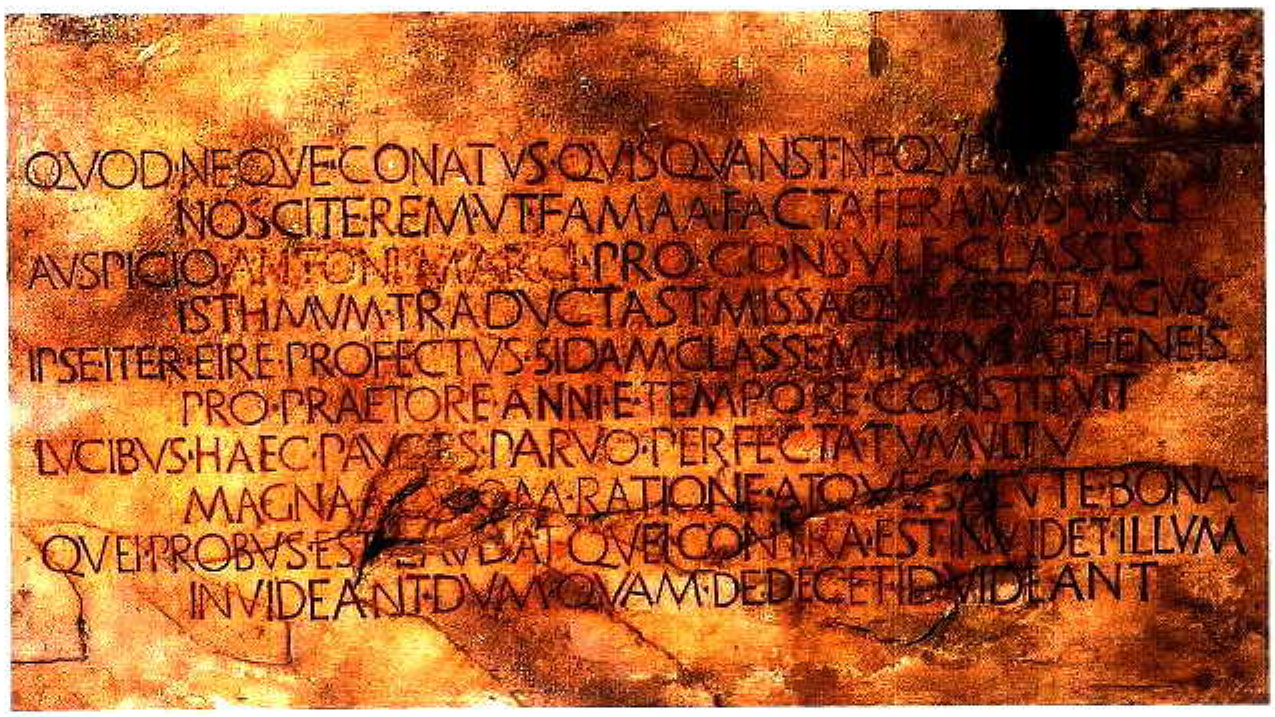
以考古为基础的地区性研究，时常对我们关于罗马帝国文化交流方式的一般概括提出挑战，强调它的社会、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目前，对社会阶级的设想和兴趣的转变以及对贵族成分的不断变化与流动、富人和穷人间存在互惠的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穷人生存方式的重视，正在对帝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结构提出根本性的质疑。

帝国的统治

在波利比乌斯看来，罗马统治的主要意图是迫使那些处在罗马统治下的人们服从罗马的命令。他于大约公元前2世纪中叶用希腊语写成的作品，解释了罗马奇迹般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原因，对于受到不俯首帖耳的怀疑的结果，波利比乌斯有亲身体验。作为一个年轻的阿卡亚贵族，他以一个囚犯的身份被带到罗马，但幸运的是，他在此得到了一些最有权势的家族成员的赏识。他的叙述表明了对罗马伟大成就的热情赞赏和乐于臣服罗马强权的深刻认识。

这是对罗马无所不包和无所不在的统治的一个完整叙述。它与我们自己较为传统的教科书中给出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别。在这些教科书中，作者浓墨重笔于那些左右着罗马如何对待行省的一些假设的“法则”，与罗马势力在那些没有受到直接统治的地区所表现出来的严酷形成了对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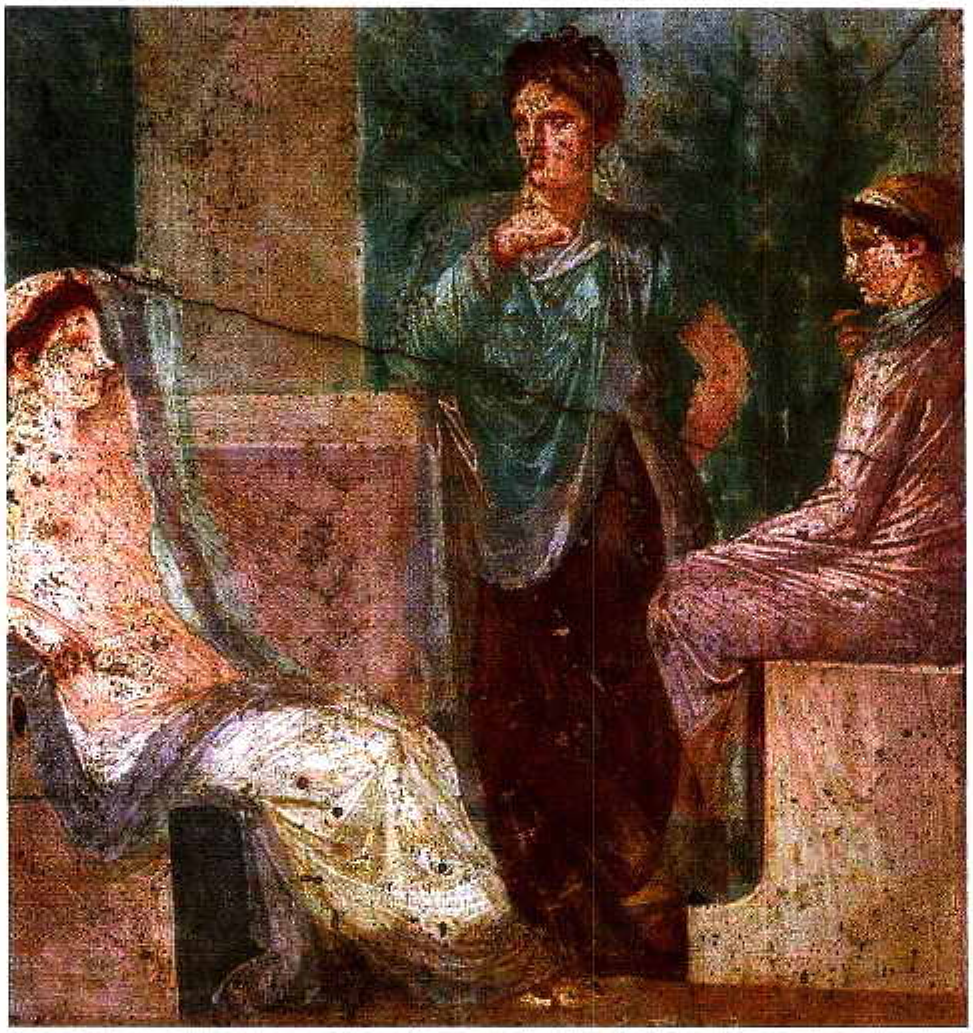
我们有理由认为，有极好的证



公元前1世纪的铭文，记录着一支罗马舰队送一位地方总督去雅典城时经过科林斯运河（通过地峡）的航行。这时罗马人已因拥有海外帝国而变得妄自尊大，他们的官员更是如此。他们热切地采用东方传统，留下帝国的文字来纪念他们的每一次行动。

罗马的妇女

很多古代材料把妇女看做一个单一的群体，一个仅以性别区分的阶层。罗马监护法被归结于罗慕路斯对妇女“因性而弱”的关心，法律的内容要求（有几处需要注意的例外）对妇女的经济事务进行终身监督。当然，所有妇女都不许参与投票和担任官职，如果她们出现在其他诸如法庭等一般仅有男性出席的公共生活领域，就会引起在座男性的惊奇和不满。在提比略统治时期，作家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提到，一名叫梅西娅的妇女曾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她因此被称为“Androgyne”（具有男子气的女人），“因为她柔弱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男人的心”。墓碑、罗马文学作品以及纪念性铭文都宣扬理想的妇女行为，这包括贞洁、节制和娴于织毛活之类的女红。



一幅出自赫库兰尼姆的公元1世纪的壁画，画面上有三名正在交谈的妇女。这是隐秘的、持久的女性内心世界，她们在这里分享秘密，对现实生活进行思考和解释。除了衣服上几处不起眼的细节，画面所描绘的很可能是公元前5世纪三名富有的雅典妇女交谈的场面。

有关帝国的描述极大地强化了性别角色的差异。例如，在共和末期，一种宇宙崩溃说受到广泛追捧，这种理论把贵族的性道德的败坏同内战、对神的忽略和即将发生的灾难联系在一起。在阿克兴失败的一方被刻画成女性化的、外来的异类，由克利奥帕特拉和她的东方风格的服饰——长着动物脑袋的神灵和蚊帐——所体现出来。与共和末期性别界线模糊相反，奥古斯都对危机的解决强调社会和性别的差异。这种解决办法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使通奸成为一种公共罪行的立法，这一立法利用了人们对女性放荡、私生子及越来越多的宫廷阴谋的恐惧。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孤立地过多强调性别在罗马世界的意义。公元前1世纪晚期，作家科奈里乌斯·奈波斯将罗马的妇女与古典时期雅典的妇女做了比较，着重指出高贵的妇女有时出现在罗马的宴会上。在一个非常重视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社会里，公共和私人政治生活领域存在相当多的交叉，贵族妇女能够赢得社会声望，有时甚至成为公众人物。皇室的女性尤为突出，这是帝王家庭膨胀到类似宫廷的结果。因女性美德而受到高度赞扬的李维娅，已经扮演了类似政治家的角色，对皇帝的请愿书都公开地呈交给她。更广泛一些说来，罗马世界对财产的重视，对地中海东部地区希腊城市的女性声望具有深刻影响。特别是在帝国时期，个别妇女被命名为捐助人，得到为其塑像的殊荣，甚至被授予名誉官职及其他职位，同时她们也因具有节制、贞洁、服从以及其他传统的女性美德而受到赞誉。

为比较卑微的妇女立的墓碑也意在表示罗马社会的取向。尤其是妇女们的户外劳动往往不被其丈夫们提及，相反，她们因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以及她们所具有的女性美德而受到赞誉。一些雕像倾向于展示这样的妇女引导着富人悠闲的生活方式。由随伺的仆人提供的纪念物以及庞贝的雕刻，还有对居室空间利用的研究，为地位较低下的罗马妇女的生活状况提供了一种较为新颖的看法。

据表明罗马帝国并不像它有时希望的那样，通常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土匪、海盗以及其他亡命之徒不断出现在帝国的中心地带说明存在着不同情况。而且很难反驳同时代的看法，即有关科林斯之类国家拒不臣服的一手证据所表明的看法。

波利比乌斯对于罗马统治特点的理解也似乎与罗马人关于权力（imperium）的思想相吻合。我们自己的术语“帝国”（empire）是一个含义模糊且被人们滥用的词汇，它源于拉丁语“imperium”。“Imperium”的主要含义是权力或统治，这是一个通常与罗马的高级行政官员联系在一起的术语，他们有权下令，必要的话有权迫使人们服从他们的命令。

假定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和法律单位在罗马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也可以发现有关父亲们对依附于他们的人拥有支配权的文学证据，这绝非偶然。就权势和服从的严格含义而言，“帝国”这一概念甚至在共和末期以前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时罗马作家就开始思考罗马统治带给属民的好处，例如和平与文明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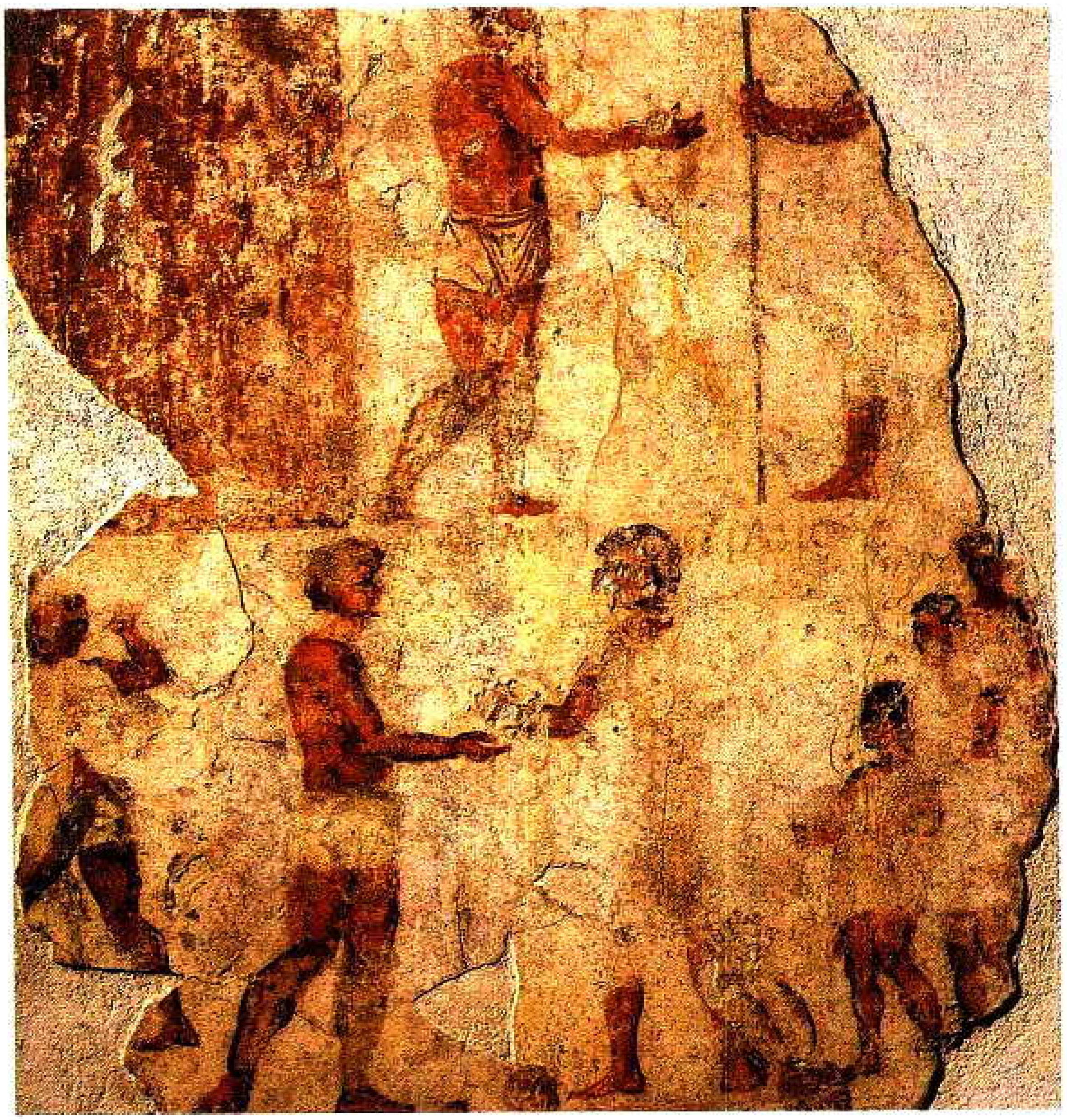
罗马和意大利

罗马获得当时人们已知世界的统治同它对意大利半岛的征服和管理密切相关。罗马的军事力量并不依靠雇佣军，而是依靠和意大利人结成的同盟网络，这种关系要求定期提供由地方资助的军队，这对一个在希腊化世界里充满着进取精神的国家来说是不同寻常的。这种军队的补充方式使罗马有可能在公元前3世纪到1世纪进行了几乎接踵而来的征服（之后，招募方法开始变化）。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军队本身的效率刺激了海外征服。

至公元2世纪，罗马对意大利的管理和对海外领土的管理之间有了重要的区别——包括罗马在意大利不设总督这一事实。这一时期，罗马和意大利的关系比以往更为密切。从观念和实践中都可看出，罗马明显对意大利拥有所有权，特别是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达到完全政治统一时，意大利逐渐被看做罗马这个地域辽阔的国家的延伸。

然而，尽管意大利和海外帝国之间存在差别，意大利却为更广阔的帝国统治提供了一种模式，这也是实情。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为合法的兼并或者政治兼并提供了先例。这包括“拉丁权利”超出了最初的拉丁族人向其他人扩展。接下来这些拉丁权利作为一种不彻底的权利向充分公民权系统转化，当然也包括同盟战争后，公民权本身向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扩展。　正是对意大利的这种政策最终有利于一个紧密的、一体化的海外帝国的形成，特别是在社会上层——比如这种政策使得行省贵族成员有可能进入罗马的元老院和骑士等级。

根据事后的判断，我们可以将罗马分而治之政策的推行定在公元前338年，



壁画残片，展示罗马人和萨莫奈人签订和平条约的情景（由握手显示出来）。这幅画出自罗马厄斯奎林山（the Esquiline）上一座公元前3世纪的坟墓。墓主很有可能对第三次或第四次（或两者皆有）萨莫奈战争的结束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维为罗马在意大利的扩张辩护

罗慕路斯派使节到周边国家，请求结盟和通婚权。他们指出，城市像其他事物一样由最低等级开始。那些受益于自己的勇气和上天庇护的人为自己赢得了伟大的权力和伟大的荣誉，因此，人们应该心甘情愿地在血缘上与他们的同胞混合。不论在哪里，使节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李维：《罗马史》第1卷

罗马人在此时最终征服了他们的近邻，包括其他拉丁人、北部坎佩尼亚和伏尔西人的一些城市。他们授予其中一些人罗马公民权，使之有权或无权在罗马公民大会上投票，迫使一些拉丁人分别与罗马结盟。

所有这些安排的结果实际上增强了罗马反对中部意大利其他人——萨莫奈人及其同盟——的军事力量，早在公元前343年，罗马人已经因为坎佩尼亚而与他们发生了冲突。这是一次长期战争的开始，古代作家统一将其称为“萨莫奈战争”，现代历史学家倾向于分成第一次（前343～前341年）、第二次（大约前328～前321年）、第三次（前316～前304年）和第四次（前298～前290年）萨莫奈战争。与萨莫奈人的冲突反过来使罗马人卷入了南意大利希腊城邦的事务，正是罗马在这些战争中的最终胜利使它能够在公元前264年前征服波河以南的整个意大利。

可能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大约是罗马第一次以新的合法地位的方式对待被征服者时，罗马与其他拉丁人拥有共同血统和祖先的血缘纽带的神话开始出现。例如，有关埃涅阿斯和他的子孙通过家族关系建立包括罗马、阿尔巴龙加（Alba longa）和拉文宁在内的许多“拉丁”城市的传统故事，而我们称之为“抢劫萨宾妇女”的故事事实上被更准确地叙述为“抢劫拉丁和萨宾妇女”——对罗马基因群扩大的一种更为概括的说法。罗马人对于血缘关系的强调似乎也与罗马授予拉丁人的法律地位一致，他们并没有被授予罗马公民权，他们仍旧享有在罗马法保护下的通婚和贸易权利，这体现了一种从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固定关系。

拉丁身份可以转移到不属于拉丁族的人，这种新观念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殖民地的建立，不论是“罗马”还是“拉丁”殖民地，都是罗马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到公元前2世纪早期对被征服的意大利进行管理的重要方面。“罗马”殖民地由罗马公民构成，完全处于罗马国家内部，是一些小型定居点，或多或少，始终是惟一的驻军单位。“拉丁”殖民地——比如弗雷格拉（建于前328年）、维纽西亚（前291年）、本尼温图姆（前268年）——都是由原来的罗马公民、拉丁人和当地人组成的居民点，并且通过对血缘关系的确认和拉丁权利

抢劫萨宾妇女，巴尔达萨利·皮鲁士约作于1525年。抢劫萨宾妇女是一个很受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喜爱的主题，结合了古代传说与感官的愉悦。对罗马人而言，这种残暴的行为是他们神话起源的一部分，在时间上要追溯到人们以非常原始的方式而不是刻写铭文来纪念征服的时期。



的拥有而与母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殖民地作为自治社区发挥作用，但被迫按规定为罗马提供人力。从建立的原因看，拉丁殖民地经常有明显的战略作用，建在要道之上或在那些联合起来反对罗马的人们的领地之间。但是，它们也是向远离罗马城的地区扩展罗马统治的有效方法，其居民仍然保留着固定的、参与性的罗马公民身份。

罗马以不同方式控制和整合它的意大利属民的实验，到公元前3世纪初仍在继续。其中包括执政官马尔库斯·库里乌斯·登塔图斯（Marcus Curius Dentatus）在公元前290年的行动，他征服了萨宾人和他们的东邻普拉图提人，并将他们并入罗马（最初作为“没有投票权的公民”，这是一种有点难以捉摸的地位），由此罗马的疆界越过了中部意大利，远达亚得里亚海。罗马人的本意可能是通过征收大块土地，将其重新分配给罗马移民以及通过剥夺政治自治权惩罚萨宾人和普拉图提人。但是，以后萨宾人被授予完全罗马公民权时，这种关系就非常不同了。到公元前2世纪早期，萨宾人不仅开始被看做是罗马社会的全权公民，而且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被认为在道义方面比传统的罗马精英本身更可取。顺利兼并萨宾人无疑得到了“罗马人和萨宾人在远古时代就有密切的关系”这一传说的支持：抢劫萨宾妇女的故事等于宣称具有共同的血缘。萨宾人的并入最终为罗马在公元前91年至前88年的同盟战争之后大规模兼并意大利人提供了政治、法律和理论上的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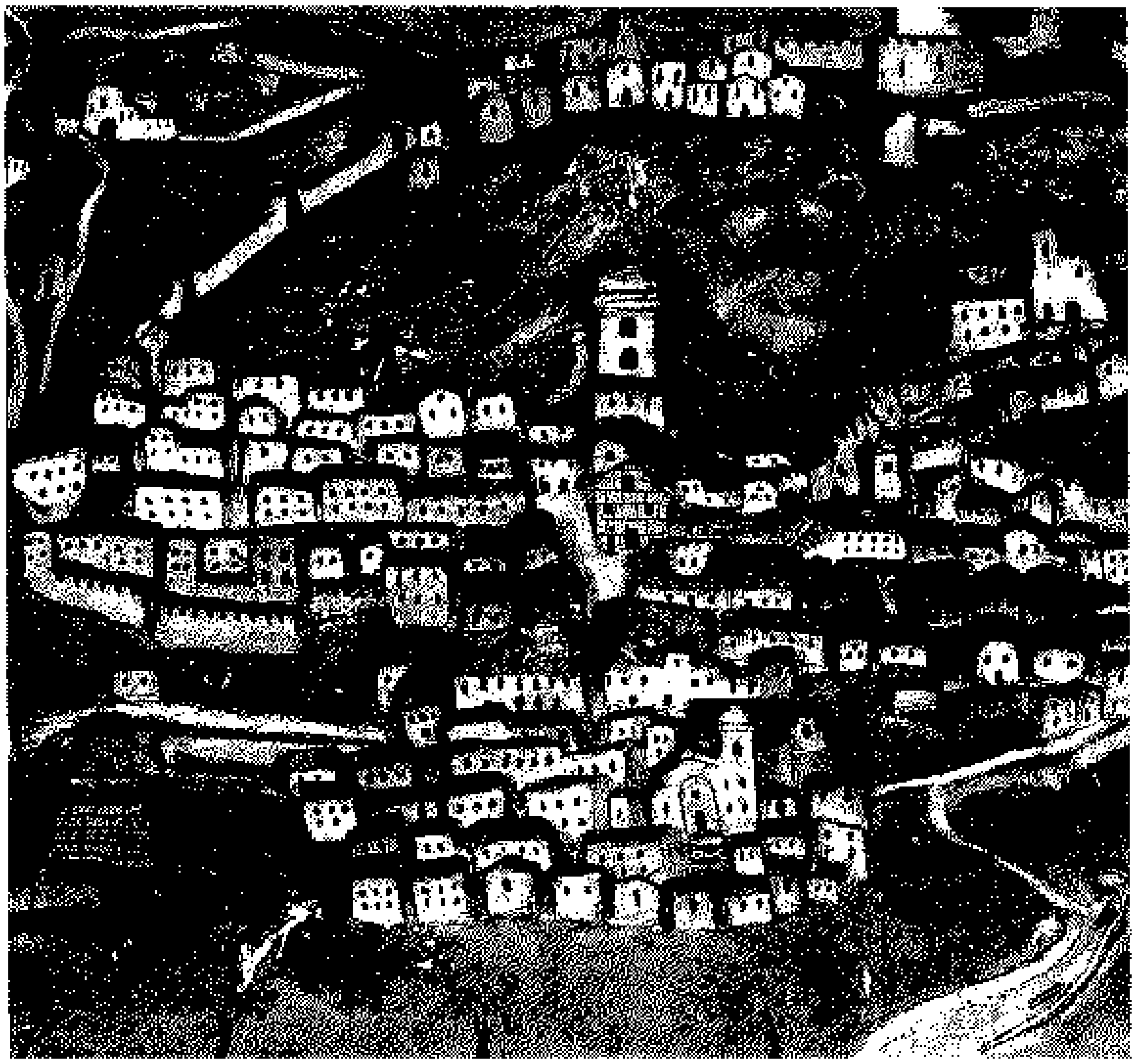
不过，在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2世纪初罗马征服意大利这段时间里，大规模政治兼并的情况很少发生。较为常用的方法是征服后将土地征收，重新分配给移民，同时罗马和被征服居民分别签订条约，要求定期提供军队（以及军队的津贴），在战斗中作为罗马军团的辅助部队。虽然从法律上来说，拉丁社区（包括殖民地）以及个别意大利同盟者在政治上依然保持自治，但罗马统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个别条约的签订、与罗马不同的法律关系的授予以及殖民地的建立，瓦解了现存网络和社会、政治、军事关系。四通八达的永久道路系统——以罗马为终点和起点——的建设，至少在某些地区已明显改变了当地的经济。对已征收的土地进行测量、划分成块、重新分配，其中的一些现今从空中还能看到。拉丁殖民地的建立，经常伴随着外来生活方式的输入，表现形式包括城市生活本身的模仿、拉丁语的使用及外来的宗教活动，例如向圣所奉献还愿的物品。

海外帝国

关于罗马在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与海外势力及地区的冲突以及最终成为其主人的叙述，同罗马卷入意大利事务以及罗马日益对意大利持吞并的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但这些叙述没有提及对意大利资源的剥削和对意大利半岛的军事控制，这一点可以从罗马的注意力转向海外的某些关键时刻清楚地看出来。比如，当塔兰提尼斯人请求伊比鲁斯的皮洛士帮助时，罗马在意大利的战争开始清晰地呈现出国际意义。这一点由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宣称颠覆了特洛伊战争的结果一事清楚地反映出来，因为皮洛士声称他是希腊人阿喀琉斯的后代，而罗马人起源于特洛伊人埃涅阿斯。皮洛士介入西西里的叙拉古，把罗马人拉进了西西里事务，最终导致了罗马人与迦太基的第一次战争（前264～前241年）。对罗马而言，这次战争最积极的成果就是对西西里、撒丁尼亚、科西嘉的征服和军事占领。罗马和伊里利亚发生战争的原因是罗马人认为保护在亚得里亚海受伊里利亚海盗威胁的意大利商人是他们的责任，正是这种军事注意力的东移，把他们卷入了同马其顿王国的冲突。

罗马人决定把伊里利亚人对意大利商人的侵扰看做自己的事情，这是罗马对意大利逐渐采取吞并态度的重要体现。这种态度无疑同罗马对海外领土——“行省”的新式管理直接相关。禁止大祭司长离开意大利的法令是这种变化的例证，这意味着罗马宗教的适用空间现已包括了整个半岛。如果我们把这个例子与公元前2世纪罗马增大了对中意大利的奇特宗教的兴趣这一点联系起来，似乎显而易见，在这个时期，整个意大利实际上已开始被看做是罗马的领地。

对当时的某些观察者而言，罗马统治在公元前2世纪的过程中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甚至是灾难性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在海外征服的早期表现得并不明显。这首先与罗马在这个已知世界的统治中排除了最后一个对手有关。公元前167年，老加图指出：罗德斯人曾打算加入马其顿的柏尔修斯反罗马的事业，但他们的想法可以谅解，因为他们害怕万一马其顿的抵抗失败，他们将“独自处于我们的统治之下”。在



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局部，画面上是一个罗马殖民地，其建筑十分整齐地排列在防御严密的城墙后面。与希腊殖民地不同，希腊殖民地的建立主要为缓解人口压力及鼓励贸易，而罗马殖民地则主要用于军事目的。在征服意大利期间，罗马建起第一个殖民地，作为前进的大本营。其后的殖民地用于安置从军团退役的大批老兵。

波利比乌斯看来，随着马其顿王国被击败，以及罗马现在具有迫使他人屈从的无法抗拒的力量，公元前167年乃是真正的转折点。

统治世界的实践

与罗马和意大利人之间密切交织却又不尽相同的关系相比，罗马的海外统治在某些方面似乎更为复杂。对行省的直接控制——最初并不比一名率领军队的将军的指挥范围更为固定或更为系统——在希腊世界较为少见，通常只是含糊地宣扬“友好”。但是，罗马的“朋友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关系没有仁慈可言：罗马官方希望完全知晓有关他们的任何事情，在出现地方争议的情况下，特别要与罗马协商。那些被认为误解了友谊规则的人，其后果是很可怕的。罗马的海外统治也通过区别对待发挥作用：真正的朋友被许诺自由，这有时（但不总是）包括免除赋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税收和征服之间的重要关系，它是古代帝国统治需要长期考虑的一个问题。罗马帝国的税收经常延续先前的规定，并不必然局限于直接统治的地区。尽管马其顿在公元前167年以后仍保持自治，但从前国王规定的一半税收现在要交给罗马。向罗马纳税可能是地方对罗马统治感到明显不满的一个方面，这一点我们在《新约全书》中可以看到。

统治世界的经验深刻影响到了罗马与意大利的关系以及罗马政治的形成。可以看出，公元前2世纪意大利经济的繁荣同罗马对地中海统治中所获得的利益有直接关系，尤其是在东部采取措施保护罗马和意大利商人的结果。在比较遥远的中意大利地区发现的罗德斯酒罐、纪念性的神庙和剧场建筑、在意大利城市的捐助人身上和希腊提洛岛的成功商人身上同时出现同一家族的名字，都证实了这种关系。

然而，统治世界的好处对罗马社会形态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加剧了罗马和拉丁人以及意大利同盟者之间的紧张局势。波利比乌斯认为，与罗马上升为世界统治者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帝国打破了他眼中的罗马政治生活三个关键因素之间的完美平衡——王政、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首先，他谴责贵族成员“讨好民众”的做法，认为这败坏了人民在罗马政治中的角色。罗马的民主化实践首先发生在提比利乌斯·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前133年）和盖乌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前123～122年）担任保民官期间，他们以某种不同的方式解释罗马人民主权的原则。提比利乌斯规定征收非法占用的公有地（超出了通常许可的限度），重新分配给穷人，可能只分配给罗马公民。他的法案引发了一系列事件，造成罗马同某些意大利同盟者之间的严重紧张局势，使后者随后宣称这些措施使他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提比利乌斯自己把罗马对世界的统治与群众主权之间的联系明显公开化了。在一次公共演说中，据称他强调不平等的事实，指出那些战斗、死亡却肥了别人腰包的罗马人，名义上是世界的主人，却没有一平方米的土地属于他们所有。公元前133年末，当帕加玛国王阿塔鲁斯三世将他的遗产赠与罗马人后，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宣布利用这份遗产直接援助定居在被没收的公有地上的殖民，以使罗马人民受益，但这一法案引起了争议。

扩大罗马公民权

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罗马官员一方面剥削罗马人，另一方面又损害拉丁和意大利同盟者的利益。盖乌斯·格拉古提出的相当广泛的立法是一个重要例外，立法（包括其他方面）规定在审判腐败的元老总督时要包括骑士等级的陪审官，并对国家资助的粮食出售做了规定。一项流产的法案公开提议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具有拉丁身份的人，同时将一项较小的权力——可能是“ius provocationis”（对罗马官员给予的重罚的上诉权）授予同盟者。在富尔维乌斯·弗拉古斯提出的明显类似的提案于公元前125年流产以后，扩大公民权开始被看做是表达拉丁人和同盟者不满的可行方法。在对意大利人事业的支持中，盖乌斯·格拉古利用了罗马官员和个别人对意大利人的傲慢、专横行为。这些都是罗马统治令人感到有趣同时又是令人齿寒的例子，在这里被施加在与之有长期特殊关系的人们身上。根据保留下来的格拉古的对手——执政官盖乌斯·法尼乌斯公元前122年一次演讲的残篇，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类建议被如何说成是与群众的利益相悖的。演讲中说：“如果你们把公民权授予拉丁人，你们认为还会有现在这样的空间供你们集会，或者你们还能参加竞赛和节日吗？你们不觉得他们会占据所有的空间吗？”显然，群众的排外情绪即使在公元前2世纪还仍然是一股力量。

意大利同盟者在公元前91年向罗马开战，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同盟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意大利半岛所有自由的成年男性最终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在以后两代人中，这种特殊行为逐渐具有了改变罗马国家整体权力平衡的作用。在罗马，人们强烈感受到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公民权对意大利人的主要价值就在于获得了参与罗马政治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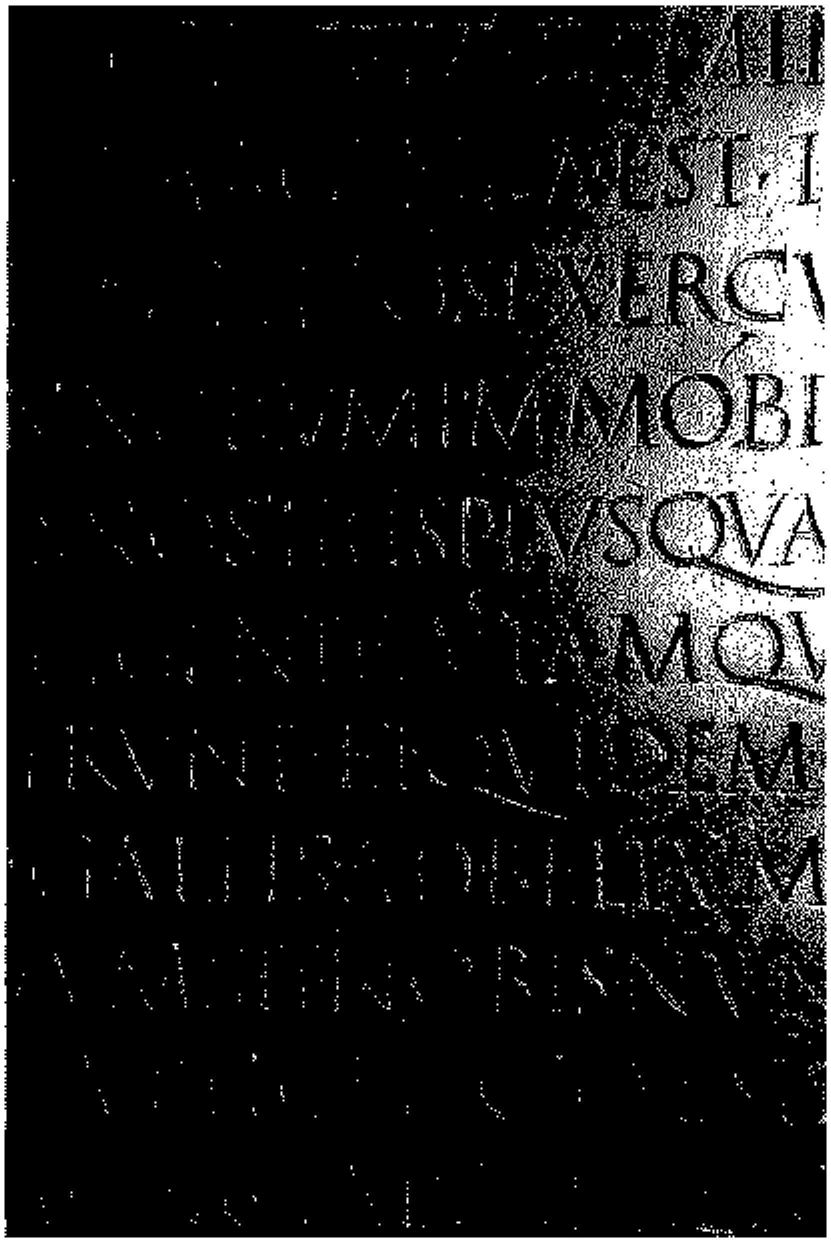
但是，反过来，罗马国家的扩大对罗马公民权本身的意义，对效忠罗马与忠于自己祖居城市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在西塞罗的《论法律》中，他提出了一种等级关系：自己所在的祖居地是人们祭祀和祖先坟墓的所在地，但对罗马这个祖国，“必要时我们要献出我们的生命”。这种早期的“双重公民权”概念预示了罗马公民权在成为一种更普通的国外身份后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公民权主要意味着特权，通常是在地方社会行使，而不是参与罗马的政治生活。当然，这个问题仅对富人才构成问题：塔苏斯的保罗是个典型例子，他在公元1世纪中叶通过要求在罗马接受审判，行使了他的罗马公民权。

公元前1世纪，罗马政治开始更多地强调个人作用，初期以军事独裁者的形式，但最终则公开地向王权的理念靠拢，发展起了一种非常明确、奇特的罗马式的妥协形式——元首制。强调个人的作用与罗马帝国的扩展以及意大利权力平衡的变化密切相关。公元前67年，罗马将剿灭地中海海盗的权力授予庞培，这一史无前例的做法加强了罗马野心勃勃的帝国计划与个人权力之间的联系。通过剥削意大利人的利益建立强大权力基础的苗头首先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当奥古斯都宣称在全体意大利人的支持下执政时，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完全变成了现实。

个人在罗马政治中日益突出对罗马国家地域上的统一有重要影响。例如，公元前1世纪军队招募方式的变化以及个人与军队间更为密切的关



19世纪法国的一尊格拉古兄弟——盖乌斯和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的半身青铜雕像。提比利乌斯被政敌雇佣的一群街头暴民谋杀以后，格拉古兄弟某种程度上成为共和的象征——受到那些为群众谋求更多政治权利的人们的崇敬——不仅在古代罗马，而且在大约九百年后的革命的法国。



《克劳狄铜表法》的局部，这是一块约公元48年在高卢制作的青铜板。公元43年把不列颠纳入帝国版图后，克劳狄热心推进高卢（它已经遭受了一个世纪的外族统治）和罗马之间更密切的关系。这则法典记录了皇帝解释他决定允许高卢贵族参与罗马元老院选举的演说。这个提议遭到某些意大利贵族的反对，当时他们一直控制着元老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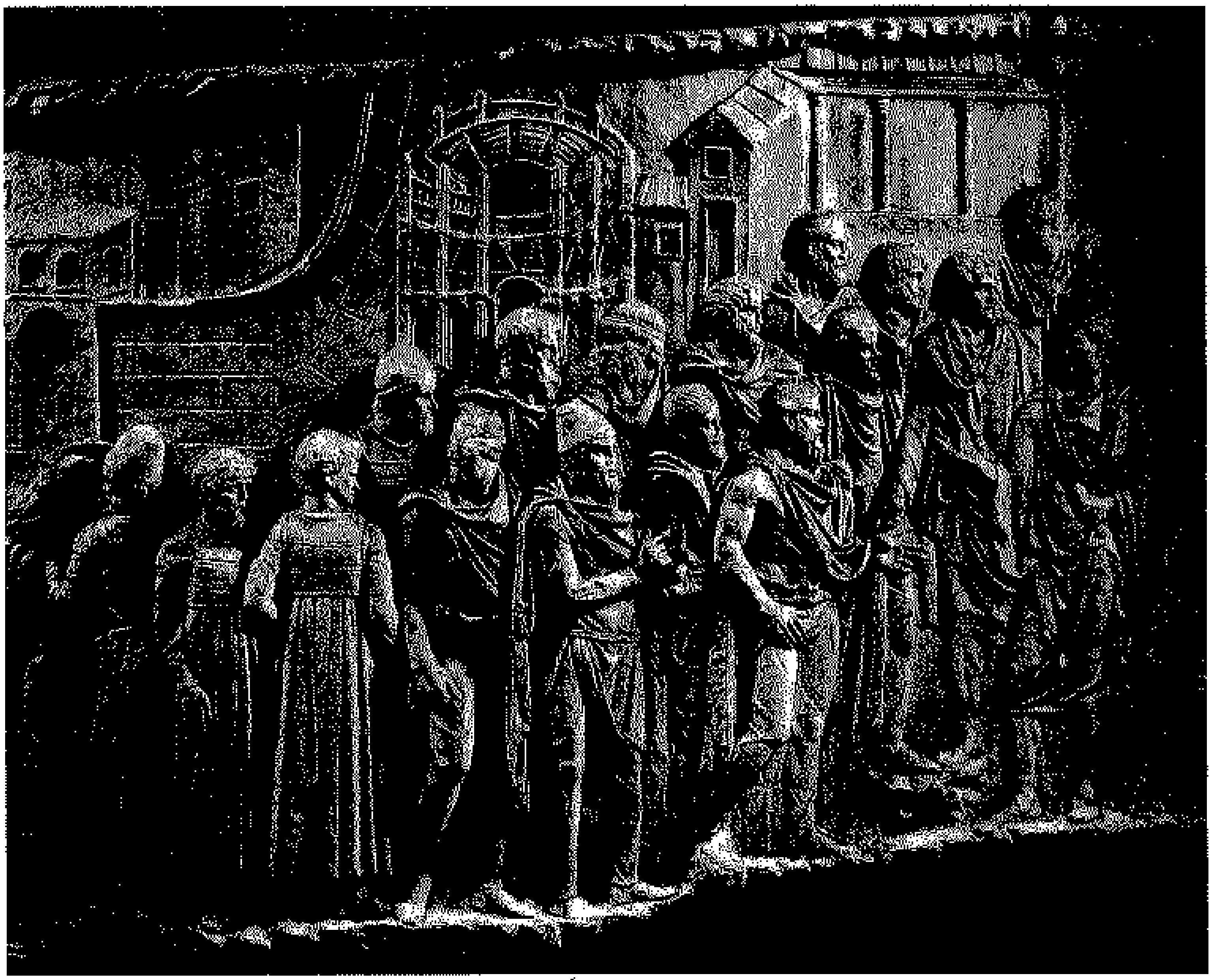
系，使得老兵在划分给他们的土地上定居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虽然老兵被安置在意大利，但为此目的在意大利征收土地是争议颇大的，屋大维在吃了苦头后才了解这一点。从政治上说，公民移民海外并不是很敏感的问题。在共和最后几十年里，授予公民权本身开始被看做是庞培、恺撒和安东尼等杰出人物的赏赐，被用作获取支持的手段或对忠诚的奖赏。当时的作家把罗马权力日益集中在个人手里与帝国凝聚力的增强联系起来。在共和国的最后几十年，罗马的海外帝国通常被想象为有边界的具体的地理概念，或以界碑或以向世人夸耀的语言表现出来。

也是在共和最后几十年，我们发现对于罗马与海外帝国关系的新观念发展起来了。在西塞罗对其弟弟昆图斯提出的有关管理的建议中，对于纠正属民的民族特性表现出了强烈的罗马责任感：抑制希腊人的过激行为和热情，教化蛮人。在撒路斯特对朱古达战争的分析中，他敏感地意识到腐败这一罗马最初的主要弱点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有害倾向，甚至北非外来人中的佼佼者都学会了这种做法。这些看法反映了更为一体化的海外帝国的发展。这种帝国模式往往是意大利人的统一。比如，皇帝克劳狄赞成（有争议地）杰出的高卢人应该有资格参选元老职位。他在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提出的这一观点是整个罗马史的“自然”延续。他提醒他的读者，他自己的家族是萨宾人，可能在共和初期获得了公民权，罗马国家的历史就是不断扩展公民权的历史，最初是在整个意大利，现在又越过了阿尔卑斯山。

在罗马文学中，很容易发现在地方应该保持社会差别的观点。小普林尼在帝国早期一直热心提倡上层阶级良好的行为方式，极力主张他的朋友，西班牙的巴提卡（Baetica）总督卡里斯特里乌斯·提禄保持阶级和等级划分，“因为没有比平等更不平等的事情了”。在罗马的城市精英中，类似“帝国文化”的东西正在出现——一种非同源但有共同追求的文化。同样，在宗教领域，所谓的帝国崇拜为个别地区与罗马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交汇点，现在则部分地由皇帝和他的前任体现出来。

在政治方面，皇帝卡拉卡拉敕令规定授予帝国内部自由男性“普遍”公民权（时间可能在212年），乍一看，这个敕令似乎反映了一个理想化的、统一帝国的完全实现。但是，这个敕令之所以有意义仅因为罗马公民权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确实，随着帝国早期罗马海外公民数量的日益增加，公民权主要不再是参与罗马政治和军事机构。相反，公民权扩展至越来越多的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它在地方作为一种社会区分标志的作用。我们也看到法律条文公开地基于社会地位量刑，这不是偶然的。也有人认为，卡拉卡拉敕令对于排除在外的少数人的关注不亚于对于涵盖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注意。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敕令预示了达西亚人对基督徒的迫害：一种独特的“非罗马人”行为——基督教的兴起，实际上可能推进了一种新的、普遍适用的“罗马人”定义的产生。

从共和晚期开始，古代作家倾向于把罗马公民权直线式的扩展描述为源于罗慕路斯的一种宽容政策。但是，在共和晚期之前，人们是否对获得罗马公民权有着广泛的兴趣，这一点并不是很清楚，早期的授予可能主要出于惩罚性目的。帝国早期的特点是在公民权授予方面既吝啬又慷慨。然而，皇室的被释奴出卖公民权的丑闻可以纠正这种直线解释的观点。



罗马图拉真柱的细部，展示了公元1世纪早期图拉真在达西亚作战期间，面部光洁的罗马征兵官招募不修边幅的非公民到军团服役的场面。虽然他们处于辅助地位，但对那些渴望成为罗马公民的外来者（这里的外来者几乎可以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达西亚人）而言，服军役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奴隶制

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奴隶制很长时间以来即是帝国统治的代名词，帝国统治者有时也被称为奴隶主或（实际上同义）暴君。大约公元前400年，修昔底德在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利用奴役的比喻叙述了早在公元前466年开始的与众不同的雅典帝国的统治。他提到同盟条约的实施以及对反叛城邦的严酷惩罚。由于剧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已经解释了希腊在波斯战争中的成功并且从政治自由（与雅典新生的民主制相联系）对“亚洲”专制主义的胜利这个角度为其后的雅典霸权辩护，这种奴役语言的运用确实具有讽刺意味。

在地中海确立统治以及建立帝国的历史中，“自由”和“奴役”的语言使用得更为频繁和得心应手。当罗马的帝国野心使他们在公元前3世纪末与马其顿王国发生冲突时，他们骄傲地宣扬他们的希腊同盟者享受自由，即依照自己的法律处理事务、没有驻军且无须交纳贡金。根据波利比乌斯在大约两代后所写的有关罗马崛起的作品，埃托利亚人明显被排除于提出这一说法的公元前196年法令条款之外，他们通过条款的表述看出：正在发生的事情与其说是希腊人从马其顿统治下的解放不如说只是更换了主人而已。



一艘罗马三列桨战船的浮雕石刻，作于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没有航海传统，当他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创建海军时，显然由奴隶做桨手。这与希腊人的做法形成强烈对比——在萨拉米海战中取胜的雅典水手是拿着高薪的公民，他们恰好为自己的军事权利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而感到骄傲。



“多米劳斯·朱利乌斯的马赛克”，一块出自突尼斯的晚期罗马的地板，图上是为农村生活场景围绕着的一座乡间设防住所。收获和运输庄稼的农工显然是非洲人，但可能不是奴隶。在帝国的这个地区，最好的收获来自以现金或（更为普遍）实物支付报酬的劳动者。

如果罗马帝国可以被描述为奴隶制国家，那么处在皇帝统治下的罗马本身也是被奴役的对象。我们在这里看到，罗马的对手——或高贵或卑贱的北方蛮族的形象在文学中的发展，他们认识到文明的陷阱实际上是自由的丧失这一事实，这种形象成为那些深思熟虑的罗马人有时感到很不舒服的有关罗马衰落的一种解释。

但是，奴隶制和帝国之间的联系显然超出了比喻的范围，奴隶制本身实际上是帝国的一种重要的副产品。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获得奴隶事实上是罗马在共和国中后期几乎不间断发动征服和扩张战争的主要目的，尽管当时及其以后的罗马文献都没有强调这一点。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罗马人有选择地释放奴隶使之成为公民的习惯，我们可以把罗马帝国的奴隶制看做是将外来人口统一到罗马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

罗马奴隶制的早期历史与罗马国家自身形成的过程有密切关系。十二铜表法是一份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法律条文，共和制晚期的人们将它归功于传说中的罗马建立者罗慕路斯，它规定只有“越过台伯河”，罗马人才能被卖为奴。台伯河在这里代表国家的边界，“奴隶”和“外国人”之间的联系被写进了法律。

十二铜表法对“nexum”（可大致翻译为“债务奴役”）的兴趣提示我们战争仅仅是导致奴隶状态的途径之一。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我们知道大量战俘受到罗马人奴役。对于萨莫奈战争后受奴役的人数，李维提供的数字一度达到11,000人。但是，公元前177年，65,000撒丁尼亚奴隶被出售后，众所周知的撒丁奴隶的廉价使李维的数字黯然失色。

就此而言，要计算意大利或整个罗马帝国奴隶人口的数量以及它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是非常困难的。不过，现代人估计，共和制末期意大利的奴隶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200万或可能300万人。对于奴隶在整个帝国所占的比例，最近的估计是大约在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输入奴隶和“家生”奴隶（罗马人为这类奴隶起了一个特殊的名字“vernae”）的相对比例同样是有争议的。这些比例可能随时在变化。在帝制早期，战争已不像共和制中后期那样是罗马人生活的一个主要特点，但即使在这时，进口奴隶贸易很可能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盗和土匪在奴隶贸易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暗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即罗马统治的局限及帝国从来就不像它的崇拜者所想象的那样和平。根据个案研究很难得出一般性结论。例如，农业中使用奴隶劳动似乎在意大利、西西里、希腊大陆以及靠近意大利的高卢地区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在北非和埃及却不甚普遍。

有人认为，公元前2世纪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依靠奴隶劳动的大农庄的兴起取代了意大利乡村的小农，迫使小农们逃往城市。一些罗马政治家显然已经意识到，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以排斥自由劳动为代价、完全由受到掌控的奴隶在土地上劳作是可能的。盖乌斯·格拉古讲述了其兄长提比利乌斯路经意大利到达纽曼提亚时发生的一件轶事，他发现那里的土地上没有（自由）农民，都是由“外来的蛮族奴隶”耕种。但这是否意味着奴隶制庄园使小农失去土地成为一种全国普遍的现象，这一点还不能确定。最初，考古学家将大地产的发展定在大约公元前1世纪中叶，而不是公元前2世纪。然而，考古本身并不能回答土地所有权或拥有农庄者的身份之类的问题，对埃特鲁里亚南部地区移民模式的调查表明，这里大地产并没有取代小地产。奴隶与自由劳动力在大地产上相互依存，也常为罗马的农学作家所证实。

一般说来，罗马世界的奴隶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社会或经济等级：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生活

质量也千差万别。奴隶们持久的群体意识经常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惧，但很少变为现实。西西里奴隶战争（前136～前132年、前104～前101年）以及著名的斯巴达克起义只是个别事件。

罗马法中关于奴隶的条款主要倾向于支持家长约束和管理自己家庭的权力，强调分散奴隶的经验。恰恰由于群体意识引起的恐惧，以任何一种明显可识的方法来标明奴隶的低级身份并不符合奴隶主的利益。在帝国时期，元老院曾两次否决"奴隶应该穿制服"的提案。

可以断定，在罗马世界，奴隶之间的差别与他们作为一个等级的观念无疑同样重要。比如，很多证据表明有些奴隶可以监督其他奴隶，或甚至实际上拥有其他奴隶。管家有时自己也是奴隶，他们对时常住在外面的地产主的田产负有重大责任。历史学家指出，特别是在家内奴隶和仆役中间，"工作头衔"——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职业升迁"——是区别身份的非常重要的方法。这种情况经常被记录在墓铭当中。在3世纪，法学家甚至为不同等级的奴隶规定了不同的食物和服装。即使在罗马帝国的奴隶们之间，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极为在意这一点。

"天生的奴隶"

罗马贵族的身份可以由是否拥有奴隶来标志。在一个颇为有名的段落中，波利比乌斯援引老加图的一篇演说。老加图说他很惊愕地注意到罗马征服马其顿后，小男孩和鱼子酱的价格比土地和雇佣庄稼汉还要高。他将幼年奴隶和鱼子酱相提并论，强烈地暗示奴隶可能是一种输入的奢侈品，是富人和野心家身份的象征。在个别富有的家庭，奴隶的数量可能达到上百人，他们有不同的工作头衔。记载朱利亚·克劳狄家族被释奴和奴隶活动、生活的铭文证实罗马最显贵的家族的差异程度：水晶玻璃品的管家、花匠、执杯人以及贴身仆人的区分，清晰地反映出家族的富有、喜好及仆人之间潜在的社会差别。

我们已经看到，奴隶的民族和文化起源非常广泛，罗马人试图将奴隶集体作为一个受限制的群体，比如以共同的出身或以地位低下的蛮族为区分界限。古代奴隶制以民族优越论为思想基础，这一点是它与18世纪晚期及19世纪欧洲和美洲奴隶制的最重要区别之一。 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亚里士多德曾反对体质差的人天生是奴隶的观点：他提到，自由人在体力方面经常次于奴隶。但是，希腊人的文化优越感使他们很容易将奴隶与蛮人等同起来。

不过，即便在罗马世界，一些观念有时也表明奴隶在出身和血缘方面与罗马人有别。罗马作家偶尔会把诸如犹太人、叙利亚人称作"天生即为奴隶的人"，这是一种修辞上的夸张，把物化奴隶和臣服帝国统治的人之间加以主观想象的联系。更值得注意的是，奥古斯都授予外国人公民权时采取的谨慎态度以及他为释放奴隶设定限制的明白意图。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奥古斯都认为保持人民的纯洁、不为任何外来奴性的血统玷污是最重要的。

罗马人有时认为他们自己有混合血统——



一幅公元1世纪壁画的断片，出自庞贝，画中描绘了一群正在吃点心的富人。家奴端上食品和饮料，而另一名奴隶则跪着为一位刚到的客人脱鞋。丝毫不讲究礼节表明这是一次日常的家庭聚会，而不是一次正式的宴会。不论奴隶在家中与主人的关系如何密切，当有其他人在场时，都要严格遵守自由人与奴隶间的界限。



一块公元1世纪的墓碑，上面刻着一名铁匠的工具和作坊。铁匠（图中坐着的那位）是自由民，但他的助手的发型表明他是在某次对外战争中被俘获的奴隶。根据两者间的关系推测，铁匠去世时，奴隶大概已经得到释放，但他也有可能被铁匠遗孀当成作坊设备的一部分卖掉了。

出自奴隶和各种外国人、包括特洛伊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并且将其看做是一种独特的、有时又非常有益的罗马社会的特点。但在奥古斯都时期，我们见到有些人仍强调基于血缘的罗马身份观念，这可能是对公元前1世纪大规模政治动荡所引起的身份危机做出的回应。上面引述的段落可能让我们感到有点寒心：几乎不可避免地使我们联想到现代种族主义以及它对血缘纯洁的重视。然而，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把奥古斯都的意图与现代种族主义的观念区别开来。从更为宽泛的上下文联系看，奥古斯都意在限制而不是停止授予罗马公民权，这段话总体上是强调外国人获得公民权资格首先以文化标准来衡量。

奴隶的释放

罗马人有选择地释放奴隶并授予其公民权的做法在希腊人看来是他们文化中独特的、惊人的一面。被释奴的百分比很难确定，但释奴无疑是被大肆宣扬的罗马社会的一个特色。对被释身份的满足体现在铭文中，获释者在幸存的铭文中无疑是被频繁提到的对象，主要因为他们有理由庆祝他们新获得的身份。在一名死者的遗嘱中，释放奴隶的做法是他生前慷慨的真实写照，也是如何使释奴成为对主人和奴隶身份声明的一个例证。有人认为，大肆宣传的自由的可能性作为一种社会约束形式发生作用，促进奴隶间的合作和善行。

我们必须将释奴的做法与庇护关系联系起来考虑，也把它放在一种社会背景下考虑，这个社会甚至对公民间的某种政治参与强加以法律的限制。一名被释放的男奴或女奴继续对其从前的主人负有义务，这可能是得到法律程序认可的最后一招。正是这种关系促进了社会一体化（甚至向上的流动）也突出了被释奴的有限地位。可能最重要的是，被释奴不允许担任地方或罗马的政治官职，虽然——也是很重要的——他们的后代有这种权力。禁止成为地方议员对一些非常富有的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有趣的是，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我们发现意大利发展起了一种主要是宗教性的官职——奥古斯塔利斯（Augustales），即皇帝为其保护神献祭时携带的随从。被释奴不仅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而且是它的主要承担者，我们发现奥古斯塔利斯首先利用他们的身份参与捐献——这是城市精英的一种重要活动——好像它是一种行政官职。奥古斯塔利斯的子孙成为地方议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当然，释放的可能性并没有使奴隶的世界变得那么美好。释放实际上强调所有奴隶生活的那个世界的专制本质：他们得到的奖惩取决于主人或女主人一时的兴致。那些在主人身边工作的奴隶——比如助手、秘书、保育员或医生更可能体验流动性及其他可用的社会、地位优势，但甚至在这些情况下，密切的关系也有其两面性，家内奴隶同样会招致男主人或女主人的愤怒。在一则非常有名的帝国早期的轶事中，皇帝奥古斯都曾插手挽救一名幼年奴隶的生命，因为他打碎了一个玻璃杯，而他的主人瓦狄乌斯·波里奥非常骄纵，恐吓这名奴隶要将他喂鱼。

一般来说，被遣到矿井或磨坊的奴隶，包括某些农业奴隶，获得释放、特免权甚至公正、人道待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与家内奴隶相比，我们对这类奴隶的了解必然要少得多，因为家内奴隶与主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在罗马文学中有突出反映。虽然古代世界没有废奴主义者，但多少有些感伤的现实主义明显反映在某些罗马文学中。例如阿普雷（Apuleius）的《变形记》，描写了一个被魔法变成驴的人在罗马帝国所做的一次奇异旅行。驴的旅行和命运的变迁把他带入了下等人的生活，比如悲惨的奴隶们工作的磨坊，他们衣衫褴褛，身上是鞭打留下的伤痕，前额印着烙印，脚上带着镣铐，眼睛几近失明。这种奴隶为小说的情节提供了背景，但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境遇被夸大了。从农业著作以及小普林尼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大量



一块发现于法国的公元3世纪罗马马赛克地板上的两幅图画，画面上展示了工人们收获橄榄（左图）和苹果（右图）的情景，这些工人几乎可以确定是奴隶。无花果和橄榄树是有利可图的事业，仅在一年中的某段时间需要密集的劳动。这些奴隶可能属于土地所有者，或也许只是他在收获季节租来的。

带着脚镣、生活在非人的、监狱一样环境中的农业奴隶。这样的奴隶与那些受到更人道待遇的奴隶相比，有着危险、难于管束以及效率低下的坏名声，这并不奇怪。同样让人感到寒心的是"会讲话的"铁项圈的发现，上面刻着说明，让发现者将奴隶交给合法的主人——一种非常不舒服、象征地位低下的狗套。

城市和乡村

在罗马世界幸存的证据中，家内奴隶比非家内奴隶更为常见（由于他们与主人的密切关系），同样，城市贫民往往比乡下贫民更为多见。前者一般被社会地位较高的罗马评论家视为非常讨嫌的群众，为了保持安定，必须对他们加以安抚。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他们受到了日益密切的关注。狄奥·克里苏斯托姆于1世纪末至2世纪初作于比提尼亚的《演说集》和他的同代人普卢塔克的《道德篇》都生动描述了希腊城邦内部潜在的社会冲突的严重性，这种冲突的危险苗头引起了罗马官方的注意。但是，这种厌恶主要是富人和穷人在城市生活中密切关系的反映。这种密切关系是通过大规模地捐献（例如富人捐献的食物、油或捐助的比赛）以及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之间的互利却又非常不平等的关系（包括地主和佃户或雇主和雇工）形成的。

乡村社会对于富人宣扬他们的进步和成功无疑并不是一个理想场所；同样，各类群众性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但我们不应低估古代世界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相互联系。农村生活的情景对罗马贵族有着巨大吸引力。共和早期，在田间耕作的辛辛那图应召挽救罗马的故事，对于以节俭、勤劳及农耕和军事才能之间存在重要联系等价值观为基础的合格领导而言，是非常真切的，在文化上具有特殊的真实性。古代罗马幸存下来的一些农业手册，通过指出农耕和农村生活的可行性，都不同程度地试图从理论上阐明（由有闲的贵族所写，主要也是为他们所用）这种生活的重要思想。例如，老加图的《论农业》通过赞美农民兵的传统道德和军事价值，在前言中对农场的购置、所有权以及管理方法提出了建议。在这一过程中，他将读者的经验——未来相对较大的地产所有者——与小农的经验相提并论。这导致一些有趣的矛盾：他希望他的读者通过给土地施肥和为病牛准备药品参与农业，但又想象他们来去不定，建议把他们的产业交给挑选出来并加以严密监督的管家手里。对那些有可能读到加图建议的人，耕作主要还是一种爱好。

更具体地说，共和时期罗马军团兵源的招募使得农田及其占有者始终成为一个热点政治问题。问题是如

何增加那些达到了以土地所有为衡量标准的军事服役要求的最低限额的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各种办法，包括殖民地的建立和提比利乌斯·格拉古重新分配非法占有的公有地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据文学材料记载，在后一种情况下，乡下人是提比利乌斯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们纷纷涌人罗马支持他的法案。

乡村关系

在个人层面上，应注意的重要之点是较富有的农民与较贫穷的农民之间以及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之间个人的社会关系在乡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正是这种关系对罗马世界的繁荣（有时仅仅是为了生存）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有关这种关系的幸存文献使我们对农村生活有了更多了解。事实上，古代世界的大部分材料仅在他们与罗马贵族的关系方面才对城市贫民（或也对乡下贫民）的“真实”生活感兴趣。盖伦，一位2世纪的出自帕加玛的医生，对乡下穷人饮食的考察是明确、科学地关心环境问题的个别例子。比如，盖伦观察到，在饥荒时期，贫穷的乡下人以橡实为食，一般情况下这种食物只用来喂猪。他还发现在橡实的做法上，各地有所不同。

大部分幸存下来的文献反映出富人和穷人间广泛的社会关系。这包括上面提到的以农业手册形式出现的文学证据。这些手册中明显的说教语气体现出土地所有者和劳动力之间多少有些僵化但从经济上合理的关系。加图建议只让奴隶穿很少的衣服，减少生病奴隶的食品数量。瓦罗建议在危害身体健康的地方利用临时的自由劳动力工作，因为他们的死对土地所有者而言远比死一个奴隶的损失要小。

在小普林尼《书信集》中，对佃农的态度更具有家长式作风：他描述自己如何控制听众们喋喋不休的抱怨，同时显示自己令人欣赏的优雅、有闲的作风，并且看上去很恼火地考虑订立新的契约，说明他们欠他的巨额债务。

普林尼似乎渴望把自己描绘成那个时代的典型元老，他的家长作风反映了皇帝图拉真的公众形象。图拉真所谓的食物计划实际上是试图为培养地产主们的社会责任感提供某种重要的凭证。

三个文献为他的计划提供了证据，一份来自意大利北部的瓦雷亚，一份来自本尼温图姆附近的利古利亚巴贝尼（Ligures Baebiani），另外一份来自罗马南部的弗兰丁姆。这些文献记录了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数量，他们获得了约相当于他们财产价值百分之八的帝国贷款，并长期为贷款付百分之五的利息，这些利息作为补助用于当地儿童的抚养。同罗马世界所有的救济一样，这些补助好像没有对家庭经济情况进行调查：接受者的道德价值观似乎比他们的实际需求重要的多，我们可以想象在确定接受者身



罗马公民鲁基乌斯·阿布提乌斯·弗斯图斯（Lucius Aebutius Faustus）的纪念碑，发现于意大利。铭文下方的手工雕刻图案表明弗斯图斯是一名土地测量员（一种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标志是交叉状的量尺）。他在军队里学会了这种技能（两把剑表明他曾在军队服役）。从事这种职业，经常要解决边界争端。

份时，保护关系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出自埃及奥克苏宇楚斯的早期帝国文献有时提到一种与农业手册的理性主义或图拉真时代家长作风迥然不同的关系。比如在公元前3世纪，一名叫阿芬基斯（Aphynchis）的人写信给一位在亚历山大里亚，名叫阿比斯（Apis）的长期在外的地主，提醒他曾和阿芬基斯的儿子关于租一些土地种植动物饲料进行过一次谈话。阿芬基斯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太忙，不能安排租地事宜，所以阿比斯或他的代理人有必要来一趟处理事宜；阿芬基斯还提出他可能考虑到的其他想法，但偏向于租种阿比斯的土地。

到目前为止，我们集中讨论了农村社会中的富人和穷人的关系。事实上，对一些个案的研究可以证明这种关系在古代晚期的农村社会发生了强烈的两极分化，这是罗马统治下富人所具有的保护人地位的一种体现。但是，农村的社会关系通常当然比这种程式化的区分表现得更复杂和多样。大部分农村家庭经济一开始可能非常分散。比如，从上面提到的食物计划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社会上较为富有的成员所占有的土地一般被分成许多小块，这种做法促使包括几个管家和佃农在内的各种复杂关系的产生。

甚至在讨论某一个大地产时，罗马农业手册的作者通常也设想奴隶和各种自由劳动力并存，反映了农业对劳动力变化不定的需求这一事实。埃及的“希罗尼诺斯档案”（“Heroninos Archive”）表明在地主阿庇安努斯（Appianus）的地产上出现了自由劳动者，他们根据各种契约劳动，始终构成仆役和依附民的基本成员。

在不甚富裕的农村居民当中，我们必须想到雇佣和义务的复杂类型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多样性，甚至在土地所有者中间，小块土地的转让也是罗马地产记录中经常出现的情况。这类土地通常只有小花园大小，甚至称不上是维持生计的农场。可能正是这种惯例而非例外才使这类土地所有者在农村经济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土地所有者、临时劳动力和佃农的角色经常是交叉的。

我们已经提到佃农在富人地产中的重要性，但也应注意“科洛尼”（“Coloni”）这个术语所涵盖的范围，这一点也很重要。“科洛尼”有可能既包括为偿还租金或部分收获物而耕种土地的人，也有我们称之为承包商、奴隶管家和自由劳动者的人。我们因此可以想象不同佃农之间在不同经济状况下多种多样的命运，从富有的主顾到欠下巨额债务、依附于债权人的弱势人群，涵盖了整个社会和经济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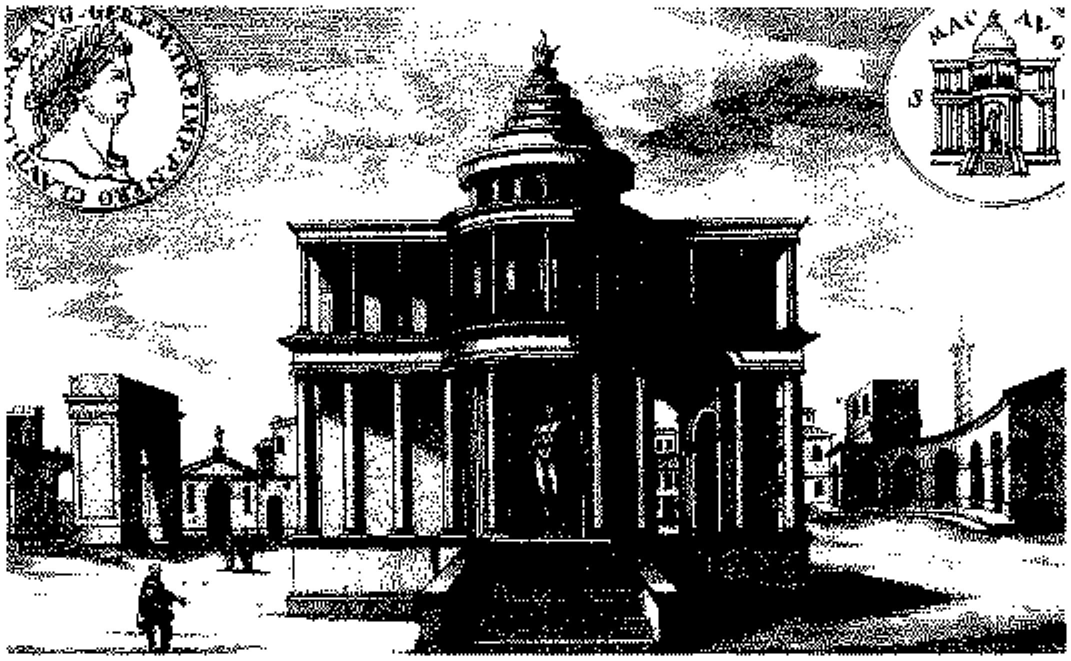
第七章

帝国的都城

约翰·古尔斯顿　　海泽尔·多奇

帝国的都城

罗马由单一城邦向洲际帝国的发展直接体现在城市本身的规划上。这个大都会是贵族们向着不断增长的人口炫耀的舞台。随着居民数量的增加，他们对安全（人身的和精神的）、饮食、住房、娱乐和管理的要求通过新的建筑形式得到了满足。罗马在海外获得的成功丰富了首都的艺术品和经济资源。元老家族和皇帝都以在整个城市的纪念性庙宇、凯旋门和记功柱上如实书写铭文的方式宣扬他们的成就。工业革命以前，西方没有其他城市可以在规模、人口数量和豪华的装饰上与罗马媲美。罗马城是罗马世界王冠上的宝石，几乎到现在还是城市效仿的对象和城市建设成就的典范。



一件刻在一枚钱币背面的18世纪的德国雕刻作品，画面是一座罗马神庙的重构。庙宇是城市的一种主要装饰品，不仅增加了它的审美情趣，也强化了它在精神和（隐含的）政治方面的权威。

文艺复兴以来的古代城市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某些特殊史料的帮助。古代钱币上刻有各种纪念物。一幅雕刻的大理石地图碎片于16世纪为人们发现，上面包括整个城市建筑的基本规划。这幅所谓的罗马城市图附在韦伯芗和平庙的一面墙上（面积为18×13平方米），大约作于205年至208年，虽然仅有百分之二十以碎片或古代图样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但它确实包括了许多代表性建筑（圆形大剧场、大竞技场）以及地点明确但还未发掘出来的纪念物（克劳狄庙、埃米利亚库房），尚未得到定位的公共建筑、庙宇、房屋、商店、花园、街道、喷泉、引水渠和河岸。两份4世纪下半叶的目录（地名目录）列出了集中在奥古斯都14个区内的各类建筑和纪念物，包括方尖碑、骑马雕像和巨形雕像。罗马是一个铭文极为丰富的城市，大约有三十万片铭文幸存下来。中世纪以来，艺术家和建筑师对古代建筑进行了研究和记录，其中很多后来遭到毁坏。从19世纪40年代晚期起，摄影师成为积极的记录者，他们在罗马成为意大利的首都（1870年）并在一次建筑爆破改造之前拍摄了这座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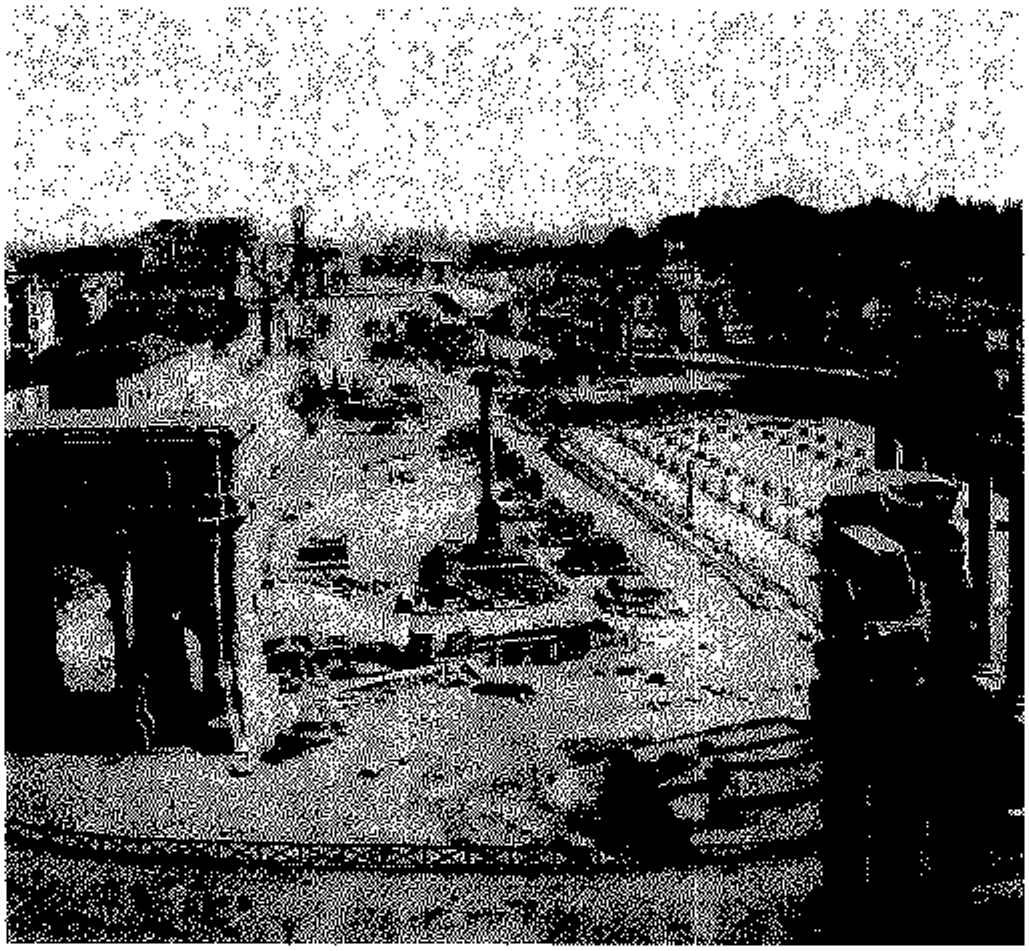
罗马考古也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古代城市经常被大火焚毁，然后重建。台伯河的定期泛滥将古代建筑埋在河中淤泥之下，深达数米；为获得理想的建筑空间，人们将山腰开辟为台地，这也掩埋了很多作为护墙的早期建筑。两个过程都使建筑物埋藏在土层深处且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最引人注目的是保存在图拉真浴场下拥有丰富壁画的尼禄金宫（the Golden House of Nero）的侧厅。众多人口以及土地价格的上涨促使人们修建高层建筑，并且向下挖掘，深入到较软的石灰岩。地下墓葬或地下墓穴仅是这一过程的最为著名的产物。

罗马遗址

古代史料经常把罗马的自然特点看做罗马后来伟大的原因。城市发展本身有时会使遗址发生极大的改观，但重构最初的景象是可能的。罗马由位于台伯河水位最低处（现代特维里）的一个沙洲岛发展起来，河两岸，特别是东岸紧靠着一片山岗。在这些山岗中，帕拉丁山势陡峭，易于防守，而且有足够的空间容下大量的移民。卡皮托林山俯视河水流过，注定要成为城市的卫城和重要神庙的建筑地点。城市扩大后，合并了其他几座独立的山岗——阿芬丁（Aventine）、维里安（Velian）和卡里安（Caelian），海拔升至大约五十米。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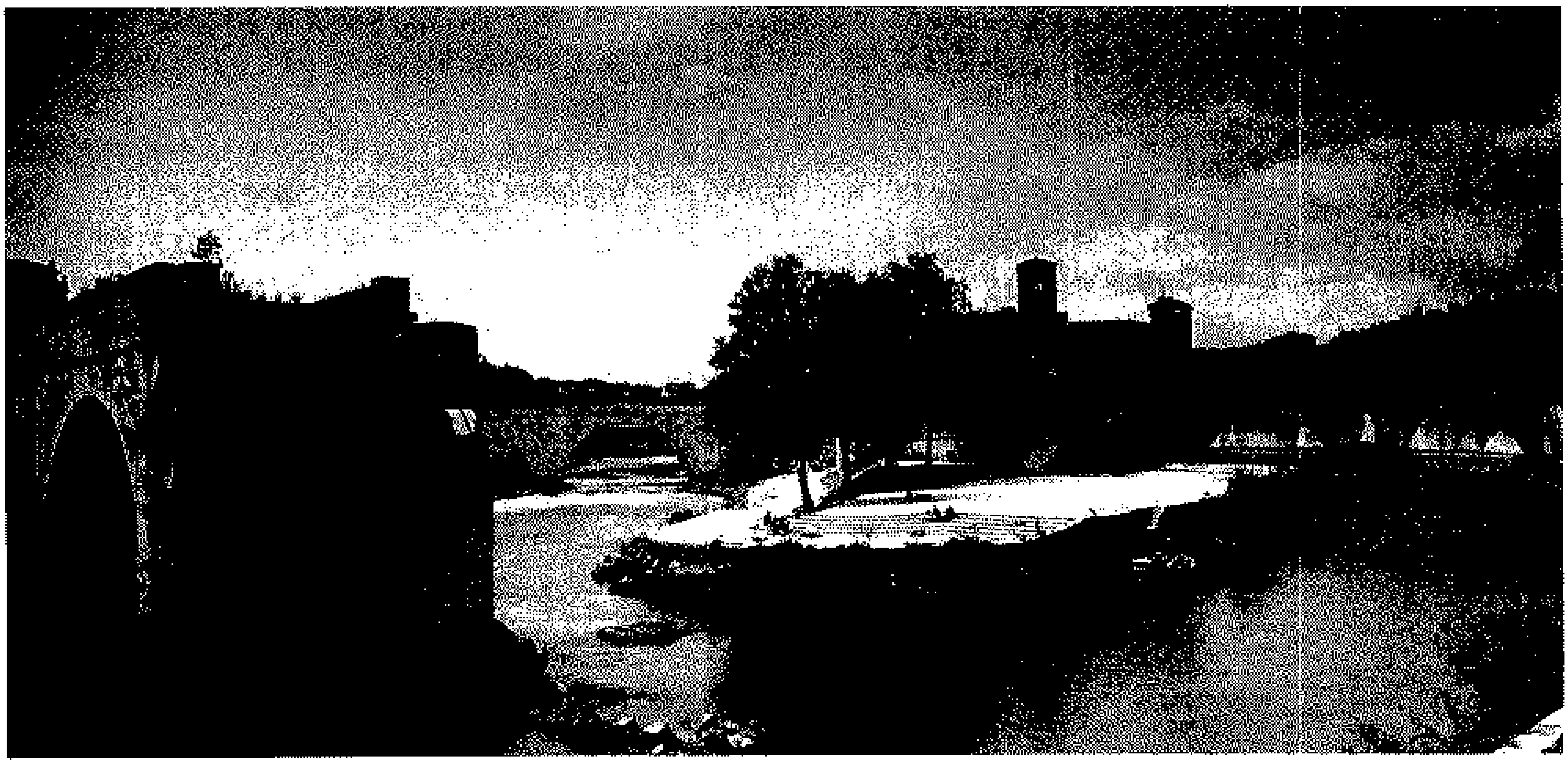
纳尔（Quirinal Hill）和维米那尔（Viminal）等山岗也被合并，城市达到东北面的厄斯奎林高地，海拔约为六十三米。这些山岗最初林木茂盛，如果不是以后几个世纪的削平、开垦和挖掘，它们会生长得更繁茂。同时，山间洼地的地平面也逐渐升高，这是河水泛滥的自然结果或人为填充的结果。卡皮托林山的北面和西北面是台伯河冲积平原的一部分，三面为蜿蜒曲折的台伯河所环绕。在这一地区的中部，是众所周知的马尔斯战场（古代的马提乌斯校场，现代的马里奥广场），它是传统召集城市民兵的地方，其所在的21世纪的地平面比1世纪的街道高出了大约八米。

古代作家注意到通往意大利中心的台伯河谷有利于往来和贸易，尤其是本地主要日用品——盐的贸易。但是，春天亚平宁山上积雪融化造成的洪水是在河谷中居住的主要不利条件。台伯河水流湍急且流量大，早期罗马很难架设能够长久使用的桥。对桨手和水手来说，在河中航行也成问题，所以通常由一群人合力将船拽向上游。城市部分地区地势低洼，容易受到洪水侵袭，这意味着早期不很坚固的建筑物即便没有被洪水冲垮，也会逐渐损坏。公元前193年，城市低洼部



一张罗马广场的摄影图片，摄于19世纪60年代。这幅老照片是从卡皮托林山顶拍摄的，展示了老城内广场的中心。公元4世纪的公民会轻而易举地辨认出上面的景物。

罗马最早在台伯河上架设的桥是木质结构，屡次为洪水和暴风雨毁坏。第一座石桥是埃米里乌斯桥（画面中的前景）（建于前179年和前142年）；自从它在1598年最后倒塌后，人们称之为“Ponte Rotto”（断桥）。台伯岛（画面中间）由塞斯提乌斯桥（左面）和法布里库斯桥（右边）与城市其余部分相连，后者是罗马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桥（建于前62年）。



分遭遇洪水，致使许多建筑物倒塌，第二年，又有两座桥被冲走。公元前23年，苏布里奇乌斯桥在四十年间第二次被毁。三天里，城市变成了泽国，坐船行走比步行容易得多。217年，城市中心罗马广场上的市民被洪水冲走。

罗马的地理位置也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城市的桥梁连接了埃特鲁里亚西北和希腊东南部之间的大陆，罗马距离海岸线如此之近，使它（最终）能够控制相应的海路。城市在台伯河边所处的位置有助于罗马人控制他们的上游邻居，例如维伊人和菲顿人。以后，随着道路和殖民地的发展，罗马中途向下游延伸至意大利半岛，使它有可能向北部和南部扩张。一旦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意大利就变成了整个地中海的中心。另一方面，当2世纪晚期帝国北部边境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时，罗马的地理位置就不如米兰这种偏北的中心城市方便，也比拉温纳更容易遭到侵袭。它的位置实际上阻碍了城市的繁荣，降低了城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王政时期的罗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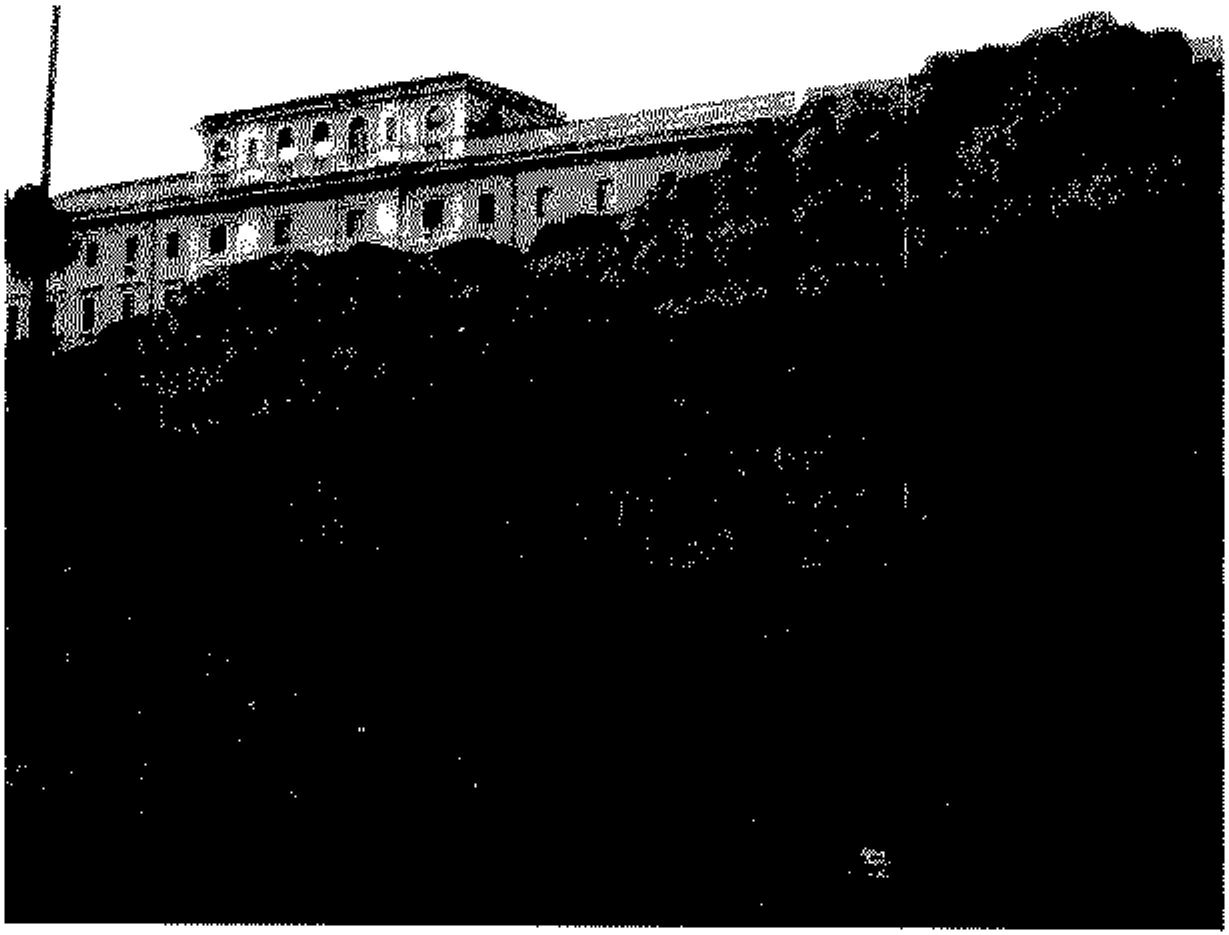
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处于王权统治下的罗马形成了一个以帕拉丁山为中心的统一的城市实体。最初，帕拉丁构成了一个设防区，外围是公墓。这时期在山的西隅还可看到低于地面的小屋。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东北面的山谷被排干并且填充大量土石（8万立方米）提高了地平面，成为祭祀和经济活动中心——罗马广场。圣殿及国王、社会贵族的住所集中在广场周围。商业活动逐渐转移到河岸附近的牛市（Foram Boarium）和蔬菜市场（Form Holitorium)，这两个地方更便于陆上供应，而且远离贵族区。随着这里商业的发展，包括商店以及献给旅行保护神，特别是赫丘利的庙宇在内的商业性建筑也发展了起来。卡皮托林山成了城市主神的聚集地，也是纪念胜利的展示地。帕拉丁西南面的山谷就地辟为马术比赛及其他体育比赛场所，为观众准备了通道和座位，这里逐渐发展为具有纪念意义的大竞技场。

共和时期的罗马

由于缺乏公元前200年以前的文字史料，学者们主要依靠考古材料获取共和早期罗马发展的信息。公元前7至6世纪后，埃特鲁里亚文化统治着城市。公元前5世纪几乎没有什么重要建筑，丰富的随葬品也有所减少。家族纪念的重点重新放在了庙宇的修建上。公元前4世纪的主要事件是罗马的意大利战争、拉丁人的征服、埃特鲁里亚据点的建立以及更多公共建筑的出现。公元前396年维伊人投降后，罗马紧接着受到高卢人的劫掠（大约公元前390年）。不管这一事件造成的损失如何，它对未来罗马人有关北方“蛮族”观念的形成都有深刻影响。它也刺激了新的防御工事“塞尔维亚墙”（Servian Wall）的修建。

李维记载，遭高卢人劫掠后，罗马城很快恢复了元气，但是没有诸如希腊化时期建立的整齐的街道网这样合理的规划。公路循着山谷或山冈的等高线延伸，所以城市正如西塞罗描述的那样“耸立在山冈上，矗立在河谷中，房屋高高地悬挂，道路崎岖难走，巷子狭窄不堪”。公元前3世纪罗马的疆域达到北意大利和西西里，使南意大利的希腊文化引起了罗马贵族的密切关注。这个过程在公元前2世纪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那时爱琴海周边的战争把更多的希腊人直接带到了罗马城。截至公元前1世纪同盟战争之前，每一次冲突都伴随着人口的流入，包括来自意大利的难民和海外奴隶。随着人口的迅猛增长，罗马土地价格上涨，人们迫切想要建立高层建筑。高密度的简陋住宅是穷人的立命之所。城市人口的增长引起了富有的元老贵族的警觉，他们采取各种措施驱逐拉丁居民，将人口迁往殖民地以及遏制“外来”崇拜和习俗。

2世纪出现了更为坚固的石头和混凝土建筑、新式石制门廊、桥和铺设的街道。新的建筑类型也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是有顶篷的市场会堂（例如公元前179年的埃米利亚会堂）、记功柱和凯旋门。在墙外阿芬丁南部平坦的空地上——这里是著名的“商业中心”（Emporium）——建起了如埃米利亚（Aemilia，公元前193和公元前174年）和霍里亚加尔巴那（Horrea Galbana）等大型河边食品库房。1世纪，更大的建筑物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是在苏拉、庞培和尤里乌斯·恺撒等军事将领的主持下修建的，他们将帝国的财富用于私人工程。



所说的“塞尔维亚墙”的一段，现伫立于斯塔吉奥内·狄·特米尼（Stazione di Termini）旁。4世纪早期修建戴克里先浴池挖掘出的土石堆使这道墙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或是在最后一位国王时期或为纪念新共和国的首次“成功”，一座奉献给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的巨大神庙在卡皮托林山上建了起来。神庙采用埃特鲁里亚式设计，它的装饰性屋顶赤陶由引进的埃特鲁里亚艺术家完成，它的石基（高出来的基座）长62米，宽53米，在1世纪前的数次重建中一直保持着这个规模。在这座卡皮托林三神庙中献祭是凯旋仪式的最高潮。这座神庙一直为遍及广阔帝国的罗马殖民地争相模仿。

共和国建立后，罗马贵族接管并分割了国王的司法、军事和宗教职能，这种情况促进了罗马广场周围诸如王宫（Regia）和库里亚这类市政和宗教建筑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广场开放的空间日益成为精英活动的舞台，比如公开演说、为某些人树立雕像以示公开的敬意、举行葬礼及相关的仪式、演说、焚化和竞赛，而市场的职能却越来越淡化。

长期存在的崇拜对象以建立新庙宇的形式得到了永久纪念，与一些重要事件相关的新的纪念物又不断增加，例如瑞吉鲁斯湖（Lake Regillus）战役（约公元前496年）后建立的卡斯托尔和波鲁斯庙及公元前367年贵族和平民制定出新的政治合作方式后建立的和平庙。罗马富人的住宅簇拥在公共建筑附近、周边和后面以及帕拉丁山坡上，以至于他们能够接近政治生活——更有利的是为了能处在凯旋路线的两侧。到公元前4世纪，阿芬丁山成了平民的活动场所。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平民集会的中心不再是罗马广场，而是城墙外卡皮托林山下靠近河边的一块空地，人们称之为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

外来神的进入是罗马扩张的一个方面，例如来自阿尔班山的狄安娜（Diana）和来自维伊的朱诺·雷吉那（Juno Regina），都供奉在他们位于阿芬丁山上的庙宇中。由于瘟疫，公元前431年后，在河边建立了阿波罗神庙（阿波罗·梅迪古斯庙），公元前291年，在台伯岛上为治愈之神阿斯克列庇奥斯（Aesculapius）建立了神庙。在汉尼拔威胁城市的黑暗日子里，罗马人把对大母神（Great Mother）的崇拜从小亚带到了帕拉丁（参见第十一章）。

另一方面是新的外来建筑材料的进口，这些材料的使用象征着罗马权力的扩张。公元前1世纪期间，精美的白色大理石源源不断地从希腊世界运到罗马。每一次重建后（经常是在火灾之后），神庙的规模都有所扩大，而且由于新材料的使用变得很“新潮”。原来较小的墙基为更大的墙基包围，很像俄罗斯的玩偶。

成功的罗马将军应该充实国家的金库，犒赏他们的士兵，增加他们的家族产业，而且利用战利品美化城市也成为一种惯例。战争之后经常会兴修新的引水渠，例如击败皮洛士后修建的安尼奥维图斯（Aqua Anio Vetus）水渠（前272年）及公元前146年洗劫迦太基和科林斯后修建的马奇亚水渠。不过，最具特色的纪念物是“记功”庙，经常建在战前许下的诺言实现之后。这些神庙被献给与战争和某次胜利相对应的神，希望保佑成功者和他的家族获得不朽的荣誉。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神庙趋向于主要沿着凯旋路排列，有时最终建在多重庙宇的周围，面对着公共空间。为了靠近军队集合的地方，公元前300左右，一组神庙甚至出现在了马提乌斯校场中央，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为拉哥·阿根提那（Largo Argentina）。

凯旋仪式是罗马国家的一项制度，它对城市的建设有最大的影响。共和时期，凯旋式是元老院授予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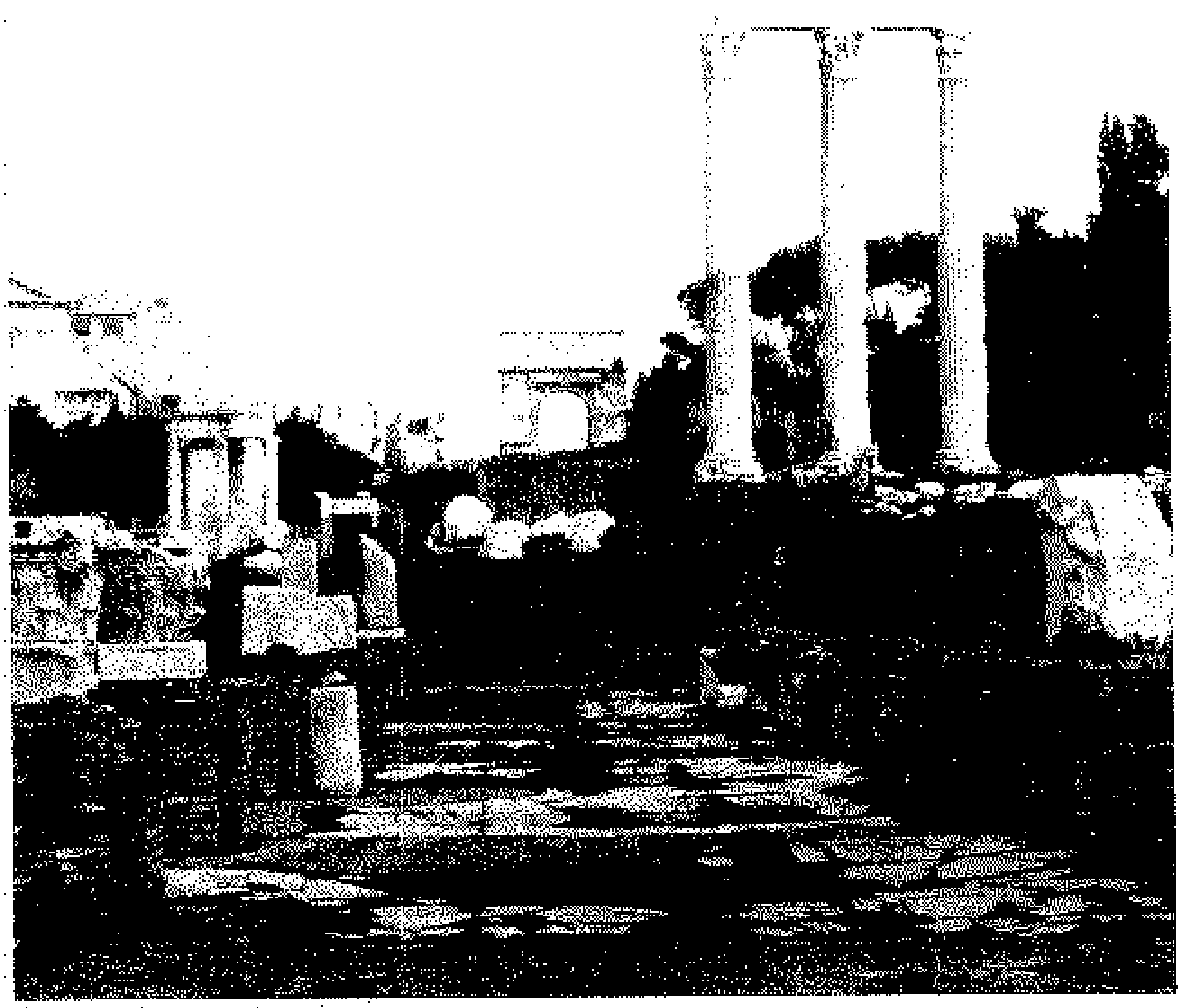
罗马广场

罗马广场是公共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罗马国家最重要的一些建筑物就建在这里。这个地方最初是帕拉丁和卡皮托林山以及厄斯奎林和奎里纳尔低坡间的一个沼泽谷地。公元前7世纪中叶，人们在这里填上土石，使它的地平面升高了两米，这里才作为公共场所发展起来。显然这是为抵御台伯河洪水所做的一次尝试。马克西姆下水道也是此时挖掘的。水道穿过广场，排干了厄斯奎林和奎里纳尔山坡以及谷地的积水，经过瓦拉布鲁姆山谷（Velabrum）和蔬菜市场（Forum Holitorium），排入台伯河。到公元前7世纪末，人们铺设了广场，建起了第一座议事会和元老院。议事会的边缘是一个重要的圣所拉比斯尼哥（Lapis Niger）①，因为利用黑色石头铺路而得名，罗马人称其为沃尔坎的圣所。公元前6世纪早期的还愿物品确定了出现的时间，一根石柱的基座幸存下来，上面有古风时代的拉丁铭文。

王权被推翻后，建立了许多重要的宗教建筑，著名的是公元前494年的农神庙和公元前484年或483年建的卡斯托尔和波鲁斯神庙，两座建筑后来多次重建。原来处于周边地区的贵族住宅逐渐让位于更多的公共建筑。圣路——胜利的将军在凯旋仪式上走过的最后一段路——贯穿广场。公元前318年，盖乌斯·马尼乌斯在广场东北和西南面的店铺上修建了门廊和阳台，它们不仅使建筑更气派，而且提供了新的观赏设施。

共和时期，广场也是贵族举行葬礼的传统地点，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起，葬礼经常包括角斗比赛。但是，这种炫耀高贵身份的做法有时可能失去控制：公元前52年，元老院被克劳狄火葬时的柴堆烧毁，波西亚会堂也随之被焚毁。

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广场上建起了罗马第一批会堂，波西亚会堂建于公元前184年，弗尔维亚和埃米利亚会堂建于公元前179年，圣普罗尼亚会堂建于公元前169年。因此，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广场已为重要的建筑和神庙包围。下一个重要工程由独裁者苏拉于公元前80年代主持修建。这个工程将地平面抬高了大约一米，中心地区也被重新铺设。20世纪60年代挖掘出的地下长廊可能也是此时修建的。重建的元老院位于广场的北面；在卡



顺着罗马广场中部向南看到的景象。右边是尤里亚会堂的遗迹，远处是三根重建的卡斯托尔和波鲁斯庙石柱。

① Lapis Niger 的拉丁文原义是“黑色的石头”。——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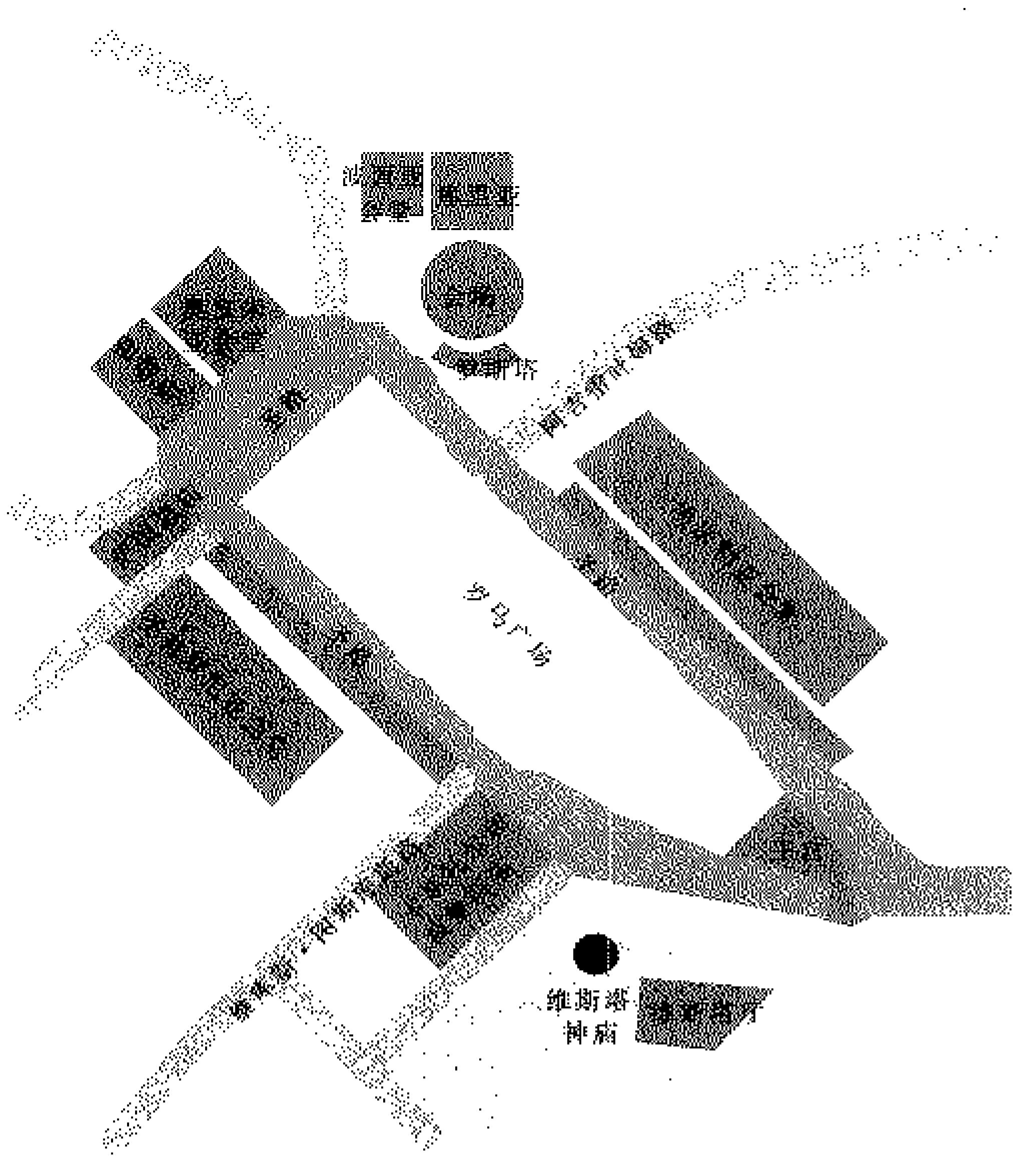
皮托林山坡上，一座巨大的砖石建筑拔地而起，它可能是国家档案室（Tabularium）或造币厂。

尤里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广场呈现出罗马时代晚期依然保持的布局。恺撒开始重建库里亚和南边的一座大会堂——尤里亚会堂（Basilica Iulia）。二者均在奥古斯都时期完成，他又在东南角增建了圣尤里乌斯神庙，侧面是新凯旋门。为纪念他战胜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9年兴建了阿克提亚凯旋门，所说的帕提亚凯旋门建于公元前19年，标志着罗马人夺回了从前被克拉苏输给帕提亚人的军标。铭文记录了从罗慕路斯到奥古斯都所有凯旋者的名字。演讲坛“罗斯特拉”（Rostra）从议事会旁边移到了广场西北角，占据了一个交点，皇帝可以在此向广场上的罗马民众发表演说。因此，开放的空间完全为皇帝或其家族和派系成员建造或重建的建筑物包围。

283年的一场大火使戴克里先借此创造了类似的效果，他重建库里亚、尤里亚会堂和演讲台以及建立自己的记功柱。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挖掘罗马广场时，如预想的一样，广场上群集着最晚修建的展示纪念物、君士坦丁一世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骑马雕像基座以及与4世纪晚期到5世纪早期的皇帝相关的铭文。最后一次增建的是弗卡斯柱，时间上要晚得多，这根建于4世纪，高50罗马尺（15米）的柱子，在608年再次用于纪念那位将万神殿赠予基督徒（作为他们存放自地下墓穴中出土的教徒遗物的储藏室）的皇帝。选择这个地点是为了人们可以沿着阿吉雷吐姆（Argiletum）路观赏它。

将领的一种荣誉，在某段时期里，凯旋式几乎每年举行，反映了帝国的扩张和个别元老的野心。它实际是士兵、敌方将领及其他俘虏、战利品、公告牌、描绘战争事件的巨幅镶框画以及坐在四马战车上的成功将领列队通过城市的一次盛大游行。仪式可能举行很多天，比如公元前168年埃米利乌斯·保卢斯（Aemilins Paullus）在皮德纳（Pydna）战胜马其顿的柏尔修斯（Perseus）后举行的凯旋仪式，对此波利比乌斯有详尽描述。

随着时间的发展，凯旋式的路线逐渐固定下来。起点是马提乌斯校场，那里有地方集结相关人马；仪式的终点是朱庇特·卡皮托林（Jupiter Capitolinus）庙。在起点和终点之间，游行队伍经特里姆法利斯门（Porta Trium Phalis）进入城市，经牛市和大竞技场登上帕拉丁和卡里安山间的谷地，越过维里亚山脊到达罗马广场。如果敌方将领没有得到赦



公元前2世纪早期罗马广场平面图。共和国建立后，很快修建了很多公共和市政建筑以供贵族使用，他们操纵了从前由国王及议会履行的各种职能。随着时间的发展，广场本身的角色从中心市场变成了公共会议和庆典场所。



尤里乌斯·恺撒广场（Forum of Julius Caesar）一览，中轴线上是维纳斯格内特里克斯庙（朱利亚家族的神圣祖先）。

免，他将被带到这里处决，同时，成功的将领登上卡皮托林山坡，在神庙中献祭并奉献缴获的武器。绕帕拉丁三面走的路类似于路普卡里亚（Lupercalia）节日期间披着狼皮的年轻贵族跑过的路线。这条路线沿着古老的帕拉丁“罗慕路斯之城”的圣界（pomerium），它能够确保最多数的旁观者，特别是在大竞技场。庙宇和其他纪念建筑沿路排列，奥古斯都及其后继皇帝（奥古斯都、韦伯芗和提图斯、塞维鲁、君士坦丁）添加的凯旋门跨越路的两边。甚至沿线的精英住宅也在凯旋的日子加入进来，外面装饰着花环以及其在以前的成功战役中缴获、被授予成功者家族的战利品。

凯旋路线的起点是马提乌斯校场上普布利卡别墅附近的庞培剧场，它于公元前55年建成。它的花园将拉哥·阿根提那庙的区域包括在内，像是一个入口。献给维纳斯·维克特里克斯（Venus Victrix）的联合庙宇进一步强化了纪念建筑的庆功特点。这座建筑是由一位将军在战争中获得的单独一座建筑构成，它的简洁形制与四座小拉哥·阿根提那庙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们标志着两个世纪以来各个家族早些时候取得的成功。

由于成功者企图超越他们的前辈，所以这些胜利纪念物设计得越来越复杂，给人留下的印象也越来越深刻。从共和晚期开始，公共表演成为成功庆典的一部分。公元前46年，尤里乌斯·恺撒在庆祝四个地方的凯旋时，在罗马广场举办了角斗表演，在大竞技场举行了赛马，在剧场上演了戏剧（可能是庞培剧场）并重现了海战场面。为了这次海战表演，他特地在马提乌斯校场挖了一个水坞，战斗在埃及和叙利亚舰队之间展开。苏维托尼乌斯记载，由于人们蜂拥到这些地点观看表演，人群极度拥挤，以至于发生了几起死亡事故，其中包括两名元老。恺撒为城市做了许多其他的贡献。他着手重建在公元前52年的政治动乱中烧毁的库里亚。而且，他在罗马广场外面建了一个新广场——尤利乌斯广场（Forum Iulium）。中轴线上的神庙献给了传说中的朱里亚家族的女先人维纳斯·格内特里克斯（Venus Genetrix），使它几乎成为一座家族纪念碑。他在马提乌斯校场建立了一个投票场所萨波塔尤里亚，也可用于公开表演。同样重要的是，他的突然死亡留下了许多广为人知的建筑计划以及没有来得及完成、后来由他的继承人奥古斯都完成的建筑，包括位于罗马广场一侧的一座新尤里亚会堂（Basilica Iulia）。恺撒的独裁地位使他能够为城市做整体规划，奢侈地进行建设。他的继承人做了这两方面的工作。

皇帝的城市

随着奥古斯都的即位，罗马城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从这时开始，皇帝要负责城市管理的诸多事宜，包括治安、消防、建筑规划、粮食供应及价格。对于一个巨大城市的中心，这些更需要效率，但对效率的关心次于政治命令。皇帝们认为，共和晚期的动荡局势不该再次发生。为避免因粮食问题引发骚乱，需要采取措施保证粮食供应充足，价格便宜。皇帝任命骑士而非政治上更为显赫的元老成员管理粮食供应。像克劳狄、尼禄和图拉真皇帝都治理了台伯河口周围（奥斯提亚和波图斯〔Portus〕）及沿岸（森都塞勒、特拉奇那和普特



位于罗马帕拉丁山上的图密善大宫殿的遗迹。这幢建筑的侧翼为奥古斯塔那宫（Domus Augustana），是帝王家族的私人公寓，在此可俯瞰举行战车比赛的大竞技场。

奥利）的港口，同时也注意陆路交通，保护罗马中心的储藏设施。

奥古斯都将城市划分成14个区，这在许多方面便利了管理。这些区又划分下级行政区（vici），在这里不仅司法而且与皇帝有关的宗教节日都由地方官员（vico-magistri）管理。由一名骑士级官员领导的七支军事消防队取代了克劳狄和克拉苏时期的政治帮派，保护城市免于火患。但是，一旦发生大火，他们除了设置防火带，几乎无能为力。这些巡逻兵有搜查和惩罚权，其他的城市军队也可用于维持治安，防止骚乱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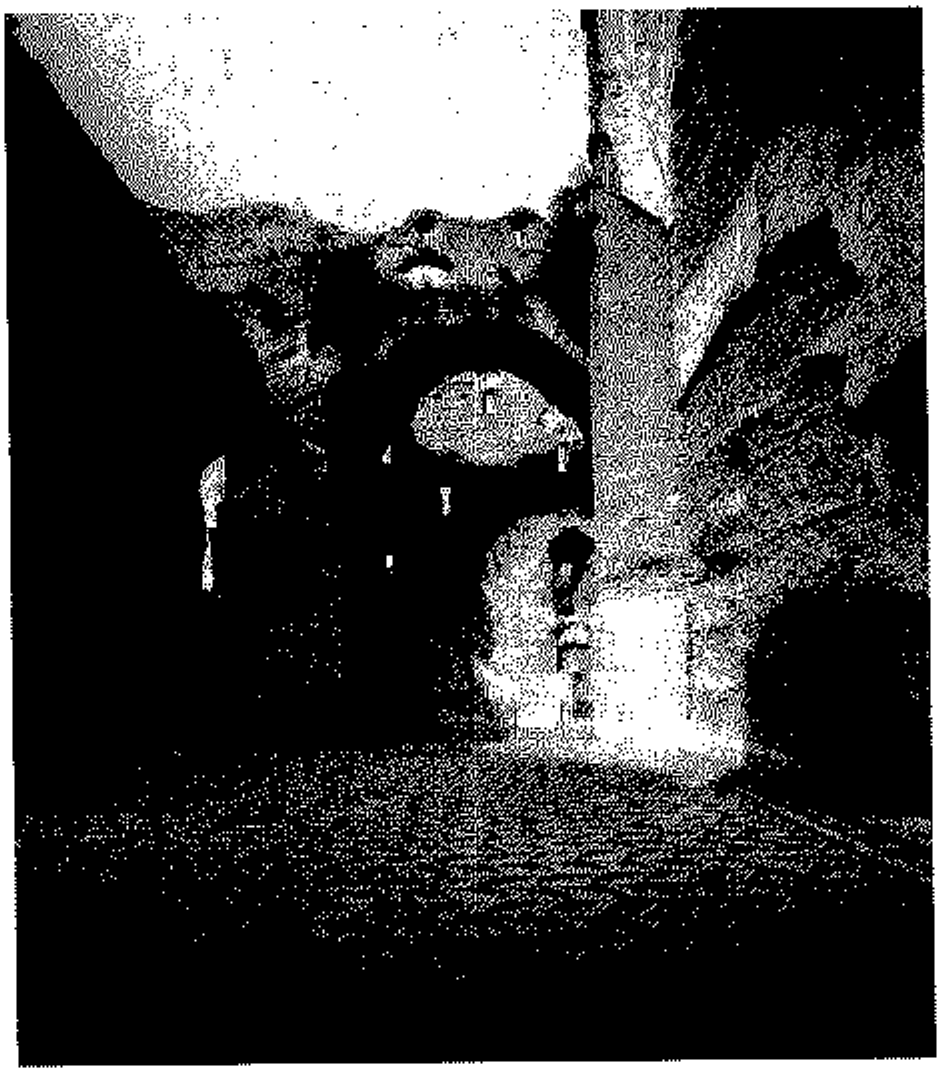
皇帝及其家属需要保护，以免受到城市人的伤害。奥古斯都有一支由公民兵组成的卫队，提比略将其集中在一个要塞，即近卫军营地。值得注意的是，这支近卫军在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时期数目有所扩大，并且他将近卫军成员由意大利士兵改为来自多瑙河行省的训练有素的军团。骑士级成员而非元老贵族被任命为近卫军长官。

朱利亚-克劳狄王朝的皇帝又增加了一支由日耳曼人组成的骑兵队作为近卫军，使暗中的阴谋家更难怂恿两种兵团造反。但在68年至69年的内战中，骑兵卫队被解散了，使得从加尔巴到涅尔瓦的各位皇帝很不安全。图拉真招募边境辅助部队的非公民，重新组成了一支骑兵队，称为“奥古斯都骑兵队”。塞维鲁使骑兵队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将一支新招募的5000人的军团驻扎在了罗马附近。罗马也装备了海军，负责通信和运输，而且配备了顶篷（velaria）用于保护剧场和圆形斗兽场的观众。越来越多的军队驻扎在城郊周围的要塞，在这里它们看上去不像僭主的堡垒。

事实上，驻罗马的军队比驻帝国任何其他城市或军事基地的都要多：奥古斯都时期达到8000人，图拉真时期20，000人，塞维鲁时期31，500人（不包括军团）。这些人拿很高的薪俸并享有法律特权，他们不仅使罗马的人口构成具有了世界性，而且也是经济捐献的主要来源。仅在很少的情况下，这些军队会像193年佩提那克斯死时那样反对他们的元首——皇帝。

皇帝的恩惠

虽然一些皇帝长期不在罗马，但罗马仍然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地。据说，虽然奥古斯都位于帕拉丁西隅的住宅紧挨着周围的神庙，他却在家中过着简朴的元老式的生活。提比略延伸到北隅建了一座更为宽敞的住宅，盖乌斯（Galius）（卡里古拉）将这所住宅同下面的罗马广场连接起来。尼禄将帕拉丁的大部分地区和东北面的山谷改造成了一组公园、水池和住宅，最初称“通道”宫（Domus Transitoria），64年大火后重建，改称金宫（Domus Aurea）。这座建筑物在建筑和装饰风格上有所创新，不论是抱着敬畏还是非难的心理，都无可辩驳地让人感到奢华和震惊。弗拉维王朝的皇帝甘愿继续使用尼禄的金宫，直到图密善修建了罗马最大的宫殿弗拉维宫（Domus Flavia）为止（“宫殿”palatium一词本身源于这座建筑的地点帕拉丁山）。这座建筑正对着罗马广场和大竞技场，由多个庭院、接见室、起居室、边房和低地花园构成，所有的房间都奢侈地装饰着马赛克、大理石、抹灰和许多雕像，由捐献的引水渠供水。这座宫殿由塞维鲁最后完成，他增建了一个有巨大拱顶的南向边房和浴室。



罗马卡拉卡拉浴场的马赛克地板和巨大的拱顶。卡拉卡拉打算超过其伟大的前任们所建造的最好的浴场，以他的慷慨宠惯罗马公民，这个浴场表明整个地中海的资源都可为皇帝所用。

除了帕拉丁的财产外，皇帝们还在城郊周围的大绿化带中增建了花园（Horti）和别墅。许多还保留着共和时期赫赫有名的主人的名字，例如撒路斯提安尼花园（Hoti Sallustiani）和路卡里安尼花园（Hoti Lucul-liani）。

罗马的皇帝要履行很多职责——出席元老会议、会见使节、听取法律诉讼、主持运动会。他们也召集观众、参观罗马广场、举行宴会和享受洗浴。他们出席任何其他贵族捐献者的公开和私人活动，所不同的是，这个捐献者控制着帝国全部的资源。皇帝正是以最高捐助者的身份与城市人们发生联系。元老可以资助公共比赛，但它的奢华程度远不能与皇帝的娱乐活动相提并论。元老们也可以搞建筑，但在规模上根本无法为整个城市服务。塔西陀探讨了权力的秘密（arcana imperii），包括资助食品、各种公共活动以及其他“恩惠”让罗马居民感到高兴。每一位大兴土木的皇帝不仅为城市提供了新的建筑和设施，而且为很大一部分人提供了受欢迎的职业。

诸如烧砖之类建筑材料的供应更加规范化，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督。提比略以来，各个皇帝都竭尽全力确保他们在罗马的大工程所需的装饰性石料（大理石、石灰石、花岗岩和斑岩）供应充足、价格低廉。实际上，皇帝建筑中利用的多色的石料种类象征着罗马对自然世界的占有程度。

巨大的帝国浴场建筑（thermae）系列是捐赠、规模和奢华的装饰相结合的典范。在奥古斯都的支持下，阿格里帕（Agrippa）在马提乌斯校场建立了第一座浴场。此后，尼禄、提图斯、图拉真、塞维鲁、卡拉卡拉、塞维鲁·亚历山大、德基乌斯、戴克里先、君士坦丁都修建了新浴场。这些不仅仅是规模日益扩大的罗马浴场：它们提供了各种设施。如果现代存在相应的设施的话，它将是土耳其和日本的浴场、日光浴室、更衣室、体育馆、游泳池、盥洗室、餐馆、妓院、艺术画廊、商店、风景如画的花园、室内花园、户外跑道、图书馆、报告厅和宗教神殿的联合体。装饰包括马赛克地板、大理石装饰的墙面、灰泥粉刷的天花板、雕像以及雕刻、着色、镀金的装饰品。

皇帝的纪念性建筑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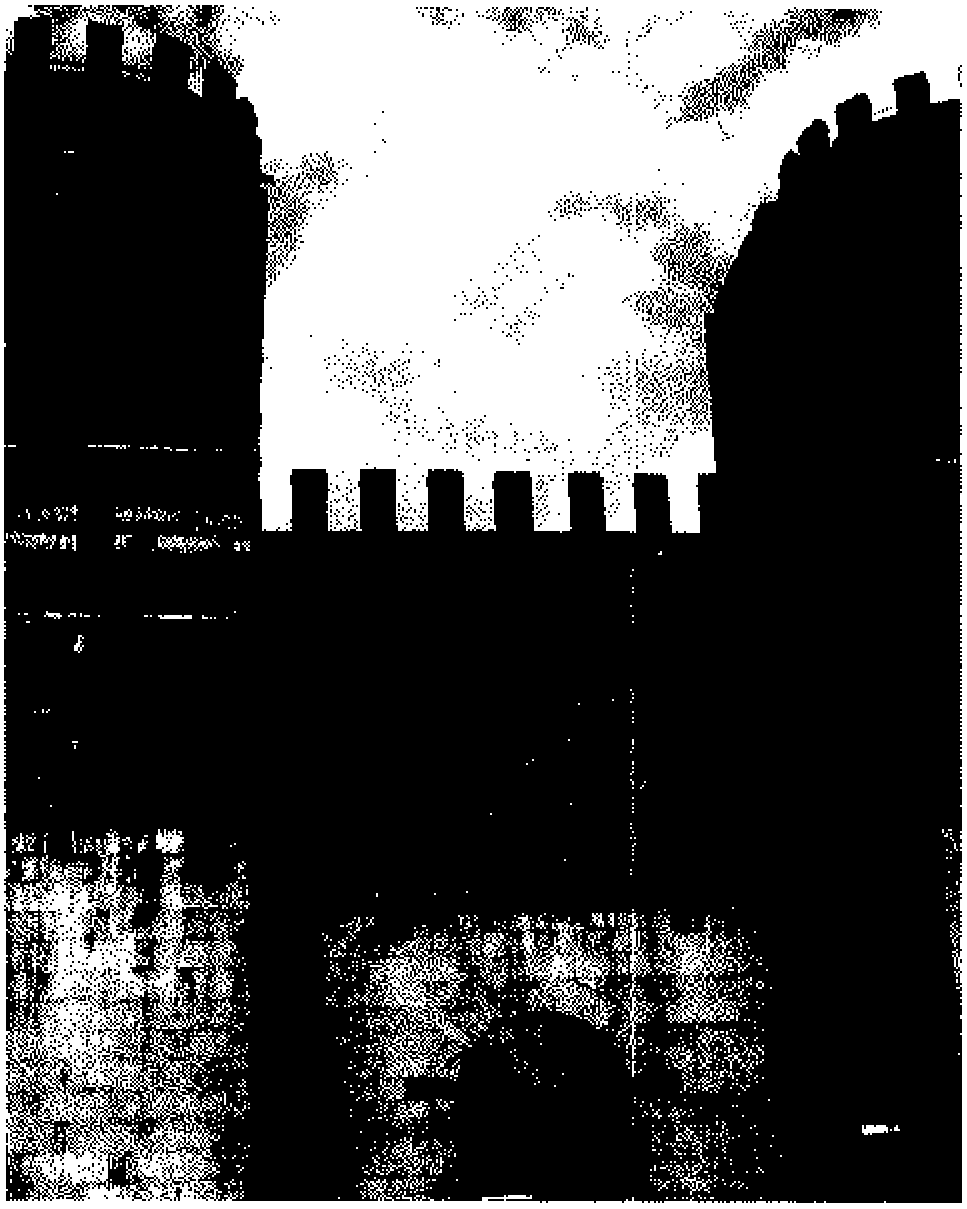
皇帝和城市居民有许多其他的交流方式，尤其是正式的凯旋仪式成为皇帝的专利。公元前19年，鲁基乌斯·康奈里乌斯·巴尔布斯（Lucius Cornelius Balbus）是最后一位以个人名义被授予此殊荣的元老。此后，只有皇帝或帝王家族的成员可以乘坐战车。凯旋仪式中的运动会变得越来越奢华。公元80年，比赛持续100天，每天要用5000只动物，弗拉维圆形大剧场同时开放，花费由提图斯洗劫耶路撒冷获得的战利品提供。图拉真为庆祝他对达西亚人的胜利，举行了123天比赛，动用了11，000只动物和10，000名角斗士。发行的钱币被用来表现失败的蛮族和缴获的战利品，建筑物也用于宣传计划方案或庆祝就职。传统意义上的成就——主要是战争的胜利——或通过修建大规模的纪念物，例如横跨特里姆法利斯大道（Via Triumphalis）的庄严的帝国凯旋门，或以塑造镀金雕像，比如立在罗马广场的巨大的图密善骑马雕像，进行宣传。人性化的雕刻也用于宣扬对帝国敌人的胜利，吸引罗马公民的注意力，像至今仍可见的提图斯、塞维鲁、君士坦丁凯旋门及图拉真柱、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记功柱上的雕刻。着色、镀金的巨大宣传栏对贵族等级、士兵和城市群众同等

罗马城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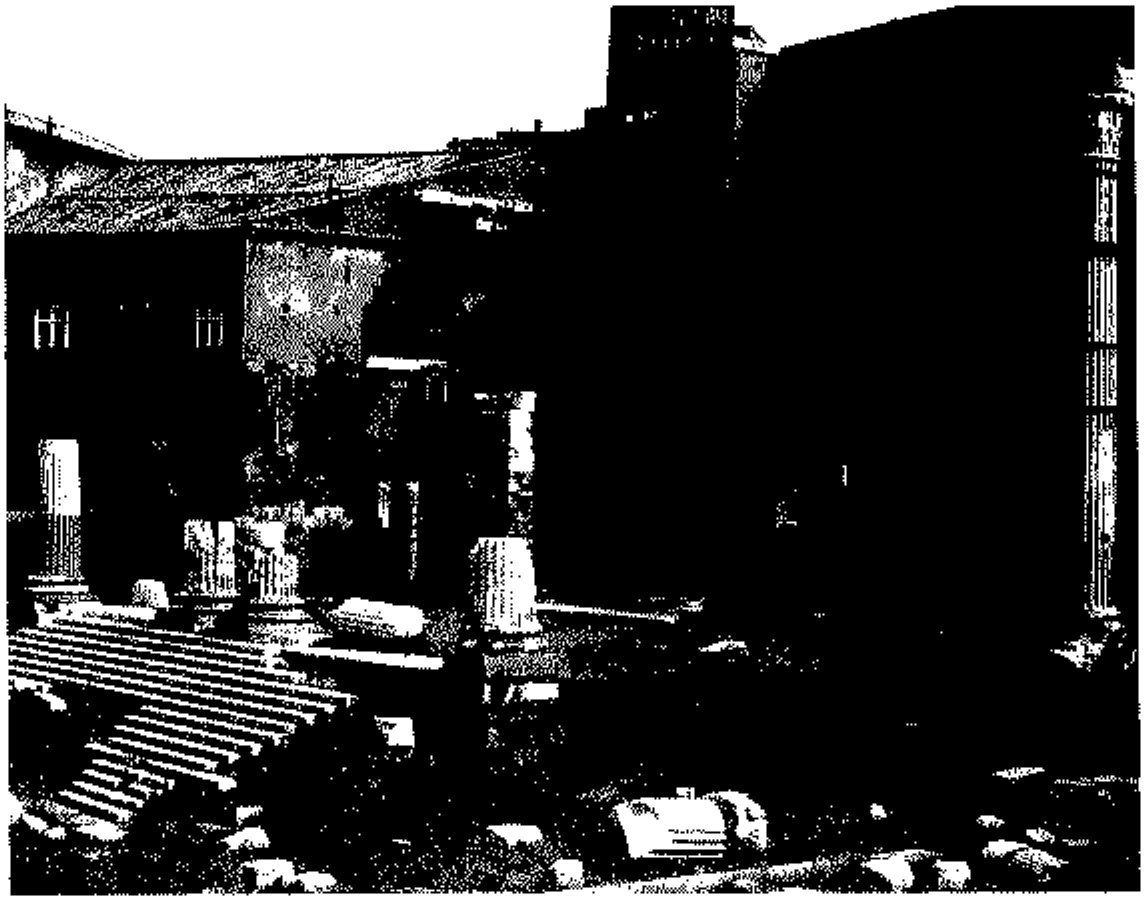
早期城市有一系列绕城的防御性城墙，在帕拉丁山和卡皮托林山上还可以看到部分墙体的遗迹。不过，第一座整体防御工事建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劫掠罗马后的一段时间。这些传统上被误称为“塞尔维亚墙”的防御工事，是由引进的西西里希腊泥瓦匠利用维伊附近奥斯库拉山洞中挖掘出的凝灰岩建成的。它们长11公里，包围着传统的7座山丘，面积为426公顷，设有21个通向城市的入口。同许多其他4世纪意大利的城墙一样，它的风格厚重、雄伟。在厄斯奎林高地上，巨大的地沟和土堤使城墙得到了进一步保护和支撑。这就是汉尼拔面对的城墙，它保护罗马直至同盟战争，最后一次修复是在公元前87年。此后，它丧失了军事职能且为建筑物遮挡，但是东北面延伸出来的某些部分成为人们傍晚散步的场所。此时，驻扎在帝国边境上的军队是罗马的保卫者。

公元3世纪，帝国遭遇了军事失利和“蛮族”入侵，这使奥勒良（Aurelian）和普洛布斯（Probus）在270年至282年重新加固了城市。这些城墙长19公里，由砖包混凝土建成，有383个塔楼、18座大门和许多便门，圈起的总面积约1372公顷。墙体可能由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加高，5世纪早期，霍诺里乌斯（Honorius）又以厚重的城门进一步加固了城墙，现今保存十分完好的地方在阿庇亚门（Porta Appia）、阿西那里亚门（Asinaria）、奥斯廷西斯门（Ostiensis）和提布尔提那门（Tiburtina）。城墙沿着这条保存完好的路线连成一体，因此保留了为数众多的坟墓、公寓楼外观、花园台地、一座圆形竞技场和近卫军营房的三面。它们的范围很广，圈起了大片花园空地，其中一些自此以后没有再建设。在近卫军营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开始于城门、塔楼、城墙和提比略建筑的护墙的逐渐升高的幕墙平面。奥勒良墙（Aurelianic Wall）连着台伯河岸，首次将亚尼库鲁姆（Janiculum）山坡右岸的地区（特伦斯提比里姆），今天的特拉斯特维里（Trastevere））圈了进来。

9世纪，当“列奥奈”（Leonine）墙的环墙将梵蒂冈（Vatican）连接到河岸以及16世纪、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火炮防御工事加固了梵蒂冈和亚尼库鲁姆（Janiculum）时，奥勒良墙继续在其他的边界保护着城市，直到19世纪。它们被定期修护并且额外增加了塔楼，但惟一一次重大的整修是在西南部增加了一座16世纪的大砖墙和在门口修建了地面防御工事。1527年和1849年，敌人在西面的高地成功地对罗马进行了打击，放在那里的现代化大炮能够辐射整个城市。1870年，皇家军队在皮亚门附近的奥勒良墙做了一次象征性的突围，这是罗马的防御工事最后一次扮演军事角色。



阿庇亚门（圣·塞巴斯蒂安门）的外观，始建于3世纪晚期，但广场塔楼和楼上部分直到5世纪初才建成。



罗马的奥古斯都广场。中轴庙宇是为报复谋杀尤里乌斯·恺撒的人而献给马尔斯·乌尔特（Mars Ultor）神的。后来，这里用于展示克拉苏在公元前53年丢失、公元前20年至19年由帕提亚人交还的军标。

开放，一定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红色花岗岩方尖碑是主要由皇帝使用的一种胜利纪念物。这些或是刻着象形文字出自埃及神庙的法老时期的物品，或是带有无装饰的柱身或毫无意义的象形文字的传统方尖碑。像从前一样，奥古斯都通过在大竞技场树立巨大的方尖碑和在马提乌斯校场放置他的巨大日晷开了先例。一对较小的方尖碑位于他的陵墓入口的两侧。这是一种恰当的做法，因为方尖碑是从新兼并的埃及获得的战利品，要置于征服者的陵墓旁。而且，按惯例它们是奉献给太阳的，所以在竞技场中，太阳和战车的雕刻非常地和谐，钟表上的太阳针甚至更明显。为装饰他在瓦提坎山边的竞技场，盖乌斯把另一座高大的方尖碑带到了罗马。韦伯芗、提图斯和图密善重建了在马提乌斯校场装饰伊西斯和塞拉皮斯庙的许多小方尖碑——对他们而言，埃及和伊西斯是特殊内战的纪念。为纪念溺死在尼罗河中的情人安提诺斯，哈德良树起了一座方尖碑。

尤里乌斯·恺撒开了一个先例，即在罗马广场附近，紧挨着捐献者家族建一座新广场。在法萨卢（Pharsalus）战役中（公元前48年），他发誓要为维纳斯·格内特里克斯建一座庙宇。奥古斯都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新广场，毗邻尤里乌斯广场。它是一项宏大的建筑计划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治愈内战造成的分裂及宣扬胜利。位于中轴线上的庙宇是献给复仇之神马尔斯（Mars the Avenger）的，最初是为肃清暗杀恺撒者及作为腓力比战役后（公元前42年）的还愿行为。里面是马尔斯、维纳斯、尤里乌斯·恺撒的雕像。广场的两条长边上是彩色大理石柱廊，带有大的半圆形壁龛，里面放满了雕像。西北门廊的尽头是巨大的奥古斯都像；一面壁龛是埃涅阿斯和国王阿尔巴龙加的雕像，另一面是罗慕路斯和共和名人的雕像。广场中央是一辆载着凯旋者奥古斯都的战车。皇帝因此把自己置于罗马历史的中心，与罗马传说中的英雄比肩而立。

从奥古斯都广场穿过阿吉雷吐姆路是韦伯芗庙或称和平广场。它是为纪念68年至69年内战后达成的和平而建，但却是用洗劫耶路撒冷获得的更有名的战利品装饰的。广场上有一个长水池，其柱廊和房间都是一种文化设施，里面有艺术品和图书。在南面角落的房间里，一面墙上雕刻着大理石罗马城市图，开始可能在弗拉维最初的建筑中，但在塞维鲁时期作了修订。和平庙和奥古斯都广场间的空地由图密善改造成了特兰西托里乌姆广场（Forum Transitorium，拉丁文“Transitorium”意为“通道”。——译注），这个名字来自罗马广场和苏布拉（Subura）区之间的通道阿吉雷吐姆。这里历来是书商和抄写员的地盘，一座献给图密善选择的女庇护人密涅瓦的神庙使它增色不少。图密善被暗杀后，涅尔瓦捐献了这座广场，为涅尔瓦广场带来了荣誉。

帝国最后一座广场是所有广场中规模最大、装饰最奢华的（总面积为118 × 89平方米），112年由图拉真捐献，它的费用直接来自106年征服达西亚后图拉真分享的战利品。“ex manubiis” 一词在铭文中具体指这一来源，同圆形大剧场的做法一样。这座建筑的浮雕、雕像和铭文不遗余力地表达的主题就是皇帝在多瑙河取得的胜利。广场上包括一座露天的设有柱廊的庭院，院子有门廊和进口大理石铺设的地面，上层由比真人还大的达西亚俘虏装饰。中间伫立着图拉真骑马的巨形雕像。一面是罗马建筑中最大的带有柱廊的大厅，阿尔丕亚会堂（Basilica Ulpia）。会堂那边是耸立在自己的广场上的图拉真柱，侧面是两个图书室。图拉真柱不仅以雕刻的形式描绘了达西亚战争，而且在整座建筑之上提供了一个观赏平台，使公众能够进一步了解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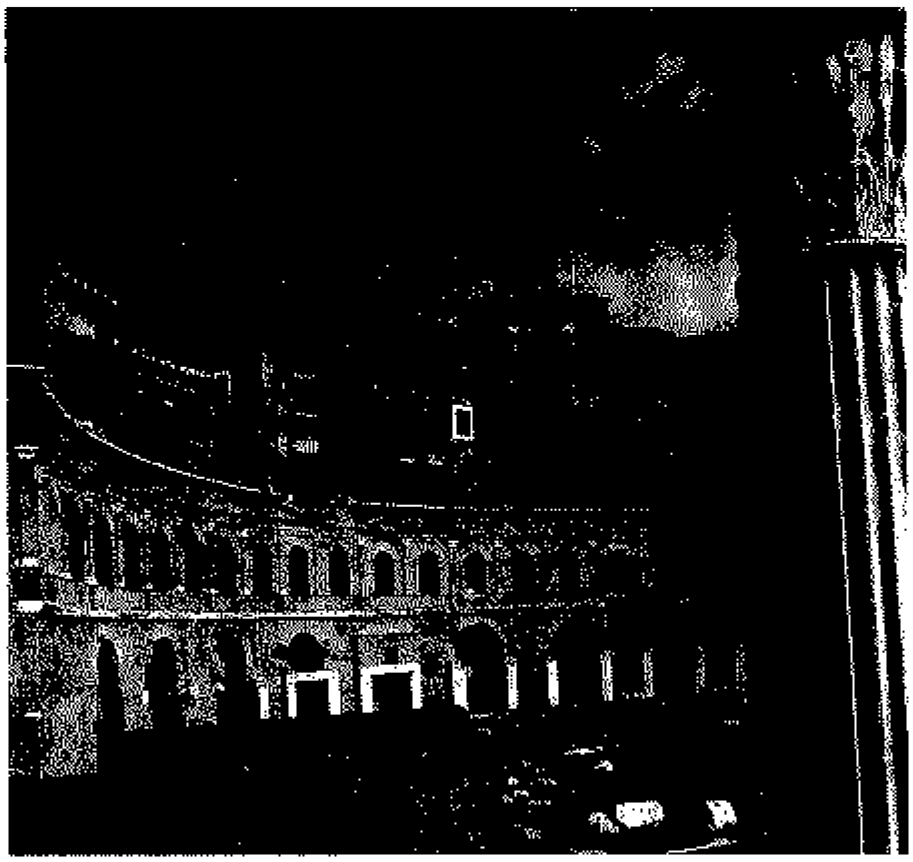
的成就。图拉真广场用于审判法律案件、举办诸如诗歌朗诵等文化活动以及公开烧毁债务契约和释放奴隶。

所有这些帝国广场都是帝王的纪念物，用于宣传个人和家族的成就。所有的广场都有一座庙宇，它们与共和时期“胜利”庙的传统有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纪念物也是皇帝们为攀比而建——虽然皇帝与之竞争的是他们的前任，而不是元老。在罗马，建筑总是具有政治意义。例如，为了参与凯旋路上的庆祝活动并且为了完全控制阿波罗·苏西阿努斯庙（the Temple of Apollo Sosianus），奥古斯都修的马尔塞鲁斯剧场（The Augustan Theatre of Marcellus）建在了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The Circus Flaminius）的一角，它曾被一位在阿克兴战役中（公元前31年）[1]支持敌方的元老重建。圆形剧场的地点是为利用一个天然湖泊洼地，而且把曾经是尼禄金宫主要特色的湖泊填平了。由于尼禄占用众多的城市空间为个人享用，所以他是一位不受拥戴的皇帝，但他的浴场又使他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诗人马蒂尔〔Martial〕问道“有谁比尼禄更可恶，但又有什么能赛过尼禄浴场？”）。因此，弗拉维王朝以各种方式赚取了政治资本：他们恢复了湖的原貌，为角斗比赛提供了最大的场地；利用耶路撒冷的战利品筹措资金，庆祝他们击败了外族人，而不是内战中的敌人。最后，通过同时开放提图斯浴场和圆形大剧场，他们大大地转移了人们对尼禄成就的兴趣。

图密善被暗杀后，元老院下令控告对图密善的纪念（damatio memoriae），从此局面开始恶化。他的许多凯旋门都被拆毁，他在罗马广场的骑马雕像也被熔化。图拉真不能直接超越图密善改造成形的圆形大剧场，但他可以向更多的人展示大竞技场的能量（像他的钱币上赞美的那样）。他能够也确实抹掉了人们对图密善的成功以及他所能展示的奢侈程度举行比赛的记忆。图拉真浴场从形制上控制、超越了下面的提图斯浴场。图拉真广场上树立的他的雕像取代了人们对罗马广场上图密善雕像的记忆。通过雕像，图拉真能够突出对外敌达西亚人取得的成功（在帝国内部，犹太人毕竟还不是真正的行省居民），达西亚国王德塞巴鲁斯（Decebalus）曾击败、羞辱图密善。每一位聪明的读者在读了圆形大剧场和广场的铭文后，都会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反差。

皇帝的宗教角色

皇帝通过担任祭司和赞助传统的祭祀活动在城市的宗教、仪式生活中扮演着角色。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8年声称已经修复了82座神庙，这是继内战期间的忽略后打算恢复与神的传统关系的标志。皇帝也支持有益的祭祀活动，比如奥古斯都为还愿在帕拉丁山为阿波罗·阿克提亚古斯（Apollo Actiacus）建的神庙，他曾在阿克兴战役前许下这一誓愿。弗拉维王朝曾在马提乌斯校场为伊西斯女神举行祭祀活动。哈德良按照自己的希腊式设计在罗马广场与圆形大剧场之间建起了一座维纳斯和罗马的神庙。他也在马提乌斯校场重建了献给众神的阿格里帕庙（Agrippa's Temple）（万神殿），可能他个人为神庙设计了圆形图案，它需要一座直径43米的混凝土圆顶。埃拉加巴鲁斯无耻地将他的出生地叙利亚埃麦沙城的天神带到了罗马，在帕拉丁山上为他建了一座神庙（他死后，这个地方重新献给了复仇之神朱庇特）。



从图拉真广场登上图拉真市场及中世纪的托利·戴勒·米利奇（顶部）（Torre delle Milizie）看到的景象，这座建筑物呈阶梯状延伸到了奎里纳尔山旁边，由砖包混凝土建成，上面有混凝土拱顶。

① 共和末期两大军阀屋大维与安东尼的海军决战，屋大维获胜，并最终消灭托勒密埃及王国。——译注

对死去皇帝的神化也导致许多神庙和新节日的出现，这些都是由继任者设立，通过使自己成为神的子嗣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分享了罗马广场西南面瓦拉布鲁姆山谷中的一座神庙。克劳狄庙建在卡里安山的一个大平台上，周围是美丽的喷泉和花园。韦伯芗和提图斯共享了罗马广场上的一座庙宇，而安东尼努斯·庇乌斯庙则位于萨克拉大道（Via Sacra）附近。哈德良、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及图拉真的各种女家眷居住在马提乌斯校场。这最后一块地方完全为皇帝的庙宇、浴场、剧场、带有门廊的围场、凯旋纪念碑和住宅占满。许多建筑物都以南北或东西方向排列，使得校场呈现出整齐的街道网格景观，很像商业区，但它井然有序的发展模式与城市其他地区截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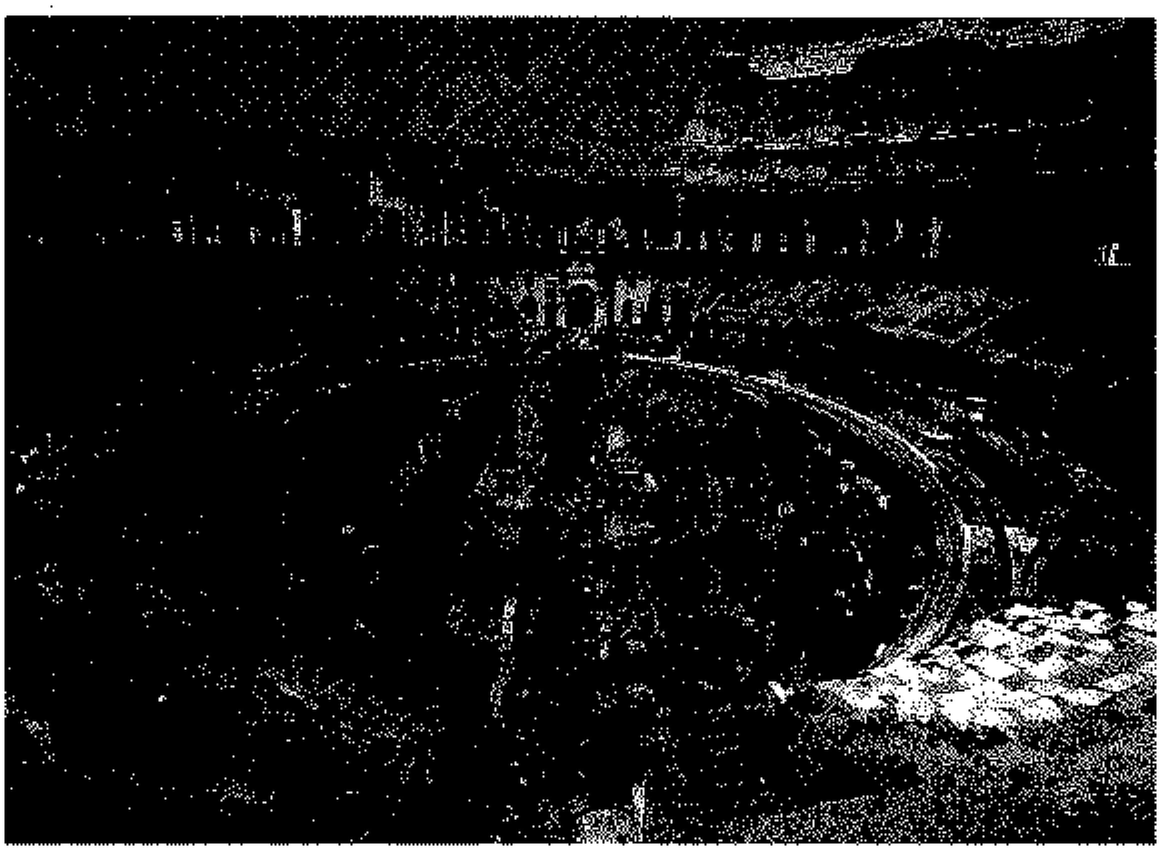
罗马的娱乐

根据2世纪早期的讽刺作家朱维那尔的说法，面包和竞技（panemet circenses）是罗马平民渴望的两样东西。罗马的娱乐虽然起源于宗教，但很快具有了世俗和政治的重要性。这种群众公共娱乐采取了多种不同形式：大竞技场的战车比赛（ludi circenses，意为“竞技场赛会”）与动物的角斗（venationes，也在竞技场举行，但后来也在圆形剧场举行）和戏剧赛会（ludis caenici）。角斗表演不属于公共娱乐项目，在制度方面与宗教并无关系；它们是“献礼”（munera），是公共表演。早期的角斗表演与贵族的葬礼有关，在皇帝的葬礼中，角斗在圆形剧场举行，但偶尔也在其他公共场所举行。虽然赛会（ludi）和公共表演（munera）的起源不同，但在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间，罗马人已经完全认识到了这种表演所带来的政治利益。在帝国时期，皇帝举行专门的娱乐活动庆祝胜利和周年纪念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早期罗马的戏剧表演最初与纪念某些神的宗教节日有关。经证实，戏剧表演早在公元前364年已经出现。希腊古典时期的悲剧和喜剧及共和早期的伟大诗人（恩尼乌斯、普劳图斯、泰伦斯等等）的作品在公元前2世纪极为盛行。但有趣的是，在庞培于公元前55年建立并捐献他的剧场之前，罗马一直没有专门的剧场建筑。在此之前，罗马所有的剧场都是临时的木结构建筑，通常建在适当的宗教圣所，节日过后，为此目的搭建的剧场也就随之拆除。共和晚期，杰出的政治家为赢得公众的支持互相竞争，把临时剧场建得越来越豪华。公元前58年马尔库斯·斯考鲁斯（Marcus Scaurus）担任市政官时，大摆排场，其中包括一个非常奢华的临时剧场，由于他的过分炫耀，马库斯·斯考鲁斯成为奢侈的代名词。据老普林尼记载：

> 他的剧场有一个包括360根柱子的三层舞台；只要你高兴，这在一个不允许出现六根西梅图斯大理石柱的社会并不是对一位杰出公民的侮辱。最底层的舞台由大理石制成，中间一层是玻璃（甚至在晚后时期，其奢侈程度也无人能及），顶层则由镀金的木板制成。最底层的柱子高38英尺。柱子间的青铜雕像多达3000座……至于观众席，则可容纳80，000人。

在罗马，首次有记载的角斗表演出现在公元前264年，退任执政官戴西姆斯·朱尼乌斯·布鲁图斯·培拉（Decimus Ju-



从较低的座位上看到的圆形大剧场内部景象。在中部，不同于原来的木制地面，现代的参观者可以看到迷宫式的通道，里面有小房间、热身房和笼子。比赛的参与者和舞台布景都由绞盘式升降机降至竞技场地。

nius Brutus Pera）和他的弟弟为表示对父亲的尊敬，在牛市举行了这次表演。这种表演虽然主要是私人仪式的一部分，却随着贵族斗争的加剧发展为公共表演。在为此修建专门建筑之前，至少从公元前210年至公元1世纪早期这段时间里，角斗表演在城市的社会和宗教中心罗马广场举行。

公元前29年，奥古斯都的一位将军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Statilius Taurus）在马提乌斯校场南边建起了罗马第一座永久的圆形剧场。建筑费用来自他于公元前34年为庆祝在非洲的成功举行的凯旋仪式。它的结构，甚至它的确切地点都鲜为人知，因为它在64年的大火中被完全烧毁。这使历史学家认为虽然地基可能是石制的，但上面主要是木结构。57年时，尼禄在马提乌斯校场建了一座石基、木结构的圆形剧场；据说，尽管它的建筑材料一般，但却是一座奢华的建筑。它由象牙和黄金装饰，覆盖着一个天蓝色、点缀着星星的天篷；由外国引进的野兽供人们娱乐。

但是，直到80年圆形大剧场开放时，罗马才有了第一座永久的剧场。剧场由韦伯芗于75年始建，到他的儿子提图斯时期建成。这是一座让人印象至深的建筑，它有近五十米高，可容纳约五万名观众。一则最近发现的铭文明确指出它的费用来自70年劫掠耶路撒冷时获得的战利品，据约瑟弗斯记载，韦伯芗和提图斯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落成典礼采取了举行100天赛会的形式，本身是炫耀帝国慷慨的又一次机会。这些表演由马蒂尔记录在一组简短的讽刺诗中，这些小诗以诗集的形式幸存下来（至少部分地），称为《表演手册》(*liber spectaculorum or liberde spectaculis*)。

在希腊罗马世界，战车比赛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竞技及相关活动在罗马有很长的历史。罗马世界最有名的罗马大竞技场位于帕拉丁和阿芬丁之间的山谷。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起，这个地方就用于公共娱乐。传说第一座竞技场出现在塔克文（Tarquins）时期。但是，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竞技场无非是一块长半公里开外的平地，有入口和木制坐位，中间是一个简单的障碍物，战车比赛在其周围进行。从共和晚期开始，其结构越来越宏伟，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图拉真时期。新的竞技场长600米，能容纳300至350，000名观众，是世界上最大的独一无二的公共集会场所。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心障碍物增加了纪念碑和雕刻。有两种计算圈数的办法：首次得到证实的公元前174年的七枚金蛋以及公元前33年阿格里帕增加的七枚镀金海豚。每个拐角处都有一个很大的镀金青铜锥体作为转弯的标志。

城市供应

到2世纪，罗马的城市人口可能已经达到了100万人，食品和水的供应对罗马的组织能力是一个持久的考验。到帝国时期，食品供应主要是皇帝的责任。像罗马这样的大城市，总是面临着饥荒的威胁，特别从共和晚期起，越来越多的食品，主要是谷物、酒和橄榄油都由地中海其他地区进口。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运输和食物储存方面的技术局限——但是古典时期的雅典尽管主要依靠进口，却设法保持着持续、稳定的供应。不过，罗马在两方面有所不同。首先，人口数量意味着问题的难度更大；其次，特别从盖乌斯·格拉古时期起，这个问题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意义。

第一次有记载的国家干预粮食供应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99年，当时的高价促使市政官改善粮食供应。海外领土的获得，特别是西西里的征服，帮助补充了来自意大利的供应。公元前203和201年，国家又进一步采取措施，分配来自西班牙和非洲的低价粮食。波动的价格、囤积居奇和谋取暴力的做法无助于改善这种情况。公元前2世纪，意大利的农业开始从农作物向酒、橄榄和家畜等经济作物转变，农业的这种变化对改进粮食供应也没有帮助。

第一个规定向罗马贫民供应粮食的重要法律条文是盖乌斯·格拉古（公元前123年）提出的粮食法（lex frumentaria)。国家将大宗购买粮食，储存在公共仓库（仓库的修建提供了很多人们需要的岗位）。然后，国家将以低价每月向合格的罗马公民出售一定量的粮食。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到公元前1世纪，当那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将这种做法转变为施舍，作为政治贿赂的一种手段时，它们的政治作用就很明显了。因此，罗马人希望粮食供应能够得到保障。尤里乌斯·恺撒让一些市政官专门负责粮食供应，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尝试，但规范这个过程的任务留给了奥古斯都。他设立了一种官职，称为粮食督办



支撑着克劳狄水渠和罗马南部的安尼奥·诺乌斯水渠（the Aqua Anio Novus）高架水道的拱廊。罗马的水渠大部分采用了一系列隐蔽的水道或穿过软火山岩的隧道形式。但是，有必要修建凸起的结构保持流量的稳定，特别是穿过罗马附近平坦的乡村地区时。

(praefectus annonae)，由骑士等级的公民担任。从克劳狄时代起，这种官职在马提乌斯校场的米努西亚弗鲁门塔里亚(Porticus Minucia Frumentaria) 库房办公。克劳狄在波图斯新建的深水港也帮助改善了供应。但主要问题仍然存在——克劳狄自己在广场上遭到伏击，一名愤怒的饥饿平民向他投掷面包。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把橄榄油列入国家专卖品，但橄榄油一直是罗马人饮食中重要的一部分，它也是照明和沐浴的主要油料。被称为特斯塔奇奥山（Monte Testaccio）的巨大的人造山生动地证实了罗马人在公元头两个世纪里消费橄榄油的程度，据估计，这座山由5300万个打碎的双耳陶瓶构成，大致相当于2万亿升油，这些油大部分是从西班牙南部的巴提卡进口的。

直到公元前4世纪晚期，罗马的用水仍然来自井水、泉水和储在蓄水池中的雨水以及台伯河中的水。公元前312年，监察官阿庇乌斯·克劳狄·卡古斯（Appius Clandius Caecus）修建了罗马第一座高架引水渠——阿庇亚水渠（Aqua Appia)。到图拉真时代，城市已有了十座干渠。这些庞大的设施是衡量罗马伟大功业的标志，直至今天，在罗马的乡村仍可见到它们的遗迹。古代作家以崇敬和惊奇的心情描述了这些引水渠。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ssus）[①]在公元前1世纪的作品中写道："依我看来，实际上最能体现罗马帝国的伟大的三项重要工程要数高架引水渠、铺设的道路和修建的下水道。"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提到"大量的水通过水渠流入城市，以致名副其实的河水在城市和下水道中流过"。对罗马水渠最经典的评价可能出自弗朗提努斯（Frontinus)："这样一批必不可少的设施为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如果你愿意，比较一下金字塔或虽然有名却不实用的希腊人的工程！"

随着罗马的发展，水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象征。惟一专门记载罗马水供应的历史材料出自塞克图斯·尤里乌斯·弗朗提努斯，他被涅尔瓦任命为罗马的水利专员（curator aquarum)。像面包和竞技一样，水的供应也是罗马人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共和时期，维持水供应曾是监察官的一项职责。公元前312年的阿庇亚水渠和公元前125年的特普拉水渠（the Aqua Tepula）都是他们主持修建的。公元前33年，阿格里帕担任市政官时不仅修建了尤里亚水渠（Aqua Iulia)，而且修缮了现存的水渠，并派他自己的奴隶（多达240人）负责水渠的维修。他把这些传给奥古斯都，使它们成为公共财产。从这时起，奥古斯都设立了水专员，一个由三名元老及一名长官组成的委员会。工作人员包括建筑师、勘测员、管理员和公共奴隶。克劳狄时期设立了水渠检察官一职，他们对水的供应具有永久性权力。从公元2世纪晚期开始，水井官的总部可能设在米努西亚库房，铭文证据表明从4世纪开始，总部在罗马广场的拉古斯尤特那（Lacus Iuternae)。

从公元前4世纪晚期修建第一座水渠到公元2世纪早期特拉亚那水渠（Aqua Traiana）建成，引入罗马的水量增加了15倍。这与其说是为解决人们的缺水问题，不如说为满足人们对洗浴设施和其他舒适性日益提高的需求。从奥古斯都时代起，大型帝国浴场的建设成为修建水渠的决定性因素。

罗马人的日常生活

生活在罗马并不总是很安全，甚至对富人也一样。许多自然和非自然因素威胁着脆弱的城市基础设施。台伯河水提供了最简便的废物处理方法，废物或直接或间接经由下水道排入河中。这可能包括从人们制造的

① 公元前一世纪末叶的希腊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古代》一书。——译注

垃圾到尸体等任何东西，每一次河水泛滥罗马居民才会想到这个事实。台伯河既是罗马人的威胁也是他们的福祉。它是主要的运输路线，尤其是对从内地和地中海其他地方运输粮食而言。定期的河水泛滥对这种粮食供应构成了持久威胁。哈德良提高了北面马提乌斯校场的地平面，有效地形成了一道抬高的防洪河堤，但凶猛的洪水依然肆虐，直到19世纪晚期运河开通才最终平息。



塞尔斯的大道（the Via in Selce），经过古代的萨伯拉区向上延伸至厄斯奎林山坡。现代的街道沿着古代玄武岩铺就的街区延伸。远处的尽头是砖面公寓楼的外观。

对于城市的居住条件，特别是共和时期的情况，实物证据很少。学者们因此不得不依靠文学材料和出自庞贝、赫库兰尼姆和奥斯提亚的相应的考古发现。共和晚期典型的社会上层住宅采用了天井式格局。受希腊影响，许多住宅都发展成了后部通常带有庭院（peristyle）的奢华建筑。尽管后来居家建筑发生了变化，但天井式房屋直到3世纪早期依然存在，像在城市地图上看到的那样。这种风格的房屋由一组集中环布在中厅三面的卧室构成，一条入口廊道通向位于前屋或店铺之间的天井。住宅的主要房间、餐厅（triclinium）和休息室（tablinum）通常位于天井的第四面，正对着入口。庭院有时种上植物，作为一个带有喷泉的装饰花园。

贵族住宅的风格和地点反映了主人身份的差别。主人的上午会见（salutatio）在中厅和休息室举行，任何人都可以从街道上通过前门看到受接见的平民。面对萨克拉大道和特里姆法利斯大道的地区是最好的居住地点。西塞罗的帕拉丁住宅很清楚地显示出住宅与名望间的联系。西塞罗被放逐后，他的住宅为克劳狄拆毁，等他成功返回后，又用公款重建了这处住所。

从共和中期开始，另一种风格的住宅出现了：高层公寓楼，人们用一个用法灵活的词“insula”为其冠名。它可以指堆在道路旁的“土堆”或上面的建筑。4世纪的地名目录列出了4602座高层公寓楼，与1832座宫殿相对比，但几层高的楼房至少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就已经存在。它们最初是木结构，由碎石和砂浆做填充物，根据古代史料判断，这种建筑很容易着火或倒塌。由于没有建筑限制，主人把房子建得越来越高，以便最大限度增加租金。水无法输送到第一层以上（但直接连接到城市供水的方法无论如何都是很少见的），许多房屋没有专门修建厕所。结果一些房子——虽然绝不是所有的——非常肮脏，不利于身体健康。情况非常糟糕，奥古斯都不得不强加了一个60罗马尺的高度限制（18米，5层）。64年大火后，各种防止火灾发生的法令得以通过。国家规定高层建筑的高度限制为70罗马尺（21米），建筑物之间应留出10罗马尺的空间（3米）。法律也要求在对着毗邻建筑物正面的地方应修建平顶的门廊，以使消防员可以更容易地进入房间。大火的威胁也使人们大力推广砖包混凝土作为建筑材料。但是，我行我素的情况依然存在，图拉真不得不又一次将高度限制到60罗马尺。例如，2世纪建的法利古拉高层公寓楼（the Insula of Felicula），它的高度使它跻身罗马名胜行列。

尽管国家有规定，但危险建筑依然存在。图拉真统治期间，朱维那尔（Juvenal）[①]为此写文章讽刺罗马：

> 大部分建筑由细长的柱子支撑：这就是为什么管家要修补旧墙的裂缝，他告诉那些在屋顶下安睡的居民，对噪音要有所准备。不，不，我必须居住在没有火灾、没有夜间警报的地方。下面的[居民]已经嚷嚷着要水，搬动着他的物品，浓烟正从你的三层阁楼上滚滚涌出，但你对此毫无知觉。因为如果警报是在第一层响起，最后一个烧到的人就是除了屋瓦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风避雨的人，但在屋瓦中，温顺的鸽子正在产蛋。

一室的单元房可能大部分属于穷人。还有一些是店铺（tabernae），上面有一个夹层，用于居住或储藏。

① 罗马作家，生于公元47年左右，为被释奴之子，目前存有他的16篇讽刺文章。其去世时间约在127年以后。——译注



奥勒良墙中阿西纳里亚门（S.Giovanni）后面的景象。它的单拱（中间）、上层及后面的围墙（前景）建于霍诺里乌斯统治时期（5世纪早期）。

房子（domus）的主人有可能扩建他们建筑的店面。西塞罗曾经拥有一些明显有害的危房：

> 我的两间店铺已经倒塌了，其余的也有很大的裂缝，结果不仅我的房客甚至老鼠都搬了出来。别人说这是一个灾难，但我认为它还没有造成什么不便。但是，根据韦斯特里乌斯（Vestorius）的建议，我开始了一个重建计划，它将使这座危房有利可图。

罗马的几处高层公寓楼的遗迹已经发掘出来了，许多在城市地图上有所显示。在拉塔大道东边的加勒里亚柱廊下发现了哈德良公寓。1928年到1930年间，沿着卡皮托林山西北线发现了一套公寓楼，它紧挨着位于阿拉古利的圣玛利亚教堂（the Church of Santa Maria in Aracoeli）的台阶，部分位于台阶之下。这座靠山而建的楼房保留至第六层的地面。第一层是商店，前面有尼禄式的防火连拱廊，上面是夹层。第三层分为三个房间，仅有部分发掘出来。第四层，可能也有第五层是一排排单间，由走廊连接，那些在后面的房间仅有很小的窗户，光线很暗。整个建筑的正面由于和晚后的建筑合并，得以保留下来，比如桑提吉奥瓦尼埃保罗的克里乌斯·斯考利（the Clivus Scauri of Santi Giovannie Paolo）一面、塞尔西大道（the Via in Selci）沿线的建筑正面以及狄·波塔·拉比卡那大道（Via di Porta labicana）沿线奥勒良墙的一部分。1世纪到3世纪砖包混凝土以及拱顶支撑地面结构的推广减少了火患，提高了这种建筑物的幸存率。无疑，还有许多建筑屹立着，重新用于后来的居民建筑。

古代的讽刺作家津津乐道于罗马生活的危险。洪水、火灾、地震、建筑物倒塌、掉下的物体及抢劫都可能减短人的寿命，但更可怕的是恶劣的卫生条件，男性和婴儿的高死亡率、疾病在人群及公共浴场的传播。瘟疫定期光顾，65年死了30，000人，仅189年，每天就有2000人死于瘟疫。在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统治期间，军队从东方带来的鼠疫在罗马传播，这场灾难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证据表明，营养不良也是地方性流行病，疟疾和其他相关疾病非常普遍。

罗马人死后埋葬的方式和地点取决于他们的地位、财富和所处的时代。城市圣界以外的普通希腊-罗马坟墓意味着当罗马扩张时，建立公墓的习惯要早于移民。罗马广场有一些年代最早的公墓，但均为后来的建筑覆盖。厄斯奎林高地和所有通往罗马的主路都发现了公墓。当马提乌斯校场扩建，边界向外延伸时，在北面修建了葬礼纪念碑。盖乌斯·波普里奇乌斯·毕布鲁斯（Gaius Poplicius Bibulus）的坟墓位于卡皮托林山脚下，可能在2世纪早期首次修建。奥鲁斯·希尔提乌斯（Aulus Hirtius）死于公元前43年，他的坟墓发现于校场中部。奥古斯都的陵墓始建于公元前28年，正好位于马提乌斯校场尽头、拉塔大道和河流间的狭窄地带。

从奥古斯都到涅尔瓦时代，皇帝及其家族的知名人物实行火化，骨灰放在坟墓中。图拉真被授予埋在广场内其记功柱基里的殊荣。其后哈德良在河对岸马提乌斯校场的西北面修了一座巨大的新陵寝，直到塞维鲁时代它一直用于埋葬帝王。元老等级的成员也修建大的陵寝，特别是在公元前1世纪晚期到公元1世纪早期这段时间里。位于阿庇亚大道（the Appian Way）上的前三头之一克拉苏的孙女卡西里亚·梅特拉（Caecilia Metella）的坟墓，（圆形坟头的直径为100罗马尺〔30米〕）和奥斯廷西斯门旁盖乌斯·塞斯提乌斯的坟墓是现存的两个最有名的例子。奥古斯都的被释奴面包师幼里萨斯（Eurysaces）的坟墓由于并入提布尔提那门得以保留，这是一个富有但社会地位低下的阶级成员的显要声明。被释奴群体的骨灰被埋在巨大的有多个小龛的陵墓中（columbaria），为确保死后得到纪念，其他人也加入了埋葬仪式。似乎罗马人对来生特有的模糊观

念，由于这么多人心中莫名的恐惧而变得更加复杂了。在铭文和个人墓碑上，提到最多的可能是士兵，因为对罗马而言，许多人是外国人，因此特别注重证明他们的身份和成就。

火葬及日益盛行的土葬为建筑师和雕刻师提供了赚钱的行当，城市的公墓以建筑装饰、雕像、墓碑、铭文、骨灰坛和石棺等形式为后代人留下了丰富的大理石战利品资源。3世纪到4世纪，地下公墓有了巨大发展。这些主要是基督徒的公墓，但也有传统宗教和犹太教的公墓。地下墓穴的优点是可以合葬并且便宜，它们为现代研究提供了保存完好的雕刻、浮雕和人工制品。

帝国晚期的城市

3世纪的短命皇帝经常不在罗马，他们对城市建设的直接资助减少了。由于帝国建设的放缓，对帝国周围精美石材的开采也减少了。管理制度依然保留，旧建筑也得到了修复。但是，一些皇帝，例如奥勒良确实为城市贡献了重要的新建筑，特别是他为城市修建的新的防御工事。

不过，新的四帝共治制在与城市关系方面努力模仿先前的皇帝。为庆祝登基20周年，戴克里先平生首次参观了罗马。新的胜利纪念物逐渐占据了罗马广场。新浴场也献给了城市人民。当马克森提乌斯在残余卫队的支持下把城市变为他的据点，以新的维纳斯和罗马庙、巨大的穹顶观众厅（马克森提乌斯会堂）及其他帝王建筑装饰它时，罗马继续享受直接的资助。与罗马的密切关系意味着征服了罗马的内战对手同样要关注城市。君士坦丁一世再次捐献了会堂，建立了帝国最后一座浴场——位于奎里纳尔山上的君士坦丁浴场。他解散了在罗马以外击溃的近卫军，而且，他把自己的资助转向基督教仪式，修建了第一座大教堂。为了不触犯传统主义者，他把教堂建在了位于城郊的自己的土地上。

4世纪罗马的人口可能处在下降的趋势中，但元老等级依然过着奢侈的生活。对帝国的关心，即认识到要保持罗马的辉煌可能要追溯到提奥多西法令（the Theodosian Code）。当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于357年参观罗马时，他已不能再筹集资源或招募熟练工人建立规模超过其前任的建筑。他参观了图拉真广场，从图拉真柱的阳台俯瞰了城市，对图拉真的骑马雕像感到好奇。他超越其他皇帝的一次行动是在大竞技场树立了曾带入罗马的最高的方尖碑（32.5米）。



向西北面看到的4世纪早期罗马的规模。可以辨认的是弗拉维圆形大剧场（中间）、神圣的克劳狄庙（向左）、帕拉丁宫殿（左上角）、罗马广场（中部顶端）以及帝国花神庙（右上角）。

第八章

帝国文学

西蒙·斯万





帝国文学

提到罗马世界的文学，我们意指什么？它扮演着什么角色？这一章将试图回答上面两个问题。我们将从传统的意义上理解文学，考察它与整个罗马社会的关系，但我们也将超越文学的传统定义，考察丰富了罗马世界知识的写作文化更广泛的层面。

现存的古罗马文字材料包括不同社会阶层留下的各种文本，从写在埃及纸草上的税收报告到刻在石头或青铜上宣传、纪念或发布命令的私人文字到抄写员一代一代传下来直至能够复印的较长书稿。我们所说的罗马文学在狭义上大部分属于最后一类材料。

古代的书籍分为两种形式：最初是纸草卷，然后是我们所熟悉的替代纸草卷的“书本”（codex）。纸草主要产于尼罗河三角洲。制成的纸草卷长度在6米至8米之间，文本以竖排书写。近来的工作是试图把每一行书写的字母数量——大约二十个以上，中间无漏字——同眼睛移动与选取字母的方式联系起来，这似乎对这种另类的、不太方便的版式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不过，这种书的阅读体验与我们的有很大不同。打开书卷就很可能需要一个奴隶的帮助。再者，人们在很长时间内相信（根据几本有名的古代参考书），阅读这种书的方式通常是大声朗读的。

随着罗马世界的发展，书籍发生了明显变化。罗马的商人们开了书本风气之先。起初，人们把一张张羊皮纸（已经备好、干燥的动物皮）用线缝在一起，这种方法源出于传统的石蜡书写板的木板面。以这种方法制成的书本到公元前1世纪末一直用作商业记录的笔记本。据诗人马蒂尔记载，到1世纪，作为文学作品载体的羊皮纸书出现了，与之同样廉价的是一般纸草卷的袖珍本。从2世纪晚期起，把纸草页连缀在一起，以羊皮做封皮的本子广泛用于文学作品。真正打破纸草卷和书本之间均势的是基督徒采用了书本。书本确实容易阅读，分开的书页使人们更容易找到特定的文本内容。这种新技术对于推动新宗教的神圣文本的阅读是个理想的方式。从3世纪末始，羊皮纸书籍成为世俗和宗教作品的一般形式，但是埃及是个例外，纸草在那里至少直到6世纪还在使用。

作为古典生活主要的幸存材料之一，古代作家留下了很多这类书籍，但是书的生产必然是缓慢的。罗马有一些大型私人图书馆（西塞罗记载了他参观学者马可·泰伦提乌斯·瓦罗、独裁者苏拉的儿子法斯图斯·苏拉〔Faustus Sulla〕、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Marcus Licinius Lucullus〕的图书馆的情况——众所周知，西塞罗自己也有一个大型图书馆），但没有证据表明罗马的精英成员一般都有规模不等的私人图书馆。虽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诸如罗马、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这样的大城市有公共图书馆，但并不十分普遍。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罗马社会并不像我们自己的社会一样，建立在书写的基础之上。演说无论何时何地，甚至在最正式的场合都是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罗马生气勃勃的文学界出产的



一幅罗马壁画，画面上是希腊剧作家、著名的雅典新式喜剧大师米南德（Menander）。画中的米南德戴着文学比赛中优胜者的桂冠，这对于一位写就七十多部作品的作家是适宜的，他的许多作品被泰伦斯和普劳图斯改编给罗马的观众。

著作大部分从未打算以书面形式传播；人们以生动的口头表演形式宣传自己的作品，希望给观众中有可能赞助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文学和庇护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不管书面文学或口头文学，主要局限于精英群体——那些控制着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机构的人（主要是男人）。写作文化是贵族精英文化。实际上，写作文化、财富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密切关系意味着文学作为精英们的一种竞争手段在罗马社会发挥作用。

希腊的影响

对罗马世界文学和丰富的文化活动的描述务必以重述第五章已经概述过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希腊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关系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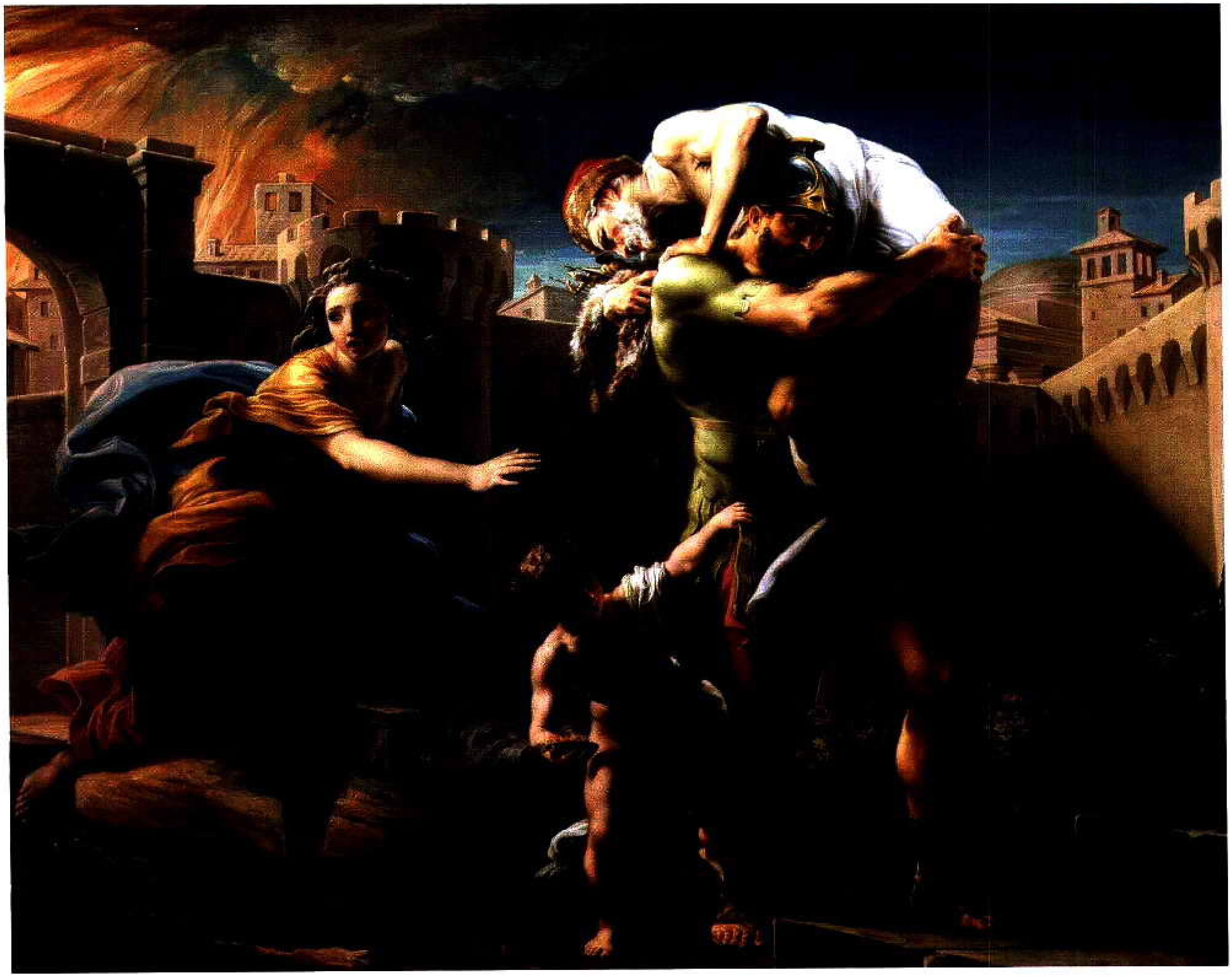
罗马精英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即掌握"两种语言"。日常用语是拉丁语：宣传这种双重知识对罗马人是很重要的，然而希腊人没有理由这样做。事实上，虽然我们可以断定希腊语世界的精英也懂得拉丁语，但希腊人倾向于对它缄口不言或声称他们不懂拉丁语。修辞学家昆体良建议罗马富裕家庭的儿童应该在学拉丁语之前先学习希腊语。根据拉丁作家对他们的观众们的希腊语知识的预先判断，显然，昆体良的建议符合真实的生活。

拉丁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借鉴、竞争和互相尊重的过程，同时也是怀疑的过程。共享的、相通的神话语言处于所有古代文化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神话是希腊人的东西，大部分希腊罗马世界的神话都起源于希腊，但神话是一种任何人都能理解的语言。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许多城市居民都得益于改编希腊的英雄神话，把它们重新用作自己的建城传说，把自己溶入到希腊文化当中，包括希腊文化令人惊叹的文学、艺术、建筑、法律、哲学、政治、宗教，甚至军事的成就。在意大利，埃特鲁里亚人坟墓中的壁画和手工艺品最早证实了埃涅阿斯传说的流行。埃涅阿斯有两点优势：他是希腊神话中的角色（他是《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但也是一个非希腊人，一个特洛伊人。《伊利亚特》中已经预言他将统治希腊人。他在西方的漫游很早即被证实，这使人们很自然地选择他作为西方权力萌芽的奠基人。当罗马在公元前3世纪与希腊世界开始了军事、政治交往时，罗马作家大力宣扬埃涅阿斯。这种宣传的顶点是罗马的国家史诗，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的出现。它可能在公元前20年代首次公开朗诵。罗马人对希腊神话的这种借鉴同时涉及整合与疏离，可以说通常罗马与希腊文化的关系也是如此。



一尊真人大小的罗马最伟大的修辞学家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的大理石雕像。西塞罗对修辞学的精通使他成为一位有影响的律师、政治家和文学家。在皇帝统治下，修辞学失去了大部分政治作用，但是它的文化影响，也可以说西塞罗的文化影响，在西方比帝国的影响更为持久。

正如第七章所示，古代罗马是历史上最大的世界大都会之一。到公元前2世纪，在城市的其他外来少数人口中，形成了一个数量很大的、稳定的讲希腊语的人群，主要由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构成。罗马的贵族由此习惯于使用讲希腊语的奴隶或释放从前的奴隶，而不使用地位较高的自由希腊人。这种做法扭曲了他们对罗马在这一时期获得的对希腊语行省居民的看法。大多数罗马贵族认为这些希腊人通常没有能力自我管理，这种政治态度在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罗马人很快认识到"古典"希腊是黄金时代，与他们目前遇到的显然被贬低的希腊文化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准备模仿、评价希腊人的思想产品。这在造型艺术和绘画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公元前2世纪，复制古典（希腊）艺术作品最初受罗马贵族精英们的



这幅画由吉罗拉姆·巴托尼（Girolamo Batoni）所作，标题是《埃涅阿斯逃离特洛伊》，突出了罗马的奠基性文化中的英雄个人的高贵品质。埃涅阿斯带着年幼的家人离开烈火熊熊的特洛伊城和杀气腾腾的希腊人，附带扛着自己年迈父亲的这个细节，表现了大部分罗马人所具有的品质——孝敬老人。

喜好所推动，到3世纪晚期，地中海地区的艺术文化已被这种复制所统治。艺术清晰地显示出罗马人根据自己对希腊人的理解塑造希腊文化的决心，但是——至少在视觉艺术上——他们从来没有信心十足地做这件事。可以肯定有许多罗马艺术家创作了古典风格的希腊艺术作品，但没有人敢于宣称能与先前的希腊艺术家平起平坐。

拉丁文学和诗歌

但是，文学的情况却大相径庭。有明确的证据证实罗马人的感受力，他们利用属于自己的不同的语言，以一种完全独立的方式，在这方面发展出某些新的东西。马尔库斯·波西乌斯·加图（老加图）被称为拉丁散文文学的奠基人。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他用拉丁文写了第一部历史著作。他在公元前168年动笔，当时罗马已经做好了摧毁希腊马其顿王国的准备。罗马庞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显然需要有使用自身语言书写的历史。

加图是个顽固的老人，他以愤世嫉俗的旁白和不分青红皂白的谴责闻名（值得注意的是对希腊医生的谴责，他宣称他们正在密谋杀死罗马人），但他也富有远见。他的史书称为《双城记》（*origins*），不仅关注罗马，也包括整个意大利。这部著作表达了对罗马的民族主义信念，该信念基于罗马对意大利人业已确立的统治。《双城记》开始了罗马历史学家以拉丁文写作的长期传统，包括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盖乌斯·撒路斯特·克里斯普斯（Sallust）、公元前后的提图斯·李维（Livy）和1世纪末到2世纪初的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塔西陀等杰出人物。所有这些人在形式上都借鉴了希腊风格（特别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风格），但在内容上，无疑是从罗马人的角度讨论罗马事物。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卷1（1—18节）

我要歌颂的是战争和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受命运摆布，离开了特洛伊海岸，傲慢的朱诺不忘前仇，让他一路上跋山涉水、历尽了苦难，他还要经受战争之苦，才能战胜拉丁王国，建立自己的城邦；他把故国的神祇安放到拉丁姆，保证了血统的延续，从此才有了阿尔巴的父老和伟大的罗马的持久光荣。

缪斯女神啊，请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和罪行冒犯了女神，以致她如此嫉恨，致使上天的女王开始惩治这个如此勇敢正直的人，让他命悬一线，经受匮乏与突如其来的战争磨难。难道天神们竟怀着如此深仇大恨，把他们的怨恨化作人们的灾难？

约翰·德兰登（John Dryden）译

最早的拉丁诗歌是改编或翻译希腊范本，包括约在公元前205年至前184年从事创作的提图斯·马修斯·普劳图斯（Titus Maccius Plautus）和在公元前160年代写作的普布利乌斯·泰伦提乌斯·阿菲尔（泰伦斯）的著名喜剧。拉丁诗歌在公元前1世纪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共和晚期和帝国早期的主要诗人包括盖乌斯·瓦雷里乌斯·加图路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维吉尔、昆图斯·贺拉提乌斯·弗拉古斯（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塞克斯图·普罗普提乌斯（Sextus Propertius）、阿尔比乌斯·提布鲁斯（Albius Tibullns）和普布利乌斯·奥维德·那索（Publius Ovidius Naso）（奥维德），还主要受到他们的希腊前辈的影响，这点较历史学家的情况要突出。就诗歌来说，希腊素材的纯粹性将希腊的韵律强加于一种具有完全不同地方传统的不同语言之上。希腊诗歌的主题也很流行，但在此我们必须谨慎。主题遗风罗马化的过程既是文学性的，同时也是政治和社会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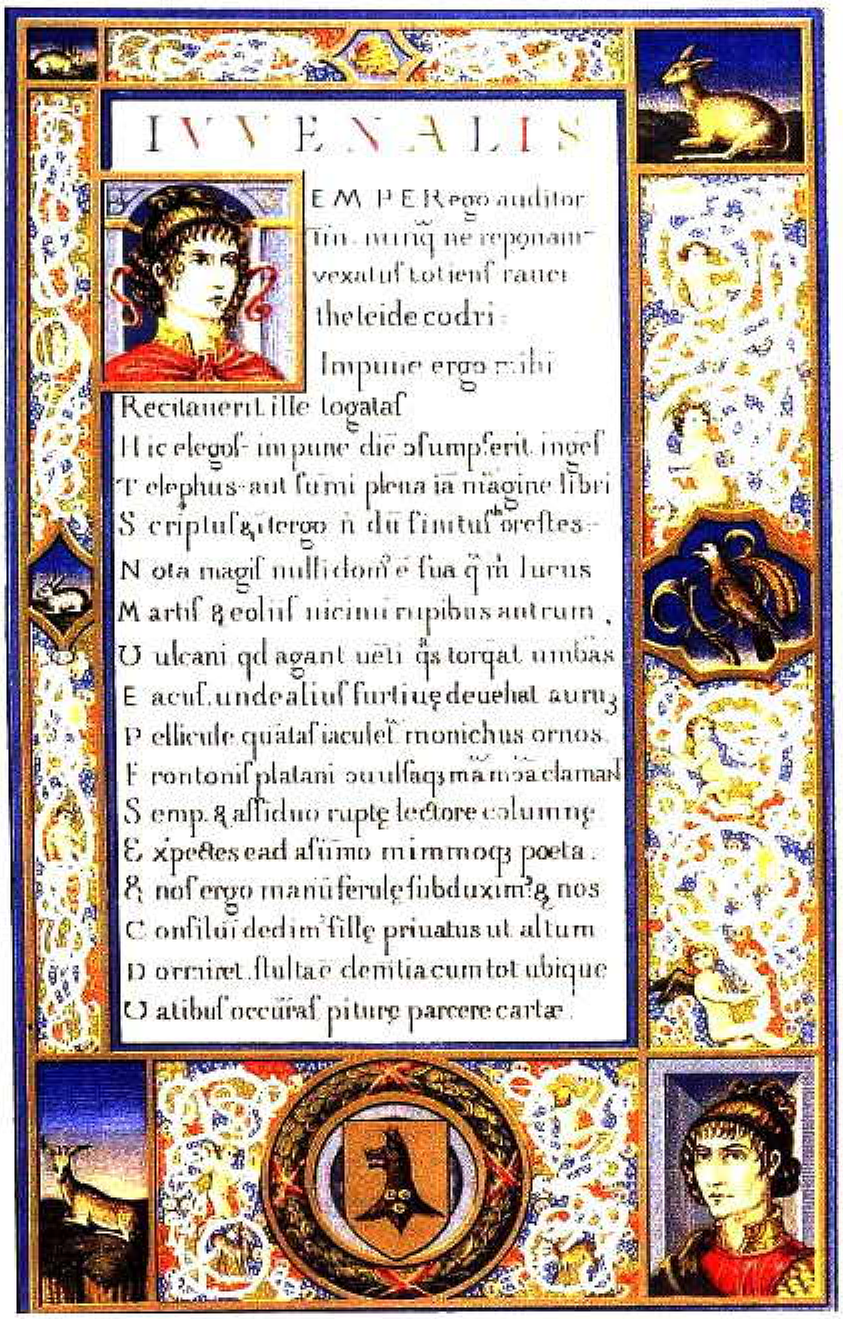
共和晚期的财富在这些诗人中造就了一个年轻的文学贵族阶层，他们以希腊化时期的宫廷文化而不是早期罗马的文化作为他们自己写作和娱乐的样板。加图路斯、普罗普提乌斯、奥维德和其他人都讲一种新语言。他们讨论情人们在50年代中期开始修建的罗马新式"希腊化"时髦场合约会的情景。他们把心思完全放在讨论"情人"的不忠和"情敌"的成功这类主题上。他们描写家庭和朋友。他们为取乐重写希腊神话（奥维德的《变形记》）。他们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流传，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情况做了一般性的概括，也与他们的写作技巧和幽默感有关。他们公开宣传性解放乃是一种冒险的做法——西塞罗抱怨这些文雅的年轻人把性看得比国家还重要。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作风严谨的奥古斯都放逐了奥维德。

加图路斯著名的爱情诗系列提供了典型的例子。他的诗叙述作者与一位他称为"莱斯比亚"的已婚妇女的感情纠葛，从兴冲冲地夸耀她的美貌、修养和自信到庆祝他成为她的情人的好运，直至发现她继续同其他情人保持密切关系后的绝望。他的叙述涵盖了恋爱中的人们的全程感受。他对爱情解释的深度和坦诚远远超出了希腊化文学漫不经心的方法。有趣的是，这种把个人隐私作为严肃诗歌的适当主题的新方法，也使古典时代罗马惟一的女性歌颂自己的爱情。苏尔皮西娅（Sulpicia），奥古斯都时期一位杰出政治家的侄女，成为这种新文学排他本性的提示者。她的"塞林苏斯"（Ceiinthus）在为罗马生活而改编的希腊风格的诗歌中，是一个典型的希腊假名。

我憎恶我的生日，
我必须为此破费，
在没有塞林苏斯的可怕乡村——有什么比城市更让人向往呢？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像恺撒评价西塞罗时所说："拓宽罗马的文化疆界比扩展帝国的边界更伟大。"

西塞罗实际上创立了罗马哲学，确立了罗马演说的可靠性与权威性。维吉尔成了拉丁诗歌的样板。所有这些作家一起为奥古斯都帝国以及以后罗马人的治权提供了一种深刻的文化基础。



在一个领域，拉丁文学不仅突破了希腊的影响，而且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风格。讽刺（satura）是一种文学类型，出现于共和晚期和帝国早期的罗马。这幅插图是戴西姆斯·朱尼乌斯·朱维那利斯(Decimus Iunius Iuvenalis〔Juvenal〕）的一本15世纪手稿中装饰得非常华丽的一页。虽然它夹杂在传统的教会手稿中，但它完全是一个世俗文献。在朱维那尔的笔下，罗马的腐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植根于演说术

不过，要真正理解罗马文学所扮演的角色，只有超越文学一词的狭隘意义。事实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只是更广泛的写作文化的一个方面。

在共和晚期和帝国时期，这种更为广泛的写作文化开始于演说术，即劝说艺术。罗马的上层文化重视在公共场合所具有的娴熟演说技巧。这不可避免地使修辞教育成为男性的一种主要特权，虽然女孩也明显能从这个过程的某些阶段受益。希腊人发展起来的正式演说训练最初受到罗马人的质疑（虽然自己精于演说，但老加图却谴责那些求教演说术的人，“参与某个话题，自然就有话说了”是他的建议）。然而到公元前2世纪晚期，罗马的公共演说普遍采用了希腊人的修辞技巧，从1世纪早期起，正式的演说训练成为罗马教育制度的一部分。

罗马人的演说教育制度与希腊的十分相似。学生们到语法教师那里学习朗读并且做简单的练习。在大约13岁时，他们会到专门教授五步演说法的老师处学习。他首先教不同类型的演说（赞美演说、讨论演说、法庭演说）及其适当的结构和论证方法，然后是布局谋篇（就是写作）、辩术（从拉丁语知识开始，过渡到演说手法和工具等等）、记忆（在古典世界被认为是一种技巧，不是天赋），最后是表达（声音的控制及肢体动作）。

大部分演说理论以法庭辩论为基础，非常注重论证和各类证据。在共和晚期，演说主要集中在元老院和法庭（保存下来的西塞罗的法庭演说是演说家在法庭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一个证明）。但在帝国时期，最广泛的演说类型是赞美和驳斥的演说（称为颂词或赞词）。这些传统形式之所以重新受到重视，可能是因为帝国清晰地界定了社会政治等级的金字塔，皇帝处于顶峰。在许多情况下，同大臣、军事的和民职的官员正式讲话是必要或有益的。在细心地礼尚往来之间，无论是演说还是书信形式，这种交互作用成了一种固定形式。这些交流背后则是数年如一日地练习规范写作法则的过程，因此可以将其看做一种文学形式，在罗马精英的日常生活中，它们体现了文学技能的非常重要的实用性。

上面概括的演说步骤体现了马尔库斯·法比乌斯·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Quntilian〕）的体系，他是非常有影响的《演说家的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 一书的作者。昆体良是1世纪晚期罗马的一名专业教师和辩护师。他也曾在弗拉维王朝的宫廷中身居要职。《演说家的教育》第12卷和最后一卷提出了完美的西塞罗式演说家的理想。昆体良声称鉴别这种演说家的素质对他来说是最艰难和最具独创性的任务。他眼中的演说家兼具道德品质、系统的教育理念、职业感和选择演说风格的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加图称为“擅长演说的好人”的形象，即完美的罗马人。这种理想的演说家形象使他的书一直很受欢迎：每个罗马精英都想让人们看到他拥有昆体良概括的高度的文化教养。

手势和面相

昆体良在最后一卷中给出的关于如何利用正确的手势和动作保持适度这种风格化的形象，应当在前一卷里详加评述。比如，他列举了不少于23种手或手指的不同动作："最常见的手势是中指弯曲，挨着大拇指，其余三个手指张开"；"如果食指指尖接触大拇指盖右侧边缘的中部，其余手指放松，这个手势表示完全同意"；"也有一种表示坚持的手势，即迅速地将手反复开合，这是一种很平常的手势，不属于艺术"，等等。这种详尽的建议证实了这一时期的人们对注视与被注视的广泛关注。

如果考虑帝国精心整合的希腊罗马贵族社会，这种强调观赏、定位和评价的文化大概就不会令我们感到很惊奇了。有产阶级人数不多，却具有竞争性。密切观察某人的竞争对手们的特点十分重要，而研究他们的动作和讲话方式是了解他们个性的关键。当时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是希腊哲学家、随笔作家和传记作家卢基乌斯·马斯特里乌斯·普卢塔克（Plutarch），他生活在大约公元50年到120年间。普卢塔克了解罗马社会强加给文化人的压力，为反映这一特点，他创造了一个新词"dusopia"（"尴尬"）来表达当社会压力要求一个人以违背自己意愿的方式行事时发生的情况。昆体良和普卢塔克因此都认识到了现代社会语言学家在语言交流中称为"面子"的东西。在做这件事时，他们为我们指出了罗马帝国教育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另一位杰出的文学人物、演说家、富豪贵族、皇帝哈德良的廷臣是来自拉奥迪西亚（位于现代土耳其东南部德尼兹利附近）的马尔库斯·安东尼·波勒穆（Marcus Antonius Polemo），在一本反映贵族竞争的著作中集中讨论了面相问题。波勒穆的手册《面相术》（*Physiognomy*）详细介绍了在判断被观察者属于哪类人时，身体的不同部位——它们的形态、颜色和动作——传达给观察者的信息。这部作品意在引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注意，导言（如现在保存的所示）讨论了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的相貌。波勒穆非常认真地从眼睛说起。实际上，他的（依我们的看法）过分详尽的描述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

> 如果你见到眼睛上翻，与牛眼类似，这是愚蠢、粗心、智力低下的象征，因为他们是沉溺于声色犬马中的人。如果眼睛逐渐变成青色，这显示了一种致命的爱……如果眼睛布满血丝、瞪得很大，表明此人喜好饮酒、争论和女人；他永远摆脱不了淫欲、邪恶、爱争论和懒惰。

这本书最有趣之处是作者从面相的角度讲述了仇家的几桩轶事。在3世纪塞维鲁王朝的廷臣弗拉维·菲罗斯特拉图斯（Flavius philostratus）对"智者"（或高级修辞学教师）的系列描述中，波勒穆本人成了一个不朽的人物，在回到波勒穆之前，先看一下菲罗斯特拉图斯是个不错的主意。

《智者列传》（*THE LIVES OF THE SOPHISTS*）

对于把高度的文学修养作为贵族生活的一种本质而言，《智者列传》是极其重要的史料。菲罗斯特拉图斯关注的显然是记载过去200年间最著名的教师们，赞美他们和他本人所欣赏的演说风格和主题。但对他来说，这必须叙述贵族们的活动，这个问题占据了书中大部分篇幅。贵族是变动不定的，关于波勒穆的传记及其演说是从强调传主与比较重要的城市斯米尔纳（Smyrna）和与哈德良的关系开始的："波勒穆如此傲慢，他把城市人看做下人说话，不视皇帝为君上，神也只是与他平等的人。"菲罗斯特拉图斯特别注意波勒穆赢得观众好评的"布景或戏剧效果"，包括他的服装，他在舞台上的动作和他的演说。波勒穆把自己的表演比成汗如雨下、为生命担忧的角斗士的表演。曾经担任过保民官，富有的雅典智者和政治家赫罗德斯·阿提库斯（Herodes Atticus）用《伊利亚特》中的一句话忆及对他的印象："快马的欢叫打动了我的耳朵。"

菲罗斯特拉图斯对他熟识的一位2世纪晚期的智者的描述可以用来说明波勒穆的生活方式。达米安努斯（Damianus）是他的母邦以弗所的主要经济捐助人。菲罗斯特拉图斯写道：

> 他能够扶助穷人、修复公共建筑。他建了一座一斯塔迪长、有顶的大理石走廊、将阿尔忒米斯神庙



一本17世纪出版的昆体良作品的封面。画面意在表现学习演说的学生们在老师面前演习技能。虽然演说作为一种公共表演形式发展了起来，但到昆体良时代，这种活动主要限于皇帝的接见厅。他的演说小册子可以当作廷臣的指南，是所有贵族的重要读物。

与以弗所连接起来，这样雨水就不会妨碍崇拜者前来祭祀。他以妻子的名义捐献了这座长廊，以自己的名义捐献了宴会大厅。他建的宴会大厅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同类建筑，磨光的弗里吉亚的美丽大理石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不过，达米安努斯并没有忽略自己：

> 他所有的土地上都种着树，提供了好吃的水果和大片的树阴。在靠海的土地上，他修建了近海小岛，为了他的货船而对港口进行保护。至于他在郊区的家，一些房屋像城市的一样，而其他的就像大山洞。
>
> 这是水分充足的地区令人向往的景象，这里物产丰富，同时又很舒适，有他们的经济区和别墅，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断裂的城市碎片"。

菲罗斯特拉图斯记载，达米安努斯被葬在一间乡村别墅中，他曾在这里度过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对这个地方的喜爱使我们想起了小普林尼在他的书信集中对他在意大利的两处别墅所做的热情描述：别墅中有绿树成阴的小道，满是灌木的花园，漂亮的房间和海景，尤其是出自庞贝的许多壁画证实了海边别墅的理想，这在地中海地区的贵族及其他的中产阶级模仿者中显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但是，达米安努斯肯定也在议会大厅、讲堂、剧场和其他公共场所花掉了很多时间，正是在这些地方，他引起了波勒穆的注意。波勒穆确实在各种私人和公共场所发现了他的牺牲品。在菲罗斯特拉图斯的传记集中，最有名的是出自阿雷拉特（现代阿尔勒〔Arles〕）的修辞家法罗里努斯（Favorinus）。法罗里努斯是个百万富翁，属于地位较高的骑士阶层，在他的家乡那波南西斯（Gallia Narbonensis）行省担任帝国祭祀活动的祭司。他是一支不开花的兰花（就是说，他无法生育），这一不幸的事实引起了众多人士的注意：

> 他眼睛浮肿，脸颊松弛，长着一张大嘴，脖子又细又长，脚踝粗壮，腿上有很多肉……他的嘴唇很薄，声音像女人一样。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他在城市和市场上游荡……他告诉男人他有办法让女人到他们身边来，同样他也能让男人到女人身边去。

波勒穆也是如此这般。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法罗里努斯会与奥鲁斯·格里乌斯（Aulus Gellius）的《阿提卡之夜》（*Attic Nishts*）（这是2世纪中叶一本重要的拉丁文著作，赞美贵族们在帝国鼎盛时期享受的高雅文

化和极其舒适的生活）中的那个出席皇宫各种活动以及私人宴会的非常受人尊重的专家——熟谙拉丁-希腊语、税务和历史的专家——是同一个人。

波勒穆对不符合常规的性生活的重视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事实上，这与当时文学对正确性行为的密切关注相一致，尤其是在所谓的“希腊小说”当中（参见第142页）。正确的关系通向婚姻的主题在文学中颇为常见，这至少部分是由于继续贵族统治的重要性。因此，2世纪初的一位伟大政治家、文学家，来自普鲁沙（现代布尔萨）的“名嘴”狄奥（Dio）写了一篇关于优卑亚岛（the Island of Euboea）上农村生活的作品，场景是婚礼庆典。这引起了狄奥对富人与他们的调解者的婚姻以及对财产与家庭、嫁妆与礼品、诺言与欺骗、协议与证明，最后是仪式上的辱骂与敌意的思考。

波勒穆同代人中的两个例子是两个默许在婚礼上受劫持的准新娘，如同波勒穆根据相面预言的一样，但这些描述读起来像小说中的段落，它们是按固定形式创作的艺术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文学反映了生活。他的另一个主题是巫术和毒术，这在当时的虚构文学中也是很重要的主题。但在一个没有现代科学的世界中，由于许多事情无法解释，所以相信巫术、毒术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如果被牵连到指控当中——往往由同行竞争对手所提出——那则是很严重的事。

教育和文化

我们已经提到文学构成罗马上层文化和贵族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各个方面，专门讨论了公共表演的口头文化——演说——如何成为教育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表明这种教育重要性的一些想法可以从古代最伟大的医生，帕加玛的盖伦（Galen）的观察中获得。在2世纪，成为一名绅士的前提条件是“了解我们每个人出自的家族、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和文化、我们拥有的财产及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盖伦所说的“教育和文化”概括起来就是“paideia”（音译为派迪亚，也就是教养。——译注）一词，是罗马文学修养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虽然这是一个希腊单词，但拉丁作家准确地理解了它的内涵。派迪亚不是学校中反复灌输、又被遗忘的知识。相反，它意喻着一种生活，一种根据上层文化原则而过的生活。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展示自己为基础的一种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在2世纪，为了让人们看到他们符合理想的行为和教养——也就是对派迪亚的强调，罗马贵族成员面对着巨大的压力。萨摩斯塔（Samosata）的讽刺作家琉善（Lucian）为人们的希望提供了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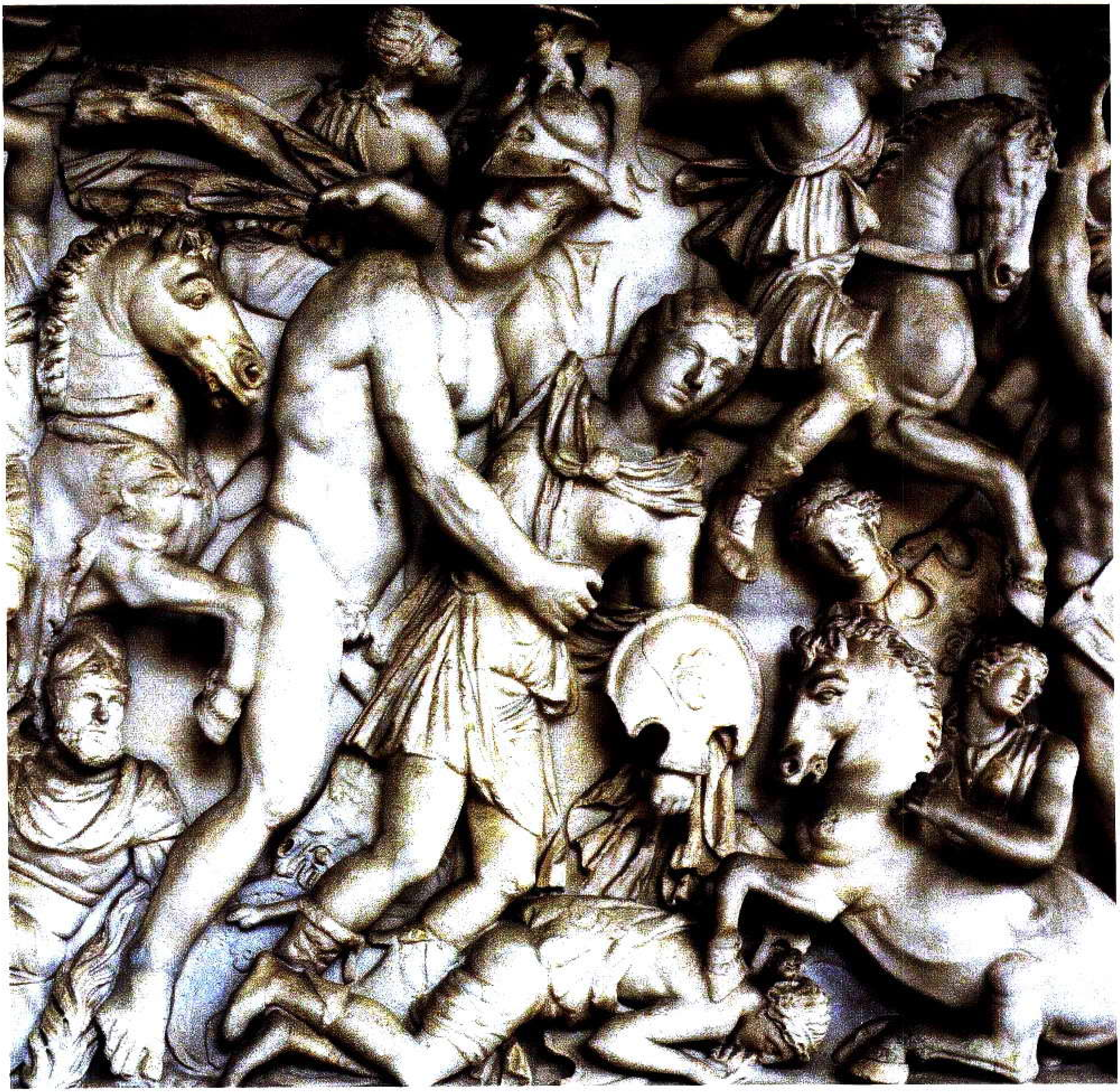
琉善敏锐地认识到上层文化的竞争性。保存下来的他的作品宣扬自己辉煌的成绩和独创性——这种做法有其正当的理由，因为他的优美的希腊文和敏锐的视角，使他从古代到文艺复兴一直是一位颇



一幅难解的罗马壁画局部，画面上显然是一群富有的女人。头上的花环表明这不是普通的场合，主要人物迈出了半步，意味深长地站在那里。我们不清楚画面上的人物是人还是神；她们是在参加剧场表演、宗教仪式还是诸如订婚或成丁礼等家庭庆祝均无法确定。

炫耀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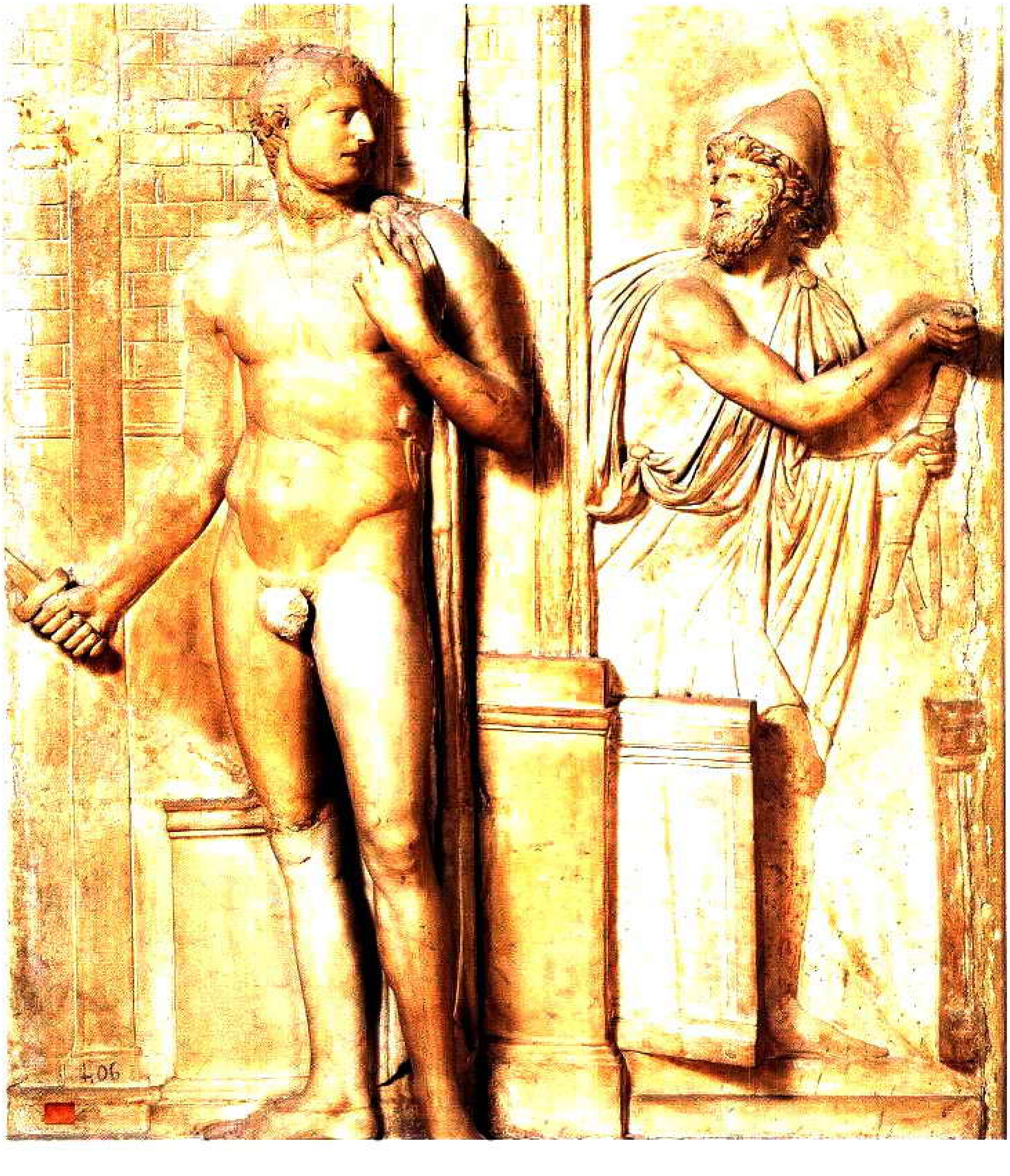
对希腊神话较晚后的改编在罗马帝国社会的精英文化中处于中心地位，不管是在生前还是死后。在2世纪早期，土葬逐渐在罗马人中盛行。特洛阿德（Troad，土耳其西北）的“食肉石”（lapis sarcophagus）成了新近流行的石棺的名称，石棺的平坦表面使艺术家们能够以贵族男女生前喜爱的同样主题



歌颂死亡。

希腊人和亚马孙人的战斗是许多受欢迎的神话场面之一。在这个被刻画的石棺上，英雄阿喀琉斯紧抱着他的敌人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a）的尸体。类似这样的神话英雄被雕刻在石棺上作为死者的代表，所以，在此我们可以断定阿喀琉斯和彭忒西勒亚代表着现实生活中的一对夫妻。如果是这样的话，艺术家和他的捐助人就可以对神话中阿喀琉斯杀死彭忒西勒亚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将神话塞进现实的框架，也见于现实生活中罗马人的相貌以及重要人物的发型，战士们混战的情形使人想起了另一个颇受欢迎的主题——成功的罗马军队——也正是从这一相同的时代开始，人们便在战死将领的石棺上发现了这一主题。

在罗马精英的生活中，一般的神话语言简直无所不在。比如，作家弗拉维·菲罗斯特拉图斯在3世纪早期对那不勒斯城外一所海边别墅中的私人艺术画廊所作的描述中，提到了至少65幅以神话场面为题材的绘画。菲罗斯特拉图斯让画廊主人的小儿子带领我们欣赏绘画，而他则仔细地向当地的年轻绅士讲解神话故事。这个时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绘画保存下来，但我们可以通过再次观察雕刻，获得菲罗斯特拉图斯和他的朋友见到的一些信息。斯帕达（Spada）浮雕是2世纪存留下来的最完好的作品，可能是位于罗马附近的一个私人家庭的艺术品。八块浮雕包含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例如小英雄奥菲尔特之死以及对主人的一座观海住宅的饶有趣味的一瞥。总而言之，它们恰恰证明了在罗马社会中，财富的拥有包含着相应程度地对古典艺术品的展示，证明了这些艺术品是从属于一种社会圈子的象征，贵族们在这个圈子里要经常相互炫耀、为获得社会承认而不断竞争。



特洛伊传奇是罗马文学、艺术和生活的一个重要主题。斯帕达浮雕之一（右图）描绘了特洛伊人偷走“帕拉丁”——罗马命运的保护神雅典娜的小雕像的故事。大多数罗马人认为是埃涅阿斯偷走了小雕像，但真正的行家却要的是与奥德修斯（Ody－sseus）（戴帽子的那位）和傲慢地手持雕像的狄俄墨得斯（Diomedes）有关的希腊神话版本。



出自意大利的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描绘丘比特和普塞克（Psyche）[1]的拥抱。像许多希腊戏剧一样，这个故事的情节取自凡人和神的交往——维纳斯派遣丘比特折磨凡人普塞克，结果丘比特与普塞克陷入爱河，最终普塞克成了他的妻子。

受欢迎的作家。他也对敌手展开猛烈的、毫不留情的攻击，并以此为乐。一则典型的断片涉及“无知的书籍收集者”——此人的存在使我们对文化教养在罗马社会的重要性有了不少了解。“你想以拥有书的数量来掩盖你的无知，”他评论道，“恰恰就像最愚蠢的医生使用象牙药箱，银火罐和镶金的解剖刀——但是当人们让他们利用这些工具时，他们却不知如何下手。”他继续说道：“如果有人看你拿着一本书——因为你总拿着本书——问它的作者是谁，你可以从标题上得到答案，但是如果进一步谈到书里的优缺点——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你却连一句也说不上来。我敢打赌你会祈祷大地裂开，将你吞没。”琉善嘲讽的东西是“因之好看”而被选择的书本——换句话说，他的目标恰恰是那个虚伪的对象，即假装拥有社会上层所要求的文化修养的人。

琉善对文化骗子的蔑视具有传奇性。推罗（Tyre）[2]的智者哈德良曾大胆批评他的希腊语。在2世纪的希腊罗马世界，希腊人最推崇的公共演说风格是模仿古典雅典文学语言的风格。为了能复制老式的语言和语法结构，许多人准备做教育投资，这种投资表现出当时社会对文学炫耀的热衷。琉善告诉我们，他生来本是一个讲阿拉姆语（Aramaic）的人，从他的许多著作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保卫他的希腊语的，这可能是他在评论中插入许多尖刻话语的原因。他对哈德良进行了众人皆知的、言语粗鄙的反击，在对诽谤进行辩解时充满了性影射，将真正恶毒的语言加入到了精英文化的竞争中。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形女子，代表被爱，有时被描绘成有一副蝴蝶翅膀的少女，有时被直接描绘成蝴蝶。——译注
② 古代腓尼基的著名城市，后被并入罗马版图。——译注

拉丁小说

今天人们了解琉善可能主要是因为他的《真实的历史》（*Alethe Diegemata*）一书。这本书首次描写了赴月球的旅行。写作《真实的历史》纯粹是为了娱乐，但也意在讽刺那些轻信的人，他们相信当时的旅游作家和探险家提供的有关妖魔鬼怪的离奇故事。该书是一种小说，根据西欧文学史，在罗马世界，文学方面最重要的发展大概就是希腊－罗马小说本身。

用散文形式讲述一个长篇的、虚构的故事，在这种意义上，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可能于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间出现在罗马世界讲希腊语的地区。这种小说从大约1世纪起就很受欢迎，在整个帝国时期一直盛行不衰。目前有五本希腊语小说和一本拉丁语小说（阿普雷〔Apule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或《金驴》〔*Golden Ass*〕）完整地保存下来，另一本拉丁文作品（皮特罗尼乌斯·阿尔比特〔Petronius Arbiter〕的《森林之神》〔*Satyrica*〕）部分保留下来，其余仅有些断卷残篇。

"小说"一词当然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作品。在幸存的残片中，主要是对性、饮酒、打仗的描写，内容显然非常庸俗。不论是《森林之神》①还是《金驴》都受到了译成拉丁文的生动的希腊短篇故事集、公元前1世纪鲁基乌斯·康奈里乌斯·希森那（Lucius Cornelius Sisenna）所写的《米利都故事》（*Milesian Tales*）的影响。《森林之神》是幸存下来的1世纪罗马文学中最有名的作品之一。这本书叙述了一群放荡的情人在南意大利的希腊城市所进行的有违道德的冒险。最初这本书的篇幅一定很长（可能40万个单词），有很多有趣的情节。一方面，违背常理的性生活被置于希腊背景下，主人公的名字来自希腊性学辞典，因为罗马人时刻准备质疑任性无忌的希腊人。另一方面，作者在选取下等社会的人物进行描述时，表现出了毫无掩饰的愉悦感，他们可能是尼禄享乐主义的"优雅的仲裁人"，历史学家塔西陀在一篇生动的描写中如此形容。《森林之神》（这个题目既是有意的讽刺，也涉及主人公恩库皮乌斯明显无用的性功能）的写作意图显然是供社会上层的读者消遣。书中多处对荷马的《奥德赛》进行了讽刺，包括经常出现的恩库皮乌斯冒犯普利阿普斯（Priapus）神后丧失性能力的主题（由此讽刺奥德修斯激怒波塞冬后遭遇的苦难），以及恩库皮乌斯与一个名叫西尔斯的女人之间的冲突。著名的"特里马奇奥晚宴"（Dinner of Trimalchio）的场面强调富有的被释奴特里马奇奥的粗俗及恩库皮乌斯的势利，它包含由特里马奇奥的被释奴朋友讲的一系列（大部分是淫猥下流的）故事，是对柏拉图《宴飨篇》的拙劣模仿。

我们不能确定皮特罗尼乌斯的著作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希腊传说，但是主要人物的背信和普遍道德低下几乎可以肯定是对当时希腊小说中（异性的）夫妻间的忠诚和美德的故意歪曲。其他的影响几乎可以确定来自哑剧和滑稽戏等群众娱乐，它们各自利用了出自神话（集中于最具戏剧性和悲剧色彩的一些场面）、家内以及同时代的性生活和暴力的一些情景。

阿普雷是自我炒作者和花花公子的原型。他唆使一个富有的寡妇和她的亲戚控告他搞巫术。他对控告的著名申辩（the *Apology*）以要求与法官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做智慧的交流为基础。他对在自己的表演性演说基础上出版的四本重要书籍感到非常满意，这些书充满了有关他所在的排他性社会圈子的各种信息。他的天赋最终在一本描写一个人变成驴之后的生活喜剧小说中得到了合理宣泄，这就是著名的《金驴》。这本带有很多插图故事和华丽的拉丁文著作，实际上是一本类似的庸俗希腊文佚名短篇故事的扩充版。由于罗马人对希腊人的偏见（主要集中于性变态和缺乏忠诚），佚名故事中的希腊背景被严重歪曲，语言是受过普通教育的人使用的希腊语，而不是主流希腊作家采用的复杂的古典形式，英雄则是罗马人的英雄。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罗马人，其候选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阿普雷自己。显然这就是《金驴》的原型，那两个文本几乎涵盖了罗马人利用希腊背景来实现自身文化的全部意图。毫无疑问，阿普雷在炫耀自己的希腊文知识。由于他出自北非的一座小城，对希腊文的熟识（他曾在雅典学习了一段时间）表明他个人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证明在罗马社会炫耀这种知识将会获得的收益。

① 喜好欢愉，耽于淫欲的希腊神。——译注

希腊文小说

保存下来的希腊小说均以理想化的异性相爱以及实现这种爱情遇到的自然或人为的障碍为主题。它们全都促进了婚前无性行为（或不是很多）、对婚姻的忠诚以及在人生多苦的世界中把婚姻作为理想选择的观念。同皮特罗尼乌斯选择希腊背景叙述同性恋人一样，希腊故事也在希腊世界寻找它们的背景——虽然情节中经常包括更新奇的在中东一些地区的旅行。不过，在背景上还是存在一点区别：在这些故事中，罗马帝国完全被看做不相干的东西，我们仿佛置身在一个永恒的、独立的希腊城邦世界。这些故事是由一些文化人为本阶层的消遣而作，读者们似乎幻想通过他们的广泛阅读和教育逃避熟悉的世界。这种现象集中在早期希腊文化界，使人想起了演说教育中的一个类似现象，因为虚构的演说也以现实为基础——富人与贫穷的邻居、僭主和被辱骂的公民、乖僻的丈夫和他健谈的妻子之间的争论等等——都被置于同样永恒的希腊世界。最后一个例子在4世纪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安条克的李巴尼乌斯（Libanius）的作品中保留了下来（在本·约翰逊〔Ben Jonson〕的《沉默的妇女》〔*The Silent Woman*〕一书中偶然被译成了英文），为了逃避，坏脾气的丈夫请求城市议会允许他自杀：



皇家芭蕾舞团表演的拉威尔（Ravel）的歌剧《达夫尼和科洛》（*Daphnis and Chloe*）。这部歌剧基于希腊作家朗格斯（Logus）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表现毫无经验的年轻情侣的故事。由于故事中滑稽的农夫以及对早期作品的模仿，该剧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在过去两千年间，故事的讽刺意味已经逐渐消失了。



一对夫妇合葬墓中的镶嵌画，发现于突尼斯斯法克斯附近。图中描绘丈夫和妻子参加葬礼宴会的情景。虽然这幅画出现于罗马时代的晚后阶段（马赛克发端于4世纪），但画中的形象很容易使人想到在罗马人的前辈埃特鲁里亚人中间流行的赤土色石棺，上面刻有躺着的夫妇。

> 新婚之夜还没到一半，她大声抱怨床不舒服。她的话让我相当烦躁——这不适合于一个新娘。然后，她问："你睡着了吗？"我更加心烦意乱。随后她问了第三个、第四个问题，我没有回答。我感到非常羞愧，而她却不以为耻。事情完全倒过来了：男人保持安静，女人喋喋不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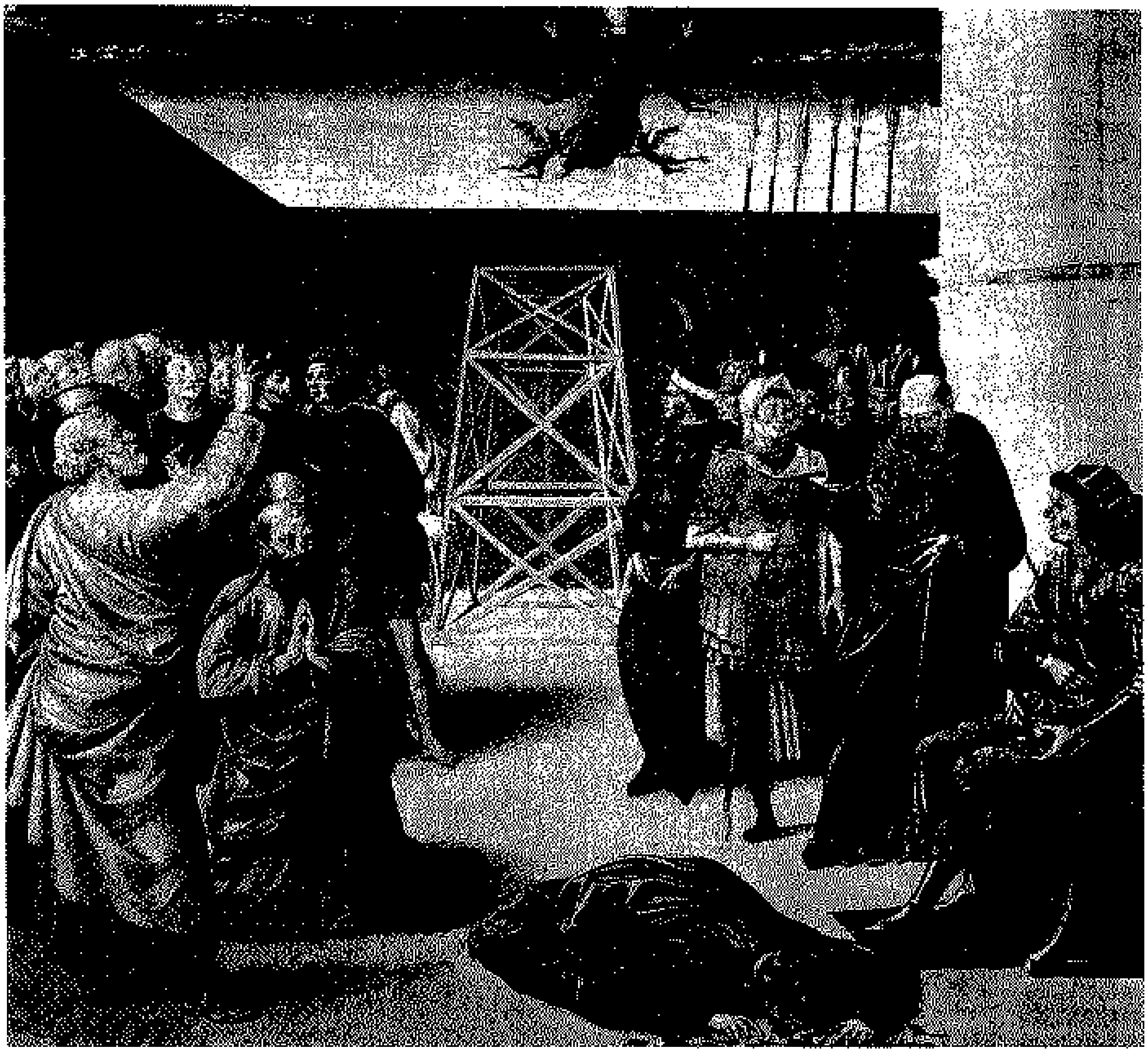
这些被正式称作"辩术"，学习演说的学生把它们当作练习的作品。在诸如公元前5世纪早期希腊战胜波斯这类历史事件为基础（通常是很松散的）的辩术材料中，他们想象中的希腊世界就更清晰了。既然作家和读者都是阅读这种材料长大的，小说以此为前提大概就不会让人感到惊奇了。

这些希腊小说中最好的是阿基里斯·塔提乌斯（Achilles Tatius）的《路西帕和克雷托丰》（*Leucippe and Clitophon*）、朗格斯的《达夫尼和科洛》以及希里奥多洛斯（Heliodorus）的情节复杂的长篇《埃塞俄比亚故事》（*Elhiopian Story*）。朗格斯的影响最大，他的80，000个词的小说有500多个不同的版本，还产生了拉威尔的著名歌剧。他的故事集中讨论年轻夫妇内心对性生活的好奇，而不是针对他们爱情的外部障碍，但这个故事究竟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城里人对一个可怜的青年农民的捉弄，还是真心诚意地试图称颂年轻人的纯真爱情还很难说。年轻的达夫尼和科洛原来是被遗弃的贵族后裔，沿着皮特罗尼乌斯的线索至少部分地指明小说具有讽刺的意图，因为农民主人公显然颇为滑稽。这个故事充满了其他较早的希腊文学资料——这种资料非常之多，要把它们全部列出来，需做一个详细的注释——古代读者之所以喜爱这个故事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就在于这些资料。

这里不可能对希里奥多洛斯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个最长的故事（大约八万个单词）十分详尽。令人吃惊之处在于作者对两个订婚的年轻人之间的忠诚特别予以强调，他们的分离构成了故事的基础。许多人猜测这个纯洁的故事具有宗教意味，基督教作家的确也称希里奥多洛斯是主教；这绝不是没有可能。而阿基里斯·塔提乌斯则大概是在极力吁请我们对这种写法往有趣处想，由此引发出他对"男性主导下的性生活"的好处进行了相当生动的描述和讨论。有趣的是，在基督教史料中也称阿基里斯是主教，虽然是指在他晚年的时候。故事中的两位主角最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阿基里斯无疑发展了这种写作套路，给读者提供了一些忍俊不禁的东西。

美德和基督教

这些故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牺牲男人同性恋为代价，强调异性之间的恋爱和婚姻。可能这是对帝国晚期在希腊-罗马精英们中间事实上存在的社会、道德优先权所做出的一种回应，也是罗马世界开始看重道德和善行的一种反应。类似主题在这一时期最吸引人、最成功的一部文学作品——即普卢塔克写于2世纪早期的对话《埃洛提科斯》（*Eroticus*）或《关于爱情的对话》（*Dialogue on love*）——中也可以看到。



一幅15世纪的绘画，由比诺左·格左利（Benozzo Gozzoli）所作，描绘了圣彼得对邪恶的巫师西蒙·马格斯的胜利，西蒙受了致命伤，躺在罗马皇帝的脚边。这个起初为了宣传早期基督教教义的故事在几个世纪中被美化了，成了适于圣画的主题。

普卢塔克的对话围绕一起与众不同的新娘绑架事件展开。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年轻小伙子被一个上了岁数的富有寡妇绑架。年轻人非常英俊，有许多男性追求者。寡妇的举动震惊了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特斯皮亚（Thespiae）小镇。普卢塔克巧妙地把柏拉图将爱情视为一种强烈的兴奋力量的观点从男性间的爱转移到男女之间的爱，他部分地以希腊古典时期之后的罗马世界赋予妇女较为独立的权利为基础（但是，性别平等在此是无法想象的。普卢塔克还写了一本有关婚姻建议的严肃作品，理想的妻子在其中仍扮演着非常传统的角色）。在对话中，婚后的爱情和男人与妻子肉体的结合由于互相的给予而显得富有吸引力，乃是很高尚的事。普卢塔克感到，在两个男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中，这种互相的给予是不太可能的。

对已婚夫妇而言，性关系是感情交流的基础，这像是一个很大的秘密……世上没有什么较彼此愉悦更快乐，没有什么较互相给予更恒久，没有哪种爱比“男人和妻子情投意合/家庭和睦”这种纯粹的美更让人羡慕和尊重。为了社会的繁衍，法律也会帮助“埃罗斯”①。

这段引文出自奥德修斯对诺西嘉（Nausicaa）公主未来幸福的祝愿，这是对人们耳熟能详的段落的恰当征引，是我们经常在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见到的现象。

普卢塔克的态度使人们更容易理解把希里奥多洛斯看做基督徒的观点，在公元2世纪至3世纪所谓的伪使徒行传中，基督教作家将旅行和冒险的新奇做法与对贞洁的强调联系起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种颇为有趣的文学作品包括广泛的情趣和风格。有理由相信，基督教的杰出人物读了这些为填补福音书、保罗书信和其他基督教作品留下的空白而创作的故事。这些作品创作的时期是富有的基督徒首次在罗马社会出现的年代。他们的要求在一种新文学形式的雏形——布道中得到了表达。这个词含有重要意义，最初它意味着“一次谈话”，但基督徒对它加以改进，使它具有布道者和他的听众之间谈话的含义，但这是一种独白而不是对话。它让我们看到了罗马精英生活中的一种新元素，虽然——这是基督教的秘密——不是一种全新的元素。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蒙特（Clement）是个典型的基督教作家，也是2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大部分作品写给富人和受过教育的群体，目的是使基督教安然无恙，以及能被这一群体所接受。在他的小布

① Eros，希腊词意为爱。——译注

道书《富人的救赎》(*The Rich Man's Salvation*)中，他设法解决由于耶稣那个著名的富人与针眼的比喻给富有的基督徒所造成的尴尬。在克雷蒙特看来，重要的事情是恰当地利用某人的钱财。

克雷蒙特的另一作品《私人教师》(*The Tutor*)进一步阐明了帝国晚期文学与真正的精英生活之间的关系。为了给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提供引导，这本书详细列举了引用的古典文学和文献的资料，表明克雷蒙特的读者是受过教育的人。书的题目也指明了这一点：私人教师暗指把富人的孩子带到学校的人。

咂嘴、吹口哨、打响指叫仆人的行为都是不理性的，因此理性的人要戒掉这些做法。经常吐痰、大声清嗓子、喝酒时擤鼻子也应予以禁止……如果有人要打喷嚏，就像打嗝时一样，他千万不该发出很大的声响，惊动身边的人，否则只能说明他缺乏教养。嗝应该通过呼气安静地传送出来，嘴要保持适当形状，不要咧着大嘴，像悲剧中使用的面具一样。

克雷蒙特对鞋、耳环、笑以及性的观点都清楚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需要，他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也为非基督徒所接受（至少在理论上）。实际上，类似的建议也见于普卢塔克和盖伦的作品。

伪使徒行传本身把类似克雷蒙特这种基督说教者的建议变成了以基督教过去的名人为基础的叙述。有很多关于节制性欲的内容，节制，包括违背誓言都是常见的主题。克雷蒙特的思想主要是对男人而言，但是行传中对贞洁的推崇经常指向女性。最著名的文本之一是保罗（Paul）和特克拉（Thecla）的故事。特克拉是个年轻的未婚妻，她听了保罗的传教，放弃了即将举行的婚礼。这自然引起了各种麻烦，但她的忠诚最终获得了胜利。我们见过与此类似的内容：一对年轻的夫妇、一个私人教师（比如，在希里奥多洛斯的小说中也可见到）、旅行。使徒当然是伟大的世界旅行家。这种旅行似乎为罗马世界的精英们所熟悉。

另一篇2世纪的基督教文本《彼得行传》(*The Acts of Peter*)中的内容看起来更像是为罗马社会各个阶层喜爱的哑剧和滑稽剧。首先是彼得女儿的故事，使徒已祷告让她残疾，所以她不能和富有的拐子有性生活（这个故事显然是为基督徒所作，他们要尽力避免“身体的污秽”）。彼得和西蒙·马格斯（Simon Magus）之间重新开始的著名争斗也是这本书的特色。这场纠葛以一次短促的竞争结束，西蒙被彼得击倒在罗马的大街上，在给他的肮脏的断腿做了手术后死去。消遣故事——一种“好读物”——在这里服务于推广基督教对忠诚、异端和生活的严肃教义。

传记的兴起

所有这些作品对人的重视与罗马帝国世界日益增长的对个别人物个性特征的兴趣并行不悖。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可以看到传记体写作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特点就是为某种专门目的而作的传记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出现，比如普卢塔克很有影响的《平行列传》把过去的希腊罗马名人成对撰述，作为当前人们生活的榜样。但是，新兴的对个人的关注要比这一点广泛得多，这一时期的所有作品都以短篇人物传记为特色。

像塔西陀这类历史作家以及罗马的希腊史家卡西乌斯·狄奥都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了皇帝身上。以虚构的人物和生活为基础产生的杜撰文学也是这种有意识的变化的组成部分。但是，真实的同代人的经历同样重要——可能是评论文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两部重要作品是皇帝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的《自省录》(*To Himself*，通常被称为《沉思录》)以及希腊贵族演说家埃里乌斯·阿里斯泰德的神话故事中对作者的生理和心理疾病的特别描述。

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人认为《沉思录》是以往作品中最沉闷的一部，但很长时间以来，它一直受到人们的赞赏。它的风格好像是斯多葛派哲学家提倡的日常“精神练习”。斯多葛学派是希腊化时期希腊哲学对新的帝国时代和官僚政治的反应。由于它强调义务和等级观念，因此它容易迎合罗马帝国精英的口味也就不足为奇了。受斯多葛思想影响较早的一部文学作品是1世纪的哲学家、作家和政治家鲁基乌斯·安尼乌斯·辛尼加（Lucius Annaeus Seneca），即小辛尼加（“Seneca the Younger”）的《道德书信》。据说这些书信是写给盖乌斯·卢基里乌斯的，但事实上只是辛尼加自己道德观的记录，他的观点受到他年轻时在罗马遇到的斯多葛派思想家的很大影响。在现代读者看来，这些不过是适度的娱乐。但是，马尔库斯更严肃地看

待哲学的反省——虽然他日常思想的私人记录极有可能不打算公开。今天读《沉思录》，我们能够感到一个即将丧失统治权的人的消沉：

> 这些是你对沐浴的看法：油、汗水、污垢、油腻的水，每样东西都令人生厌，这就是生活的全部。
> 不久你会忘掉一切，不久一切也将忘记你。
>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和他的马车夫同样都要死亡。
> 万物都在分解、变化，处在瓦解或消亡的状态。

对感官世界的肤浅有深刻体验，有人认为，这使这部著作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关于怎样在这个世界生存，也有实用的斯多葛派的建议。难得的是，马尔库斯谈到了自己的公众生活："不要专制"，"别让任何人，甚至别让你自己听到你在宫廷中抱怨生活。"

个人书信

虽然历史学家定会因缺少具体细节感到失望，但这部作品无疑是马尔库斯自己的生活体验。很难概括马尔库斯的悲观思想，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他的书信，把他的情绪置于某种背景下。保存下来的是科奈里乌斯·弗兰托（Cornelius Fronto）的部分信件。弗兰托是2世纪中叶罗马杰出的演说家，但几乎没有任何他的演讲幸存下来。他出生在塔西陀和朱维纳尔之后，那时拉丁文学开始衰落，直到4世纪晚期复兴——事实上，从弗兰托和奥鲁斯·格里乌斯直到古代晚期，阿普雷的著作是惟一幸存下来的非基督教作品。部分原因可能是受过教育的罗马人用希腊文写作，这是探究哲学的恰当语言。

古代的信件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文学形式，可用与修辞同样的方法做理论分析。许多信件根据固定程式书写，例如很普遍的"推荐信"。在这种形式中，虚构与现实生活很容易交织在一起。在昆体良的学生小普林尼手中，十本生动的书信把这位理想的罗马绅士呈现在我们面前——他当然是精通两种文化的人。弗兰托的书信作为例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精英们如何利用一种独特的文学为现实需要服务。弗兰托是马尔库斯和他的共治皇帝鲁基乌斯·维鲁斯的老师。大部分信件是写给帝国的学生兼统治者的。那些写给马尔库斯的信和回信特别有趣。它们讨论了教育和文化。当弗兰托看到马尔库斯对哲学表现出了兴趣，他极力要把他留在修辞学这边，但是对一个2世纪罗马的文化历史学家来说，更有趣的是这么多信件都围绕着两个话题：爱情和健康。

在罗马的公共生活中，爱的语言是众所周知的，但马尔库斯和弗兰托把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我想立刻跑到我最俊美的人儿身旁，弗兰托……握着他的手……抚摸着他冰凉的脚，把它放到浴盆里暖热，让我来搀扶着你，"弗兰托也热情地回应马尔库斯对他的挚爱。"你想跑到我身边，飞到我身边，这是情人间特有的举动。"马尔库斯的母亲很生气，马尔库斯要做好准备回答那些问他为什么这么爱弗兰托的问题。"让他们去怀疑、辩论、争执、猜测、思考我们爱情的产生，就像他们猜测尼罗河的起源一样。"在弗兰托任执政官期间（142年）马尔库斯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投降，你赢了。毫无疑问，你的爱击败了生活中所有的情人。拿着王冠，让传令官在你自己的法庭公开宣布你的胜利，'执政官M.科奈里乌斯·弗兰托是胜利者。他在伟大的爱情竞赛中获得了荣冠'。"用希腊语表达取胜可能意味着某些苦衷。在一封让人迷惑不解的"另类"信件（已知的一种文学风格）中，弗兰托也使用了希腊语，信中通过重写柏拉图在《法德鲁斯篇》中对爱情的讨论来表达他对马尔库斯的爱慕。弗兰托在做这件事时的愉悦是显而易见的，这封另类信件是他发出的第三封这样的柏拉图模仿作品。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史料，古典文学和哲学作为揭示大臣和帝王之间微妙关系的一种"密码"在发挥作用。马尔库斯的回答同样有趣，他声称他是高级情人，处在苏格拉底的位置，弗兰托是他的下属，处在法德鲁斯的位置，当然他是从地位方面来说的。

私人日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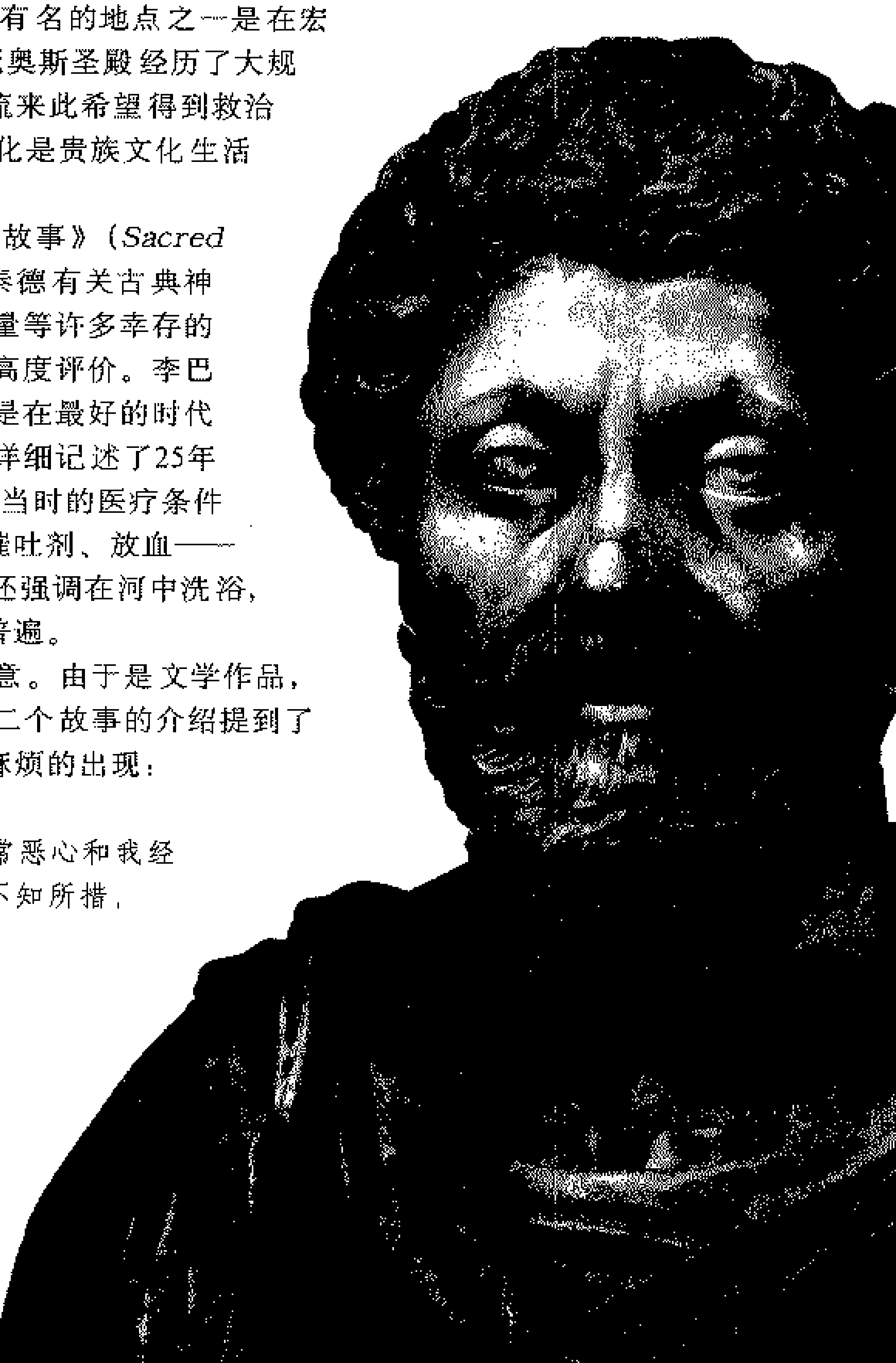
很多信件提到了健康。例如，有一系列关于弗兰托脖子的内容："我想知道你现在如何，陛下。我自己受到脖子痛的折磨。再见，陛下。向你的夫人致敬。"马尔库斯在回信中写道："我昨夜没有发烧。我已经想吃东西了。现在我感觉非常好。我们要看看晚上怎么样，但是当我知道你正受到脖子痛的折磨……"这似乎引起了弗兰托更热切的回应："我的脖子疼得很厉害。这个病是从我的脚引起的。再见，亲爱的陛下。向您的夫人致敬。"弗兰托也喜欢讲述偶然发生的事情："当我的小奴隶像往常一样，扶我从浴室的椅子上出来时，他们很粗心，让我撞在了浴室滚烫的入口上。我的膝盖擦破了，灼伤得很厉害。之后，我的腹股沟肿了。医生让我卧床休息。"我们仍很难知道描述这些事情的意义何在。在普林尼（2世纪初）、西塞罗（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书信中或古代更晚时期著名的集子中，我们没有遇到任何这样的反省。

不管弗兰托和马尔库斯就医一事的真实情况如何，在2世纪，驱病仪式在富人和穷人的生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最有影响的是阿斯克列庇奥斯的仪式。在罗马时期，阿斯克列庇奥斯圣所（称为阿斯克里皮亚）是非常有组织的聚集地，配备了来访者所需要的任何设施。这种驱病方法的主要环节是"沉迷"仪式，换句话说，就是在圣所里睡觉，使神能够出现在梦中给以忠告和治疗。病人可能需花很长时间寻求这种帮助。最有名的地点之一是在宏大的城市帕加玛。约2世纪中叶，这里的阿斯克列庇奥斯圣殿经历了大规模的整修。我们从铭文和文学作品中得知，许多名流来此希望得到救治或通过奉献和修筑建筑物炫耀他们的财富。医治文化是贵族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帕加玛是个参观的好地方。

这种仪式在埃里乌斯·阿里斯泰德的《神圣的故事》（*Sacred Tales*）一书中进入了文学，这并不奇怪。阿里斯泰德有关古典神话和历史问题、当时的政治问题、他钟爱的神的力量等许多幸存的演说，都受到同代人以及李巴尼乌斯等晚后作家的高度评价。李巴尼乌斯在他的影响下写了自己的作品。阿里斯泰德是在最好的时代出现的一位颇令人费解的作家。在神话故事中，他详细记述了25年间阿斯克列庇奥斯赋予他的大约130个奇特的梦。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大部分治疗都用与之匹配的方法——灌肠法、催吐剂、放血——阿里斯泰德也很有特点地交替使用神灵和医生。他还强调在河中洗浴，但这主要是个人的习惯，河中洗浴在罗马世界并不普遍。

阿里斯泰德对自己心理的描述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由于是文学作品，他的文本故意将内容割裂，编年上是混乱的。对第二个故事的介绍提到了包括"至少300，000行"的杂乱笔记。这导致他的麻烦的出现：

> 当人们把我从意大利带到这里后，由于经常恶心和我经历的暴风雨天气，我患了很多小病，医生完全不知所措，



2世纪的皇帝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的大理石半身雕像，他有时被称为哲学家皇帝。他统治期间赶上了罗马900周年庆典，也遭遇了瘟疫的袭击。他是一个博学深思的人，周围是一群谄媚者和阴谋家。他的个人经历可能影响了他令人吃惊的新颖自由的生活方式。



从空中看到的位于土耳其帕加玛的阿斯克列庇奥斯（Asclepius）圣殿景象，阿斯克列庇奥斯是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继承过来的半神半人的治疗之神。那些寻求帮助的人要在圣殿中过夜，并将在梦中接受治疗。

> 不仅不知道如何帮我，甚至说不出是什么病。最麻烦、最难受的事情是我的呼吸受阻。经过很多努力和猜测，我甚至不能做粗重、短促的呼吸，这时救治之神第一次开始给我启示。他让我光着脚向前走。我在梦中大声叫喊："伟大的阿斯克列庇奥斯！"

这是在公元144年，第二年夏天，神把阿里斯泰德叫到了帕加玛的阿斯克里皮昂。他在那里呆了两年，直至受到预示他将成为一个成功的演说家的梦幻所引诱，但他的病没有痊愈。多年以后，他出版了他的治疗日记的节选本，时间是从166年1月4日到2月15日，正值帕提亚战争期间：

> 第17天，梦醒后没有洗澡，第18天没有洗澡。第19天，我梦到一些帕提亚人抓到了我，其中一人走近我，好像要在我身上打烙印。接着他把一根手指插到我的喉咙里……然后我呕吐，帕提亚人下令今天我不用洗澡，没有洗澡，呕吐，感到舒服。

从其他史料获悉有这样一个日志存在。马尔库斯的《沉思录》多半是以类似的日常描述为基础，对身体症状的重视使我们想起了弗兰托书信，但在非基督教的古代，记录日常宗教经历的文献是很少见的。

基督教的未来

然而，尽管在形式上具有独创性，但《神圣的故事》有些内容过于放纵，并不能令人满意。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相当迥异的作品，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其主要代表是殉道者行传，也包括著名的日记。把它们与私人日志做一比较是件有趣的事情。殉道者的死亡报道始于2世纪中叶，以多种形式和不同篇幅出现。这种文学的主要意义在于宣传，以达到预期的教育和鼓舞的作用。可能阿里斯泰德的故事也有这种作用。确实，他为各种神祇所作的散文圣诗就起到了这种作用，但与基督教作家富于感染力和简洁的叙述相比，他的夸张华丽的风格缺乏吸引力。一篇2世纪晚期、3世纪初期的拉丁作品吸引了我们的注意。西里坦圣徒行传的故事大致是统治者和一群基督徒之间的法庭听证的原始记录。它篇幅短小、叙事简洁。圣徒的最终命运留给人们去猜想，这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运用的同样高明的吸引读者的方法。

更复杂的例子是圣徒伯贝图（Perpetua）和菲力西塔斯（Felicitas）的受难。这个故事最使人感兴趣的部分是"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维比亚·伯贝图的监狱日记，"因为她用自己的手和自己的语言写就了它"。她22岁，还在给她的孩子喂奶。"几天后，我们被关进监狱，我很害怕，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的黑暗。因为拥挤，里面很热，士兵们的管理很粗暴。"她祈求显圣，得到一个通往天堂的梯子。"我爬上去，看到一

个很大的花园，一个人坐在中间，花白的头发，穿着牧羊人的衣服，高高的个子，正在给他的羊喂奶。他对我说：'欢迎你，孩子（teknon）'。"她以这样一些话结束了自己的日记："我一直写到游戏结束的前一天。游戏本身让他去写他想写的东西。"善良的牧羊人形象实际上是我们从教会和墓葬的基督教艺术中最早获知的形象之一。希腊单词"teknon"的使用使我们想到讲拉丁语的基督教受益于希腊模式，这是一种恩惠，我们已经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有类似的特点。

最终，拉丁和希腊文学的未来当然是基督教文学。我们已经看到，这使得这本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改编。事实上，基督教文学的出现可以作为本章的主题。因为基督教是一种生活方式。当它走进精英阶层，它缓慢但毋庸置疑地推进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希腊罗马精英文化的发展，它改编了它们（历史、书信、小说）或者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了创新（布道、殉道者行传），像其他事物一样，有力地证明了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生死攸关的东西。



一幅4世纪壁画的局部，发现于罗马的圣彼得和马西里努斯的陵寝中。在早期的基督徒中，牧羊人耶稣的形象很受欢迎，这可能源于希腊的畜牧传统。孔雀不是基督教公开的象征，而是源于罗马帝国的宗教仪式，在那里它代表女神朱诺。

第九章

众城构成的帝国

潘尼洛普·M·阿里森





众城构成的帝国

人们认为罗马人确立了西方世界的秩序，这种秩序集中体现在它们的城市结构和组织上。这些城市通常为贸易和军事利益，或为纪念胜利、由此炫耀罗马的权力和荣誉而建。许多城市建在事先存在的城市中心，在意大利、非洲和东方尤其如此。大多数情况下，当地的人口被并入新城，但有时候，他们被赶走。今天，罗马人由于他们的管理和军事能力而闻名，他们正是利用这种能力征服了已知的世界，建立了这些城市。

罗马的城建计划对业已存在的城市规划和职能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不过，现在得到广泛认同的是许多罗马城市正交、方格式的布局是罗马与南意大利希腊人交往的结果。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希腊人就开始以固定的城市规划建筑城市。事先规划的希腊城市以地形为基础，主要采取垂直的街道格局，有一对，有时是两对交叉的主路。除了住宅区，城市中还辟出管理中心和市场（the agora)、庙宇、剧场和运动场（gymnasia or stadia)。这些基本的希腊要素成为罗马城市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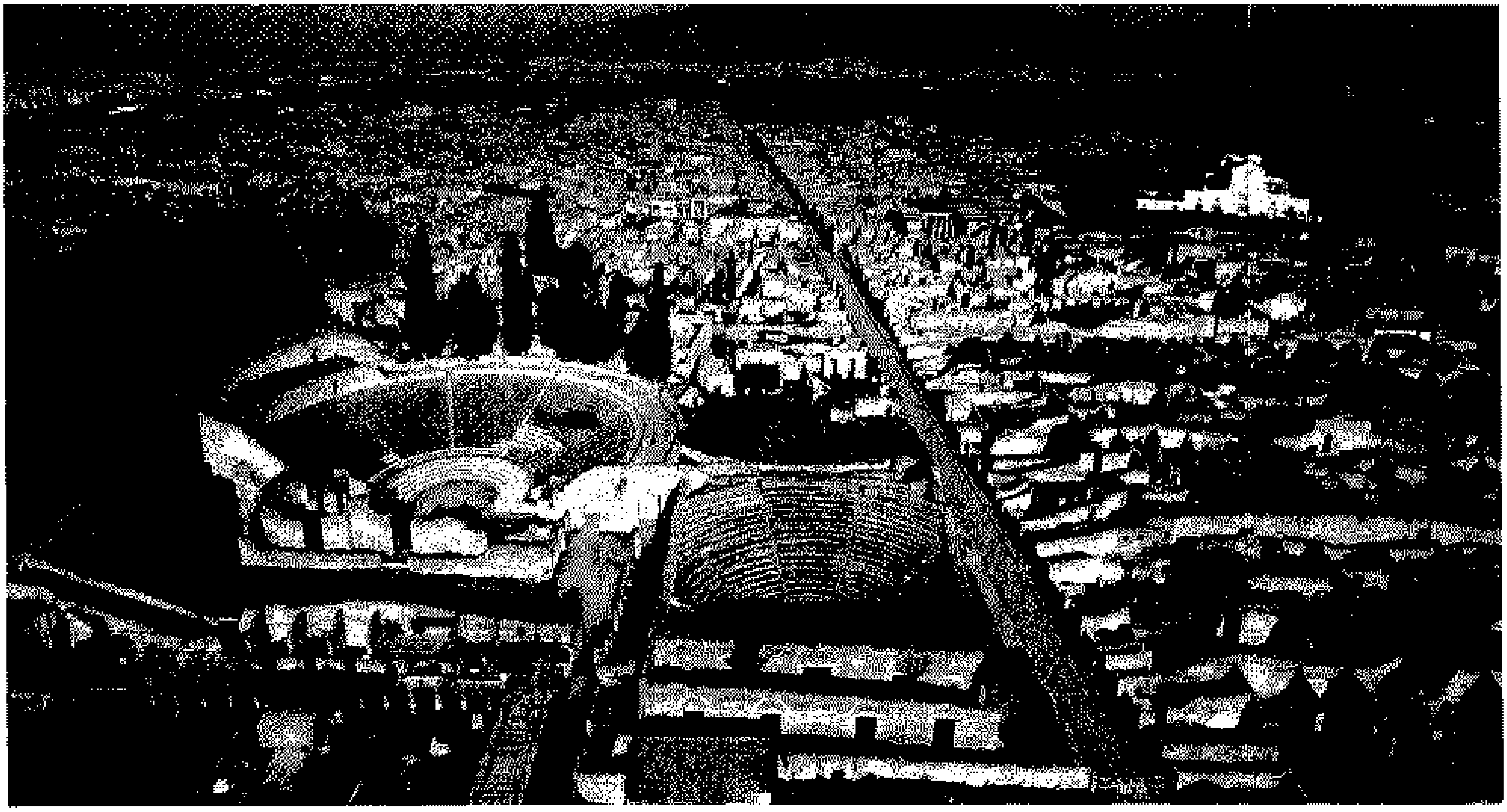
每一座罗马城市的布局通常都以两条交叉的中轴主路和辅路为基础，主路卡多马克西姆（cardo maximus）南北走向，德库马努斯马克西姆（decumanus maximus）东西走向，辅路形成街区，称为公寓楼。大部分公寓楼是私人住宅，但这种格局的中心附近也是市中心（the forum)，庙宇、剧场和其他运动、娱乐和休闲场所同样构成城市的一部分。像远古青铜时代的希腊和近东城市一样，罗马的城市经常设有防御城墙。公墓通常沿着主路的方向排列在城市边界外围。

所以，同从前的城市一样，罗马的城市不仅为它们的公民提供了居住空间和保护措施，而且也提供了政治、管理、经济、社会和宗教设施。除了特殊的管理制度，罗马人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保存至今的休闲娱乐设施和建筑物的数量和范围。罗马人把新建筑技术带到了业已存在和新建立的城市。他们推广了混凝土的使用(公元前3世纪首先在坎佩尼亚发展起来)，它大幅提高了技术和建筑水平，特别表现在以穹顶和圆顶覆盖很大的空间方面。他们把罗马人雄伟和对称的观念以及在外国产的白色和彩色大理石上雕刻丰富图案、创作精美壁画的建筑物装饰方法带到了这些城市。他们也带来了罗马特有的建筑类型，例如凯旋门和圆形斗兽场，这些对公民的社会生活至关重要，同时也提醒人们他们的城市是广阔的罗马世界的一部分。相对而言，小规模的建筑方案是共和中期的特点，但从公元前1世纪中叶起，大规模的纪念性建筑计划开始出现，比如以圆顶和穹顶、多变的房间形状和砖包混凝土的广泛使用为基础的独特的罗马建筑风格。从大约公元前1世纪起，整个帝国的城市都以这种表现独特的罗马文化的建筑形式装饰。

为罗马公民提供他们的保护、管理、商业需求、健康和娱乐所需要的各种设施是罗马公众人物的义务。杰出的罗马公民是某些城市的资助人，利用自己的资金建立或修复特定的建筑物，由此提高自己及罗马的声誉。而且，为了在他们向往的高级管理职位的任命中与政敌竞争民众的好感和选票，杰出公民经常出资为自己的城市修建公共设施。行政官员也常常修筑建筑和纪念物，对在过去的选举中曾投票支持他们的城市人民表示感谢。城墙、城门和街道都属于公共设施，由愿意出资的捐助人维护。水也是城市生活至关重要的必需品。水的供应经常需要修建引水渠，将水引入公共水池和浴场，更不用说排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公共浴场是帝国城市最为重要的社会和健康中心，也需要足够的水供应，这些设施也常常由这些捐助人修建、扩建或装饰。

罗马人非常重视公共娱乐和悠闲，这一点比他们的希腊先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杰出公民不仅争先恐后地为城市提供剧场、圆形斗兽场和运动场，而且也争相在这些设施中提供表演、比赛和娱乐活动，以确保他们的努力能被记录在铭文中。

帝国前两个世纪的和平、安全和物质繁荣特别促进了许多新城的发展和许多老城的美化。由于帝国各地不同的发展史，每一地区的城市历史也各不相同。这一章从帝国的四个主要地区——意大利、北非、东方行省和西方行省各选一个城市，考察罗马城市的发展。



空中俯瞰挖掘出的庞贝古城遗址，维苏威火山在远处若隐若现。在该城遭到毁坏时，庞贝只是很小的行省城市，享受着比罗马更好的天气。之所以称它为城市，并不是因为它的规模（它的面积很小），而是由于它的管理制度，更无需说它所提供的从庙宇、浴场到剧场和妓院的全面的公共设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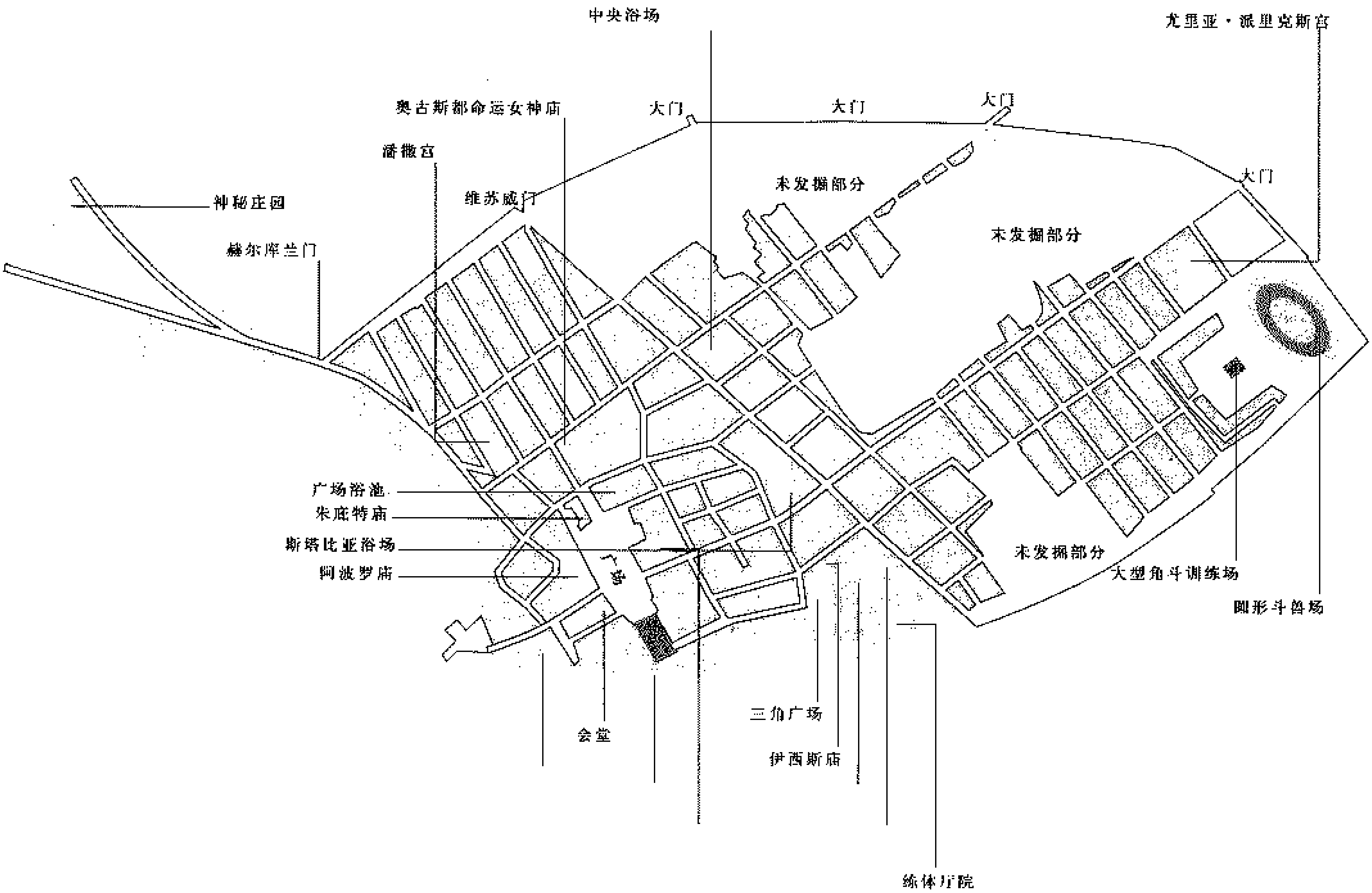
意大利的庞贝城

同位于意大利北部埃特鲁里亚和南部希腊的许多城市一样，庞贝在罗马帝国形成很久以前就是城市的中心。这个地方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有人居住，到公元前6世纪，它成为一个有围墙的城镇，坚固的防御性城墙由当地的大块石灰石和火山灰建成，长3.2千米，圈起的面积约有66公顷，但我们不能确定在这么早的时候，是否整个地区都建起了房屋和公共设施。实际上，最近对城市东南部的考察显示，公元79年城市被维苏威火山喷发毁灭时，城市的许多地产还是葡萄园和果园。通常估计，庞贝的人口达到了20，000，但这种估计以城市规模与晚后时期城市人口的对比为基础，一般没有考虑城内相当广大的农业区域。因此，这个特殊的罗马城市的人口数量可能要稍微少于构成一个现代城市所要求的人数。可以肯定，它始终不是帝国的一个大城市。

庞贝对我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悲剧性毁灭意味着从考古学的角度而言，它比帝国的任何其他城市都保存得完好。事实上，我们对城市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考古遗存，仅有很少一部分来自文字史料。因此，它为一座罗马城市的布局及舒适的程度提供了多于罗马世界其他城市的实物证据。

在庞贝城建立的早期，究竟谁统治着这座城市还不是很清楚。有证据显示，希腊人和埃特鲁里亚人都曾在此出现，与当地居民共处。公元前6世纪，当城市修建防御工事时，在从河边通往广场的路上建起了一座阿波罗神庙，另一座神庙建在城市的南面，最初献给希腊神赫拉克勒斯，后来献给雅典娜。即便如此，这些庙宇的修建并不必然意味着希腊人的统治，因为这些神对埃特鲁里亚人同样重要。

公元前80年，罗马人在同盟战争中击败他们从前的意大利同盟后，独裁官普布利乌斯·康奈里乌斯·苏拉（Publius Cornelius Sulla）为解决他的老兵移民问题，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名为“康奈里亚·委内利阿·庞贝”的殖民地，从这时起，城市才被称为“庞贝”。这个殖民地的建立意味着大约四千到五千罗马军队的老兵及他们的家属在此定居，控制了城市大部分事务的管理。他们或者把原来的居民从家中赶走，或占用城中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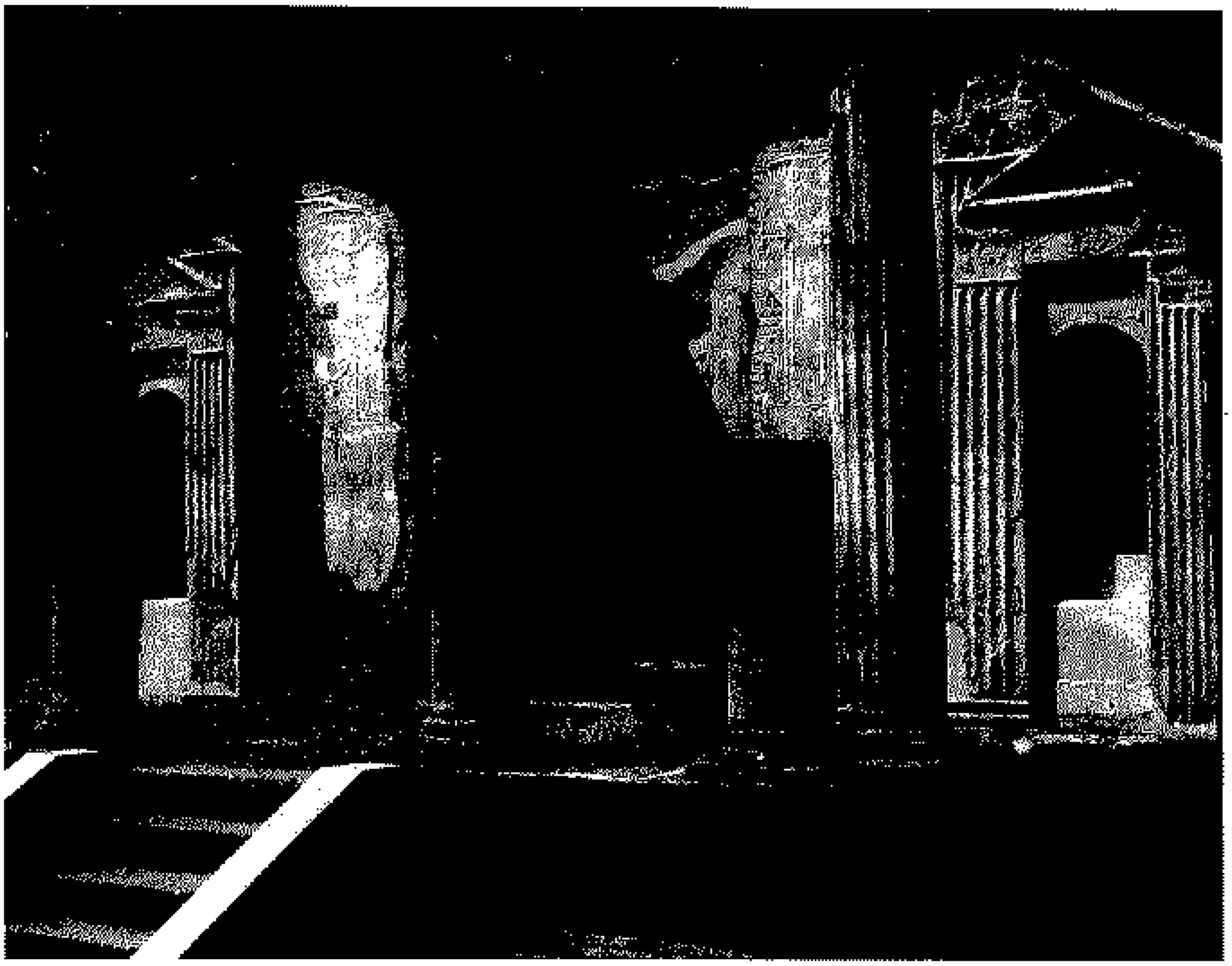
庞贝城建于公元前8世纪，在公元前89年被罗马征服以前，由希腊人和埃特鲁里亚人统治。这座城市是罗马帝国保存最好的城市之一，79年毁于附近的维苏威火山大喷发。这个平面图显示出一些更为重要的建筑和地点，它们尚未被发掘（始于18世纪）出来。

先用于农业的土地。人们相信，由于这些罗马公民的涌入，许多公共建筑和设施的建设以及城市住宅的重要变化都从此时开始。可以肯定，到奥古斯都统治时代，庞贝已经具有了一个真正罗马城市的所有标志，尽管其中一些建于较早的前罗马城市时期。比如，广场周围地区并不符合整齐的街道模式，而这是罗马城市，甚至希腊城市的标志之一。因此，这个城市中心的建立甚至可能早于希腊人控制这个地区的时期。不过，这个广场上现今仍然可见的许多特征证实了罗马的管理如何强化了事先存在的城市中心。

一个宗教中心

最初，人们在广场上为许多神和崇拜对象建起了神庙，这些神对罗马公民非常重要。这样的神庙既用于公共祭祀，也被个别公民用于个人献祭与祈祷。如果从海边进入城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维纳斯神庙，威严地耸立在右侧。这座神庙是标准的意大利式样，建在一座位于一块开阔地区内的高台上，有一条幽深的、带柱廊的前通道。手执青铜舵的大理石雕像立在神庙的台阶上，这座雕像的发现帮助确定了神庙的身份，即它是献给城市的保护神维纳斯·庞贝阿（Venus Pompeiana）的神庙，由罗马殖民地的名称推测，雅典娜的崇

拜可能由苏拉引入。阿波罗庙位于广场西面，在奥古斯都时期，它的周边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树立了很多纪念物。在广场内部，罗马众神之父朱庇特庙占据了最好的位置。在这座神庙中，发现了一位坐姿男性的庞大躯干，它为神庙的鉴定提供了依据。神庙位于广场北端，也是传统的意大利风格。如果这些归类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三座神庙和城市南边的赫拉克勒斯以及雅典娜神庙就一道证实了庞贝人对希腊神祇由来已久的崇拜，是罗马人把希腊神祇纳入到自己的众神体系当中。



在庞贝挖掘出的伊西斯神庙遗迹。精美的、融合多种外来文化的装饰——融合了希腊化和埃及的风格——主要用抹在厚厚的普通罗马砖墙表面的灰泥完成。

庞贝广场上其他神圣的建筑证实帝国的神在庞贝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西边是公众的拉莱斯（Public Lares）神圣所。拉莱斯是家族神，保佑家庭和家族。公共拉莱斯神为庞贝集体公民这个大家族履行这一职责。这座圣所约建于1世纪中叶，其中一端有一座拱形后殿，里面立着一尊雕像，经鉴定是格尼乌斯（Genius），他是奥古斯都祖先的家族或血统的代表。两个侧面的矩形壁龛可能摆放着拉莱斯自己的雕像。这座圣所采用的壁龛形式无疑受到罗马帝国广场上的此类建筑形式的影响，它把庞贝的安全和幸福与帝王家族联系了起来，又通过它在建筑上与罗马中央权力的承接强化了这种联系。

广场上与帝国崇拜有关的另一座建筑大致位于东面的中心位置。这是一座带有宽阔的柱廊通道的小神庙，建在一块非常宽敞的地方，庙的中央是大理石祭坛。正面的雕刻遗迹显示了一名祭司以公牛做牺牲的场面。这样的牺牲往往是为了表达对在世皇帝的尊崇而献。该神庙在庞贝城毁灭时还没有竣工，因此很可能是献给韦伯芗皇帝的。假如维苏威火山没有喷发，它也将成为庞贝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但由于存在时间短暂，它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地位。这座虽小但很精致的神庙的修建提示着庞贝人铭记罗马皇帝对他们的统治及恩惠。

第三座庙宇离广场不远，也让庞贝人想起罗马皇帝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这座大理石小庙位于通往市中心北边的路上，铭文显示它是献给奥古斯都命运女神的庙宇，由三次担任市政官和被人民选为军事保民官的马尔库斯·图里乌斯出资修建。这三座位于广场附近的神庙向庞贝人证明，罗马皇帝和罗马的统治通常是以市政官员为中介，对公民们提供保护，以换取他们的忠心。

还有其他一些不断被庞贝人崇拜的对象。伊西斯（Isis）神庙位于庞贝的两座剧场附近，离早期的雅典娜庙不远，可能建于公元前2世纪末。这座献给埃及神的庙宇及其装饰表明希腊和罗马对埃及的影响也刺激了埃及文化和宗教向意大利的传播。这座规模虽小但令人难忘的庙宇说明对这类神的崇拜——确实很盛行——得到了罗马帝国的认可。一则铭文显示，这座神庙可能在62年的地震中遭到严重损坏，由一个被释奴的儿子努麦里乌斯·波皮迪乌斯·塞尔西努斯（Numerius Popidius Celsinus）修复。他的父亲是被释奴，所以不是公民，他希望通过把儿子的名字与这座神庙和这位神祇联系起来，以便促进儿子在仕途上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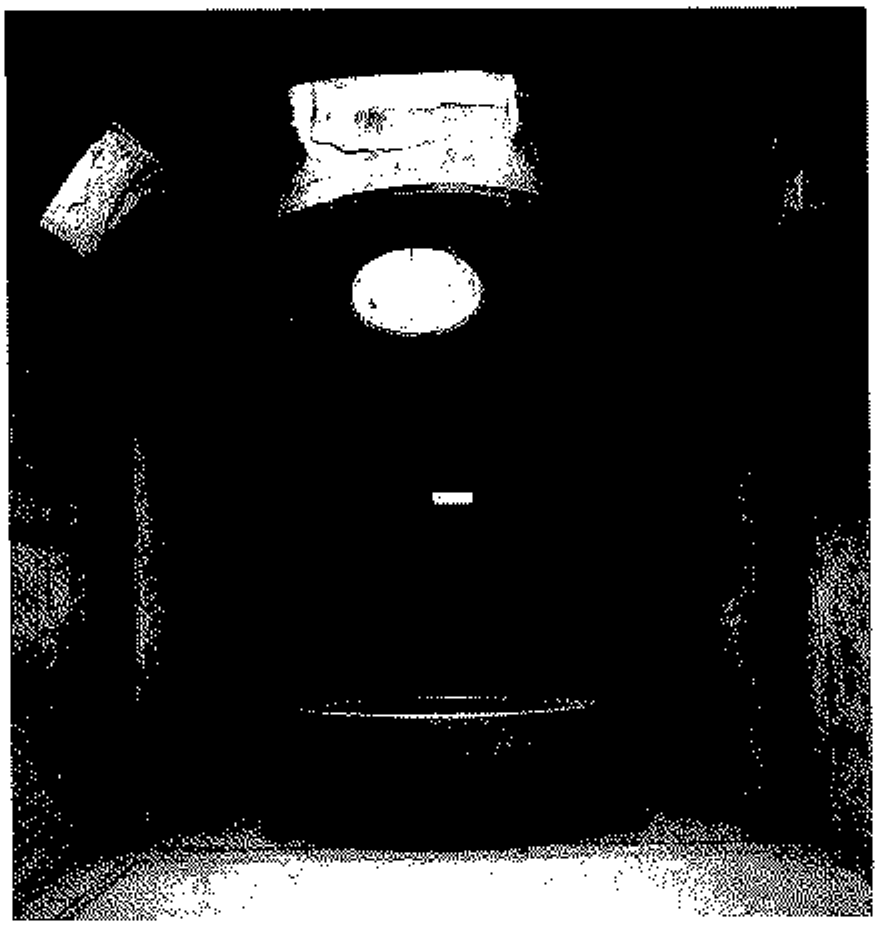
剧场和浴场

虽然庞贝的许多世俗的公共建筑证实了罗马建筑形式和社会形态向意大利南部的扩展，但这类建筑中有一些在罗马殖民者到来之间就存在了，有可能是希腊人的遗产。比如，城市南部大剧场的建筑技术表明它建于公元前2世纪，比罗马第一座石制剧场的出现早约一百年。庞贝的剧场具有传统的希腊形式，但在罗马时期，由于公民希望提高他们的公民地位，他们至少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对一座基本上是希腊建筑的这种创新表明，希腊文化对增强罗马行政管理体系具有重要作用。紧挨着这座剧场的是一座现代学者称之为“奥狄昂”(Odeon) 的较小的剧场，是用于音乐活动的有屋顶的剧场。它所用的砖石技术表明，它建于公元前80年罗马殖民地建立之后，但在形制上它主要还是一座希腊剧场。盖乌斯·昆提乌斯·瓦尔古斯 (Gaius Quinctius Valgus) 和马尔库斯·波西乌斯 (Marcus Porcius) 两位官员由于建了这座有顶篷的剧场得到了相应的荣誉。另一则写在青铜路面上的铭文告诉我们，官员马尔库斯·奥卡拉提斯·维鲁斯 (Marcus Oculatis) 出钱赞助这里举行的公共表演，无疑也是为了赢得公众的支持。

五座不同的浴场足够庞贝居民使用。公共浴场是另一种源于希腊的公民娱乐设施。所说的斯塔比亚浴场是庞贝最大的建筑物（在1世纪末占地四千多平方米），它的中心是一座较小的建筑，由一口井和四个有水池的小房间构成。这座小建筑物是与之毗邻的体育馆的洗浴设施，建于公元前4世纪末，即罗马殖民庞贝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座浴场的最终形制是典型的罗马浴场建筑风格，分为两部分，各三个房间，温度渐次升高——冷水浴、温水浴和热水浴。这一系统的复原以及维特鲁维乌斯 (Vitruvius)[①]关于男女热水浴室毗邻的规定，帮助证实一边是男浴区，而另一边则是女浴区。这种复式建筑的起源也要追溯到庞贝成为罗马殖民地以前，因为一则铭文显示在殖民者到达后不久，城市官员修复和扩建了浴场，出钱增建了桑拿室 (laconicum)，修复了运动场的门廊。在庞贝存在的最后几年，其他名人通过在运动场的西墙上添加精美的灰泥浮雕装饰及对浴场做一些小修小补，继续装扮这座浴场建筑（无疑是为他们自己的荣誉）。在做这项工作时，他们对罗马人到来之前庞贝的占有者及新殖民者都表现出了好感。

庞贝的其他四座浴场建于罗马统治时期。一座位于广场的正北面，与奥古斯都命运女神庙相对；今天人们称之为广场浴池。其砖石结构表明它建于殖民的早期，铭文证实它由三位官员修建，他们可能是和苏拉的军队一起到达庞贝的。这座建筑物靠近广场的公共区域无疑意味着到市中心办事的公民经常光顾这里。第三座浴场——郊区浴场坐落在城墙外面，可能在从河边到广场的通道附近，于公元的头一个十年修建。萨诺 (Sarno) 浴场位于城市的西南边，在广场市政建筑后面，可能也建于1世纪早期。最后是中央浴场，它是庞贝最新的公共浴场建筑，可能始于62年地震后，一直没有完成。所以，虽然公共浴场的修建要追溯到庞贝成为罗马城市之前，但在罗马时期，公民才越来越多地享受到了新式的、经过改进的浴场设施。

由于庞贝位于火山岩高地上，要保证城市充足的供水有很大的困难。在建城的早些年，个人在自家院子里的岩石中挖井。公元前1世纪修了一条引水渠，从附近的河中运



庞贝广场浴池的热水浴室。这个别致的空间——虽然完全是实用性的，但它的雅致可与一个庙宇的内部相比——离广场的公众喧嚣仅几米之远，这里温暖、清净，庞贝的名流再次加入外面的喧闹之前，都在这里休息，恢复体力。

① 公元前1世纪末叶的罗马建筑家与军事工程师，著《论建筑》一书，共10卷，是幸存下来的惟一一部有关这个课题的古希腊罗马著作。——译注

水。引水渠供水不仅意味着水现在成了一种公共必需品，而且也为上面提到的公共浴场提供了充足的供水。

圆形剧场

庞贝最有名的公共建筑是圆形剧场，它并非起源于希腊，这一点与剧场、神庙和浴场不同。庞贝的圆形剧场是罗马世界出现最早、保存最好的石制斗兽场。它位于城市的东南角，靠着城墙，因此减少了对支撑它的宽阔土堤的需求。这个地点也意味着城墙对用来保护观众的顶篷起到了支撑作用，有了顶篷，前来观看斗兽比赛和动物角斗的观众就能免受南意大利骄阳的炙烤。圆形剧场是典型的罗马建筑，特别迎合罗马人的趣味。这座圆形剧场建于公元前1世纪初，这说明到此时为止，庞贝公民在娱乐方面已经有了罗马化的味道，或至少希望他们如此。奠基铭文显示，为了使庞贝公民有观看比赛的适当场所，同时也为感谢公民在选举中的支持并希望继续得到这种支持，两名职务相同的市政官盖乌斯·昆提乌斯·瓦尔古斯和马尔库斯·波西乌斯建了这座圆形剧场。据估计，它可容纳约两万名观众。

与圆形剧场相连的是占地约1.5公顷的一大块空地（所说的运动场），中间有一个游泳池。这个运动场是奥古斯都统治期间由公众出资修建，人们认为它是庞贝的年轻小伙聚会、训炼身体以便适合在罗马军队服役的理想场所。



位于庞贝的角斗士营房和训练场。在这里，那些无望成为文化人的人们将利用特殊的武器装备进行训练，在罗马人看来，这些装备有助于运动竞赛。比赛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暴力和流血，这使得营房对于各种寻求感官刺激的人来说成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赛后参观地点。

行政和商业建筑

广场上除了宗教建筑，许多行政和商业建筑也是这个市中心的组成部分。从河边到入口的右侧，穿过维纳斯庙，是一座现称为会堂的大型建筑。这种建筑风格起源于位于希腊广场侧面的有柱廊的连拱廊（stoas），人们可以呆在里面讨论生意、政治或出售商品。庞贝的会堂是一座大型建筑，有一条走廊通向广场，排列整齐的柱廊形成了三个中间广场，供参观者歇息。它大约建于公元前130年至前120年，当时庞贝还不是罗马的殖民地，罗马的广场上还没有出现类似建筑。因此，它是罗马世界最古老的会堂，这一事实无疑增强了下述观点的说服力：这种建筑类型起源于希腊的柱廊，以后又从中发展出了早期基督教会的建筑风格。

在庞贝广场的南端，有三座规模较小的建筑，每座建筑的一端都有一座后殿。虽然它们的实际功能还没有得到证实，但人们相信它们是行政建筑。最东边的一座可能是地方官员行使司法权的地方，中间一座是城市档案馆（the tabularium），最西边的一座则是当地元老议员集会之所，称为库里亚。这三座建筑都用砖建成，这说明它



庞贝会堂毁坏的柱廊。会堂比广场稍高（为象征和现实目的），它的出现比罗马官方到来的时间早大约五十年。一些城市管理机构设在其中，这些官员可能负责市场和商业管理。

赛　会（LUDI）

朱维那尔的著名嘲讽（见《嘲讽》10.81）"所有人都关心面包和竞技"说明了娱乐在罗马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城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们提供了娱乐设施——剧场、圆形斗兽场和竞技场。通过在效忠罗马的城市当中提供娱乐设施，并的确在这些场合举办娱乐活动，罗马当局既推进了这些地区的罗马化，同时也鼓励了其他地区吸收罗马文化。

在这些设施中举办活动是市政官员的责任。这些活动花费很高，为此官员们既要利用公共基金，又要动用自己的财产。表演者通常是表演赞助者的奴隶。这些表演包括在剧场举办的戏剧表演和朗诵，在竞技场举行的竞技和战车比赛以及在圆形剧场上演的角斗士和野兽的角斗。剧场表演的是希腊和罗马作家的作品，但战车比赛和斗兽表演更受欢迎。驾车手和角斗士虽然通常是奴隶，但他们往往在罗马世界能够获得英雄身份。

城里人和周边的乡下人都观看比赛。在不同队伍或表演者的支持者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对抗。公元59年，由于一个特殊的角斗士引发的争端导致庞贝的观众和附近城市努塞里亚的公民在庞贝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结果在十年时间里，庞贝人被禁止举行任何类似比赛，赞助人也遭到放逐。

许多宗教祭祀活动包括助兴比赛，或每年一次或几年一次，由官员和祭司负责。有时，一个城市会请求皇帝举办国际比赛。如果请求得到批准，这种比赛就是皇帝的一种赏赐。比如在3世纪，为表达对阿波罗神的敬意，迦太基举行了皮提亚赛会。比赛吸引了来自地中海各地的竞争者，其他城市的使节也被邀请前来，以表达他们对阿波罗和迦太基的尊重。

剧场或圆形剧场的席位安排反映了城市的社会构成。社会的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固定区域。议员、地方官员和元老坐在前排的贵宾席，这是剧场最显眼的位置。迦太基法令规定对那些坐在他们没有资格坐的位子上的人处以5000塞司退斯①的罚款。



① 罗马货币单位。——译注



一幅4世纪罗马马赛克镶嵌画的细部，发现于西班牙（上图与上页图）。画面描绘了单纯的角斗比赛场面，这是一项受到谨慎监督的运动，裁判的人数几乎与选手一样多，其隐喻着规则的重要意义，似乎表明有罗马大型赌博集团深深卷入其中。

们建于罗马时期，主要行使市政职能。紧靠广场东面的是另一座建筑遗址，至少有八个入口，可能是举行市政选举的地方，即公众议事会。

庞贝广场的其他建筑可能扮演了商业中心的角色。首先，一座带有一个宽敞的露天中心的柱廊建筑占据了公众议事会街道对面的空间。这座建筑是尤马奇亚（Eumachia）和他的儿子献给皮塔斯·康克迪亚·奥古斯塔（Pietas Concordia Augusta）的。尤马奇亚是一名公共祭司，是当地一个重要家族——尤马奇家族的成员，现在这座建筑物称为尤马奇亚建筑。皮塔斯（虔敬）·康克迪亚（和谐）·奥古斯塔是罗马元老院授予皇帝提比略和他的母亲，奥古斯都的妻子李维娅的称号。现在人们相信，这座建筑是城市的羊毛市场。羊毛是庞贝地区的一种主要产品，经考证，羊毛加工是庞贝的主要手工业之一。不论这里举办何种商业活动，铭文显示地方手工业、帝国祭祀和当地贵族扮演的角色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关系，其中包括著名的妇女在推进这种关系。

广场东北角的一座大型建筑由一个环绕着许多小房间的柱廊区构成。经考证，这是肉类和鱼类市场（the macellum），在这儿发现了很多鱼骨，中间的供水系统可能是用来保存这类商品的。东端有一个祭坛，我们从中发现了两座残存的雕像，这表明它也是奉献给帝国神祇的。这座建筑也证实罗马城市的商业界、宗教界和皇帝在这些活动中始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广场周围地区也为庞贝公民提供了其他设施，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至今下落不明的是纪念性雕像，它们本应立在广场中央空地上现存的很多基座上。19世纪挖掘广场时，这些雕像已经不知去向，所以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这里曾供奉着谁；不过，我们可以想象，这些雕像可能与罗马其他城市的广场上树立的雕像类似，包括当时和逝去的皇帝、他们的家人以及城市捐献者的形象。在广场的西北角发现了许多仓库和公共厕所，这些对于利用这个公共空间的人们来说也是基本的设施。

这并不是一份为罗马庞贝城的人们服务，为他们提供职业的所有设施的详尽目录。数不清的小商店、作坊可能还有小酒馆排列在城市主要街道两侧，妓院在某些地点已经被考证出来。但是这个目录在于强调庞贝拥有人们希望在几乎任何一个罗马城市见到的公共设施以及这些设施在推进罗马统治方面扮演的角色。其中

一些在罗马人统治前就是城市的一部分，但罗马官方对其加以改造、革新，使其具有纪念意义并对其加以利用，这些建筑和新建筑一起加强了罗马人的权力和荣誉，美化了皇帝和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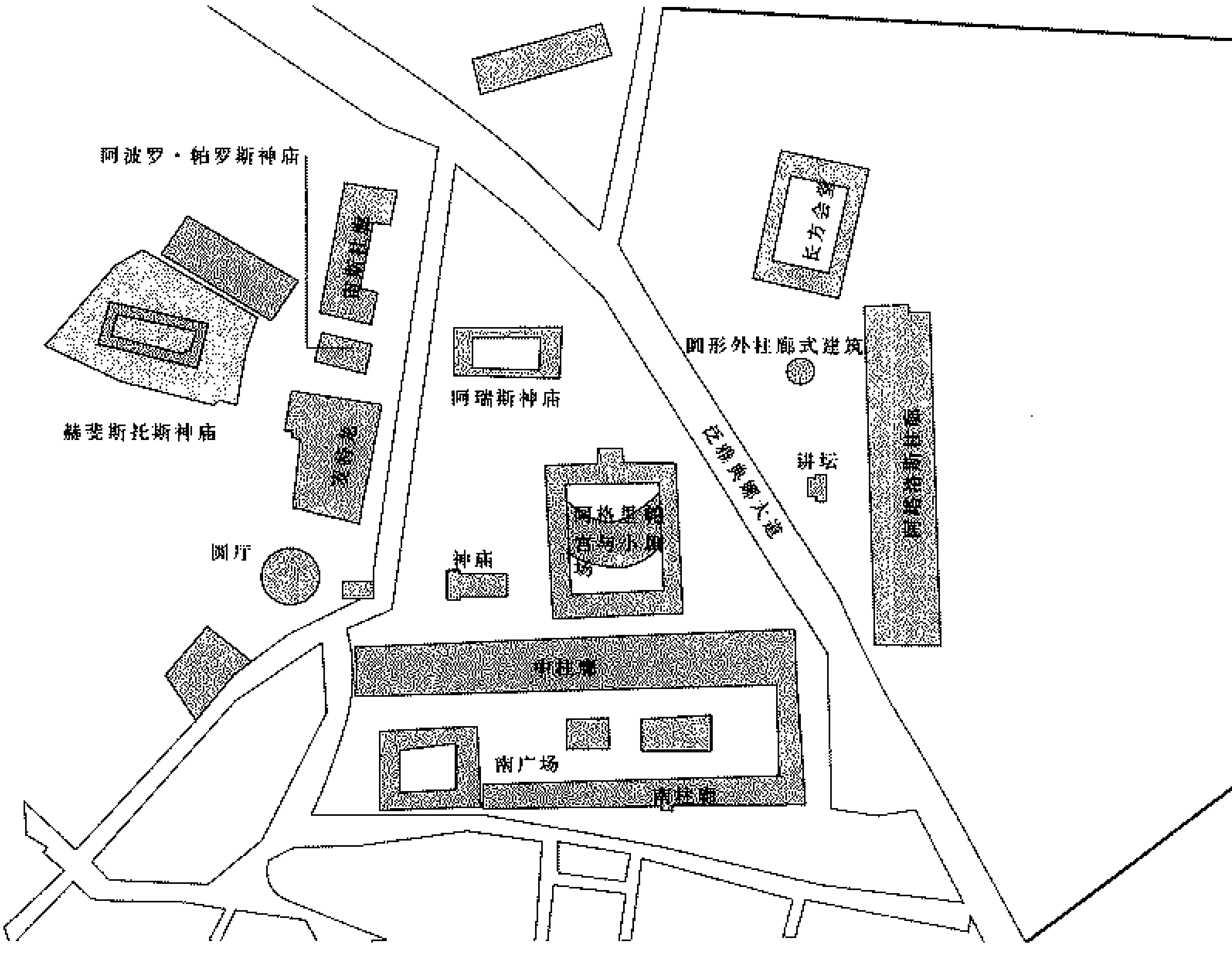
希腊东部的雅典

虽然没有哪个城市能像庞贝那样提供如此丰富多样的罗马世界实物遗存，但雅典也留下了非常丰富的考古、碑铭和文学材料。

雅典也是罗马人在现存城市基础上建城的最突出的例子。他们清楚地认识到雅典作为一个重要的希腊城市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因为它记录着希腊古典时代的辉煌。来自罗马各地的学生和游客蜂拥到此研究希腊文化，发现它对于了解罗马的复杂形象同样重要。罗马的许多属民是希腊人，所以罗马人确保将这个希腊遗产的中心变成罗马世界的代表，这一点也很重要。不仅罗马著名的捐献人，就连皇帝和帝王家族的其他成员都对雅典慷慨解囊。罗马作家提供了详尽的建筑计划的描述，至今在城市的建筑和碑铭遗迹上仍然能够看得出来。

但雅典并非始终是一个杰出的希腊城市。从公元前4世纪晚期起，叙利亚的安条克、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和小亚的帕加玛这些新兴希腊化城市的发展，意味着雅典在希腊世界的中心地位削弱了，但是这些城市的统治者仍然把雅典作为他们的文化中心，通过在那里修建建筑物和自己的纪念碑来称颂雅典。

公元前86年被苏拉洗劫，防御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后，雅典在政治上变得死气沉沉，但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它开始被罗马化。起初，尤里乌斯·恺撒出钱在雅典老广场的东面修建新广场，但它由奥古斯都完成，并举行了落成式。铺筑的矩形广场（面积为82×69平方米）四面环绕着爱奥尼亚式门廊，广场不远处是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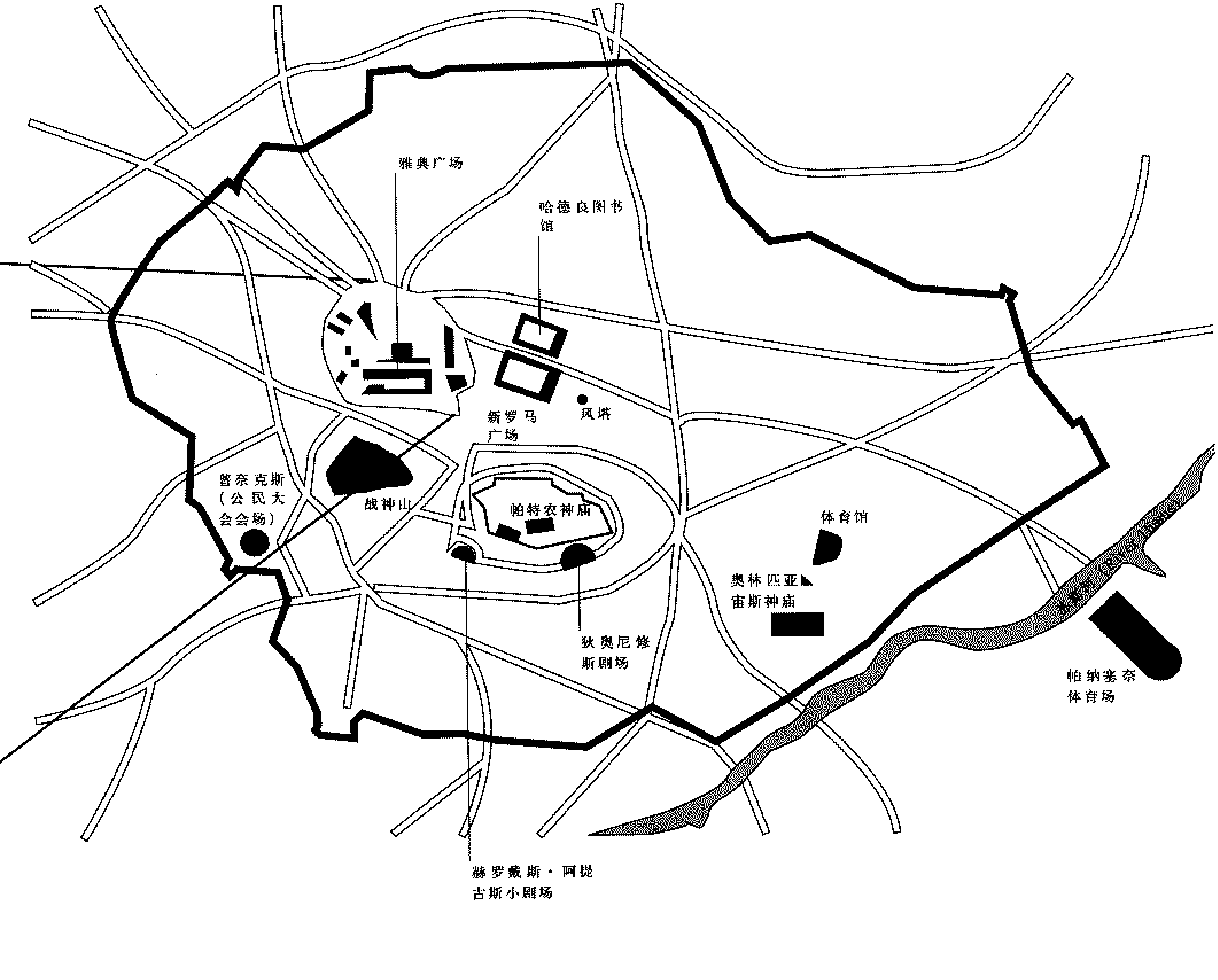


广场（Agora）是古代雅典的中心——商业、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中心。雅典广场到大约公元前2世纪呈现出了目前的矩形形状。原来存在的许多建筑被奥古斯都“罗马化”了，但他的女婿马尔库斯·阿格里帕也修建了新式纪念建筑，即包括100个席位的剧场，人们认为，阿瑞斯庙（与马尔斯相对应的希腊神）也是他负责修建的。

开的店铺，它的南面是水房。由西面一个宏伟的大门（还可见到）进入广场，据铭文记载，门上最初立着奥古斯都的孙子鲁基乌斯·恺撒（Lucius Caesar）的雕像。这个入口有意模仿了普洛派拉的建筑风格，即通往卫城雅典娜圣所的宏伟入口的风格，因此把罗马的纪念和商业中心与城市的保护神联系了起来。

改造广场和卫城

雅典广场是希腊民主政治的中心，也是奥古斯都时期人们关注的中心。他的女婿马尔库斯·阿格里帕建了一个剧场，成为老广场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罗马建筑。高耸的带有三角形山墙的矩形大厅，可容纳1000名观众的有顶篷剧场的彩色大理石装饰，堪与所谓的庞贝剧场媲美，区别只是在于这个剧场恰好位于雅典市中心的中心。同时，老广场西面的阿波罗·帕罗斯（Apollo Patroös）庙受到改造，安放了一个献给帝国神的祭坛。阿波罗庙北面的宙斯·厄柳西里奥斯（Zeus Eleutherios）柱廊也为适应帝王崇拜加以改造，忠实的雅典





罗马时代的雅典广场。同帝国其他地区的新式公共空间一样，这个广场建于公元前1世纪末，事先做了整体规划。矩形的广场由柱廊环绕，可从一个巨大的拱门进入。它也有商店、市场官员的办公室和公共厕所。远处是一座保留下来的八角形风塔，从希腊化时期起，塔内珍藏了一个精美的大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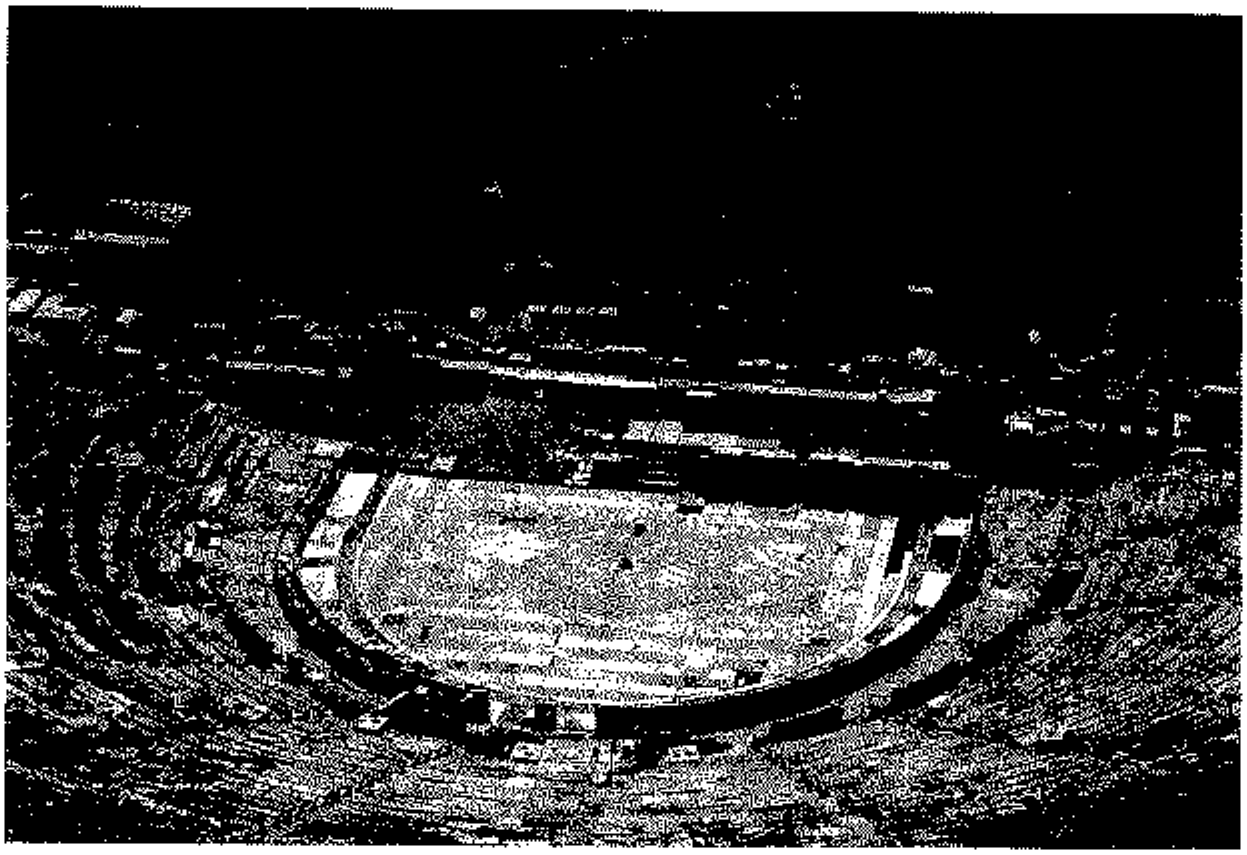
人在此奉献牺牲，以庆祝皇帝的生日。

阿格里帕可能也将雅典外面一座公元前5世纪的阿瑞斯（希腊的战神）庙的建筑部件转移到了广场上，建成了一座新的阿瑞斯庙。这座神庙现在位于广场从前的露天中心，是市中心最大的建筑。它象征性地与罗马奥古斯都广场的主要建筑马尔斯·乌尔特（Mars Ultor）神庙联系在一起。因此，虽然阿瑞斯神庙与帝王崇拜没有直接联系，但它使传统的雅典广场与罗马的奥古斯都帝国广场有了某种联系。

奥古斯都及其亲友的建筑活动效仿希腊化时期的国王在雅典兴建公共建筑的传统，但这些罗马化的转变也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昔日对雅典民主制极为重要的开放的公共空间现在充斥着建筑物。因此，他们把罗马帝国的统治象征性地，当然也真实地强加给了雅典。

由于对剧场的一贯兴趣，尼禄通过整修位于卫城南坡的雅典主要剧场——狄奥尼修斯剧场，也把自己同希腊文化中心雅典联系起来。这次整修既献给狄奥尼修斯也献给尼禄自己。事实上，在奥古斯都时期，剧场已经与帝王崇拜有了联系。留在一个座位上的铭文证实，从大约公元前27年起，雅典就开始了对奥古斯都的崇拜。1世纪期间，在这个剧场还举行角斗表演，这种做法在帝国东部较为普遍，而在意大利和帝国西部（奥古斯都以后），一般是在圆形斗兽场举行。这种表演常常与帝国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可能由祭司们出钱，作为对他们的职务的部分报偿。雅典人对帝国祭祀活动的热情很难估计，但公民对角斗表演的热情在狄奥尼修斯剧场得到了明确证实。而且，罗马人重新利用这一现成的设施成功地将一种很受欢迎的罗马娱乐形式与传统的希腊剧场联系起来，可能也与帝国祭祀庆典联系了起来。

伫立在雅典的专门用于帝王崇拜的惟一建筑是卫城上献给奥古斯都和女神罗玛的小神庙。这座庙宇的建造直接暗示着雅典的宗教中心卫城已经处于罗马的控制之下。这座新建的神庙受到埃里克泰昂（供奉雅典娜、波塞冬和其他希腊神与英雄的复合庙宇，位于卫城附近）风格的重大影响，因此这使它与古典希腊宗教有了联系。但雅典对罗马皇帝的崇拜看来与其说



雅典卫城脚下的狄奥尼修斯剧场。这座城市和传统希腊文化得到皇帝尼禄的大力支持。

是热情洋溢，不如说是沉默不语。这似乎表明在雅典保护神的圣所中兴建一座新庙可能反映了帝国对雅典人不敬行为的愤怒。仅在克劳狄（Claudius）和尼禄时期，帝王崇拜才在雅典变得更为明显了一些。

哈德良的改良

根据对罗马朱利亚·克劳狄王朝在雅典建筑活动的调查，尽管罗马皇帝中伟大的亲希腊者——哈德良显而易见在2世纪中叶建立了最早的纪念碑，但罗马人在此之前就已经对雅典社会、宗教、商业和政治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介入，尽管雅典人一开始并不愿意接受。朱利亚·克劳狄王朝及其官员们吸收、改进并且丰富了雅典居民生活的一些重要内容。

由于哈德良对希腊文化的兴趣，他对雅典表现出了特殊的好感。他在130年使雅典成为祭祀团体——泛希腊联盟的中心，许多行省的希腊城市都被邀请入会。哈德良第一次参观雅典时，下令建成献给奥林匹亚的宙斯的神庙，这座庙宇由僭主庇西特拉图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晚期，但公元前510年雅典建立民主政体后，放弃了这项工程。这座神庙最终在132年落成，历经大约七百年，一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将这次行动看做罗马皇帝与前民主时代的希腊僭主之间联系的标志。哈德良时期还增建了一座新的高架引水渠，这是一项更具实用性的工程。引水渠由四根爱奥尼亚立柱支撑，外观宏伟，极大地改进了水的供应。在他支持下，对老城向西和向东南方进行了扩建，我们在那里还可以看到民宅、浴场和体育场的废墟。而且，哈德良还修建了一座纪念凯旋门，标志着老城与新城的变迁。这座凯旋门上展示着哈德良和雅典传说中的英雄提修斯的雕像。哈德良还在紧靠恺撒和奥古斯都广场的地方建了柱廊与图书馆，在布局上模仿位于罗马中心的韦伯芗和平神庙，拥有带柱廊的花园，延伸至中心的狭长水池。

在哈德良之后的一段时期，雅典的公共工程直接由赫罗德斯·阿提古斯（Herods Atticus）负责，他是一位富有的艺术赞助者，雅典人邀请他操办他们最重要的城市活动——泛雅典娜节，他因这一殊荣而希望对雅典人表示感谢。他修复和扩建了公元前4世纪的体育场，它最初是为泛雅典娜运动会的田径比赛而建。现在它被改造成一个罗马式的剧场，适用于角斗比赛。

在基督教皇帝查士丁尼于6世纪关闭哲学学园之前，雅典城一直是文化和学术的主要中心，但是在2世纪以后，它的杰出地位并没有反映在修建大规模的建筑物或纪念物方面，虽然一些常规的建设和对一些公共空间的小规模改造仍在继续。3世纪中叶，皇帝瓦列里安修建了防御城墙，但这并没有阻止哥特人和西鲁尔人于267年蹂躏雅典。

虽然庞贝为一个罗马城市的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证据，但雅典却是一个前罗马传统在罗马帝国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的城市的最突出例证，许多帝国时期的罗马建筑由于采用了古典希腊风格，表现出强烈的怀旧感。卫城的奥古斯都和罗玛（Roma）庙以及罗马的奥古斯都广场都采用了这样的古典形式，象征罗马的管理制度、宗教和罗马对属民统治的包容性。罗马皇帝在雅典的工作不仅美化了这座古老的古典和希腊化城市，而且赋予它罗马化的本质特征和设施。同时，雅典在建筑和文化方面象征性的中心地位，意味着它不仅保持了传统的面貌，而且也把它们输出到了罗马自身。

北非的迦太基

北非的罗马城市迦太基在考古和历史方面显示出与庞贝和雅典不同的情况。让人感到好奇的是，悠久的、富于传奇色彩的布匿迦太基的历史，对它的罗马继承者而言，却几乎没有提供有关其结构及功能的信息。迦太基城不仅在罗马时期之后仍不断进行建设，而且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由于现代突尼斯城及其郊区的扩张，都意味着古代迦太基——不论是布匿时期还是罗马时期的迦太基，几乎没有什么遗迹能够幸存下来。寻找布匿人的墓葬行为也进一步造成罗马迦太基的破坏。所以，为了挽救这座城市的部分历史，突尼斯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发起了一次国际行动。来自保加利亚、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波兰、瑞典、突尼斯、英国和美国的考古队利用先进的地层学方法在城市的各个地区进行考古发掘，使得现

在有可能拼凑出这座城市在罗马统治时期的某些生活片断。

至少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布匿文明支配着西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其中心便是迦太基城。约公元前814年，出自腓尼基的推罗城的殖民者建了这座城市（据传统说法）。布匿城的地理边界还不清楚，但是挖掘出了一个宏伟的大门，一座防御性海堤和一座设计良好的矩形的城市，时间不晚于公元前5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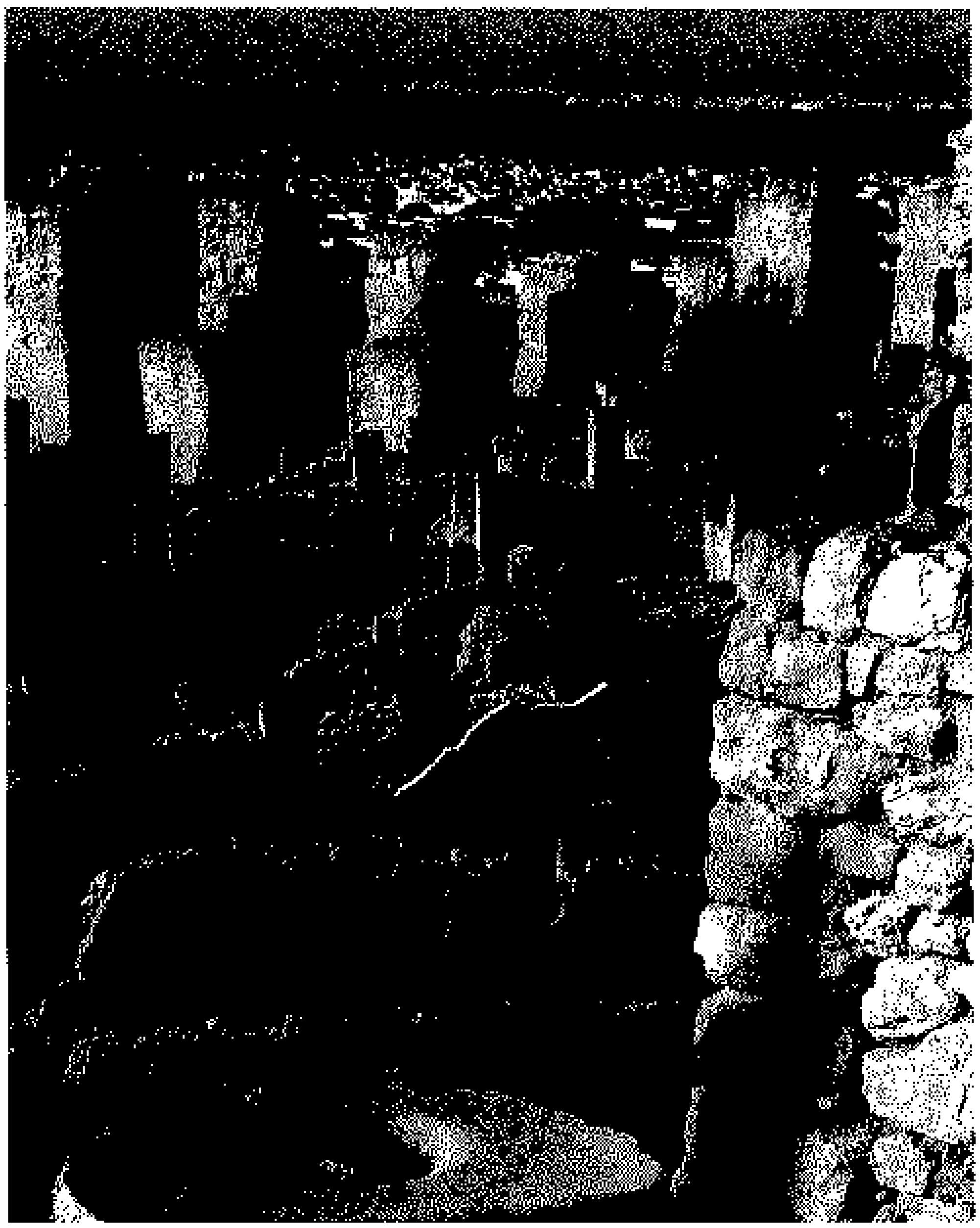
布匿人在地中海的统治以及它与罗马的对抗结束于公元前146年春天。当时罗马元老院下令把迦太基夷为平地，并且对这个地方加以诅咒。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①的军队捣毁了防御城墙，进入市中心——比尔萨城堡。成千上万的男人、妇女和孩子在那里避难，他们中有许多人被杀，迦太基的宗教和城市建筑被摧毁。在这些建筑中，有一座古代文学中最有名的庙宇埃诗蒙庙，它在布匿相当于医治之神阿斯克列庇奥斯(Aescu-lapius)。

公元前122年，尽管发生过这次灾难以及对这座城市上的诅咒，但罗马保民官盖乌斯·格拉古还是试图在这里建立一个6000人的小殖民地——朱诺尼亚（Colonia Junonia）殖民地。每个殖民者都将分得约四分之一公顷的土地。虽然在空中仍然可以见到属于这个早期殖民地的一些格状划分标记（百户区），但我们对有关它的其他事情所知甚少。事实上，以后几百年对迦太基的记录是一片空白。

罗马殖民地

公元前44年尤里乌斯·恺撒死前不久，曾下令恢复迦太基城，但直到前29年奥古斯都统治开始后，由3000名殖民者构成的朱利亚·康克迪亚·迦太基殖民地才在老城废墟上建立起来。奥古斯都显然打算让迦太基成为阿非利加行省的首府，成为帝国最大的城市之一。

奥古斯都的勘测员绘制出了完整的城市格状规划图以及一个百户农业区。浩大的土方工程的实施湮没了早期布匿城市的中心。比尔萨城堡被夷为平地，形成了一个大约三四公顷的矩形平台，成为罗马殖民地新的市中心。这里也建起纪念性建筑——会堂、广场和神庙，明显铲除了布匿统治的基本象征物。然而，最近的发掘已经找到了布匿城的遗址，表明这座罗马新城的规划仿效了被毁灭的老城。许多新建筑也是根据布匿而非罗马的测量方法建成的。换句话说，老城被完全毁灭的神话并没有得到最近考古研究的证实。同罗马其他行省城市一样，迦太基依然是由原居民和后来的罗马移民组成的混合居民的家园。



在突尼斯城附近发掘出来的迦太基遗址，虽然罗马元老院根据不能宽容的强硬态度要求毁灭迦太基，但是该地点拥有优良的天然港口，是非常适于生活的地方，不可能被长期忽略。罗马人的迦太基城繁荣了将近四个世纪（以帝国铸币行业闻名），直至被汪达尔人征服。

① 又称小西庇阿，率军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毁灭罗马宿敌迦太基。历史家波利比乌斯记载了他在目击迦太基城毁灭时的感慨。——译注

迦太基的宗教

同罗马帝国其他城市的情况一样，罗马征服者无疑也把自己的世俗和宗教秩序强加于这座城市。一个奥古斯都家族的祭坛被置于新的基座之上，如同在雅典那样，从前迦太基的宗教中心变成了帝国祭祀活动的观看地点。这个祭坛及其花饰、螺旋装饰、象征性的牛角、牺牲场面，都不禁使人想起了在罗马兴建的庆祝奥古斯都为罗马世界带来和平的奥古斯都和平祭坛。在这个新的中心也建起了古典风格的宏大庙宇。

我们不清楚这座庙宇是献给谁的，但保留下来的文献表明了一座献给卡皮托林三神，即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的。该神庙位于广场的西端。罗马女神塞瑞斯（Ceres）和康克迪亚（Concordia，她的名字出现在殖民地的名称上）在迦太基也有圣所，可能也在这个台地上。不过，同整个帝国的一般情况一样，迦太基的罗马人对当地宗教也保持了宽容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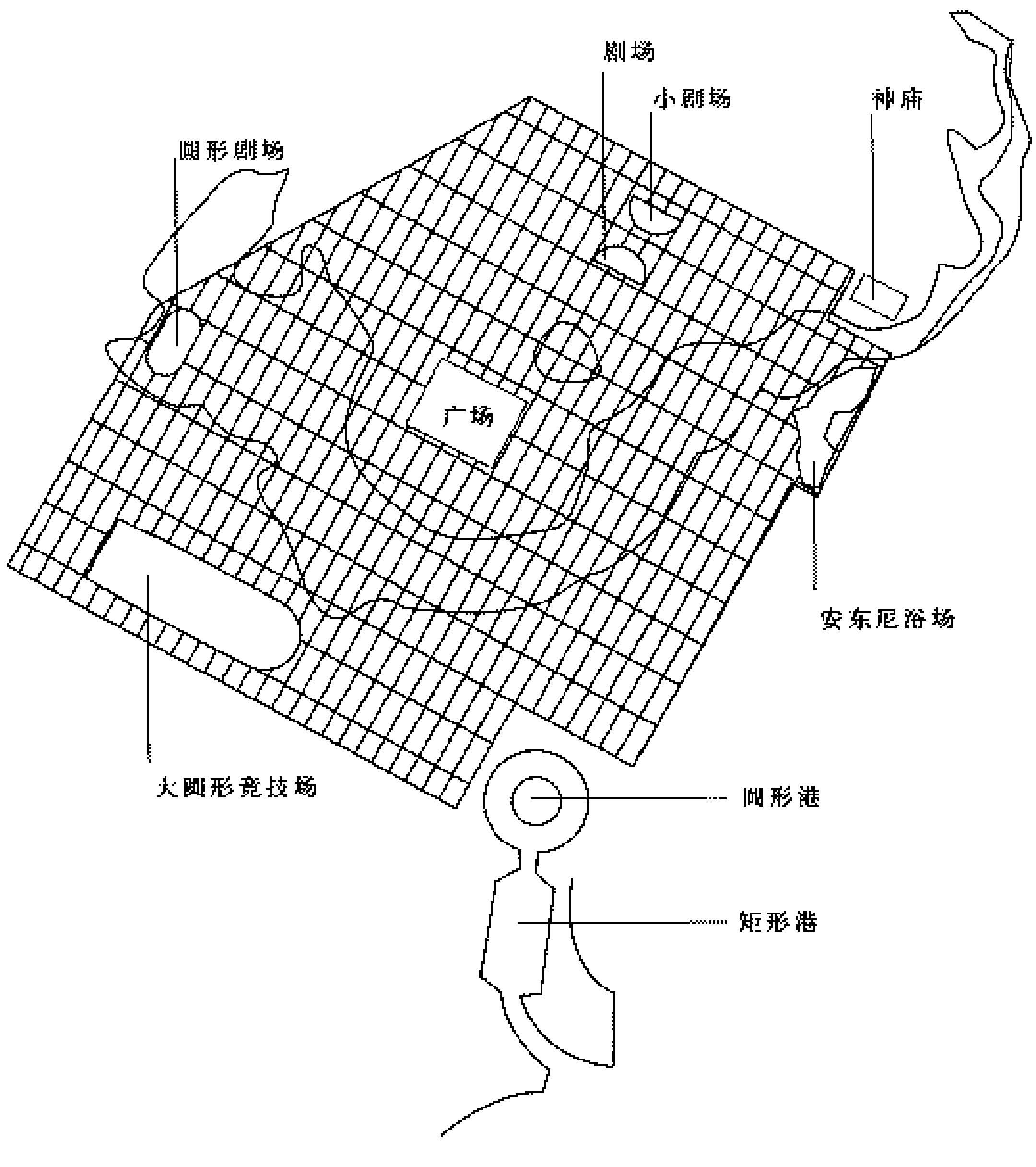
文献材料表明在罗马的迦太基，有一座献给卡勒斯提斯的神庙，它是罗马人用来取代布匿迦太基的保护神塔尼特（Tanit）的神灵，它的圣所位于城市南边的托菲特附近（献祭点，可能包括儿童献祭）。最近在那里的挖掘证实这个古代的圣所仍然是罗马女神卡勒斯提斯（Caelestis）的祭祀中心。也有证据表明，到2世纪中叶，迦太基出现了基督教团体。

公共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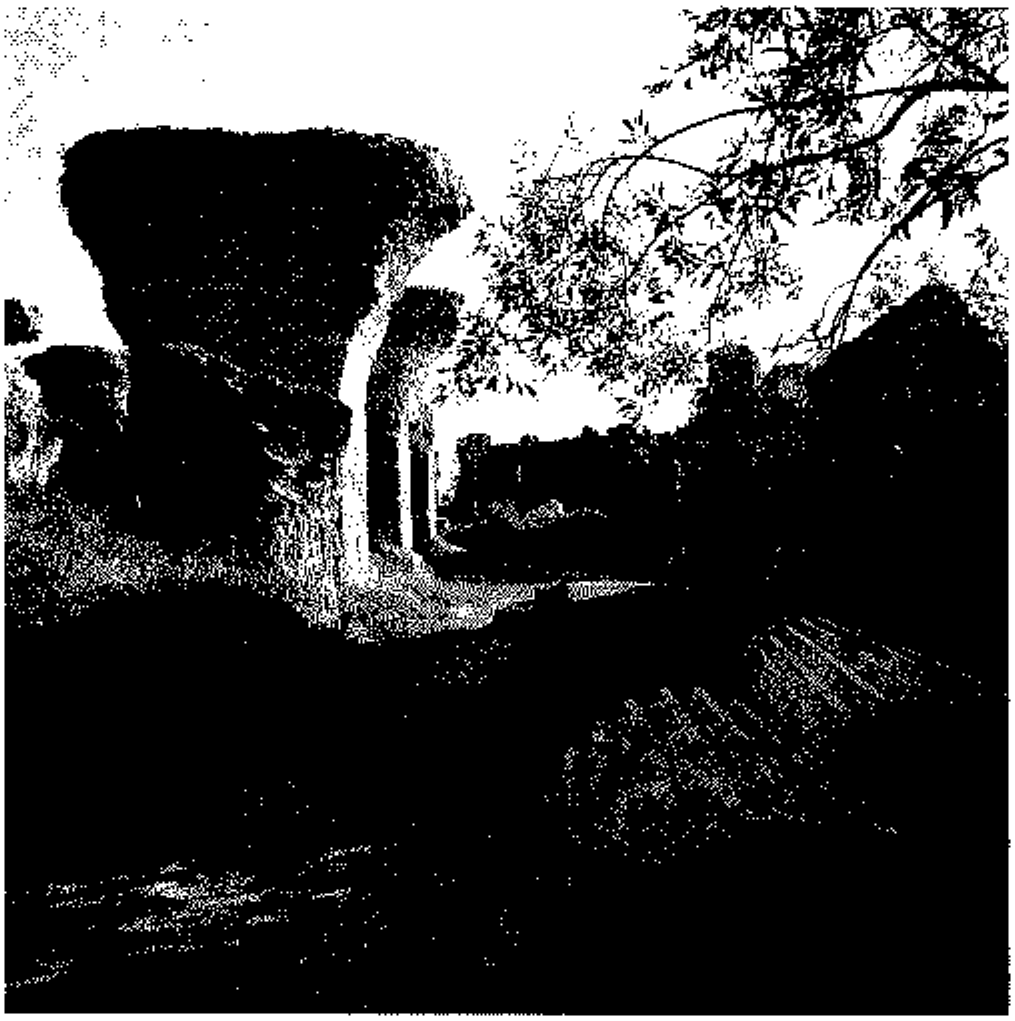
罗马迦太基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是位于城市东南部的两个港口，外面的矩形港口与里面的环形港口相通，处于城市的格状规划之内（西塞罗提到，布匿迦太基被港口包围）。考古发掘已经发现了大约三十个布匿时代晚期的船坞遗迹，以扇形排列在内部的环形港口周围。显然，罗马迦太基主要依据布匿时代的做法规划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

但罗马人也为迦太基提供了很多新的公共设施。其中重要的是位于城市西面的必不可少的圆形斗兽场，面积为156×128平方米，与庞贝圆形斗兽场的面积相近。到1世纪末，在城市的西南角建起了一座516米长的竞技场或称体育场，这里可以举行运动会。竞技场可以容纳41，000至55，000人，仅比罗马的大竞技场短80米。

在2世纪期间，阿非利加行省繁荣起来，迦太基成为位居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之后的罗马世界第三大城市。作家阿普雷



对于布匿或事实上罗马的迦太基城，几乎没有什么考古证据保留下来。公元前146年布匿战争后，罗马人对它的破坏以及19世纪中叶大规模的建筑计划，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古代建筑遗存。不过，还是有证据证明存在一个建在格状规划基础上的城市，尽管我们无法确定这种百人区制度出现于什么历史时期。我们知道城市以超过23英里长的厚墙严加防卫，它以作为城市组成部分的、颇为壮观的港口为特色。



罗马迦太基安东尼浴场遗址中倒下的柱子。罗马人从埃特鲁里亚人那里学到的水利工程技术使他们能够把迦太基重新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地中海城市，在这里，一个公民能够享受到在罗马、庞贝或雅典同样的物质生活。

生于阿非利加，描述了迦太基的哈德良剧场的豪华装饰——大理石铺地，精美的舞台上有彩色镶板装饰的顶篷，格外耀眼。这个剧场的考古遗址在城市的北面，由带有凹槽的花岗岩、大理石、斑岩和石华柱构成，证实阿普雷对帝国鼎盛时期迦太基奢华的公共建筑的描述。紧挨着哈德良剧场的是罗马世界最大的剧场，也建于2世纪晚期或3世纪早期。

但是，现今最有名的遗迹是安东尼浴场，临海建在原来的一个小海湾上。因此，这座建筑可能填平了城市的一个古老港口。这个浴场占地17，850平方米，是罗马以外最大的浴场建筑。它采用罗马浴场常用的对称结构，在一半中央热水浴室和八分之一中央热水浴室中都有同样的设备。一则铭文将它的时间定为145年至16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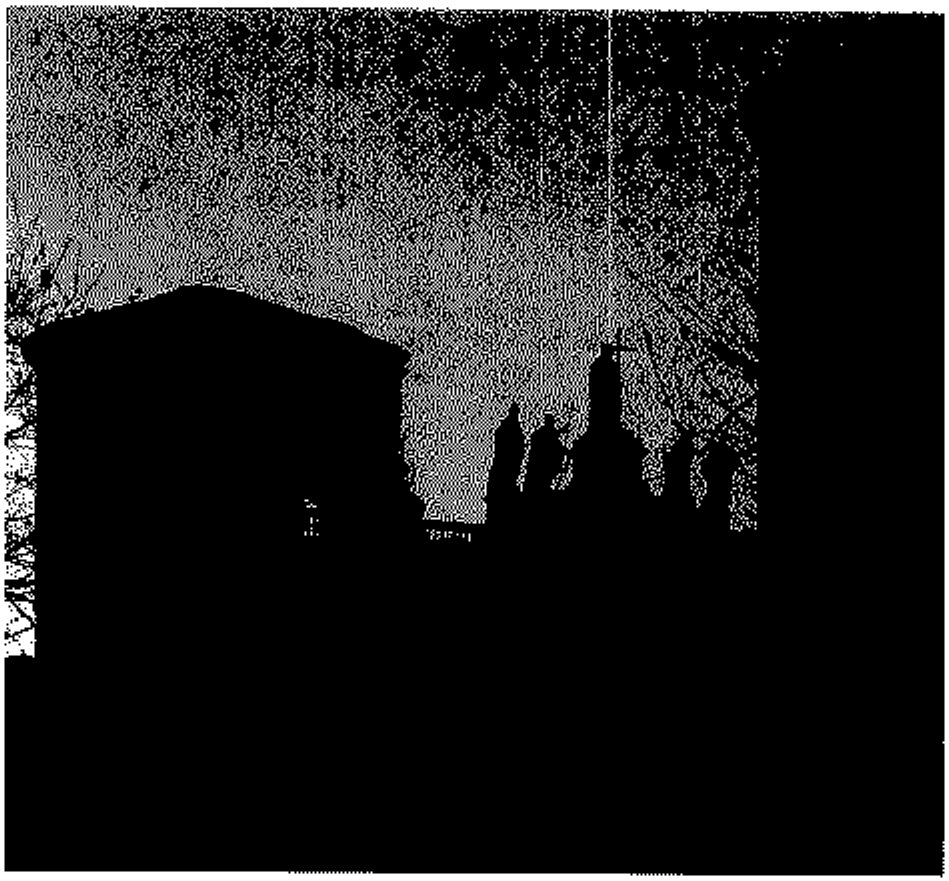
这些浴场由一条引水渠供水，从大约56公里远的地方把水引过来。水渠的几段保存了下来，据估计一天的流量在3200万升。水流进可储存2.5万至3万立方米的蓄水池。然后，水由管道送至一个U形大院，流入一个华美的梯形水池。这种供水系统给罗马的供水官员弗朗提努斯（Frontinus）留下了深刻印象，公元100年，他对此进行了描述。蓄水池最初由布匿人修建，罗马时期被重新利用。

基督教时期的迦太基

3世纪中叶，迦太基主教塞普里安（Cyprian）写道：矿藏用完了，农民数量减少，奴隶跑光了，殖民者变成了强盗，整个世界都是老弱病残，一切都要结束了，但迦太基的这种景象似乎与考古证据相抵触。事实上，在4世纪初显然发生了更为重大的变化。当时鲁基乌斯·多米提乌斯·亚历山大（Lucius Domitius Alexander）作为阿非利加主教区的首脑驻扎在迦太基，他背叛了罗马，毁坏了港口，因此妨碍了粮食出口，给罗马造成了饥荒。即便如此，这次反叛还是在311年被镇压了，迦太基迎来了建筑的复兴。

塔格斯特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Thagaste）于370年至383年生活在迦太基，他笔下的迦太基有井然有序的街道和广场，树木葱茏，并且夸口说比尔萨至少有12座教堂和1个三位一体大厅。临近别墅区的精美马赛克图案也为4至5世纪的持续繁荣提供了证据。尽管有证据表明城市曾充满生机，但5世纪早期的衰落也是显而易见的。439年，迦太基被汪达尔人占领，成为汪达尔国王盖塞利克（Gaiseric）和他的继承者的都城。竞技场在这时作用减小，在7世纪不再使用。拜占庭将军贝利萨留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于533年至534年摧毁了汪达尔王国，这座城市成为基督教的中心，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效忠东罗马帝国。698年，在城市化和罗马化500年之后，迦太基遭到阿拉伯人的入侵，这次入侵横扫了北非。

在人们的记忆中，罗马征服者对布匿迦太基的做法是西方古代史上对一个国家最残酷的歼灭。但是，罗马对迦太基的政治仇恨引导他们消灭了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城市或一种文化。而且，布匿迦太基的许多特色都在罗马时期得到了改造和复兴，留下了永久的纪念。他们鼓励当地居民奉行自己的法律和宗教，因此创造了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



建于2世纪末叶的特里尔尼格拉门是进入罗马城市的重要北部门户。由于用砂石所建，这座城门现在已受到严重侵蚀（它的名字因此而得），添加在它实用性的防御表面的外部装饰始终没有完成。这座城门长120英尺，宽76英尺，高100英尺，是现存最大的罗马时代的城门。

西方的特里尔

与庞贝、雅典和迦太基不同，特里尔是一个新建的城市。它坐落在摩西勒河（the Moselle River）岸，处于特里维利人（Treveri）管辖区内，这个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卢森堡。据尤里乌斯·恺撒记载，特里维利是一个好战的高卢部族，这个部族的人擅长骑马。虽然罗马人到来前周围地区有一些堡垒，但恺撒提到在后来罗马建城的地方，起先并没有城市或堡垒。考古发现证实，罗马人到来前，这里实际上没有居民点。此前，没有材料提到这个地方的名称，这也说明之前这里没有任何居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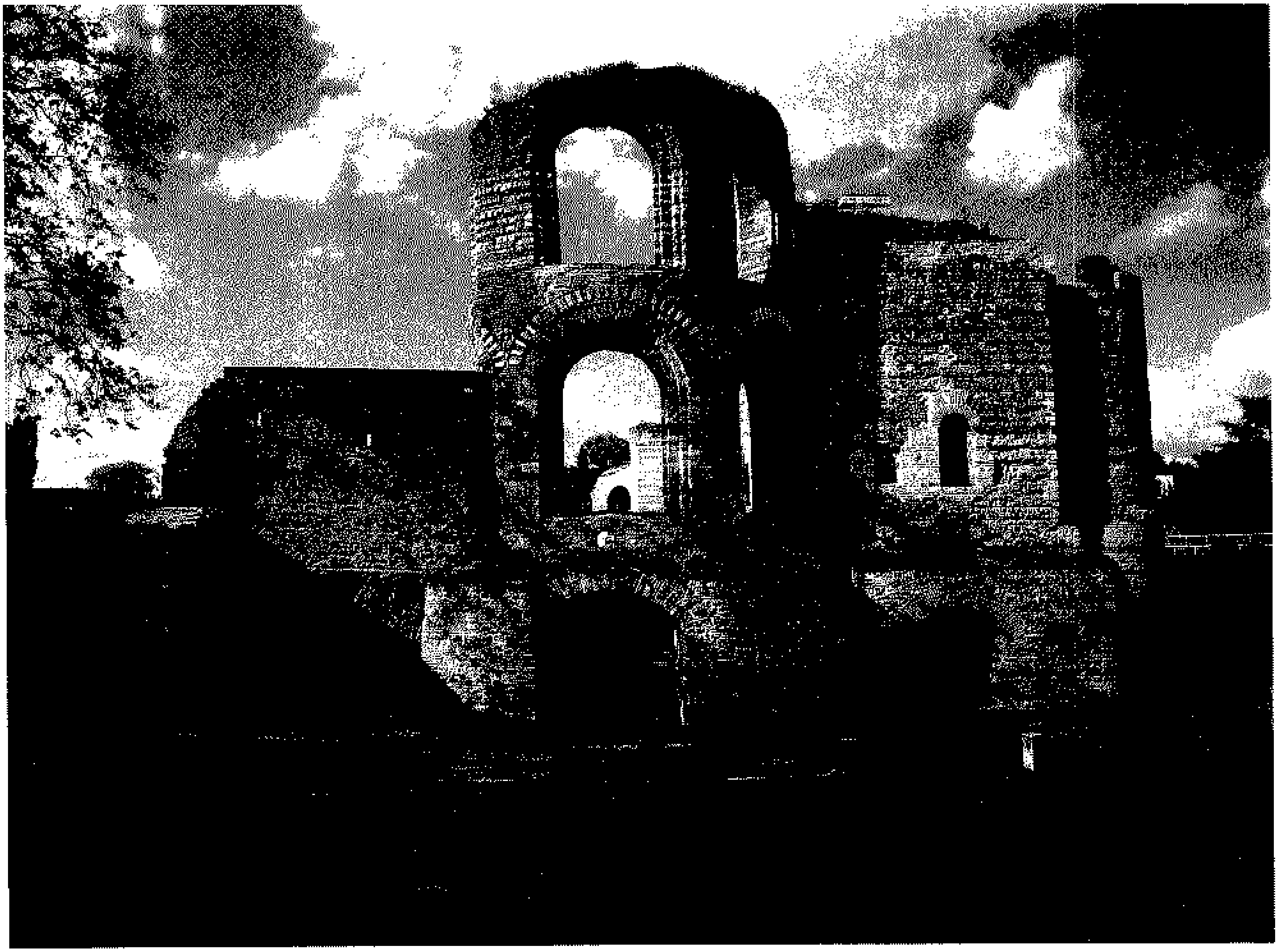
与北非和东方行省相比，西北部行省的罗马城市的特点是它们通常不建在事先存在的城市中心。相反，它们常常是为军事目的而建。奥古斯都的将军和女婿阿格里帕可能觉得有必要控制摩西勒河这个可涉水通过的地方，因此选择这个地点作为军事营地，在战略上处于罗马边境以及莱茵河上罗马军事基地的后方。这种兵营经常要为随行的非军事人员建立聚居地，包括当地人以及随军的士兵家属和商人，他们与军队老兵一起常常构成新城的核心，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老兵或大的罗马殖民团体被安置在特里尔。因此，虽然特里尔由罗马人建立，但它的最早居民主要是现有的当地人。

罗马在特里尔建立殖民地依据的是奥古斯都的政策，但直到克劳狄时期，它才获得许可并取得殖民地的地位，称为奥古斯都·特里维尔殖民地。特里尔处于意大利和莱茵河流域地区的交通要道上，由于经济地位重要，它迅速发展为北部高卢最繁荣的城市。大约1世纪中叶，它已成为比利其和上、下日耳曼行省总督的居住地。3世纪末，成为罗马帝国次级都城之一。293年，当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Constantius Chlorus）被皇帝戴克里先任命为四头之一时（四位共治皇帝），他选择特里尔作为他的都城和驻地。城市现在控制着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哈德良墙，从莱茵河到大西洋的广大地区。4世纪，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是西方著名的城市。395年，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把宫廷迁到米兰，把军事总部迁到阿尔勒斯以前，特里尔一直是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君士坦丁及许多家庭成员的驻地。从5世纪早期到中期，特里尔先后被汪达尔人、法兰克人、布甘迪人和阿拉马尼人占领和洗劫。很难确定罗马在特里尔统治结束的确切时间，但5世纪特里尔生活水平下降、人口有所减少。

早期特里尔城

由于特里尔在罗马时代晚期的发展以及至今作为一个城市中心的持续存在，所以最初三个世纪的历史遗迹几乎没有什么保存下来。它的直角布局的中心可能是最初的奥古斯都军营。有一篇纪念铭文提到奥古斯都命运不济的孙子盖乌斯和鲁基乌斯，这表明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期间，特里尔至少建起了一座重要的建筑。根据木头的年代测定，也是在奥古斯都时代早期，有座木桥架在了摩西勒河上。在克劳狄统治时期，这第一座桥为一座石桥所代替，它的桥墩还支撑着现代桥。

最早的石基房屋出现于1世纪中叶。在后来建起的会堂的西边，发现了一座矩形大厅和门厅的遗迹，时间



位于特里尔的所谓凯瑟特曼（Kaiserthermen）（帝国浴场）遗址。4世纪初，特里尔由行省城市转变为一位共治皇帝的都城。最初虽然打算做浴场，但凯瑟特曼似乎为其他目的被封闭起来，可能是为越来越多的帝国官僚们提供住所。

也是在1世纪中叶。这座建筑装饰着精美的马赛克镶嵌画和壁画，与一座带有长廊和花园的露天院落相接，使人想起尼禄和图密善在罗马的宫殿。人们很自然地将其定为总督的住所。木质圆形斗兽场可能也建在1世纪，位于城市东南部的皮特里斯堡（Petrisberg）的西坡。

因此，在特里尔被授予殖民地的地位时，它开始呈现出罗马城市的外部特征。不久以后，街道被延长，东西向大道为另一条朝南的东西向主路所取代。与此同时，用石头重建了圆形斗兽场。可容纳2万观众的斗兽场为特里尔公民及周围农村人口提供了娱乐。在君士坦丁统治期间，这些观众可以看到被俘获的法兰克王子被迫在这里同野兽搏斗的场面。

鼎盛时期的特里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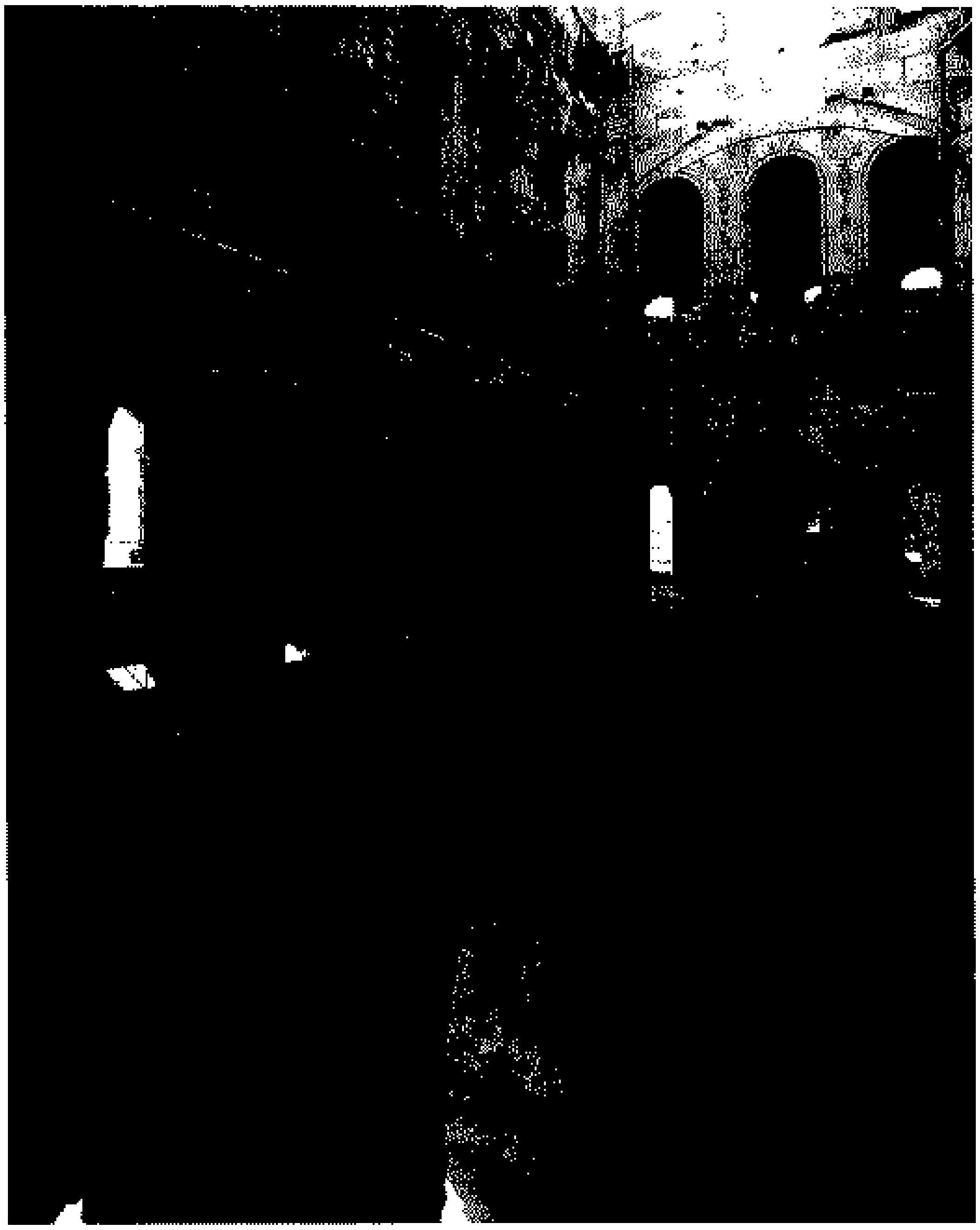
2世纪到3世纪，特里尔作为一个繁荣的罗马城市得到了全面发展。由于约400米长、150米宽的广场建在一些早期的房屋和一条街道上，因此它有可能是在2世纪早期规划的。在它的西面，发现了一座下沉的长廊遗迹，这里应该还有更多的建筑，可能是官方的元老院和议会厅。虽然会堂或神庙在罗马其他城市的广场很普遍，但在这里却没有发现类似建筑的遗迹。

在城市中心没有发现剧场。相反，在东南面的阿特巴克塔（Altbachtal）宗教圣所里却发现了一座小剧场。它建于2世纪，用木头和泥土建成，座位是石制的，可能与这个圣所的仪式有关。另一座剧场位于河对岸的雷努斯·马尔斯（Lenus Mars）圣域内，也建于2世纪晚期和3世纪早期。在西方，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即剧场更多时候与神庙和圣域相连，并不建在市区，这似乎也适用于特里尔。

同庞贝、迦太基和雅典的居民一样，特里尔的居民也得到了洗浴设施——但仅在城市建立后一段时间。这座建筑组合现在称为“巴巴拉特曼”（Barbarathermen），是罗马以外规模最大、最豪华的洗浴设施，可能建于公元100年后不久。这些浴场装饰精美，大理石雕像置于幽深的半圆形壁龛中，周围有一个露天游泳池。虽然它们也采用了我们在其他浴场见到的对称格局，但并非每个侧厅都是一个完整的浴场，所以可能并没有打算为男女洗浴设置隔离设施。然而，每个侧厅的确有几间热水浴房，这在帝国较为寒冷的地区是重要的设施。这些浴场大约与迦太基的安东尼浴场同时修建，其规模之大可与庞贝浴场媲美。这反映出帝国晚期在建筑上追求宏伟的趋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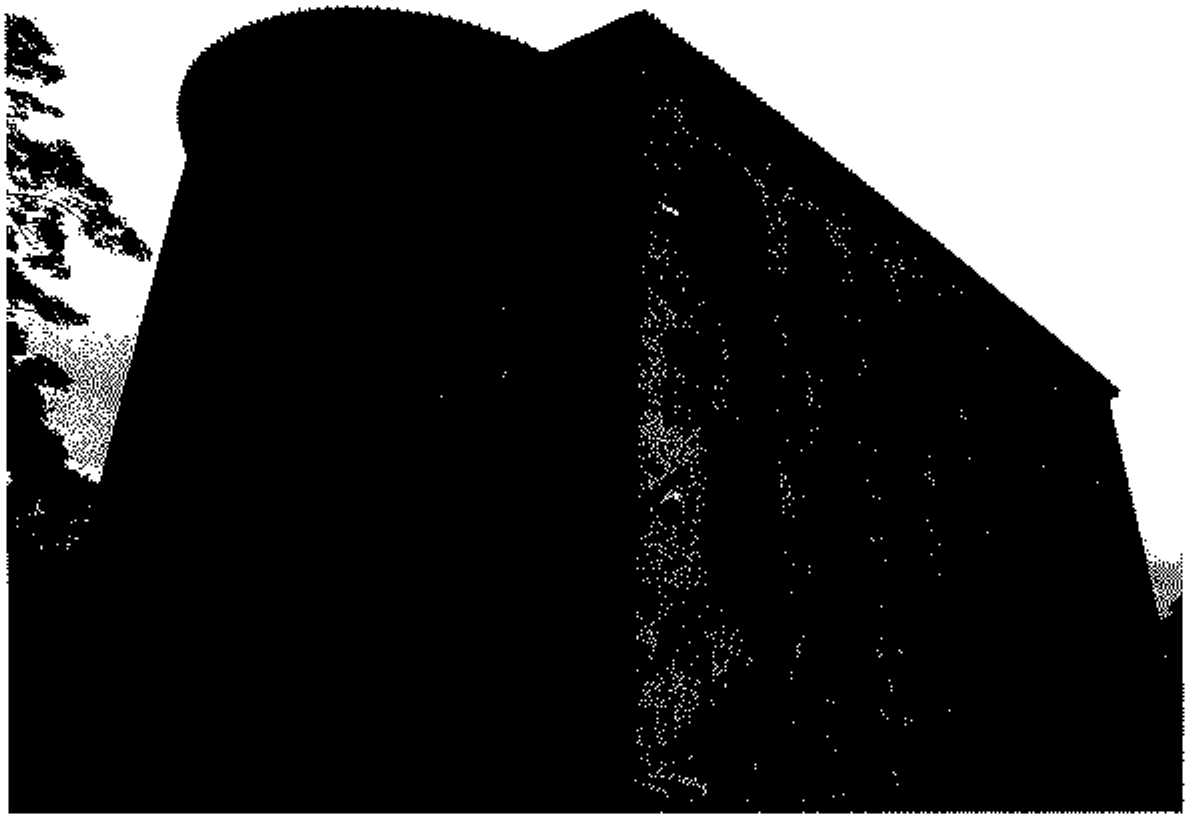
到4世纪，特里尔成了一个真正的都城。对这个时期，我们拥有更多的考古遗存和幸存下来的文献材料。在后一种材料中，奥索尼乌斯（Ausonius）[①]的诗《摩西拉》（*Mosella*）以及献给君士坦丁的颂词提供了很多有关城市的信息。这些文字材料显示君士坦提乌斯在城市的东北部始建了一座宫殿，由君士坦丁完成。所说的“会堂”遗址是这座宫殿的组成部分，也是现今特里尔的主要特征之一。这座建筑于1944年被毁，但随之而来的调查和重建则提供了很多信息。它全部用红砖建成，没有较为常用的混凝土内核，长67米，宽27.5米，高30米，没有内部支撑结构。一端有一个半圆形后殿和两排圆顶窗户。地板由黑白两色大理石铺就，下面有地热供暖系统，内墙由大理石饰面装饰，外墙覆盖灰泥。这有可能是宫殿中的皇帝接见大厅，它的极其简洁的设计可能是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严。

特里尔还有另一处洗浴设施遗址，可能是这个宫殿的一部分。因此，到君士坦丁时期，城市拥有了罗马以外已知的两套最大的浴场设施。这些“凯瑟特曼”（帝国浴场）建于293年之后的某一时期，占据了几乎与特里尔广场同样大的一块地方。与巴巴拉特曼相比，这些浴场显示出许多先进的设计特色，比如更简洁，比较多地利用圆形，额外加热的房间以及更有效的排水系统。可能人们并未打算让它们与事先存在的浴场同时发挥作用，而是要取而代之。不过，同样可能的是，它们根本无意被用作公共浴场：作为宫殿的一部分，它们可能只打算供这里的居住者和客人使用。但是，没有发现水管或大理石墙面的遗迹这一事实表明这座建筑可能始终没有完成，因此从未真正投入使用。相反，它们的规模随后减小了，被改造成一座官方建筑，可能为给城市议会提供一个更大的会场。



带有浮雕假石柱的尼格拉门内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帝国宏大建筑物的原貌，但这座建筑除了象征权力之外，不可能有更多的意义。

① 4世纪的拉丁诗人，其代表作《摩西拉》描述了高卢的摩西拉河的美景。——译注



特里尔朴素的砖结构会堂，建于4世纪上半叶。后来，它成了一座宫殿，最初由法兰克国王占有，后来又成为大主教的宅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大规模的修复。

罗马的对手

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基督教成为帝国内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特里尔成为北部高卢第一座拥有教堂的城市。这个早期的教堂原计划作为一个双重教堂，现在成了特里尔大教堂和圣玛利亚教堂。后者的多边形制是4世纪意大利和东方教堂的特点，但在西方很少见。据说，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到圣城朝圣后，授意了此种设计。

皇帝出现在特里尔也带来了其他的变化。已经很宽阔的街道现在排列着门廊，砾石路面改由铺路石铺就。同迦太基一样，特里尔现在有一座竞技场，同罗马的大竞技场不相上下。它的确切地点现在无法确定，但有可能建在大教堂东南部的开放空间，与圆形斗兽场相隔不远。

雄伟的石灰石仓库建在城市另一面的河流旁，由两座建筑构成，长度都是70米，宽度是19米，在规模和气势上可与会堂相比。没有通风设备表明它们不可能是存放粮食的仓库，相反，它们可能用于存放军事装备。

在某段时期，人们可能发现有必要在特里尔周围兴建城墙，但兴建时间和原因是有争议的。城墙不可能建于公元2世纪下半叶之前，但到了355年，它确实已经存在。城墙主体由混凝土建成，约3米厚、6米高。整个环形超过6公里长，面积285公顷，连接了75座塔楼。非常奇怪的是，这座墙连接了圆形斗兽场，使它成为进入城市的一个重要通道。另外，还有一座伫立着但没有完成的宏伟大门，它就是城墙北面、雄伟的尼格拉门，由于它是圣人西蒙的修道院而得以保留，直到19世纪还是一座教堂。它的黑色——由此得名——是石头受侵蚀的结果。这座城门的设计证实它有意要恢复1世纪帝国的风格，使徒步履行者感受到罗马的权威。这一特点表明这些防御城墙可能打算作为罗马权力的展示和象征，而并非为防御目的。城墙上面的连拱廊也太宽，不可能起到防御的作用。

特里尔的宗教

罗马的特里尔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本土宗教中心。由于罗马推行允许甚至鼓励地方宗教的政策，许多前罗马时代的神常常与罗马神一起继续在城市中受到崇拜。城市的规划因此考虑到了事先存在的各类地方神的圣所，特别是那些位于阿特巴克塔山谷（Altbachtal Valley）的圣所。在此发现了五十多座圣所，密密地挤在一起，但大小、形状和方位不尽相同。其中一些在形制上更具地方特色，然而另外一些则是典型的罗马风格。在1至4世纪期间，许多圣所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个明显的圣域也包括祭司的住宅和一座小庙。后者在2世纪弃置不用，3世纪为一所与米特拉斯（Mithras）崇拜有关的建筑所取代，米特拉斯崇拜源于东方，特别与士兵、商人和自救的观念有关。

穿过阿特巴克塔山谷向圆形斗兽场的方向望去，一座壮丽的神庙耸立在城市南部的赫里克鲁兹山（Heiligkreuz）的北坡，现在称之为赫兰布伦辰神庙。这是一座罗马风格的庙宇，由一段宏伟的台阶进入，装饰着叶形的螺线板和斜纹及披着衣服的女像，这是献给谁的庙宇现在尚不清楚，但它居高临下的位置表明它或是献给卡皮托林三神或是帝国的罗玛和奥古斯都神的。从1世纪的铭文中我们了解到，特里尔有两名罗玛

和奥古斯都的祭司。

在河对面，离最早的桥不远处是雷努斯·马尔斯圣域，这位神祇体现了罗马与当地特点和风格的结合。这个地区在前罗马时代就是圣界。大庙有一个房间，前面带有柱廊的门厅支撑着一座三角形山墙，这是典型的罗马风格，但时间属于2世纪。雷努斯是当地人的神灵，这里对它的崇拜相当于罗马对马尔斯神的崇拜。与这座献给雷努斯·马尔斯的神庙有关的祭品见证了两位神的力量：祭品包括儿童的小雕像，与马尔斯作为年轻人的保护者的身份相关；戴着头罩、拿着钱袋的矮子，表明雷努斯能给人带来好运。特里尔的主要剧场也在这个圣域内，显示出非常有组织性的罗马-凯尔特的崇拜。有趣的是，记录显示上面提到的罗玛和奥古斯都的两名祭司也是雷努斯·马尔斯的祭司，这再次说明传统的罗马神、地方神与帝王崇拜的混合。但是，在晚后的3世纪至4世纪，这种地方性的高卢-罗马神被看成是反对新兴的基督教崇拜的主要力量，所以，格拉提安皇帝统治时期拆毁了他们的神庙。

特里尔是一个繁荣的高卢罗马城市，它的繁荣主要因为它恰恰处在帝国的日耳曼边界后面，控制着意大利和西北行省之间一条战略军事和贸易要道。强烈的高卢本地的影响保留在城市的宗教供品中，但特里尔的公共建筑主要具有罗马帝国特色，象征这个城市在晚期帝国的行政管理上所处的重要地位。

城市化

奥古斯都皇帝是帝国城市的主要建立者，但只是从2世纪起——这时庞贝已经被毁——这些城市才真正作为罗马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繁荣起来。从2世纪早期起，城市间的地区差异开始打破，雄伟的罗马建筑类型开始在整个帝国城市占据统治地位。对于意大利、非洲和东方已建好的城市，罗马人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技术，新的材料和罗马人的雄伟观念，建筑的构造和对称格局以及典型的罗马建筑风格。在西方，他们同样利用这些原则创造了重要的新城市中心。

罗马在建筑方面的统治地位掩盖了它在文化和宗教上的统治地位，但“罗马化”（意在改造他们的属民）与有效地对他们进行统治一样，都是部分罗马人的愿望。罗马的统治有赖于地方贵族的合作，他们自行管理地方宗教和政治事务。这些贵族通过代行罗马的权力反过来加强了自己的权力。所以确保罗马统治的继续对他们意味着最大的利益。通过这样一种控制和宽容的制度，罗马帝国的城市作为真正的多元文化中心繁荣起来。



位于特里尔城摩西勒河旁的罗马浴场（4世纪）的遗迹，紧挨着尚未征服的日耳曼边界。特里尔对罗马人具有心理上及战略上的意义，因此罗马人赋予它不朽的建筑，使城市获得了“北方罗马”的称号。





第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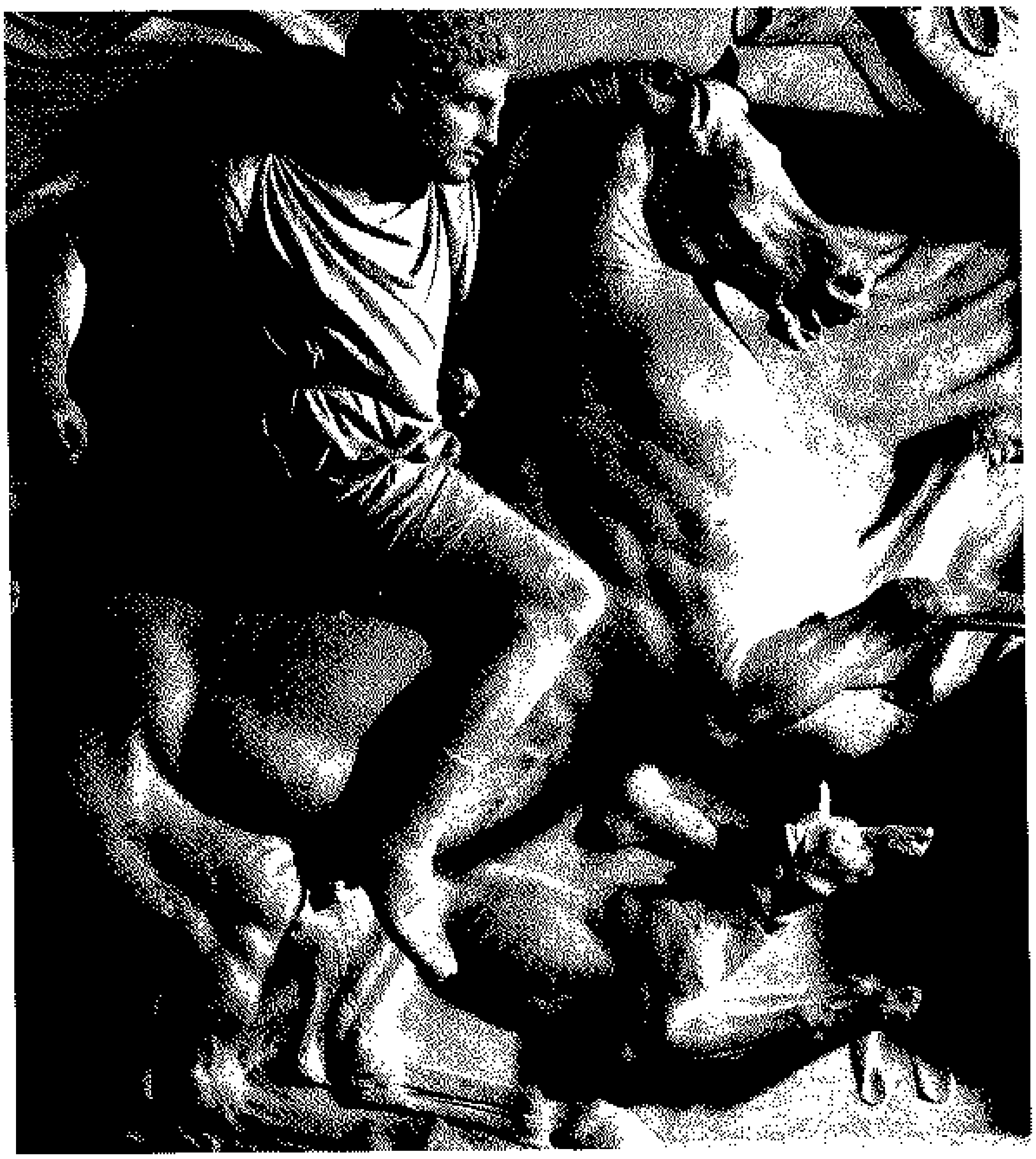
知识和帝国

吕贝卡·弗莱明

知识和帝国

正如近代欧洲各帝国的历史学家们所言，殖民扩张是同知识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知识有助于征服，征服反过来也能产生知识；知识随着土地和人民一起被征服者获取，并在获得和确立统治的过程中产生。与其他新的领域一样，知识也需要加以规范和组织，纳入到帝国统治和生产管理的更广泛的体系当中——尽管这些举动可能会遇到抵抗与逃避。

例如，在18世纪和19世纪，诸如植物学、动物学、人种学和地理学这样的学科，随着欧洲各个帝国对这些学科的需要和支持都同时获得了巨大的扩展。帝国不仅有赖于这些学科所提供的信息（它们有利于征服、殖民和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而且有赖于它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有赖于它们通过把帝国扩张与知识扩张联系在一起而对其扩张行为提供合法性。在古典世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从小亚和埃及延伸到了兴都库什山，这也引起了一次知识的扩张——关于世界、它的国家、民族、植物、动物和矿物；关于人体、疾病和治疗；关于宇宙本身的结构以及更世俗的机械学——引起了使知识系统化的各种活动。希腊化时代，在其多种知识的发展中，制定了有关各种知识的纲要和标准，几种被认同的知识体系得到了巩固。而且，这些发展中很多都是由继承亚历山大统治的王朝推动和促进的。最具雄心和慷慨的资助者是早期托勒密王朝，因为他们努力要使亚历山大里亚成为当时更大的希腊世界的文化新首都，而不仅仅是埃及帝国的首都。但是，所有的希腊化国王都在他们的宫廷中至少网罗了一些有知识和创造力的人们，因为这种庇护关系也是他们权力的内在组成部分。



亚历山大大帝的大理石浮雕。罗马人把自己看做是这位扩张者、英雄般的希腊国王的文化继承人，罗马人的思想征服了各个学科部门，然后把它们汇总成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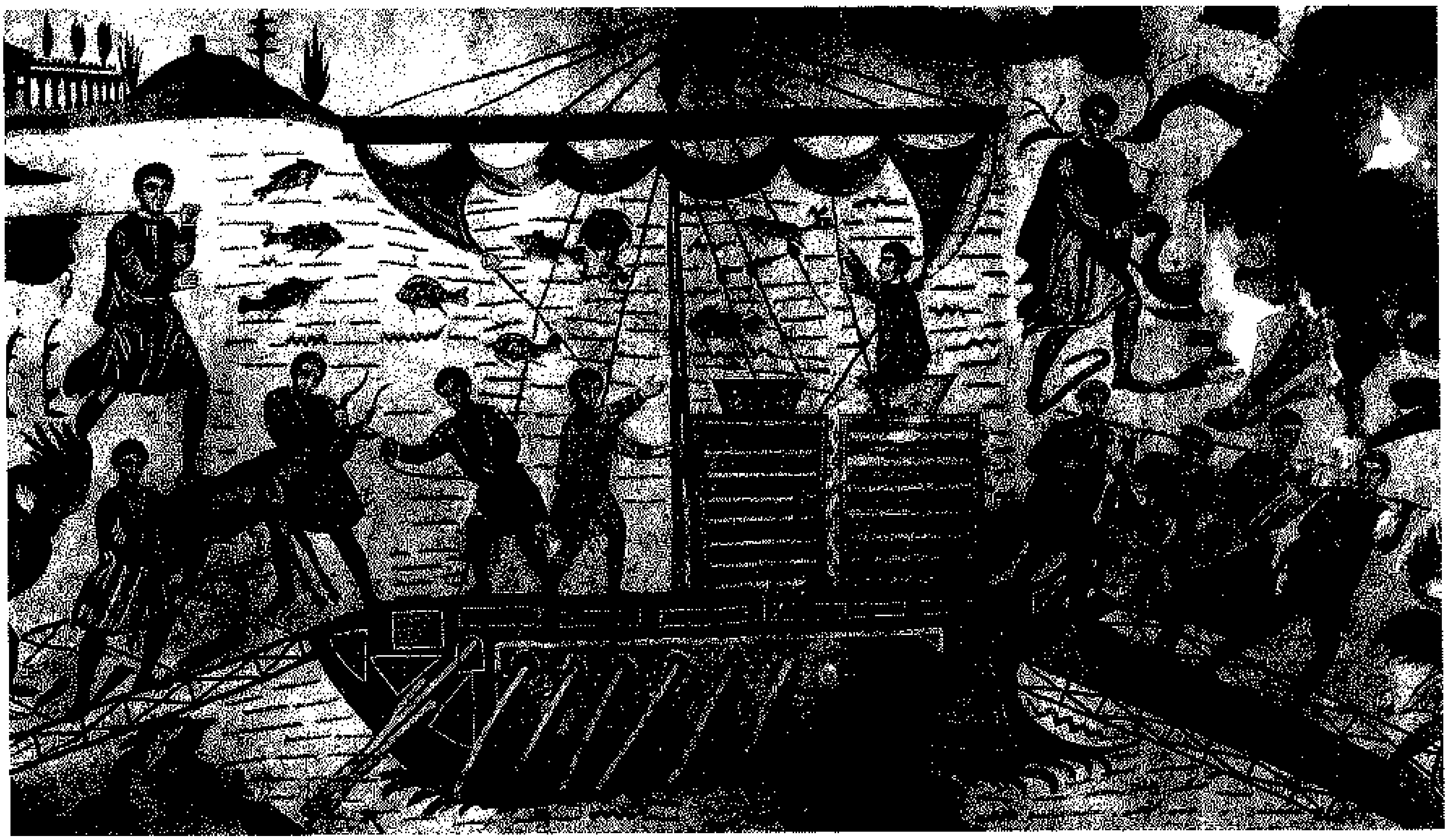
罗马帝国也不例外，采用了这种扩展帝国知识的做法，但它是一个特例，这主要是因为罗马帝国建立的特定目标、方法和条件同它对被征服者文化所持的相当不同的态度结合在一起，使之与他们的希腊前辈或以后的欧洲继承者之间存在不同的特征，尤其是本书前几章所勾画出的希腊和罗马之间长期、复杂的关系在这里也发挥了作用。这是因为当罗马人在军事上不断推进、跨过希腊化世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征服者的文化已经成为古代地中海的主流文化，他们开辟了罗马文化传统所无法比拟的知识前景。但是，罗马仍然征服了希腊人，不仅清晰地证明了他们在军事方面对失败者的优越性，而且也证明了与罗马军事力量息息相关的道德和宗教

方面的优越性。问题是罗马政权如何在如此发达的文化地区维持自己的统治并与政治统治一起建立一个罗马的知识帝国。

庞培和米特拉达第

罗马政权和希腊文化相遇的特殊条件，可以从罗马与他的强敌本都国王米特拉达第六世优帕特，(Mithridates VI Eupator, King of Pontus)①的战争结束时的一个事件看出来。这次战争在罗马对东方的军事征服以及罗马与东方文化关系的发展中，都是一次重要的战争。米特拉达第是一位国王，他模仿亚历山大大帝和王朝继承人的做法，处心积虑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位文化的支持者。杰出植物学家克拉图斯（Crateuas）就是与他的宫廷有联系的学者之一。国王自己对科学研究表现出了直接的兴趣：他在制毒和解毒领域颇具盛名，在许多相关领域也是如此。米特拉达第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军事征服者，他从自己广袤的王国各地收集资料和实物，把它们有条不紊地集中在自己身边，如同对待他的其他领地一样。就像伟大的罗马将军庞培在公元前63年最后打败他之后所发现的那样，有关植物的医学特性的论文和毒物学的论文，同所论问题的植物标本以及其他各种具有自然史趣味的物品一起，可能也包括整个动物学的东西，都属于罗马缴获的大量王家战利品之列。

同其他罗马人一样，庞培也认为亚历山大作为英勇的征服者和帝国建立者是一个颇具魅力的模仿对象。



一块罗马晚期马赛克镶嵌画地板的局部，出自西西里的村庄。图案描绘捕获新奇的野生动物的情景（左边是一只阿拉伯大羚羊）。虽然画中动物被用于娱乐而非科学启蒙，但鸵鸟、老虎、大象和其他稀有动物经常出现在罗马，毕竟增加了罗马人对百科全书式的世界知识的认识。

① 本都王国位于小亚细亚，其国王米特拉达第六世的姓为优帕特，据说此姓来自当地的一种泽兰属植物"eupatorium"，米特拉达第六世首先利用这一植物治病。——译注

他像亚历山大一样，在他的东方战役中有希腊朋友（及被释奴）陪伴，他们不仅记录他的军事成就，也记录下来他所穿越的领土及其人民、动植物群的情况。因此，他认识到了他的敌人的科学活动的价值和重要性，这一点丝毫不亚于罗马的成功和统治。因此，他对这些发现表现出了尊重和肯定。虽然米特拉达第的成就得到了承认，但是他的荣誉却被剥夺了，打上了罗马（及庞培）权力的印记。庞培命令他的被释奴列内乌斯（Lenaeus）将医学论文翻译成拉丁文，他还在收集到的物品中整理出许多更具价值、引人瞩目的样品，把它们运往罗马。其中一些（比如一种非常昂贵的乌木树）用于他的凯旋式，一些（比较新奇的动物）丧命于竞技场，米特拉达第收藏的宝石存放在卡皮托林山。知识同王国、它的自然资源和数量众多的人口一起被俘获了。现在，所有这一切——由于庞培——都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罗马统治在所有这些方面的扩展，通过希腊医学和植物学文本的获得以及凯旋式、比赛和神庙中的公开展示品，得到了多方面的证实。

至米特拉达第战争结束时，罗马人获得的希腊知识大大增加了。这种知识在诸如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Marcus Licinius Lucullus）这样的显贵的图书馆中，以书本形式得到了积累。而以个人形式出现的希腊学者和教师——奴隶，被释放的自由人——现在把帝国的首都当成了自己的家园，这种人数量很多，还有更多物质形式的战利品。希腊知识和罗马政权间的遭遇由此对于双方都得到了加强。罗马人试图掌握这个新的知识领域，使之更具系统性；希腊人则对重新绘制希腊世界的政治地图做出回应。

罗马百科全书的诞生

首次尝试掌握全部希腊文化传统并进行罗马式改造的是马尔库斯·泰伦提乌斯·瓦罗，他是共和末期拉丁文化生活中的主要人物。瓦罗是一个既追求成功的政治、军事生涯又追求文化生活的人，他在很多方面扩大了拉丁文学的范围，几乎为罗马生活、习俗和历史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文学解释。他的努力起初得到了庞培的支持，之后又得到尤里乌斯·恺撒的热情襄助。在他的大部分事业中，他将希腊方法——有关的定义和结构、研究和导论——应用到罗马的材料之上，就像老加图在前一个世纪所做的那样（尽管他有反希腊的言辞）。事实上，在写作《论农业》（On Agriculthre）这篇文章时以及在他的某些历史写作当中，瓦罗都直接追随着加图的脚步，但是他走得更远，在许多方面扩展了先前的拉丁模式，他的文学范围随同罗马帝国的边界在一起延伸。

写于公元前30年代的九卷本《学科论》（*Disciplinae*）是瓦罗的一部重要作品。书中不仅包括知识的扩展，而且涉及知识的集中和整理。不幸的是现在该书已经失传，但我们发现在幸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地方都提到这部著作，这种努力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也有可能重构该书的全部形式和结构，同时至少复原部分内容。《学科论》目标在于涵盖罗马的绅士们应该掌握的各门学科或技艺（但不是在专业的意义上，因为对许多罗马贵族来说，以任何一种技艺谋生当然都是降低身份的做法）——也就是说，公认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但是，这些成就不仅证明了适合于处在上升中的帝国统治阶级的文化形式的高度，而且也证明在成为一个罗马贵族的一般事务中是有益的。在这方面，瓦罗认为重要的学科是语法、修辞和辩术（也就是说，大致是对语言、劝说和辩论的理解）、几何学、算术、天文和音乐理论（主题是数学），还有医学和建筑学。前七门课程构成希腊的基础教育，更专业或更先进的教育由此才可能产生。医学和建筑学通常被纳入更专业的门类（最具特点的高级课程是哲学，瓦罗主要把它留给了西塞罗）。

瓦罗采用了希腊人的学科定义和组织方法，但是他对论题的选择以及把它们一股脑儿都纳入单独一本百科全书内的做法却是很独特的，罗马以及希腊的资料和传统为他提供了素材。事实上，如果他的现存的论文《论农业》是可供参照的标准的话，那么他涉猎的范围要宽泛得多，因为他认为迦太基人马哥的著作是有关这个论题的最权威作品。马哥的著作最初用本地布匿语写成，但有所删减，并改成了希腊语（马哥的著作也已译成拉丁文）。当时出现了对实用知识的收集活动，不论起源于何处，都利用希腊的方式和罗马的判断。如同在帝国本身一样，这是一种强迫接受的统一秩序。

百科全书的时代

瓦罗的百科全书式的继承人——塞尔苏斯（Celsus）和老普林尼——以不同的方法将他的文学知识工程向前推进了一步。两人都在1世纪写作，也就是在共和晚期奥古斯都解决了政治冲突和一个新的帝国殖民地建立起来之后；二者与瓦罗有相似的社会背景，都是出身贵族的业余爱好者，而不是专业作家，二者都以一种非常广泛的方式将罗马的价值观加在了希腊（和罗马）文化之上。在无所不包的框架之内，他们的独特方法之间的差别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早期帝国时代，很多问题还悬而未决，处在变化当中，有关帝国与知识之间的最好关系的争论仍在继续。

奥鲁斯·科奈里乌斯·塞尔苏斯（Aulus Cornelius Celsus）在提比略皇帝统治期间从事写作，对瓦罗亦步亦趋。他的作品集《论技艺》（*Artes*）可以肯定包括医学、军事和农业事务，可能还涉及哲学和修辞学，很可能也有法学（但仅有关于医学技艺的八卷本保留了下来）。在这里，有关希腊基础教育的内容很少，更多地集中在具有实用价值的专门技艺上。但是，修辞学似乎是塞尔苏斯文化方案的主体，不仅因为它是罗马贵族的一种重要技能，正像演说对公共职业非常重要一样；而且因为它对任何文学表达都很重要。修辞学和辩术的规则支配着各种作品的形式和结构，即在技术或科学文本中，以及在文学性更强的文本中，应该如何组织材料和进行辩论的规则。

塞尔苏斯个人的修辞和辩论技能在幸存下来的他的《论技艺》中的确得到了证实。同他的写作技巧一样，他的拉丁风格很受推崇，他的说服力被证明是很强的。在《论医学》（*On Medicine*）的序言中，我们可以最明显地看到这些特点在起作用。他在这里把他的方法同他正在为罗马读者重新加工的基本希腊素材结合了起来。塞尔苏斯将自己看做是先进的希腊医学传统的继承人，这种传统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的著作，经由希腊化的亚历山大里亚，现在已经传到了罗马这个已知世界的文化首都、拥有堆积如山的战利品的帝国城市。借助征服而来的继承过程和罗马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使塞尔苏斯相对于这种悠久的、复杂和冲突的传统而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他将自己作为一个客观的仲裁人，站在冲突的希腊医学潮流之上，超越它的派别分歧和长期的争论，他能够在它们中间找到一条明智的中间路线，从中挑出最好的，再根据明晰和实用的原则来组织它。

在这里他运用了罗马的力量、判断和常识，如同罗马人在实践中的做法一样。塞尔苏斯对于人体如何运行与保持健康、疾病如何产生和治愈的理论解释（大致以希波克拉底的学说为基础的一种理解）基本上是含蓄的，因为他更多地集中在具体的医学问题上。在谈到健康在有关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饮食、性、锻炼、休息和沐浴——如何体现之后，为了保持和改善它们的条件（也就是说，为了健康所采用的养生法），他直接转到了疾病及其治疗，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养生、药物学和外科手术这三种治疗方法。从他倡导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读者所属的社会阶层："健康的人，应该过一种多变的生活，有时在乡村，有时在城市，但主要是在他的庄园里。他应该乘船旅行，打猎，并不时地休息一下。"对大多数罗马人而言，这类建议是毫无意义的。

罗马人对知识的应用

盖乌斯·普林尼·塞肯都斯（老普林尼）大约五十年后从事写作，他对百科全书方案采用了相当不同的方法。他把罗马人对希腊观念（把知识分为不同的学科或技艺）加以改造的做法进一步发展，把那些曾经被分别对待的科目合并为一个整然一体的著作，表达一个统一的主题——"自然，那就是生活"。对普林尼来说，技艺本身是人为的、相异的艺术——它对于真实地理解世界，对于那种直接和实际理解罗马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造成了一种障碍，如果罗马不想耽于奢侈，丧失它的伟大，就必须返回到这种理解。但是这种返回必须考虑到罗马已经扩大的疆界，考虑到罗马世界已经比从前更广大、更复杂这一事实。希腊的学问，或确切地说是更为广义的非罗马的学问，本身并不差（虽然此说确实要经过仔细审查），但是需要把它从希腊人手里、从专家的手里拿过来——普林尼对专家常常抱有敌意。这种学问必须成为所有能利用它的人的财产，其中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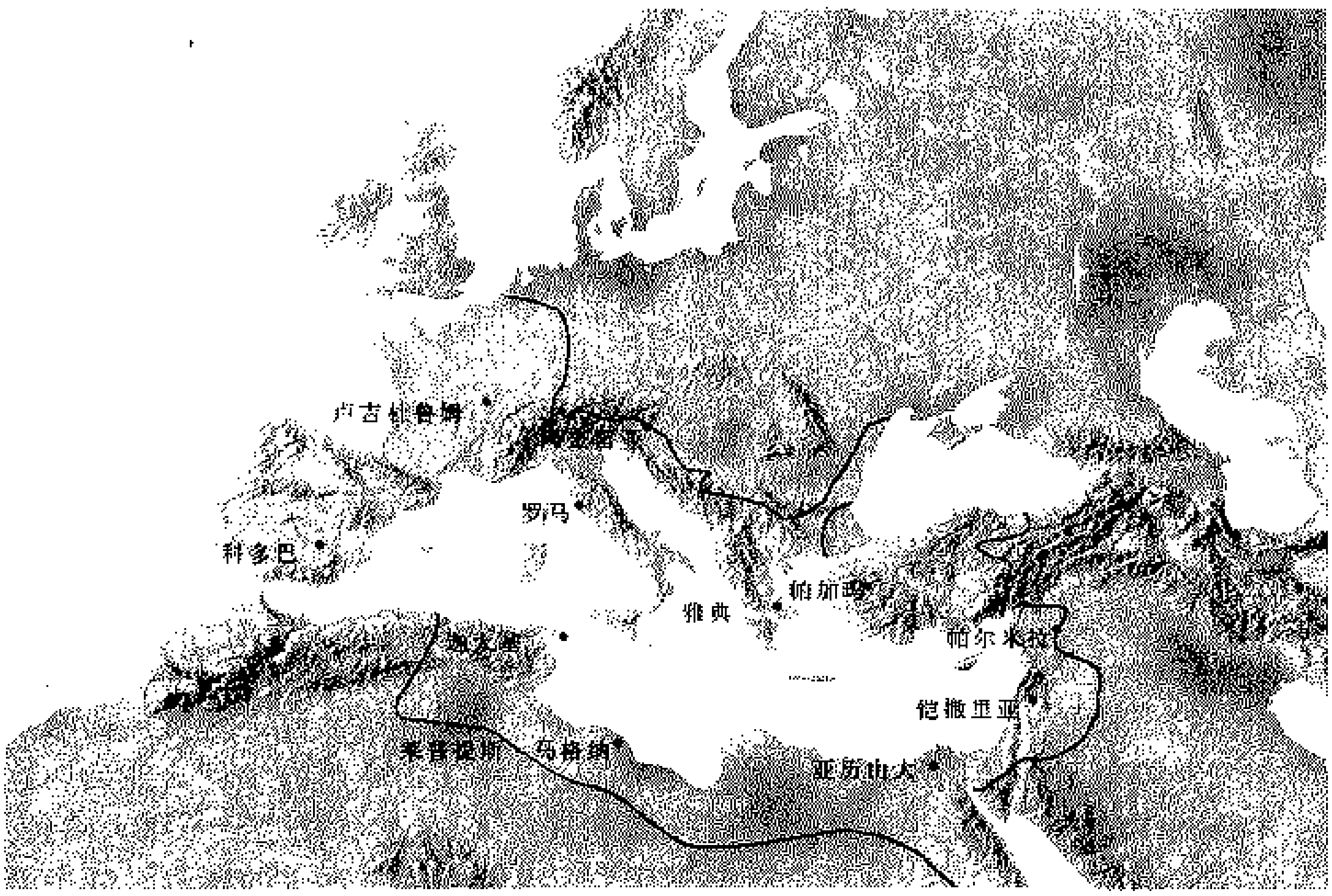
出自意大利的一块希腊石雕，画面上一名医生正在为病人做检查。尽管拉丁文化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杰出地位，但在1至2世纪期间，罗马帝国的大部分知识基础（例如医学或工程学等学科）还掌握在希腊专家的手里。一些罗马人将知识的拉丁化看做国家的主要任务。

主要的是罗马的统治阶级，他们必须统治这个世界。这就是普林尼试图做的事情——收集全部有用的知识，对它们进行彻底重组，使之尽可能直接地为罗马政权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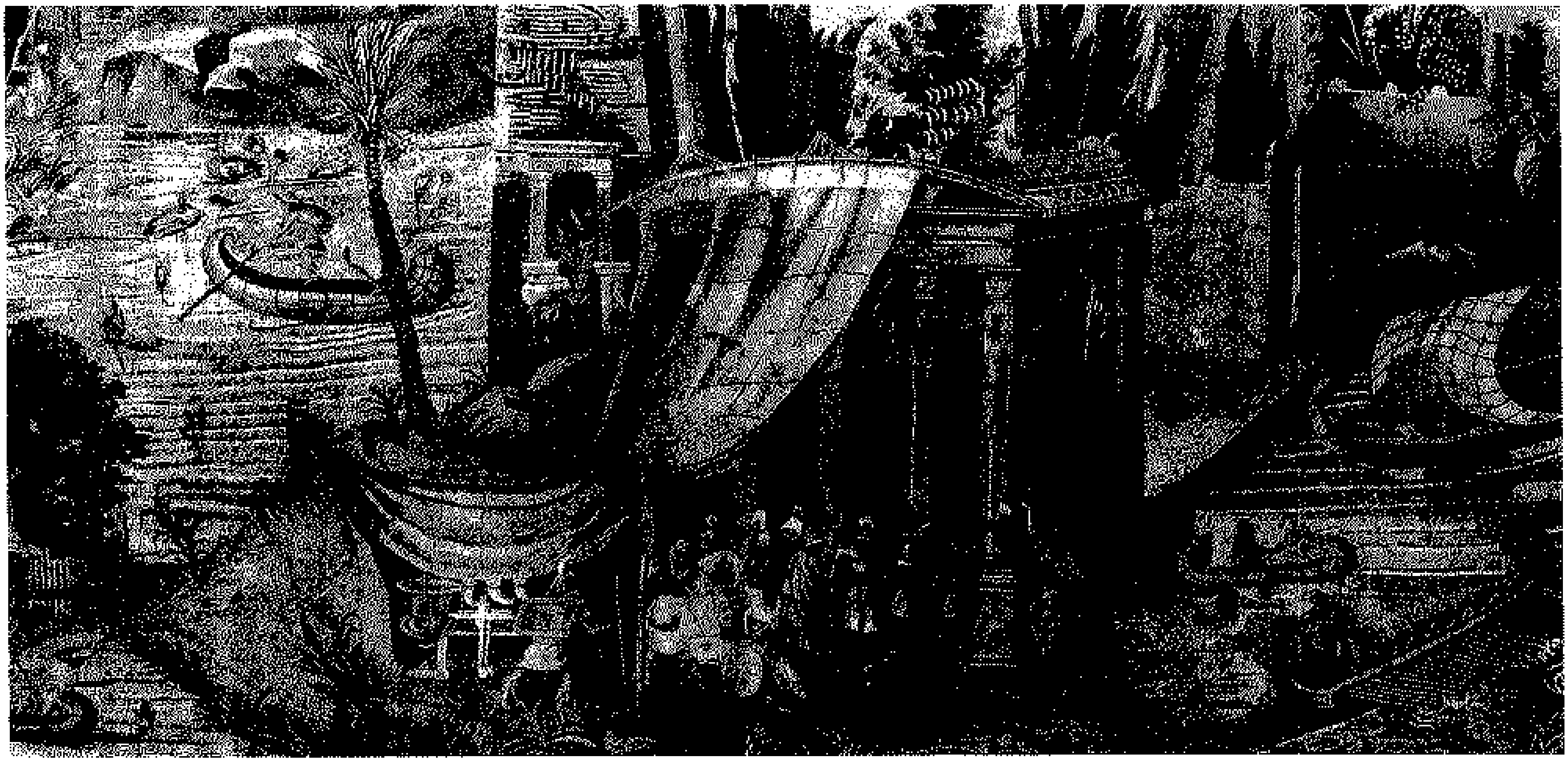
在献给帝国继承人提图斯的书信之后，以及用了一卷篇幅不仅列出下面36卷内容而且还有普林尼引用的每个作者和著作的名录之后（这些最明显地揭示出他对希腊文化的依赖），普林尼开始了《自然史》一书的总体叙述。他试图完整地描述事物的本质——包括地上事物和天上事物的本质。他从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出发，首先讨论地理部分，然后转向对世界上的民族、动物、植物和矿物的描述。

地理学显然是关于帝国的地理，大致按照行省的顺序展开。它利用了直接来自帝国军事和管理活动的信息，还有很多学术资料。普林尼经常引用奥古斯都的得力助手阿格里帕的作品，他似乎已经着手搜集和整理了由从遥远的地方返回的罗马将军和总督的报告提供的罗马广阔的领土的各种数据和描述，以及其他旅行者的记述，以便（至少部分地）给当时的大部分罗马世界创造一种视觉体现，展示给罗马人。他有时也直接引自这些报告——例如，来自埃里乌斯·加鲁斯（Aelins Gallus）有关他的阿拉伯远征的报告——也有各种负责情报搜集的使节的报告，例如从埃及向南探险尼罗河的近卫军侦察队，那时尼禄皇帝正打算入侵埃塞俄比亚。

普林尼更广泛地整理对有关自然界的信息，主要依据它们与人类的关系以及对人类的实用性。比如，大约十卷都用于描述源于植物、动物和某些矿物的医学内容，同时对食物性庄稼的种植与用于花环的适于生长的花、雕刻中金属的使用也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这也揭示了普林尼隐晦的帝国情结，因



阿格里帕调查的帝国已经包括几百座由铺筑的成千上万里的道路连接的城市，但还没有完全囊括地中海。奥古斯都的继承人完成了这项任务，对日耳曼边界做了小的调整，加入了不列颠和达西亚（现代罗马尼亚），将帝国边界扩展到了里海和波斯湾。这些最东部的领土后来被哈德良抛弃，他认为它们无法防御。



巴勒斯特里纳（Palestrina）的马赛克画局部，展示尼罗河泛滥的情景。该马赛克画发现于罗马附近，它的图案形式表现出到公元前1世纪初罗马人掌握的外国知识的水平。对埃及生活的细节，例如纸莎草编结的小船，都描绘得非常准确。

为当罗马人确定了它们对世界的道德和政治统治时，这些都是罗马应该善加利用的资源——比如，在更多利用自然提供的简单的治疗方法，尽量减少黄金的奢侈浪费的意义上。事实上，普林尼宣称，在无比伟大的罗马和平中，罗马统治的重要利益之一是它使具有医疗价值的植物能够自由地从帝国的一端到达另一端，所以大大有益于人类的幸福。他认为这使得自然的丰饶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斯特拉波的帝国地理

但是，罗马政权和希腊文化的碰撞并不完全是单方面的。就像他们的罗马征服者屈服于他们俘获的、但还没有完全为它们所有的学问一样，希腊学者也对新的政治现状实行了妥协。一般说来，希腊人对他们的变化的环境，特别是他们的罗马主人的反应不尽相同，就像罗马人对它们所征服的希腊化文化的反应千差万别一样。二者之间的互动当然也在许多不同的层面和各种不同的地点发生了。

帝国早期的一篇希腊论作与塞尔苏斯和普林尼的拉丁百科全书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这就是斯特拉波的《地理学》（*Geography*）。大概在米特拉达第失败的同时，斯特拉波出生在阿马西亚（Amasia，在现代土耳其）。这一事件对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有重要的影响。青年时代，斯特拉波到过罗马旅行。在他广泛的旅行过程中，他曾几次回到帝国的首都。他不仅写了《地理学》，而且写了《历史》，现在已失传；二者都是部头很大、涉及面很广的作品，但都围绕一个学科展开。对斯特拉波而言，地理学包括历史和神话知识的成分，也包括出自数学技艺和自然哲学，尤其是天文学和几何学的概念和技能。虽然他主要依赖他的希腊化前辈的理论地理学——像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和波西冬尼（Posidonius）的地理学（他们和罗马也有重要联系），但他自己对这个领域的贡献更具描述性和政治性。从西方的西班牙到东方的亚述，从北部的不列颠到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他提供了有关这些地区的详细描述，不仅包括对河流、山脉和其他自然物的确切信息，而且也有关于城市和人口、它们的历史和政治的材料。

作为一名介于罗马政权和希腊学识二者之间的作者，这种政治主题是斯特拉波自我定位的一部分。他赞

赞罗马的军事、政治成就，特别是奥古斯古的成就，《地理学》有很多内容就是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写成的。他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世界曾经享受过如此美好的和平和繁荣。"因为，"人民和城市都被统一于一个政权，处于一种政治管理之下。"他的著作被认为对统治者和将军有用，拓宽了人们的全部知识和理解。他认为他的作品对罗马统治者的用处在于他们当时的地理知识贫乏，这种缺乏不仅明显表现在有关这个主题的罗马作品本质上非常肤浅，而且对与帕提亚人、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的冲突也产生了不利的现实影响。斯特拉波指出，罗马的文化还没有跟上军事成功的步伐。由于在西方和东方的征服，学术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宽了——但这些机会还没有为罗马人认真或严格地加以利用。他试图将现存的希腊知识扩展到罗马帝国的疆界，甚至超越这一疆界，把希腊的地理方法应用于罗马军事力量开拓的空间。

因此，斯特拉波致力于将希腊知识服务于罗马政权的目标，而且他也试图使罗马政权为希腊知识服务。这就是他的特殊地位所在。对他而言，他自己在希腊地理学和人种学的学术传统中的地位，至少与他在罗马统治中找到一席之地同样重要。这两个目标相辅相成，因为正是罗马为他提供了超越他的希腊前辈，因而在古代科学探索的竞争性领域获得成功的手段，就像他的希腊知识的形式为罗马提供了巩固帝国的手段一样。

斯特拉波的社会地位是他与瓦罗、塞尔苏斯和普林尼的相似点。他也来自社会贵族，尽管是被征服的希腊城市的贵族。他之所以热爱旅行，并非因为他是一名专业的地理学学者，而是因为整个帝国的政治事务吸引了他。在这本书的前几章我们已经看到，罗马帝国统治的力量之一就是能够吸纳当地贵族，不仅让他们参与行省统治的实践，而且参与更广泛的、更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帝国建立过程。斯特拉波描述了这些过程的各个层面——希腊与罗马之间不断展开宗主协商的各个方面。

在帝国西部，还有一些与斯特拉波相对应的人物。罗马世界流传下来了一部用拉丁语写成的最广泛系统的《论农业》一书，它的作者是罗马公民鲁基乌斯·朱尼乌斯·科路美拉（Lucius Junius Columella）。事实上，他属于骑士等级，但出生在西班牙的加德斯（现代卡迪兹）。在公元50年左右最终定居意大利、经营他的庄园和从事文学创作以前，他可能作为一名军事保民官随军队一起在东方服役。显而易见他对东西方的农业条件有所了解。他的著作建立在两个主要前辈的作品之上——加图的《论农业》和瓦罗的《论农业》——但与科路美拉的时代相适应，他以结构清晰的方式对它们进行了扩展和延伸。他利用了帝国的全部资源和所有能够给以支持的人。

斯特拉波对亚美尼亚的部分描述

亚美尼亚也有一些很大的湖泊，一个是曼提尼湖（Mantiane），它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蓝色"。它是仅次于美奥提斯湖（Lake Maeotis）的最大的咸水湖，据他们说，它一直延伸至阿图帕提亚，其周围还有一些盐场。另一个是阿塞内湖（Arsene），也叫托皮提斯（Thopitis），它含有苏打，可以清洗和恢复织物，但由于含有这种成分，它的湖水不适宜饮用。底格里斯河（Tigris）从尼法提斯附近的山村流出后，流经这个湖，由于流速很快，所以它的水流与湖水没有混合。底格里斯这个名字所由何来呢？是因为米底语的"箭镞"一词是"底格里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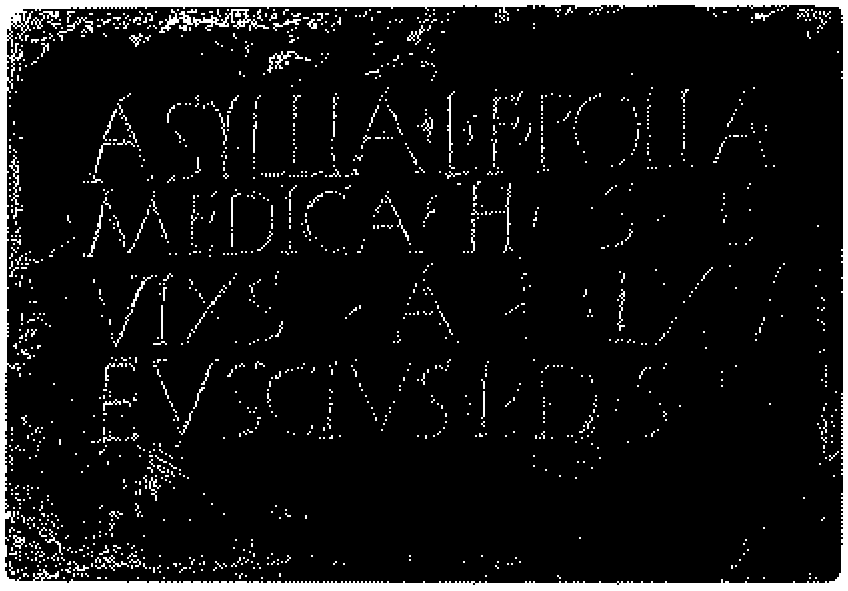
斯特拉波《地理学》5. 12（Horalce Jones翻译）

专家们

各个不同学科视野的扩展并非只属于社会的贵族精英，专业人士也可能怀有成为权威的渴求。虽然瓦罗和塞尔苏斯的写作有一代人的间隔，但两人的著作却在某些方面改善了建筑、医疗之类活动在罗马世界的地位。这类活动作为受到承认的"手工技艺"（artes）而充分合法化，也就是说，这种合法包括书本知识也包括实用技能。一些专家为了自身职业的利益以及出于技艺本身的考虑，试图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以便拓展文化空间，因而也开放文化空间，并使罗马的力量总的说来得到加强。这里有必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部门在罗马世界中的竞争性质，这是古典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也具有的一种特征。但由于古代的专业不固定、非正规的运作方式，而致使这一特征有些复杂罢了。

目前，对从事医生、建筑师或工程师职业的必要资格已有明确规定，并由负责保持培训与实践标准的相

关专业机构和政府部门予以认真监管，但在罗马世界，这类行业并没有正式的资格认证，没有考试，没有机构把关，没有法律要求。确实也存在一些文化上的期待，比如关于医生应该如何表现他（或她）自己、关于应该显示一下学养和技能等等，但是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医生，基本上取决于相信你的医术的人员数量以及他们的素质。富人和体面的人不仅会提供最好的报酬，而且还会极力向他们的朋友推荐，因此在一个很多人都在尝试同一件事情的环境里，医学权威不等于诊所墙上框起来的执照，而必须和支付酬金的病人一起积极地去创造，依靠个人努力来获得。在被现代历史学家称为“医疗市场”的环境里，所有从业人员都以同样的方式吸引回头客。



一位名叫阿西丽娅·波拉（Asyllia Polla）的女医生的拉丁葬礼铭文，出自北非的迦太基。这是众多出自罗马帝国的铭文之一。医疗专业形式的变化最终迫使妇女离开了这一行业，以至她们在此之后不得不为重新进入这一行业而努力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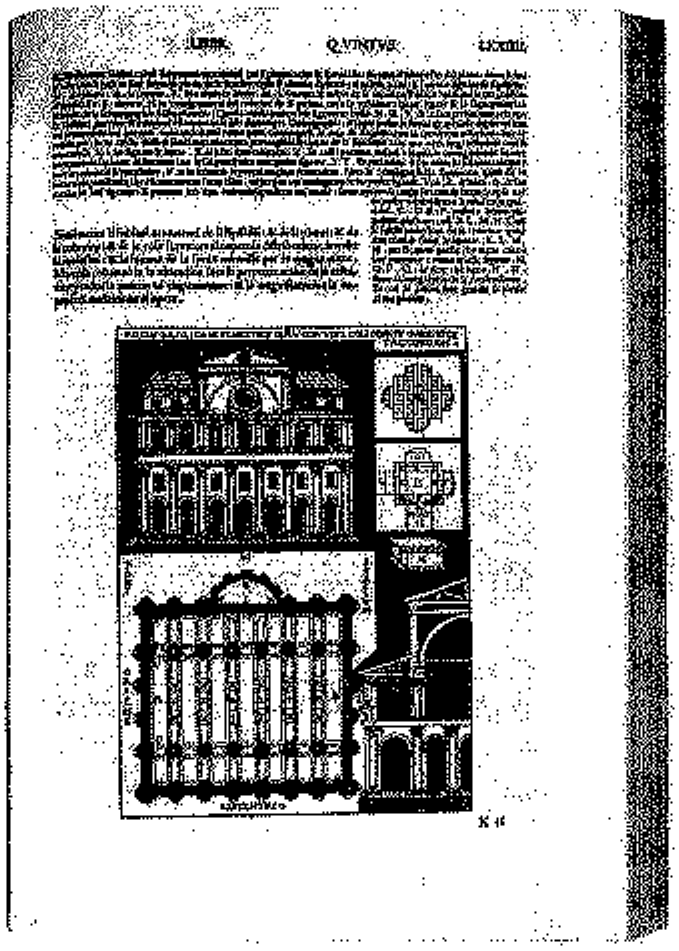
维特鲁维乌斯与建筑师

其他依赖其专长谋生的人，比如说建筑师，情况也一样。在这方面，在帝国早期更为广泛的文化背景下（事实上是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建筑业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维特鲁维乌斯，他的著作便应放到这样的背景下来考查。马尔库斯·维特鲁维乌斯·波里奥似乎在尤里乌斯·恺撒的军队技术部就已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充任“fabri”，或称军事工程师。这些专业人员负责投射武器（像石弩）和运输车辆之类的制作和维修，也负责诸如桥梁和一些防御工事等建筑物的修建。之后他转向民用工程，显然在奥古斯都手下担任某种有薪水的职务。他的十卷本《论建筑》（*On Architecture*）一书就是呈献给奥古斯都的，他是罗马史上规模最大的建筑计划的发起人。

在《论建筑》中，维特鲁维乌斯对建筑学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要求（当然还有他自己在其中的地位）。他的主要观点是建筑技术不仅要求手艺，也需要广泛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来自较斯特拉波为地理学所要求的还要广泛的学科范围。根据维特鲁维乌斯的观点，除了更为实用的技能，修辞学、数学技能（算术、几何、天文学、光学和音乐）、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医学和法律都是建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用说，这种知识的大部分理论基础是希腊的，但维特鲁维乌斯所应用的材料，在文化上看却是很不同的，特别是当他在处理建筑类型的时候。比如，在他关于神庙建筑的讨论中，他利用了罗马的例子——大竞技场旁的塞瑞斯庙和卡皮托林庙本身，当然也有取自希腊世界的例子。他



一座刻画着罗马药铺的高浮雕。药材和稀奇古怪的药剂（成分越奇怪越好）在罗马世界很常见。对医学疾病和其他不适（如在爱情上的不幸）的治疗几乎没有什么分别。药铺前方的妇女可以看做是一名聪明的村妇在城市中的形象。



维特鲁维乌斯《论建筑》的一个早期印刷版本中的一页。内容是拉丁原文，插图虽然是出版者加上去的，但使人对罗马建筑工程中所采用的技术产生深刻的印象。图中建筑包括罗马的两项主要创新——拱门和圆顶。

的其他公共建筑包括典型的罗马广场和会堂，与更具希腊风格的剧场和浴场并列。在家内建筑方面，与希腊差别很大的罗马住宅类型也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在该书的最后三卷，他的工程背景就更多地显现出来了。这三卷讨论了一系列与建筑有关的事物，从供水到诸如升降机、起重机等机械装置的建造（也有围城器械）。他也谈到了日晷和水时计这两种古代测量时间的主要工具。

维特鲁维乌斯在事业上的拓展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建筑学利用各种相邻学科的内容，所以获得了新的知识范围并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建筑学成了一门艺术，不论从观念上还是实质上它所包含的内容都比从前更为丰富、更具有力量。而且，它的发展与罗马自身作为帝国政权和帝国首都的发展相适应。维特鲁维乌斯直接提及奥古斯都的建筑计划，这是一个要使罗马城提升至地中海大都会标准的计划。

盖伦（Galen）和医生

但是，对于这种知识大规模拓展的真正体现者是帕加玛的盖伦，他是医生而不是建筑师。盖伦是希腊东部生人，并非来自罗马或意大利。他父亲是一名建筑师，一生大部分时间呆在帝国首都，那是惟一能够实现他的抱负的地方。到129年盖伦出生时，希腊在帝国中的地位比前几十年更加明确，正在经历某种文化的复兴。

当然，在盖伦以前，希腊医学作品没有任何中断。一系列作品，比如狄奥斯科里德斯的（Dioscorides）《论医学材料》（*On Medical Materiais*，最有影响的有关医学草药的古典著作——也就是说，以单一的有效成分为基础的药物）及同样重要的索拉努斯（Soranus）的《妇科学》（*Gynaecology*），幸存到1世纪中叶至2世纪初。它们都打上了罗马帝国的印记。

狄奥斯科里德斯在其作品的前言中提到了他的“士兵生涯”，这个提法应视为他实际上是一名跟随罗马军团的军医或者是对一次花钱少、收获大的旅行的更为一般的提法，他确实从帝国地理的角度描述了植物。其中大部分是指东方（狄奥斯科里德斯出生在阿那泽布，可能在塔苏斯学习，这两个地方均在现代土耳其），但书中也出现了意大利、撒丁尼亚、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还有一些与罗马人进行贸易的更为陌生的地方，比如印度。同样，不论出现在很多手稿标题中的名字“皮达尼乌斯”（‘Pedanius’）是否应被看做狄奥斯科里德斯已经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暗示，他确实在罗马庇护关系网中进行着广泛的活动。他把他的著作献给阿雷乌斯（Areius）医生，这可能是他在塔苏斯的老师，但在阿雷乌



罗马图拉真柱的局部，显示军医正在治疗伤兵的情景。罗马军队曾经全部由公民构成，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医护工作在战场上的重要性：不仅挽救伤者的生命，而且为了保持那些还在战斗的士兵的士气。

斯之后就是执政官拉卡尼乌斯·贝苏斯（Laecanius Bassus），作品中显然也谈到了他。

索拉努斯虽然也来自小亚（以弗所城），但可以肯定，他的成功的医学生涯大部分是在罗马度过的。他的《妇科学》（幸存于帝国时期的惟一一部专论女性医疗的希腊医学作品）虽不能说是世界性的，但反应了它的大都市背景。而且，虽然该书大部分已经遗失（或者说仅有后来的拉丁译本保存了下来），但索拉努斯的写作功夫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从专业性的医学拓展到相邻的哲学和语言学领域。不过，盖伦则对这种发展给予了更多的推动。

盖伦在罗马同时追循着两条通往成功的道路，这清楚地表明罗马医学的竞争特点。他接受并成功地治愈了来自城市贵族的病人，例如退任执政官弗拉维·波苏斯（Flavius Boethus）的妻子。他也积极参与有关医学问题的各种公开讨论和论证，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讨论似乎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看来存在着定期召开的会议，他和该领域的竞争对手在会议中对从古代医生的作品中随意选出的段落进行讨论（用闭上眼睛、把尖笔插入纸卷的方法）。同样，应富人和对知识充满好奇心的人们的要求，也可能组织解剖演示，比如盖伦通过几天对猪和羊的解剖的讲解，证明了神经和肌肉都参与呼吸和发声的演示。这些多少带有即兴色彩的演说或者直接被记录下来，或采取更周密的方式，日后自然形成了文字形式。盖伦的荣誉和权威就是借助这些文本（以及文本背后的公共演示）和他的治疗实践确立起来的。

盖伦的名字终于传到了皇帝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的耳朵里，他成了皇室家族的御用医生。取得这个地位后，他可能脱离医生职业更具公众性的某些方面，利用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虽然人们劝他回到公众面前以维护他的杰作《论各部位的功用》，避免其声誉受到损毁）。这好像是他余生中关注的主要问题，他的

14世纪门弗雷德（Manfredus）的科学手稿《论草药与植物》（*De Herbis et Plantis*）中的一幅插图，描绘了希波克拉底（左）和盖伦（右）之间一次假想的对话。希腊哲学思想的持久影响，蕴含在公认的、前现代的西方医学创立者之间苏格拉底式的正式对话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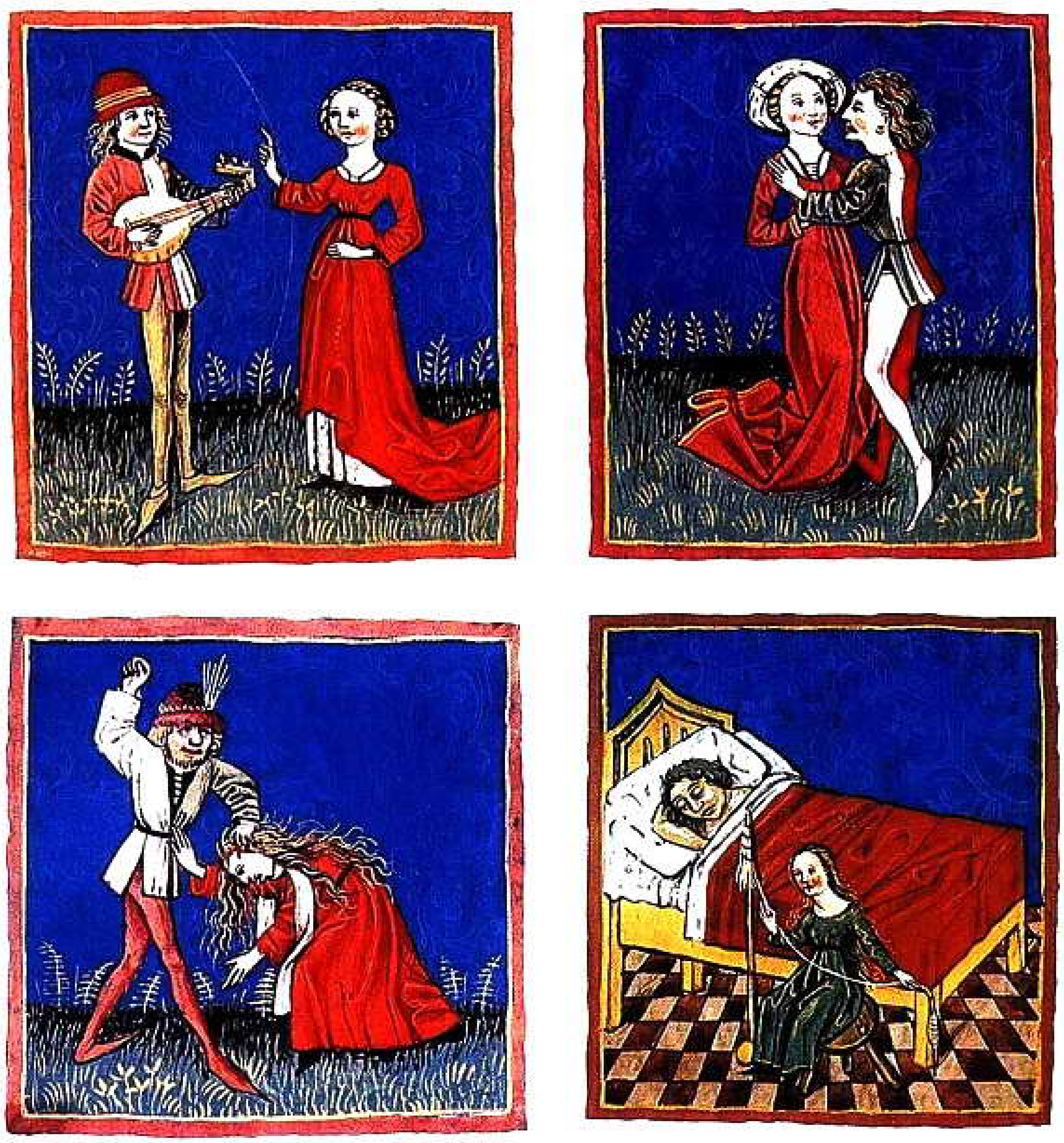
长寿使他能够为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服务，即使没能效力于塞维鲁的继承人麾下。

盖伦的大综合

我们仍然拥有关于他的庞大作品的证据。它们虽然远不完整，但仍然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占据非常显要的位置，在所有现存古代（非基督教的）希腊文献中占有大约10%的份额。其中不仅包括广泛的医学著作（一些显然是自传体的），而且还有哲学作品，不仅有一般性问题（有关逻辑方法或道德行为的问题）的讨论，还有更多的具体集中在特定学说上的题材，比如有关柏拉图的学说。他从前关于修辞和语言方面的更为广泛的作品也有残篇保留下来。所涉猎的范围反映盖伦的医学技艺观念，即囊括了每一种对其目标——有益人类健康的学说。因此医学对盖伦而言不仅包括有关身体运作方式所必需的知识——可能会出毛病但也能完全恢复其功能；而且也包括关于这种知识的所有理论基础和推论、正确的伦理构成和对技艺本身的正确信仰。他的一篇短文题为“优秀的医生也是一名哲学家”——但事实上，他相信优秀的医生远不止于此。

即使在他的医学核心部分，盖伦的计划也非常宏大。他想涵盖一切，完全掌握现存的医学传统。为达到这个目标，他建立了概念的螺旋上升模式，以希腊医学之父“神圣的希波克拉底”为支撑点。希波克拉底的作品代表医疗艺术写作的首次尝试，为他的后继者提供了可以追随和拓展的粗略路线图。盖伦自己的一些前辈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例如，他觉得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菲鲁斯（Herophilus）从事的人体系统解剖和活体解剖，增加了重要的解剖细节知识，可以与希波克拉底的生理学基本原则相提并论。另一方面，还有一位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解剖学家埃拉西斯特拉图（Erasistratus）犯了严重错误，他试图以他的研究为基础确立对于身体如何运行的新理解。盖伦宣称必须抛弃这些以及最近的错误，犯错误的人应受到适当的惩罚；同时要吸收有用的成果并发展这些成果（前者比后者要多）。当然，整个这一进程在盖伦这里达到了顶峰。他搜集了所有有用的成果，使它们成为一个超越任何先前的医学论作的统一整体。

然而盖伦的医学形象并不是焕然一新的，相反，他提供的是一种庞大的综合。希波克拉底关于健康是拥有适度体液的身体平衡状态，疾病是由不均衡的体液产生的不平衡状态，必须通过补充不足或消除过量来加以纠正等基本观点仍然重要。但是，盖伦通过自己的解剖实践的支持，成功地将这种观念与希腊化解剖研究的成果较先前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解剖并不是他著作所包含的惟一的后希波克拉底的发展。他的综合详尽系统，既注重细节，也关注大局。它的方法是正确的，理论是周密的，以劝导性的方式提出，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推进，但却不是创新性的。事实上，这种综合尝试在小范围内有一些帝国



一本中世纪书稿中的插图，以婚姻为背景描绘了四种基本的体液质——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和忧郁质。盖伦的形体人格一体观此后被笛卡儿和其他哲学家所提出的精神－肉体二元论替代了。

时期的前辈，它与当时的其他思想意识的发展相适应，比如哲学方面的“折衷主义”。

这种综合也发挥了效能。盖伦的雄心壮志得到了报偿。他的影响确实超过了所有先前的医学理论家，在4世纪60年代，他得到了皇帝朱利安（最后一个异教皇帝）的医生奥里巴西乌斯（Oribasius）的明确承认。朱利安建议奥里巴西乌斯将所有优秀医生的主要作品收集到一起，以便将所有对医学技艺有用的东西汇编起来。奥里巴西乌斯从盖伦已经完成的总结开始，认为盖伦是最出色的，超过所有其他作者。他的百科全书及其体现出的医学技艺观念因而都是围绕盖伦的框架构建起来的。广义地说，这是直到中世纪结束以后医学思想始终沿用的方法，至少在帝国的东半部如此（在拉丁化的西半部，保留了一些更为多样化的思想，比如，索拉努斯就更有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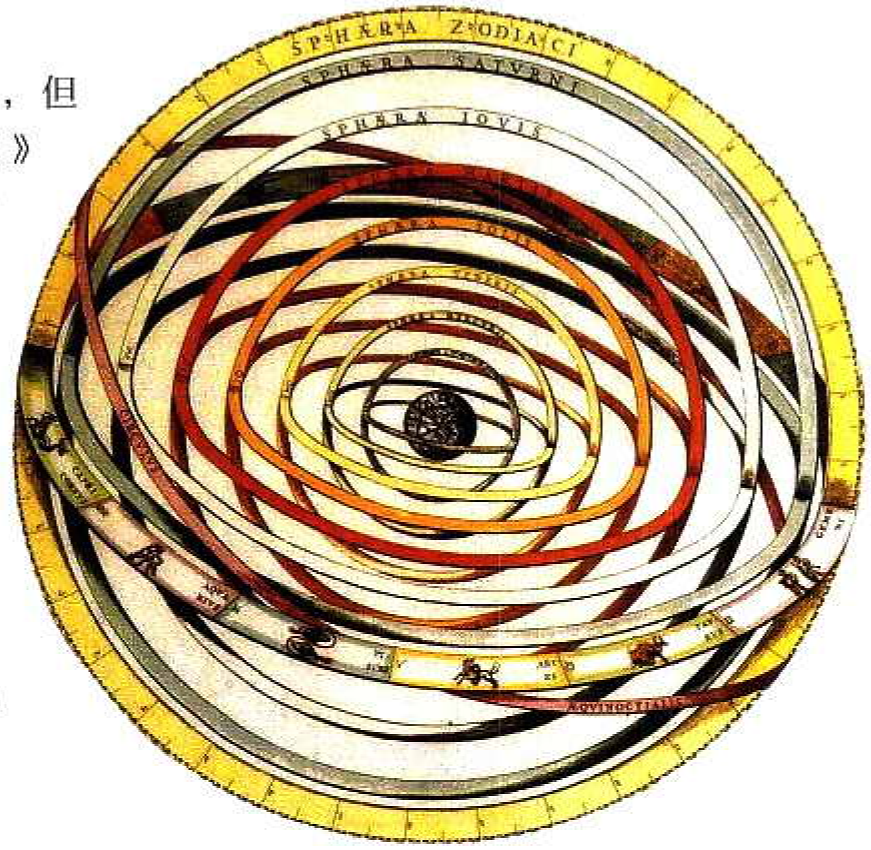
由于盖伦在古典医学传统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因此他的很多作品都保留了下来，语言范围从最初的希腊语到叙利亚语、阿拉伯语、西伯来语、拉丁语和亚美尼亚语。许多世纪以来，这些作品在不少地区一直被人们阅读、传授、讨论、注释、批评和修正、赞赏和模仿。在西方，盖伦主义——意即数代以来试图整合、编纂盖伦宏大松散的作品的医生和教师们，根据他的主要观点和学说建立起来的医学体系——只是到了19世纪，才完全为近代“科学”医学所取代。在世界的某些地方，盖伦仍然是权威，通常作为阿拉伯医学传统的组成部分——比如在肯尼亚海岸。

不论希腊化时期的人体解剖还是罗马的动物解剖，都没有动摇希波克拉底有关生理学的基本假设，这证明在古代世界，经验观察从属于理论的信仰。盖伦做解剖是为了证明一个既定的假说，他的发现是对假说加以解释。他并不像现在的科学家所做的那样，通过解剖获得的资料开始，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事实上，这一点被认为是近代科学与古代对世界进行调查研究之间的根本区别之一。观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被颠倒了。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世界虽然可以被确切地描述为“实验”之类活动的地点，但这些做法却从来没有被系统化为一种实验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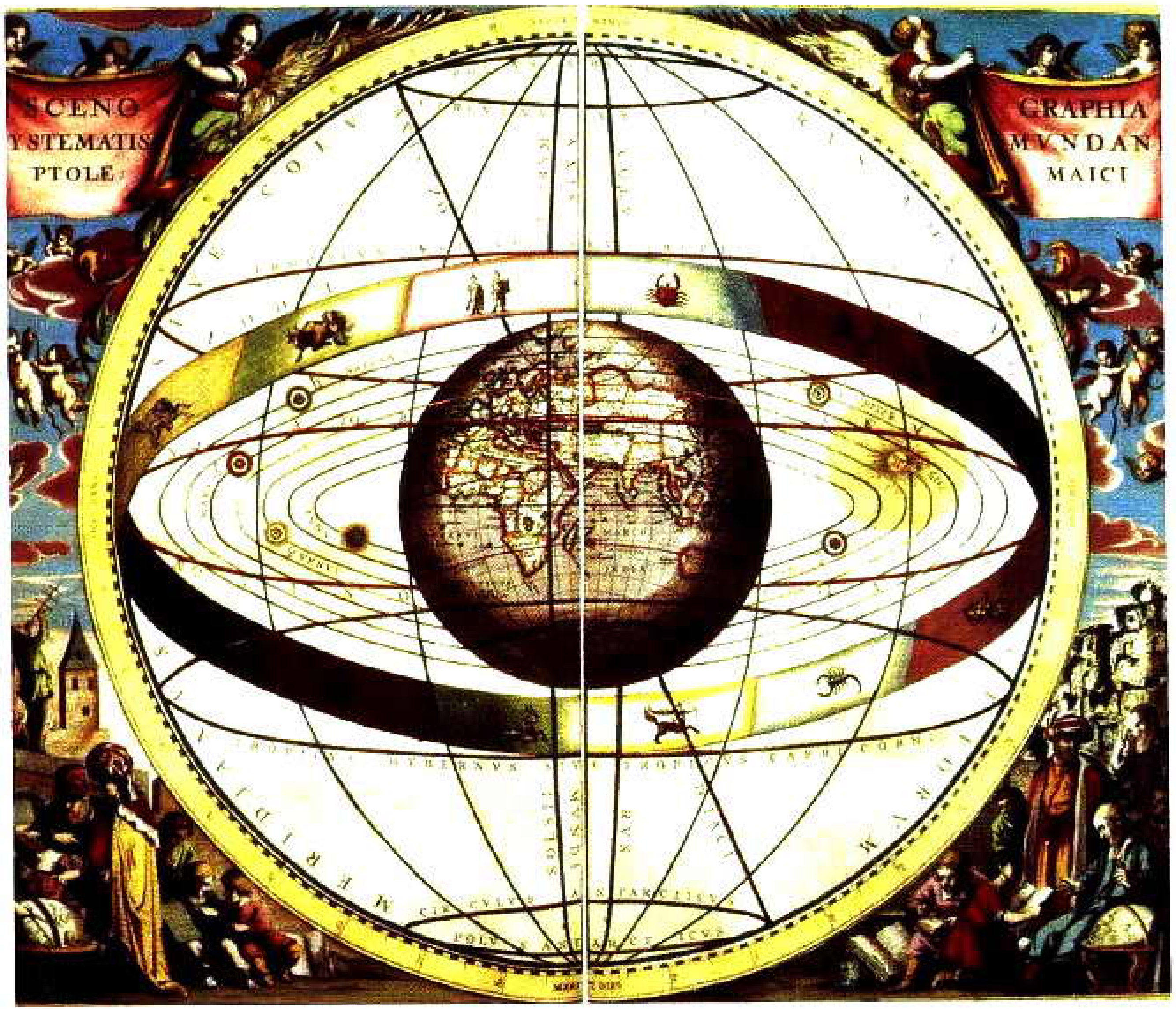
托勒密

希腊数学家（在这个词所包含的古代意义上）托勒密大概更直白地说明了这种观点，他是罗马帝国惟一能够在自身成就和他留下的遗产方面对盖伦的科学统治地位发起严峻挑战的人。托勒密比盖伦早生了几十年，但是我们对他的生平经历所知甚少。不过他最有可能终生都待在埃及——确实没有与其同代的证据证明他曾在除亚历山大里亚以外的任何地方生活过，因此他从未到过帝国的首都罗马，虽然他无疑在罗马帝国境内有过比较广泛的生活经历，但有一种难以否定的看法，即亚历山大里亚是他的世界中心。

幸存下来的他的论文涵盖了古代数学领域的大部分内容，但核心部分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他称之为《数学集成》（*Mathematical Compilation*）（或《大综合》（*Syntaxis*））；它以《大综合论》（*Almagest*）广为人知（通过一种阿拉伯语-希腊语的结合体）。它是对中世纪世界产生最大影响的古代天文学著作，仅在16世纪才被哥白尼的著作所取代。在这本著作中，托勒密提供了描述太阳、月亮和行星（古典时代只观测到了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



一个托勒密所认为的宇宙的雕版图（17世纪），显示行星环绕地球的轨道，其中土星被正确地视为最遥远的行星（在当时所知的行星当中）。虽然轨道被描绘成一种天文器械——扁平环，但它们事实上是（根据古典托勒密的理论）透明的水晶圈。



在这幅17世纪60年代的图画中，托勒密的宇宙“地心说”由一个不相称的大球加以强调，大球上添加了地理细节，它们超出了2世纪的天文学家所掌握的范围。其含义是天空就像地球本身一样被精确地绘制出来，而且同样是非常有局限的。

土星这五颗行星）运动的详细的数学理论。它的内容表明，托勒密是宇宙地心说的拥护者，这一学说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得到了大部分古代天文学家的支持，但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古斯（Aristarchus of Samos）是个例外（他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假想了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通过对天体连续观测的结果（他进行天文观测的时间可以准确注明，从127年5月26日到141年1月2日）和严密的数学理论，包括各种新的证明和定理的应用，托勒密能够在这个模式中提出对天体运行的全面解释，这个解释相当精确地体现了五大行星的复杂运动。

但是，这种解释面临很多困难，这是托勒密自己承认的事实。一方面是他的观测数据，另一方面是他关于宇宙运行和结构的一些最重要的假设。然而当他在二者之间面临选择时，他不打算放弃后者。同盖伦一样，他有很多经深思熟虑后产生的方法论原则，他信奉它们（他的论文《论标准和统率才能》〔*On the Criterion and the Commanding*〕对此做了概括）——但它们不是近代科学的原则。另一方面，他的论文《论光学》（仅有来自阿拉伯的拉丁译本保存下来）确实涉及了诸如对反射和折射的系统实验。例如，他甚至制作了一些特殊的装置来帮助调查，但他得到的结果让现代观测者感到失望。他的《和声学》（*Harmonics*）是对音乐理论所做的高度数学化的论述，这是一种长期的传统做法，比我们可能预想的还要更具实验性。这本书描述了依据精确的原理和尺寸制造的特殊乐器（各种类型的一弦琴），它们按照他的和声理论提出的确切数量关系模式产生出乐音。

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托勒密的《和声学》也具有数学性和实验性（至少对现代读者是这样），同时也有天文学内容。在第三卷，他论述了各种音乐和天体现象之间的关系——比如，“行星之间的关系如何与音调间的关系作比较”。托勒密遵循毕达哥拉斯的传统，认为同样的理性秩序构成了音乐、天空，甚至灵魂的基础，同样的数学原则也体现在它们当中。

天文主题统率了他的其他作品。从《大综合论》中，他引申出各种更为通俗、在技术方面更有用的副产品，还有四卷有关占星术的内容，即他的《四书》（*Tetrabiblos*）。对托勒密而言，从计算、预测天体的运动到预测它们对整个尘世、特别是对个人的影响，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步骤。天体和地球间的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基于共同拥有的重要特征：热、冷、湿和干。因此，不同的天体汇合使这些影响尘世的特征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结合——干多一些或少一些，或热多一些、少一些等等。这些特征影响到空间和本身有不同体质的人们，同样的特征在其内部按不同的比例结合，以至他们受到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而且，这种体系承认各种预兆的可能性。虽然这些可能是挑战性的，但作为一种先见，它们的价值在于有助于人类冷静地面对未来。

托勒密的世界观

正是托勒密的天文活动带来了他的另外一部最有名的作品，八卷本的《地理学》。特别是根据纬度和经度确定观测天空的地点以及联系不同观测点的需要使他将详细的数学方法应用于地理学。同样的需要也使他提出了赋予地球的弯曲部分以一种视觉印象的设想，同时保持（尽可能远地）地点之间的相对距离，由此产生了他的著名地图。正像托勒密自己想强调的，这是世界地图，而不是区域地图。他的目标是“通过画出世界的全部已知部分及广义上与之相关的事物，来提供一种参照物”。这个已知的世界大致上就是罗马帝国加上它的东南贸易路线，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当他超越罗马的控制范围后，可用信息的数量和质量都急剧地减少。

托勒密因而至少拥有盖伦的某些帝国目光，但他的关注点非常不同，罗马世界的许多其他的知识创造者和发现者也是这样。对于知识进行大规模扩展的处理方法并不是帝国时代采纳的惟一方法，这是百科全书的时代，同时也是技术手册的时代，是普及性文章和初学者指南的时代以及专家们的专著迭出的时代。这种多样的处理方法反映了在整个帝国内具有众多不同口味的读者，反映了帝国允许不同的看法和目标，也反映了它为高度专业化和职业的发展创造了不同的空间，推动了兼容并包。

实用技术

亚历山大里亚的席洛（Hero）虽然是一个典型的专家，但却是一位非常值得注意的人。他可能在2世纪的下半叶写了一篇专论抛射机的简明论文，维特鲁维乌斯曾在其著作第十卷的三章里谈论及这个题目。事实上，席洛好像至少写了两篇这样的文章。一篇是《论战争机械的制造》（*the Belopoeica*），写得较为松散，他说其目的是献给普通大众。另一篇仅有片断保留下来，是为专家而作，也就是说，是为了那些事实上打算制造该作品所描述的新式射箭装置（手弩，用金属而不是木头架子支撑弹簧）的人们。席洛的知识成果也涉及了机械、测量和数学等其他领域，每一项都是分别论述而非综合进行。他用希腊语写作，但有很多内容参考了罗马世界——罗马的度量衡和拉丁术语——也参照了自己身处的埃及的情况。他的《气体力学》（*Pneumatica*）（见下面）是对蒸汽原理同样全面和非常早熟的研究。

尽管席洛的杰出成就，罗马社会——特别是贵族精英群体——一般不支持实用技术。对这种贵族态度最扼要的陈述出自1世纪末的希腊知识分子和地方显贵卢基乌斯·马斯特里乌斯·普卢塔克，他是另一名积极参与调和罗马政权和希腊文化的人。共和时期著名的将军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尔凯路斯的传记列在他的《平行列传》中（以著名的希腊和罗马政治家配对的传记，是这种调和的组成部分）。马尔凯路斯于公元前212年包围叙拉古所获得的成功，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道德和艺术方面都是罗马征服希腊世界的关键。根据普卢塔克的说法，这位成功的将领带回罗马的不仅有叙拉古被迫交出的部分精选出的最精美希腊艺术品（马尔凯路斯用来反对当时罗马的市侩艺术作风），而且还有对阿基米德——恐怕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希腊数学家——的记忆，尽管马尔凯路斯尽力挽救他，但他还是在城市劫掠中被杀。关于阿基米德，普卢塔克提到：

> 他认为机械事物和所有从总体上涉及实用的技术都是低下的，适合于卑微的工匠，结果他将全部心思放在那些精巧、奇特但缺乏实用性的事物上。

因此，普卢塔克笔下的阿基米德轻视他的很多蜚声遐迩的发明，包括他对叙拉古军队和城市能够长期抵抗罗马的实力的重要贡献，比如他创新的投射装置，适于击沉船只。与此相反，阿基米德希望以他的抽象思想和理论成就名垂后世。

当然，普卢塔克是否真实再现了历史上阿基米德的看法，而不仅仅是对一个已经达到希腊文化英雄地位的人物提出自己的偏见，是值得怀疑的。保留下来的阿基米德的作品没有明确表达这种观点，它们的含蓄态度引起了很大争议，没有确定的结论。罗马帝国时期阿基米德继承人对这种贵族精英态度的反应与普卢塔克

罗马世界的蒸汽力

亚历山大里亚的席洛大概主要以他的《气体力学》闻名于世。这是一个利用空气、水和蒸汽压力的机械装置的两卷本目录，还包括对构成这些设计基础的一些原理的概括。在席洛谈到的八十多种独立的装置中，有一种设计巧妙的水壶，根据使用者的一时兴致，它能倒出未经过混合的酒、与水混合的酒或只是纯水。一对似乎得到改进的青铜旋转轮安装在一些埃及神庙的入口处，朝拜者为了净化的目的，在进门时转动轮子。当轮子转动时，一个转轮洒水，加强净化的效果；另一个转轮让一只喂饱了的鸟的鸣叫，加入这个过程之中。但席洛最著名的一些发明几乎使古代世界超越了人力、畜力和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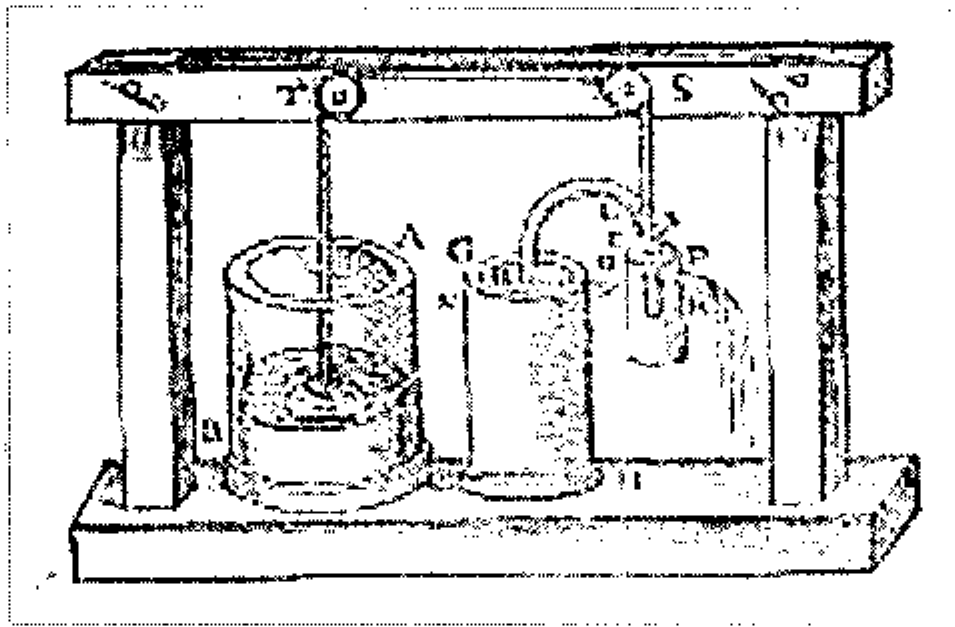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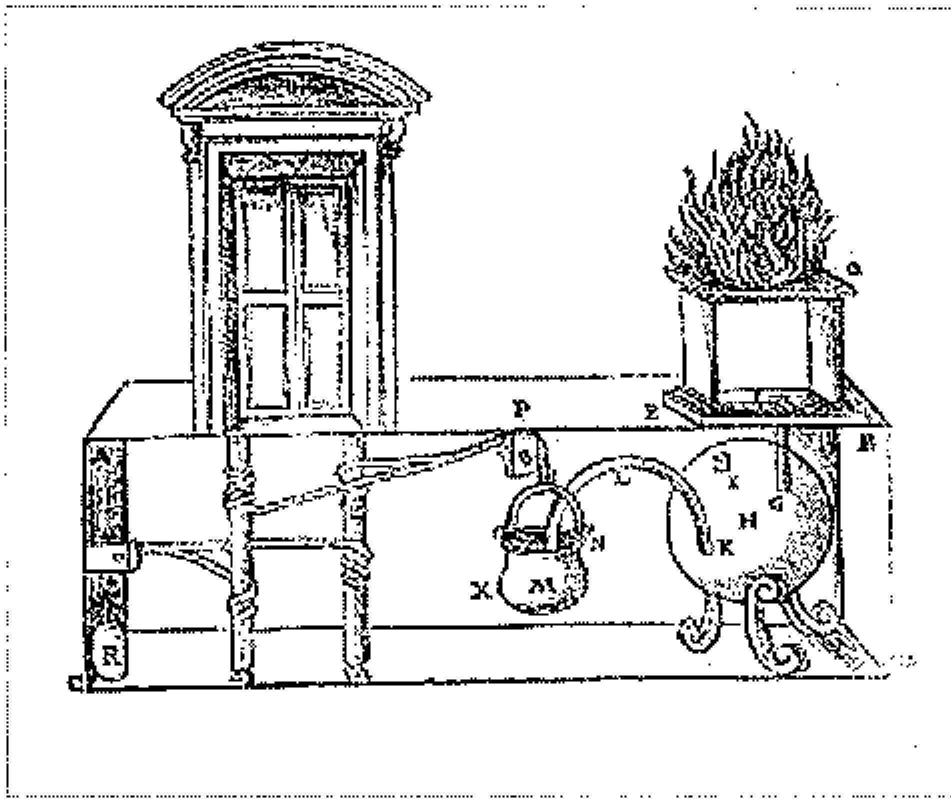
达到了利用蒸汽作为能源的高度。这样的发明之一是利用释放出来的蒸汽压力使一个小球跳到空中。另一个更为精巧的发明是利用蒸汽力产生旋转运动。这里的技术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莱昂纳多·达·芬奇在欧洲文艺复兴时发明的一种蒸汽炮（architron）和丹尼斯·帕平（Denis Papin）在17世纪发明的蒸汽压力容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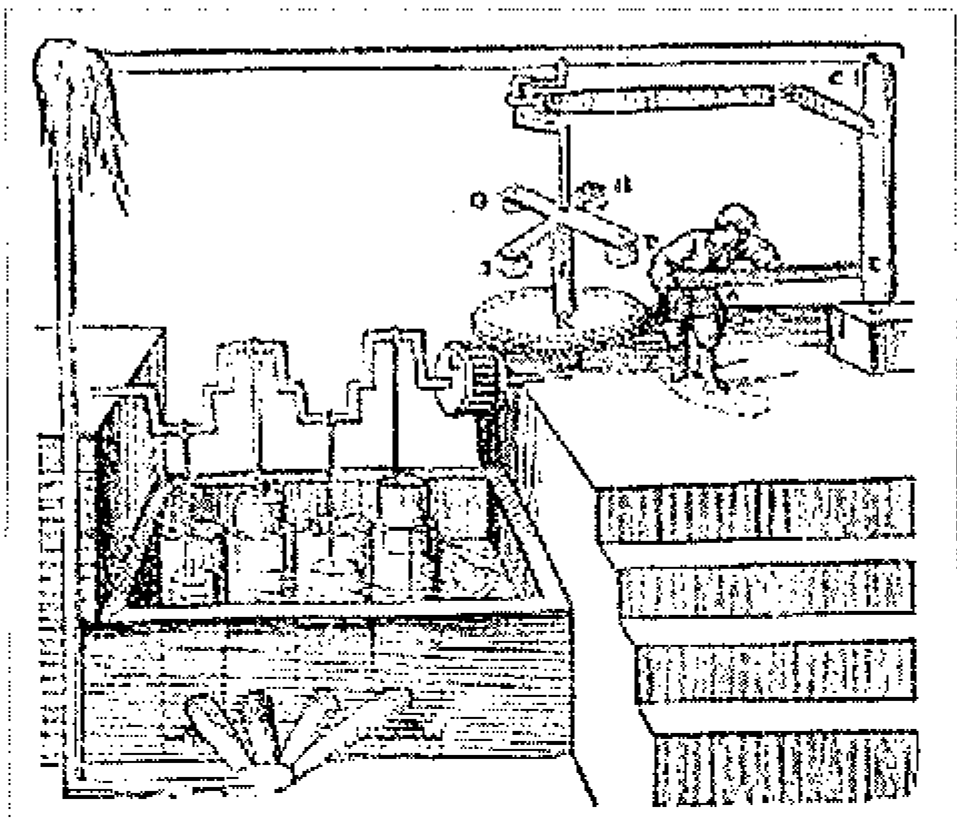
席洛发明的装置是汽转球或蒸汽球。这是一口被置于火上的密封金属大水锅。水沸腾后，蒸汽由两根与顶端相连的管子排出，在两根管子中间，一个空心金属球被放在枢轴上，可以自由旋转。从锅里散发出的蒸汽通过管子进入金属球，只能通过对置的、嵌在球外面的、与旋转轴垂直的小L型出口管排出。当球内部的压力增大时，逸出的蒸汽就促使金属球在轴上迅速旋转。

席洛及其继承人虽然发展了所有必要的部件（不仅有锅炉，还有各种阀门、活塞和汽缸），但实际上都没有进一步制作蒸汽机，这已被看做是古典技术薄弱的象征。席洛的很多最具创新性的发明都是消遣物，是为它们的奇特效果（汽转球的速度和球跳起的高度都给人以深刻印象）而非为了日常使用而设计，人们认为这一事实更应受到指责。这是一个娱乐和新奇要重于产业的社会，也是一个鄙视从事玷污双手的手工劳动的社会。现代观察者认为这种态度对罗马世界技术进步的可能性设置了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同时考虑到罗马社会与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其他保守态度时更是如此。

事实上，创造诸如席洛制作的那些装置所遇到的困难和代价，意味着在一个廉价的畜力和人力劳动的社会，这些装置的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受到了限制。而且，席洛和他的追随者在构建他们对自然界的理解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表明，他们不可能认识可能会带来进一步发展的蒸汽力的基本原理。对席洛而言，蒸汽逃逸的现象是似是而非的，并不是一种可以系统加以利用的自然现象。







西班牙拉斯美都拉斯（Las Medulas）罗马矿井遗址（左图），在这里，席洛描述的那种精巧的抽水器被用来从其他积水的矿坑排水。三幅插图右图出自席洛作品的中世纪版本，书名是《自动装置与其他奇妙的机器》（*Automata and Other Curious Machines*）。



一块马赛克的复制品（以2世纪罗马的原本为基础），表现阿基米德在叙拉古死于罗马士兵手下的情景。他是博学家，可能也是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死后被提高到希腊文化英雄的地位，他的命运是受到野蛮镇压的文明的象征。

的观点并不一致。罗马人对技术及其实际应用的态度当然要比普卢塔克所暗示的更多样化。

维特鲁维乌斯无疑可以看做是对有关建筑师的专业或专长的贵族精英偏见的一种回应。事实上，在他对技艺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精英的价值观作出了让步。尽管如此，他仍然强调实际应用的重要性。他试图把技术技能和经验与理论知识结合，而不是以后者取代前者。当席洛在其《论战争机械的建造》一书导论中宣称它对人类的宁静和幸福（所有哲学努力的目标）的贡献远远超过任何理论猜测或抽象思考时，他对机械技艺——尤其是对于制作战争机械——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说明。他认为，强大的石弩保证了和平与安全，它既是潜在侵犯者的威慑物又是冲突爆发后取得胜利的保证。另一方面，哲学是一种无休止的、无法解决的争论。而且，至少有一名罗马贵族成员——正巧是一名执政官——不认为技术细节有失身份，似乎对它们很着迷。塞克图斯·朱利乌斯·弗朗提努斯的论文《论引水渠》（*On Aqueduts*）是对罗马供水体系的系统研究，一直谈到最小的管子。这个供水系统是由一名政治、军事的成功人士设计的。公元97年，皇帝涅尔瓦下令由他负责罗马的水供应，图拉真再次批准他担任这一职务，弗朗提努斯也两次与他一起担任执政官。

此外，用内容奇特的《气体力学》——或是论述与两个小型木偶剧场的建造有关的自动装置的短文《自动机械》（*Mechanica*）——来评判席洛的幸存作品的做法，都是一种误导。他的《机械学》仅有阿拉伯文译本（以及一些希腊文残片）保留下来，是更具实用性的文本。该书首先谈到了机械学的理论基础，然后是它的基本设计，最后是这些基本原理在诸如升降机、起重机和压力机等机械上的一些关键性的应用。席洛也很全面地论及测量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在土地的划分与分配、地界争端的解决、估税和实物税的交纳（比如以粮食）、灌溉的规划及供水的组织等政府事务中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测量学》（*Metrica*）中，他几乎全面地阐明了有关测量的几何方法。而他的《立体测量》（*Stereometrica*）一文更具有实用性，比如书中包括计算各种尺寸的船只所能堆放的酒罐数量和不同面积的屋顶建筑所需要的瓦块数量。他的论文《光学》（*Dioptra*）则完全集中于调查（他的有关钟表和时间的测算等其他文章已经遗失）。

席洛的论文《气体力学》的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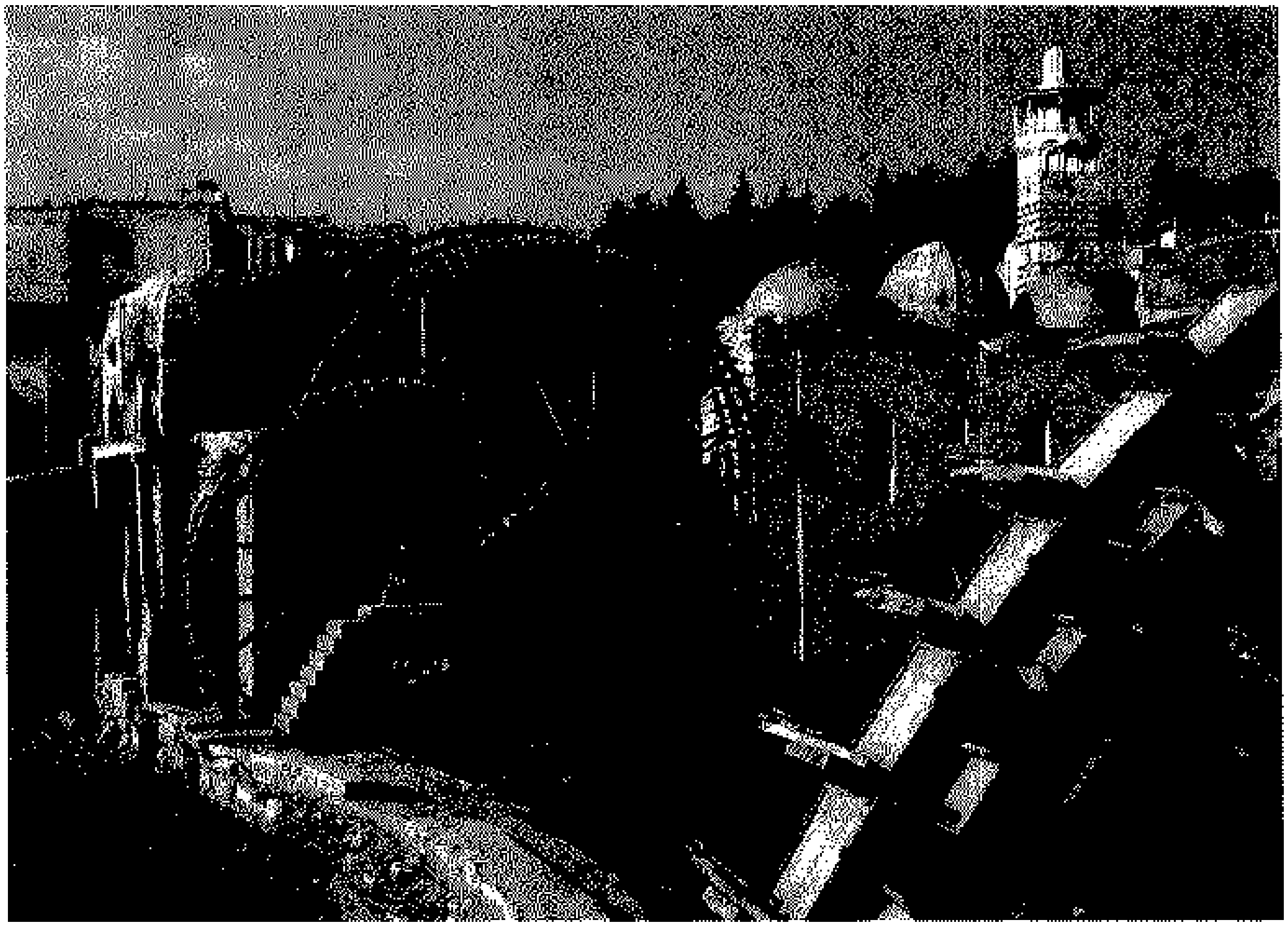
因为通过空气、土、火和水的结合以及三种或四种本原的共同作用，所以就实现了各种组合，其中一些满足了人类生活最迫切的需要，而另外一些则产生了惊异和恐慌。

席洛《气体力学》（英译者本奈特·伍德克罗夫特［Bennet Woodcroft］）

技术和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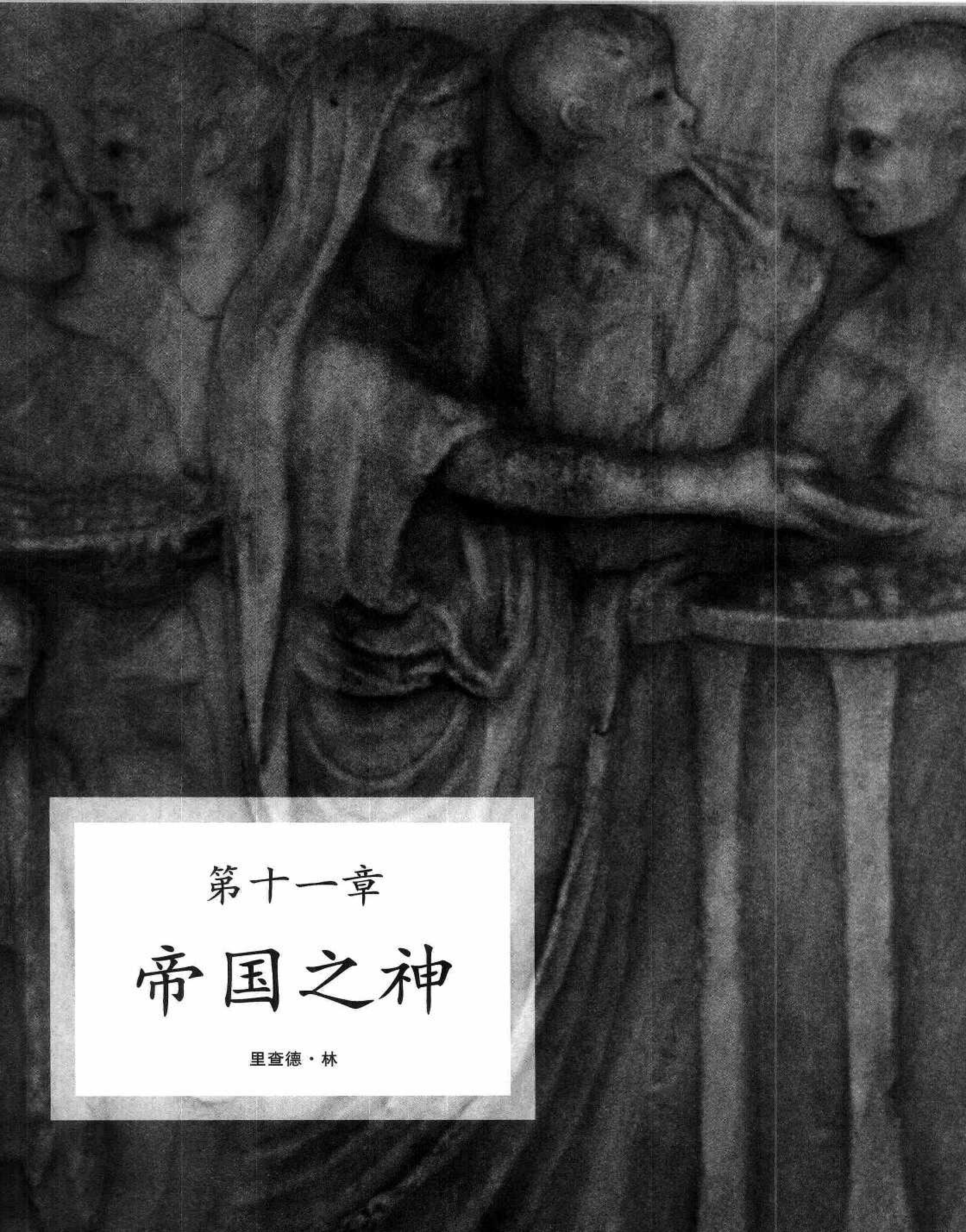
这些作品与其他作品，比如有关土地勘查的拉丁文本和人们所熟知的《罗

马农业大全》(*Corpus Agrimensorum Romanorum*)之类相关的编纂活动，不断以拉丁文和希腊文撰写军事题材的传统（包括军事工程）——还有很多考古证据——这一切都应作为对罗马技术发展过于简单或过于否定认识的一种警示。罗马在工程方面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奇技淫巧的范围，在各个时期，有关基本设计的改进都在不断地进行。罗马在军事发射方面的开发之一——金属架的手弩——我们已经提到了，还有其他的发展。在民用方面，罗马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发明——比如混凝土和玻璃。在技术进步中，水力在磨面和其他机器中（从杵锤到锯）的应用随着帝国的发展增加了，与城市供应、农业和采矿有关的抽水器和治水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复杂。



位于叙利亚哈马的罗马时代晚期的水轮。由于数个世纪的无数次修复，这些水轮保持着罗马原型的尺寸和复杂性。为了提水以及提供旋转的力量，正是这样的轮子在罗马世界的末期改变了罗马世界。台伯河岸排列着以水轮驱动的粮食磨坊。在危机时代，水轮甚至被架设在河中抛锚的船只上。

事实上，罗马帝国让人印象最深的一些工程成就出现于较大的西班牙矿山当中，在这里水是采掘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罗马国家但可能租给私人企业的西班牙矿山中出产贵金属——金、银和铜，还有锡、铅和铁。根据经营场地留下的遗迹，采掘的规模显而易见，所采用的某些方法也颇为壮观。庞大的蓄水池建在工作面之上，一端带有水闸。一旦蓄水池被注满（通常是通过水渠），水闸立即开放，放出大量的水冲洗工作面，带走泥土和碎石。在这个过程的其他环节，水也可能以更容易控制的方式来利用。当然，也需要用提水系统把水从矿坑中排出，有时可达到30米（在利奥·丁托矿，八对巨大、复杂的水轮连续作业，每个都由一位能够胜任的人推动，据计算，一小时它们可以抽出大约二百四十加仑水）。但是，从技术方面看，罗马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全新的发明。在以前尚未触及的生活领域几乎没有什么发明，如同最终在欧洲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情况一样。相反，帝国对于较早的、先于罗马世界的技术进行了提高和完善。技术与社会和帝国同步发展，并没有超越它们。对于帝国的各项事业——军事、后勤和经济事业——所提出的特定的技术挑战，人们找到了巧妙的解决办法，但这些解决办法几乎没有得到概括。知识也随着帝国扩展，沿着罗马帝国的路线在系统化和综合化，但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而当时的罗马世界真的不是一个激变的地方。



第十一章

帝国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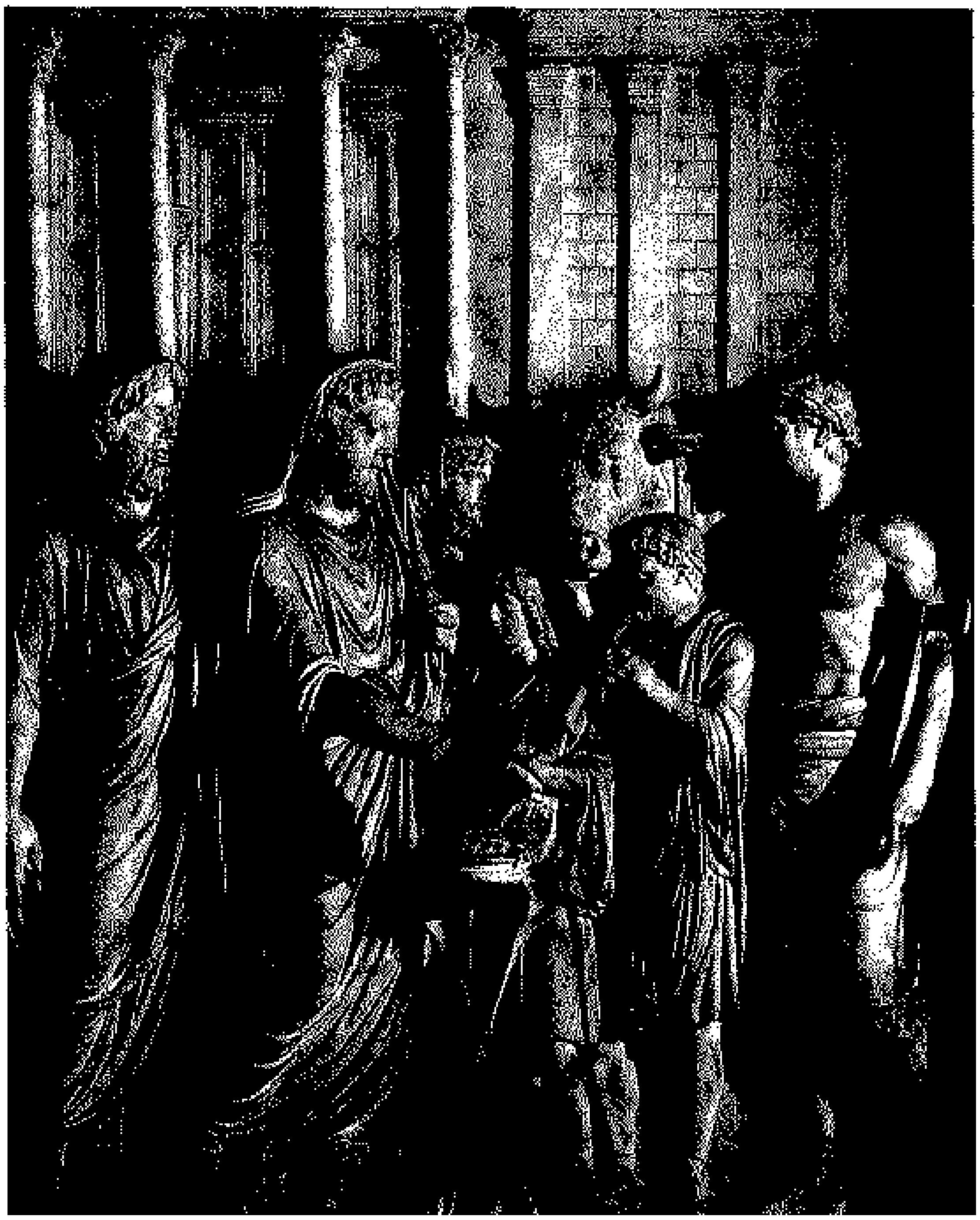
里查德·林



帝国之神

尽管罗马人具有宗教保守的名声，但他们在赢得属于自己的帝国后，调整了他们与神的关系。从此，为数众多的神灵在“罗马的和平”（the Pax Romana）时期为争取显赫地位和拥护者展开了竞争。地方上的人们通过为自己的神重新命名，但同时保留传统的崇拜形式来应对希腊－罗马神话体系。在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一神论的信仰中，不存在主要的异教信仰，他们至高无上的一神观念与当时关于神灵的哲学观念相交汇。4世纪以后，基督教一神论开始获得贵族和平民的共同支持，由此重新定义了罗马世界中神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

“我们的国家总是认为一切都没有宗教（religio）重要”——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1.1.9）这样提请人们注意罗马赋予神灵崇拜的突出地位。为了罗马能够保持胜利，实现统治世界的使命，人们必须遵照古人留传下来的仪式程序一丝不苟地供奉它的神祇。神需要的大多是动物牺牲，由指定的祭司在神圣的祭坛上进行献祭。祖先的方式（mos maiorum）所规定的正确献祭与祈祷的规范，是这个城市的宗教礼仪的基础。拉丁单词“religio”也许最好翻译成小心翼翼地伺奉仪式活动，旨在人类和神灵世界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因此，它与晚近西方的“宗教”概念（作为个人的精神积淀和信仰一种先验的神灵）相去甚远。在王政时期和共和初期，这种宗教开始是与早期农业社会的需求和希望联系在一起，农业社会为了维持生存而期待土地丰产，以适当的方式崇祀神灵会确保雨水的降临和谷物的生长。人口和家畜的繁衍也很重要。为了所有诸如此类的原因，早期罗马人非常关注他们与成群生活在他们周边地区却又看不见的生命精灵之间的关系。罗马公共宗教在很重要的方面鲜明地体现了农田与住房的仪式习惯。人形的男神、女神很快从邻近地区来到罗马。随着罗马城从一个落后的小村社发展成一个世界性帝国的首都，它与神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但其宗教的许多早期特征却永久保留了下来。非罗马人的个人和团体不断涌入罗马并被接受为公民，有的是全体被授予公民权，有的是个人先被奴役，后来获得释放。这些人为罗马带来了他们原来社会的地方崇拜。罗马帝国的神与帝国本身的特征一道，以形形色色的方式缓慢地加以转变。



出自罗马卡皮托林山上的朱庇特神庙的浮雕，显示皇帝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戴头巾者）正在进行公共献祭。遵照“古老”传统，一丝不苟地遵守献祭仪式（包括人和动物在内，所有参加者的年龄和性别都有明确的规定）被看做是帝王的一项基本职责。自元首统治确立起，皇帝还拥有大祭司长的头衔。

本土神和外来神

起初，罗马神祇是指那些罗马公民集体以诸如公共献祭和祷告等仪式尊崇的神。既然罗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民族混合的城市，这种定义允许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伸缩性。正如在罗慕路斯和埃涅阿斯建城神话中所看到的那样，罗马最初的居民来自附近的城镇和地区。罗马人和拉丁人有许多共通之处。在神话传说中，埃涅阿斯和儿子建立了拉文宁（Lavinium）和阿尔巴龙加（Alba Longa）两座拉丁城市，以后又从中出现了罗马的创建者。罗马国王在阿芬丁山上为拉丁人崇奉的一位同盟之神戴安娜（Diana）建起一座神庙后，罗马代替拉文宁成为拉丁同盟的崇拜中心。

罗马在拉丁姆取得优势地位后，神之间的这种交流继续进行。罗马从它的拉丁邻人那里引进了朱诺·索斯庇特（Juno Sospita）等神祇；从因擅长占卜术而闻名遐迩的埃特鲁里亚人那里学得了宗教仪式。随着与埃特鲁里亚人和大希腊的希腊社会接触的增加，罗马人把自己的抽象神祇转变为人格化的男神、女神，并建立了一套名义上的对应神，例如朱庇特相当于宙斯，朱诺相当于赫拉，雅典娜相当于密涅瓦，墨丘利（Mercury）相当于赫尔墨斯（Hermes），马尔斯相当于阿瑞斯（Ares），塞瑞斯相当于德麦特尔（Demeter）。罗马宗教至少在神话术语上被源于荷马、赫西俄德的神学体系所同化。但是，大多数崇拜仪式并未在这个过程中有所改变。

古典时期的罗马人宣称拥有本国的神系（ius divinum），他们的崇拜与城市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民族的早期历史有关。然而，罗马宗教的历史远没有固定在某些始于城市建立的原初形式，而是表现出一种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历程，甚至从城市的守护神来看也是如此。在传说中的祭司-国王努玛（Numa）统治时期，罗马崇奉朱庇特、马尔斯和奎里努斯神。公元前6世纪，这个三神组合被附近埃特鲁里亚诸城市尊崇的另一个三神组合取代，即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在罗马王政时期的最后岁月里，人们为他们在卡皮托林山上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神庙，这座神庙可能反映了塔克文家族希望通过建造一座"国际"化（这里指埃特鲁里亚）的宏伟神庙来宣扬他们的权势。

如果说树立一种强国的形象是罗马公共宗教革新的一个动机，那么战争和社会危机则是另外的原因。一种通常的作法是，罗马的将军在出征前都要向特别的神祇发誓，为换取胜利，他们将用战利品在罗马建造奉献给这些神灵的神庙。人们在罗马发现了四座共和时期的这类神庙，坐落在现称为拉哥阿根提纳（Largo Argentina）圣域的地方。一位意大利神弗洛尼亚（Feronia）的神庙是公元前290年罗马人对萨宾人的胜利的纪念，而朱诺·卡瑞提斯（Juno Curritis）的神庙则是在公元前241年法拉利或迦太基战败以后事先许下要建的。不履行这种还愿（ex voto）誓约是极端不虔敬的行为，整个罗马人集体大多接受罗马的个人以他们的名义向神许下的誓愿。罗马人并不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出于任何一个群体都拥有自己的保护神的信念，他们把失败看做是敌人的保护神实在是太过强大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使用召唤（evocatio）仪式，在仪式中他们向敌方的神祇许诺将以他们的名义在罗马建立神庙崇拜，以此请求这些神祇离弃自己的故乡来到罗马。所知最早的事例之一，与罗马同埃特鲁里亚的维伊之间的长期战争有关。公元前396年，罗马执政官卡米利乌斯（Camillus）向阿波罗许诺将把虏获物的十分之一献给他，又向维伊的庇护女神乌尼（Uni）(现在被当做朱诺)保证将在罗马为她建造一座神庙。在布匿战争中，罗马人按惯例故伎重演，召唤迦太基的庇护女神塔尼特（Tanit）抛弃她的城市到罗马定居，在这里她被称作朱诺·卡勒斯提斯（Juno Caelestis，通过这样以一个熟悉的名

狄奥尼修斯论西卜林神谕

塔克文统治时期，一个罕见的好运降临罗马城，这是由某位神或某种力量赋予的福祉……一个外国妇女走近这位专制君主，提出要卖给他九卷《西卜林神谕》。塔克文拒绝以她要求的价钱买下它们，于是她离开并烧掉了三卷……（这种情况重复发生了一次）塔克文于是对这位妇女的意图感到好奇，派人去请占卜官，对他们诉说发生的事情并询问自己该怎么做。他们通过某些迹象意识到，他拒绝的是神赐予的礼物，于是他们告诉他没有买下整卷书是个灾难，建议他付给那个妇女所要求的全部价钱以使得到剩下的神谕。那个妇女交出那些书册，告诉他妥善保管它们，然后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哈利卡纳索斯人狄奥尼修斯所著《罗马古代》第6卷第2章



一位佚名神祇的神庙废墟，位于罗马拉哥阿根提那圣域内，这里曾发现另外三座共和时期的神庙遗迹。罗马散布着数百座神庙和神殿，它们的修缮程度不一，捐助的程度也相差极大。其中一些，比如广场上的维纳斯神庙，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其他的则是地方性的崇拜。

称来重新命名一位外来神，罗马人可以把一位不同的异邦神吸纳到现有的本地神集体中）。这些事例也表明，罗马人并没有把他们对敌人的仇恨转移到敌人的神祇身上。然而，这种模式在布匿战争之后就停止了，这暗喻罗马人对自己的军力和帝国力量日渐增长的信心。

对罗马人来说，尽管把外来神加入自己的神系是可以接受的现实，但也只是在遇到深刻危机，特别需要从远方直接引进时才会发生。公元前5世纪，一场瘟疫促使元老院求助于《西卜林预言书》——即一种神谕作品的汇编，它指示罗马人在城中建立对医疗神阿波罗的崇拜以保护其人民的健康。公元前293年，另一场瘟疫夺去了乡村大批人的生命。因正常的神祇崇拜仪式（res sacra）没能防止这场灾难而感到困惑和绝望的罗马人，再一次向女巫西贝尔求助，她主张寻求阿波罗之子，医神阿斯克列庇奥斯的帮助，它的主神殿设在中希腊的埃皮道鲁斯。罗马人致力于和迦太基的战争，使这一引进的任务拖延了两至三年。但瘟疫肆虐，并无减弱之势，女巫坚持自己的意见。最终，一支由罗马显贵组成的代表团向东旅行，从神庙祭司处得到一条圣蛇后，完成使命返回。这条经常表现为盘绕在一根拐杖上的蛇，是阿斯克列庇奥斯的圣物，也是这位神祇神圣存在的具体体现。根据一种传说，它溜出小船，在台伯岛上登陆，罗马人于是把这座岛屿作为阿斯克列庇奥斯的专辖区域。公元前291年1月1日，人们向阿斯克列庇奥斯（拉丁文作Asclepius）奉献了一座神庙，庙宇包括这位神及其女儿海吉娅（Hygeia）的神像，海吉娅后来与意大利的本地神萨鲁斯（Salus）结合起来。在这座岛上现今的儿童医院下面，仍可看到这座神庙的遗迹。在这个事例中，罗马人没有采用近邻的神祇，而是做了审慎地选择，派人从远方请来一位其医疗特征为当时的意大利所急需的神祇。西卜林的神谕为这次努力提供了合理的建议，并给予新神以其他方式不可能在罗马社会获得的身份和地位。然而，尽管阿斯克列庇奥斯给予罗马全力帮助，罗马人还是与他保持着一定距离。台伯岛不在罗马城的圣界内（pomerium），因此，这位神祇一直作为一位生活在台伯河畔的罗马移民中间的异国来客（peregrinus）为罗马人服务。

对于一位医疗之神，这也许是合适的命运，因为在罗马，医生长期是由讲希腊语的奴隶从事的一种职业。更大的敬意被赋予汉尼拔战争期间从东方引进的一位著名神灵。这场在意大利持续十数年的战争，使罗马人的斗志深受打击，奇迹和征兆的广泛传播又加剧了当时许多人的不确定感。罗马人甚至公开献祭人牲来讨好神灵。预言书又一次成为一个陷于危机中的民族的最后手段，它指示，只有把“派西努斯的伊达山之母”（the Idaean Mother of Pessinus）带到罗马，才能把汉尼拔赶出意大利。人们认为这是指安纳托利亚的母亲之神玛格娜·玛特（Magna Mater，希腊语称西贝尔①），她的崇拜地点在小亚细亚中部的弗里吉亚。罗马人恭敬地派出了一个使团。经过一番政治活动后，他们得到了女神的神圣象征物——一块大概是陨石的黑色石头。

① Magna Mater的拉丁文意译是“伟大的母亲”。——译注

与此同时，德尔斐[①]神谕指示罗马人用他们最优秀的人去欢迎那位女神。于是这位崇拜偶像被请入城市，人们举行欢庆仪式，把她暂时安放在胜利神庙里。公元前191年4月10日，玛格娜·玛特"目睹"了人们向她奉献属于她自己的神庙。神庙建于帕拉丁山上，她原有的祟祀设施与人员，包括一批从弗里吉亚带来的阉人祭司(galli)，都安排妥当。每年4月5日到10日，是罗马庆祝众神之母崇拜的梅伽莱希亚节（Megalesia），这是一个盛大的公共节日，所有罗马人都要参加，在此期间，禁止处理官方事务。节日包括宗教游行、希腊式体育竞赛以及在大竞技场举行的戏剧表演。宗教庆典由一位罗马长官来主持——西塞罗时代是市政官，帝国晚期是行政官（praetor），他在女神庙中进行最初的香草奉献。

然而，作为一种公共节日的梅伽莱希亚节的普遍吸引力和崇高地位与罗马城中对众神之母的崇拜形成了强烈对比。包括被阉割的男性和奇特行头的崇拜仪式极大地冒犯了上层罗马人的情感。阉人祭司们经常在罗马街头举行壮观的游行，同时用希腊语唱着赞美歌。他们身穿色彩艳丽的长袍，身上沾着自我鞭挞渗出的血迹，吹笛手、鼓手、铙钹手陪伴其左右。事实上，罗马政府禁止其市民担任圣母的祭司，根据一位希腊作家的记述，罗马政府甚至禁止市民加入游行队伍。这样，虽然圣母被迎进罗马城，并在官方日历中设立了一个庆典日，但她仍然是一个处于本国神系之外的异国神祇，对她的崇拜被局限于她的帕拉丁神庙。

当外来崇拜进入罗马是私人发起而非政府行为时，接受起来便显然尤为苛刻。一个这方面的事例与狄奥尼索斯（Dionysus，拉丁语作巴库斯Bacchus）崇拜有关，他在罗马长期被作为利伯·帕特（Liber Pater）——一位意大利的丰产和酒神受到崇奉。罗马人在每年3月17日庆祝利伯节（Liberalia）。由于他是一位乡村之神，因此在城中的主要祭祀地与塞瑞斯神（Ceres）一起位于阿芬丁山上一座建于公元前493年的神庙中。那时该地还处于罗马圣界以外。塞瑞斯、利伯和莱伯拉（Libera）以阿芬丁三神闻名，是等级斗争中与贵族的卡皮托林三神相抗衡的平民代表。公元前2世纪，包括狂欢庆典在内的巴库斯崇拜仪式在意大利传播，甚至传至罗马，吸引了一批各个社会阶层的男女追随者。元老院贵族成员对此非常忧虑，于是在公元前186年通过一项法律，导致后来所谓的"巴库斯事件"，这是罗马政府首次有组织地对一个宗教团体的迫害。执政官受命去镇压这一崇拜，并毁坏他们所能找到的这位神祇的几乎全部圣坛和圣像，只有最古老的除外。官方在意大利所有的乡村地区展开了调查，虽然这种崇拜的公开活动在一个时期内有所收敛，但在以后的罗马社会中仍然是一股有影响的力量。信奉多神教的罗马人为什么会采取这种行动？这与一个外来神被崇拜的事实无关。事实上，巴库斯仪式的追随者对罗马社会、政治习俗的冒犯，远多于对他们的宗教禁忌的冒犯。罗马宗教在观念上是功利主义的，服务于增强诸如家庭、宗族、其他血缘团体及罗马国家的集体认同。相反，巴库斯崇拜紧紧围绕特定的领袖进行组织，这些领袖对他们的追随者有很强的控制力，甚至达到了影响他们交出自己财产的程度。个人断绝与自己家庭、血缘团体和国家的联系而支持这些狭隘的权威人物的事实，也许解释了罗马国家因此而做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反应。

宗教保守主义与变化之间的一种微妙平衡贯穿于整个共和时期。国家始终细心关注着哪些神祇可以引入、定居罗马，并调整它的宗教策略以适应城市的特殊需要。同时，它竭力审查比较随意的宗教革新，定期采取措施控制它认为过分的做法。西塞罗描述了正统的罗马人对神应该秉持的态度："没有人可以拥有自己的神，不论是新神还是从外国引进的神，除非是公开地引入（罗马）；他们的个人崇拜应该给予那些他们从父辈正式承继下来的神祇"（《论法律》2.19），但是促使西塞罗有感而发的事实表明，他的同时代人常常并不这样认为。

"罗马的和平"时期的神与人

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过渡改变了政治权力的分配，却未引起罗马世界宗教的巨大变化，重要的例外是皇帝作为罗马最高政治、宗教权威角色的上升。皇帝时而是传统宗教的保卫者，时而成为使罗马公共宗教发生变化的代理人。尤里乌斯·恺撒担任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大祭司长是祭司团体的领袖，此时成为整个罗马国家宗教的首脑）职位时，曾改革罗马的宗教习俗。而承袭这一职位（它成为一项皇帝头衔）的奥古斯

① 位于希腊半岛中部深山中，是阿波罗神庙所在地。——译注



一幅来自突尼斯的3世纪的镶嵌画，描绘巴库斯对印度人的胜利。虽然最初人们把他与土生土长的乡村神祇相联系，但巴库斯（同他的希腊化身狄奥尼索斯一样）是一个没有羞耻心的东方神祇。他的崇拜强调直接、狂热的个人参与，这引起了希腊和罗马官方的忧虑。

都，却选择了以古老罗马宗教的保卫者的姿态出现。根据他的《业绩自传》，即对自己光辉业绩的自传式陈述（Res Gestae），他重建了82座神庙，并复兴了已废弃的仪式。

奥古斯都也建造了新的神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座是复仇者马尔斯神庙，据说它是在腓力比（Battle of Philippi）战役[1]前夕许下的誓愿，它在奥古斯都新广场起着中心作用。整个结构清晰地表现出奥古斯都对罗马的神同罗马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紧密关系的想象。与复仇者马尔斯的联合意味着这位神对奥古斯都家族的关照，以及他对尤里乌斯·恺撒的刺杀者进行报复的正义性——恺撒是他的养父，那时已经成了一个神。这座神庙山墙上的浮雕特点是，维纳斯和罗慕路斯位于马尔斯的左侧，而弗图娜（Fortuna：命运女神。——译注）和罗玛位于他的右侧。旁边的柱廊里是半圆形的壁龛，里面放着罗马城的两位创建者埃涅阿斯和罗慕路斯的神像，还选取了一些罗马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阿尔巴·龙加的拉丁国王们和朱利亚家族的成员陪伴着他们的祖先埃涅阿斯；共和国以来的名人则环绕着罗慕路斯。一座奥古斯都本人站在一辆四马战车上（凯旋的将军的车辆）的雕像，面对神庙前方的圣坛。这种人与神并列的精心设置，体现了罗马历史的神佑观念，并突出了奥古斯都本人的家族在实现神为罗马安排好的命运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伊塔利娅（Italia），一位其形象出现在和平祭坛（Ara Pacis）上的人格化女神，是皇帝为向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保证他们仍然是正在成长的罗马帝国的核心而加以扶植的。每当奥古斯都和他的继任者恢复古代神庙并重建他们的崇拜时，他们都在试图减缓宗教和社会变革的正常进程。如我们已看到的，罗马的国家和私人宗教事实上都非常有生命力并愿意接受革新，新输入崇拜的可接受性最终取决于它们的规模和性质，而不仅仅是它们是外来神这一事实。

希腊化的东方曾经是罗马引进文化和宗教的主要来源。从老加图时代直到进入帝国时期，希腊化及讲希腊语者移居罗马的步伐，开始让那些害怕丧失本土拉丁文化和宗教的人感到忧虑。奥古斯都本人对同族的意大利的价值观和崇拜的强调，在很多方面是对被他描述为“马克·安东尼的”希腊化道路的摒弃。但即使是安东尼的失败也没能阻止以后的皇帝成为公开的亲希腊者：尼禄和哈德良只是那些热爱希腊的所有东西并寻求把希腊风俗输入罗马的皇帝中最有名的例子而已。

原则上罗马从来没有反对过希腊文化的传播。相反，罗马人积极支持希腊价值观和制度从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希腊城市向偏远地区的深入传播。在西方，并行发生了当地社会的罗马化转变。罗马帝国并没有真正努力地去输出它的神祇，但罗马公民很自然地在新殖民领地上建立起了对传统罗马神祇的崇拜。因此，对卡皮托林三神的崇拜传播到了西部地中海和其他地方。这些献给三神组合——最初由埃特鲁里亚人崇拜，后来加以改造适合罗马使用——的神庙控制着城镇上的当地市民广场，比如埃特鲁里亚的库萨（Cosa），北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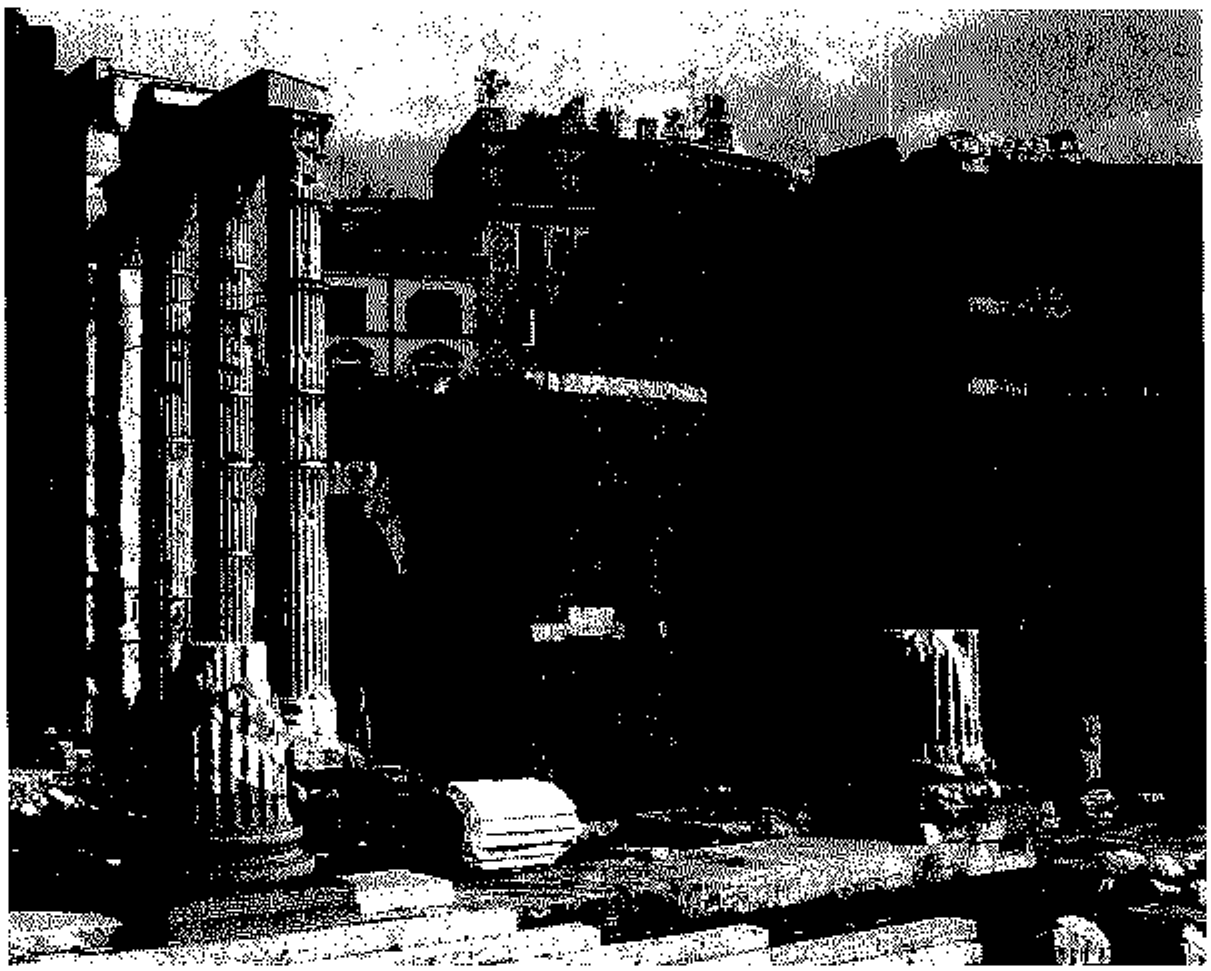
[1] 奥古斯都与刺杀恺撒的共和派军在希腊腓力比举行的决战，奥古斯都胜。——译注

萨加（Thugga，即都加〔Dougga〕）、修伯·迈乌斯（Thuburbo Maius）、塔木加迪（Thamugadi，即提姆加德〔Timgad〕）和萨弗图拉（Sufetula，即萨伯特拉〔Sbeitla〕），它们以小规模的形式模仿了卡皮托林与罗马广场的接近关系以及神和它所象征的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罗马皇帝崇拜

在帝国时代，殖民地和其他行省城市也许会决定为某一位皇帝建造一座庙宇，而不是建造一座卡皮托林三神庙。皇帝在罗马世界的不同情境中受到崇拜——从国家崇拜到私人家庭对与皇帝们相关的家神崇奉。罗马人已经取得了对地中海世界的统治权，在这个地区，尊奉帝王为神的习俗自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起就已经充分确立了。为尊崇强大的国王，希腊城邦以投票的方式建立庙宇、一年一度的庆典、一系列的献祭和祭司集团；作为回报，他们常常会被授予各种特许权和利益。当罗马在共和国中期作为希腊化统治者的平等者出现时，希腊人出于感恩或政治上的便利等动机，开始向罗马女神的抽象神性，甚至向罗马元老院和人民效忠。他们还把某些共和国的将军和统治者敬为神圣的救星，直到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这种做法才被取消。从此以后，神圣的荣誉变成了皇族成员的特权。希腊城邦很快把对皇帝的崇拜融入到已有的对希腊化统治者的崇拜当中，皇帝的圣像明显进入市民游行和传统宗教节日中，并被安置在希腊神祇的古老圣所里。为帝王崇拜修建神庙，成为各行省城市的一种常见景象，比如位于土耳其阿弗罗狄塞斯（Aphrodisias）的维护得相当好的塞巴斯蒂安神庙。当地的贵族成员组成专门的祭司集团，对他们而言，帝王祭司的职务是他们与统治权力相联系的一个标志。各城市竞相为皇帝提供越来越复杂的崇拜仪式，甚至是在他们不在场的时候。由此，奥古斯都在帕加玛被圣歌歌手所赞颂，而伯罗奔尼撒半岛吉提乌姆的人民则通过包括音乐比赛在内的庆典崇奉提比略。通常皇帝们并不鼓励这些庆祝形式，只是对地方上向他们表达爱戴的需求顺水推舟。起先，对这些崇拜很少进行管理或集中控制，然而，从奥古斯都起，皇帝们试图管理自身帝王形象的视觉体现，方法是从罗马送出一些模型让行省工场模仿制作。

希腊化城市的市民长期习惯于对神圣统治者的崇拜，很高兴能有机会与这些罗马权力的化身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皇帝崇拜在罗马世界的其他地区，包括罗马城本身，是一种新鲜事物，甚至在共和国之后，这些地方对君主制的不信任导致人们，尤其是贵族把对在世者的神化看做是专制的标志。奥古斯都没有尝试把对他本人神性的崇拜引入罗马，而是选择了准许他的家神拉瑞斯（lares）和他自己的生命力神盖尼乌斯（genius）成为崇拜的对象。起先只有已故的皇帝才会由元老院的法令得到神化。当卡里古拉（Caligula）穿戴得如同巴库斯、阿波罗，甚至打扮成朱庇特，并坚持把他作为神来崇拜时，他的夸张举止被归因于疯狂。图密善宣称他应该被称呼为“主人与神”（dominus et deus），同样被解释为自大狂的表现。大部分早期罗马皇帝不得不等待死后被



坐落于罗马奥古斯都广场上的复仇者马尔斯神庙的废墟。这座神庙位于第一位皇帝修建的大批王朝纪念物的中央，里面放置着他从帕提亚人手中夺回的罗马军标。这座神庙一直用于召开元老会议、接见使节以及许多其他的官方事务。

尊奉为神。这个过程成为固定的程式：尸体在火葬堆上被火化后，祭司们将主持献祭，同时放飞象征着死者灵魂的鹰，它们展翅飞翔，象征着死者的灵魂升入了天堂。尽管如此，罗马人并非没有意识到隔开人与神的巨大鸿沟，而官方以外一定数量的犬儒主义者欢迎这种做法。对死去皇帝的神化甚至可能遭到皇帝本人的一些嘲讽。韦伯芗临死之际，曾开了一句著名的玩笑："我想我正在变成一个神！"

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竭力劝阻他们的属民不要给予他们过分的神圣荣誉，这是他们的美德、他们的统治术的标志。事实上，很少发生把皇帝崇拜自上强加给不情愿的属民的情况。而在古代，没有比犹太人更不情愿的属民了。按照长期确立的惯例，罗马官方认识到犹太人的古老宗教禁止他们崇拜自己的神祇以外的任何神，并承认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崇拜的权利。但是，虽然卡里古拉大概很清楚犹太人严格的一神教不允许他们以其希腊邻居的方式崇拜皇帝，却仍然命令把自己的崇拜像放置在耶路撒冷神庙的至圣堂（the Holy of Holies）中。这个粗暴的提议也许是对不久前在亚历山大里亚和犹太发生的暴动的一种反应，犹太人在那里挑衅性地捣毁了一座他们的非犹太人邻居建造的献给皇帝崇拜的圣坛。经过犹太人和罗马显要人物的一再吁请，才最终说服皇帝取消了他那史无前例的命令，把犹太人和罗马人从大规模流血冲突中解救出来。

在西部，把皇帝崇拜引入新建立的行省——比如高卢、日耳曼和不列颠，成为这些领土罗马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献给皇帝崇拜的圣坛成为向罗马表达忠诚的主要手段。卢格杜努姆（Lugdunum,里昂）建立了一座献给罗马和奥古斯都的巨大圣坛，三个高卢行省的代表们每年到这里表达他们对罗马和皇帝的忠诚。阿格里皮奈西斯殖民地（Agrippinensis,科隆）拟订了一个同样的计划，它是附属国乌比（Ubii）原来的首都，后来成为下日耳曼行省的首府。行省议会是政治、宗教机构，议会主席常常也是主要的帝王祭司。通过这种方式，地方显贵变成了罗马贵族，担任皇帝祭司这个职位代表着他们为当地社会进行公共服务的一个方面。这样一种程式满足了这个贵族精英阶层展示他们的罗马人新身份的需要，也满足了罗马官方保持行省忠诚的具体需要。

一座城市中拥有已确立起来的皇帝崇拜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它已经在罗马城市的级别竞争中获得了一定地位。但对其他城市，尤其是在罗马征服的第一批城市中，它仅仅意味着外来压迫。随着克劳狄皇帝对不列颠的侵入，在凯缪勒敦努姆（Colchester,科尔切斯特）建立了一个新的行省首府，那里的一座献给业已神化的克劳狄的纪念性庙宇，成为每年在城里召开的新行省议会的中心。一些不列颠人发现他们被腐败的罗马官僚所剥削，这些官僚甚至连先前的罗马代理人也不放过。其中一位叫伊克尼（Iceni）的不列颠人发现他们贵族的土地被无偿没收，这与预期的罗马管理行为相反。反抗罗马不公行为的呼声引发了一场由他们的女王波狄卡（Boudicca）领导的较大规模的起义。人们攻占了凯缪勒敦努姆（Camulodunum），并杀死那里的罗马和意大利人，同时克劳狄庙成为破坏的目标。这样，皇帝神性的象征就成为起义者愤怒情绪的聚焦点。在日耳曼和高卢发生的类似地方性起义中，加入了本土主张，即包括宗教在内的地方身份认同。尽管如此，没有理由认为对皇帝崇拜的抵制是意识形态的，或者在帝国西部是普遍的。新的罗马化贵族欣然热情地参与到皇帝崇拜中来，以此标明他们自己的罗马文化身份、社会地位以及与统治权力的密切关系。

一个充满神灵的世界

罗马世界是个充满神灵的地方，这反映出帝国自身的多民族特征。当然，这些神祇并不都是平等的，正如帝国的所有居民并不都是平等的一样。虽然希腊和罗马神祇的名字在帝国文学中随处可见，却并不意味着希腊化或罗马化成功地抹煞了其他群体原有神祇的特性。几个世纪以来，希腊人和罗马人曾致力于在他们的神祇和邻人的神祇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这个被称作希腊的解释（interpretatio graeca）或罗马的解释（interpretatio romana）过程，容许本土的宗教传统——如果不是在实践上，就是在想象中——融入希腊-罗马神话解释中。这也许能让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以亲近的感觉去关注一个多样的宗教世界，他们的对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本土崇拜与帝国的主流文学神话故事联系起来。虽然这在一个充满神和不同仪式习惯的世界中，有助于使地方神祇适应一致的知识体系，但现实情况是极其复杂的，神祇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仍然是生活中的一个现实。当每一个人——包括罗马人自己——继续把宗教崇拜看做地方社会不可侵犯的权利

时，大部分地区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宗教排他主义和认同感。罗马自身复杂的仪式规则及神圣律法（ius divinum）与非罗马公民无关。它们没有被强行施加到非罗马人身上，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正如罗马人不同于其他人并按自己的一套国家法律生活一样，他们遵照自己特殊的传统崇拜他们的神。他们希望其他人同样可以尊崇他们自己的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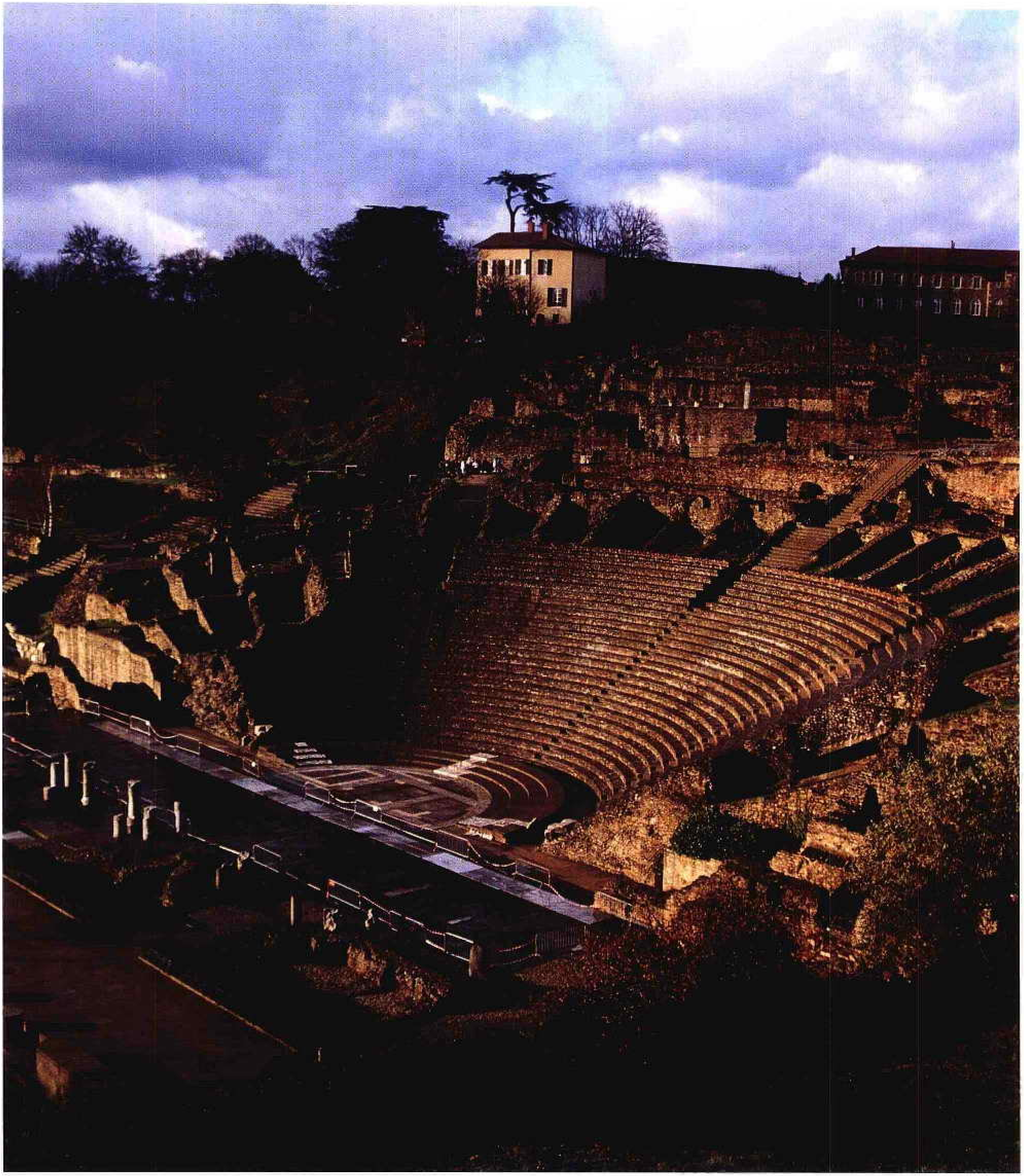
在西部地中海世界，罗马人遭遇到业已确立的中东神庙崇拜，即崇拜类似于古典希腊-罗马神祇的部落神以及各种地方自然神的本土宗教。迦太基人的宗教在很多方面与罗马人相似，虽然前者是由腓尼基人的城市崇拜变化而来。面对遍布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类似崇拜中的男神、女神，罗马人可以采用希腊人先前曾用来把罗马神祇转变为他们的希腊对应者的同样转换手法。这样，布匿的神祇巴尔·哈蒙（Baal Hammon）、塔尼特（Tanit）、塞卓帕（Shadrapa）和迈尔夸特（Melqart）就分别以萨特恩（Saturn）、朱诺·卡勒斯提斯、巴库斯和赫丘利而闻名，但名称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布匿的宗教信仰完全为罗马宗教信仰所取代。在罗马宗教中，朱庇特是最高神，而萨特恩这个古老的与努玛国王相联系的意大利-罗马神祇则是微不足道的，这主要因为在12月中旬举行的狂欢节——农神节（the Saturnalia）而为人所知。然而在北非，与萨特恩的重要性相比，甚至朱庇特也黯然失色——那里出于对神的崇敬，许多孩子以萨特恩命名。这非常清楚地表明，即使在神祇的名称被拉丁化以后，布匿宗教信仰和习惯的基本体系仍然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不该过高估计无论是布匿还是罗马的宗教改变那些乡村居民的宗教信仰和习惯的能力。在北非，无论是迦太基人还是罗马人，都没能彻底改变贝贝尔（Berber）土著居民对本地自然神灵的信仰，而据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itine）说，这些神灵在5世纪时甚至还受到基督徒的广泛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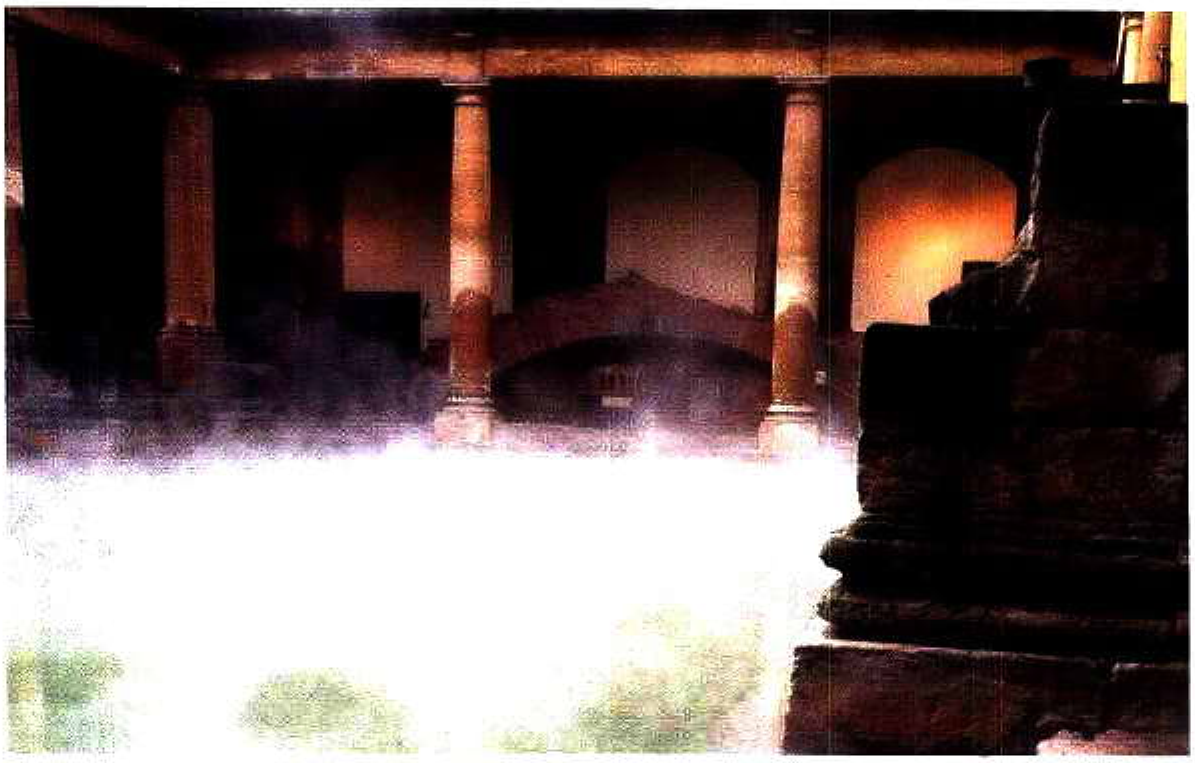
一件罗马玉雕，表现克劳狄封神的情景——一个有翼的胜利女神把神的花冠戴在已故皇帝的头上。原来的玛瑙宝石是在1世纪雕成的，在17世纪被放置在现在的背景当中。皇帝对神化的态度从轻率的实用主义到完全的疯狂不尽相同。

巴特的萨莉斯崇拜这个著名事例表现了罗马人与自然神之间的典型遭遇。一位太阳女神（爱尔兰的 suil）是掌管温泉的当地神祇，尼禄统治时期在温泉之上建造了一座世界闻名的温泉胜地。萨莉斯温泉（The aquae Sulis）成为一个疗养的国际胜地，常去光顾的罗马人把它与医疗之神密涅瓦（Minerva medica）联系起来。在官方名称中，这位凯尔特人的女神结合了罗马的密涅瓦：萨莉斯·密涅瓦，但这个双重名称并没有证明在巴斯城对这位神的崇拜方式必然与前罗马在这样一个重要地点的宗教习惯类似。

高卢同样富有自然之神。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知道大约四百个前罗马凯尔特神祇：丛林、泉水、洞穴、山峰神以及诸如此类事物的守护神。恺撒和其他后来的罗马观察家通常用罗马的解释把这些神转化为使他们的希腊-罗马读者熟悉的更人格化的形式。这样，条塔特（Teutates）变成墨丘利，比林（Belen）变成阿波罗，伊修斯（Esus）变成马尔斯，塔兰尼（Taranis）则成为朱庇特。这种宗教融合形式与其说是在已有宗教崇拜形式中制造一种混合物，不如说最终导致了本地神祇的彻底罗马化，直到几乎没有原来的信仰和习惯存在。有趣的是，这些地点很多后来成为古代晚期当地（基督徒）高卢-罗马殉教者的神殿所在地。



坐落在法国里昂的罗马剧场。剧场是罗马殖民地遗迹的一部分。里昂还有一座围绕圣坛（每年用来对罗马和奥古斯都进行集体崇拜）的同盟者的神殿。一年一度的祭司选举、与庆典有关的角斗比赛以及此时举行的行省议会的会议，都使里昂成为最富有的高卢-罗马贵族巨资捐献的中心。



在亚翁河旁的巴特（Bath），蒸汽从得到重建的罗马浴场的天然热水中升起。这个镇以阿奎萨莉斯（Sulis，根据当地凯尔特神萨莉斯命名）为罗马人所知，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一个温泉疗养圣地。泉水在欧洲有作为神圣场所的古老传统（前罗马和前希腊）。巴斯的热水赋予这个地方以额外的重要性。

国际性神祇

对这些罗马化的布匿神祇和凯尔特神祇的崇拜，大部分被限制在他们自己的家乡地区。这些神祇在外地势力很小。然而从希腊化到罗马时期，一些原来土生土长的神祇设法获得了国际知名度和尊崇。其中很多来自小亚、中东和埃及，有着东方血统。这些神祇如何充分地与罗马原来的神祇、帝王权力相竞争也许看起来很奇怪，但在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帝国中难免会发生宗教的变化。罗马的城市成了世界性场所，不同的团体把他们的地方神祇和崇拜形式带到这里。罗马的统治使内部移民的高度发展成为可能，而且有时是不可避免的。

移民中有希腊民族的人，他们很多是作为战争俘虏或者到新权力中心寻找机遇的商人来到罗马的。希腊化产生了为数更多的讲希腊语的人群，他们作为商人、士兵和文化传播者的重要性在帝国时期变得日益明显。其中叙利亚人把自己的宗教崇拜带入了西地中海。在罗马时期，大量自称叙利亚血统的神祇的广泛传播，既与东方作为宗教权威的强有力来源的普遍声望有关，也与这些希腊语叙利亚人的进取精神和在地理上的广泛分布有关。

在叙利亚诸神中获得普遍名声的是巴尔·哈达德（Baal Haddad），他和配偶阿塔格提斯-阿斯塔特（Atargartis-Astarte）在位于现代黎巴嫩的古代腓尼基城市巴贝克（Baalbek）受到崇拜。这座城市成为罗马人的殖民地后，被重新命名为希里奥波里斯（Heliopolis），于是这位当地的巴尔以希里奥波里斯的朱庇特（或希腊的宙斯）而闻名。供奉着他的金像的宏大神庙组合逐渐被外地人作为一个权威的神谕发布地来崇拜，甚至罗马皇帝也前来咨询。这位以朱庇特·奥普提姆·马克西姆·希里奥波里塔努斯（Jupiter Optimus Maximus Heliopolitanus）而为人所知的神，在群众的想象中被转化成一位支配一切事物的宇宙神。而且，甚至一个来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的无名巴尔神，也可以在这种宗教机会平等的世界中追求超乎寻常的地位。朱庇特·道利克努斯（Jupiter Dolichenus）起初是赫梯的天神，最早在科玛盖尼的一个卑微的小镇受到尊敬，如今则得到东南部土耳其人的崇拜。罗马时期，这位曾经的巴尔身穿护胸甲，手持一对战斧，以战神的面貌出现。他还炫耀朱庇特·奥普提姆·马克西姆·道利克努斯的光荣称号——这是该地方神祇要求与罗马主神分庭抗礼的一个并不微弱的暗示，更不用说他的来自希里奥波里斯的叙利亚表亲了。这位道利克努斯神甚至有一位安纳托利亚圣母——在拉丁文中称为朱诺——作为配偶。他的崇拜遍布帝国，祭司和热切的支持者在罗马为这位神捐献了两座神庙。他的追随者主要是东方人，其中很多是士兵，后来军队中的其他人也加入了这个队伍。随着这些拥护者从帝国的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这种崇拜

尤里乌斯·恺撒论高卢人的神祇

在众神中，他们尤其崇拜墨丘利。那里有他的大量神像，他们声称他是所有手工艺的发明者，也是所有道路和旅行的向导，他们认为他有赚钱和经商的特殊能力。在他之后，他们崇拜阿波罗、马尔斯、朱庇特和密涅瓦。对于这些神祇，他们有着和其他国家大致相同的观点：阿波罗祛除疾病，密涅瓦给予艺术和手工艺的原则，朱庇特统治天空，马尔斯掌管战争。在决定参与战斗后，他们通常向马尔斯许愿奉献他们可能在战斗中得到的各种战利品。

奥古斯丁谈及瓦罗的误解

但是他们的瓦罗（他们不可能从他们的人民之中找到比他更博学的人）认为犹太人的神是朱庇特，并断定只要理解同一件事，以什么方式祈求并没有区别。我相信，他被他的崇高所威慑。因为通常罗马人所崇拜的神没有比朱庇特更高的，如他们的卡皮托林三神庙所充分证明的那样，并认为他是众神之王，因此当他看到犹太人崇拜一个最高神祇，他不可能设想到除了朱庇特之外的任何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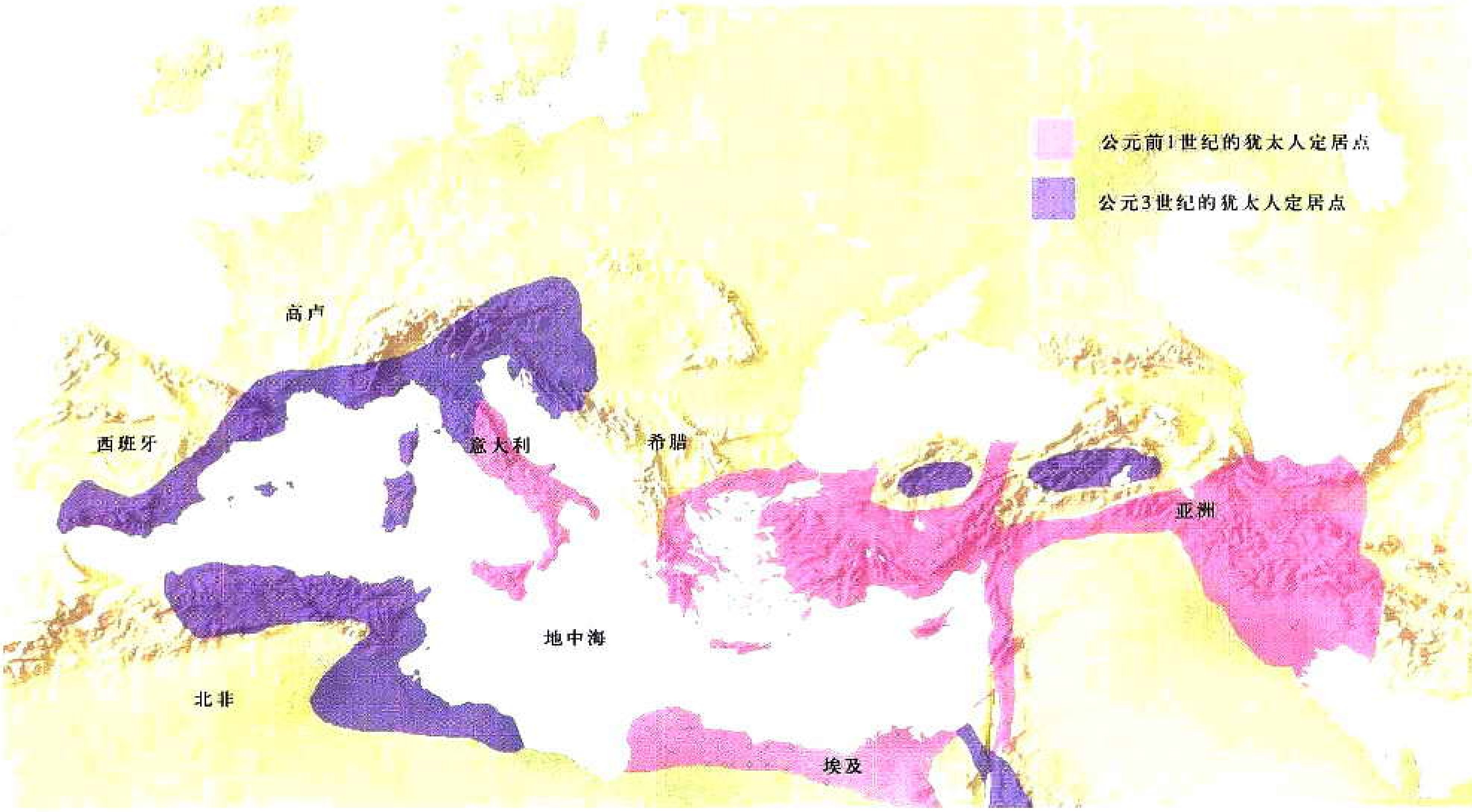
摘自希波的奥古斯丁所著《四福音作者的和谐一致》Ⅰ卷22章30节

被带往各地。人们有时把朱庇特·道利克努斯与朱庇特·希里奥波里塔努斯合并在一起，他们两个得到尊崇的证据从其叙利亚家乡远至不列颠、高卢和日耳曼都可找到。

犹太人之神

犹太人的耶和华当然也是成功吸引到众多群众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神祇中的一位。犹太人从希腊化时期就因为他们古老的宗教而闻名。庞培的东方战争为罗马输入了大量犹太俘虏，加上在罗马世界的沿海城市和美索不达米亚定居的犹太人，形成了分布范围极广，由共有神庙崇拜所联结的犹太人聚居区。66年至70年发生的犹太人起义是一次大伤元气的事件，随着犹太人的民族献祭仪式中心耶路撒冷的第二神庙的被摧毁而结束。此后犹太人继续在地方上的犹太教会堂集会，并遵循已经消失了的神庙的象征仪式进行崇拜。有趣的是，甚至非犹太人也寻求犹太人的上帝给以力量的眷顾，一些人甚至成为“上帝的敬畏者”，即一种异教徒或非犹太人，他们在罗马世界实行某些犹太律法信条而不是它的全部。犹太教上帝的力量还以其他形式表现，比如发现于埃及纸草上的巫术符咒。犹太人本身，尤其是摩西的形象，一般被人们看做是法力高强的巫师。

由于罗马帝国更加稳固地控制了地中海地区，以至犹太人聚居区分布更加广泛。从公元前1世纪起到公元3世纪末，很多犹太人已经定居于地中海东部的沿海地区，到帝国气数将近时，犹太人逐渐向西部移动。



犹太人起义

罗马官方尊重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并给予他们信仰的自由，但犹太人与他们的非犹太邻居之间一再出现的紧张关系，以及对罗马人在犹太支持一个贵族神权政府的不满，最终导致了起义爆发，造成残暴的镇压以及罗马人极力对犹太教活动与传播加以短期的压制。

埃及诸神

埃及宗教是吸引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另一种土生土长的传统，在他们看来，它是相当古老和奇特的。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时代开始，到尼罗河的游客就惊异于他们所遇到的那些巨大建筑物，惊异于那块土地及其习俗的古老——它们由不同等级的神庙祭司通过象形文字——一种神秘的圣书字体来维护。亚历山大大帝对位于现代利比亚的西瓦绿洲的阿蒙（Ammon）神谕之所进行的著名拜访，确立了这位特殊的埃及神祇作为权威性的预言发出者的声誉，使之可以与德尔斐的阿波罗或多多纳（Dodona）的宙斯相提并论。尽管希罗多德和其他人通过希腊式的解释，努力解读埃及宗教，希腊人和罗马人仍然认为大多数埃及神祇与自己的神祇有着很大不同。许多埃及神祇带有动物特性，并以动物形象表现出来，使喜欢人格化神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避而远之。某些地方宗教仪式在外人看来也很古怪；保存鳄鱼和其他神圣动物的干尸说明埃及人崇拜死去的动物，这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是埃及人民迷信愚行的一个确定标志。但长期以来，埃及人拥有其所有习俗与其他民族相反的名声。这种基本前提使希腊人与罗马人同样不愿意，干涉土生土长的埃及宗教传统，不管它们多么古怪和让人厌恶。相反，希腊化希腊统治者和罗马皇帝们细心扶持许多埃及崇拜，作为回报，他们被当地人看做是本国的法老以及埃及土地的合法统治者。

萨拉匹斯崇拜

埃及作为令人印象深刻的异族智慧的发源地享有巨大声誉，这意味它的很多神祇最终会在非埃及人中找到崇拜者。萨拉匹斯（Sarapis）就是这样一位神祇。奥西里斯神、阿比斯圣牛奥色-阿比斯（Osor-apis）——一位地下世界之神，在希腊化时期合并成为希腊化的萨拉匹斯。他在托勒密国王们的支持下来到亚历山大里亚。这些国王把自己的王权与这位神祇联系起来，于是给予他“宙斯·萨拉匹斯”（“Zeus Sarapis”）的称号。出现在地中海诸城市中的萨拉匹斯是一位威严的大胡子男性神形象，使人强烈地联想到宙斯的形象。然而，在神话术语中，希腊人很难精确地把他与已知的希腊神对应起来，因此就把它看做宙斯、狄奥尼索斯、阿斯克列庇奥斯、甚至普鲁图等不同的神。治病救人仍然是萨拉匹斯神的主要职能，那些渴望求神治病的人来到他的神庙，通过医疗梦幻，即一种人们所知的“潜伏”过程得到神奇治疗。虽然在孟菲斯有一批世袭的埃及祭司们坚持对阿比斯圣牛的崇拜，但在埃及以外，这种崇拜呈现为不同的形式，并拥有自愿组成的宗教团体的追随者。萨拉匹斯的希腊式崇拜在更为广阔的地中海世界成为得到非埃及人群拥护的第一个埃及宗教。希腊化国王和以后的罗马皇帝向萨拉匹斯效忠，韦伯芗在追逐皇权及其合法性时，甚至宣布自己就是一位“新萨拉匹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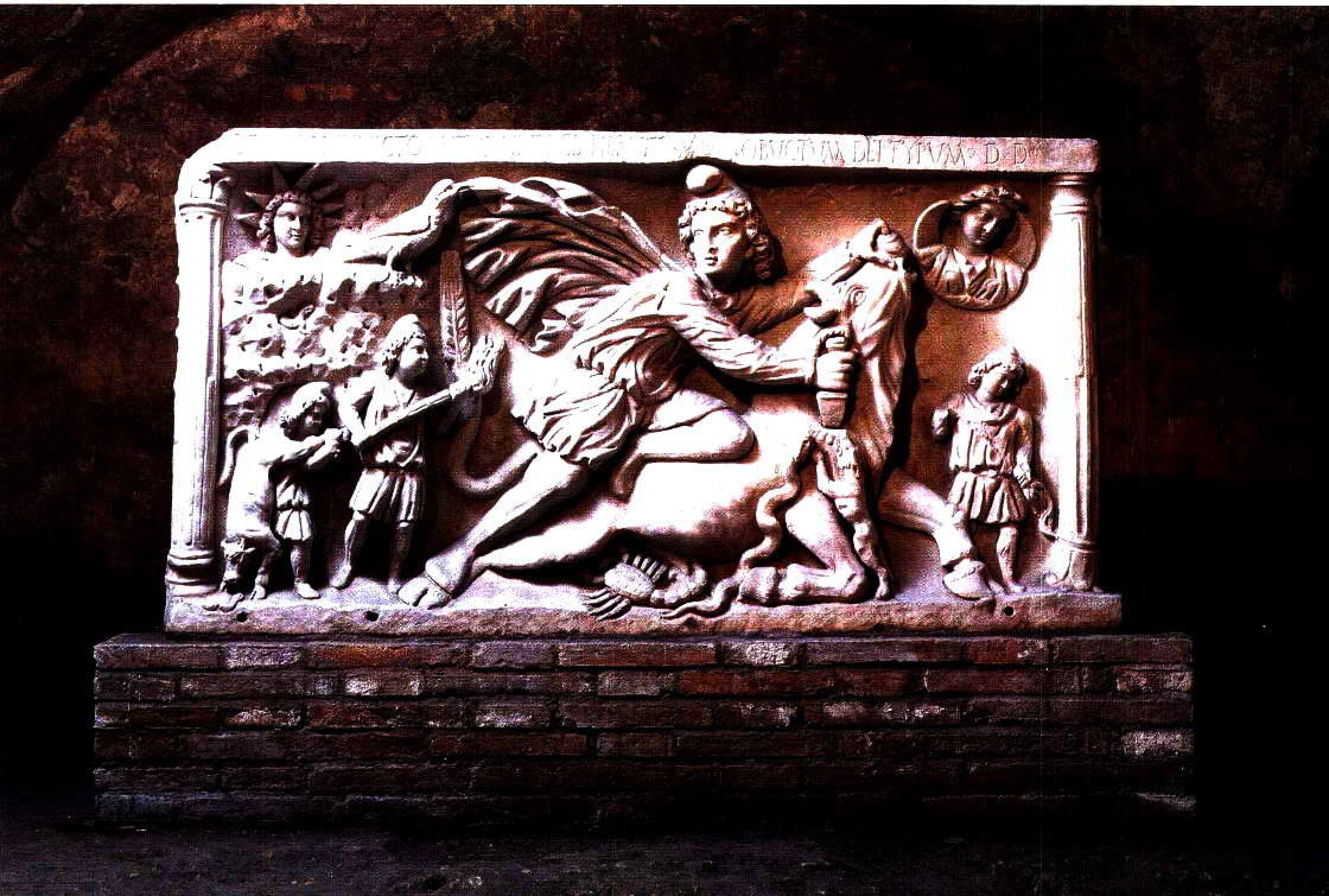
伊西斯崇拜

伊西斯（Isis）是闯入国际舞台的另一位重要的埃及神祇。公元1世纪，维特鲁维乌斯认为所有意大利城市都有萨拉匹斯和伊西斯的神庙是理所当然的。伊西斯是荷鲁斯（Horus）的母亲和奥西里斯（Osiris）的配偶，在埃及神话传说中，她为了恢复丈夫被肢解的身体找遍了大地，这是一个明显与丰产和谷物每年的“枯”“荣”有关的神话。希腊化埃及祭司以希腊形式对她的故事加以改造，于是女神开始作为一位凌驾于自然力量之上法力无边的救星流行开来。伊西斯首先在法罗斯岛的亚历山大里亚得到承认，以航海者的保护者身份出

现。在罗马，她一年一度的庆典是为了庆祝航海季节的开始。在所有她的崇拜扎根的地方，包括在她位于马提乌斯校场和庞贝非常著名的神庙当中，伊西斯都伴随着具有埃及风格的人员和礼器，以便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她身上凝聚着埃及人所有令人敬畏的宗教气氛。伊西斯作为一位埃及女神的形象，与作为其法力远远超出本土范围的一位保护与救助女神的声名之间，达到了和谐。一份拉丁铭文称她为“支配万物之神”，而阿普雷在他的《变形记》中，更为她精心编造了一套溢美之词：“天堂的第一位生命，诸男神、女神的惟一体现，密涅瓦、维纳斯、狄安娜、普洛斯佩瑞娜（Prosperina）、塞瑞斯、朱诺、布鲁娜、赫卡特（Hecate）、涅麦西斯（Nemesis）等众神之母，在埃塞俄比亚和埃及，她真正的名字是伊西斯女王。”

在现代作品中，伊西斯与米特拉斯（Mithras）经常作为罗马人最欢迎的两位东方神祇被相提并论。在圣像中，米特拉斯是一个身穿波斯服装、头戴弗里吉亚帽子的东方人形象，经常出现于宰杀公牛的仪式中，这是他在遍布罗马世界的神殿中的主要形象。关于他的出身仍存在争议。最近的理论认为，由《吠陀经》获悉，他起源于一位原始的印度-伊朗神米特拉（Mithra）；或者把他视为在希腊化时代塔苏斯的斯多葛派学者的发明，这是他们对其所发现的天体异常现象的一种反应；或是莱茵地区或罗马东方边境人（科马盖尼人）的发明。一些人甚至主张是罗马自己发明了这个“外邦”神祇。无论米特拉斯出于何处，对罗马人来说他以世界的拯救者的形象出现，他对于另外一种主宰宇宙的基本力量的胜利，是通过常见的杀牛场景来表现的。对他的崇拜在2、3世纪颇为流行，尤其是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以及罗马和奥斯提亚。像伊西斯崇拜一样，米

罗马圆形大竞技场的一块石雕，主要形象是正在宰牛的米特拉斯。由于强调个人和自身的“拯救”，米特拉斯教是一种理想的兵营宗教。与国家崇拜不同，这种信仰体系的基本要素可以被简化为一些象征性的生动偶像，比如蝎子。它们容易为没有文化的皈依者所理解。



特拉教是一种分等级的神秘宗教，通过神秘的入会仪式，皈依者可以达到与神更密切的联系。在19世纪晚期，历史学家厄内斯特·雷南（Ernest Renan）提出了有名的理论，认为米特拉斯崇拜在功能上与基督教相当，如果不是后者的胜利，它将征服罗马世界的其余部分，但米特拉教只吸纳男性这一事实使它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作为一种互助组织，米特拉教鲜明的教阶结构使人联想到罗马军队和行政当局，它从这两个组织当中吸纳了大批信徒。当这些组织中的某些人升迁到具有更高权力的职位时，对米特拉斯的崇拜最终会得到帝国的支持，并与无法战胜的太阳崇拜结合在一起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见下页）。

寻求一种帝国宗教

212年，卡拉卡拉皇帝授予罗马世界的所有自由居民以罗马公民权，其明确的目的是把所有人统一到对罗马神祇的共同宗教信仰中。对颁布该法令的背景的更为仔细的考察说明，这项安东尼法令意欲通过增加交纳罗马财产税的人的数量来提高国家的收入。即便如此，这种变化仍然有效地使罗马人的宗教成为帝国每一个人的宗教，以至卡皮托林三神如今甚至出现在此前几乎没有罗马化的埃及乡村，但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削弱了地方神祇的崇拜，因为按照规定，所有的行省——如今也包括罗马人，都将继续崇拜它们以及罗马的神。同样地，个人并没有因为卡拉卡拉授予罗马公民权而放弃他们本城市的公民权，而是由此立刻成为——譬如说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他们共同的城市的市民，对它们都要尽义务。

帝国早期建立统一神系的努力并没有产生一个普遍性的帝国宗教，但却出现一些神祇，他们的拥护者为他们要求越来越多的荣誉，从而事实上产生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男神、女神，其势力被认为扩展到罗马世界的所有居民。对帝国所有神祇集体的认识，因在麻烦丛生的时期明显需要神祇的关照而得到加强。从皇帝们开始，培植一种“众神的和平”（“Pax deorum”）的努力统一了帝国人民的宗教、政治利益。宗教融合成为集中神的力量的一种方法——可能从来没有太多的神站在一方的立场上。根据《奥古斯都史》，塞维鲁·亚历山大在他罗马的私人小礼拜堂里放置着家神和已得到神化的皇帝们的塑像，与泰纳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基督、亚伯拉罕（Abraham）和厄尔蒲斯（Orpheus）的雕像并肩而立。

长期以来，精英的哲学思索已经接受了一个逐渐增长的信念，即在多神教的众多神祇背后隐藏着一种更根本、更单一的神力。哲学家们还首先起来反对神人同形论，他们把宙斯与人私通解释为一种精神的比喻，而不是有关神的真实做法如何——也就是说，淫荡的故事。一些人发现很难接受人们去崇拜人为制造出来的偶像这一事实，他们宁愿选择把特定的本地神看做潜藏于宇宙万物之下的单一神力的发出者，但这些关于神性的非传统观点没有引起公开冲突。与信仰相比，多神教更重视参与，而且古代哲学家一般并不背弃公共宗教习惯，即使他们也许在自己的作品或私人生活中强调个人精神祷告和献祭。

在宇宙中寻求一种单一神力的政治、哲学倾



卡拉卡拉皇帝的半身大理石雕像，作于3世纪早期。此处刻画的全副武装的形象受塞维鲁王朝的影响。卡拉卡拉有正当的经济理由把公民权扩展至所有的人。提升罗马宗教只是提高帝国税收的借口。

向在对太阳神索尔（Sol）的崇拜中达到顶峰。索尔·尹狄是罗马人及其拉丁邻居所崇拜的一个早期意大利神祇。希腊的赫利奥斯（Helios）在意大利当然也很出名，阿波罗也是如此。奥古斯都在帕拉丁山上为太阳神阿波罗建造了一座神庙，而尼禄则经常自称为赫利奥斯。102年，第一位中东地区的太阳神来到罗马，在2世纪中期首次出现了"不可征服的太阳神"（Sol Invictus）的尊称。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把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光轮加到自己的皇帝像上，从此，塞维鲁王朝的皇帝们都被称为尹维克提（invicti，不可征服者），这是一个通常与太阳神索尔相联系的头衔。

决定性的影响也许来自塞普提米乌斯（Septimius）的妻子朱利亚·多姆娜（Julia Domna）和她的姊妹朱利亚·美萨（Julia Maesa），她们是叙利亚埃麦沙的太阳神埃拉加巴尔（Elagabal）的高级祭司的女儿。塞普提米乌斯的孙子法里乌斯·阿维图斯（Varius Avius）在登上皇位前曾是埃拉加巴尔的祭司，因此当他于218年至219年来到罗马时，带来了这位神祇著名的黑色石柱，他把它与迦太基的塔尼特或朱诺·卡勒斯提斯的神圣象征物一起放在帕拉丁山的一座神庙里。这位充满热忱更为人所知的是名字为埃拉加巴鲁斯（Elagabalus）的皇帝，把朱庇特·乌尔特（Jupiter Ultor）神庙改名为朱庇特·维克特（Jupiter Victor）神庙，由此在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叙利亚的解释（intepretatio syriaca）过程中，混合了对朱庇特和索尔·尹维克图斯（Sol Invictus）的罗马本土崇拜。在埃拉加巴鲁斯统治下，索尔·尹维克图斯短时期内成为罗马的主神。埃拉加巴鲁斯使一位外来神灵不仅得到平等待遇而且优于罗马本土众神的行为，极大地冒犯了罗马的罗马人的感情，以致于他被暗杀以后，后继者亚历山大很快把神庙重新奉献给朱庇特·乌尔特，并打制了一个大徽章，上面刻画着朱庇特亲自选择亚历山大为罗马人的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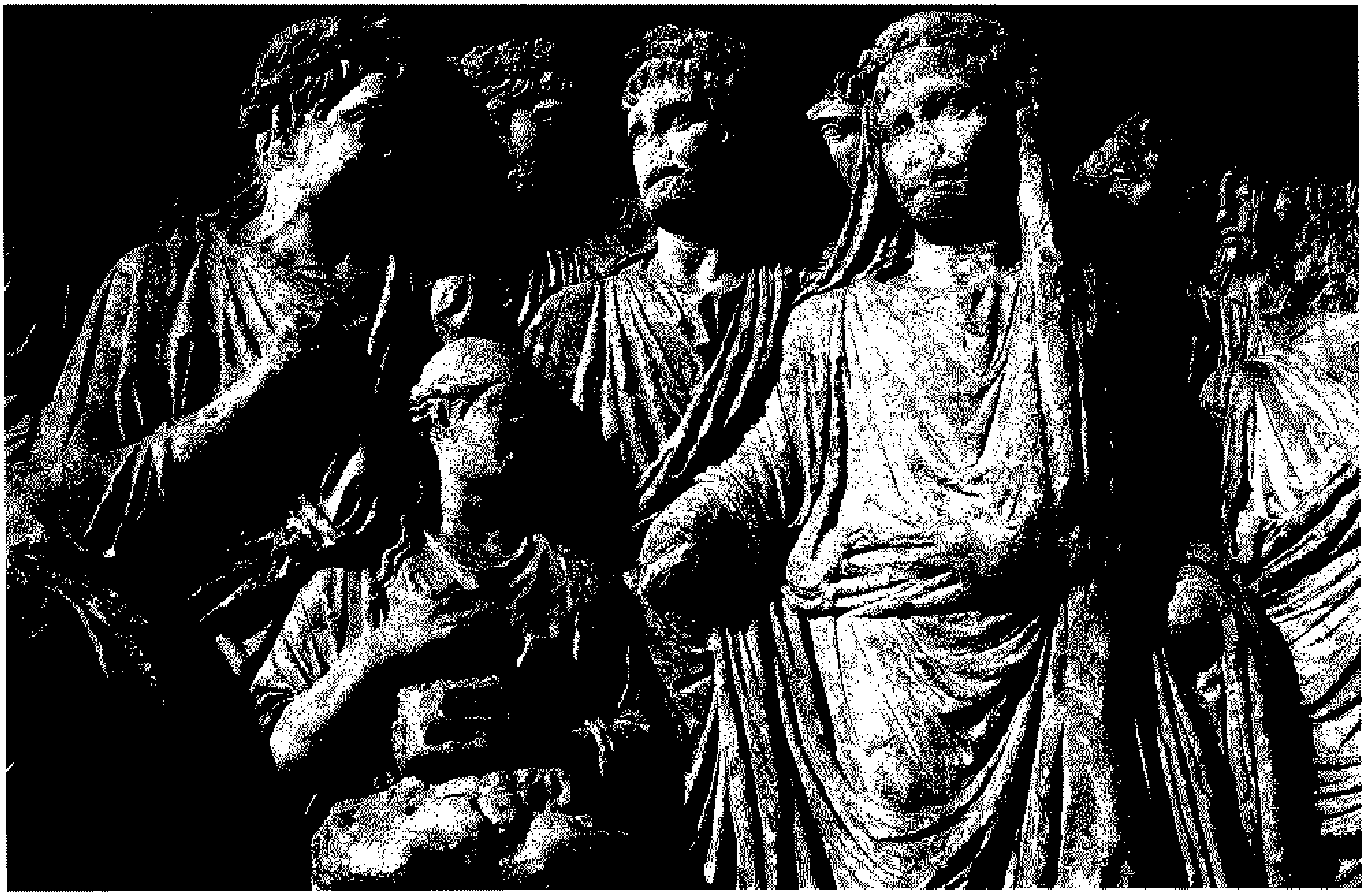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塞维鲁通过遣返埃拉加巴尔和塔尼特的圣物，同时恢复罗马的传统神殿和祭祀地点强调自己作为古代仪式（res antiqui）恢复者的形象，但索尔·尹维克图斯的权益并不会被长时间否定。274年，奥勒良设置了另一个索尔·尹维克图斯以及一个献给神的新祭司团体，作为罗马、帝国公众和帝王崇拜的首要对象，并把神的生日12月25日作为公众假日（当然后来基督教徒把同一天作为自己的上帝之子的生日）。由于帝国当时面对的那些困难，罗马人普遍发现，设想他们所有的神都共同致力于提高和保护他们国家的幸福是更有利的，其中罗马的神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帝国晚期，皇帝对索尔·尹维克图斯崇拜的推动，时常通过把信仰引向朱庇特来加以平衡。图拉真很早以前就在本尼温图姆的拱门上展示出是朱庇特赋予他统治权的。在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时期，在位的皇帝们与朱庇特和赫丘利神甚至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以至地位较高的帝王家族的两个皇帝拥有朱维（Jovii）的头衔，而较低家族的两位皇帝则持赫丘利头衔，给出的解释是正如朱庇特统治天空而赫丘利维持地上的和平一样，这两个王室家族共同合作以保卫"罗马和平"时期的和平与安宁。

帝国之神

戴克里先在297年发出的第一道迫害敕令是针对摩尼（Manichaeans）教徒的，他把他们说成是波斯的"第五纵队"，他们误导人民并危及罗马国家的安全。303年，皇帝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派宗教团体身上，即基督教徒。随着以处理罪犯的形式处决基督教的创始人，起初作为犹太教中持不同意见的分裂团体的基督教，很快就变成在非犹太人中流行的市民信仰。这些基督教徒的邻居长期以怀疑的目光审视他们，与其说是由于他们的信仰——虽然这些看起来很是古怪——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拒绝参加公民的宗教仪式。在传统罗马人看来，对崇拜祖先之神的疏忽是无神论的本质，地方的紧张状态时常升级为冲突和迫害。很多谣言四处传播，把基督教徒描绘成热衷密仪的、嗜食人肉的人，曲解基督教对团圆宴、友好聚餐和圣餐的庆祝。虽然罗马官方并不完全相信这些控诉，但到3世纪末时，他们开始主动迫害基督徒。在此之前，罗马官员曾决定只惩罚那些引起了他们注意以及经多次要求放弃后仍坚信自己信仰的人。正是这些基督的追随者异常倔强的态度，使得像总督小普林尼及其皇帝图拉真这样开明的罗马人也要判处他们死刑。

尽管如此，基督徒并没有真正起来反抗帝国，因为他们被教导"要向恺撒臣服"。基督教崇拜与希腊－罗马那些献身于米特拉斯、伊西斯密仪的非官方宗教社团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基督徒和犹太人一样，



一块严重风化了的石雕细部，来自意大利本尼温图姆的图拉真拱门。场面描述去世的皇帝正在被朱庇特（左边）和其他神迎入众神的行列。图拉真（右边）的月桂枝王冠下罩着头巾。根据罗马艺术传统，所有社会阶层的已故市民都被描绘为戴着一块头巾。

宣称他们的神是惟一的上帝，而不是众神中最好的神。但是，犹太人能够以他们信仰的古老为其严格的一神教作辩护，而基督徒尽管百般努力，却无法使异教的官方相信他们事实上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是犹太《圣经》和犹太教地位的合法继承人。主要从多神教转化而来的基督教徒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回到他们祖先的宗教习俗并崇拜那些神祇，要么面临无神论的指控。那些选择后者的人经历了基督徒所谓的殉道，即一种为基督证明的方式，根据一些同时代人的说法，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直接获得了进入天堂的入场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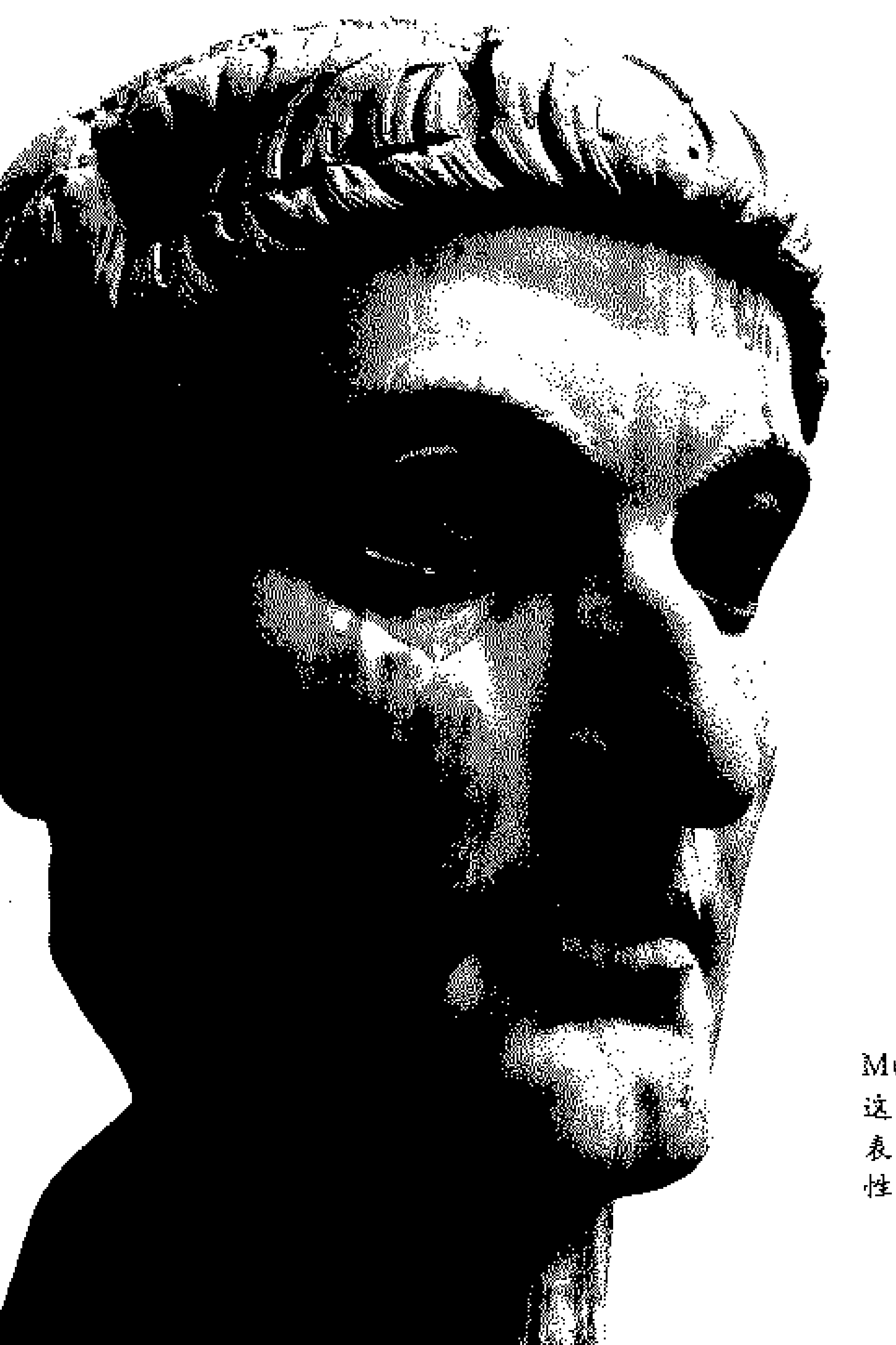
基督徒的迫害者们相信，基督徒拒绝给予帝国众神以应有权益的行为，置每个人于危险境地，因为他们已经破坏了“众神的和平”。2世纪后期到3世纪，帝国的不安定状态更加剧了这一忧虑。现在这些由于受到忽视而愤怒的神祇，通过用大量灾祸折磨罗马人民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寻找替罪羊的典型情况，但它也暗含着对基督教能使个人的忠诚转向新的不合法社会团体和理想的恐惧。很快事情变得越发明显，甚至国家协同一致的迫害也不能达到使基督徒放弃他们的愚蠢行为的目的。因此，加列里乌斯(Galerius) 在311年放弃了镇压运动，发布了一道宽容敕令，要求基督徒为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为皇帝和帝国祈祷。帝国需要所有神的共同保护，包括基督徒的神。

根据后来的记载，在312年的密尔文桥（Milvian Bridge）战斗前夕，君士坦丁在梦中得到指示：展示基督的标志，在其引导下他将战胜敌人。接下来他对马克森提乌斯的胜利似乎证明了这一信念：基督是战争胜利的使者，是一个值得雄心勃勃的统治者扶植的神。君士坦丁说服当时东方的同僚、异教徒李锡尼乌斯，他们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批准对整个帝国的基督徒采取容忍态度。所有神祇能够以某种方式共同发挥作用的

基本想法并没有维持很久，但它的一些潜在观念却非常持久。第一位基督教皇帝于312年接受基督教纪年以后，继续发行带有索尔·尹维克图斯肖像的钱币，他把这位神祇与罗马国家的繁荣联系起来。在他的新城市君士坦丁堡，甚至树立了一尊自己的雕像，头戴饰有太阳光线的王冠，手执一道霹雳。这也许是不同信仰的结合在起作用，或更可能是一种证明，即君士坦丁以一种符合大众口味的方式，聪明地利用传统象征来表现自己的新神，但从长远来看，基督教严格的一神论难以容忍任何实用主义的调整，因为基督教徒的上帝不能容忍任何平等者。对于基督徒来说，多神教徒的众多神祇根本就不是神，而是邪恶的魔鬼。君士坦丁虽然做出一些变动支持基督徒，却很少采取实际行动来割断帝国与它的众神之间的联系。迄今为止，帝国与教会之间还没有建立起明确的联盟。

直到数十年之后，基督教皇帝们才最终把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最先采取的若干步骤是反对基督徒认为最让人厌恶的那些宗教习惯，比如奉献动物牺牲。起初是取消了公共献祭，后来连私人献祭也被禁止。没有了这些，神灵崇拜的仪式就无法实行，而官员和皇帝作为通常代表集体献祭的祭司的观念也就根基不稳了，于是联结罗马国家和神灵崇拜的整个纽带便慢慢松开了。君士坦丁曾经授予基督教神职人员与担任祭司职位者享受相同的免税权。396年，他的继任者开始剥夺异教祭司的免税特权。对传统祭司集团的排斥随着格拉提安（Gratian）放弃大祭司长头衔而得到强化，大祭司长是自奥古斯都时代起所有先辈皇帝们担任的一种职务。还是这位皇帝，下令去除坐落于罗马元老院的胜利祭坛，这使异教元老们极为沮丧，比如时任罗马市行政长官的老叙马库斯（Symmachus）。他为恢复圣坛辩护说，甚至是一个基督教的帝国也需要胜利，但最终他的对手、米兰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的观点获胜，圣坛再也没有恢复。

人们采用很多形式对诸神加以崇拜，这长期以来都是罗马社会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彻底分清什么是宗教、政治、社会和文化是不可能的，但基督徒仍坚持不懈地挑出旧社会的某些成分作为异端，从而加以破坏，甚至曾经改变为神庙所在地的自然景区，也被诅咒为恶魔所有的、不洁的地方。基督教维持教会纯洁的人员起了带头作用。392年，在亚历山大里亚主教提奥菲鲁斯（Theophilus）的领导下，当地基督徒砍掉萨拉匹斯神像的头颅并毁坏了他的著名神庙。当看到这种不合法行为没有受到惩罚，其他地区的基督徒纷纷起而效仿。现在甚至埃及乡村的很多献给神的神殿、神庙，也一座接一座地被毁坏，而它们曾经躲过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到来时的劫难。在埃及以外的地方也是如此。很快皇帝宣布，郊区的神庙规定一个开放日期，而城市里的神庙在不毁坏的情况下暂时关闭。总之，这些发生在4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的事件成为一个分水岭。那时罗马公共官员集体背叛了他们的古老神祇，宣称献祭的习惯仪式是一种可憎的行为，传统宗教本身是一种迷信，但并不是所有东西在一夜间都改变了。神的庆典日曾长期规定着很多地区每年的生活节奏，这些共同的仪式在很多地区坚持到神庙关闭、献祭停止以后。有一些被重新命名，以消除与异端宗教信仰之间的任何有害联系。另一些，比如1月的第一天或新年庆典，越来越被看成没有宗教色彩的“世俗”节日。



君士坦丁大帝的巨大石头头像，现存罗马康舍瓦托利宫博物馆（the Museo del Palazzo dei Conservatori）。为了借助严格的尺寸来表现威严，这尊肖像几乎没有显示出个人的细部特征。在四帝共治制下，艺术服务于表现奥古斯都和恺撒们的一致和永恒权力，而不是用来表现个人外貌或个性癖好。

这些变化发生在一个不稳定的时期，此时的帝国遭受到一个又一个屈辱的失败：378年，瓦伦斯（Valens）[①]在亚德里亚堡战役中被哥特人打败并杀死；410年，罗马城遭到阿拉里克[②]的军队的劫掠；439年，“非洲的罗马”迦太基陷入日耳曼汪达尔人[③]之手。随着罗马人曾享有的神佑的消失，一些人哀叹不幸时代的来临，谴责献祭仪式的普遍废除及对“众神的和平”的破坏。在随之而来的相互辩论中，罗马与诸神之间关系的整个历史又被重新加以审视。希波城人奥古斯丁的巨著《上帝之城》（*City of God*）利用罗马的文物和历史文献，首先说明罗马神灵从未很好地支持过罗马人，他表达了辩论一方的意见，但他的论点从断言罗马甚至在给神奉献祭品时也经常遭受不幸转向了更为激进的观点，即声称在神助和尘世繁荣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存在。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上帝甚至允许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以便使他们的灵魂接受教导，并阻断他们对短暂的世上城市的任何依恋。他所持的放弃支撑着“神的和平”的传统宗教模式的愿望，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大部分人坚信罗马帝国的新上帝也是一位拯救之神，他回应祈祷者并保护他的子民。地方上的基督徒继续把基督和殉道者作为自己专门的保护者。而在罗马城本身，使徒彼得和保罗被提升为永恒罗马（Roma aeterna）的新双神狄奥斯库里（Diosuri）及共同保护神。一个基督教帝国最终在“上帝的和平”的保护下出现。它最早的支持者之一，教会历史学家及君士坦丁的传记作者，恺撒里亚的优西比乌斯认为，天意在联合帝国和基督教的命运中发挥作用，这清楚地体现在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统治期间耶稣的降生中。君士坦丁的统治开始了一种联合，它在下一个世纪得到深化。到4世纪后期，信仰不相一致已经成为一种可由国家进行惩罚的民事犯罪。异教徒和摩尼教徒忍受这些法令的正面冲击，而犹太人却比以前更多地被局限在自己的宗教习惯中。在提奥多西乌斯一世（Theodusius 1）统治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正统信仰的基督徒会被作为异端而遭到迫害。坚持一套规定的对神灵的正确信仰已成为良好罗马公民的标志。由于这个原因，曾存在于多民族和多神教罗马帝国的宗教宽容精神，开始让位于对单一的一神论教义的积极执行。



意大利别墅上的山墙中楣，由安卓·帕拉狄奥（Andrda Palladio）设计，描绘了基督徒在罗马皇帝的脚下被处死的情景。从尼禄统治时期开始，基督徒就成了任意处置的替罪羊，他们的新宗教没能获得犹太教得到的那种有限的宽容。罗马人由于犹太教年代久远而认为应该得到尊崇。

普罗登提乌斯（Prudentius）为基督教罗马祈祷

主啊，您把这座城市赐予您的罗马人，通过您的赐予，所有其他城市将统一在一种崇拜之下，这座城市才可能成为基督教的城市。帝国各地在信仰上已联合起来，它所征服的世界正在逐步成长，但愿它的都城也是如此。但愿她看到远处的土地正统一在一个受神恩宠的国度之中，但愿罗慕路斯成为一位忠实的信徒，让努玛自己现在信仰……离开淫逸的朱庇特，他用性玷污了你的姐妹。让罗马自由，避开那些现在已是基督的子民的人们。保罗从这里放逐你，彼得的鲜血驱逐你，尼禄的恶行——为此你曾把剑置于他手中——将报应在你身上。

普罗登提乌斯：《殉难的王冠》（Prudentius Crowns）2.4.33

① 罗马皇帝（364－378年在位）。——译注
② 古代日耳曼人一支西哥特人的首领（约370－410年），多次攻入罗马帝国并于410年攻陷罗马城，大掠三日。同年病逝，是罗马劲敌。——译注
③ 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译注





第十二章

帝国的收益

内维勒·摩利

帝国的收益

成功的征服带来巨额财富，其数额令人吃惊，例如，公元前167年，罗马打败马其顿，获得了价值1.2亿塞斯特斯的战利品。我们很难用现代的数字来量化这笔财富，但120塞斯特斯可以购买足够的粮食，满足一个人一年的基本生活需要。一个罗马士兵一年的军饷是1200塞斯特斯，而要成为奥古斯都元老院成员的最低财产资格是100万塞斯特斯。另外，马其顿地区每年交纳240万塞斯特斯的税收；西班牙银矿每年交纳3650万塞斯特斯；公元前70年，希腊和亚洲诸城邦被勒令纳贡7.2亿塞斯特斯；庞培夺取的米特拉达弟的国库储备约86亿塞斯特斯。罗马逐渐以繁荣（aurea）富足闻名一点都不足为奇。犹太教《塔木德经》（*Talmud*）中的一段话评价到："十份智慧降临到世界：巴勒斯坦占了九份，其他地方只占一份……十份财富来到世上：罗马占了九份，其他地方只占一份。"

所有的罗马公民都可以分享帝国的财富，但财富分配很不平等。最初，国家不定期征收钱、物等税收与贡赋（例如从西西里和埃及征收谷物），然后从公元前1世纪始，国家采用正规的直接税制度征税。国家也向

文艺复兴时期弗朗西斯科·凯奇诺（Francesco Cecchino）创作的一幅壁画，描绘了公元前5世纪末罗马将军马尔库斯·弗利乌斯·卡米利乌斯（Marcus Furius Camilius）的凯旋式。在早期阶段，罗马进行战争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持续存在，但经济收益确实以贡赋和战利品的形式得到了增长。



采矿业、采石业以及充公的土地征税，还有来自海关税和其他间接税的收入。征服马其顿后，罗马取消了直接土地税（tributum），普通罗马公民从中获益。罗马城内的公民也许还能分到一份作为贡赋征收的谷物，这些谷物最初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后来（自公元前1世纪起）则免费分发。他们还可以享受以征服得来的钱财建造的引水渠、下水道、剧院和其他公共建筑。

有些个人在战争中发了横财。获胜的将军控制战利品的分配，接受希望得到优待的被征服城市给予的赠礼，并将战俘变卖为奴，从中渔利——恺撒在高卢的征战产生了大约一百万新奴隶。下级指挥官、百人队队长和士兵都分到一份战利品。与此同时，一些罗马人在获胜前，甚至不管战争胜负都从战争中渔利。他们签署盈利性的合同，为军队提供食物、衣物和装备。和平创造了更多的机会，那些政治精英们有望在担任行省总督期间获取价值数百万塞斯特斯的赠礼与贿赂，而在任期结束时却只面临很小的被控敲诈、勒索的风险。西塞罗曾经炫耀他在担任西里西亚（Cilicia）总督时的诚实与正直，但仍然承认获取了220万塞斯特斯的财富；他还指控西西里总督维雷斯（Verres）三年就敛财4000万塞斯特斯，而在公元前70年他就曾指控维雷斯勒索钱财。另一些富裕的罗马人出钱购买能盈利的税收合同（这些包税商被称作“publicani”，因传闻中的贪婪和敲诈行为受到人们的普遍憎恶）和矿藏之类的公共资产的开采合同。还有一些人通过向各行省城市提供高利贷和帮助它们支付罗马征收的贡金发财致富。许多人在行省拥有大片庄园。

罗马的征服对被征服地区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死亡和沦为奴隶使人口减少，纳贡的要求使很多城市和地区陷入债务的漩涡，无数的财富被掠夺殆尽——在恺撒征服的过程中，高卢货币中的贵金属含量急剧减少。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影响很难说得清楚，尤其是罗马曾经实施了比率合理的固定税收制度，而没有惩罚性的强行征税。许多行省的税收额度还不如被征服前高，但是收取的税收现在被用在其他地方，主要是罗马和意大利，以至行省的财富被稳步地消耗殆尽。与此同时，罗马的统治给行省社会带来了各种变化，尤其是将他们纳入一个全地中海范围的帝国体系。政治独立的丧失可能以经济机会的增加得到了平衡。本章的目的不是提供罗马霸业的决算表，而是探讨罗马帝国的扩张使古代经济的传统结构的改变。

前工业经济

古代世界常被史学家描述成“前工业社会”，意在强调它与我们这样的现代工业社会之间在经济组织和运作方面的巨大差异。确实，人们有时把古代描绘成“不发达的”或甚至是“原始的”。就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建筑、艺术、文学、哲学和其他文化领域中取得的成就来看，这似乎是一种过于消极的判断，但是，这种看法显然并未打算应用于整个古典文明，而只是对它的经济结构而言。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定决定着该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的先进水平。然而，经济确实产生了剩余财富，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要，更使他们能够建立帝国、创造文化。古典文明的发展似乎格外引人注目，原因在于它是在相对原始、效率低下的生产工艺和相对较低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达到的，它们极大地限制了经济增长的潜力。

前工业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它依赖土地的物产，不仅是食物，还包括许多原材料（木材、羊毛、兽皮）以及大多数的热能和动力资源（木材、木炭、劳动者和牲畜需要的食物）。土地是有限的资源，特别是那些肥沃、易于开垦的土地，这一特点从理论上最终限制了经济发展的水平。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人们可能开垦比较贫瘠的土地，但是耕作的成本可能会超过最终的收成。此外，农业扩展到边远土地一般意味着放牧、狩猎等活动被取代，这可能给社会部分成员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提高总产量的另一种方法是提高已被种植的土地的收成，要么通过增加用于耕种土地的劳动力数量，要么通过投入更多的资金（比如购买耕牛，或者施加更多的肥料）。但是，在化学肥料发明之前，从长远来看，在没有耗尽土地肥力的情况下提高产量有一个限度。古代农民往往每隔一年就要让自己的土地休耕一次，使其恢复肥力。这对长远的生计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却又限制了古代地中海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从而限制了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

前工业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从事任何一项工作所用的动力资源都是“有机的”——首先是人类和动物的肌肉，而不是支撑现代经济的矿产能源（煤、石油和天然气）。人类肌肉的生产力，即个人在特定时间



4世纪的一个有雕刻装饰的石棺的局部，藏于梵蒂冈博物馆。这位罗马富豪将新式石棺与传统墓碑的叙事性造像糅和起来。石棺上有一幅墓主仰视的半身像，这种造型因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而流行起来。在半身像的下方，雕刻家刻画了若干在类似现代的生产线上劳动的雇工（或奴隶）。

内的劳动产出很低。如果劳动者营养不足的话，生产力就更低，而古代世界的大多数人可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个赶着牛拉犁耕地或驾着牛车的人，其生产力要高得多。然而，前工业社会可能无法饲养大量的牛，因为它们与人类争食土地的物产。富裕的地主养得起牛，不仅得益于它们的劳动，而且也能利用它们的粪便补充自己土地的肥力。最穷的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养活一头牛及全家人，他们几乎没有多余产品来供养一头牛。这样，劳动力的平均生产力就很低，它意味着剩余产品，即超过养活农民及其家人所需要的产品的数量必然也很少。现今，一个拥有一台拖拉机和一台联合收割机的农民能够生产出足够养活一百人甚至更多人的粮食，在前工业经济中，为产出足够养活另外一个非农业家庭的粮食，需要九或十个农民及其家人的劳动。

有机力量的局限性还影响到其他经济领域。几乎所有的生产都是通过手工来完成，大部分手工生产都是在小作坊或家庭中进行。规模较大的作坊当然也有，但它们只是拥有更多从事同样劳动的工人而已；当时几乎没有机会发展规模经济，而在当今世界，同时生产数百件产品通常要比生产几十件效益好得多。在较大的企业中，可能已经出现某种劳动分工，因此一个罐子可能是由一个工人制造，而由另一个工人装饰。从原毛纺布的各个工序也已独立开来，并分派给不同的工人。分工使专业化工场在效率方面比家庭生产稍高，其产品质量可能也要好一些。另一方面，稍有剩余的农民家庭还是宁愿辛勤地劳动，而不愿花钱，仍然宁愿自己纺纱织布。即使生产部门具备了扩大生产力的技术，由于对产品的需求很有限，因此限制了人们大力投资设备或生产的热情。

第三，对有机力量的依赖使得旅行和运输速度慢，费用高。在陆上，马的速度快，但驮的东西不多，而且饲养成本高，因此只有有钱人和政府官员才养得起。牛可以驮或拉更重的货物，但速度慢，因此路途很远的话，货物的价值很快就会被喂养牲畜的费用耗尽。人的速度更快，但负荷能力却不如牛，远途运输的话，给养的花费更高（需要住处及食物）。因此，大部分陆上运输往往是短途运送，如将货物运到最近的集镇、河边或海岸。水运要便宜得多，特别是运送大批货物，然而，只有地中海地区那些最大的河流才适于常年运输，其他的河流在冬季急流汹涌，夏季则水位太低。海运风险大——由于害怕风暴，希腊人和罗马人冬季一般不出海——而且不可靠，因为如果风向相反或不刮风，船只就可能在港湾中滞留数日甚至几星期。

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反应

农业生产力因许多古代农民采取的生产策略而进一步受到限制。农业总是一种冒险的活动，正如《占星家阿伽提阿斯》（Agathias the Astrologer，实际是个讽刺作品，写于6世纪）中所说到的那样："如果你那块地雨水充沛、杂草不侵，如果寒霜没有侵袭田垅，如果冰雹没有打坏刚刚抽穗的庄稼，如果谷物没有遭到鹿群的啃噬，如果它躲过了其他的天灾人祸，我敢说你将获得丰硕的收成，只要再提防蝗灾，你将成功地收粮归仓。"天气变幻莫测、暴冷暴热是地中海气候的一大特征，特别是它的季节性降雨模式。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内，降雨量都相差很大。在地中海的许多地区，我们都发现了亚气候类型，甚至在邻近的



文艺复兴时期杰考珀·瑞普（Jacopo Rip）的一幅壁画，描绘了马尔库斯·阿提利乌斯·雷古鲁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正在劝罗马人不要与迦太基人议和。雷古鲁斯是个罗马将军和执政官，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被迦太基人俘获，迦太基人将他释放，条件是他要劝罗马议和，但雷古鲁斯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可敬的是，后来他又回到迦太基，在那里被折磨致死。

山谷间，天气都会有差异。降雨的时机、雨量大小对各种庄稼的丰收都至关重要；洪水和干旱同样是灾难性的。

针对这些不确定的情况，大多数古代农民采取了将风险降至最低的策略。他们宁愿耕种分散的田地，而不愿耕种一整片田地；他们宁愿在田地间奔波消耗劳力导致生产力降低，希望假如某块田地遭灾，其余的可能幸免。他们不是种植某种单一的经济作物，以寻求将可能的收益最大化并节约劳动力，而宁愿花费更多的气力种植适合不同环境的各种庄稼，以期灾年将不会让他们无以为食。这两种策略都有道理，也非常符合地中海的环境条件和现有的技术水平，但是以现代标准来看，这种方式没有效率可言，限制了剩余生产和扩大产出的可能性。

古代农民的目标是尽可能实现自给自足，即自己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依赖市场，尽可能地储存粮食以便能安然度过歉收之年。同样，以现代标准来看，这种做法成本高、效率低，而专门种植一种商品作物，然后从其他专业生产者手中购买所需要的商品要远胜过前者。然而，只有当市场合理有效地确保各类商品可以满足需求时，这种生产才能进行，但是古代市场无法做到如此有效，因为船或马是当时传递信息的最快方式。西塞罗曾经在他的一个哲学论辩中举了一个粮商的例子，这个粮商到达罗得岛时，那里正发生饥荒，这就引发了一个道德问题：这个粮商是该告诉罗得岛人有更多地粮船正驶向这里（这样就会导致粮价下跌），还是保持缄默、大捞一笔？一个真正的商人在这样的选择面前似乎不可能犹豫很久，但是这种情况确实可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中，某个地方出现歉收，外界的人可能要好几个星期后才能获悉，还要再过上几周，粮商才能带着补充物资赶到。

因此，即便考虑到最好的情况，古代世界各地的市场之间联系也并不密切，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迟缓，有时，甚至毫无反映。对离海较远的地区来说，陆上运输如谷物这类的大批廉价货物，无论距离多远，其高昂的费用都可能让商人几乎无利可图。这种情形似乎在362年依然存在。那一年安条克城遭受了异常严重的粮食危机，而可用的粮食储备却远在将近八十公里外的地方。在那种情况下，皇帝进行了干预，迫使商人补充供应（这并非不公正，因为可能正是皇帝的扈从来到安条克才首次引发了危机）。其他城市的居民往往必须依靠当地贵族的慷慨解囊才能度过粮食危机。总而言之，如果你能生产、储备自己所需要的食物，比种植某种商品作物，结果却发现市场上根本买不到食物要安全得多。

商业的桎梏

手工业者与商人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不能这样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必须购买食物。因此，大多数城市的规模受到它们的腹地的“承载能力”，即当地物产通常能养活的人口数量的制约。地中海的环境变幻莫测，这意味着各个地区——即使它的人口低于土地的承载能力，有时也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购买食物，有时会有剩余产品出口。来自地中海的比较资料表明，在一个特定地区，每四年就会有一年出现小麦歉收。

小普林尼论耕种与司法的相似性

我在我的农庄像种植葡萄园一样精心栽种果树，耕种田地，我在地里种上大麦、豌豆和其他豆类，还有玉米和小麦；所以，我作演讲时就像播种一样散播各种论点，以便无论什么庄稼长出来都能有收获。在说服法官改变主意时，要克服许多无法预见的危险和不确定因素，就像种植过程中要应付天气和土壤问题一样。

小普林尼《书信集》(1.20)

在食物过剩和紧缺的地区之间调剂食物供应的工作为众多商人提供了生计，但这项生计并不稳定。依赖市场谋生和依赖市场购买粮食同样具有风险。正如加图在一部敦促罗马人坚持耕种的著作前言中提出："我认为商人是精力充沛之人，醉心牟利之人，但它却是一种充满危险、易遭灾祸的职业。"商人不仅面临遭遇风暴、海盗时失去船只和货物的危险，而且在市场需求难以预测、信息传递缓慢的年代，也难以找到价格可以补偿商人投资的市场。

一般来说，各地区的其他商品生产也多少能够自给自足，这进一步降低了对商品物资的需求水平，增加了商人的风险。大多数用于生产的原材料在地中海地区几乎随处可见。由于剩余生产很有限，人们对制成品的需求一般很低，通常从当地资源就能得到满足。任何地区都没有能够生产出足够廉价商品的技术优势，使其商品在出口时即使加上运输费用，也能与当地产出的商品竞争。一定数量的商品，特别是那些质量较高的商品也许能找到海外市场，但是不足以支撑意义重大的、专业化的出口贸易。许多必备的资源如金属、树脂和磨石石材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分布不均，对它们的需求量虽小但很稳定，所以这类商品的贸易一直持续不断。但是，古代世界大部分商人经营规模很小，装载着各种商品沿港叫卖，希望每次靠岸至少能卖掉点货。

只有像雅典那样的城市（它位于沿海地区、又有劳里昂银矿的可靠财富来源），才能使其发展远远超过它的领土承载能力，维持一种更高水平的工业活动。雅典对食品的需求很稳定，因此商人们总能指望以不错的价格在那里卖掉货物，然后采购各种制成品装满一船返航。很少有古代城市具备雅典这种优势，即便如此，雅典人也不得不以制约商人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食品供应。完全依赖自由市场风险太大了。

需求的增长

古代经济生产力水平低、运输费用高、速度慢，这意味着对生产的商品和贸易商品的需求受到限制，只有小规模的非农业生产部门才能生存。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它意味着农产品市场小并且无法预测，农民没有任何动力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但这种黯淡的图景不应被夸大，其他前工业社会的例子，尤其是近代英国早期的例子表明，在这些限制下也可能获得经济增长，尽管这种增长不具备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特点。自古以来，雅典的例子表明自给自足、低需求的模式有时会被打破。正是鉴于这一点，我们能够考察罗马帝国对地中海经济的影响。

如果我们全面看待地中海世界的财富总量，可以看出罗马征服首先是灾难性的。他们屠戮生命、毁坏财物、强征贡赋，使各地贫困不堪、负债累累——虽然我们很难知道其影响是持续了几十年还是仅仅几年。罗马没有创造财富，而是鲸吞了其他民族的财富，但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罗马人将财富集中在特定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和大庄园主这两个群体逐渐控制了帝国的绝大部分剩余产品，他们以创造粮食和其他从未在当地获得充足供应的基本物资的需求中心等方式消费新获得的财富。这就需要在各地区之间发展更为完善的商品分配系统，推动贸易的发展；在适当时候，它也会对生产系统产生影响。

安布罗斯论海上贸易

神创造海不是为了让人们航行，而是为了大自然的美丽。风暴使大海翻腾，因此你们应该敬畏它，而不是利用它。无辜的大自然没做错什么，是人类自己的鲁莽使他处于危险的境地。从未出过海的人不必惧怕船难。神创造海是为以鱼供你食用，而不是让你自己去海上冒险；你可以去海中找食物，但不能用它来经商。然而，商人们是多么贪得无厌啊！大海对他们做出了让步，海洋却再也无法忍受他们的贪得无厌。大自然厌倦了那些无休无止地驾船在海上穿梭往来的商人们。海浪不像这些人那样贪婪；海风也不像他们的欲望那样暴虐。

安布罗斯（Ambrose）《论以利亚与斋戒》(7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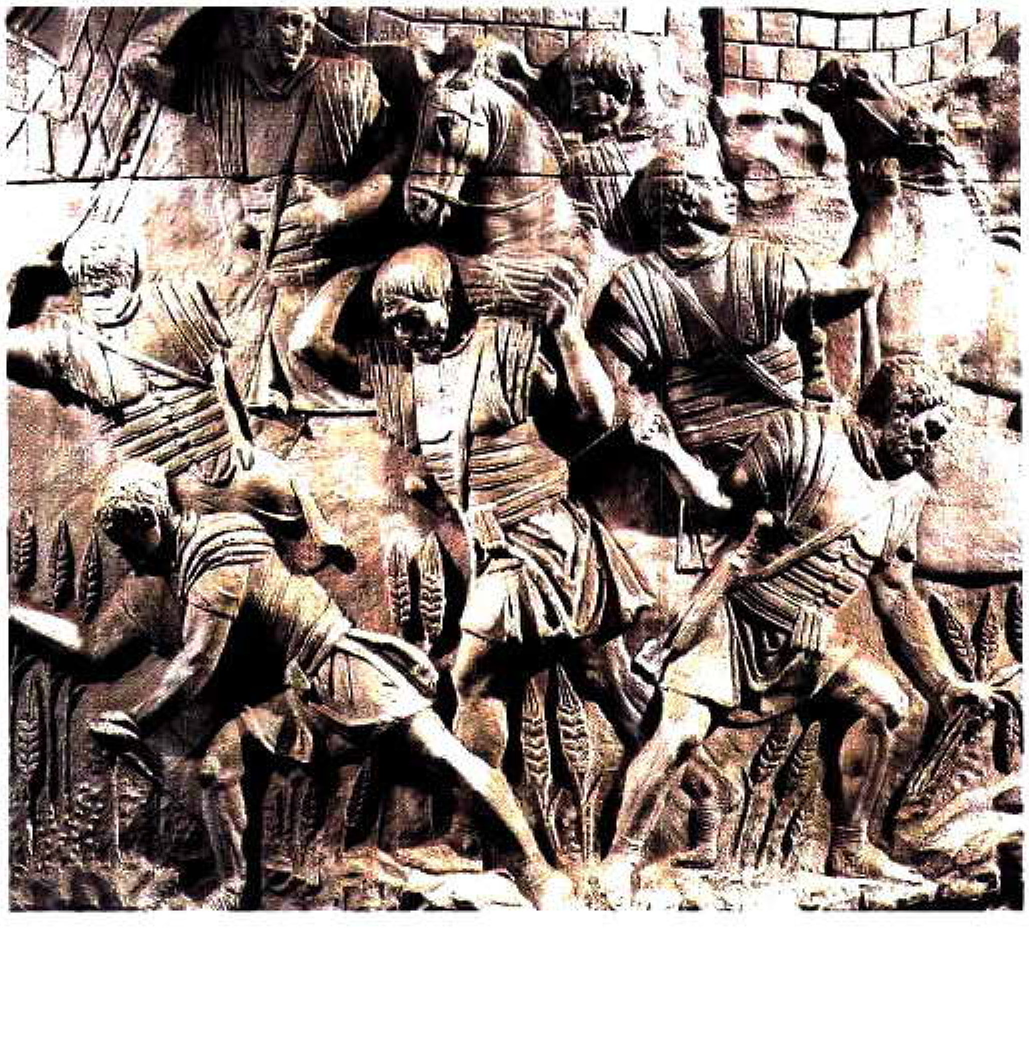


一幅1世纪的壁画，描绘了位于那不勒斯附近的斯塔比阿（Stabiae）的罗马港口。这幅画是古代透视法的杰作，表现了罗马帝国境内海上贸易的重要性，非常有价值。尽管港口本质上是一种实用性建筑，但这里仍以高石柱上的雕像、大量的神殿以及一条通往城市的带拱门的游行大道来装点。

军　队

此类需求中心首推军队。军费开支是最重要的政府开支项目，到1世纪中期，每年要花费4.5亿至5亿塞斯特斯（超过了帝国财政预算的一半）。这些军队大部分驻扎在罗马帝国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在那里，他们至多只能从当地获得部分基本的必需品。据估计，1至2世纪驻扎在莱茵边境的四个军团要消耗掉相当于10万平方公里土地产量的十分之一，而这个地区只有5.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生产者根据新的市场需求安排生产，军队有望获得当地更多的粮食供应。这种情况在不列颠可能确实发生过。到3世纪中期，进口的印纹陶器（terra sigillata）数量从罗马占领早期的高峰大大降低。这种陶器被公认为是食物进口的"标记"（因为它是随各类货物进口的，而不是单独进口的）。然而，许多边境地区，特别是东部边境，粮食种植似乎总不顺利，因此那些地区总是必须从其他地方进口粮食。

军队消耗的不仅仅是粮食，士兵们的饮食包括酒或波斯卡（posca，一种水和醋的混合饮料）、橄榄油和猪肉，不用说还有佐料，如芥末（鱼佐料）和胡椒。他们需要马匹、驮载的牲口和用于献祭的牲畜，所有这些牲畜都需要饲料。军备的更换需要毛皮（北不列颠的军队仅修补和更换帐篷每年就需1.2万张牛皮）和金属（仅一个军团要塞就产生了20吨铁钉）。这些商品中，有些商品的供应方式和粮食供应相似，在罗马占领的早期，随着当地生产的发展，大量进口转由当地供应解决。其他商品一直依赖进口，在北部边境，橄榄油和酒等地中海地区产品的进口尤其显著。养活



图拉真柱的局部。描绘的是罗马士兵在达西亚战役中收割小麦——这是罗马军队自给自足的一个例证。一些军队企业成为永久的综合性生产企业，如制造屋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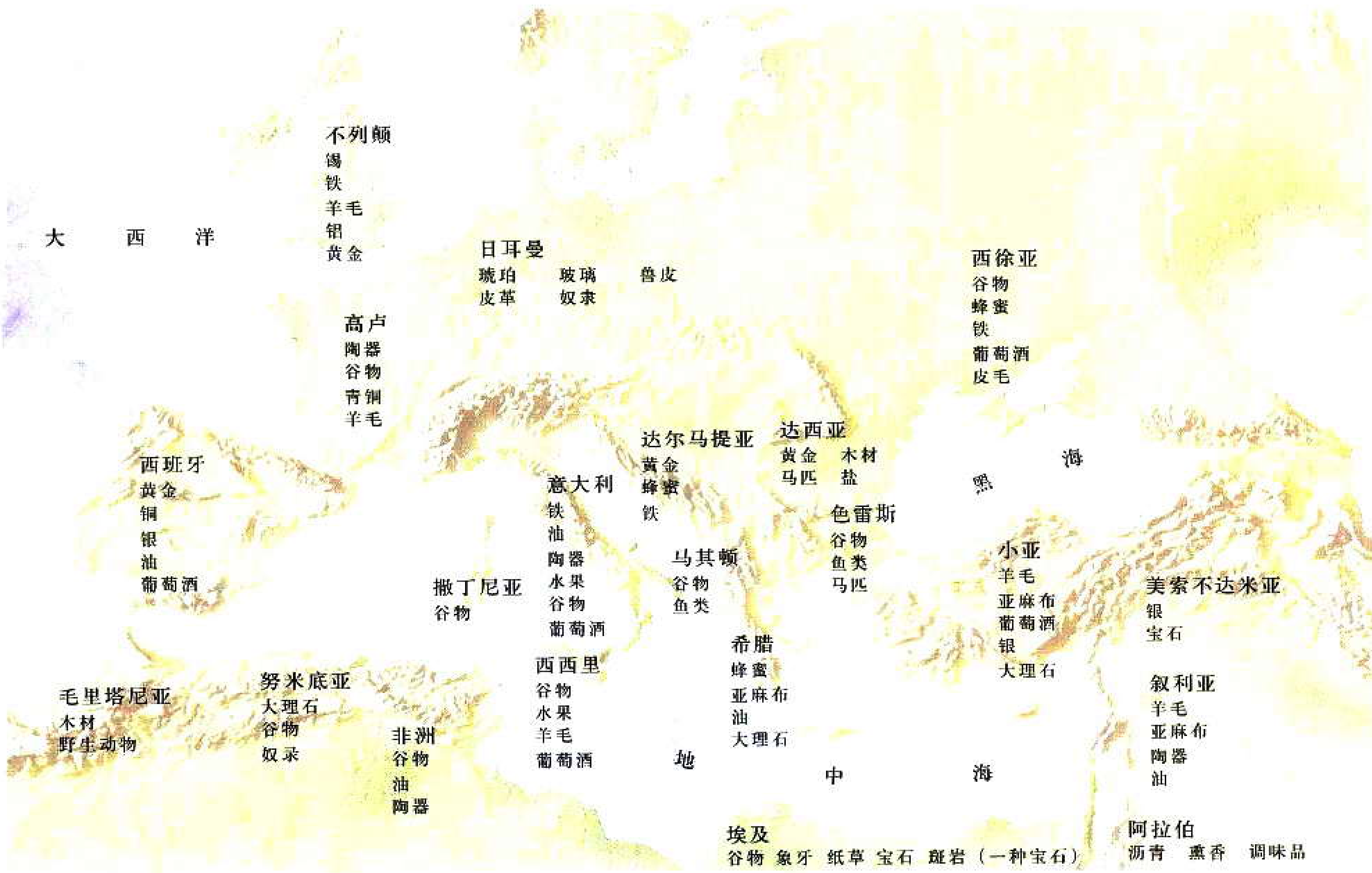
军队需要对物资分配、基础设施和人员进行巨大投人，体现了资源从富庶、有税收的内陆行省向边境行省的基本转变。

罗马城

第二大需求中心是罗马城。在共和时代的最后一百年中，罗马城的人口从大约二十万人急剧增长到约一百万人，而对于一个前工业城市来说，二十万已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作为一个城市，罗马的人口膨胀完全归因于它作为帝国的首都、象征和炫耀资本的角色，也是包括皇帝在内的罗马精英实现政治野心、挥霍巨额财富的中心。他们的活动，特别是在城内兴修的大型土木工程，需要的原材料数量惊人。有些可以在当地生产，如在城市的腹地修建的砖窑；其他原材料则必须从数百公里之外的地方运来，如从埃及和爱琴海地区运来的大理石，更不用说用于修建引水渠和澡堂的数千吨铅、数以万计的奴隶和牲畜以及大量的国外食物、香料和纺织品。

贵族精英们的建筑工程和奢侈生活方式需要雇用大量的人手，这些人自己也需要食物、住宅和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又需要雇用更多的人。据估计，罗马每年至少需要15万吨粮食，每年消费的酒大约是7500万升，每年有100万升橄榄油用于照明，2000万到3000万升橄榄油用于烹饪和洗涤。罗马城的腹地从来无法满足这些需求。罗马从意大利、撒丁尼亚、西西里、非洲和埃及等地区进口粮食；从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爱琴海

罗马帝国及其腹地产出各种农业和矿产资源，除了那些稀奇古怪的愿望，足以满足其居民的全部需求。帝国的经济安全，某种程度上也有政治安全取决于这些资源的再分配，主要通过海上贸易进行。罗马城的稳定取决于城中居民这帮“乌合之众”，他们依靠从进口粮食中分得的少量食品为生。



等地区进口酒；从意大利、西班牙和非洲进口橄榄油；还从已知世界的各个地区进口其他商品。某些需求通过国家分配得到满足，但是粮食的供应（annona）不能满足罗马全部粮食需求，更不用说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了。罗马城的大部分物资都由商人运来，因为他们确信能够以高于一般的价格出售其商品。罗马是个典型的消费城市，大部分人口直接或间接依靠税收和租金生活，而不是依靠出口工业产品生活。但是，消费者并不一定是寄生虫，罗马的需求创造和支撑了一种以前不可能达到的商业活动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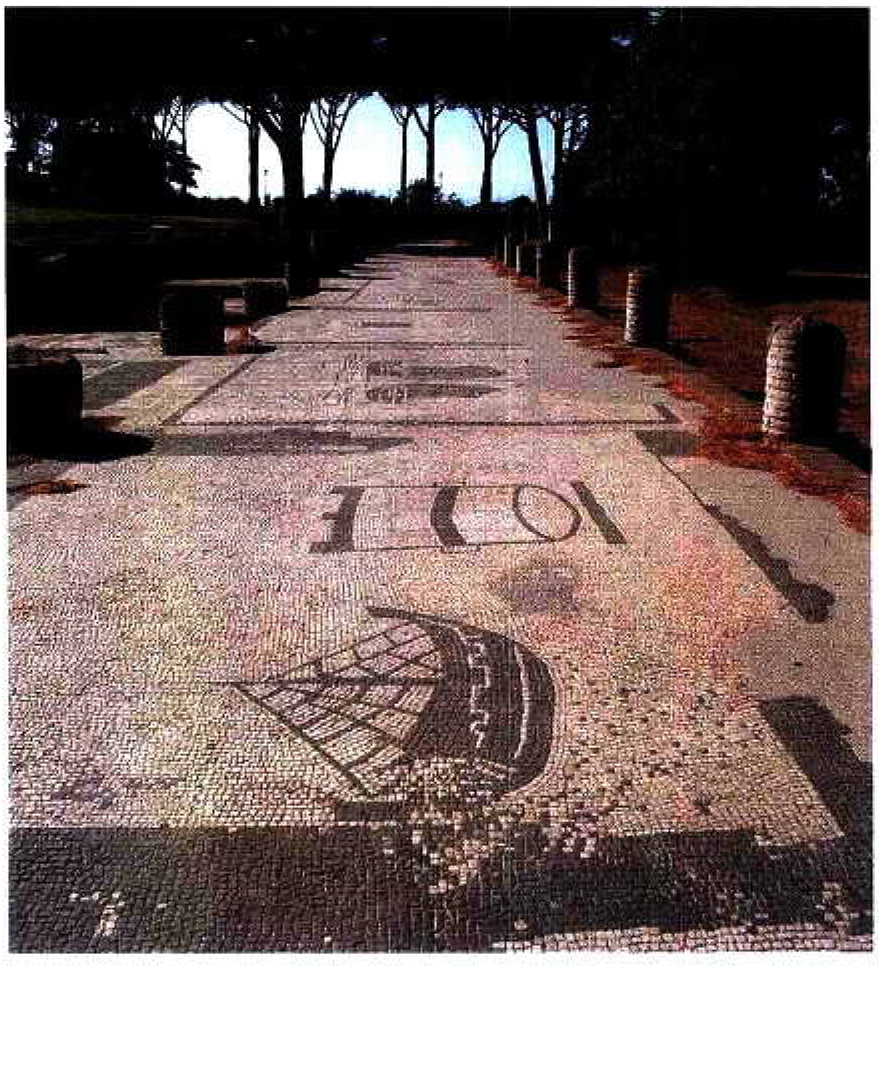
城市化和“罗马化”

罗马人把他们征服得来的财富用于首都和边境的建设上，创造了对商品的需求，这种需求只能通过商业或某种别的分配形式从这些地区以外得到满足。这不是任何经济政策的结果，而是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利己主义和自我放纵造成的结果，然而其经济影响却是巨大的。罗马统治的其他方面同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经济后果。

首先是城市化的提高，特别是在帝国的西半部（东半部在罗马人到来之前，城市化程度就已很高）。古代城市是建立和强化政治、思想与经济力量的一种工具，是奢侈消费、展示文化和新获得的罗马精神的舞台，也是当地精英彼此竞争的竞技场。罗马人鼓励城市发展，他们更希望通过与地方城市精英的合作来统治他们的帝国，这样城市就成为协调当地社会与上级权力部门的中介，也为更多雄心勃勃、试图跻身大的行省首府或罗马城的人提供了晋身之阶。因此，罗马统治的建立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推动力，特别是在那些征服前城市化水平不高的地区。有些城市由于处于向军队和首都提供给养的主要路线上也繁荣起来。罗马的港口奥斯提亚在共和国时期只是一个小镇，到2世纪发展成一个拥有3万或更多人口的城市，纪念广场、庙宇、剧院、竞技场等一应俱全，还至少拥有17个公共浴场。建于大河之上以及在通往边境的主要路线的交叉点上的城市，如位于罗纳河上的阿尔勒斯、里昂（Lyon）和维也纳，伦敦、亚眠（Amiens）和特里尔等，其人口规模也急剧增长，同时修建了各种公共建筑和公民便利设施（有关城市化的更多信息参见第九章）。

城市已经成为或一直是地方精英消费的主要中心。正如在罗马，上层的消费习惯和建筑工程给予工业者和其他工人提供了工作，而这些人的需求也必须得到满足。大多数城市都能从其临近地区获得大部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除非在农业歉收之年，他们才不得不去其他地方寻求补给。然而，即使在正常年景，人口集中在某一个地区的事实也需要对在城市和乡村间分配物资的手段进行投资。维持城市的费用高于维持分散的乡村人口的费用。像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这样的东方大城市（可能甚至像特里尔、阿尔勒斯、里昂和米兰这些中等规模的西方区域性中心城市）总是必须定期从广阔的区域进口食物和其他物质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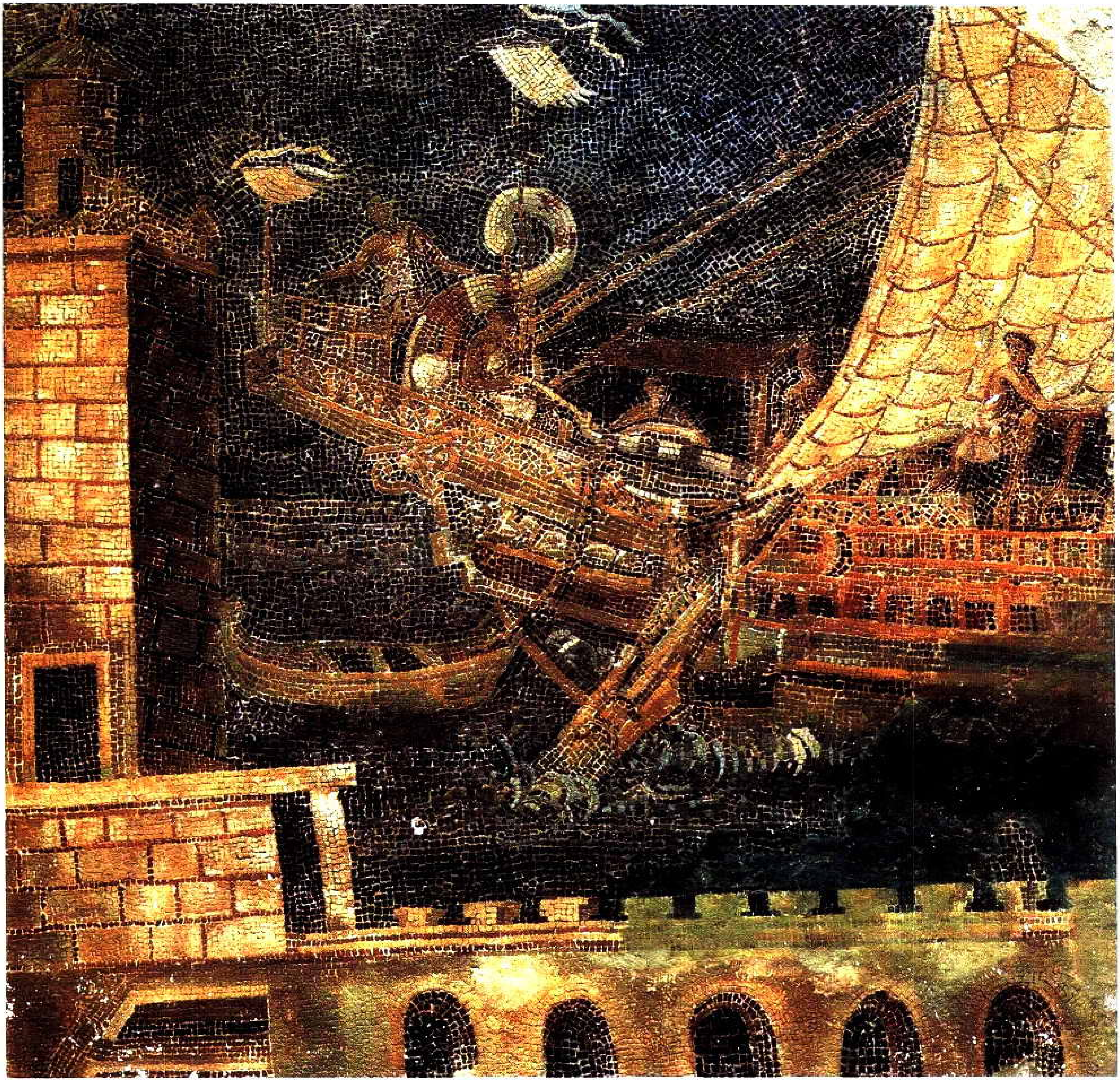
罗马统治的第二大后果是人们的消费习惯总体上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西方。在这个通常被称作“罗马化”的文化变迁的进程中，各个行省通过新的消费方式明确表达了自己作为罗马臣民和公民的新身份。这一点在精英身上最为明显，他们在文化趋同过程中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



这是位于罗马的港口奥斯提亚的皮亚佐拉科尔波奇昂（Piazzale delle Corporazion）的一条马赛克人行道。宽敞、圆底、靠帆驱动的商船对于城市的存在就像兵团一样必不可少。如果不能定期用船将粮食从埃及、塞浦路斯和西西里运来，罗马肯定会发生饥荒。这艘船的另一边描绘的物体是一个量器，这是用来称量粮食和其他干货的一种传统量器。

奢侈品与东方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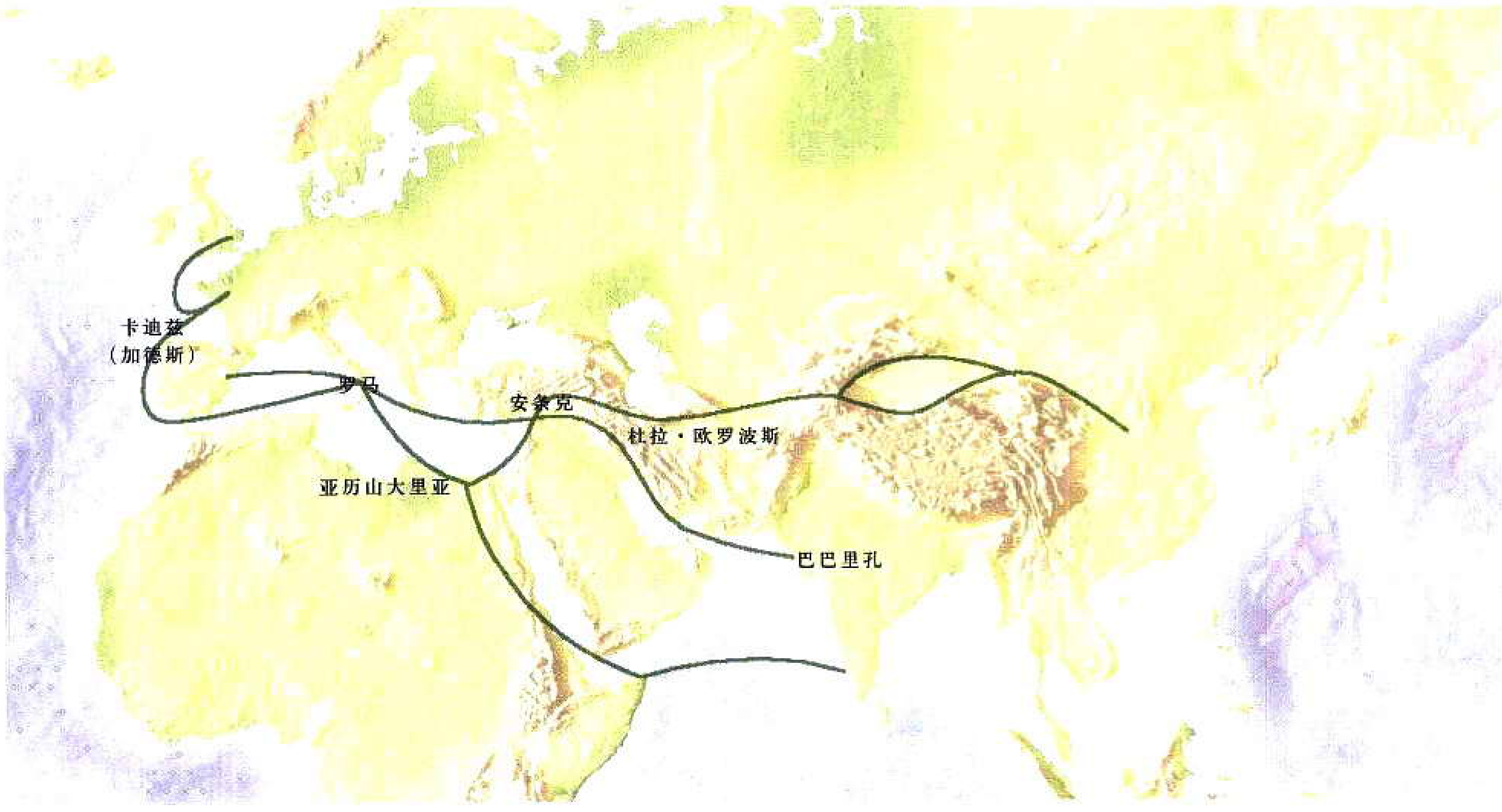
并非罗马人需要的所有东西都能在帝国境内找到。希腊演说家埃里乌斯·阿里斯泰德（Aelius Aristides）曾经夸张地指出："如果你看看从印度运来的货物，甚至是从圣地阿拉伯（Arabia the Blest）运来的货物，你会发现它们是如此丰富，以至于会猜想那些土地上的树皮都会被剥光，那里的居民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必须到这里来乞求他们的一份。"熏香及其他香料、香水及润滑油、调味品、丝绸和珍珠都从东部边境以外运来，其数量之多令老普林尼担忧帝国正耗尽金银以支付这些物品的费用。



起初，这种贸易控制在阿拉伯商人手中，但在公元前116年，一位为埃及的希腊统治者服务的船长发现了通往印度的航线。一本罗马商人手册《瓦里斯拉的海上旅行》（*Periplus Maris Erythraei*）说明了船只如何在7月从红海启航，乘着季风开往印度，然后在12月或1月乘着东北向的季风返航；其他船只前往阿拉伯收获乳香。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这类贸易的数量和价值都急剧增加。记载贸易远征的资金状况的纸草证实了这类贸易是多么有利可图。一份纸草描述了一批价值约三百万塞斯特斯的象牙、纺织品和甘松，而一艘大船能装载很多这样的货物。亚历山大里亚和帕尔米拉这类城市凭借它们在商路上的战略位置富裕起来（亚历山大里亚也是进口原材料的加工中心），并且向国家缴纳大量的海关税。

许多作家认为，外国商品流入罗马祸害匪浅。自尊自重、品行高尚的罗马人受腐化的外来生活方式的影响，正变得道德败坏、优柔寡断并且女子气十足。在获得了大型的奴隶制庄园后，罗马精英们仍然保留着把自己看做节俭的农民兵的意识，这种意识造成他们对财富和经济繁荣的社会影响焦虑不安。由于罗马的衰落，奢侈的行为受到谴责——“奢华的宴会和精致的礼服是国家处于病态的表现”，哲学家辛尼加（Seneca）如是说——并被用作攻击政敌的武器，因为那些不能抵制外来食品、香水和香木桌的诱惑的人显然不适于执掌大权。

史学家们往往认为这种贸易对经济发展无关紧要，因为它只为少数富有的消费者服务。以加上运输、加工的费用和商人的利润之后的罗马商品价格为基础，普林尼对这种贸易消耗的财富的计算显然被夸大了。然而，并非所有的东方贸易都是购买多余的“奢侈品”，熏香对祭祀活动和葬礼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调味品（少量的）则为众多的人所使用。我们可以将对这类商品的需求的增长看做经济发展的证据。正如辛尼加所说：“繁荣使奢侈品得到了广泛传播。”



（左图）一幅马赛克镶嵌画的局部画面，出自2世纪克劳狄·克劳狄安乌斯（Claudius Claudianus）位于罗马的住宅。画面描绘了一艘双排桨海船正驶离港口。罗马是一个经济磁场，吸引着来自帝国最边远地区以外的奢侈品。丝绸之路从中国开始，横跨贵霜（Kushan）帝国、帕提亚（Parthian）帝国，将价值昂贵的丝织品运送到亚历山大里亚（途径红海的贝利尼斯港）、安条克的市场以及位于杜拉·欧罗波斯（Dura Europus）的罗马贸易前哨。香料则用船直接从南印度运出，也经过印度西北部的巴巴里孔（Barbaricon）港。

——比如修建规模宏大、装饰精美的别墅，或购买许多上佳的意大利酒，但是这种行为并不仅限于他们。高卢的个别农民偶尔也能买得起酒，或一年买上一件精美的意大利风格的陶器，但是如果每个农民都花少许钱购买这种“高档”商品的话，就会导致需求总量增加，这将足以支撑起更大规模的地区间贸易。考古材料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如高卢境内的意大利双耳陶罐的分布。沿着主要河谷，人们发现了成千上万只双耳陶罐的碎片，并且在整个帝国西部都发现了光洁的红釉印纹陶器（terra sigillata）。有时，这种货物采用肩扛背驮的方式供给军队，这有效地降低了运输费用；同时，对这些货物的需求也使得军需合同更有利可图。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最终都会扩大生产以满足需求，高卢又是一个有力的例证，继意大利的阿瑞底陶器（Arretinewore）后，那里也生产出了一系列精美的类似风格的地方陶器。然而几个世纪以来，罗马统治又一次对那些不能由地方满足的商品产生了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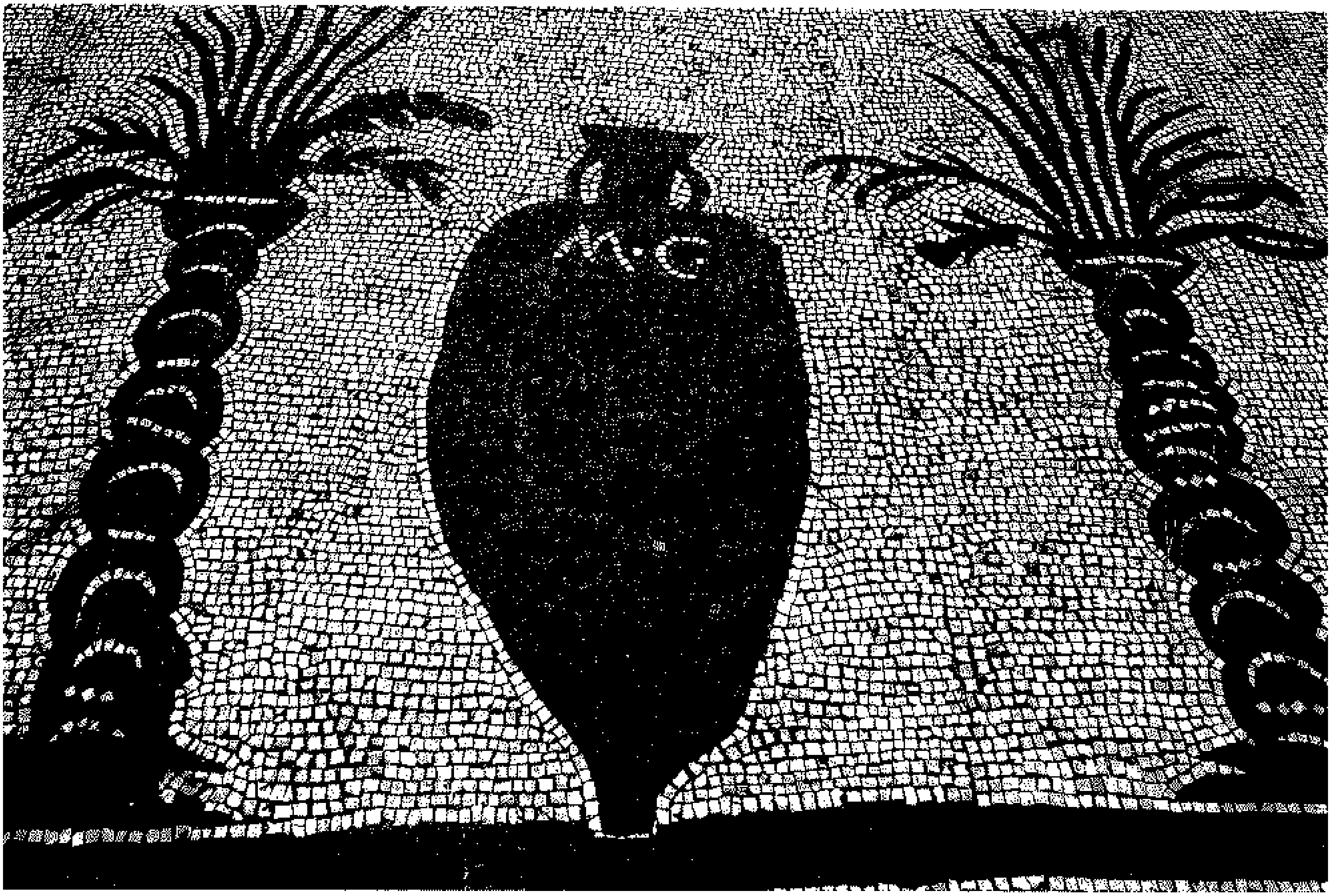
贸易扩张

大量不同类型的考古材料揭示了对食品和其他商品的这些新需求对罗马帝国经济的影响。例如，地中海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失事船只，属于共和时代晚期和帝国时代早期的失事船只远多于16世纪前的其他任何一个时期。正如对待其他任何史料一样，我们不能完全从外在价值来看待这些材料。已找到的沉船在整个地中海分布不均，而是集中在某些区域，特别是西班牙和法国的南部海岸。这种分布既反映出古代贸易航线，也反映出考古学家和潜水员活跃于这些地区。此外，装载罗马双耳陶罐这类大陶罐的沉船比那些将货物装在易腐坏的容器中的沉船被发现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从非洲海岸或地中海东部发现的更多材料可能会改变这种情况，但是，既然我们从其他材料得知罗马船只活跃于整个地中海地区，那么从这些地区得到的材料同样可能说明那里有大量的罗马沉船。经过改进的探测技术可以确认未装载双耳陶罐的沉船，也可能发现和其他时期一样多的罗马船只（如那些运载散装粮食或袋装粮食的沉船）。没有史料证明罗马造船质量有显著下降，从而增加船只失事的可能性，因此沉船的数字意味着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出海的船只比先前任何时期都多得多，这个数字在此后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被超越。

也有史料记载，大量的双耳陶罐和其他陶器出于这个时期，其中很多是在沉船中发现的，但更多的是在罗马帝国的各种遗址上发现的。最壮观的集中地点是特斯塔奇奥山（Monte Testaccio），这是罗马境内一座海拔约五十米的小山，完全由装橄榄油的陶罐的碎片堆积而成。陶罐形状各异，大小不等，考古学家能准确地鉴定出其中很多陶罐的年代和出处。某些形状的陶罐在地理上的广泛分布引人注目，例如，意大利南部出产的兰伯格利亚（Lamboglia）2号陶罐在整个西部地中海都有发现，而一些非洲陶罐几乎出现在从不列颠至埃及的沿途各地。陶罐非常适于长途运输货物，其设计也适于在船舱里整齐堆放——这是正规化的另一个体现，借此货物现在被运到地中海各地。各地风格趋向标准化，以至人们可以根据陶罐的形状判断出是西班牙的油还是希腊的酒（除非是一些地区开始模仿他们的竞争对手生产的容器），这也证实了正规



这是在位于尤斯提加（Ustica）岛附近一艘罗马船只失事的地方发现的一只表面已经斑驳的双耳陶罐。尽管这种陶罐主要用于盛装诸如酒和橄榄油等主要农产品，但它们也是用途广泛的船运容器，可以用来盛放更具异国情调的产品，如胡椒、丁香、明矾或熏香，否则，这些东西在长途海运中可能会变质。



这是奥斯提亚发现的一幅马赛克镶嵌画的局部。画上是个双耳陶罐，两侧各有一棵棕榈树。字母“MC”大概代表一位从事非洲贸易的商人，它的财富至少有一些来自对进口棕榈油、棕榈糖或棕榈酒的需求。

的大规模贸易的发展。

双耳陶罐用于运输诸如酒、油、橄榄、鱼酱和其他食物等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相对便宜——但与它们的价值相比则相对笨重——在地中海的分布相当普遍。这体现出在各地区之间流通的商品本身发生了变化：不仅有非常富有的人所需要的像香料和丝绸等贵重的稀罕物和诸如金属等几种必要但稀缺的资源（正如我们从其高昂的运输费用中预料的那样），而且还有食物这种大宗但并非必不可少的产品。确切地说，这些商品是很大一部分人都能获得的那种“大众奢侈品”。许多是被指定供应罗马城（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沿岸发现的沉船上的货物）或军队的，但更多的被运往罗马帝国的各个城市和周边农村。

分配过程

商品在帝国境内的分配由许多不同身份的人，以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一方面，我们发现有简单的、小规模的地方性交换，比如农民把他们的剩余产品带到城市，直接与城市中的消费者交换。意大利城镇有集市，即每周一次的定期集市，当地农民可以在那里出售他们的物产，并从城市手工业者手中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同时可以享用城镇设施。有时商品根本不用于商业交换，而只是被运往需要的地方。有钱的庄园主从庄园里将生活用品运到他们在城区的住宅。国家定期将以实物税形式收购的粮食和国有庄园、矿藏和采石场的物产进行再分配，将它们从产地运往罗马城和边境。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被运送的货物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交易，

苏维托尼乌斯论罗马的粮食供应

有一次，在连年的农业歉收造成了粮食短缺之后，克劳狄被一伙人拦在广场上，他们辱骂他并向他投掷面包块，猛烈的攻击使他差点无法逃进皇宫。这次事件后，他想尽办法进口粮食，甚至在冬季也是如此。他向商人们提供有保证的利润，承诺如果因恶劣天气发生意外，他将补偿任何损失。对那些建造商船的人，他提供与其身份相称的巨大物质刺激。

（苏维托尼乌斯《克劳狄传》（Claudius）18—19）

不断有中间人从中分享收益。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一个维拉（villa）庄园的物产到达消费者手中的过程。这个维拉庄园位于意大利西海岸，埃特鲁里亚的库萨附近，类似于被称作塞特芬尼斯特雷（Settefinestre）的大型经济复合庄园。拥有这种庄园的富人需要钱来维持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和推进他们的政治生涯，因此正如我们从罗马农业手册中给出的建议了解到的那样，庄园的绝大部分农产品被出售，大致包括橄榄油、橄榄、水果、蔬菜、家禽、猪肉、粮食以及埃特鲁里亚沿海地区的特产——酒等等。有些庄园主自己参于其产品的销售：一些庄园主为了将自己的货物运到市场（有位元老院议员被指控利用国家基金在他的维拉附近修建了一座码头）购置了船只，而埃及的阿庇安努斯庄园拥有驴、牛和运送货物的骆驼队。更为常见的是，庄园主在庄园门口直接向商人出售其产品，他们宁愿赚得少些但是更稳妥，因为他们将运输和销售其产品的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了商人。加图于公元前2世纪撰写的农业指南和许多罗马律师的著作等史料显示，人们通常在收获之前就将庄稼卖掉（这是最初的期货市场）；庄园主甚至将不可靠的气候所带来的风险转嫁给了商人，而商人则将赌注押在了可能获得的丰收上。罗马法律对此类合同有详细的规定，明确了酒类制作和储存、质量的检验以及试图解决在买主购买之前酒已变酸的补偿问题的责任，但是，如果农业歉收，买主就会血本无归。甚至在这些不利条款之上，庄园主仍然能找到买主，这一事实说明，在那些经销庄园农产品的商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因而肯定意味着在市场上可能获得的利润是值得为之一搏的。

有时，庄园提供运酒所需的双耳陶罐（有些庄园自己就有粘土矿和窑），有时由商人提供。双耳陶罐上可能会印上标记，标示出罐内产品的生产者的名字或生产容器的工场主的名字，塞子上可能也印有生产者或商人的名字。一旦酒已酿好，由买主品尝并得到认可后，就用骡子、马车或河船运至岸边，装到船上。有些商人自己拥有船只，在我们所知的一艘名为“德拉蒙特A”（Dramont A）的沉船上，同样的名字出现在船锚和船载双耳陶罐的盖子上。这艘船发现于距戛纳不远的法国海岸，制造时间是公元前1世纪。其他商人则向装载多种货物的船只租用船上的空间。罗马律师的作品中广泛涉及试图分担责任的问题，即一旦这样一艘船在航行途中沉没或遇上风暴、船主打算把一些货物扔下船以使船不致沉没时，责任该如何分担。双耳陶罐上的标记有助于分辨哪些货物属于哪位商人，罐上可能还印有更多的信息（即所谓的titulipicti），往往包括托运人（the navicularius）的名字——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所运货物的主人。

有些商船逢港必停，每次靠港都尽可能向顾客、当地的零售商或内陆贩卖货物的其他商人兜售商品。沿法国南岸远至西班牙的安普里阿（Ampurias），在内陆向着罗纳山谷、远至巴塞尔（Basel）和普瓦提埃（Poitiers）都发现了产自库萨附近印有塞斯提乌斯（Sestius）这个名字的酒罐。这样广泛的分布表明做此生意的一定不止一位商人。其他船只都有明确的目的地：罗马的奥斯提亚港和边境驻军。奥斯提亚（从铭文中我们可以得知）有许多专门从事特定货物和特定地区产品进口的商人协会。一些双耳陶罐的分布方式与军队供给网络和莱茵河沿岸军队活动的区域密切相关，例如，产自巴提卡的油罐类别为德雷塞尔20（Dressel）的双耳陶罐，而高卢的大部分用来纪念中间商的铭文都发现于沿罗纳-莱茵河的供给线上。

这种模式反映了“再分配”而不是自由市场贸易，这并不是说没有私营商人参与。罗马人从未有过一支国有商船队，但必须通过征用运输的牲畜和与船主签订合同等方式来安排如粮食和大理石等国有物资的运输。他们做出慷慨的让步，授予公民权及免除当地平民税，劝说人们签署向罗马城供应粮食的合同，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将货物运到需要的地方。史学家们有时认为，罗马帝国中国家再分配的重要性意味着市场贸易无足轻重，但显而易见的是，罗马的制度是以私人船只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些船能被征用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运输承包商按市场价得到酬金，还可以通过在官方货物中一并运输私人货物获得额外的利润（偶尔，

他们还试图要求这些货物同国家供给品一样免税）。国家对运输的需求或多或少保证了拥有船只是有利可图的，并进一步促进了船只的建造——之后那些船也可用于私人企业。皇帝们也投资建设运输基础设施，首要的是发展台伯河口的港口设施。所有这一切都为帝国贸易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更有利的环境。



克劳狄和尼禄皇帝统治时期的金币，发现于庞贝城的废墟。在帝国最初的两个世纪里，罗马人使用的是金、银、铜三种金属的货币制度。在3世纪期间，由于通货膨胀加剧，贵金属的供给日渐减少，不可能再以货币储备和贸易的方式采用这种币制了。金币全面停止流通，"银币"也不是用纯银或银合金铸成，而是化学合成的银币。

金融业及组织

大多数罗马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富裕程度中等，大概因为分配过程缺乏组织性，又有这么多中间商层层盘剥；皇帝哈德良颁布了一条法律，通过限制中间商的人数来控制阿提卡的鱼价，结束了"不道德的牟利"。然而，我们应该谨防用中世纪后期的发展标准来评判罗马贸易，也应避免因缺乏商业巨头和大型贸易公司而谴责它。现行的结构对于维持军队和城市的正常供应的目的是有效的，支持分配的公共机构的组织也同样有效。罗马人缺少某些行业（例如有限公司和汇票），这些行业有时被认为是近代欧洲早期经济发展的前提。然而，我们并不清楚，他们是否缺少真正需要的商业组织。正如上文提到的，罗马法对合同、酒类销售、损失货物的补偿等提供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对于管理复杂的商业冒险是必不可少的。文献对成立的商业公司几乎没有记载，但那主要是因为罗马人宁愿在家庭或家族内（familia）组织交易——许多商业活动建立在被释奴和他们先前的主人之间保持的密切的法律和社会联系基础之上（参见64～69页）。

就金融而言，海事借贷的组织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在这种借贷活动中，由于贷方承担货物遗失的风险，因而索要的利率高得多）。大规模的商业冒险要求有很高的信誉。虽然风险巨大，但潜在的回报也很可观，对商人是如此，但对贷方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信誉通常是容易获得的。发现于庞贝城的漆面书简，即穆雷辛书简（Murecine tablets），记录了商业贷款的详细情况，显示出有些钱是由帝王家族的奴隶或被释奴预先垫付的。同样，元老阶层的某



这是大约公元400年的一块罗马马赛克地板残片。残片展现了一个庄园，周围是经过修整的园地，里面栖息着各种猎禽和水禽。在这个乡村乐园田园牧歌般的画面背后，农业庄园是罗马末期欧洲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力之源，并预示着中世纪的庄园作为地方和政府之间日常联系的、对双方而言都便利的地点的角色。

些成员肯定也同样通过中介参与贷款。几乎没有任何文献表明曾经存在过经营和资助贸易的“商业资本家”（穆雷辛书简上出现的普特奥利的苏尔比奇也许是个例外）。投资贸易的巨额资金主要掌握在拥有土地的精英手中，任何一个成功“企业家”都想尽快跻身于这个阶层。

国家的作用

如上所述，在创立对商人供应的物品的需求中心、资助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制定解决市场和其他商业活动争端的法规等方面，国家起着重要作用。国家在其他方面的活动也产生了经济影响。最为明显的是，罗马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和平，使这个曾经的战场成了一个统一的空间（mare nostrum，“我们的海”）。为了保证本国的供给，国家投入资金抗击海盗，使所有的商人和船主获益。国家修建驿道运送军队，但却无法阻止其他人利用它们更方便地运输货物。

国家为了自己的目的发行货币，支付军饷和官俸，采购物品，而不是通过规定货币供应实施经济政策。通过提供标准的交换媒介以及为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共同接受的价值尺度，它也推动了商业的发展。铜币和银币在各地区内广泛流通，而帝政早期金币的发展使得大笔资金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更方便。在此期间，银币的数量显著增长，但未对价格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这一事实表明整个市场活动都有所增长。

产量的提高

起初，地中海世界商品流通的增加只是现有财富的一次再分配，因为税收和租金集中到国家和富有的庄园主手中，由此流入参与供应网络的个人的腰包。城市的发展以及为数更多的人现在从事非农业生产，也许意味着农业生产力已经提高，或者仅仅表明农民正受到更沉重的剥削。然而，罗马帝国的需求最终确实引起了农业和工业的变化，因为生产者，或部分生产者，受更高的市场价格的刺激（和纳税的需要），会努力增加可以投放市场的剩余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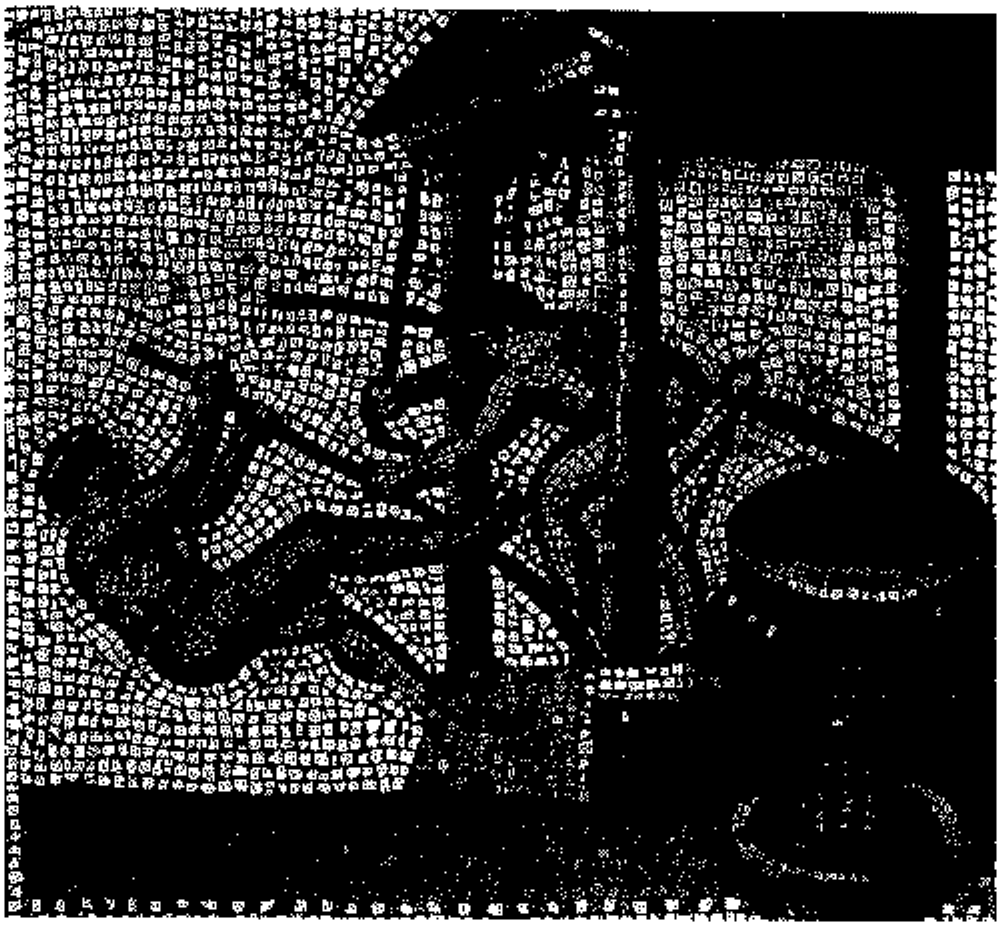
农业变化最明显的例子来自罗马城的近郊地区（suburbium）。一方面是高地价和高地租，另一方面是供应城市要有利可图，二者的结合使农民尽可能地对田地进行精耕细作。这个地区生产成本高、易腐坏的商品有：水果、蔬菜、鲜花、蜂蜜和各种奢侈肉食（睡鼠、蜗牛、燕雀和野味）。考古研究表明，这里的居留地得到了精耕细作，但并非所有的居留地都是供应市场的园子：城区的上层人士在郊区建立庄园，城区的死者需要墓地，因此园艺不得不与他们争夺土地（和水）。罗马城的财富和各种需求决定了郊区的经济和社会。

在意大利中部，我们发现了瓦罗和科路美拉等罗马农业作家在其著作中描写的那种“维拉”。这种维拉是一种中等规模的庄园，使用奴隶劳动，足以养活大量牲畜并利用它们的劳力和粪肥。这种维拉并不专门种植某种单一农作物，而是种植多种作物，这意味着劳动力全年都忙忙碌碌，也使庄园在食物和原材料方面基本可以自给自足——但庄园试图生产大量剩余的酒、油或粮食以供销售。有些酒出口到高卢，顺着罗纳河一路上都发现了产自埃特鲁里亚海岸的库萨镇的双耳陶罐。然而，这些庄园的大部分产品都是面向罗马城这个无法满足的市场的。

在意大利境内的考古研究将某些遗址确定为“维拉”，其依据是研究者发现的陶器分布规模和马赛克碎片之类能说明财富状况的器物的存在。这些庄园使用的劳动力类型到底是自由民还是奴隶，考古学难以考证，因此，假定所有这种大型、富裕的庄园都采用罗马农学家建议的经营方式是冒险的做法。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遗址大量出现在靠近运输路线的地方，如位于罗马容易触及的范围内的埃特鲁里亚、拉丁姆和坎佩尼亚地区。在更为封闭的内陆地区，居住方式很少受到破坏，这种大型遗址的痕迹更少。这一情况更证明了这种想法，即农业变化，最可能出现在容易到达罗马市场的地区。

然而，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农业上也出现了变化。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我们发现了某些数目惊人的大羊群的发展，它们在冬夏牧场之间长途游牧。就传统而言，放牧的规模一般很小，并局限在当地；这些庞大的羊群说明人们开始对土地和牲畜进行大力投资，其目的无疑是想在市场上获取巨额利润。在西部行省，葡

萄和橄榄的种植逐渐推广，最初是供应本地消费，后来出口供应罗马及其军队，从奥斯提亚港和莱茵河边境发现的双耳陶罐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到3世纪，整个西部地中海地区都出现了非洲油罐和陶器。北非农业专业化最有力的证据是考古发现的橄榄油坊的遗迹，不仅总数多（例如，在大利普西斯附近地区每两平方公里就有一个油坊），而且出现了拥有4至5台榨油机的“工场式油坊”（个别油坊甚至有17台榨油机），能够加工大量的橄榄。这再次证明富裕的庄园主针对市场大量投资生产，他们处于把握市场新契机的最有利位置。他们也拥有投资资本，有经济实力储存产品，直到市场价格提高才出售，而且他们能够承担专门种植特殊作物的风险。贫苦农民的境况要差得多，事实上，由于富人试图大量收购最好的土地置办庄园、饲养畜群，农民们可能已经感到他们的处境在恶化。



这是一幅马赛克画的局部，出自3世纪高卢的一个罗马庄园。画上描绘的是两个男人正在榨橄榄油。种植橄榄以获取高质油是古代地中海地区农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一。橄榄树的年产量非常可观。

技术与生产力

土地所有者提高收入的一种方法是专业化生产，另一种方法是提高土地或劳动者的生产力。罗马的农学家提出了保持和改善土地肥力的建议：他们建议不仅要使用畜肥（从牲畜厩和粪坑中收集），而且利用“绿色肥料”，即植物，它们生长时可以防止土壤侵蚀及养分流失，枯萎后将其混入土壤以恢复肥力。这些技艺可能使一些农民提高了他们的产量，或者避免了每隔一年就要让土地休耕的必要。耕种知识的积累随着经验增加，并被收录在书籍中。农作物品种增多了，这样农民就可以选择某种最适合他的土壤和自身情况的农作物；树木嫁接和葡萄栽培技艺也有所改进。

除了显然未被广泛采用的高卢收割机，文献中几乎没有提到耕种过程中曾引进先进技术。事实上，地中海地区几乎没有余地做这种改进，葡萄和橄榄的种植即使在今天也不适合机械化耕作，只有当面临恶劣的天气将损害收成这样严酷的风险时，机械化收割才是真正可行的。罗马农业技术很“适合”这里的环境，更密集的种植则可能加速优质土壤的侵蚀和地力的耗尽。有些资料表明，这个问题在古代就已出现了。

庄园使用奴隶的方式也许已经提高了生产力。随着奴隶从事葡萄修剪等专业化工作的技能不断提高，劳动出现了某种分工。与此同时，严密的监督和暴力威胁可能也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但这一点不可能得到证实，来自19世纪美国奴隶制的类似证据同样是有争议的。罗马农学家们从未认真考虑过雇用自由劳力，除了农忙时雇用他们做临时工，但这样做不是因为奴隶的生产效率更高，可能是因为除了生存的最低需求，奴隶生产的一切都是纯利润。奴隶劳动的缺陷是需要由监工对奴隶进行经常的监督，同时，这些监工又需要主人的监督。因此，奴隶是一项巨大的投资，这使其不得不接受沉重的剥削，只要市场价格高到足以保证成本，庄园就是成功的。然而到了2世纪，意大利的庄园主开始采用更为粗放、松散的庄园管理方式。

工业生产

铭文中记录的不同行业的数目是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手工业和工业发展的表现之一，比如庞贝出现了85种，西里西亚的科里库斯（Corycus）110种，而罗马城超过了284种。由于人们需要的商品数量大、种类多，足以支持日益发展的专业化生产，这也必然反映出专业技术的发展。301年，皇帝戴克里先颁布敕令，试图控制

罗马帝国境内的物价。这一敕令显示了当时消费者能购买到的商品的种类：22种靴子、凉鞋、普通鞋子和拖鞋，21种质量和产地不同的衬衫，这些产品只是139种不同的亚麻制品名单中的部分产品。

生产更加专业化，但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变化。大多数商品仍然由小作坊生产，劳动分工很少，效率的提高也很有限；这里使用奴隶劳动，他们与自由工人从事完全一样的工作。罗马的一位名叫幼里萨斯(Eurysaces) 的富裕面包师的墓碑雕刻展示了面包加工过程的不同阶段，可能证明了他的作坊里有劳动分工，但是来自庞贝的考古材料显示，大多数面包房的经营规模都比这小得多，通常只有一台驴拉磨粉机，也没有容纳许多工人的空间。有资料显示，一些城市拥有数量众多的纺织作坊，如北非的塔木加迪（提姆加德，Timgad)，它位于耕种区和放牧区交界处。正如戴克里先的敕令（Diocletian's Edict）所示，一些地区生产的布流通很广，但大部分地区仍然主要使用本地生产的织物，只进口较高质量的产品。古代没有类似兰开厦(the Lancashire）那样向全球出口价格便宜、批量生产的商品的棉纺织工业。

罗马人确实在两个生产领域进行了重大的革新。首先，随着压榨机和磨粉机、谷仓和标准化储存容器的发展，他们改进了食物的加工、储存和运输。特别是，有资料显示从2世纪起，西欧开始广泛引进水力磨粉机。山南高卢（Southern Gaul）阿尔勒斯附近的巴贝加尔（Barbegal）复合磨坊拥有16台水力磨轮，加工的谷物足以供应当地半数城市人口。罗马亚尼库鲁姆地区的磨坊也许更大，由特拉亚那水渠供水。利用水力驱动磨轮至少比驴拉磨快五倍，磨坊的经营成本也降低了，水力磨坊一旦建成，几乎可以肯定需要来自国家的投资。

另一个技术发展的领域是采矿业。承包商们代表国家开采金银矿，他们利用水力采掘矿石，利用抽水装置排干矿井积水，利用畜力和水力捣碎矿石。技术革新的目的不是为了节省劳力——矿主一般会哄骗奴隶使他们在矿坑里工作到死——而是为了进行最大限度的采掘。从熔炼矿石引起的大气污染的史料可以看出采掘的收益和规模，对格陵兰的冰核的分析显示，在整个公元前1世纪，冰核的铅、铜残留量都急剧上升。国家对金属的需求正如罗马和其他城市对粮食的需求那样，使生产力在技术的驱动下得到显著提高。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不足以促使人们在那些行业上进行大力投资。

发展的局限性

罗马城的发展、帝国的扩张和行省的“罗马化”依赖于商品的有效流通，并对其产生了需求，而国家和精英们的购买力保证了商品的有效流通。虽然国家和贵族们只考虑自身的利益，但是他们调配财富的方法却为市场贸易的发展和工农业生产的改进创造了有利条件。沉船的数量、整个帝国商品流通的净额，甚至是较贫穷地区的物质文化水平、货币供应的增长等考古资料表明，从大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这个时期是后来几个世纪中经济活动的高峰。

然而，这些史料也提出了为何发展受到限制的问题。帝国头两个世纪中沉船的数量只略高于共和晚期的数量，从那以后，沉船数量迅速减少。1世纪后，格陵兰冰核所反映出来的工业活动的增长未能持续下去。没有迹象表明我们从近代早期以来的欧洲经济活动中见到的那种持续的发展。尽管帝政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和平与稳定，但经济增长速度却减缓了，随后开始衰退。而在共和时代，尽管几乎不间断的战争，经济却得到了巨大发展。

这种情形反映出前工业经济中对需求膨胀的限制。军事和城市需求的刺激促进了行省更加地方化的生产的发展。在共和时代必须进口的商品现在可以从当地资源获得，而且价格更便宜，而原先出口的商品却没有可供选择的市场。在这一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高卢酒业的发展，以至到了2世纪，这个地区不再进口意大利酒罐，并开始将自己的产品出口到罗马（除了意大利的供应，罗马也很喜欢高卢的产品）。从高卢和不列颠的陶器史料也可以看出当地生产取代进口（有时反而出口）的类似情况。到了3世纪，边境地区逐步实现自给自足（尽管从未完全自给自足），这使得影响地区间流通的一个关键驱动力在重要性方面有所下降。帝国的各个城市也可以依靠当地生产获得更广泛的商品。罗马继续从广大地区进口商品，但它停止了发展，部分原因也许是基础设施（特别是由台伯河造成的城市供给网络中的瓶颈）难以维持更多的人口。

罗马帝国的分配模式和生产的新发展并不是自发形成和自主存在的，它们反映了国家和精英集团的需求。

历代皇帝关注的是军队和罗马城的供给，而不是促进经济发展。当国家提供给船主们的利益无法吸引足够的承包商以确保罗马的可靠供给时——这可能反映了地区间交换的利润日趋减少——国家就会采取强制手段，而不顾对市场贸易造成的后果。戴克里先的价格敕令和自四世纪以来对征收实物的日益依赖，同样揭示了人们不再相信依靠商人能促进国家的利益。当单独一个都城越来越无法有效地维持帝国的权力时，帝王们会毫不犹豫地将财政支出转而投向阿尔勒斯、米兰和特里尔等中心——这几个城市一度成为重要的需求中心，但它们的需求比罗马的集中需求要小得多，而且这种需求更容易从当地生产得到满足。同样，当帝国晚期公民义务和捐献不再是获得权力的有效手段时，精英阶层开始将他们的资源重新投放到自己的农庄，或者馈赠给教会，而不顾对城市中心造成的后果，更不顾对商品需求乃至经济繁荣的重大影响。帝国的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西方的大部分地区，城市建筑到3世纪时都或多或少出现了停滞，但即便在这里也有明显的例外，如马赛（Marseilles）和迦太基。与此同时，东方的一些城市在6世纪仍在发展。尽管如此，总的趋势却很明显：需求中心缩小，对市场的依赖性降低。

一名早期基督徒对一个大城市的经济实力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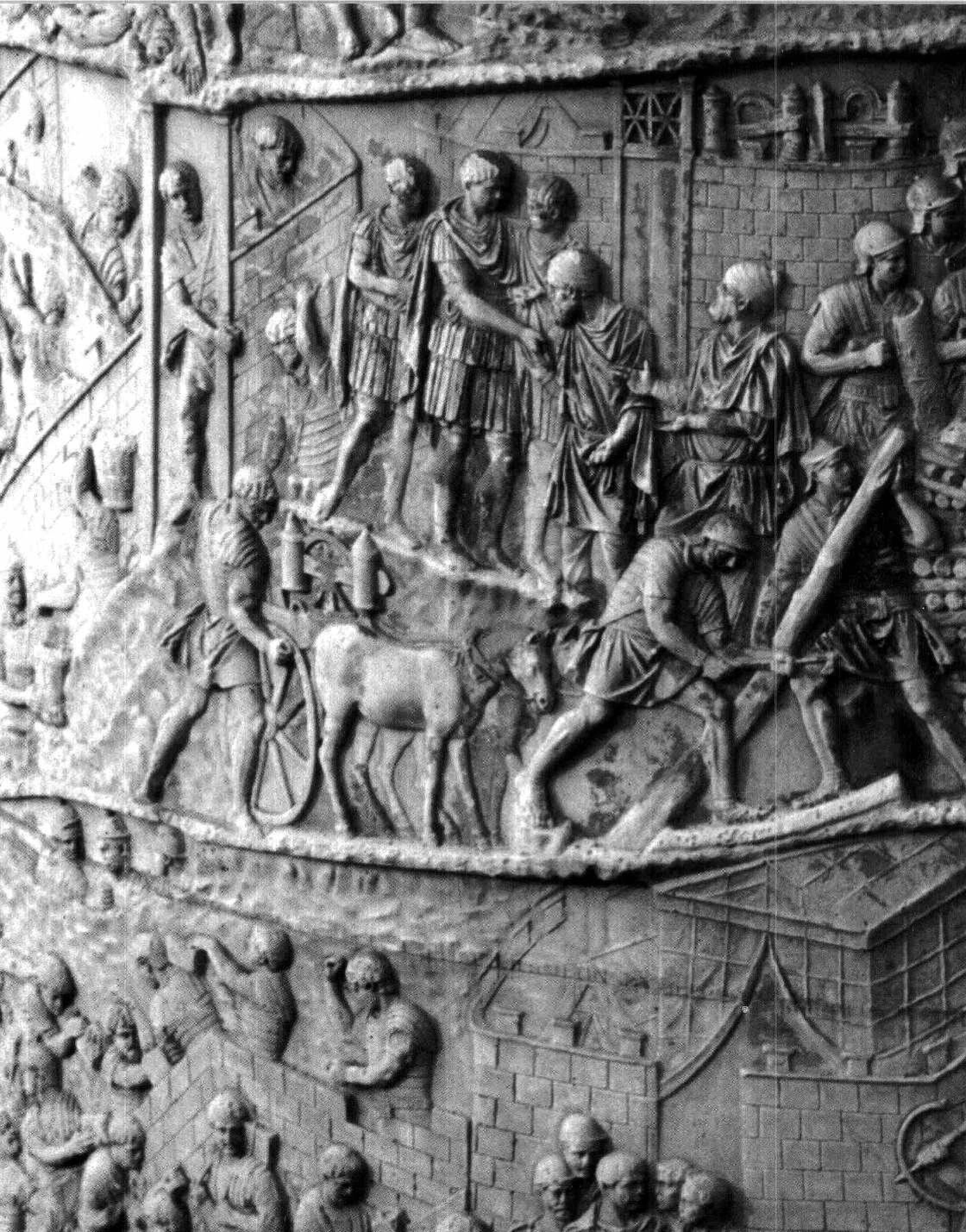
世上的商人将为她（陷落后的巴比伦）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有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丝绸、朱红色布料、各种香木、各种用象牙、贵重木料、铜、铁和大理石制成的物品，肉桂和香料，熏香、没药和乳香，酒和橄榄油，精面粉和麦子，牛、羊、马车和人口。所有的船长、坐船旅行的人、水手以及靠海为生的人，都远远地站着，看到她燃烧时冒出的烟，他们就喊着："曾有过像这样伟大的城市吗？"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着，悲伤地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她的珍宝成就了富足，而她在一时之间就成了废墟。"

《启示录》18

（将罗马和巴比伦等同是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文献的一个共同主题）

几个世纪以来，剩余产品的有效流通和分配巩固了罗马及其统治集团的统治，确保了罗马帝国的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又动摇了帝国的统治基础。拥有土地的精英大大得益于国家在保持帝国的完整和统一方面所做的资金投入。他们参与罗马及其军队供应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从农业生产到海上借贷，再到从作坊和零售市场收取租金。他们获得了大片土地和巨额财富：2世纪早期，元老们的平均财富是共和时代晚期的2至3倍，到4世纪时，又上升了7至8倍。到了这个阶段，精英们的权力限制着国家征收足够的赋税以维持帝国统一的能力。此外，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得人民大众占有的剩余产品更少，降低了对商品的总需求。经济无法腾飞，它仍然依赖组织能力，当市场需求下降，经济就倒退到更低、更容易维持的发展水平，表现为生产力低下、贸易受限、物质文化发展水平降低。与现代经济相比，罗马帝国的经济并不发达，但与中世纪早期及许多其他前工业社会相比，罗马帝国的经济先进而充满活力，并且改善了许多居民的生活质量。

无论是帝制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指出，帝国给罗马的统治者带来了巨额财富，但是人们却很少注意到罗马的力量有赖于它的经济实力，有赖于资源的有效生产、流通和分配这一事实。





第十三章

战争与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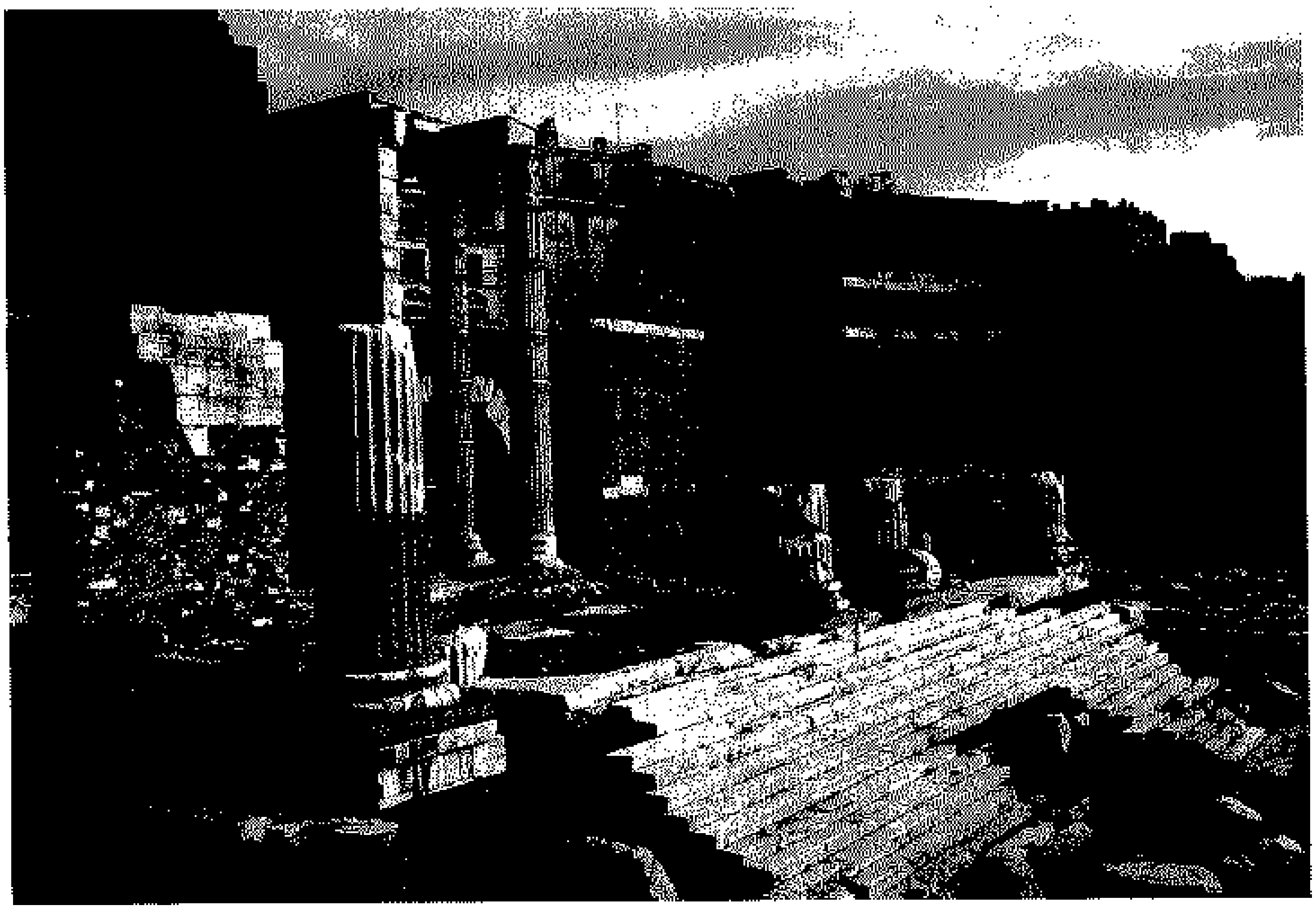
伊恩·海恩斯

战争与和平

罗马起源的神话歌颂了战争的荣耀。罗马城的创建者罗慕路斯是战神马尔斯的孪生子之一。成年后，他和他的孪生兄弟成为一个武装团伙的首领，以掠夺为生。他的生活和行为反映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即合法的权威与军事实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罗马的版图扩张到多远，这种联系在城市自身的生活和肌体中一直保留，实际上反复得到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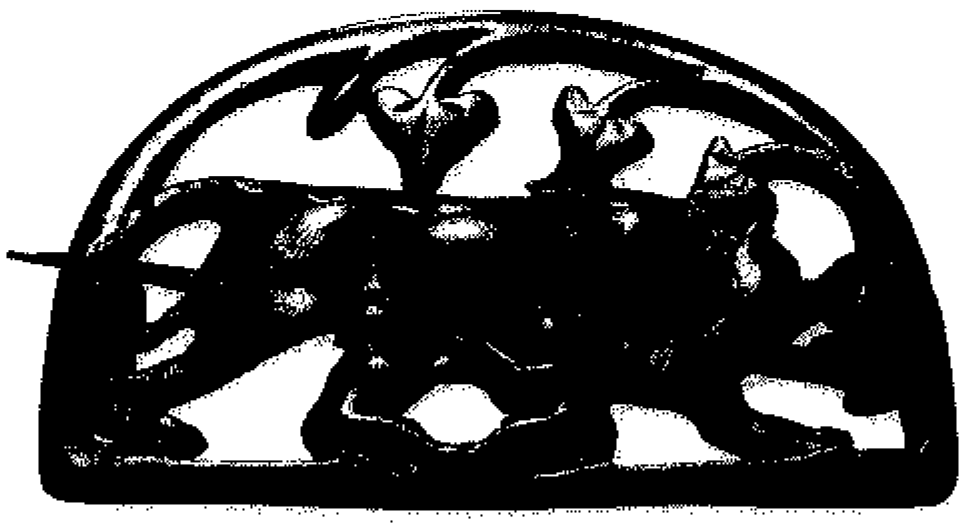
马尔斯广场上装点着献给战神的巨大祭坛，这里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集会和人口登记的场所。正如新的纪念物密集地装点着这座永恒之城，军事力量也到处得到颂扬。公元前3至2世纪，随着罗马军队在越来越远的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罗马城内涌现出大量献给胜利女神的庙宇。神的恩泽被理解成征服的前提，因而在所有与战争有关的事情上，人们都要刻意举行适当的祭仪。在罗马的战争从区域性战斗演变为惨烈的世界性征服的过程中，他们都虔诚地举行战争与和平的古代仪式。不过，所有这些仪式都有变化的空间。斐提阿勒斯（Fetiales）是一个宗教团体，一旦他们将长矛投向敌国领土，就意味着这是和平或战争的最后通牒。他们逐渐在位于不断膨胀的罗马市中心的一个象征敌国领土的小广场上将就着举行他们的仪式。有些时候，他们也祈求并非罗马传统中的异国神祇的恩泽。因此，根据著名的《西卜林预言书》的解释，圣母神西贝尔（Cybele）在筋疲力尽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最后年头从土耳其被介绍到了罗马。引人注意的是，当她的雕像于公元前205年出现在罗马时，被安放在帕拉丁山上的胜利神庙内，直到紧挨着这座神庙建成了一座适合于她的神庙。西贝尔不是佑助罗马的最后一位外来神或女神，事实上，罗马人在多次击败敌人的过程中，逐渐接纳了敌人的神祇皈依罗马。

毫不夸张地说，为展示罗马军队的辉煌战绩而修建的纪念物改变了罗马城的面貌。城内修建的第一批纪念罗马军队胜利的永久性纪念物都建于公元前1世纪。凯旋门是常见的城市建筑，几乎每个罗马行省都有，4世纪时仍在那里不断修建。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早期帝政时代，得胜的将军们，即皇帝们，用掠夺来的财物资助这类宏伟的纪念物的修建，如建有献给战神复仇者马尔斯的神庙的奥古斯都广场、圆形大剧场及图拉真广场等。只是到了1世纪，随着著名的奥古斯都和平祭坛在马尔斯广场上的建立，我们才发现和平真正成为城市的特征。在罗马人的思想中，和平



马尔斯·乌尔特（复仇者马尔斯）神庙的幸存遗址，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奥古斯都广场。这座神庙公元前2年献给战神，是广场上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它的描述性名称暗示了奥古斯都的养父、尤里乌斯·恺撒之死，神庙中供奉着他的崇拜塑像。

女神与战神并列并无嘲讽之意，因为和平和胜利同样是罗马统治的象征。若究其原因，我们需要考察罗马社会与战争之间那种特殊的、不断加深的关系。



这是发现于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1世纪的银皮带扣，描绘了母狼给罗慕路斯和勒摩斯哺乳的情景。根据传说，罗马城的创建者们在经过非正统的养育长大后，像强盗一样过着好战的生活。

重甲步兵和城邦

在最早时期，希腊思想对罗马的战争与和平产生了同样深远的影响。服兵役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这是支撑希腊城邦军队和罗马军队的共同观念。在埃特鲁里亚统治衰落期和共和时代早期，罗马人认为那些财富充足之人在公共广场和战场上为城市效力是理所当然的。军事改革因而成为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基本组成部分。

李维和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确信，约公元前579年至534年间的罗马国王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Servius Tullius）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塞尔维乌斯宪法》），深刻地影响了罗马国家的发展。改革的核心是人口登记，要求公民按财富等级进行登记，这种措施在以后历代的罗马经济与军事生活中都将起到重要作用。对被归功于图里乌斯的这项十分复杂的改革措施，多大程度上真正由他实行还有待商榷。然而，对于政治领域中选民的组织和为战争有效地调动国家联合物资来说，似乎对公民进行某种分类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百人团”或叫百人队，是男人们在公民大会中的选举单位，至少也是过去在战场上作战的单位。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只按人头统计，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参加主要战线的战斗，因为他们买不起所需要的军事装备。

公元前6世纪意大利战争的鲜明特点是希腊重甲步兵方阵的引入，它无疑需要参战者支出一大笔经费。配备着圆盾、重甲、长矛的重甲步兵体现了战场上的新理念。旧的英雄理念——单兵格斗、尚武精神日渐为强调高度纪律性的协同作战和不事张扬的新理念所削弱。在当时人看来，荷矛的士兵以八排或更纵深的紧密方

这是公元前4世纪佩斯图姆（现今的佩斯托，位于那不勒斯附近）地区的一幅墓画。图上描绘的是身着护胫、胸铠、手持一面巨大圆盾的希腊式重甲步兵，还有一名身着同样装束的骑兵。公元前410年，佩斯图姆这个希腊殖民地被奥斯坎（Oscan）民族的一支——卢卡尼亚人（Lucanians）占领了，公元前273年成为罗马的一个拉丁殖民地。



阵共同前进，这种协同作战的理想效果就像碾子一样（phalanx），方阵正是得名于这种形象的比喻。

尽管传统形式的战斗，如突然袭击无疑仍继续存在，但是重甲步兵战斗在战场上占据优势有重要的社会内涵。构成方阵的士兵大部分都不再是贵族（他们担任骑兵），而是普通农民。对这些农民来说，在军队中的作用越大，就意味着他们在公民大会中的地位越高。然而，就更广泛的希腊文献来看，这种制度自然会限制重甲步兵作战的程度。农民兵无法长期闲置他们的土地，因此许多正式的交战最多在数天之内就要结束。

罗马战争走向成熟

只要敌人相距近、战时短，就能继续保持这样的战争模式，但是到了公元前5至4世纪，意大利局势不断变化，改革作战方式显得越来越迫切，尤其是罗马与相邻城市维伊的战争以及后来与高卢移民的战争，引发了新型的、更具罗马特色的战争形式的出现。

当我们阅读古代文献对罗马和维伊之间的长期冲突所做的宏大叙述时，很难想到两个城市的距离不超过15公里。然而，即使战争距离罗马如此之近，也对城市的军事资源造成了几乎难以承受的压力。如果农民兵得不到某种形式的补贴，他们就无力参加旷日持久的包围战，这种战争在公元前396年占领维伊时达到了顶点。因此，国家首次开始给士兵发放军饷。公民队伍的不断扩大也对军队性质的不断变化具有深远的意义。邻近的几个拉丁城市一旦被纳入罗马的统治之下，他们的人民就成为罗马公民。因此，随着罗马实力的增强，它能征集越来越多的公民为进一步扩张作战，这一点至关重要。在积聚力量向维伊发动最后的猛攻时，罗马军队人数增加了一半，达到6000人。军队人数这样猛增很可能也需要对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的等级制度加以改革，因为现在许多被征召入伍的人买不起胸甲或胫甲。这些人由于缺少盔甲，似乎采用一种长而弯曲的盾牌（Scutum）代替，这种盾牌取代了前几个世纪一直作为罗马士兵形象象征的那种小圆盾。

对于当时那些来自拉丁和同盟者地区（Socii）、成为罗马作战部队重要组成部分的士兵，我们了解的还很不够。罗马作家不太有兴趣描写这些作为非公民、不太引人注意的人物。同盟者军团被称为“ala sociorum”，这一名字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这些士兵事实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仍然不被当作正式战争的主要力量。“ala”一词的意思是“翼”，反映了同盟军团在战场上的位置。他们位居两翼，在战略上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不如罗马军团的位置那么显赫。罗马军队越来越依赖非公民，这对后来几个世纪罗马世界的战争与和平的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元前390年，高卢发动对罗马的猛攻，这一事件使罗马人在心灵深处对“北方蛮族”感到极度恐惧，但这也可能是促使罗马进行改革的原因，这次改革最终使罗马人获得了胜过对手的决定性优势。这一新思想主要归功于独裁官卡米利乌，他领导夺取了维伊城，后来又抗击高卢人，但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也许正是在与高卢人的流动作战过程中，或者是后来几十年中在亚平宁高地抗击萨莫奈人（前343～前290年）的战争中，证明了罗马方阵的笨拙并开始寻找替代形式。指挥官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2世纪早期的罗马士兵。他们以密集队形排列、手持矩形盾牌，时刻准备战斗。这个画面选自装饰图拉真柱的浮雕带。图拉真柱是为纪念图拉真在达西亚（现代罗马尼亚）进行的战斗而建。这幅浮雕强烈地表现出列队有序、着装整齐的罗马军团战士的纪律和决心。

采用步兵中队，每两个百人队组成一个步兵中队，既能独立进行战斗，又在大部队之内。这种更灵活的战术形式与更广泛采用的长盾以及日渐受到重视的投掷武器相得益彰。现在，罗马军队的运作不仅比希腊方阵更灵便，而且比凯尔特人的军队更具凝聚力，罗马军队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战术通道，对罗马统治意大利及更远地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更高层面上，这个时期罗马军队的组织反映了罗马政治的持续关注。征召服役的全体兵士，或叫兵团，当时首次被分为两个军团（持续到公元前362年），然后又分成四个军团（直到公元前311年）。执政官每次当选任期一年，各统率一半军队；六名保民官统率各个军团。指挥权的分割、任期缩短以及由公民大会选举所有这些职务的担任者这一事实，反映了独特的罗马制衡体制。它也反映了罗马世界战争与和平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执政官在军事和民政事务中都是最高官员。

到公元前265年，这支基本由公民组成的军队已经征服了意大利。在近一个世纪的集中扩张时期，罗马打败了由亚平宁人、埃特鲁里亚人、波河南部的高卢人和南部意大利的各个民族组成的萨莫奈部落联盟。为了巩固和平，罗马人使用了两种策略，这些策略将成为以后几个世纪罗马帝制印记的特征。全天候的道路从根本上缩短了通往被征服地区及彼此之间的路途，使罗马军队能快速将兵力调遣到任何骚乱的中心。此外，在原来反对罗马统治的地区建立由忠于罗马的公民构成的殖民地，使之成为安全的避风港和可靠的基石。

战争的代价与和平的价值

在罗马一步步上升为地中海霸主的过程中，奉行冷酷的实用主义的罗马军事政策证实了同样的核心原则：永不议和；残酷地掠夺人力储备；效仿敌人最有效的战略（但只要有可能，就要更大规模地实施）；只有在对己有利时才显示对敌人的慈悲。

对那些接受过希腊战争艺术教育的人来说，罗马拒绝议和最初曾令他们恼怒，后来，当罗马军队显示出重建、改革并重新回到战场的能力时，他们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的术语“皮洛士的胜利”（Pyrrhic victory）使罗马最强大的一位对手——皮洛士的名字流传至今，这一切并非偶然。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King Pyrrhus of Epirus）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将军之一，指挥着一支杰出的职业化军队。他铭记敌人的军纪，在抗击罗马军队时多次获胜，然而最终是他撤出了意大利，罗马却坚持下来了。

忍耐力也是罗马在三次布匿战争中与迦太基对峙时表现出的主要特点，它是罗马在西部地中海最危险的敌人。公元前216年，即皮洛士死后大约60年，发生了坎奈（Cannae）之战，据说5万名罗马士兵及其盟军在一天中丧命于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手中。但是，罗马不仅拒绝谈判，而且拒绝赎回罗马战俘，甚至禁止战俘的家属私自筹钱赎回他们。罗马人没有求和，而是采取非常措施招募和武装部队，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决心。为了装备四个新的军团，他们拿走了神庙中用以炫耀的武器，这些武器是在以前的战争中缴获的；又购买了8000奴隶，让他们恢复自由并将他们征召入伍。这最后的举措特别令人瞩目：即使在这样艰难的境地中，罗马人仍然坚持某些标准，不肯接受奴隶代表他们作战的观念。经过几次战斗，罗马人终于报复了他们的迦太基敌人。在公元前202年的扎玛之战中，西庇阿·阿非利加在战场上彻底打败了非洲人。跟罗马人不同的是，迦太基人随后就准备求和了。

在与迦太基的长期对峙中，罗马人有关恰当的战争行为的理念必然延伸至地中海世界的战斗中，这是一个极其不同的新战场。在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制造热潮中，他们仿造一艘俘获的敌船建造了一支舰队。他们还为海战引进了一种新的装置，这项非凡的技术革新叫做“corvus”——一种带大钉的浮桥，可以从罗马船的甲板降下搭到敌船的甲板上，把两船连在一起，使罗马士兵很容易就能登上敌船。这一革新极为成功，但是，在风大浪急的海上，浮桥会使船只头重脚轻。在公元前3世纪50年代中期，罗马舰队的人和船在一连串强烈的风暴中都遭受了重大损失，这很可能是浮桥造成的。罗马人替换了数以千计被溺死的水手，继续战斗。而且，他们的水性出奇得好，屡次打败经验丰富的海上对手的军队。海上惟一一次重大失败是公元前249年的德雷帕纳（Drepana）海战。有趣的是，罗马评论家将此次灾难归咎于指挥作战的执政官不敬神。据信，如果鸡群的胃口好，神就会支持罗马的军事行动。不幸的是，执政官的鸡群都没有受命吃食，他振臂一挥，将



这是《西庇阿·阿非利加的节制》(*The Continence of Scipio Africanus*) 的局部画面，该画由乔凡尼·巴提斯塔·提埃坡罗 (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 于1745年创作。这幅画描绘了西庇阿在扎玛战役（公元前202年）中击败汉尼拔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扎玛战役宣告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结束，也为西庇阿赢得了"阿非利加"(Africanus) 这一光荣称号。

这些不幸的家禽投入大海，说如果它们不吃食，它们就要喝水。尽管完全奉行冷酷的实用主义，但罗马的战争行为一直掺杂着复杂的宗教信仰和习俗。

希腊作家波利比乌斯在叙述第二次布匿战争时，谈到了罗马的政治制度及罗马军队。二者的并置说明他也认识到国家与军队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他的著作写于约公元前160年，但取材于更早时期，其叙述对与汉尼拔作战期间罗马军队的组织提出了真知灼见。所有财产价值超过400蒂那尔的人都有资格应征入伍，但是一旦参加战役，国家就给他们发放津贴。最穷的新兵称为"velites"，即轻装步兵，他们参战时最多只是手持一面圆盾和一柄长剑保护自己。他们头戴外罩狼皮的头盔，作为散兵作战，每个军团约有1200名这类士兵。富裕一点的士兵组建成重装步兵团，按年龄和经验进一步划分。他们中间最年轻的士兵叫做哈斯塔提（hastati，每军团1200人），被置于紧靠敌人的位置。年龄大一些的叫做普林西比（principes，每军团1200人），年龄最长的士兵叫做特利阿里（triarii，每军团600人），站在后排充当后备。这三种士兵的装备大致相同，包括胸甲、头盔、胫甲和长盾。士兵们先是向敌人投掷重型标枪，然后用短剑（gladius）结束战斗。每个军团都包含一组300人的骑兵。在布匿战争中的许多战役中，尽管骑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军团中服役的骑兵数量却很少高于这个数字，而实际上，在晚后年间他们的数量更少了。公民兵主要担当步兵，非公民提供大部分骑兵。

后来正是这支军队为罗马赢得了布匿战争。然而，尽管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的毁灭使罗马获得了地中海的统治权，但并没有带来和平。对这片广袤的领土进行占领和剥削导致许多战线发生了冲突，所有这一切绝不是罗马人自己选择的。

马略的骡子们

在布匿战争后的年代里，人们常常忘记战争中的老兵得到的沉痛教训。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随着罗马军队在战场上接连败退，公民军长期存在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出来。在非洲，罗马军事优越性的观念遭到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无能与腐败的可悲传闻在一支罗马军队投降后达到了顶峰。在高卢地区，罗马军队多次败在凯尔特游牧部落手下。公元前105年奥兰治（Orange）战役是众多交锋之一，罗马在这次战斗中遭受的损失至少相当于坎奈之战的损失。

这个时代也经历了改革的尝试。都曾担任平民保民官职务的格拉古兄弟提倡革命性的改革，这些措施具有民事与军事影响。长兄提比利乌斯·格拉古主张重新分配土地，他指出，这样的政策不仅有利于较穷的公民，而且将增加有资格在军团服役者的数量。十年后，提比利乌斯的弟弟盖乌斯提倡服役条件的几项改革，包括国家承担士兵个人装备的购买费用、限制军官对其手下士兵施加酷刑的权利，显然还限定了军事服役的

期限。尽管格拉古兄弟提出的改革主张意义重大，但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中，军事改革成就最突出的人物是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他是一名成功的战争统帅，曾经平定了非洲行省的叛乱，打败了游牧的凯尔特人。然而，正如所谓的军事改革家通常都存在这类问题一样，很难确定在所有归功于马略的改革中有多少是真正由他实施的。

撒路斯特曾记录了一篇被归为马略的演说辞，时间是在他首次担任执政官（前107年）之初。演说辞的主题是军事事务专业化的必要性。由于近来的失败，罗马的“贪婪、无能和自负”受到了谴责，但是马略向他的听众保证，他当选后将改变军队的指挥和训练。可以肯定，马略已做好了改革的准备。他决定向无地者（the capite censi）开放军队的军阶，这些人曾经被认为太穷而不能为军队服役，这项改革措施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这既不像我们有时提到的那样具有创新性——在坎奈之役之后，我们已经看到征兵策略出现了某种灵活性——也肯定没有打算作为一种长期模式。然而，有了这项举措，加上马略本人长期担任军队统帅（他史无前例地连续六次担任执政官），罗马军队日益呈现出职业化的特征。

马略带军的特点是努力作战、努力训练、艰苦行军。而艰苦行军逐渐成了新军团士兵的特征。在行军途中，士兵们在装备的重压下累得摔倒，因此马略军中的士兵逐渐被称为“马略的骡子”。不仅要携带武器，而且要携带挖战壕和做饭的器具，这一艰难的任务表明了罗马战士的一些特殊身份。在许多方面，他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人，一名强大的战士，但是他还要从事战场以外的一些艰苦的体力劳动。

有两项有不同程度确定性被归功于马略的其他变革，它们对军团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一项是战略学说的发展，包括将步兵中队改成约四百八十人的步兵大队作为基本战斗单位。现在，每个军团都由十个步兵大队组成。这项改革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确已完成，它继续保留百人团作为军事管理单位，但是在军队的社会结构上进行了一些补充性变革。在国家的支持下，现在可以保证士兵获得大致相同的装备水平。战士们不再依据他们自备装备的能力列队。

另一项重要的改革是决定采用鹰作为军团的主要军标。军标在罗马士兵的生活中将扮演重要角色，日益受到士兵的崇敬，它们立于每个营地的中心以及任何战斗队的中心。到马略统帅军队之时，罗马军队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军标，但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朱庇特的象征——鹰将成为军团集合的标志及其灵魂。失去自己的鹰旗是一个军团蒙受的最大耻辱。

在打败朱古达和威胁山南高卢的凯尔特人部落之后，马略的军事生涯又经历了两次事件，这两次事件对军队与社会的关系将有深远影响。第一件是同盟战争，此次战争中马略担任副统帅。公元前94年，住在罗马的意大利人获得了公民权，但是亚平宁半岛其他地方的许多同盟却未能享受这一特权。他们对于低人一等的待遇愤愤不平，终于发展为从公元前91年至89年的公开战争。罗马综合使用了武力和外交手段才得以解决这场冲突，但最终还是导致公民权扩大到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然而，这场危机造成的后果是许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农庄。这些发展致使军团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因此，无论是就经济还是就地域而论，罗马公民单位从总体上比先前更多的意大利人力储备中得到了补充。

正是马略的最后一次任命引起了军队与国家之间不祥关系的发展。本都（位于现今的土耳其）国王米特拉达弟入侵希腊。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鲁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受元老院任命开始抗击米特拉达弟，但不久以后，统帅权被转给了马略。苏拉做出了惊人的反应：为保住自己的统帅权，他率领自己六个军团的部队向罗马进军。这是一个教训，这种教训不久还会出

马略呼吁重塑古代价值

我讲话并不是字斟句酌的。对这些讲话技巧我毫不在意，正是我的对手们才需要讲话的技巧帮助他们掩饰自己的可耻行为。我也没有研究过希腊的学问，我对这种不能提高其专家们的道德的学问不感兴趣。我所学到的知识使我能够最好地为国家服务，这就是把敌人打倒在地，坚守岗位，除去不好的名声之外一切都无所畏惧，能同样地忍受得住酷暑与严寒，席地而睡，同时经受得住困苦和饥饿。这就是我用来鼓励士兵的课程。我不想让他们过苦日子而我自己却过优裕的生活，也不想通过他们的劳苦赢得我个人的荣誉。这才是一个公民领导他的同胞的正确方法。要知道，自己过着豪奢的生活却以严酷的纪律来控制自己的军队，这是僭主的做法而不是统帅的做法。你们的祖先正是通过我上述所说的行为方式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赢得了荣耀。

撒路斯特，《朱古达战争》（The Jugurthine War）（85）S. A. 汉福德（S. A. Handford）翻译

现，即军队对罗马自身而言可能有多么危险以及军队如何越来越倾向于指望自己的统帅而不是元老院获得领导权。马略死后，苏拉继续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任意行事。他的老兵们都正式地在那些曾抵制他的地区征收的土地上定居下来。

伟大的将军，个人的军队

苏拉开了先例后，其他人纷纷效仿。公元前1世纪的明显特征是几个实力雄厚的个人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统帅的罗马军队首先效忠于其统帅。事实上，军队对统帅是如此忠心耿耿，以致他们的统帅竟能让军队与他们的罗马同胞交战。文献中清晰地记载了这些战争领袖的人格魅力，但这只能部分地解释这一现象的出现。当时的很多士兵来自没有土地的阶层，退伍后他们无以为生，除非他们的统帅通过与元老院谈判为他们争取到土地。此外，长时期在远方服役也减少了他们在感情上与国内社会的联系。这种情形对罗马共和国和日益形成的帝国主义特征意义重大。随着元老院势力的瓦解，出现了新的独裁者，他们将罗马的疆域延伸至地中海沿岸之外很远的地方。

然而，这些实权人物的兴起必须被置于意大利的背景下观之。他们的行动是为了转化为只有罗马才能提供的政治资本。并且，他们中有许多人由于在共和国的心脏地带抗击威胁而闻名，例如，镇压著名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的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斯巴达克是个角斗士，公元前73年，从卡普亚（Capua）起兵挑战罗马权威，留下深远影响。对这次冲突的记载反映了罗马战争中各种重要的主题。首先，我们知道斯巴达克原先曾以辅助军的身份为罗马军队服役，是一名非公民士兵。在文献资料中，可能在现实中也往往如此，特别危险的敌人就是那些曾经为罗马服役的人——在反叛先前的主人之前，他们已经学会他们的交战对手的伎俩了。其次，我们看到罗马失败的情形都很相似，直到纪律严明的统帅带来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克拉苏采取了果断、残酷的手段，对从懦弱无能的前任手中接管过来的两个战败军团实行“十一抽杀律”。对后来几代人而言，军队统帅选出部分士兵处死这种惩罚形式，无论在现实中的使用多么罕见，仍然成为罗马军纪的残酷本质的象征。这种残酷无情的惩罚的基础是军队归自己所有的观念。克拉苏认识到，除非他利用自己的资源供养一支军队，否则没人会认为他有钱。有时，正如克拉苏、恺撒和庞培结成的同盟一样，这些势力强大的统帅会强迫元老院认可他们的军事主动权。一旦握有大批军队，这些人就有实力发动超出元老院意愿的冒险军事行动。

这个时期在战场和政治舞台上同样闻名的还有格奈乌斯·庞培（Gnaeus Pompey）。尽管古代文献试图反映战争主要关系到军队和城市之间的冲突的观点，但对许多普通人而言，对生命和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有组织的犯罪。土匪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地中海的海盗几乎成了一种时疫。当海盗们鲁莽地绑架了两名在阿庇亚大道游览的官员时，元老院决定采取行动——授予庞培特殊权力以及一支拥有两百艘船只的舰队。庞培的同代人称，庞培在三个月内就解决了海盗问题，而这些海盗曾在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使地中海航行成为一个梦魇。庞培清剿海盗的战役无疑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在整个帝政初期，海上劫掠和土匪抢劫仍继续困扰过往旅客，尽管规模已经减小。剿灭海盗的战役一结束，庞培又击败了米特拉达弟，吞并了叙利亚，同时还提出一系列对整个罗马中东地区的行省组织具有深远影响的议案。在这些议案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培植“友好国王”，即在罗马领土边缘地区的缓冲国培植傀儡统治。庞培的老兵们把自己的将来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当庞培回到罗马为这些老兵争取土地时，遇到了重重困难。当元老院表明不与他合作时，庞培与克拉苏以及声名不如他们显赫的第三个同盟者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结成了政治同盟，即我们现在所谓的“前三头同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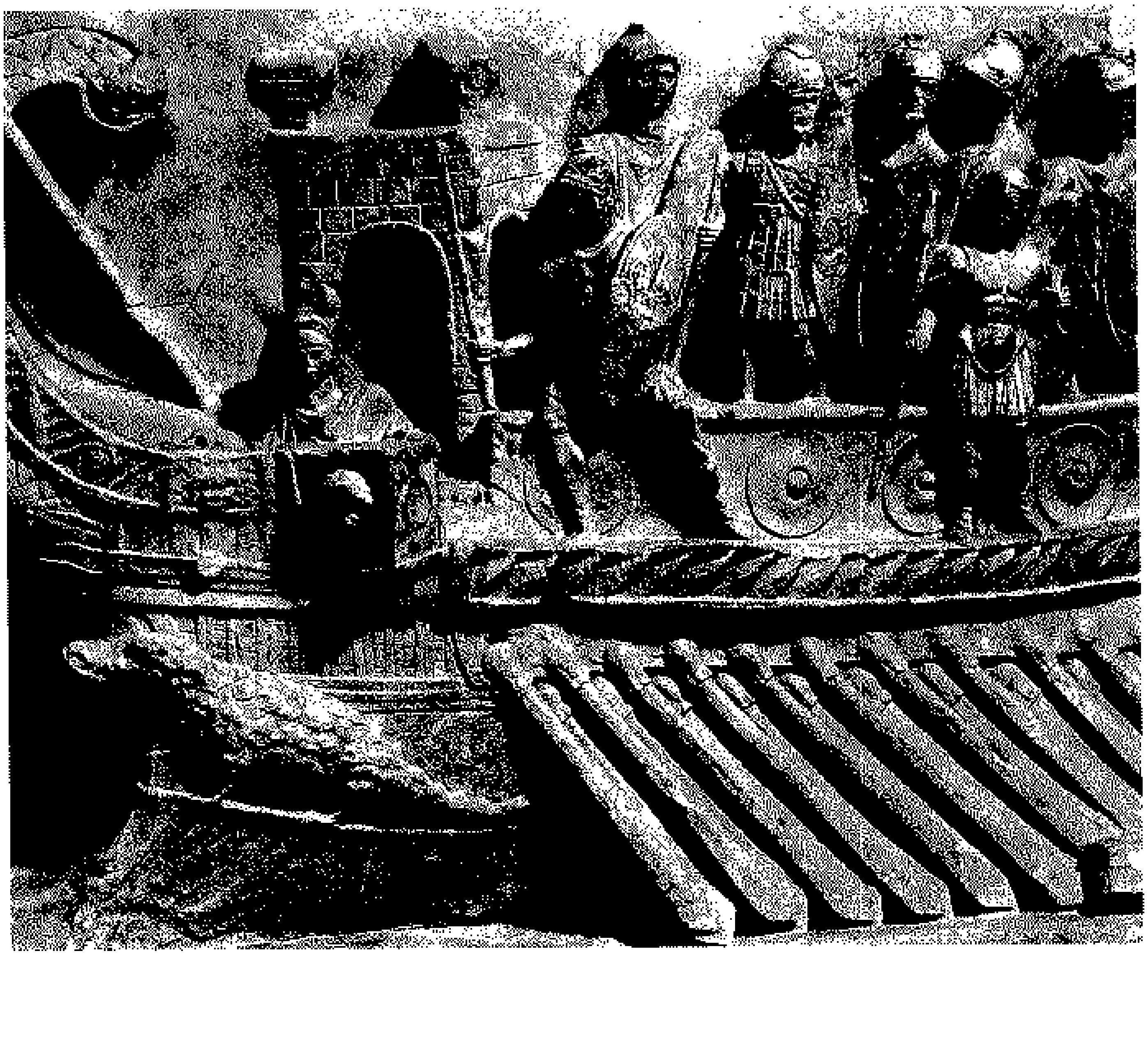
这位资历较浅的同盟者恺撒继续证明那个时代的精神。尽管不是一位军事改革家，但是他使其军队的战斗力达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高度。他保留了有经验的士兵，凭借自己非凡的领导才能使其不断发展壮大。他充分利用当时军队特有的个人对统帅的忠诚。这种至关重要的关系由士兵向他的统帅发誓（sacramentum）得到巩固，又通过分发战利品得到加强。在古代世界，战争是有利可图的。一场成功的战役会给统帅和士兵们带来财富，恺撒的士兵们也因此获益。然而，从更宏观的罗马历史背景来看，恺撒不是因其作为战争领袖、

英勇无畏和足智多谋的行动而闻名于世，而是由于他的野心使其扩大罗马疆界所达到的程度而闻名。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恺撒那样扩大罗马的势力范围。在公元前59年当选执政官后的十年中，他镇压了游牧的赫尔维西亚人（Helvetii）、征服了高卢、两次远征不列颠，并迫使日耳曼人就范。严格来说，他在不列颠的军事行动已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但是却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原动力在共和时代的衰落期运作的方式。为了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恺撒将自己对其战役的评述送回罗马，它们回忆了那些尽管为他赢得高度赞誉但军事意义却不甚明朗的远征活动。对横渡英吉利海峡一事，恺撒向他的读者保证，罗马军队能够安全渡过海峡，跨越他们所知的世界的边界。

在这个由强权人物和腐朽的元老政权共同驾驭的新的罗马世界中，伟大统帅与其军队冲突的结果，在事后想起来几乎难以避免。公元前49年恺撒与庞培的交锋标志着当罗马军队相互遭遇时，一系列损失惨重的冲突的开始。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身亡，持续不断的内战进一步加速了共和国的灭亡。随着公元前31年恺撒的侄子屋大维在阿克兴海战中获胜，罗马世界的秩序才真正建立起来。

尽管军队统帅频频更换，但在公元前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仍持之以恒的坚持既定的军队服役原则。然而，随着作战军队服役期的延长，出现了日益专业化的迹象。事实上，有些士兵服役很长时间才退役，远远超过六年的最短服役期。他们丰富的作战经验使他们成为战场上格外令人畏惧的敌手。军官阶层的变化也预示了后来的发展。执政官在任职期间不再允许到国外征战——这条法律措施改变了军队统帅首先是罗马公民这一特点。此外，我们开始看到下级军官以更系统化的方式通过指挥链不断得到晋升。这一举措在多大范围内得到实施很难估计，但是庞培麾下的一位军官——马尔库斯·皮特里乌斯（Marcus Petreius）的军事生涯极具说服力。他从一个军团的保民官，升至行政官（可能指挥非公民士兵），最后升至军队副统帅。

在军团体制之外，罗马人继续雇用非公民士兵——这一举措在几代人以前就已经完备确立了。然而，所不同的是，此时这些战士都是从意大利以外征募的。巴拉里克（Balaeric）的投石手和克里特的弓箭手都曾短期为罗马军队服役。尽管之前罗马军队已多次使用投石器和弓，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公民士兵充当重甲步兵的作战传统中，它们几乎没有地位。由于强调继续重视军团步兵的首要地位，导致公民骑兵消失。骑兵现在也从意大利以外征募，如努米底亚、日耳曼以及高卢地区。当恺撒的一名对手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攫取了高卢的征兵地盘时，西塞罗的担忧反映了当军队统帅欲将更多人投入战场时，他们越来越依赖于这些辅助军队。



这是1世纪的一幅浮雕上雕刻的一艘典型的罗马战舰。庞培的舰队，经元老院公开授权清剿地中海的海盗，由200艘这样的战舰组成，每艘战舰都配备重甲士兵分遣队。以这样的行动自由指挥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为庞培在罗马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战争与和平的主人

盖乌斯·屋大维（后来被称作奥古斯都）的胜利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尽管奥古斯都的宣传往往将这个时代描述为共和国理想的回归，但它已被正确地定义为一次革命。在奥古斯都的主持下，军队经历了一场改造，其意义不亚于国家其他部分的改造。如果军队要防止那些颠覆共和国的问题重复出现的话，就必须进行改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要付出代价。现在，所有军队的指挥权，实际上是发动战争的特权，全部掌握在奥古斯都一个人手中，作家斯特拉波恰当地称他为“战争与和平的主人”。

大量服役军人成为内战遗留下来的一支潜在的破坏力量。奥古斯都认为罗马帝国现在需要比传统的10至14个军团更多的军事力量，因此他保留了内战期间成立的许多新军团，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军团成为永久编制，军饷数量也标准化了。公元前13年进行的军事改革也包括将服役期从6年延长到16年，还有另外4年的预备役。服役期满后光荣退役，就被授予一份土地或现金或二者兼有作为报偿。由于这些规定，在很多方面奥古斯都可以宣称他正在效仿共和国时期的先例，但结果是更多人服役更长的时间，使得军队成为古代世界最有经验的军队之一，士兵个个都是最有经验的士兵。最后，士兵们服役25年后才被授予光荣退役成了通例。奥古斯都效仿他的前任们，通过建立新的殖民地回报服役期满的老兵们，其中许多殖民地都建在意大利之外。公元前30年，为了满足内战中急于退役的老兵的需求，通过了一项土地法案。同时，奥古斯都可能还针对普通士兵提出了其他条件，特别是普通士兵不能结婚的法律。罗马士兵现在真正成了职业化的士兵，脱离了公民社会。

奥古斯都的改革不仅涉及正规军团，而且涉及辅助军团（auxilia）。这些军事单位最初打算作为非公民军团，但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起，公民也加入了辅助部队，此后，人数不断增加。这个时期形成了三种新型的辅助部队——步兵队、骑步兵队（骑兵与步兵的混合）与骑兵队（alae）——在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们一直是罗马军队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与那些拥有五六千人的强大军团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这些军团都是些不到500人的小军团。只是在1世纪下半叶，才出现了800到1000人的辅助军团。尽管如此，辅助军的服役总人数已经与正规军团人数相当，因此成为罗马军事力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理论上，这些辅助军是从特定的部落和地区招募的，至少起初的几个辅助军团还保持着他们家乡地区的作战传统。辅助军的装束通常有别于正规军团士兵。军团仍持长盾和重型投枪（pilum），而辅助军的装备一般包括一面扁平盾（clipeus）和一支长矛（hasta）。形成这种差别的部分原因是，早期罗马人认为辅助军在战场上应作为散兵行动，但显而易见的是，在大战中，他们往往以和正规军团同样的方式被调遣。

罗马第一批常规舰队的创建也要归功于奥古斯都。随着帝国的扩张，罗马在意大利海岸增派了新的舰队，比如，有舰队负责多瑙河、莱茵河与不列颠的防卫。尽管水手的人数增至约三万人，而且大多数是非公民，但是在我们掌握的文献中，鲜有对他们的记载。在阿克兴海战之后的几百年间，能吸引当时作家注意的那种大海战极为罕见。因此，舰队的主要作用是支持军队，可能也担当低级的抗击海盗的巡逻工作。

这个时期的高层指挥结构也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革。个别元老院议员现在也被授予军团的指挥权，每次指挥几年。此外，尽管辅助军的高级军官的组织并未定型，而是由百人队队长和被任命的元老院议员共同指挥各个辅助军队，但是这种统帅职位与骑士阶层的资格越来越趋向联合。这种联合到了朱利亚·克劳迪安（Julio-Claudian）王朝末期已成为普遍现象。事实上，辅助军的指挥权逐渐被看成是一名骑士的正常军旅生涯中的一个阶段。

然而，比这些变革更重要的是军队现在等同于奥古斯都本人，因此对继他

奥古斯都的帝国

我曾领导多次国内外战争，有陆战有海战，战火遍及世界各地。作为获胜方，我饶恕了所有告饶的人民。如果饶恕异族对我们来说很安全，我会选择保全他们的性命，而不会灭绝他们。近50万罗马公民兵宣誓效忠于我。我让30多万士兵在殖民地安营扎寨，或在他们服役期满后将他们送回家乡。我给所有这些士兵分发土地，或发放钱财作为他们服兵役的报酬。我俘获了600艘战舰，还不包括比三列桨船小的船只。

《圣奥古斯都的丰功伟绩》（3，1-4）

之后的帝王也是如此。军队对驰骋战场的将领的效忠随之成为过去，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军队指望皇帝给予慷慨的赏赐，反之，皇帝则指望军队维系其统治。因此，奥古斯都是众多皇帝中第一个重视与士兵关系的皇帝，他不仅通过发放军饷和授予职权，而且通过士兵们的宣誓、举行宗教仪式、定期观礼皇帝崇拜仪式祭仪等方式加强与士兵的联系。

除了实战军队和舰队，奥古斯都还建立了近卫军（the Praetorian Guard）负责保护他的个人安全，这支精锐的近卫军的军饷是普通士兵军饷的三倍。尽管偶尔卷入令人厌恶的帝国权力之争、定期遭到遣散，而后又从辅助军团中抽调其他的护卫军来抵充，但是近卫军作为执政帝王自己的兵力一直保留到4世纪。

奥古斯都的军事改革的最终结果是获得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够成功地击溃皇帝在国内外的敌人。考虑到军队史无前例的规模和职业化，很容易明白诗人及宣传者维吉尔如何能从当时的历史证据中看出罗马对无限的权力（imperium sine fine）享有神授的权利。

然而，罗马军队并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公元9年，在深入日耳曼地区的一场灾难性的战役中，普布里乌斯·昆提里乌斯·瓦鲁斯率领三个军团及其附属的辅助军团在条托堡森林深处遭到伏击，全军覆没。设计屠杀他们的是一个名叫阿米尼乌斯的日耳曼将领，他本人原先是罗马的一个辅助军战士。这场灾难动摇了罗马统治的核心，领导以最快速度扩张帝国的皇帝奥古斯都建议他的继承者提比略维持帝国现有的疆界。尽管这种做法也许意味着他实事求是地承认了帝国力量的局限性，但显然并不是罗马扩张终结的标志。

维护罗马的和平

这一概念不应与我们现代“维护和平”的概念相混淆。一旦发生冲突，罗马支持维护罗马利益的最强大的一方，如有需要，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因此，罗马的和平是不平等的和平，这种和平在罗马世界的很多地区都需要依仗暴力不断地重新确立。在哈德良统治之前罗马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决定了这种新型和平的形式，哈德良既得益于这种和平又从中遭受了损失。

几乎从奥古斯都去世的那一刻起，他的新式军队所固有的危险就极其清晰地凸显出来。莱茵河及潘诺尼亚（Pannonia）等地的军团中爆发了叛乱。塔西陀的著述以怜悯的、近乎戏剧性的笔触描绘了这些叛乱者，我们听到掉光牙齿的老兵悲叹他们的命运。在这些不幸的士兵中，有些据说已经服役40年。在叛乱者的抱怨中，首当其冲的是军饷、该授予退役士兵的土地及百人队队长的暴行。有一个绰号叫“再给我一根”的百人队队长，在对士兵施以惩罚性的鞭笞时，每次打断藤条棍后，总是叫人再换一根，由于这种习惯，他得了上面的绰号，他是被愤怒的士兵杀死的那些百人队队长之一。经过王室成员出面斡



近卫军军官及其部队，见于2世纪的一幅浮雕。近卫军是由皇帝的卫兵组成的一支强大的军团。尽管奥古斯都之后的皇帝们曾努力控制他们，但是他们逐渐在罗马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旋、许诺（但事后他们违背了诺言），又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才使这些军团重新恢复了秩序。

罗马从中召募辅助军的那些地区也有理由为罗马和平的代价感到懊悔。在提比略执政时期发生的一件有启发性的事件中，色雷斯部落针对罗马从他们的居民中招募新兵（dilectus）发动叛乱。他们担心他们的部队将与其他人混合，被派到边远地区，结果证明，他们的担心是正确的。那些随后被征入伍者，很少有人再见到自己的家园。被征为辅助军成了某种形式的放逐，事实上，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征募被用作帮助骚乱地区平定叛乱的一种工具。依照罗马惯例，地方国王、其非正规军及其他辅助军团（在这次事件中是从莱茵地区招募的）帮助镇压了这次叛乱。从此，罗马连续几百年都从色雷斯征召士兵。在3世纪，一位名叫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的新兵将成为皇帝。

色雷斯人叛乱这样的暴动最终可能导致了辅助军服役条件的进一步改善。长期以来，尽管罗马公民权已经被授予共和国内的忠实同盟，但是直到1世纪，罗马才开始系统地用这种方式奖励服役的辅助军。克劳狄奖励所有为罗马服役至少25年的辅助军士兵，授予他们公民身份并且承认他们所有子女的合法性。在遍布帝国的遗址上，都发现了刻着姓名、授予物及被授予人的详细情况的青铜证书（diplomas)。这些证书提供了有关新兵征募、军队部署和老兵安置的重要信息。所知最早的证书出自52年。

在1世纪60、70年代，罗马维护和平与帝国安全的观念将在各种挑战中面对巨大的考验。首先是60年至61年在波狄卡率领下的伊克尼人起义，这一起义生动地说明了滥用维护和平的策略可能激起毁灭性的叛乱这一情况。波狄卡的丈夫普拉苏塔古（Prasutagus）生前是亲罗马的代理统治者，他一死，当地的罗马当局就决定将伊克尼王国视作被征服的领地。他们一心要剥夺、征用部落的财产，罗马士兵侮辱王后，蹂躏了她的女儿们。他们很快就遭到了可怕的报应。临近的部落也加入进来，他们对驻扎在凯缪勒敦努姆（Camulodunum）（科尔切斯特）的罗马殖民者的傲慢行为极为不满。伊克尼人的起义席卷了英格兰南部，他们首先摧毁了驻防地，然后捣毁了维鲁拉米翁（Verulamium，今名圣阿尔班，St Albans）和伦敦的罗马殖民地，最后被罗马从不列颠北部和西部匆忙召集的军团打败。殖民地并非像帝国理论家所宣称的那样，是推介罗马生活方式的广告，事实证明它是仇恨之源。

69年，不同的情况引发了下莱茵河地区的叛乱，同样引人注目。这一年以涌现出四位皇帝而臭名昭著。这时，罗马的军队已经有了各自不同的特征和效忠对象，是年他们又一次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并向罗马进军将各自拥护的候选人推上了帝王的宝座。一个辅助步兵队的指挥官尤利乌斯·西维利斯（Julius Civilis）抓住机会号召他的巴达维亚（Batavian）部落成员及其邻人起义。这次起义成为行省居民针对征兵（dilectus）发起的最后一次严峻挑战。反叛者的动力与野心交织在一起。塔西陀指出，罗马粗暴而剥削性地对待巴达维亚征兵引起的怨恨、辅助军要求加薪以及西维利斯自己的政治野心是起义的原因。在接下来发生的激烈战斗中，辅助军战士屡屡打败他们的军团对手，打破了公民兵具有战斗优势的说法。最后，罗马人与巴达维亚贵族达成协议，使他们在为罗马服役时能继续享受传统的军事特权——征兵问题的处理已经暗示出的某些事情仍面临威胁。当然，在北欧其他地方的人民心目中，传统的力量的象征——武器和劫掠由于罗马帝国对军事力量的垄断而遭到了削弱。并不是所有的地方上层人士都赞成（或幸免于）改说拉丁语、沐浴、穿宽外袍，这些构成了新的政权体制下社会身份的标志。

66年，在罗马世界的另一边爆发了犹太战争，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新近的学术研究着重强调，在罗马体制下，犹太精英们如果要在保留他们的宗教身份的同时取得发展是多么的艰难。国家不能更全面地吸纳犹太社会，无疑导致了各种敌对情绪的爆发。

罗马在镇压这些叛乱时并未放弃使用绥靖政策，罗马军队在几条战线上继续英勇作战。在不列颠，罗马人在波狄卡叛乱后重新获得了主动权，但是对于不列颠并入帝国的影响，塔西陀描绘出了一个复杂的图景。在颂扬1世纪80年代的不列颠总督阿格利可拉（Gnaeus Julius Agricola）的成功时，塔西陀指出，阿格利可拉是如何想方设法鼓励当地人放弃惯于战争的生活，鼓励他们通过致力于诸如神庙、城镇住宅等外部装饰工作竞相为罗马争光。然而，在显然是当时关于罗马统治特征的复杂讨论的组成部分中，他还让一位不列颠将领发出感叹："罗马人创造了一片荒芜，却将它称之为和平。"

帝国的边境

在1世纪晚期，罗马的扩张并没有停止。实际上在2世纪初，战士皇帝图拉真在达西亚对北方民族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战争，但对帕提亚的东方战役中，罗马并不是很成功，但是在1世纪末，确实看到了一种新现象的出现：在帝国边疆地区存在几条移动的边境线。哈德良即位后，由于史无前例地放弃了某些领土以及在某些地区修筑边境城墙，罗马疆域的范围得到了更明确的界定。不列颠北部的哈德良城墙似乎远离了维吉尔的无限权力（imperium sine fine）观念。



这是冬季看到的蜿蜒在英国北部的哈德良城墙的最清晰的走向。画面中能清楚地看到哈德良城墙沿着天然的峭壁延伸，这座峭壁向东越过豪斯斯蒂兹要塞（Housesteads Fort）附近的古迪岩（Cuddy's Crags）。哈德良城墙是一个复杂的军事工事，建有固定间隔的要塞、里程堡和角楼、一条军用道路，有些地方还有防御性的战壕。

然而，外观可能具有欺骗性。诸如哈德良城墙等帝国纪念物的坚固象征着永恒，但是在建成数十年间就已废弃，尽管只是暂时废弃，因为在更远的北部建立了一条类似的边境线，即安东尼城墙（the Antonie Wall）。最近对哈德良城墙和安东尼城墙进行的研究显示，这些城墙并不仅仅是海关关卡，修筑它们的目的事实上是希望抵御重大的袭击。防线前设置了巧妙的陷阱和障碍物，并无规则地加设了瞭望塔监视地面的山坳，以防敌人悄悄地越过防线。欧洲其他地方也有线形边防线，如莱茵河沿岸。然而，即使最坚固的城墙也没有真正标志出罗马霸权的“边界”。帝国的官员可以，也确实统治着城墙之外的人民，同时帝国发动的战争表明，罗马的统治者能自由地用战火和长剑将罗马势力伸向边界线以外很远的地方。

此外，帝国的边境并非处处都以这种绵延不绝的城墙来界定，原因很简单，即罗马所面临的人民并非处处都一样。例如，北非边境上规模巨大的线形关卡留下了数英里宽的巨大壕沟，它们构成了整个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其目的不是阻止迁移，而是通过保证干旱地区的水源来控制季节性移民的迁移。这一措施加上利用到城墙以外很远的地方进行长途巡逻的方法，表明罗马继续对帝国之外的那些地区享有统治权，即使他们并不总是想要占领他们的领土。

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人将他们的边境称为“limes”，他们也用这个词表示“道路”。这是帝国边防体系的形成和理解边境的方法的重要依据。道路在罗马投运军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们也发挥了与之相关的重要功能：便利了整个罗马帝国境内的联系。埃及境内的最新发掘报告记录了对罗马卫戍部队要塞的一次袭击。经过一场艰苦的战斗，袭击者逃跑了，同时抓走了一些平民俘虏。罗马人紧接着出动了巡逻队，找到了其中一个俘虏的尸体。在报告的最后，以另一种字体书写的指示下令将内容抄送到该地区其他要塞。很明显，各军事要塞之间系统化的联系已经成为惯例。因此，我们发现边防线上的许多部分并不以线形的关卡为标志，而是以与小道和道路系统相联系的瞭望塔为标志，这丝毫不足为奇。信号系统使得这些虽小却容易受到袭击的罗马哨所能够迅速地将信息传递给更大的兵团。

许多情况下，这些军队驻扎在边防线沿线的要塞上。哈德良城墙、安东尼城墙和莱茵河防线都有力地证明了这种部署方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我们对罗马军队部署的认识。通常，辅助部队驻扎在帝国边境的大小要塞，这些部队现在有500或1000人，包括仅被称为分队（numeri）的新型不规整部队，而正规军团仍然驻扎在控制着内陆地区战略要地的大型要塞中，但是部署方式实际上可能要复杂得多。不仅帝国东部行省的罗马军事基地与西部行省的基地部署方式一般大不相同，而且整个帝国境内的军事基地要同时集结来自

边防线上的罗马

人们对哈德良城墙上的豪斯斯蒂兹要塞的发掘揭示了许多有关罗马军事驻地内部和周围的生活情景。尽管整个帝国境内的要塞样式变化多端，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在西部行省所发现的那些要塞都具有某些明确的特征。那些大型军事要塞与豪斯斯蒂兹这类容纳1000人的小要塞一样都具有这些特征。导致这种相似性的一个原因是所有这种要塞都共同源于共和时期的战斗营房。它们本身都是罗马人关于正确组织生活空间与社会的思想的产物。

与其他大多数罗马军营一样，在豪斯斯蒂兹中心矗立着普林西比亚（principia），或叫指挥部大楼。它由一个小的开放式广场和一个会堂组成。虽然它的规模较小，但与行省城市中常见的广场与市政大厅整体相似，这种相似并非偶然。正是在这里，罗马士兵如同其平民同胞一样，聚集起来等待当局的消息、命令和裁决。在普林西比亚里，还建有一座军团圣所，用于存放军团的旗帜，军团的军饷柜也谨慎地与它存放在一起。附近是指挥官的住房(Praetorium)。即使在不列颠，这种住房仍然保持了地中海地区的城镇房屋样式，带有一个开放式的庭院。但是，这不仅仅是指挥官全家居住的场所，根据罗马传统，这里还是权贵集会和处理公务的场所。

坚固的粮仓是每个要塞的关键部分，由于其地基高出地表，考古学上很容易辨认。从其他遗址得来的考古资料和在临近的文多兰达要塞恢复的书简表明，这些粮仓存放的很多粮食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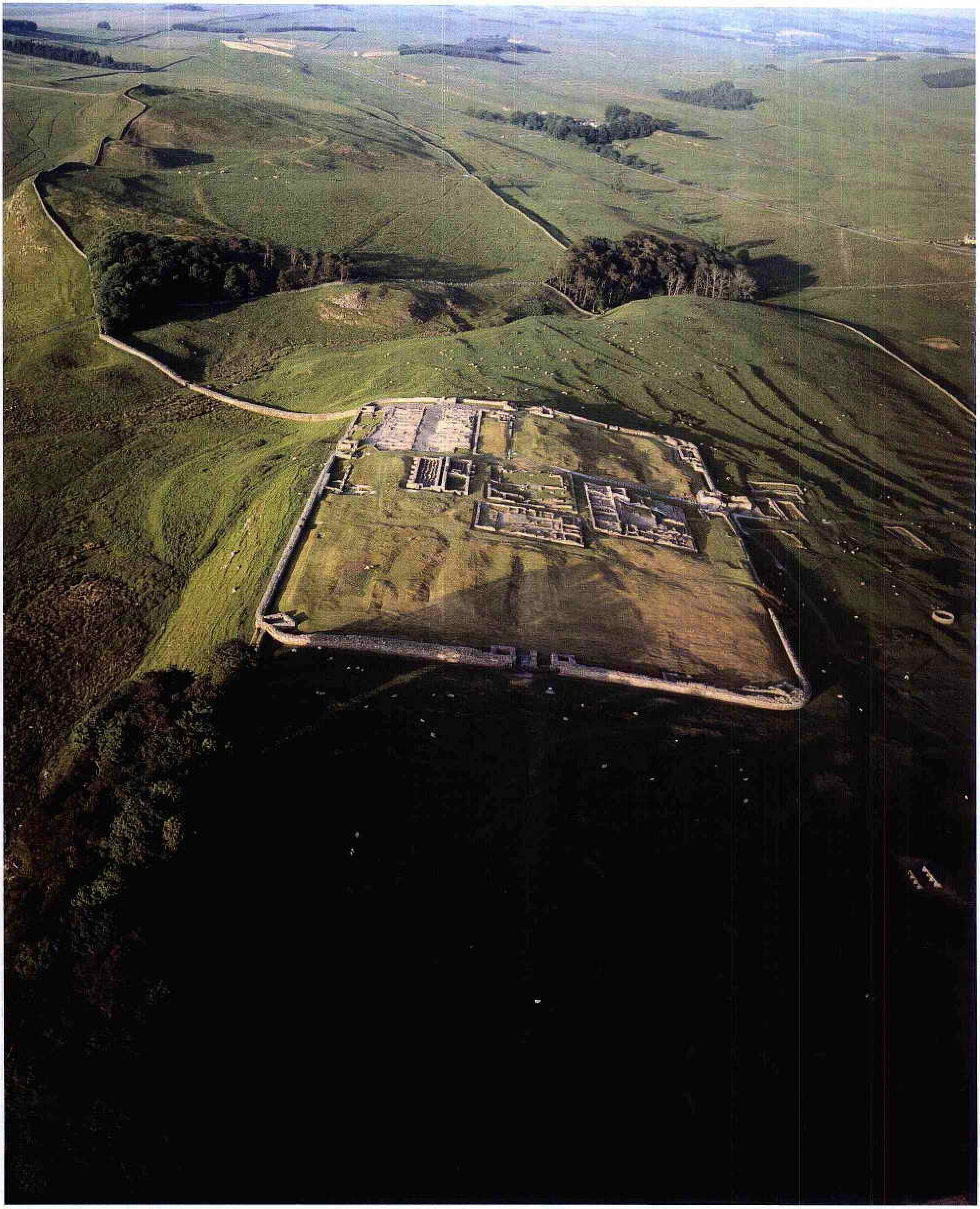
长长的营房占据了要塞内部剩余的大部分空间，每个营房能住100名士兵，每个营区的尽头住着百人队队长。在分析共和时代帐篷式的罗马军营时，历史学家认为，百人队里每个八人小分队（contubernium）都能从营区分得两间房，一间存放军备，另一间用来睡觉，但考古材料并不能使我们确定这一点。

士兵的活动并不局限在要塞的围墙之内，围墙外有一个浴室——这是文明的罗马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还有几座神庙。有些士兵崇拜波斯的太阳神米特拉斯，其他的则崇拜他们的家乡神。还有一些民用建筑，其中一些作为士兵服务的小酒店和商店，其他的则住着士兵的家属。在一个房屋的地板下，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对被杀害的男女的遗骸——边疆的生活可能很不安定。



修建哈德良城墙的目的是标明哈德良时代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也有人猜测是为控制英格兰北部边疆地区提供一种手段。城墙约始建于122年，绵延73英里，平均约7.5英尺厚（苏格兰、英格兰、豪斯斯蒂兹、文多兰达）。

（右页图）这是豪斯斯蒂兹要塞(Housesteads)的航拍照片。这一要塞建于2世纪20年代，它的北边构成了哈德良城墙的部分墙体。这是不列颠境内最著名的罗马要塞，有很多内部建筑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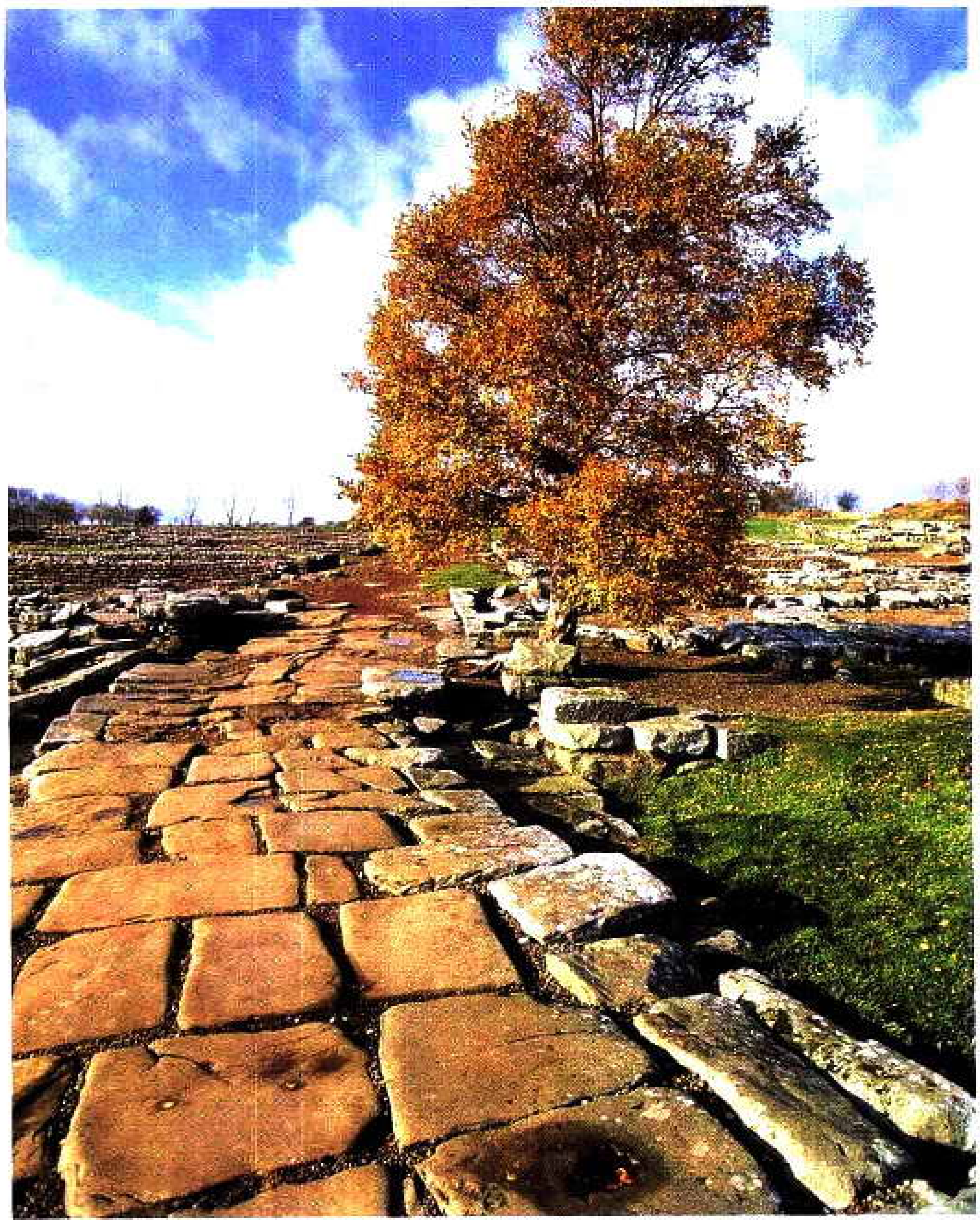
几个不同军团的士兵。几乎在假定的任何一天，帝国的每个部队都有士兵接受调遣——护送收税官、传递信息、采购物资或充当总督的近卫军。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许多士兵驻扎在边防线后方很远的地方，这也许是对传统上历史学家所假定的要塞-军团-边防线的部署模式的最大背离。最近的发现揭示出执行特殊任务部队（beneficiarii）的小分队如何被部署在道路网的关键地点和大型矿场，以保证国家利益的安全。从众多恰好位于边界后方的居民点发现的军事装备也说明，哪里需要他们的保护，需要处理军队自己的联络路线和物资供应，士兵就被派驻到哪里。不管这个地点位于广阔的行省地界的什么地方都是如此。

然而，就整个帝国来看，到哈德良统治时期，罗马军事力量显然都集中在边疆行省。这种方式渐渐强化了罗马军队的地方色彩，这一点以各种方式体现出来。罗马倾向于从近便的资源中征募士兵。有时，甚至是在比较稳定的2世纪时期，兵源距离军团总部还有很长的路程，甚至可能在另一个行省，但通常就在军团驻扎的行省招募新兵。维西（vici）、卡纳柏（canabae）这类平民居民点分别紧挨着辅助要塞和军团要塞，显然成了相邻要塞的兵源。到了2世纪中期，在军团的各级官兵中已经很难找到意大利人了。罗马军队可能包括了越来越多的罗马公民，但是罗马人民却发现他们比创建帝国的共和国时期的国民军更陌生，更具威胁性。

边防体系演化的深一层特点是许多军事驻地越来越具有永久性。尽管不断发生大规模的战斗，许多部队似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一直驻扎在同一地点。事实上，自2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军事指挥人员越来越喜欢利用分遣队而不是整个军团来组建战斗部队。驻地的持久化必然对士兵和公民的互相融合产生重要影响，但这些影响并不总是很明显。一方面，维西和卡纳柏常常具有很强的军事意义，其中一些居民点已取得自治地位。我们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几个这样的居民点在当地驻军撤走后就关闭了，但在这些居民点的外面，士兵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就更难判定了。

许多士兵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住在离营房很远的地方，我们从遗留下来的往来信件中了解到一些他们私生活的情况，但是对许多平民来说，他们宁愿与军队的联系不是这样密切，军队多半是不受欢迎的。2世纪，阿普雷的故事《金驴》，讲述了一个邪恶的士兵强词夺理的故事。一位军团士兵要将一位农民的“驴”占为己有，但是这位不幸的农民无法理解他用拉丁文下的命令。然后士兵就殴打了这位农民，农民进行了反抗，制服了那个士兵，并夺走他的剑逃跑了。然而，就是在这时，农民的厄运真的开始了，因为殴打士兵的后果非常可怕。这位士兵的同伴四处寻找这个农民，要给他严厉的惩罚。一旦面临军队的暴力与勒索，地方居民实际上几乎没有指望获得公正的对待。



这是通向哈德良城墙附近的文多兰达要塞的引道的残留路段。随着哈德良城墙的延伸，围绕着相邻要塞的居民点（vici）不断扩大，成为当地人口和当地经济的中心。要塞的辅助部队最初要从各个行省征召，后来越来越多地从当地招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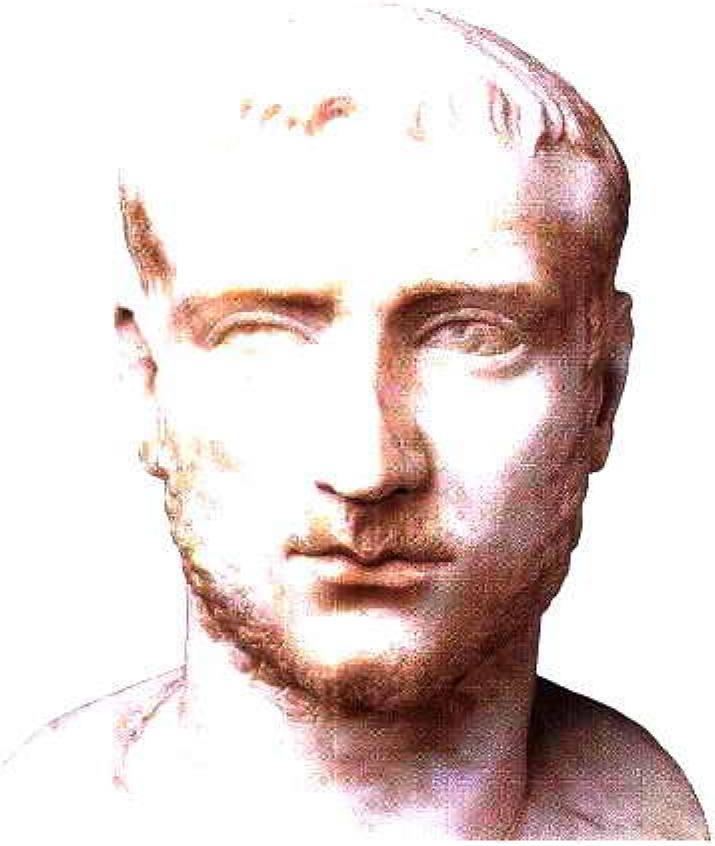
让士兵发财，别管其他人！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临终前给他的儿子提了一条建议：“记住，让士兵发财，别管其他人。”这个遗嘱反映出在帝国层面上实际情况也一样。帝国权力的得失都仰仗军队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老百姓。塞维鲁本人的军旅生涯充分证明了这一赤裸裸的对等关系：193年，他在敌对的军队指挥官的内战中获取了权力。当塞维鲁胜利之后，他声明他已经吸取了足够的教训。他对军队的改革包括增加军饷和重新赋予士兵结婚的权利，他的同时代批评家认为这些措施破坏了良好的军队纪律。由于近卫军暗杀了他的前任，他解散了这支队伍，代之以从忠诚于他的多瑙河军团中招募的一支新的近卫军。

塞维鲁的儿子卡拉卡拉接管军队后，他至少部分地采纳了父亲在船上的忠告。他也竭力使自己与军队紧密联系在一起，像普通士兵那样生活，据说，他在战役中自己碾磨分得的军粮。不过，在212年的敕令中，他最著名的做法是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的大多数自由民。这一做法的实际意义还不清楚，但至少在理论上取

193年，多瑙河军团拥立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最终的胜利者）为皇帝，与此同时，东方军团支持佩斯塞尼乌斯·尼格尔（Pescennius Niger）。尼格尔死后，北方军团坚决支持自己的候选人科洛狄乌斯·阿尔比努斯（Clodius Albinus）。





在3世纪中期，皇帝加里埃努斯（253～268年在位）无法阻止帝国陷入危机。他的改革目的在于降低元老阶层的影响，特别是对军队的影响。他击败了哥特人，但不能制止波斯人在东方的推进或高卢、不列颠和西班牙的反叛。

消了公民军构成的军团和非公民军构成的侧翼部队和步兵团（cohortes）这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可能这种差别已经减弱，因为到3世纪中期，我们发现军团士兵既非因为降级，也非因为受罚就单纯地转到了辅助大队。有意思的是，侧翼部队和步兵团在敕令颁布后并未取消，相反在后来的很多年都保持着这种编制。

由于贵族利益受到侵犯，塞维鲁的改革紧接着引起了保守派的反对，这并不奇怪，但是军队中压倒性的实用主义又一次发挥了作用。恰在这时，塞维鲁王朝终结了，它的崩溃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皇帝塞维鲁·亚历山大事实上已经无力有效地统帅和犒赏他的士兵。而且，他的谋杀者和继承人马克西米努斯·提拉克斯（Maximinus Thrax，235～238年在位）对于如何赢得和保持军队的忠诚表现出了精明的意识。马克西米努斯是一名士兵皇帝，他真正体现了自尤里乌斯·恺撒时代起罗马统治者时断时续地扮演的战友（commilito）角色。他是第一位真正在战斗前线作战的皇帝，一份有关他生平的近乎理想化的描述美化他卑微的出身——多瑙河边境的一名骑兵，他一天出的汗多到能装满几个杯子。在罗马世界，真正的士兵要努力工作并以此为荣。

通常将马克西米努斯登上帝位后的时期称为危机时代。在284年戴克里先登基之前，皇帝以令人吃惊的速度频频更换。在广阔的战场上频繁发生罗马军队之间的对抗。此外，罗马的领土在各条战线都遭到了进攻，实际上丧失了达西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领土。251年，皇帝德基乌斯的军队被哥特人打败，皇帝被杀，而260年，皇帝瓦列里安及其军队一起向波斯人投降。但是帝制并没有崩溃——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它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考古记录证实，危机的表现相对较少；在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生活似乎还一如既往，没有大的中断。

在很多方面，元老阶层从这段危机时期中损失最大。在3世纪中叶混乱的几十年里，他们给帝国提供了一群无能的皇帝和不忠诚的军事长官。加里埃努斯（253～268年）对此的反应是任命越来越多的骑士成员担任曾经为元老保留的职务。这种做法很快成为其继承人遵循的惯例。而且，这种变化的叠加影响更为重要。由于骑士现在形成了一个经验更丰富的军事长官团体，他们对于行省总督和战斗统帅等职位全然是更好的人选。特别是任命骑士担任杜克斯职（dux，3世纪中叶创立的一种官职）对元



提图斯凯旋门（the Arch of Titus）于81年建于罗马广场，这是凯旋门上的一幅浮雕。浮雕展示了罗马士兵在70年洗劫耶路撒冷城后，将其金银财宝胜利地搬走的情景。原来供奉在圣殿中的七头烛台（menorah）清晰可见。历史学家约瑟弗斯记录了罗马军队对这座反抗的城市的残暴掠夺。

老统治的古代模式提出了严重挑战。起初杜克斯担任大军团的统帅，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他的职位逐渐包括了广泛的地域管辖权，其中很多跨越了现存的行省边界。富有经验的高级官员骨干的随之发展体现了罗马国家权力平衡的彻底改变。

这个困难时期的另一重要特征是伊里利亚人的崛起。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的军队不均衡地吸收了行省的人力。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高卢人被普遍看做是军队的主要来源。在2至3世纪，巴尔干人——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体现出更重要的作用。在军队的统帅权方面，人数相对较少的伊里利亚军官队伍在3世纪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有几个成了皇帝，其中之一的戴克里先继续改革帝国和军队。他在建立四帝共治中起的作用在这本书的其他部分讨论过了，但这里重要的是强调，此时出现的军事与行政机构形式上的分离有深刻的含义。到目前为止，军队已经提供了很多国家低级管理人员。新的安排由此削弱了军队在行省社会的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戴克里先统治下，边防军（limitanei）和野战军（comitatus或comitatenses）之间也有了明确的区分，但在君士坦丁以前，这种区分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官方形式。边防军在战术据点范围内活动，很多军队从边防线缩进以提供深度防御，但他们还能参与进攻行动。野战军在罗马后来的军队中适当地获得了较高地位，是统治者认为可以依靠的忠实军队的核心，因此是其战斗力量的中坚。

现在的军队看起来非常不同于人们想象中的罗马军队。虽然古代的军团称号保留了下来，但具有新称号的新部队也出现了，比如骑兵支队。平均说来，部队的规模也更小了；后期军队中六十个左右的军团每个都由大约一千人构成，只是旧军团人数的一小部分。椭圆形盾现在大量取代了原来区分军团的矩形长盾，所以军团成员与步兵队中的战友不再有明显的区别。最后，招募中存在着危险。这些危险可能更多地应被看做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种类上的。很多在帝政早期的军队中已经露出了苗头。然而，我们有关这时期招募办法的文字材料着重强调与年轻的共和国的理想差别很大的主题。战斗曾经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正如担任公共职务一样，现在我们听到的不是简单的征兵和逃跑（早期军队熟悉的特征），而是越来越多的人从帝国以外的地方应征入伍。成为一名罗马士兵已经具有了不同以往的含义。

评　价

对罗马军队——罗马战争与和平的代理人的评价通常是肯定的。它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国家的工具，但是这种印象更多来源于罗马自己的历史学家的热情描述。我们很少听到那些目睹军队在街上的暴行或在战场上无情对敌的人们的意见。这种意见应该成为我们评价的组成部分。我们在《新约》、约瑟弗斯（Josephus）的《历史》和年代更晚的《塔木德》（*Talmud*）[1]中发现了这种意见。由于它们的见解，我们掌握的对朱迪亚（Judaea）[2]——虽然这块领土在很多方面具有特殊性——和整个帝国的描述更丰富了。

在《新约》中，士兵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我们知道有个军官，即卡佩尔努姆的那个“善良的”百人队队长，负责建造了一座犹太教堂。当士兵向施洗者约



这是从西北方向俯拍到的位于马萨达的大希律要塞（great herodian fortress）遗址的景象，此要塞位于高于死海的一个陡峭的岩石高原上。马萨达是犹太武装反抗罗马的最后据点。在西殿（the Western Palace）附近，罗马人靠着围墙修建了巨大的包围弯道，在这副照片中，西殿位于最接近相机的围墙的中心。

① 犹太教的经典之一。——译注
② 古巴勒斯坦南部地区，包括今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和约旦的西南部地区。——译注

翰求教时，他不主张他们放弃军人这个职业，而是告诫他们："不要掠夺钱财，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他人，满足于自己的报酬。"虽然这不是一幅描绘战火和杀戮的图画，但是它确实反映出贪婪的士兵常常造成的苦难。然而，也是在《新约》中，笼罩着一种更野蛮的罗马暴行即将临近的感觉。为了与"罗马式和平"年代的主流道德保持一致，总督彼拉多将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尽管他并没有发现基督有什么过错。维持秩序比扶弱抑强更重要。想到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情景，我们也可以感觉到罗马军队所带来的灾难。

约瑟弗斯亲眼目睹了66年至74年的犹太起义（the Jewish Revolt），他记述了这一令人恐怖的事件的原因及其可怕的后果。起义爆发后，总督立即派军镇压耶路撒冷，但这支军队被击败了。此后进行了四年的艰苦战斗，凶猛的围剿最终以圣殿的焚毁告终。军警、包税商的仆从与敲诈勒索者此时纠集成一股难以约束的力量。73年，在新一轮行动中，一群起义者惊恐地守着阵地，此时罗马军队修筑了一条巨大的包围弯道，一直通到他们位于马萨达（Masada）的貌似坚固的希律要塞。考古学证实了罗马军队如何顺着弯道的延伸，绕着被包围区域的四周修筑了一道围墙。所有山头，无论多险峻多遥远，一律都被纳入包围圈。这道城墙传递出一条清楚的讯息：没有人能逃出罗马人的围攻。约瑟弗斯记录了马萨达失陷后，被围困的人如何杀死了自己的家人然后自杀，以便不让任何人活着落入罗马士兵报复的魔掌中。

韦伯芗终结犹太战争的方式证明了罗马和平与罗马战争的残酷现实。他用战争得来的部分财富在罗马市中心建造了一座精美的神庙广场，其中展示着他从耶路撒冷神殿中掠夺的金银财宝。他把这座神庙献给了和平女神。

年 表

公元前 753 年　传统上认为是罗慕路斯创建罗马的年代。

公元前 616 年　罗马处于埃特鲁里亚统治下。

公元前 507 年　罗马人推翻了埃特鲁里亚诸王统治的塔克文王朝，共和时代开始。

公元前 496 年　罗马人在瑞吉鲁斯湖险胜拉丁人。

公元前 494 年　平民第一次撤离，由此为平民赢得了一项政治代表议案。

公元前 450 年　颁布第一部罗马法典——《十二铜表法》。

公元前 396 年　罗马占领埃特鲁里亚的维伊城。

公元前 387 年　高卢人洗劫罗马。

公元前 366 年　随着法律的调整，选举产生了第一位平民执政官。从公元前 342 年起，法律要求任何时候其中一位执政官必须是平民。

公元前 343～前 341 年　第一次萨莫奈战争，反抗意大利中南部的萨莫奈人的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一百五十年。

公元前 340 年　拉丁战争结束后，罗马控制了拉丁姆和坎佩尼亚。

公元前 326～前 304 年　第二次萨莫奈战争。

公元前312年　第一条罗马大道阿庇亚大道开始修建。

公元前 295 年　在第三次萨莫奈战争中，罗马人在森提努姆大胜萨莫奈人和高卢人，控制了意大利半岛。

公元前287年　平民议会的正式言论赢得了法律效力。

公元前 280～前 275 年　皮洛士战争，其间伊比鲁斯支持希腊在南部意大利的殖民地塔兰敦，罗马人最终获胜。

公元前 264～前 241 年　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布匿战争，这是罗马的首次海战。

公元前 241 年　西西里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个行省。

公元前 237 年　罗马占领了迦太基的科西嘉和撒丁尼亚。

公元前 225 年　罗马军队在特勒蒙战役中击败入侵的凯尔特人。

公元前 218～前 201 年　第二次布匿战争，其间罗马军队遭遇到了迦太基将领汉尼拔的强大兵力。公元前 216 年，罗马军队在坎奈之役大败后，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罗马的转变。公元前 203 年，布匿战争以西庇阿在扎玛之役击败汉尼拔宣告结束。

公元前 211～前 205 年　马其顿与迦太基结盟激怒了罗马，马其顿与罗马人之间爆发了第一次马其顿战争。

公元前 200～前 196 年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此间马其顿丧失了对希腊的控制权，希腊处于罗马统治下。

公元前 171～前 168 年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由罗马发起，意在限制复苏的马其顿势力。

公元前 149～前 148 年　第四次马其顿战争，最终以马其顿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而告终。

公元前 146 年　罗马将迦太基和科林斯夷为平地，证实了对地中海的统治。

公元前 136 年　西西里爆发奴隶起义。

公元前 133～前 132 年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担任保民官，支持土地改革，以他死于一群元老的手下而告终。

公元前 129 年　帕迦玛王国被罗马吞并，成为罗马的亚洲行省。

公元前 121 年　罗马人征服山南高卢，使之成为高卢那波南西斯行省。

公元前 123～前 122 年　盖乌斯·格拉古担任保民官。他提倡土地和税收改革，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但遭到元老院的敌视。

公元前 111～前 105 年　反击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的战争。公元前 107 年，罗马统帅马略担任执政官，接着又连任五任，掌权到公元前 100 年。

公元前 91～前 88 年　罗马与意大利的同盟国之间爆发了同盟战争。最后，罗马赋予所有意大利人以公民权。

公元前 88 年　苏拉发动政变，放逐了马略，攫取了对军队的控制权。

公元前 87 年　马略从放逐地返回罗马，联合秦纳发动政变。

公元前 86 年　马略死后，秦纳掌权。

公元前 82 年　苏拉重新执掌大权，实施独裁，扩大、

加强了元老院，改革法庭并限制保民官的权力。

公元前80年　苏拉于公元前81年放弃独裁官之位后，主动退出政坛和公众生活。

公元前73～前71年　罗马军队残酷镇压了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结束了农村地区长达十年的骚乱。著名的罗马将军格奈乌斯·庞培为罗马的最终胜利立了大功。

公元前67年　庞培在三个月内就清剿了已经困扰地中海贸易几十年的海盗。

公元前66～前63年　庞培将罗马的统治延伸到了小亚细亚。

公元前64年　以演说术著称的西塞罗担任执政官。

公元前60年　为了限制小加图的势力，恺撒、庞培和克拉苏结盟。

公元前59年　恺撒担任执政官。

公元前58～前51年　恺撒发起的高卢战争最终以罗马军队获胜宣告结束。公元前55～前54年，试图入侵不列颠失败。

公元前53年　在叙利亚的卡雷之战中，帕提亚人使克拉苏蒙受了失败的耻辱，克拉苏被杀。

公元前52年　元老院任命庞培为惟一的执政官。

公元前46年　恺撒被任命为独裁官，任期十年。

公元前49年　恺撒率军越过卢比孔河（Rubicon）回到罗马，从庞培手中攫取了权力，引发了内战。公元前48年，他在法萨卢打败庞培，庞培逃到埃及后被杀。

公元前44年　恺撒于3月15日（即3月的第15日）被一个庞大的阴谋团伙暗杀，其中包括刺客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还有很多元老。马克·安东尼继任执政官，恺撒的侄子屋大维没有当选。

公元前43年　屋大维、马克·安东尼和雷必达结成统治罗马的“后三头同盟”。实际上，屋大维统治西方，马克·安东尼统治东方。

公元前42年　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在马其顿的腓利比战役击败反对力量。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在这次失败后自杀。

公元前37～前34年　犹太王国的希罗德大王执政时期。

公元前36年　雷必达被迫退出，马克·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公元前31年　屋大维在阿克兴战役中打败马克·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的联军。马克·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自杀，埃及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公元前27年　屋大维成为首位罗马皇帝，根据元老院的决定，他被授予“奥古斯都”的称号，意思是“与众神携手之人”。在他执政时期，罗马出现了空前的和平与繁荣。

公元前19年　诗人维吉尔去世。

公元前12～前9年　巴尔干部落被安抚，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被确立为罗马的行省。

公元前8年　诗人贺拉斯去世。

公元9年　阿米尼乌斯率领日耳曼各部落在条特堡森林屠戮了三个罗马军团。

公元14年　奥古斯都（屋大维）去世，他的继子提比略即位。

公元41年　提比略的继承者盖乌斯·卡里古拉被近卫军军官暗杀。

公元43年　克劳狄征服不列颠。尽管这次军事胜利，但是他不受元老院和人民的爱戴，最后被毒死。

公元59年　克劳狄的继任者尼禄下令杀死他的母亲阿格里披娜，后来又处死了他的妻子屋大维娅。

公元60年　波狄卡领导起义，反抗不列颠的罗马人。

公元64年　罗马的大火烧毁了大部分罗马城。据说这场大火是尼禄自己放的，目的是清理出一片地方建一座他想要的宏伟宫殿。

公元66～73年　犹太人民起义反抗罗马统治。

公元68年　军队发生叛乱后，尼禄自杀。65年，尼禄逃过了对他的一次暗杀。

公元69年　在军队的支持下，韦伯芗攫取政权，结束了一年的政治骚乱和内战。他的统治给罗马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与繁荣。

公元79年　维苏威火山喷发埋葬了庞贝和赫库兰尼姆。

公元80年　在提图斯统治时期，罗马大斗兽场建成。

公元96年　皇帝图密善（韦伯芗的小儿子）被暗杀，元老院任命涅尔瓦继任。

公元100～109年　图拉真向东北方向扩张帝国，征服了达西亚。在罗马广场建立图拉真柱纪念这次胜利。117年，随着他对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征服，帝国的版图达到了最大。

公元122～127年　在不列颠修建哈德良城墙。

公元132～135年　犹太人再次起义反抗罗马统治，起义遭到残酷镇压。

公元168～175年　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率军在多瑙河边境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作战，打败了日耳曼人的入侵。

公元177年　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批准判处不向他

们妥协的基督徒死刑。

公元193年　康茂德被暗杀，其暴虐统治结束，开始了内战时期。军队拥立塞普提姆·塞维鲁继任皇帝。

公元212年　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安托尼努斯（卡拉卡拉）赋予帝国所有的自由民公民权，取消了意大利和各行省之间的地位差异。

公元226年　萨珊人取代帕提亚人成为前波斯帝国的统治者。

公元235～284年　继亚历山大·塞维鲁被暗杀之后，群龙无首，罗马帝国处于无政府状态：连续有50多人先后当过皇帝，所有人都有军队扶持，但很快又被赶下台。50年间，发生了17次暗杀皇帝的行动。

公元251年　皇帝德基乌斯在抗击哥特人的战役中被杀。

公元259年　萨珊人俘虏了皇帝瓦列里安，羞辱他并最终将他杀害。

公元260年　波修姆斯乘着东方的混乱时机，在西方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高卢帝国。

公元267年　雅典遭到来自黑海的日耳曼海盗的洗劫。

公元268年　在东方，来自帕尔米拉王国的泽诺比亚的势力日渐壮大，开始对罗马构成威胁。

公元273年　奥勒良放弃了达西亚，但是恢复了罗马对高卢的统治，摧毁了帕尔米拉的势力。他在罗马城四周修建了一道巨大的城墙。

公元284年　戴克里先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自己仍然统治西方，任命马克西米安作为共治皇帝统治东方。

公元301年　戴克里先试图通过他颁布的价格敕令来抑制帝国内出现的灾难性的通货膨胀。

公元312年　君士坦丁在密尔文桥战役击败马克森提乌斯，成为罗马惟一的皇帝。

公元324年　君士坦丁成为惟一的皇帝。

公元325年　君士坦丁召开了尼西亚会议，这是基督教教会的第一次会议。

公元330年　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

公元337～351年　君士坦丁的儿子共同统治帝国。

公元361年　"叛教者"朱利安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他试图恢复传统的非基督教多神崇拜。

公元378年　罗马皇帝瓦伦斯在抗击哥特人的亚得里亚堡战役中被杀。

公元382年　罗马皇帝提奥多西一世承认哥特人在罗马帝国内的合法地位。

公元383年　罗马军队开始撤出不列颠。

公元388年　提奥多西一世作为惟一的皇帝暂时重新统一罗马帝国。

公元395年　提奥多西一世去世，罗马帝国永久分裂。霍诺里乌斯统治西罗马帝国，阿卡狄乌斯（Arcadius）统治东罗马帝国。

公元402年　霍诺里乌斯确定拉温纳为西罗马帝国的首都。

公元410年　哥特人在国王阿拉里克的率领下洗劫了罗马城。与此同时，罗马军队全部从不列颠和高卢撤退。

公元451年　在法兰克人的帮助下，罗马人击退了匈奴王阿提拉率领的军队。

公元455年　非洲入侵，盖塞利克率领汪达尔人洗劫罗马城。

公元476年　日耳曼首领奥多亚克取代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宣布自己为意大利国王。虽然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但东方作为拜占庭帝国继续繁荣。

术语表

市政官（aedile）：他们是罗马城的行政官员，一般负责考虑城市的建设和各个方面的城市生活，例如，食物和水供应、市场和公共活动。在帝政初期，他们的一些职责已经转交给其他官员。

土地法（"agrapian laws"）：政治家们有时会尝试给大批的普通公民分配各个地区的公共土地（ager publicus），分配对象还包括退役的士兵。这些土地法是导致社会冲突的一个原因，在共和时代末期尤其如此。

圆形斗兽场（amphitheatre）：角斗士们搏斗的竞技场，一般建成椭圆形，有很多层。最早的一座石制圆形斗兽场在庞贝，而最著名的是罗马大斗兽场。

双耳罐（amphora）：有双把手的粗陶罐，用于运输各种商品，如橄榄油、酒、鱼酱等，特别用于长途的海运与河运。

攻城装置（aries）：指攻城槌，即包有铁头的一根巨大的桁木，在后来几个世纪被悬挂在一个木头架子内，有时装有几个轮子，上面有一个保护性的顶篷。

阿米拉（Armilla）：军队用来当作勋章的臂环，由将军授予。

阿斯（as）：铜币，最初重一磅（libra）。起初1蒂那尔值10阿斯，后来值16阿斯。

正厅（atrium）：私宅、神庙和其他建筑中的一个"大厅"，用于处理事务。

占卜官（augures "augurs"）：主要负责观察和进行占卜的祭司群体。

预兆（auspicium "auspice"）：征兆，往往来自飞鸟，通过这些征兆，人们相信众神表达了他们对酝酿中的或正在进行的活动的支持或反对。

石弩（balista）：一种投石的军事器械。

巴纽姆（balneum）：沐浴，后来指一种私人家庭沐浴，有别于公共浴池的"公共沐浴"。

会堂（basilica）：巨大的、多功能的公共大厅，在帝国西半部，一般作为广场的附属建筑，设计成长方形，屋顶靠内部的柱廊支撑。在罗马和其他地方都被用作早期教堂的基本建筑。

图书馆（bibliotheca）：公共图书馆，图拉真所建的乌尔披那（Ulpiana）图书馆是罗马最大的图书馆之一。罗马帝国的一些大型浴场建筑中也建有图书馆。

传令官节杖（caduceus）：是罗马传令官和使节们持有的器物，是和平的标志。

恺撒（Caesar）：尤里乌斯·恺撒的养子，继承人屋大维，即奥古斯都采用的名字，此后为所有的罗马皇帝采用，作为拥有最高军阶和权威的一种头衔（在硬币上或铭文中缩写成CAES或C）。

卡利加（caliga）：士兵的靴子，至少盖过脚部，常常也盖过脚踝和胫部较低部位；小号的又叫卡里古拉（caligula）。

"马尔斯的战场"（Campus Martius "the Field of Mars"）：罗马城西北角的城墙外的开阔空地，用于军队集合和训练，因此得名"马尔斯的"。这个场地直到3世纪才被圈入罗马城的围墙内，到这时场地上及其周围已经建起许多公共建筑。

"卡皮托林"（Capitolium "the Capitol"）：建立罗马城的众山丘中最小的山丘，构成了一个避难所和一个宗教中心。这是献给朱庇特·奥普提姆·马克提姆、朱诺和密涅瓦的神庙的原址。最初是在公元前509年建成的，后来被烧毁，又几次重建。每年年初，执政官们就是在这里祭祀，《西卜林预言书》就存放在这里，得胜的将军们去祭祀时列队从这里凯旋而过。罗马帝国的许多其他城市都模仿这里修建神庙。

卡斯特拉（castra）：标准的正方形或长方形军营，由壕沟或土墙防御，至少有四个门。

弩炮（catapulta）：用于发射飞镖的军事器械。

监察官（censor）：罗马的两位高级官员之一，负责普查人口、全面监察罗马人的道德行为。如果他们认为某些人的行为堕落，有权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和社会地位。他们还负责处理公众合同和公共财产的租赁。公元前22年后不再选举这一官职。

人口普查（census）：全国性的罗马公民（包括他们的家人）及其财产登记。在共和时代，一般每五年由监察官登记人口，但在共和时代之后就非常不固定。人口普查成为确定选举权、服军役和税收资格的基础。自奥古斯都执政开始，各行省的人口普查就有组织地展开了。

百人队"队长"（centurio "centurion"）：一个步兵队（有50至100名士兵）的领导者。一个步兵中队有两个百人队队长，其中一个队长（排在前面的）的

军阶比另一个（排在后面的）高，30个步兵中队构成一个军团。

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罗马城最大的战车比赛体育场。在尤里乌斯·恺撒和图拉真统治时期经过充分的改造和重建，能够容纳20万观众坐着观看。

步兵队（cohors "cohort"）：包括三个步兵中队的军事作战单位，因此有600个士兵，由6个百人队队长指挥，总人数相当于一个军团的十分之一。

殖民地（colonia）：罗马或拉丁两类殖民地中的一种，第一批罗马殖民地的定居者享有完全的罗马公民权。

平民会议（comitia）：由某个有这种权利的官员召集的罗马人民的会议，有三种类型：库里亚（curiata）会议、百人队（centuriata）会议和特里布斯（tributa）会议。它们的职责包括立法和选举官吏。

执政官（consul）：共和时期罗马首席行政和军事官员的头衔，任期一年，大多数年份都是每年选举两位执政官。在罗马帝国时期，这一职位仍然享有荣誉，但其权力被帝国皇帝独立掌控。

库里亚（curia）：最初是由库里奥（典礼官）管理的一个宗教会场，但是后来这个词用来指元老院会场。

蒂那尔（denarius）：自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3世纪罗马铸造的主要银币，值10阿斯，因此得名，但是在公元前141年前后，重新将其标准定为值16阿斯。

独裁官（dictator）：古罗马握有极高权力的官员，经选举产生，任期最多为六个月，管理军队或处理国内出现的紧急情况。这一头衔曾被赋予苏拉和尤里乌斯·恺撒，后者终身任职。

日（dies "the day"）：24"小时"（形式上分为白天12小时［昼］和晚上12小时［夜］，尽管白天和黑夜的"时间"长度根据季节发生变化）。

骑士团（equites "knights"）：国家出资培养的骑兵贵族（传统上认为是罗慕路斯建立的300骑士的后代），组成了国家的骑兵团，但后来增加了一个自己饲养马匹的骑士阶层。最后，骑士等级发展成社会地位仅次于元老们的一个阶层，骑士身份由财富而定，骑士成员参与各种国内和军队事务，在罗马帝国时期尤其如此。

法西斯（fasces）：象征性的榆木或桦木束棒，系着红色带子，由随从人员挎在左肩上。在罗马以外的地方，捆着斧头的法西斯象征着国家拥有判处死刑的绝对权力，不准上诉，但是在罗马可以上诉，因此法西斯上不带斧头（独裁官统治时期除外）。

斐提阿勒斯祭司团（fetiales）：罗马的祭司群体，负责处理国际间的国家关系，必要时也负责正式和仪式性的宣战。

广场（forum）：开放的广场或市场，是罗马城的集会场所，周围建有神庙、会堂等各种公共建筑，装点着荣誉雕像和其他纪念物。在罗马城，除了原来的广场，还有两个用于买卖牛和蔬菜的广场以及很多帝国时期建立的广场，这些是更具纪念意义的中心。

阿尔瓦尔兄弟祭司团（fratres Arvales）：由12个祭司组成的一个祭司团。负责主持狄亚女神节，这个节日在五月举行，与农业丰收有关。祭司团也负责与帝王家族有关的祭祀仪式。

角斗士（gladiatores, "gladiators"）：起源于埃特鲁里亚，公元前264年，他们被带入罗马，最初是出现在丧葬活动中，有四种类型：重甲角斗士（头戴鱼冠头盔）和萨莫奈人，一身轻装打扮、持网和三叉戟作战的角斗士，手持圆盾和短弯刀的色雷斯人。尽管他们往往是战争中的俘虏或受鄙视的罪犯，但有职业的角斗士，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民。

门卫（ianitor）：用链子拴在富人家正门口的奴隶（往往是阉人），旁边还用链子拴着一条狗。他的职责是迎客和禀报，打发乞丐。门卫守护正门（ianua "portal"）。

埃迪日（Ides "the Ides"）：一个月中浓日（nonae）后的第九日，因此指3月、5月、7月、10月的15日，其他月份的13日。

凯旋将军（imperator）：罗马指挥官的一般称谓，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头衔，又被罗马皇帝用作名字，后成为皇帝的头衔（在硬币上缩写为IMP）。

权力（imperium）：最高权力，包括军事指挥权、法律的解释权和执行权，后者包括判处死刑。起初由各级官吏行使，后来由皇帝一人控制，但程度有所不同。

尤格（Iugerum）：广场测量中的标准矩形单位，长边是宽边的两倍长，总面积大约有三分之二英亩（0.25公顷）。2尤格等于1赫里迪（heredium）。

卡兰德（Kalendae "Calends"）：月的第一天，当天宣布本月所有其他的特殊日期和节日，也是债务利息到期的日子。

副总督、副将（legatus "legate"）：专门处理国外公民法律事务的使节，也就是现今的领事。也指皇帝的代表，特别是指受元老院任命管理分派给他的一个行省的大使。在帝国时期，指一个军团的指挥官。

军团（legio "legion"）：罗马军队的最大作战单位，

包括4200至6000名步兵，还有少数骑兵。

磅（libra）：古罗马重量单位，一磅等于12“罗马盎司”，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1（？）盎司（327.5克）。最初，硬币的重量——阿斯被用作称量的单位（磅）。

扈从（lictors）：为高级官员掮荷法西斯的随从人员，他们的人数根据官员的级别而定。

娱乐（ludi）：公众娱乐活动，通常在宗教节日、军队胜利感恩时或丧葬仪式上举行，地点在竞技场、剧院或圆形斗兽场，包括战车比赛、角斗士和野兽搏斗、戏剧、滑稽剧和哑剧表演。

牧神节（lupercalia）：每年2月15日由牧神祭司团主持的节日。这一节日包括在牧神洞献祭一些羊和一只狗。牧神洞位于帕拉丁山山脚，罗慕路斯和勒摩斯就是在这里被一只母狼养大的。然后，牧神祭司团几乎赤裸着在街道上奔跑穿梭，用羊皮鞭抽打过路行人，特别是妇女。这一节日还包括斋戒和丰产法术。

官吏（magistrates “magistrate”）：罗马城市的官员，有些定期选举产生，如执政官和行政官，偶尔也通过任命或临时选举产生，如独裁官。有些人拥有最高权力，而其他人没有。他们几乎都经过选举，时间短（通常为一年），没有薪俸，都是集体性官职。

步兵中队（manipulus，maniples “maniple”）：罗马军队的步兵作战单位，包括两个百人团，因此达到200人（尽管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一小撮”）。3个步兵中队组成1个步兵队，30个步兵中队组成一个军团。

奴隶解放（manumissio “manumission”）：奴隶正式从奴隶制中获得解放。有三种方法：在掌握最高权力的官吏面前假称自己自由了（vindicta）、在人口普查时将奴隶登记（censu）为公民，或主人原意让他获得自由（testamento）。被公民释放的奴隶一般获得完全的公民权，但不是立即就能获得。

千步“罗马英里”（mille passus “the（Raman）mile”）：2000步或5000英尺（现在一般估计相当于1618码或1480米）。

浓日（Nonae “Nones”）：（古罗马历中）“ides”之前的第九日，因此指3月、5月、7月（Quinctillis）、10月的第七日，和其他各月的第五日。

贵族（patrich “patricians”）：罗马公民中的一个特权阶层，是共和时代基于出身的贵族，但是在王政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他们垄断了所有重要的祭司职位和政治官职，但是由于与平民发生了等级冲突（Conflict of the Orders），其垄断地位日渐丧失，尽管他们仍然继续拥有宗教特权。到共和时代末，贵族人数锐减，但是许多皇帝利用其审查权将世袭的贵族身份赋予得宠的某些人。

一罗马尺（pes “a〔Roman〕foot”）：12“罗马寸”，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1.65英寸（29.6厘米）。

平民（plebs）：罗马公民大众的称呼，有别于特权贵族。尽管这种差别的具体起因不详，但在共和时代早期，平民遭受法律、宗教和公民的歧视（禁止与贵族通婚）。平民与贵族斗争之后，平民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获得与贵族的政治平等，他们的官吏、平民保民官和市政官也成为为罗马人的官员。

大祭司（pontifex）：罗马最著名的祭司团的成员，其职能内容广泛，包括监督国家祭祀活动、竞技活动和节日，特别是建议各级官吏按照神律办事。在奥古斯都之后，大祭司团的最高职位——大祭司长由皇帝担任（在银币和铭文上缩写为PM），类似一名高级祭司。

“近卫军长官”（praefectus praetorio “prefect of the Praetorian Guard”）：公元前2年创立的两个骑士职位，占据此职的人通过对皇帝的影响可以获得相当大的权势，如提比略手下的L.埃里乌斯·塞安努斯（L. Aelius Seianus）。在戴克里先的统治之后，他们的固定职能日渐集中在国内事务上而非军事管理方面，负责帝国的特殊领域。

“城市长官”（praefectus urbi “the city prefect”）：在共和时代，国王或执政官外出时的代理人。在帝国时期，最终负责维持罗马秩序的官吏，总是一位元老，通常是职务更高的前任执政官。

行政官（praetor）：这个职务最初授予每年选出的两名共和国官员，他们是与国家齐名的长官，但在公元前367年以后，它用以指一个新官职，此官职拥有的权力没有新设立的两名“执政官”大。在共和国时期，担任此职的人数不断增加，最后被奥古斯都定为12人。共和时期，这一职务拥有军事和司法职能，但是到了帝国时期，只剩下司法职能了。担任这一职务是当选执政官的前提，任此职者通常在任期满后离开罗马去统治行省或指挥军团打仗。

近卫军（praetoriani “the Praetorian Guard”）：皇帝的终身护卫，是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7年建立的，最初包括9个步兵队，每个队500人（也可能是1000人），但是自图密善执政开始，增加到10个步兵队，每队1000人。从23年起驻扎在罗马东郊的一个永久性军营。他们的服役条件要好于普通军团。很快，

他们就对帝王的更替发挥了重要影响，但在312年，被君士坦丁大帝正式解散。

总督（proconsul）：在罗马以外的地方代替执政官行使职权的官员，不属于每年一任的职务。他可能是一位退任执政官，在执政期满后执掌或继续执掌军中指挥大权，或是某个行省的总督，要么是前任执政官，要么是前任行政官。

行省财务官（procurator）：由皇帝任命的行政官员，通常监督皇帝的财产和元老院分给他的那些行省的税收。这些人一般都是有骑士身份的人。

税吏（publicani）：一些私人个体通常组织成团体，争取获得收取公共税收的公共合同，或参与公共建设、供给和服务业，从而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在共和时代末期，那些负责收税的人获得了巨额财富，并且富有影响力，但是到了帝国时期，他们的政治影响大大降低。

度支官（quaestor）：固定任期的级别最低的官职，主要负责管理财务，但在行省，多数情况下也行使一些司法和军事职能。苏拉实施独裁后，所有的前任度支官都自动获得了元老资格。

农神节（Saturnalia）：自12月17日开始的纵情狂欢的仲冬节日。节日中，社会秩序颠倒错乱，人们互赠礼品，举办盛宴、纵情地玩乐。

元老院（Senatus“the senate”）：罗马的国家议会（最初是由年长者组成——senes），在共和时代一般有300人，自奥古斯都执政以来增加到600人。在共和时代，元老院监督国内外政策、财政和宗教等所有事务，在帝国时期，继续持有重要的团体职能。元老身份是占据关键的政治和行政管理职位的前提，包括有固定任期的高级职务。奥古斯都试图使元老院建立强大的世袭制度，将最低财产资格提高到100万塞斯特斯。在晚后的帝国时期，元老院人数激增，这一职位所赋予的社会地位胜过任何政治权力。

仆从“奴隶”（sestertius[or sestercius]）：奴隶制在罗马史上普遍存在。在共和国末期，意大利可能有两百万奴隶。拥有奴隶在整个罗马社会都很普遍，尽管奴隶都是受富人的支配（L.皮达尼乌斯·塞肯都斯仅在罗马的家中就有400个奴隶）。奴隶可以通过战俘、抢劫、自然的人口繁殖和奴隶贸易获得，在公元前2世纪和前1世纪，随着罗马帝国的发展，获得的奴隶人数大量增长。他们几乎从事每一种工作，特别是家务劳动、生产、采矿和农业等等，庄园主要依赖奴隶劳动，这一情况特别为共和国晚期的意大利所证实。偶尔出现的奴隶反抗会导致奴隶起义的全面爆发，例如公元前1世纪70年代末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奴隶主常常通过释放程序来释放他们的奴隶。

塞斯特斯（sestertius，或sestercius）：古罗马的一种货币，值四分之一蒂那尔，也就是2.5阿斯（后来值4阿斯）（因此这个名字成为拉丁语里“比三小半点”的缩略语）。

《西卜林预言书》（Sibyllini libri“The Sibylline Books”）：传说是库麦城的西贝尔（有预言力量的女人）卖给罗马国王塔克文·普里斯库斯（Tarquinius Priscus）的神秘的预言作品，此后被收藏在卡皮托林山上的朱庇特神庙。公元前83年被卡皮托林山上的大火烧毁，后来又以同样的名称编写了一部新的预言集，到405年时也被毁掉了。

SPQR：（拉）“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的缩写形式，意思是“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龟甲形连环盾（testudo）：古罗马军队攻城时为防御来自城上的袭击将前进士兵的盾牌顶在头上所构成的龟甲形连环盾。

保民官（tribunus“tribune”）：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军队保民官，他们是军官，每个军团分得六名保民官；另一种是平民保民官，他们是城市的官员，有权代表平民“老百姓”的利益行事，包括有权否决另一位官员的行动，元老院的任命、法律和命令。在共和时代末期，担任此职的人利用职权发动了革命，自奥古斯都开始，皇帝们纷纷为自己僭取各项职权（tribunicia potestas）。

“维斯塔贞女”（Vestale“the Vestal Virgins”）：主持祭祀女灶神维斯塔（Vesta）的6名女祭司，在她们最短30年的服务期间，她们必须严格保持贞洁。维斯塔是整个罗马家家户户都供奉的灶-火女神，因此在维斯塔神庙里保存着不灭之火，如果哪位女祭司让火熄灭，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在帝国时期，女祭司们的宗教长官是大祭司长——皇帝。

大道（via）：公共道路，以标准尺度在沟渠间层层修筑，大多是为了军事目的和官方使用而建，因此尽可能地笔直修建。

人　物

阿格里披娜（Iulia Agrippina，15～59年）

尼禄的母亲，克劳狄之妻，一出生便陷入政治生活和阴谋之中。她的父亲是提比略的养子日耳曼尼库斯，她的母亲维普萨尼亚·阿格里披娜是奥古斯都的孙女、提比略的仇敌，她的哥哥是皇帝盖乌斯（卡里古拉）。在盖乌斯执政时期，她由于参加39年加图里克（Gaetulicus）的阴谋活动而遭放逐，但在49年，她的叔叔和盖乌斯的继承者克劳狄把她召回罗马，并把她纳为自己的第四个妻子。她让克劳狄认养了尼禄（她在第一次婚姻中生的儿子），因此使尼禄的地位优先于克劳狄自己的儿子布里塔尼库斯（Britannicus，他年龄较小）。54年，克劳狄去世，据说是阿格里披娜毒死了他，年仅16岁的尼禄即位。起初，阿格里披娜握有很多权力，实际上几乎充当了摄政王。但是，随着尼禄日渐成熟，他开始不满母亲的控制，特别是当她干涉他的恋爱问题时。他第一次企图杀死她是谋划让载她出海的小船沉没，结果她设法游上了岸，计划失败。但他的第二次计划成功了，他命人在她的乡间住宅里杀死了她。

奥古斯都（Augustus，前63～14年）

盖乌斯·屋大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维里特拉（Velitrae）的一个富足家庭。屋大维（人们这样称呼他）还是个孩子时，受到其叔叔尤里乌斯·恺撒的庇护。公元前44年他的叔叔被刺身亡时，他才得知他已经被恺撒领养并被指定为他的继承人。尽管他才18岁，尽管他的家人有不同意见，他还是去了罗马，以其在政治上充分展露的聪明才智赢得了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支持。最初，自公元前43年开始，他作为三位执政之一与马克·安东尼、雷必达共同统治罗马。公元前36年，雷必达被赶下台。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阿克兴战役中击溃了马克·安东尼。公元前27年，元老院承认了他在国家中的最高权威，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这个称呼原先只用于宗教情境中，此后就被所有后来的罗马皇帝沿用。在他的统治下，罗马帝国获得极大的扩张，而且帝国内还普遍保持和平。奥古斯都对社会的每个层面都进行了改革，从政府的职能和结构、税收、币制到国内习俗，如婚嫁等。由于他本人受过教育又富有才智，因此成为作家和艺术家的朋友和资助者。他又大兴土木，兴建公共建筑，在罗马帝国内外修建了很多建筑上的杰作。他的皇位由提比略继承，他是屋大维忠贞的妻子李维娅在前一次婚姻中所生的儿子。

布鲁图，马尔库斯·尤尼乌斯（Brutus，Marcus Iunius，约前85～42年）

反对尤里乌斯·恺撒的阴谋集团的领导者之一。布鲁图是一位野心勃勃的政客，积极支持共和国理想。内战中他参加了庞培反对恺撒的军队，成为恺撒胜利后所颁布的大赦令的受益人之一，不仅饶恕了他参加庞培军队之过，还几次被授予政治职务。尽管如此，恺撒被任命为终身独裁官导致他在暗杀恺撒的阴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事后，布鲁图被迫逃离罗马来到马克·安东尼管辖的希腊，他在那里招募了一支反动军队。继他的军队在第二次腓利比战役中被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奥古斯都）联手打败之后，布鲁图自杀身亡。

尤里乌斯·恺撒，盖乌斯（Julius Caesar，Gaius，前100～前44年）

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尤里乌斯·恺撒都是一个精明的谋略家，尽管他作为独裁官实际统治了不到一年，仍然作为最有政绩的罗马统治者之一被载入史册。公元前60年，他创建了“前三头同盟”，与庞培、苏拉结盟，将这两位不共戴天的仇敌团结在一起，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之位，此举证明了他的政治天赋。他在高卢统帅罗马军队（前58～前51年）大大扩展了罗马的疆域，使其远及英吉利海峡。他所著的著名的《高卢战记》（*De bello Gallico*）记述了他在高卢的战斗，是他现存的少数著作之一。由于元老院和庞培与他反目，恺撒率军重返意大利，于公元前49年成功地渡过卢比孔河。他在这次内战中获胜，制服了他的敌人，但最终还是准予他们缓期受刑，公元前44年，他成为终身独裁官。在他被刺杀后的第二个月，他的改革计划就被一群元老们取消了。恺撒对后世的影响迄今在我们的年历中还清晰可见，他于公元前45年

改革过的儒略历成为我们现在使用的年历的基础。

卡里古拉（Caligula, Gaius Julius Caesar Germanicus，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日耳曼尼库斯，12～41年）

他是日耳曼尼库斯（提比略的养子）和维普萨尼亚·阿格里披娜的儿子。当他还是个步兵和他父亲一起参加公元14年至16年的莱茵河战役时，盖乌斯获得了“卡里古拉”的绰号，意思是“小皮靴”。盖乌斯被提比略收养，与提比略的儿子格梅卢斯(Gemellus)一起成为他的继承人，尽管他受到的公众生活训练很少，但37年，他在近卫军长官马克罗(Macro)的帮助下成为惟一的皇帝。他被宣布为皇帝后才七个月就得了重病，经诊断这种病会导致神经错乱，后来果真在他身上应验了。做皇帝时，他言行反复无常，常有极其残忍的行为，为满足自己的享乐挥霍无度，向富裕的罗马人勒索钱财，还动不动就将他的对手置于死地。41年，卡里古拉被近卫军士兵杀死，他的叔叔克劳狄即位。

克劳狄（Claudius, Tiberius Claudius Nero Germanicus，提比略·克劳狄·尼禄·日耳曼尼库斯，前10～54年）

卡里古拉被刺身亡后，一名近卫军成员发现克劳狄躲在皇宫中的一道帘幕后面，在没有获得元老院同意的情况下，以及尽管他没有什么公众生活经验这一事实，军队还是拥立他为皇帝。由于克劳狄的腿有点瘸，说话又口吃，因此在雄辩天赋受到尊崇的罗马文化中，他的形象并不出众，也不是一个好的公众演说家。在他执政的整个过程中，他都支持军队。43年，他将罗马帝国的疆域延伸到不列颠。他与元老院的关系不好，但他极其热衷于政府管理，制定了一些新的重要的社会法规，还实行了一些合理的政府改革。然而，他很容易受他那些富裕的被释奴以及他的第三任、第四任妻子——瓦勒里亚·麦萨莉娜（Valeria Messalina）与尤里亚·阿格里披娜的影响。据说，他是被阿格里披娜毒死的，她说服他收养她的儿子尼禄，偏爱尼禄胜过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布里塔尼库斯。

君士坦丁（Constantine, 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弗拉维·瓦勒里乌斯·君士坦提努斯，约272/3～337年）

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君士坦丁大帝。他是统治统一的东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第一位基督教皇帝。他在密尔文桥击败了与他争夺西罗马帝国的对手——篡权者马克森提乌斯后，将这一胜利归功于基督教神对他的佑助。324年，他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迫使东方的对手李锡尼乌斯退位。君士坦丁掌管着一个以戴克里先取得的进步为基础的统一帝国，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熟练的管理人才。他所取得的成功包括军事组织改革和政府改革，还发行了一种新币苏勒德斯（Solidus），72个苏勒德斯相当于1镑。为了靠近多瑙河和东部边防，他还在新建立的君士坦丁堡（先前叫做拜占庭）建立了一座永久皇宫。然而他最大的成就是承认和加强了基督教的地位。他于313年颁布了《米兰敕令》(*the Edict of Milan*)，恢复了基督徒的财产，给予教会某些特权和资助。他公开反对信奉多神教，但又积极参与统一教义的尝试，例如325年在尼西亚举行的第一次全基督教会议（the First Ecumenical Councilof Nicaea)。他在临死前接受了洗礼，将罗马帝国交给他的三个儿子和两个侄子统治。

克拉苏、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Crassus, Marcus Licinius，约前112～53年）

克拉苏是个骁勇善战的将军、精明的政治家和金融家，早期支持苏拉成功获得领导权，在放逐期间发了财。尽管克拉苏镇压了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但是功劳却被庞培独占了，从而导致二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尽管如此，当废除苏拉政体被提上他们共同的议事日程时，他们表面上又言归于好，在公元前70年共同担任执政官。在恺撒的怂恿之下，他们又走到一起，于公元前60年结成“前三头同盟”，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公元前56年这个同盟重新生效后，克拉苏被授予在叙利亚的军事重任，公元前53年死于卡雷之战（the Battle of Carrhae)。他的死导致恺撒和庞培二人陷入内战。

戴克里先（Diocletian, 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盖乌斯·奥雷里乌斯·瓦勒里乌斯·戴克里先乌斯，约240（s）～312年）

3世纪的混乱状态后，戴克里先为了使帝国重新恢复稳定实施了重要的改革。他的改革为东方的拜占庭帝国的长期强盛奠定了基础，也使西罗马帝国最大限度地苟延残喘。戴克里先出生于达尔马提亚

的一个不起眼的家庭，通过军衔的不断提升而崛起，于284年被军队拥立为皇帝。他很快意识到帝国太大了，一个人无法统治，因此将帝国的管理一分为二。戴克里先自己成为东方的奥古斯都，任命马克西米安担任西方的奥古斯都。他又任命了两个副手，都叫恺撒，一个叫加列里乌斯（Galerius）管理东方，另一个叫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管理西方。他大力改革行省和军队，为了稳定财政，他改革税制，试图创立统一货币，但收效甚微。在303年至304年的统治年间，他对基督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迫害。在位20年后，由于受不良的健康状况的困扰，戴克里先于305年退位，大约七年后去世，死时几乎没人知道。

图密善（Domitian,Titus Flavious Domitianus，提图斯·弗拉维·图密善乌斯，51～96年）

他是皇帝韦伯芗的二儿子。在他父亲和哥哥提图斯执政时期，尽管他七次担任执政官，但并没有任何实权。81年他上台当皇帝，决心实施专制统治。公道地讲，他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在军事上，他成功地巩固了罗马的广阔边防。然而，这些军事战役加上规模宏大的公共建筑项目，给帝国的财政造成了重负。他的独裁冲动导致他限制元老院的权力，因而招致仇恨。为了压制反对意见，他毫不留情地迫害假想中的敌人，于89年和95年两次放逐哲学家们，将他的假想敌置于死地，然后将他们的财产充公。96年，他被一些宫廷官员和两名近卫军长官刺杀，这些人可能得到了他的妻子的支持，元老院谴责对他的纪念。

格拉古兄弟：提比利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约前169～133年）和盖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he Gracchi：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and 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约前160～121年）

虽然出身于贵族之家，但提比利乌斯和盖乌斯兄弟俩却进行改革解决各种经济和管理问题，改善较贫困的罗马人的生活。他们支持穷人与富人对抗，招致元老院许多元老的敌视，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兄弟俩中的哥哥提比利乌斯提出了一项土地改革法案，没收为富有的地主所有超过500尤格法律限度的公有地（ager publicus），并将它分给较贫困的公民。他致力于通过和实施这项法案，利用法律漏洞迫使这项法案通过，导致了宪法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又为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他被大祭司长西庇阿·纳西卡（Scipio Nasica）率领的一群元老及其扈从打死。他的弟弟盖乌斯不仅继承了他的土地改革工作，还追求自己更远大的政治目标。他采取的措施包括一项向公民分发粮食的新资助体制、一项殖民计划、限制司法腐败和滥用职权的措施以及扩展公民权的范围。由于其立法受到攻击，他转而求助于武装起义，但在镇压过程中被杀。

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eianus，普布利乌斯·埃里乌斯·哈德良乌斯，76～138年）

由于哈德良是皇帝图拉真的被监护人，因而注定要一生从政。他很快在军队中得到提拔，于108年当上执政官。112年，他被任命为雅典的执政官，117年成为叙利亚总督。117年，图拉真死于西里西亚，第二天宣布了哈德良被其收养一事，在军队的支持下，他被拥立为皇帝。他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118年在他返回罗马之前，四个前执政官因阴谋叛国被杀。哈德良的统治因其广泛的旅行而引人瞩目。在他统治期间，他遍游帝国，不仅部分地巩固了其权力，而且满足了他无止境的好奇心和旅游嗜好。他在整个帝国修建大型建筑工程，包括著名的不列颠城墙。他还富有艺术天赋，他凭着个人兴趣设计了许多新的纪念物，他的诗歌水平也相当高。他久病之后死于罗马城外的提沃利，指定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继承其皇位。

朱利安（Julian，Flavius Claudius Iulianus，弗拉维·克劳狄乌斯·尤利安乌斯，331～363年）

他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在君士坦丁死后的大屠杀中幸免于难，这次屠杀的目的是确保皇帝的儿子继承皇位。孩提时代，他在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的一个庄园里闭门读书六年。但是青年时代就被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召见与他的妹妹结婚，355年，被任命为恺撒管理高卢和不列颠。在莱茵河地区的战役中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富有指挥才能的将军，361年，被其军队拥立为奥古斯都。同年，君士坦提乌斯的去世避免了内战，朱利安成为没有异议的皇帝。他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恢复对多神的崇拜上，因此他被人们称作“叛教者”朱利安。他第一次颁发的敕令（361年）之一批准人们享有信奉所有宗教的自由，然而，他的政策却强烈歧视基督徒。

他死于反击波斯的战役，年仅31岁，仅做了20个月的皇帝。

李维娅（德鲁西拉）(Livia [Drusilla]，前58～29年)

对奥古斯都忠贞不贰的妻子。李维娅聪明、高贵，而且醉心于权力。在她与奥古斯都的婚姻中，她的言行似乎无可指摘。奥古斯都迫使她与她的第一任丈夫——军队指挥官提比略·克劳狄·尼禄(Tiberius Claudius Nero)离婚，然后嫁给他。奥古斯都一直都很敬重她，也很尊重她的意见。然而，他们的婚姻没有留下任何子嗣，李维娅坚持不懈地怂恿奥古斯都选她的儿子提比略做他的继承人，而不要选他自己的血亲。她努力支持提比略继承皇位，为自己树立了几个敌人。奥古斯都死后，她仍然具有影响力，因而造成了她和提比略之间的冲突。提比略当上皇帝后，严格控制着她，甚至在她死后拒绝执行她在遗嘱中提出的要求。但是，她被她的孙子——皇帝克劳狄奉若神明。

马克·安东尼（马可·安东尼乌斯）(Mark Antony, Marcus Antonius，前83～30年)

马克·安东尼长得英俊迷人，而且野心勃勃，只是缺少点政治手腕。据说他在度过了放荡的青年时期后，在巴勒斯坦和埃及担任骑兵指挥官时脱颖而出。自54年起，他投身恺撒军中，在高卢和后来回到意大利后的一系列政治任命中为他效力。恺撒死后，马克·安东尼成功地采取行动使公众舆论对准了恺撒的刺杀者——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但却被迫将军队与年轻的屋大维联合。公元前43年，他们与雷必达一起建立"后三头同盟"，从而放逐了他们的敌人，于公元前42年在腓利比战役中击败了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之后，他被授予东方行省，公元前40年，娶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为妻。公元前41年，他在塔苏斯第一次遇见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但直到公元前37年才和她定居一处。安东尼抛弃屋大维娅以及他在政治上支持埃及和克利奥帕特拉激起了屋大维的愤怒。屋大维带领军队对他穷追不舍，公元前31年，在阿克兴战役中彻底打败了这对夫妇的军队。这对爱侣逃到埃及，在那里仍然受到屋大维的追击，一年后他们自杀身亡。

马略，盖乌斯(Marius, Gaius，约前157～86年)

马略出生于一个过去没有出现过元老的家庭，但他却史无前例地成功担任了七任执政官（前107年、前104～100年、86年）。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是因为他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一方面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军队统帅的声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出生于非贵族家庭。他在西班牙的纽曼提亚战争（134年）(the Numantine）中跻身于显赫地位，这一战争使他首次获得政治职位。公元前107年赢得首任执政官后，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罢黜了他的对手——率兵攻打朱古达的将军麦特路斯（尽管他早期收到了他的家族——麦特路斯家族的政治支持）。军队的强大力量是马略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选举获胜的支柱，他广泛实行军事改革，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他还废除了服兵役的财产资格。自公元前90年起，他与苏拉的敌对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从而导致了公元前88年的内战，当时他们俩正在争夺对东方的米特拉达弟作战的统帅权。公元前86年，马略最后一次担任执政官时给人们带来了灾难，他下令屠杀许多著名的反对者。他的恐怖统治开始后时间不长，他就去世了，使罗马避免了更多的冲突。

尼禄（尼禄·克劳狄·恺撒）(Nero, Nero Claudius Caesar，37～68年)

经过野心勃勃的母亲阿格里披娜的谋划，54年，尼禄继承了他的养父克劳狄的皇位，但尼禄完全不适合这一职位。他热爱音乐、艺术、战车竞赛、希腊竞技比赛，所以他的兴趣爱好华而不实。他16岁就当了皇帝，起初他的母亲操纵着实权，但是尼禄对于母亲干涉他的恋爱感到愤怒，也不满她的野心，遂将她逐出宫殿。他刚开始统治国家时，在哲学家辛尼加和近卫军长官布鲁斯(Burrus)的影响下，遵循古代传统，非常有节制而且公平。然而，他很快就显露出不理智、暴虐的一面。59年，他派人谋杀了他的母亲，不久又谋杀了他的妻子屋大维娅。他的财政政策很不健全，加上他公开地爱慕虚荣，招致了社会上层的不满并最终发展为憎恨。据谣传是他在64年放火烧毁了罗马，紧接着他就开始在罗马广场附近被大火烧焦的地方修建他的金宫(Golden Palace)，这进一步动摇了他的统治。随着反对声日渐高涨，行省军队在68年揭竿而起反对他的统治，尼禄逃离罗马后自杀身亡。

涅尔瓦，马尔库斯·科塞乌斯(Nerva, Marcus Cocceius，约35～98年)

涅尔瓦出身于贵族家庭，自己开创了体面的政治生涯，两次担任执政官，在任上被元老院选中继承了图密善的皇位。由于他已经是个上了年纪的人，看起来是个安全、传统的候选人，不可能对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有什么危害。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他废除了图密善的许多残酷的措施，实施了多项改革，然而，他从未获得军队的支持。97年，由于身心疲惫又面临威胁，他将政权交给他指定的继承人图拉真。尽管他的统治历时很短，但是后人认为他开始了摆脱独裁统治的转变，因此涅尔瓦被人们认为是“五大好皇帝”的第一人。

庞培（格奈乌斯·庞培乌斯·马格努斯）（Pompey；Gnaeus Pompeius Magnus，前106～48年）

庞培出身于皮西努姆（Picenum）的一个贵族家族。他在苏拉手下当军队指挥官时，雇佣他父亲的老兵和扈从组织了一支私人军队，从而获得了名望。他在那时以及苏拉死后的十年间获得的军事成功使他在公元前70年当上了执政官，尽管他还年轻，之前也从未担任过任何官职。后来，他先是获得了抗击地中海海盗的军队指挥权，然后又获得了打击东方的米特拉达弟的指挥权，这不仅为他带来了财富，还提高了他的声望。公元前66年迅速击败米特拉达弟后，庞培吞并了叙利亚，使之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为之后罗马对东方的管理奠定了基础。公元前62年，庞培返回罗马。公元前60年，由于不能通过其他手段有效地保证给他的老兵分配土地，也无法确保他对东方的安排得到批准，庞培与恺撒、克拉苏结成“前三头同盟”。公元前52年，罗马局势的混乱使庞培有机会被任命为惟一的执政官。他与恺撒的关系恶化，特别是从公元前53年克拉苏去世后。恺撒率领军队突入意大利时，他掌握着共和国的军队。然而，公元前48年，在法萨卢战役中，庞培兵败后逃往埃及，刚一登陆就被刺死。

西庇阿·阿非利加，普布利乌斯·康奈里乌斯（Scipio Africanus,Publius Cornelius，前236～183年）

西庇阿的父亲是一名贵族出身的军事将领，西庇阿年轻时就步其后尘。据说，他第一次显露他的英勇精神是在提西努斯战役（218年）中救了他父亲的命。公元前210年，他第一次被授予指挥权去西班牙作战，他父亲在那里的一次战役中被杀。在那里，他与迦太基敌人展开了战斗，占领了他们的指挥部，又运用新的战术，不到四年就为罗马赢得了西班牙。公元前204年，他前往非洲，公元前202年，他的军队最终在扎玛之役中打败汉尼拔，从而使罗马根据自己的条件缔结了和平。为了纪念他的伟大胜利，西庇阿被授予“阿非利加”的姓。自199年起，他回到罗马开始从政，他的政治生涯持续了15年。但是他的敌人指控他挪用公款、接受贿赂，迫使他退出政坛，主动离开罗马，第二年死于放逐地。

苏拉（鲁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菲力克斯）（Sulla，Lucius Cornelius Sulla Felix，前138～78年）

尽管苏拉和马略的对立是内战爆发的一个起因（88～82年），但他是一个有才能的统治者，他试图通过宪法改革巩固共和国。在马略军中服役攻打努米底亚时，由于俘虏了敌方将领朱古达，苏拉成功地获得了声誉。这是导致两人不和的根源，他们的不和将给国家带来可怕的后果。苏拉在同盟战争中的胜利使他当上了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但是当他准备向米特拉达弟开战时，马略默许将指挥权转交到自己手中。在向罗马进军时，苏拉获得了明显的胜利，公元前82年的科林门（the Colline Gate）之战成为转折点。他被任命为独裁官，利用自己的职权实施了许多改革，目的在于加强元老院的力量。他以对待敌人残酷无情，为安置他的老兵没收敌人的土地而闻名，因其统治守旧和残忍而恶名昭著。公元前79年，他最终主动退出政坛，第二年平静地去世了。尽管他的宪法改革在公元前70年为克拉苏和庞培废除，但是他的行政改革一直存在到共和国结束。

提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约346～395年）

提奥多西的父亲是个赫赫有名的将军，他跟随父亲征战时学会了军事战术。然而376年，他的父亲突然失宠被处死刑，提奥多西退出公众生活，但378年，格拉提安将他召回为帝国服务，379年宣布他为东部省份的奥古斯都，包括达西亚和马其顿。由于破天荒地同意与哥特人签订条约，允许他们居住在罗马土地上但仍然保持自治，提奥多西能够确保他的领土免遭敌人的进犯，也为自己赢得了坚定的同盟军。篡权者马格努斯·马克西姆（Magnus Maximus）于387年将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

tinianII）逐出意大利，提奥多西击溃并杀死了他，加强了他在西方的力量。394年，他打败了取代瓦伦提尼安统治高卢的篡权者尤金尼乌斯（Eugenius）。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坚持尼西亚信条宣布的天主教信仰。391年，他突然关闭了所有的神庙，禁止任何形式的多神教祭祀活动。在他死后，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提比略（提比略·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Tiberius，Tiberius Iulius Caesar Augustus，前42～37年）

提比略是李维娅的大儿子，在奥古斯都的宫廷里被抚养长大，很早进入政治生活，年仅18岁时就成为度支官，此后是非常成功地长达30年的军事生涯。尽管如此，奥古斯都并不支持他做继承人，而是偏爱他的两个孙子盖乌斯和鲁基乌斯，他将他们收为养子。公元前6年，提比略从私生活中隐退，移居罗德斯，受此侮辱，直到公元2年，奥古斯都才允许他重返罗马。奥古斯都的两个养子都死后，公元4年，提比略成为他的养子，被授予众多的管理权，从公元13年起，富有成效地使他成为副元首。因此，14年奥古斯都去世时，毫无疑问由他继承皇位。提比略尊重他的前任的名声和政策，在他对待边疆各族人民和王国时尤其如此。然而，国内外的很多问题加上他出名的节俭，使他很不受欢迎。23年以来，他逐渐听凭当时的近卫军长官谢雅努斯的摆布。在提比略的养子日耳曼尼库斯和他自己的儿子德鲁苏斯分别于19年和23年去世后，谢雅努斯密切参与皇位继承问题，并发动了对日尔曼尼库斯的遗孀及其孩子的迫害运动。但是，提比略在25年退隐到坎佩尼亚（Campania），后来到了卡普里（Capri），将国家的许多事务都交给谢雅努斯管理。31年，提比略得到了谢雅努斯玩弄阴谋的证据，在给元老院的一封信里，他命令逮捕谢雅努斯及其同党，并将他们处死。在他统治的最后六年直至去世，提比略一直住在卡普里。他的统治特别以元老院审判的“叛国罪”案件的数量而闻名，特别是随着谢雅努斯下台之后。

图拉真（马尔库斯·乌尔庇乌斯·图拉真乌斯）（Trajan，Marcus Ulpius Traianus，约53～117年）

图拉真来自西班牙南部的巴提卡，是第一位出生于罗马之外的皇帝，但是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退任执政官，因此图拉真主要在罗马长大。他担任过图密善和涅尔瓦时期的执政官，在涅尔瓦死时继承了王位。他重申帝国对军队的控制，统治军队尽管不是很民主，但却很公平。他对罗马人民慷慨大方，继续执行可能由涅尔瓦确定的计划，即资助意大利地区的穷苦孩子。他还在整个帝国境内实施广泛的公共工程计划，同时在罗马城建造公共浴场、宏伟的新广场和会堂，但他最大的功劳是帝国疆域自奥古斯都以来首次得到了扩大。他坚持图密善反对达西亚人的战斗，占领了他们在多瑙河北面的领土（101～106年），这一胜利被铭刻在至今仍屹立在其广场上的图拉真石柱上。他还吞并了阿拉伯，征服了帕提亚，短期内使帝国疆域远至波斯湾。

韦伯芗（提图斯·弗拉维·韦伯芗乌斯）（Vespansian，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9～79年）

韦伯芗出生于一个骑士家庭，跟随他的哥哥进入元老院，他起初的政治生涯沿着通常的模式进行，但没有任何出色的晋升。然而随着克劳狄的登基，韦伯芗的晋升速度加快，他在不列颠证明自己是一名出色的军队统帅，51年，成为执政官。他继续在尼禄手下服务，66年，他被授予在东方的特殊指挥权，镇压犹太叛乱。尼禄自杀时，韦伯芗仍在东方，他度过了一年的混乱期，之后在驻扎在东方行省的军团的支持下发动叛乱。69年，他当了皇帝，很快恢复了帝国的和平。他通过提高行省及其他税收来资助罗马的重建——罗马大斗兽场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建造的，除此以外，他还组织整个罗马帝国境内的公共建设。他重新确立了军队纪律，进一步将帝国疆域扩张到日耳曼和不列颠，并且稳定了边防。他还授予国外各个地区各种权利，特别是西班牙，并招募很多新的意大利和行省人员进入元老院。他去世时很平静，已经确保他的儿子提图斯继承皇位。

著名的考古遗址和博物馆收藏

舍尔舍勒（恺撒里亚）（Cherchel〔Caesarea〕）
阿尔及利亚（位于阿尔及尔以西95公里/59英里处）
城市废墟：广场、浴室、剧院、会堂、竞技博物馆

德杰米拉（丘卡尔）（Djemila〔Cuicul〕）
阿尔及利亚（位于阿尔及尔以东180公里/114英里处）
城市废墟：广场、剧院、神庙、梯形市场、房屋、廊柱、马赛克装饰的博物馆

特贝萨（塞维斯特）（Tebessa〔Theveste〕）
阿尔及利亚（位于与突尼斯交界处附近）
城市废墟：凯旋门、马赛克装饰的神庙、会堂、巨大的竞技场、引水渠

提姆加德（塔木加迪）（Timgad〔Thamugadi〕）
阿尔及利亚（位于阿尔及尔东南320公里/200英里处）
城市废墟：广场、浴室、卡皮托林三神庙、剧院、凯旋门、马赛克画

提帕萨（Tipaza〔Tipasa〕）
阿尔及利亚（位于中北部海岸）
城市废墟：广场、浴室、圆形斗兽场、会堂、神庙、维拉、陵墓、道路、马赛克装饰的博物馆

东格林（Tongeren）
比利时（位于布鲁塞尔东南90公里/55英里处）
城市废墟：城市城墙、露天博物馆

普罗夫迪夫（菲利波波利斯，特里蒙提姆）（Plovdiv〔Philippopolis，Trimontium〕）
保加利亚（位于索非亚东南140公里/87英里处）
城市废墟：马赛克画、浮雕、人行道、修复的剧院

索非亚（塞尔迪卡）（Sofia〔Serdica〕）
保加利亚（首都）
在现代建筑下面可以看到的废墟：浴室、会堂、马赛克装饰的房屋、博物馆

瓦尔纳（奥德苏斯）（Varna〔Odessus〕）
保加利亚（位于黑海海岸）
废墟：保存完好的浴室

斯普利特（斯帕拉托）（Split〔Spalato〕）
克罗地亚（位于萨拉热窝西南170公里/106英里处）
城市废墟与修复的遗迹：神庙、城墙、陵墓、地下墓地、博物馆

帕福斯（Paphos）
塞浦路斯（位于西南海岸）
城市废墟：剧院、马赛克装饰的房屋、海堤

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埃及（位于开罗西北210公里/130英里处）
城市废墟遗迹：浴室、马赛克装饰的大理石剧院、房屋、拱形墙、海港、地下墓地、希腊-罗马博物馆

巴斯（阿奎·萨莉斯）（Bath〔Aquae Sulis〕）
英格兰（位于伦敦以西130公里/80英里处）
城市废墟遗迹：保存完好的浴室、神庙、马赛克画、博物馆

切斯特（德瓦）（Chester 〔Deva〕）
英格兰（位于曼彻斯特西南95公里/60英里处）
废墟：圆形斗兽场、城墙、现代建筑下面及周围随处可见的残片、格罗夫纳博物馆、德瓦罗马博物馆

赛伦塞斯特（科里尼乌姆）（Cirencester〔Corinium〕）
英格兰（位于伦敦西北123公里/80英里处）
城市废墟遗迹：博物馆

科尔切斯特（凯缪勒敦努姆）（Colchester〔Camulodunum〕）
英格兰（位于伦敦东北80公里/50英里处）
保留下来的罗马城墙、博物馆

考文垂（隆特罗马要塞）（Coventry〔Lunt Roman Fort〕）
英格兰（位于约旦维尔、考文垂、西米德兰）
重建的土木结构的罗马要塞

哈德良城墙〔Hadrian's Wall〕
英格兰（位于与苏格兰交界处附近）
要塞和塔楼的废墟、乡村残留的城墙主体和断壁残垣、卡莱尔和纽卡斯尔（包括文多兰达）本地和之间的博物馆

伦敦（伦迪尼姆）（London 〔Londinium〕）
英格兰（首都）
城市废墟遗迹：神庙、城墙、码头、伦敦博物馆、大英博物馆

里奇保罗夫（拉图匹亚）（Richborough〔Rutupiae〕）
英格兰（位于伦敦东南95公里/60英里处）
港口废墟：防御工事、城墙、大拱形支柱

圣阿尔班（维鲁拉米翁）（St.Albans〔Verulamium〕）
英格兰（位于伦敦以北65公里/40英里处）
城市废墟：小圆形剧场、会堂、维拉、商店、火炕式供暖系统、城墙、马赛克装饰的博物馆

西尔切斯特（卡勒瓦·阿特里巴图）（Silchester〔Calleva Atrebatum〕）
英格兰（位于伦敦以西65公里/40英里处）
城市废墟：圆形斗兽场、城墙、阅读博物馆、西尔切斯特美术馆

南希尔兹（阿尔贝亚）（South Shields〔Arbeia〕）
英格兰（位于泰恩河上，纽卡斯尔以东8公里/5英里处）
带有防御性城墙和门楼的要塞废墟、博物馆

罗克塞特（韦罗科尼厄姆）（Wroxeter〔Viroconium〕）
英格兰（位于伯明翰东北40公里/25英里处）
大部分还埋在地下的城市废墟：浴室、城墙、博物馆

约克（埃布拉库姆）（York 〔Eboracum〕）
英格兰（位于伦敦西北170公里/105英里处）
城市废墟遗迹：城墙、房屋、博物馆

埃克斯－恩－普罗旺斯（阿基塞克斯蒂）（Aix-en-Provence〔Aquae Sextiae〕）
法国（位于马赛以北32公里/19英里处）
城市废墟遗迹：两条引水渠、博物馆

阿尔勒斯（阿雷拉特）（Arles〔Arelate〕）
法国（位于马赛西北90公里/55英里处）
城市废墟：广场、浴室、保存完好的圆形斗兽场、墓地、博物馆

弗雷茹斯（福伦茹利）（Frejus〔Forum Julii〕）
法国（位于戛纳西南20公里/13英里处）
驻防城镇废墟：圆形斗兽场、浴室、大引水渠、博物馆

里昂（拉哥敦纽姆）（Lyon〔Lugdunum〕）
法国
城市废墟遗迹：两个剧院、博物馆

马赛（马西利亚）（Marseilles〔Marsilia〕）
法国
港口废墟：房屋的残垣断壁、商店、道路（铺设于公共土地）、博物馆

尼斯（尼西亚）（Nice〔Nicaea〕）
法国（位于戛纳东北20公里/13英里处）
城市废墟：圆形斗兽场、浴室、基督教洗礼堂、博物馆

尼姆（内莫苏斯）（Nîmes〔Nemausus〕）
法国（位于马赛西北190公里/120英里处）
城市废墟：圆形斗兽场、保存完好的神庙、房屋、（远一点的地方）引水渠（Pont du Gard）、博物馆

奥兰治（阿劳西亚）（Orange〔Arausio〕）
法国（位于阿维尼翁以北22公里/14英里处）
城市废墟：大剧院、凯旋门

圣－雷米－恩－普罗旺斯（格兰努姆）（St-rémy-en-province〔Glanum〕）
法国（位于马赛西北60公里/38英里处）
城市废墟：广场、会堂、浴室、凯旋门、陵墓、博物馆

维森－拉－罗麦尼（瓦西奥·沃克提奥罗）（Vaison-la-Romaine〔Vasio Vocontiorum〕）
法国（位于阿维尼翁东北47公里/33英里处）
城市废墟：剧院、浴室、房屋、商店、道路、古桥、博物馆

科隆（科隆；科隆尼亚·阿格里皮嫩西斯）（Cologne〔Koln;Colonia Agrippinensis〕）

德国（位于波恩以北26公里/16英里处）
废墟：带塔楼和城门的城墙、近卫军营房、马赛克画、地下墓地、罗马-日耳曼博物馆

诺伊斯（诺瓦西姆）（Neuss 〔Novaesium〕）
德国（位于杜塞尔多夫以西7公里/4英里处）
要塞和防御工事废墟

特里尔（奥古斯塔·特雷维罗伦）（Trier〔Augusta Treverorum〕）
德国（靠近卢森堡边境）
城市废墟：浴室、圆形斗兽场、会堂、设防的城市大门、古桥支柱、博物馆

内伊梅根（卡斯特拉·奥比顿·巴塔沃鲁姆）（Nijmegen〔Castra oppidum Batavorum〕）
荷兰（位于鹿特丹以东120公里/73英里处）
废墟：要塞及周围居民点遗迹、博物馆

奥布达（阿金库姆）（Obuda〔Aquincum〕）
匈牙利（位于布达佩斯以北5公里/3英里处）
城市废墟：残垣断壁、用雕像装饰的浴室、道路、引水渠

恺撒里亚（Caesarea）
以色列（位于地中海海岸）
城市废墟：修复的剧院、圆形斗兽场、竞技场、海港、引水渠、廊柱、博物馆

耶路撒冷（Jerusalem）
以色列（首都）
城市废墟遗迹：安东尼亚要塞、（北部）城门、博物馆

西波里（塞福里斯）（Tsippori 〔Sepphoris〕）
以色列（位于拿撒勒以西）
废墟：剧院、重建的维拉、马赛克画

阿尔巴（阿尔巴·富森斯）（Albe〔Alba Fucens〕）
意大利（位于罗马以东80公里/50英里处）
城市废墟：广场、浴室、圆形斗兽场、剧院、会堂、神庙、房屋、商店、带城门的城墙

安齐奥（安提乌姆）（Anzio〔Antium〕）
意大利（位于罗马以南50公里/31英里处）
帝国游览胜地遗址：重建的用马赛克装饰的维拉、破败的剧院、维拉、海港、博物馆

贝内文托（本尼温图姆）（Benevento〔Beneventum〕）
意大利（位于那不勒斯东北50公里/31英里处）
城市废墟：广场、剧院、神庙、装饰华丽的拱门、古桥、方尖碑、博物馆

菲耶索莱（菲索莱）（Fiesole 〔Faesulae〕）
意大利（位于佛罗伦萨以北8公里/5英里处）
城市废墟：浴室、剧院、体育馆、廊柱、博物馆

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
意大利（位于那不勒斯东南32公里/20英里处）
保存完好的城市遗址：广场浴室、各种其他浴室、神庙、房屋、商店

奥斯提亚（Ostia）
意大利（位于罗马以西25公里/15英里处）
保存完好的城市遗址：广场、卡皮托林三神庙、浴室、剧院、神庙、房屋、商店、粮仓、道路、马赛克画、带城门的城墙、坟墓、博物馆

皮亚泽·亚美里尼（Piazza Armerini）
意大利（位于西西里岛）
废墟：有彩绘墙的帝国维拉、浴室、火炕式供暖系统、马赛克画

庞贝城（Pompeii）
意大利（位于那不勒斯东南32公里/20英里处）
保存完好的城市废墟：铺设人行道的广场、浴室、剧院、神庙、会堂、房屋、商店和酒吧、营房、坟墓、廊柱、马赛克画和绘画、城门、道路

罗马（罗马）（Rome〔Roma〕）
意大利（首都）
以各种情况保存下来的大量遗迹，从完整的、修复的到残垣断壁：广场、浴室、圆形斗兽场（著名的罗马大斗兽场）、剧院、会堂、多座神庙、多座拱门、元老院、商店、维拉和房屋、陵墓、许多廊柱、马赛克画、城墙、地下墓地、几座博物馆

叙拉古（Syracuse）
意大利（位于西西里岛）
更古老的希腊时代的废墟：圆形露天剧场、神庙、房屋、商店、廊柱、地下墓地、博物馆

的里雅斯特（特杰斯蒂）（Trieste〔Tergeste〕）
意大利（靠近与斯洛文尼亚的交界处）
废墟：剧院、凯旋门、博物馆

维罗纳（Verona）
意大利（位于威尼斯以西100公里/60英里处）
废墟：大圆形斗兽场、剧院、门楼、重建的拱门、博物馆

耶拉什（亚拉什）（Jerash〔Jarash〕）
约旦（位于安曼以北38公里/24英里处）
城市废墟：浴室、剧院、神庙、其他公共建筑、竞技场、凯旋门、铺设的道路、廊柱、博物馆

巴贝克（Baalbek）
黎巴嫩（位于贝鲁特东北64公里/40英里处）
城市废墟：保存完好的神庙（著名的朱庇特神庙）、商店、房屋、廊柱

推罗（苏尔）（Tyre〔Sour〕）
黎巴嫩（位于贝鲁特以南65公里/40英里处）
废墟：浴室、剧院、拱门、竞技场、大墓场、引水渠、博物馆

大勒普提斯（勒普西斯）（Leptis Magna〔Lepcis〕）
利比亚（位于的黎波里以东123公里/76英里处）
城市废墟：广场、浴室、宏伟的剧院、拱门、神庙、城墙

萨布拉塔（Sabrata〔Sabratha〕）
利比亚（位于的黎波里以西70公里/40英里处）
废墟：广场、浴室、神庙、商店和房屋、会堂、马赛克画

沃卢比利斯（Volubilis）
摩洛哥（位于拉巴特以东145公里/90英里处）
城市废墟：广场、卡皮托林三神庙、浴室、会堂凯旋门、房屋（有的有马赛克画）、商店、城墙

贝贾（皮索埃斯；帕克斯·朱利亚）（Beja〔Pisoes；Pax Julia〕）
葡萄牙（位于里斯本以南155公里/95英里处）
废墟：带门楼的城墙、利奥诺女王博物馆

查沃斯（阿基弗拉维亚）（Chaves〔Aquae Flaviae〕）
葡萄牙（位于波尔图东北120公里/75英里处）
废墟：古桥、残垣断壁、廊柱、博物馆

康戴克萨（康尼布里加）（Condeixa〔Conimbriga〕）
葡萄牙（位于波尔图以南122公里/77英里处）
废墟：城墙、马赛克画和绘画、墓地、博物馆

埃沃拉（Évora）
葡萄牙（位于里斯本以东110公里/70英里处）
城市废墟遗迹：神庙、引水渠、博物馆

圣地亚哥－德－卡西姆（米洛布里加）（Santiago do Cacem〔Mirobriga〕）
葡萄牙（位于里斯本东南90公里/55英里处）
城市废墟：广场、保存完好的浴室、卫城、竞技场、有壁画装饰的房屋

康斯坦察（托米/康斯坦提那）（Constanta〔Tomi/Constantiana〕）
罗马尼亚（位于黑海海岸）
城市废墟：广场、房屋、残垣断壁、马赛克画、城墙、有马赛克画和雕像的博物馆

都博里塔－特努－塞维林（Dobreta－Turnu Severin）
罗马尼亚（位于布加勒斯特以西295公里/184英里处）
卫戍城镇废墟：古桥、防御工事、训练场

哈米里斯（Halmyris）
罗马尼亚（位于多瑙河南部三角洲，黑海海岸）
废墟：浴室、有门楼的城墙要塞、基督教会堂、海港、坟墓

萨米泽杰图萨（乌尔比亚·特来亚那）（Sarmizegetusa〔Ulpia Traiana〕）
罗马尼亚（位于布加勒斯特西北310公里/190英里处）
达西亚人居住地废墟、展示陵墓出土的古器物的博物馆

贝尔格莱德（贝尔格莱德）（Belgrade〔Beograd〕）
塞尔维亚（首都）
废墟：设防的驻军营地、博物馆

米狄亚那（Mediana）
塞尔维亚（距贝尔格莱德东南200公里/125英里，

邻近尼什)
废墟：房屋、城墙、马赛克画、博物馆

阿库狄亚（波兰提亚）(Alcudia〔Pollentia〕)
西班牙（马略尔卡岛）
城市废墟：圆形斗兽场、房屋、博物馆

恩布里斯（恩布里昂）Empúries（Ampurias；Emporion)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海岸）
要塞/城市废墟：广场、圆形斗兽场、商店、房屋、马赛克画、博物馆

意塔利加（Italica）
西班牙（位于塞维利亚以北9公里/5英里处）
城市废墟：圆形斗兽场、商店、房屋、道路、考古博物馆、塞维利亚

梅里达（Mérida）
西班牙（位于马德里西南265公里/180英里处）
城市废墟：圆形斗兽场、神庙、竞技场、引水渠、古桥、罗马艺术国家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 Arte Romano）

塔拉戈纳（塔拉科）(Tarragona 〔Tarraco〕)
西班牙（位于巴塞罗那西南60英里处）
城市废墟：圆形斗兽场、竞技场、城墙、博物馆

奥格斯特（奥古斯塔·劳里卡）(Augst〔Augusta Raurica〕)
瑞士（位于巴塞尔以东10公里/6英里处）
城市废墟：剧院、重建的罗马维拉、博物馆

阿文切斯（阿文提库姆）(Avenches〔Aventicum〕)
瑞士（位于伯尔尼西南32公里/20英里处）
城市废墟：浴室、神庙、修复的圆形斗兽场、剧院、房屋、廊柱、大量的城墙、包含马赛克画的罗马博物馆（Musee Romain）

帕尔米拉（塔德莫尔）(Palmyra〔Tadmor〕)
叙利亚（位于大马士革东北215公里/134英里处）
要塞城市废墟：神庙、修复的剧院、建筑、柱廊、纪念物

迦太基（Carthage）
突尼斯（位于首都突尼斯的郊区）
少量废墟：浴室、海港、博物馆

多加（萨加）(Dougga〔Thugga〕)
突尼斯（位于突尼斯西南110公里/70英里处）
保存完好的城市废墟：广场、浴室、卡皮托林三神庙、剧院、凯旋门、神庙、维拉，还有农村附近星散的更多废墟

厄杰姆（阿尔－德杰姆；叙斯德鲁斯）(El Jem〔Al-Djem；Thysdrus〕)
突尼斯（位于突尼斯东南130公里/80英里处）
废墟：保存完好的圆形大斗兽场

贝特拉（苏菲图拉）(Sbeitla〔Sufetula〕)
突尼斯（位于El Douleb油田附近）
城市废墟：广场、浴室、凯旋门、神庙

苏塞（Sousse）
突尼斯（位于突尼斯东南100公里/65英里处）
地下墓地、有精美的马赛克画的博物馆

突尼斯（Tunis）
突尼斯（都城，向北5公里/3英里）
巴尔多博物馆，内藏精美的马赛克画和其他艺术作品

乌提卡（Utica）
突尼斯（位于突尼斯西北40公里/25英里处）
废墟：浴室、内藏精美马赛克画的博物馆

安塔基亚（安条克）(Antakya〔Antioch〕)
土耳其（位于与叙利亚接壤处）
内藏一流马赛克画的哈塔（Hatay）博物馆

贝加马（帕迦马）(Bergama〔Pergamum〕)
土耳其（位于伊斯坦布尔西南250公里/150英里处）
城市废墟：罗马－希腊神殿/神庙、剧院、运动场

埃菲斯（以弗所）(Efes〔Ephesus〕)
土耳其（位于伊斯坦布尔以南350公里/220英里处）
修复的城市废墟：圆形斗兽场、浴室、神庙、图书馆、公共建筑、装饰豪华的房屋

卡利昂（卡利昂－昂－乌斯克；伊斯卡）〔Caerleon

(Caerleon-on-Usk; Isca])
威尔士（位于蒙默斯新港以北3公里/2英里处）
废墟：圆形斗兽场、浴室的残垣断壁、神庙、商店、房屋、罗马军团博物馆

著名的博物馆典藏

澳大利亚（Australia）
约翰·艾略特古迹博物馆，霍巴特大学，塔斯马尼亚

奥地利（Austria）
卡林西亚地方博物馆，克拉根福

比利时（Belgium）
卢瓦-拉-纽维博物馆，奥提跟-卢瓦-拉-纽维（Musee de Louvain-la-Neuve, Ottignies-Louvain-la-Neuve）

加拿大（Canada）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多伦多

英格兰（England）
阿什莫兰（Ashmolean）艺术和考古博物馆，牛津大学
大英博物馆，伦敦
古迹博物馆，泰恩河上的纽卡斯尔大学
古代考古博物馆，剑桥大学
舍夫顿（Shefton）博物馆，泰恩河上的纽卡斯尔大学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伦敦
文多兰达（Vindolanda）和罗马军队博物馆，巴顿·米尔，赫克萨姆，诺森伯兰

法国（France）
卢浮宫，巴黎
地中海考古博物馆，马赛
高卢-罗马文明博物馆，里昂

德国（Germany）
阿伦边疆博物馆　（拉丁文“limes”意为“边界”、“分界线”）
罗马城市博物馆，罗滕堡

希腊（Greece）
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荷兰（Holland）
阿拉德·皮尔森博物馆，阿姆斯特丹
国家古迹博物馆，莱顿

以色列
鲁宾和伊迪斯_赫克特博物馆，海法大学

意大利（Italy）
巴洛克博物馆，罗马
卡皮托林博物馆，罗马
卡格利亚利国家考古博物馆
国家考古博物馆，那不勒斯
罗马国家博物馆

新西兰（New Zealand）
奥塔戈博物馆，奥塔戈大学

葡萄牙（Portugal）
卡路斯特·古尔班奇博物馆，里斯本

斯洛文尼亚（Slovenia）
斯洛文尼亚国家博物馆，卢布尔雅那

西班牙（Spain）
耶里兹城市考古博物馆
阿拉瓦考古博物馆
塔拉格那国家考古博物馆

瑞士（Switzerland）
巴塞尔古代艺术博物馆，路德维格收藏室，巴塞尔

美国（USA）
安布罗斯收藏室，佛蒙特大学
阿瑟·M·萨克勒博物馆，哈佛大学
J. 保罗·杰蒂博物馆，洛杉矶
凯尔塞考古博物馆，密歇根大学
洛威艺术博物馆，迈阿密大学
米歇尔·C·卡洛斯博物馆，埃莫里大学，亚特兰大
艺术博物馆，普罗维登斯，罗得岛
精美艺术品博物馆，波士顿
圣安东尼奥艺术博物馆，圣安东尼奥，得克萨斯
坦帕艺术博物馆，坦帕，佛罗里达
密西西比大学博物馆，戴维·M·罗宾逊收藏室，密西西比大学

威尔士（Wales）
韦勒考梅博物馆，威尔士大学，斯旺西

拉丁作家与希腊作家

阿基乌斯（Lucius Accius,鲁基斯·阿基乌斯，前170～约前86年）

创作了四十多部悲剧，许多是关于特洛伊的传说故事的，还包括一部论述雅典和罗马戏剧史的散文与诗歌著作。

亚历山大里亚的阿庇安（Appian of Alexandria，1世纪末至2世纪中期）

成为一名罗马公民，最后在安东尼乌斯·庇乌斯（Antoninus Pius）统治时期获得财务长官的职务。著有一部希腊语《罗马史》，从王政时代写到他自己生活的时代，根据罗马征服的各个民族编排。

阿普雷（Apuleius，生活于大约125之前）

北非社会演说家、作家，惟一一部完整保留下来的拉丁文小说《变形记》的作者（有时称为《金驴》）。

奥索尼乌斯（Decimus Magnus Ausonius，德奇穆斯·马格努斯·奥索尼乌斯，4世纪）

来自波尔多的语法和修辞老师，皇帝格拉提安执政时期，他在政治上得势。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最著名的是那首生动活泼的《摩西勒河》（*Moselle*）。

加图路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盖乌斯·瓦雷里乌斯·加图路斯，生于约前84～前54年）

出生于维罗纳，是罗马年轻的“新”诗人之一，受到希腊化时期的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诗集很薄，但风格多变，语言相当优美、简洁，其中包括描写他爱慕贵族出身的莱斯比亚的抒情诗。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前106～前43年）

共和国最后几十年杰出的政治家、演说家，还写作了有关修辞学的论文、诗歌以及哲学著作，在其哲学著作中他用拉丁文创造了一些哲学词汇。此外，他还留下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件。

秦纳（Gaius Helvius Cinna，盖乌斯·赫尔维乌斯·秦纳，生活于公元前44年前）

非常博学的、被人间接提到的诗人，与卡图卢斯交好，以其微型史诗《兹米尔那》（Zmyrna）闻名于世。因被误认为是恺撒的一个敌人，而在尤里乌斯·恺撒的葬礼上被错误地处死。

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约前110～前24年）

现存最早的拉丁文传记作家，他的著作《名人传》中大概写到四百个人，他还写了三卷世界史和一部地理学著作。

西普里安（Thascius Caecilius Cyprianus，塔斯基乌斯·凯奇利乌斯·西普里安乌斯，约200～258年）

归附了基督教，成为他的祖国迦太基的主教。他留下许多重要的信件和小册子，主要内容是由248年皇帝德基乌斯的迫害引起的基督教社会的种种困难。

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Cassius Dio ‘Cocceisnus’，卡西乌斯·狄奥·“卡先努斯”约164～229年之后）

来自俾提尼亚的成功的罗马元老、高级官员，用希腊语写了一部内容丰富的罗马史，从王政时代一直写到他生活的时代。

狄奥多鲁斯·西库卢斯（Diodorus Siculus，前1世纪）

来自西西里的希腊作家，著有一部世界史，有关罗马晚后时期的部分详细参考了波利比乌斯和波西冬尼的著作。

恩尼乌斯（Ennius [Quintus Ennius]，昆图斯·恩尼乌斯，前239～前169年）

诗人，自公元前204年一直居住在罗马，创作了大量悲剧，许多是以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为基础的。他还创作了一首很长的叙事诗《编年纪》（*the Annales*），这是一部罗马人民的历史，从特洛伊失陷一直写到他生活的时代。这部著作影响了以后的作家，如卢克莱修和维吉尔。他发明了拉丁文中的长短短格六韵步诗。

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约260～339年）

大约313年起担任恺撒里亚主教，著有圣经注释

《编年史》，综合了《旧约》、近东、希腊和罗马史，是一部一直写到324年的教会史，还著有富有争议的《君士坦丁传》。

盖伦（Galen，129～?199/216年）

来自帕迦马的希腊医师，在罗马居住，162年担任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的宫廷医生。写了很多哲学论文，特别是逻辑学论文，还有各种医学论著，主要是关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

贺拉斯（Horace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昆图斯·贺拉提乌斯·弗拉古斯，前65～前8年）

来自阿普利亚的维纽西亚的诗人，加入了麦森那斯的文学圈子，后来与奥古斯都交往甚密。他的作品糅合了文雅的诗风和富有生气的个人风格，最著名的诗有《歌集》（抒情诗）和《讽刺诗集》。

约瑟弗斯（Josephus [Flavius Iosephus]，弗拉维·约瑟弗斯，37或38年以前人）

犹太祭司和政治领袖，在66年至70年的犹太教起义中改变立场为提图斯效力，直到耶路撒冷被围，他被授予罗马公民权和位于罗马城内的一栋华丽住宅。著有一部《犹太战争史》，还有一部有关犹太历史的长篇著作，从创世纪一直写到起义爆发前。

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 [Gaius Iulius Caesar]，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约前100～前44年）

罗马政治家、将军，成为独裁官后被阴谋刺杀。他保留下来的著作有《高卢战记》（58～51年）以及描述他在公元前49年陷入罗马内战的《内战记》，这两部著作主要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

朱维那尔（Juvenal [Decimus Iunius Iuvenalis]，戴西姆斯·尤尼乌斯·尤文那利斯，主要活动于110～130年）

著有言辞非常华丽的讽刺诗，具有从史诗中借鉴而来的“宏大风格”，讽刺对象显然是他那个时代的罗马。

莱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Lucius Caelius Firmianus Lactantius]，鲁基斯·凯利乌斯·菲尔米安乌斯·莱克坦提乌斯，约240～320年）

生于北非的罗马演说家，后归附了基督教，成为一名杰出的辩护士，写作风格类似西塞罗。

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 [Lucius Livius Andronicus]，卢修斯·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前3世纪）

被释奴，创作了多部悲剧和喜剧，还翻译了荷马的《奥德赛》。

李维（Livy [Titus Livius]，提图斯·李维乌斯，前59～17年）

来自帕多瓦的史学家，著有142卷的《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描述了从罗马的起源到公元前9年的历史。他与奥古斯都私交甚密，曾鼓励年轻的克劳狄撰写历史。

卢坎（Lucan [Marcus Annnaeus Lucanus]，马尔库斯·安尼乌斯·卢卡努斯，39～65年）

罗马诗人，因其史诗《内战记》（*De bello civili*）（也常称作《法萨里亚》[*Pharsalia*]）而闻名，认为恺撒和庞培之间的内战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战争，其观点被看做是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针锋相对的。曾参与暗杀尼禄的阴谋，事机败露自杀。

萨摩斯塔的琉善（Lucian of Samosata，约120年以前）

多产的希腊文作家，以其文学对话、散文和一部模仿性杰作《真正的历史》（*the True Histories*）著称。

卢基里乌斯（Lucilius [Gaius Lucilius]，盖乌斯·卢基里乌斯，生于约前180～前102或101年）

来自坎佩尼亚的个性诗人，以其30卷诗歌被誉为当时政治和社会讽刺诗的先锋。

卢克莱修（Lucretius [Titus Lucretius Carus]，提图斯·卢克莱修·卡乌斯，约前94～前65或前51年）

希腊伊壁鸠鲁哲学学派诗人，赞成宇宙和人类精神的原子构成说，著有《物性论》（*De rerum natura*），全书采用拉丁文六韵步诗行描述他的物理学理论，但有很强的伦理道德意义。

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Marcus Aurelius，121～180年，161年成为罗马皇帝）

以写作《沉思录》闻名，是献给自己的个人笔记（用希腊文写成），记录了自己对人类生活和众神之道的很多思考，受到斯多葛学派的强烈影响。

马蒂尔（Martial [Marcus Valerius Martianlis]，马尔库斯·瓦勒里乌斯·马蒂里斯，生卒年代约为38

～41至101～104年）

拉丁诗人，来自西班牙，以警句诗闻名，主要特点是生动、无情地描绘罗马社会的景象，充满机智和幽默。

加德拉的梅利埃格（Meleager of Gadara，活动时期为前100年）

现以失传的《美尼比安》（*Menippean*）讽刺诗的作者，信奉犬儒哲学，创作各种散文、诗歌，收集、写作警句诗。

奈维乌斯（Naevius [Gnaeus Naevius]，格奈乌斯·奈维乌斯，前3世纪）

创作多部喜剧和悲剧，大多模仿希腊阿提卡戏剧的形式。他曾参加过第一次布匿战争，并创作了一首有关这次战争的诗歌。

奥利金（Origen [Origenes Adamantius]，奥利金尼斯·阿达曼提乌斯，约184年或185～254年）

出生于埃及，但用希腊文写作，《旧约》、《新约》经文及基督教教义的评注者，他的《基督教原理》被认为是基督教信仰的正式宣言。

奥维德（Ovid [Publius Ovidius Naso]，普布利乌斯·奥维德·那索，前43～17年）

以色情诗著称的诗人，特别有名的是他的教诲诗《爱的艺术》和史诗《变形记》，后者复述了含有超自然形状变化的神话。公元8年，据说由于他的《爱的艺术》和一次难以理解的不检点行为，被奥古斯都放逐到黑海的托米斯（Tomis）。

帕库维乌斯（Marcus Pacuvius，马尔库斯·帕库维乌斯，前220～约前130年）

意大利南部的悲剧作家，他的许多悲剧都是从希腊阿提卡悲剧经典翻译过来的或是其精编本。

波桑尼阿斯（Pausanias，活动时期为150年左右）

希腊游记作家，以其《希腊记事》闻名，记述了在阿卡亚行省发现的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的纪念物（特别是雕刻与绘画）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和宗教背景。

柏尔修斯（Persius [Aules Persius Flaccus]，奥勒斯·柏尔修斯·弗拉古斯，34～62年）

写过六首讽刺诗，矢志信奉斯多葛派哲学，以其复杂难懂的意象、转弯抹角的语言著称。

皮特罗尼乌斯·阿尔比特（Petronius Arbiter，死于公元66年？）

《森林之神》的作者，这是一部讽刺小说，特别强调英雄们的性爱奇遇和文学、文化批评，现存最著名的片断是《特里马开奥的晚宴》（*Cena Trimalchionis*）。

斐洛·朱迪乌斯（Philo Judaeus，1世纪早期）

犹太哲学家、作家、亚历山大里亚的政治领袖，是一位多产的使用希腊语的犹太经文评注家，深受希腊哲学传统影响，特别是柏拉图哲学。

普劳图斯（Titus Maccius Plautus，提图斯·马修斯·普劳图斯，活动于约前205～前184年）

至少21部拉丁喜剧的作者，它们改编自希腊喜剧，剧中充满普通人物和诙谐的语言，以意义被夸大的音乐成分而自豪。

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Gaius Plinius Secundus]，盖乌斯·普林尼·塞肯都斯，23年或24～79年）

罗马律师、官员，最有名的作品是《自然史》，全书共37卷，是包罗当时各种知识的百科全书，死于维苏威火山爆发。

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 [Gaius Pliniu Caecilius Secundus]，盖乌斯·普林尼·凯奇利乌斯·塞肯都斯，约61～112年）

罗马律师、官员，以文学书信集著称，这些书信详细描述了他和他那个圈子的日常活动和所思所想，第十卷包括他在担任比提尼亚-本都总督时与皇帝图拉真的来往信件。

普罗提诺（Plotinus，205～269/70年）

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其形而上学思想对早期基督教思想家有强烈影响。

喀罗尼亚的普卢塔克（Plutarch of Chaeronea [Lucius （?） Mestrius Plutarchus]，卢奇乌斯（?）·马斯特里乌斯·普卢塔克，生于50年以前，死于120年以后）

希腊作家，罗马公民，是一位多产的随笔作家，《比较列传》的作者，目的是以希腊和罗马史上的伟人在其职业生涯中表现出来的个人美德（和恶行）为参照。

波里奥（Pollio[Gaius Asinius Pollio]，盖乌斯·阿斯尼乌斯·波里奥，前76～4年）

先是支持恺撒，后支持安东尼，他是公元前40年的执政官，在罗马建立了第一座公共图书馆，撰写了诗歌、悲剧、演说辞和共和国最后20年的历史。

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前200～前118年）

阿卡亚希腊政治英雄，在罗马做了20年的俘虏，参加了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的阵营。著有罗马攫取世界统治的历史，写作方法严谨，有很多保留下来。

普罗普提乌斯（Sextus Propertius，塞克斯图·普罗普提乌斯，生于前54～前47年之间，死于前16年［？］以前）

罗马哀歌诗人，来自亚西斯（Assisi），其爱情诗歌颂了他对一个叫辛西娅的妇女的热爱，其诗作深受希腊化时期希腊诗人卡里马科斯的影响。

托勒密（Ptolemy [Claudius Ptolemaeus]，克劳狄乌斯·托勒梅乌斯，约生活在146～170年）

用希腊文写作的数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以亚历山大里亚为研究基地。其主要著作为《大综合论》，是有关天文学的完整的教科书，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统治该学科长达1300年。

昆体良（Quintilian [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马尔库斯·法比乌斯·昆体良]，约35～90年）

古罗马雄辩术老师，出生于西班牙，其文学杰作讨论了一个演说家从其孩童时代到事业的巅峰时期所受到的教育。

撒路斯特（Sallust [Gaius Sallustius Crispus]，盖乌斯·撒路斯特·克利斯普斯，约前 86～前35年）

罗马政治家、史学家，关注罗马道德的衰落，著有专题著作《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以及编年体的《历史》。

辛尼加（Seneca [Lucius Annaeus Seneca，'Seneca the Younger'］，鲁基乌斯·安尼乌斯·辛尼加，“小辛尼加”，生于前4世纪至1世纪之间，死于65年）

罗马演说家，出生于西班牙，尼禄的老师，后来成为尼禄的政治顾问和大臣。用散文体著有伦理和科学著作，现存九部悲剧，其灵感来自希腊悲剧全集，特别是欧里庇得斯，还受到罗马诗人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的影响。

斯塔提乌斯（Statius [Pulius Papinius Statius]，普布利乌斯·帕比尼乌斯·斯塔提乌斯，生于45年或60年代早期，死于96年以前）

图密善时代的颂诗诗人，著有《诗草集》（*silvae*）和高度自觉的史诗《底比斯战记》（*silvae*）。

亚马西亚的斯特拉波（Strabo of Amaseia，生于大约前64年，死于14年以后）

广泛游历的希腊地理学家、史学家，在罗马定居了若干年。

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 [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奎卢斯，约生于70年，约死于130年）

帝国行政长官，以其《诸恺撒生平》及其他传记研究著称，但是也写有关各种文化问题的零星作品。

塔西陀（Tacitus [Publius（?）Cornelius Tacitus]，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塔西陀，约生于56年，死于118年以后）

政治家、演说家、历史学家，以《历史》、《编年史》著称。他的作品表现了对皇帝统治之下的政治生活的悲观情绪，并含沙射影地揭示了一个更黑暗的基本现实状况，他的写作风格也相应地复杂难懂。

泰伦斯（Terence [Publius Terentius Afer]，普布利乌斯·泰伦提乌斯·阿菲尔，约死于前159年）

迦太基出生的作家，著有六部拉丁喜剧，它们都非常忠实地改编自希腊喜剧，以自然主义风格写就。

提布鲁斯（Tibullus [Albius Tibullus]，阿尔比乌斯·提布鲁斯，生于前55或前48年，死于前19年）

哀歌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了对德里娅（Delia）和尼美西斯（Nemesis）两位女人的爱恋以及对乡村生活的向往。

维吉尔（Virgil [Publius Vergilius Maro]，普布利乌斯·维吉利乌斯·马罗，前70～前19年）

来自曼图亚的诗人，是麦森那斯组织的文学圈子中的一员，因此跟屋大维，即奥古斯都关系密切。他的著作有田园诗歌《牧歌》、《农事诗》，这是一部关于农耕的教诲诗。还有史诗巨著《埃涅阿斯》，讲述了埃涅阿斯受命离开特洛伊，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新家园，即罗马的起源，这部史诗立刻成为拉丁文学的经典著作。

参考书目

CHAPTER ONE

M. Beard and M.H. Crawford, *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E. Fantham, *Roman Literary Culture from Cicero to Apuleiu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E. Guren,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epublican Rom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S. Hinds, *Allusion and Intertext. Dynamics of appropriation in Roman poetr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J. Huskinson, （ed.）*Experiencing Rome. Culture, Identity and Power in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E. Rawson,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PTER TWO

T.J. Cornell, *The Beginnings of Rome, 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c.1000–264 B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5

J.A. Crook, A Lintott, E. Rawson, （eds.）*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9., 3rd ed. The Last Age of the Roman Republic, 146–43 BC*,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H.H. Scullard, *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753–146 BC, 4th ed.*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0

H.H. Scullard, *From the Gracchi to Nero: A History of Rome from 133 BC to AD 68, 5th ed.*,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2

F.W. Walbank, A.E. Astin, M.W. Frederiksen, （eds.）*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7 pt. 2, 2nd ed. The Rise of Rome to 220 BC*,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F.W. Walbank, A.E. Astin, M.W. Frederiksen, （eds.）*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8, 2nd ed. Rome and the Mediterranean to 133 B.C.*,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APTER THREE

J. Bennett, *Trajan: Optimus Princeps*（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1

A.R. Birley, *Hadrian: The Restless Emperor*, London, Routledge, 1997

M.T. Boatwright, *Hadrian and the Cities of the Roman Empi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A. Camero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D 284–430*, London, Fontana, 1993

J.B. Campbell, *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 31 BC–AD 23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i. Corcoran, *The Empire of the Tetrarchs: Imperial Pronouncements and Government AD 284–32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rev. ed. 2000

A. Garzetti, *From Tiberius to the Antonines: A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AD 14–192*, London, Methuen, 1974

M. Goodman, *The Roman World 44 BC–AD 180*, London, Routledge, 1997

I. Gradel, *Emperor Worship and Roman Relig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2

A.H.M. Jones, *Augustus*（*Ancient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5

B. Levick, *Claudius*, London, Batsford, 1993

B. 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rev. ed.）, London, Routledge, 1999

B. Levick, Vespasian, London, Routledge, 1999

S.R.F. Price, *Rituals and Power: The Roman Imperial Cult in Asia Min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R.J.A. Talbert, *The Senate of Imperial Ro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A. Wallace-Hadrill, *Suetonius: The Scholar and his Caesars*（Classical Life and Letters）,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R.C. Weaver, *Familia Caesaris: A Social Study of the Emperor's Freedmen and Sla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C. Wells,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Fontana, 1984

CHAPTER FOUR

K. Bradley, *Slavery and Society at Rom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P.A. Brunt, *Roman Imperial Them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J. Gardner, *Being a Roman Citiz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J. Gardner, *Family and Familia in Roman Law and Lif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A.W. Lintott, *Imperium Romanum: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F.G.B. Millar, *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 31 BC–AD 337*,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B. Rawson（ed.）*The Family in Ancient Rom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G.D. Woolf, *Becoming Roman, The Origins of Provincial Civilization in Gaul*,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 FIVE

S.E. Alcock, *Graecia Capta, The Landscapes of Roman Greec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 Edwards, *The Politics of Immorality in Ancient Rom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S. Goldhill（ed.）*Being Greek under Rome – Cultural Identity, the Second Sophistic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mpir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A.H.M. Jones, *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 1940

F.G.B. Millar, *The Roman Near East, 31 BC–AD 3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C.R. Swain, *Hellenism and Empire, Language, Classicism and Power in the Greek World, AD 50–2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

T. Whitmarsh, *Greek Literature and the Roman Empire. The Politics of Imit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TER SIX

K. Bradley, *Slavery and Rebellion in the Roman World, 140 BC–70 B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T. Cornell, 'The Conquest of Italy', in CAH VII, 2 （2nd ed.）1989

M. Crawford, 'Origini e sviluppi del sistema provinciale romano', in *Storia di Roma II: L'impero mediterraneo I: La repubblica imperiale* （Turin, 1990）91–121.

The Roman Republic （2nd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G. De Ste. Croix,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from the Archaic Age to the Arab Conquest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W. Fitzgerald, *Slavery and the Roman Literary Imagi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Garnsey （ed.）*Non-Slave Labour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Garnsey, *Ideas of Slavery from Aristotle to August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A. Giardina （ed.）*The Rom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r. 1993, especially the essays by J. Andreau, J. Kolendo, C.R. Whittaker

A. Hands, *Charities and Social Aid in Greece and Rom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8

K. Hopkins, *Conquerors and Sla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S. Joshel, *Work, Identity, and Legal Status at Rome*,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R. Kallet-Marx, *Hegemony to Empi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Imperium in the East from 148 to 62 B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CHAPTER SEVEN

P. J. Aicher, *Guide to the Aqueducts of Ancient Rome*, Illinois, Bolchazy-Carducci Publishers, 1995

M. Boatwright, *Hadrian and the City of Ro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A. Claridge, *Rome, Oxford Archaeological Gu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Connolly and H. Dodge, *The Ancient 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J. Coulston and H. Dodge, （eds.）*Ancient Rome: the Archaeology of the Eternal 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Archaeology Monograph 54, 2000

J. Curran, *Pagan City and Christian Capital: Rome in the Four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D. Dudley, *Urbs Roma: A Source Book of Classical Texts on the City of Rome and Its Monuments*, Aberdeen, PUBLISHER?, 1967

C. Edwards and G. Woolf （eds.）, *Rome the Cosmopol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D. Favro, *The Urban Image of Augustus*, Cambridge, PUBLISHER?, 1996

E. Nash, *A Pictori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New York, Hacker Art Books, 1981

O. Robinson, *Ancient Rome: City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J. E. Stambaugh, *The Ancient Roman C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M. Steinby, *Lexicon Topographicum Urbis Romae I–V*, Rome, PUBLISHER?, 1993–9

CHAPTER EIGHT

G. B. Conte, *Latin Literature. A History*, PLACE, PUBLISHER?, 1994

A. Dihle,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D. Fowler, *Roman Constructions. Readings in Postmodern Lat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E. J. Kenney, *Latin Literature* （*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S. Morton Braund, *Latin Literature*, 2002

O. Taplin, *Literature in the Roman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M. von Albrecht, *A History of Roman Literature*, 2 vols, Leiden, 1997

CHAPTER NINE

A. and M. De Vos, Ercolano, Stabia, Rome, Guide archeologica Laterza, 1982

M.C. Holf and S. I. Rotroff, （eds.）*The Romanization of Athens: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Lincoln, Nebraska* （April 1996）, Oxford, Oxbow, 1997

S. Lancel, *Carthage: A History*, translated by Antonia Nevill, Oxford, Blackwell, 1995

P. MacKendrick, *The North African Stones Speak*,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S. Nappo, *Pompeii: Guide to the Lost Cit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8

E.J. Owens, *The City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J.B. Rives, *Religion and Authority in Roman Carthage from Augustus to Constanti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J. Travlos, *A Pictori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Athen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J.B. Ward-Perkins, *Roman Imperial Architectu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1

E.M. Wightman, *Roman Trier and the Treveri*, London, Rupert Hart-Davis, 1970

CHAPTER TEN

T. Barton, *Ancient Astr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4

M. Beagon, *Roman Nature: The Thought of Pliny the Eld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S. Cuomo, *Ancient Mathema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1

O.A.W. Dilke, *Greek and Roman Map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5

R. French, *Ancient Natural History: Histories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R. Jackson, *Doctors and Diseases in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8

J. G. Landels, *Engineer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8
J. G. Landels, *Music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London, Routledge, 1999
G.E.R. Lloyd, *Greek Science after Aristotle*,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73
E.W. Marsden, *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E.W. Marsden, *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 Technical Treatis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O. Neugebauer, *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 Providence, Brown University Press, 1957
E. Rawson,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London, Duckworth, 1985
C. Walker, (ed.) *Astronomy Before the Telescope*,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6

CHAPTER ELEVEN

M. Beard, J. North, S. Price, *Religions of Rome, Volume 1, History; Volume 2, A Sourceb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J. Ferguson, *The Religions of the Roman Empi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R. Lane Fox, *Pagans and Christians*, New York, Knopf, 1987
R. MacMullen, *Paganism in the Roman Empire*, New Haven, C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M.W. Meyer, (ed.) *The Ancient Mysteries: A Sourcebook: Sacred Texts of the Mystery Religion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9
R.M. Ogilvie, *The Romans and Their God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New York, Norton, 1970
S.R.F. Price, *Rituals and Power: The Roman Imperial Cult in Asia Min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H.H. Scullard, *Festivals and Ceremonies of the Roman Republic*,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1
R. Turcan, *The Cults of the Roman Empire*, translated by Antonia Nevil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R. Turcan, *The Gods of Ancient Rome: Religion in Everyday Life from Archaic to Imperial Times*, translated by Antonia Nevill, London, Routledge, 2001
R.E. Witt, *Isis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CHAPTER TWELVE

J. Andreau, *Banking and Business in the Rom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G. Barker and J. Lloyd, (eds.) *Roman Landscapes: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London, British School at Rome, 1991
P. Garnsey,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Garnsey and R. Saller, *The Roman Empir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Duckworth, 1987
P. Garnsey, K. Hopkins and C.R. Whittaker, (eds.) *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3
K. Greene, *The Archaeology of the Roman Economy*, London, Batsford, 1986
P. Horden and N.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2000
C.J. Howgego, *Ancient History from Coi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D.J. Mattingly and J. Salmon, (eds.) *Economies Beyond Agricultu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N. Morley, *Metropolis and Hinterland: the city of Rome and the Italian economy, 200 B.C.–A.D. 2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D.P.S. Peacock and D.F. Williams, *Amphorae and the Roman Economy: an introductory guide*, London, Longman, 1986
K.G. Persson, *Pre-Industrial Economic Growth: social organis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Europe*, Oxford, Blackwell, 1988
W. Scheidel and S. von Reden, (eds.) *The Ancient Econom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K.D. White, *Greek and Roman Techn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G. Woolf, *Becoming Roman: the origins of provincial civilization in Gau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E.A. Wrigley,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G.K. Young, *Rome's Eastern Trade: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imperial policy, 31 B.C.–A.D. 30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CHAPTER THIRTEEN

B. Campbell, *Warfare and Society in Imperial Rome*, London, Routledge, 2002
A.K. 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A.K. Goldsworthy, *Roman Warfare*, London, Cassell, 2000
L. Keppie, *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From Republic to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1984
J. Rich and G. Shipley, *War and Society in the Roma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3
G. Webster,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ies AD*, Totowa, 1985

索 引

斜体页码指插图说明。

F

J

K

L

M

N

O

P

Q

R

S

X

撰稿人

潘尼洛普·阿里森（Penelope Allison）

潘尼洛普·阿里森曾在悉尼大学、澳大利亚国家大学和舍菲尔德大学教授古代史和考古学，曾是悉尼大学和剑桥古典学学院的研究员，现在是澳大利亚国家大学澳大利亚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研究学会研究员。她最近出版的著作包括：《王室活动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Houshold Actictics)（路特里奇出版社，伦敦、纽约1999年），《庞贝的住宅》第11卷（Pompeji）((Hirmer出版社) 慕尼黑，2002年）和《庞贝的家庭：物质文化分析》(*Casadella Caccia Antica, Häuser in Pompeji*)（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Cotsen）考古学协会洛杉矶，2003年）

约翰·古尔斯顿（Jon Coulston）

约翰·古尔斯顿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古典学院的古代史与考古学讲师，出版了大量有关罗马考古的著作，侧重于罗马军队、罗马军事装备、罗马雕刻和罗马城等研究领域。他与海泽尔·多奇(Hazel Dodge）合编了《古代罗马：永恒之城的考古》(*Ancient Rome: the Archaeology of Eternal City*)（牛津大学考古协会牛津，2000年），目前正着手准备有关图拉真柱的专题著作。

艾玛·丹奇（Emma Dench）

艾玛·丹奇自1992年以来一直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古代历史与古典文化。她曾在牛津大学学习，是罗马英国学院的一名罗马学者并在此担任胡格·拉斯特（Hugh Last）研究员，最近成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学院的一名历史研究员。她的研究集中在希腊化和罗马世界的文化史，侧重于对过去的身份和古代人的接纳等问题的研究。她撰写了《从野蛮人到新人：亚平宁中部地区各民族对希腊人、罗马人和现代人的认识》(*From Barbarians to New Men: Greek, Roman and Modern Perception of People From the Central Apennines*)（克拉伦登出版社，牛津，1995年）一书，刚刚完成一部有关罗马人身份的新书。

海泽尔·多奇（Hazel Dodge）

海泽尔·多奇是路易·克劳德·普泽（Louis Claude Purser）高级讲师，在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古典学院讲授古典考古学。她的研究和出版物涉及罗马建筑、古代技术、建筑材料和工艺（特别侧重东部地中海地区）以及罗马城。目前，她正在撰写一部有关罗马世界的装饰石材的采掘、运输和使用的专题著作。

吕贝卡·弗莱明（Rebecca Flemming）

吕贝卡·弗莱明是伦敦国王学院的古代史讲师，她的研究集中在古代世界的妇女和医学，既有独立研究又有综合研究。她撰写了《医学和罗马妇女的诞生：性别、自然和从塞尔苏斯到盖伦的权威》(*Medicine and the Making of Roman Women: Gender, Nature, and Authority from Celsus to Galen*)（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

伊恩·海恩斯（Ian Haynes）

伊恩·海恩斯在伦敦大学的伯贝克学院教授罗马行省的考古。他承担了在英国、德国、捷克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的田野发掘工作。目前他担任了阿普勒（Apulum）项目的英国带头人，这个项目是三个国家对罗马尼亚的阿尔巴鲁里亚的莱伯-帕特（Liber Pater）圣所展开的考查工作。伊恩与艾德里安·格尔德斯沃奇（Adrian Goldsworthy）合编了《罗马军队社会》(《罗马考古学杂志》(*The Roman Army as a Community*)，1999年)，与W.S.汉森(W.S.Hanson）合著了有关罗马达西亚行省的作品，即将出版。2003年，他被选为古代文物协会会员。

理查德·林（Richard Lim）

自1990年以来，理查德·林一直在史密斯学院历史系教授古代史，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获得了罗马美国学会古典研究的优秀奖学金，这是国家对人文学科的研究员和国家人文学科中心的研究员给予的资助。他撰写了《古代晚期的公共辩论、权力和社会秩序》(*Public Disputations, Power, and Social Order in Late Antiquity*)（加

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正在写一本有关古代晚期的公共场所和城市改造的作品。

克里斯多弗·S·马查伊 (Christopher S. Machay)

克里斯多佛·S·马凯从哈佛大学获得了古典语言学的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任教，现在是阿尔伯达大学的副教授。他写过很多有关罗马历史各个时期的文章，即将出版《古代罗马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Ancient Rome*)、标题为《巫师的锤子》(*Malleus Maleficarum*) 的政治迫害手册的原文及翻译以及有关明斯特王国不幸的再洗礼教徒的主要当代材料的翻译（大约1565年的一部拉丁文著作)。

内维勒·摩利 (Neville Morley)

内维勒·摩利是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古代史高级讲师，他的研究兴趣是古代经济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以及19世纪经济和哲学思想对古代思想的吸收。他的著作有《大都市与腹地：罗马城与意大利经济》(*Metropolis and Hinterland: The City of Rome and The Italian Economy*)（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写作古代史》(*Writing Ancient History*)（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9年)，还有关于罗马人口统计、古代史的反事实方法、卡尔·马克思的古代观等文章。

大卫·波特 (David Potter)

大维·波特是一位古典学教授，讲授罗马史、古代运动、希腊语和拉丁语，凭借其实力担任了密歇根大学劳埃德·豪奖学金 (Lloyd Hall Scholars) 项目的带头人。他出版了四部著作，包括《文学文本与罗马史学家》(*Literary Texts and The Roman Historian*)（路特里奇出版社，1999年)、《海湾中的罗马帝国 (180–395)》(*The Roman Empireat Bay (180–395)*)（密歇根大学，2004年)。他还与人合编了《罗马帝国日常生活和娱乐》(*Entertain Ment inThe Roman Empire*)（密歇根大学，1999年)。

西蒙·斯万 (Simon Swain)

西蒙·斯万是沃里克大学的古典学教授和系主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All Souls College) 的研究员。他出版了很多有关罗马帝国文学和历史的著作。他最新出版的书名为《走近古代晚期》(*Approaching Late Antiquity*)，目前，他正致力于研究伊斯兰对希腊文化的吸收。

格雷格·沃尔夫 (Greg Woolf)

自1998年以来，格雷格·沃尔夫一直担任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古典学院的古代史教授。他曾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移居到苏格兰以前，在这两所大学都曾担任研究员。他出版了《成为罗马人——高卢行省文明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rovincial Civiliza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与阿兰·葆曼 (Alan Bowman) 合编了《古代世界中的教养与权力》(*Literaly and Power in The Ancient World*)（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与凯瑟琳·爱德华 (Catharine Edwards) 合编了《国际化都市罗马》(*Rome The Cosmopoli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他还发表了有关铁器时代史前史、罗马经济、拉丁铭文学和罗马宗教等大量题材的文章。目前，他正致力于研究罗马帝国文化及各行省的宗教创造力。

PICTURE ACKNOWLEDGEMENTS

AKG/LONDON: pps.17 Vatican Museum, 33 Pirrozi/Museo Nationale Romano della Terme, 47 Walter Gallery, 112, 113, 327 A. Lorenzini/Museo della Civilta Romana, Rome

AKG, LONDON/ERIC LESSING: pps. 52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 55 Musée de Istoria, Romania, Bucarest, 56/57 Musée Louvre, 81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84 Museo Archaeological Nazionale, Naples, 87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 90/91 Museo Archaeological Nazionale, Naples, 110, 132, Museo Nazionale, Naples, 133 Museum of Archaeology Nationale, Aquileia, 134, 135 Musée des Antiquities Nationales, St Germaine en Laye, 154, 163, 170/171 Rheinisches Landesmuseum, Trier, Germany, 195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 224 Istanbul Archaeological Musem, 236 Villa Romana del Casale, Italy, 252 Liebighaus Frankfurt am Main, 271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280/281 286, 299 Museo Archaeological Nazionale, Naples, 304/305 Palazzo dei Conservatori, Rome, 316 Musée des Antiquities Nationales, St Germaine en Laye, 337 Louvre, Paris

AKG. LONDON: pps. Gilles Mermet; pps. 130, 190/191, 314 Musée du Bardo, Tunis

ART ARCHIVE /DAGLI ORTI: pps. 40, 115, 118 Museo della Civilta Romana, Rome, 296 Museo Capitolino, Rome, 323 Archaeological Museum Zara

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 pps. 13T Giraudon, Bibliotheque Saint Genvieve, Paris, 19 Musée Conde, Chantilly 20 Charmet Archives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43 Lauros Giraudon, Louvre, Paris, 124 Giraudon, Musée D'Orsay, 124 Musée de Civilisation Gallo Romaine, Lyon, 128 Museo Archaeological Nazionale, Naples, 140, 173 Ashmolean Museum, 177, 192 Metropolitan Museum, New York, 245 Alinari, 292 Palazzo Vecchio, Florence

CAMERON COLLECTION: pps. 249, 250

CORBIS: pps. 241, 255 inset, 313

ARALDO DE LUCA: pps. 25, 30/31, 44, 48/49, 57, 71, 75, 88, 94, 95, 100, 122, 136, 153, 169, 183, 186, 198, 239, 241, 243T, 282, 287, 295, 306, 309, 349

ARCHIVO ICONOGRAFICO, S. A.: pps. 13b, 15, 21, 22, 68/69, 127, 172, 174, 210, 261, 300, 333,

YANN ARTUS-BERTRAND: p. 196

DAVE BARTRUFF: p. 350

BETTTMANN: pps. 64, 181

EDIFICE/PHILLIPPA LEWIS: p. 274

RICHARD HAMILTON SMITH: p. 161

JASON HAWKES: p. 345

JOHN HICKS: p 77

JON COULSTON/HAZEL DODGE: pps. 145, 150, 154, 157, 164

ANGELO HORNAK: pps. 152, 158, 322

ROBBIE JACK: p. 188

MIMMO JODICE: pps. 10/11, 12, 89, 104, 114, 205, 207, 209, 212, 284/285

WOLFGANG KAEHLER: p. 216

DAVID LEES: p 29

MCDONALD: p. 231

FRANCIS G. MAYER: pps. 58, 61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BY KIND PERMISSION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pps. 3, 103,

MICHAEL NICHOLSON: pps 211b, 257

VOZ NOTICIAS: p.254/255

MASSIMO LISTRI: p.279

MICHAEL MASLAN HISTORICAL PHOTOGRAPHY: p.141

VITTORIANO RASTELLI: p. 142/143, 320

JEFFREY L. ROTTMAN: p. 308

ROGER REES MEYER: p. 203

CARMEN REDONDO: p. 268

BILL ROSS: p. 184/185

SETBOUN: p. 272

STAPLETON COLLECTION: p. 178

TED SPIEGEL: p. 26/27

KAREN TWEEDY HOLMES: pps. 147

VANNI ARCHIVE: pps 63, 167, 226, 229, 258, 264, 266

SANDRO VANNINI: pps. 217, 290/1, 343,

RUGGERO VANNINI: p. 228

FRANCESCO VENTURI: p. 351

ROGER WOOD: pps. 99, 106/107, 200/201, 267

ADAM WOOLFITT: 108/109, 341

译后记

这本书虽然是科普类的罗马史著作，但没有一定有关知识基础的读者可能读起来会感到费些气力。书中的许多人物、事件和术语对于西方受过普通教育的人也许并不陌生，因为这是他们历史教育的必要内容，但也有许多人物、史事，多数西方人也可能并不知晓，毕竟人们一般喜欢关注眼下的事物。笔者在雅典卫城附近曾多次询问过路人“普奈克斯”（Pnyx，古代公民大会主会场）在哪里，回答都是“不知道”或“大概在……”。结果还是我自己凭借地图找到了目标。所以，对于我国的一般读者，本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就属于完全陌生的事物了。有鉴于此，我们依然遵循以往译本的做法，尽量在页下增加一些相关的注释。

这本古罗马史有什么阅读价值？换句话说，生活在计算机、火箭、基因时代的人类为什么还需要了解包括罗马史在内的古老的过去？为什么剑桥大学出版社现在接二连三地编写远古的历史？这是需要或多或少解释一下的问题。

由于古代史与现实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尤其是外国古代史与中国读者似乎没有直接联系，因此许多人，甚至知识界的许多人，对外国古代史并不了解，对它的价值存在着疑问。这种疑问在我国现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整个社会注重实用知识（这里的实用主要是指能否立即产生产值和利润）的氛围中，尤其突出。

古希腊人有句箴言，叫做“认识你自己”。历史学就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种主要形式。外国古代史既然是历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外国古代史当然地具有这种自我认识的重要价值。

历史学的认识对象是人类的过去。过去之所以值得人类反复去思考，去玩味，去复制，去总结，是因为现实对过去的需要。由于现实是从过去脱胎而来的，因此同过去始终存在着紧密继承和变异的联系。所以如果不了解过去，就失去了认识现实的起点，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在，至于合理地预测未来发展趋向和选择正确的行动就更无从谈起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一位物理学家不知道物理学史，不了解本学科的过去和现状，他就无异于一个睁眼瞎，根本没有能力去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

人们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每天都在运用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积累来处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认识，我们连一个简单的概念（如马克思主义、阿以冲突等等）都无法理解。假设有一天人类失去了所有已经积累的历史认识，一切从零开始，那将是怎样一种可怕的情景？所以归根结底，历史学是为现实服务的，是人类为了自觉地认识自己从何处来，现在在何处，将来应当往何处去而形成的一门学问。世界各国都把历史作为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必修课程，其原因便在于此。

对于历史学，人们通常认为近现代史最有用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现实具有直接联系，不首先了解国史，或者对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史一无所知，就不能理解现实的中国，因此中国近现代史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自从晚清以降，中国就逐渐同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融会到了一起，到了今天则可以说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现代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几乎每一种变化，都同世界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仅以日常生活习俗而言，现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加消遣等每一个环节，都打有外来文化的烙印。若往大处着眼，不了解世界历史的外因，那么现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事业就成为不可思议的现象。再如，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最终成为执政党有着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但要很好地解释和深入地理解这种合理性和必然性，至少要追溯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要追溯到工业革命。这样一来，世界近现代史就同中国近现代史一样，对当代中国人是十分重要的了。由于近现代史同现实的紧密关系，因此世界各国的史学界或社会科学的管理部门都把近现代史研究放到历史学的优先地位。

但这不等于说厚今就一定薄古，古代史无足轻重。这是因为历史发展有连续性，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昨天是前天的继续，所以认识今天的中国需要认识昨天的中国，认识昨天的中国，又需要认识古代中国。同样，认识今天的中国需要认识昨天的世界，认识昨天的世界又需要认识前天的世界。只要人们的认识要求一旦进入寻求原因的层面，思考的时空范围就必然要向前扩展。比如要认识今天西方世界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制度，像宪制政府、言论自由、个人权利、文职政府控制军队、政教分离、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作用、个人财产所有权、科学探索的理念等等，就很自然地要追本溯源到两千多年前的希腊文明；认识国际共产主义的思想渊

源也需追踪到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长诗《田功农时》。

需要指出，这种过去和现在的连续关系不只表现为现在的东西是从过去的东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还表现为许多现在的东西就是从过去直接继承下来的。比如今天深刻影响世界大多数人思想意识的三大宗教，都是在世界上古和中古时期产生的，并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差异一直延续到当代世界，影响到当代人对国际关系大局的总认识。[1] 因此，只要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角度出发，世界上古史就不再是或不完全是遥远的、与现实毫不相干，因而是可有可无的知识了，它在许多方面本来就是现实的一部分。

此外，即使那些看上去与现实利益没有直接关联的部分上古史，也具有一般的借鉴和参照的意义，对开阔现代人的眼界，提高现代人的思维能力，加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人性具有既变又不变的突出特征。虽然从生活条件上看，现代和古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现代人和古代人由于同属智人，生理上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心理和行为也有许许多多的相似和相同之处，都半是野兽，半是天使，具有同样的贪欲和野心，具有同样的对自由、平等、爱情、幸福生活的追求，对诚实、朴素、勇敢、坚毅等品质的尊敬，对欺诈、残忍、贪婪、怯懦等品行的鄙视，以及对共同追求所展开的历史活动。

考虑到这些共同之点，没有电脑和汽车的古代人同现代人的界限就消失了，古代人的人生经验和教训可以成为、并且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所以林汉达的《东周列国故事》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读者，当代美国作家金·M·奥伊尔刻画史前人类活动的长篇小说《洞熊氏族》能在当代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共鸣。[2] 这里有必要举当代历史哲学家汤因比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一书中，特别指出促使他写作这部巨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牛津大学教书期间领悟到古希腊两大军事集团争霸战争同他身临其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古希腊的历史和现代西方的历史就经验而言，彼此之间具有共时性，二者的历史过程也是平行演进的。他因此归纳出具有相似演化过程的21种文明，后来又进一步归纳出31种文明，从而展开了自己的深入分析。我们姑且不论他的循环论和挑战、应战的理论是否正确，我们看到了一个对人类命运进行深沉思考的现代人，总是力求从古代相似的历史中寻找自己的证据和答案。

古代史的价值当然不只如此，深入讨论，还可以列举若干条。比如它也有许多人关心的实用价值。古代的遗址以及对遗址的解释，是现代旅游业的重要创收来源。现代希腊的国民收入，便很大一部分来自旅游收入。学习上古史专业，虽然不会使人成为暴发户，但可以使学习者得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这些不是它的主要价值，主要价值应该在于它是一门基础学科，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自我认识，是人们思维和修养、增进智慧和拓展眼界的一种思想来源。

本书采取编年和专题相结合的方式，在头两章简要追述罗马王政和共和制的历史之后，便进入了专题陈述。这种写法可资借鉴。此外，从选题上可以看出西方史学近几十年来偏重于社会史的学术取向，如妇女史、城市和乡村史、奴隶阶级史、心理史等等，集中体现出西方学者古罗马史研究的新史料和新解释，而这些范围广泛的新取向、新史料和新解释，是我国古罗马史方向的研究者较少了解或不易了解的。因此这本书就在普及的基础上具有了学术参考的价值。

参与本书翻译的还有首都博物馆的张继华博士，她编写和核查了本书的中文索引及重要译名，为提高本书质量贡献颇大。

诚恳地欢迎读者对本书的译文提出批评。

郭小凌

2007年10月17日于北京西郊杏林山庄

① 典型的例子是当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对后冷战时期世界局势发展趋势的分析。他在1993年于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很有名的论文《文明的冲突》，提出后冷战世界的冲突将发生于不同的文明之间。这一论点深刻影响到美国政界对国际局势的总看法。他在论文中列举的诸文明没有一个是在现代形成的，都是古代的继承物。关于这方面的评述可参见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② 在西方历史思想中，确有一些思想家，认为历史经验对现实毫无借鉴意义，只有思想束缚，如黑格尔、尼采等人，但他们的看法并没有多少市场，绝大多数思想家均肯定历史所具有的缺少的价值。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倘若不知道自己的过去，不知自己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无异于一个白痴。